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新青年

第一至四期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1923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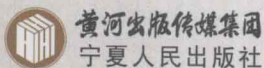
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923年

在广州改为季刊，瞿秋白担任主编，
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6年

因故停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第一至四期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 / 杨宏峰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7-04748-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409 号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一至四期

杨宏峰 主编

责任编辑 周淑芸
封面设计 陈冰融 张 宁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7.5 字数 52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685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748-3/Z·147

总定价 8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是以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之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之结集，遂使运动风靡全国。《新青年》是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要阵地。陈独秀创办该杂志时，正值民国初立，北洋军阀窃权，二次革命，袁世凯抓紧称帝，《二十一条》签订，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状况一团糟糕，如何重建政治基础，并为之作出合法性论证，在—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大有市场，《新青年》可谓适逢其时。其中，《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直至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入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代代学者直接运用，被—代代青年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可以说，《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承认，“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源，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之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

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接着说，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又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243页）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两个权威性之话语，说明它们已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非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之迷梦，对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也造成了致命打击。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向整个世界，在恐慌、震惊、自卑而又自负的不平衡心态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知识。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外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尚有其内在之根据。事实

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之挑战，而是内部传统之危机。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是在中国历史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外部示范之双重制约下进行的，这必然造成现代性的复杂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理性法则建构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个人主体领域起作用，“民族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外在前提。一旦现代政治民主以假理性之名行使专制，造成对个体空间和文化的戕害，现代性反思者便会站在人性自由之立场予以抨击，以期寻到有效平衡，重新激活现代性的生命力。中国则不同。由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重新论证社会制度与人心制度的正当性，“中国问题”一直左右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这种论证大体涵盖了三个不同层面：在历史层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现代化，在国际间不平等竞争中如何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理念如何协调，民族性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意义层面，个体承担与意义之有效性如何落实与维护。此种“中国问题”之思维，积聚着种种民族性之情绪，一再延宕着“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之转化，在民族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故，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就变成“救亡”与“启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的双重变奏。民族国家之独立与富强、政治民主化之追求与设计，被当然地置放为现代化之首要目标和考虑一切问题之基本前提与立足点。这种现代性之两难处境伴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从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一直到维新运动，莫不如此。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拶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新运动。虽然，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之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中国困局造成之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运动之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如洋务运动追求坚船利炮，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之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之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历次挫折之反思，中国人对困境之造成，才算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当然，在中国，民主之诉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愿望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之愿望中产生的，因而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目的同时也是在野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现代性之根本目标上，这两个革新派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不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维新运动推进了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的“科学”观，由以发展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其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与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故在其实质的意义上，它仍然是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其主要理路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政治人才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两个概念的极为特殊的错落关系：民主理念是包含在科学理念中而存在与发展的，科学（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的理念）之普及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理念之普及程度。此种关系，改变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真理性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这个概念也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现代政体形式的民主与作为传统的“民贵君轻”意义上的民主。直至现在，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这个理念，仍然是此两种意义之混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贵君轻”之思想。表面看来，“民贵君轻”较之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更加彻底，但它是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不可动摇性的基础之上的，故传统的“民贵君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可操作性之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但当时的“民主”仍然是像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之思想理念，是他们依照西方政治制度之形式设计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形式，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也只是他们的建国纲领，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公众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中国，以技术为重心的“科学”是国家军事与经济之发展战略，“民主”是国家政权之一结构形式，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有了很高的权威性，但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公众之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

旗帜。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同人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其性质上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这种一元化之现代文化观，至少不是鲁迅的现代文化观。我们知道，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不仅仅有“科学”，还有“文艺”。“科学”与“文艺”不但颠覆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也通过“科学”与“文艺”（人文主义）之发展传承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宗教精神。但这分明也是鲁迅自己对中国文化之期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之灵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现代性之两难的深刻性与难以化约：传统与现代、知识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科学与文化、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救人与自救……历史似乎专门要寻觅一个灵魂，来承担这无边之痛苦。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鲁迅一开始就表现出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作为传统文化浸润哺育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话语之界限，其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归宿点不可能溢出《新青年》同人之主体思想，即背后悬着一个大写的民族与国家之目标。所以，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至“文艺救国”之自觉选择与倡导，是他最基本的动力与归宿。以《新青年》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的，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科学运动，而是一个崭新之思想文化运动，并且是以文学革命为主体之文化运动。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有《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提倡的都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刘半农同时是诗人、散文家，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家，他们尽管没有像鲁迅那样明确的意识，但却绝对不是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科学与文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元价值观绝对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之思想理念，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文化意识。总之，《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之“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之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次将《新青年》重新排版录入，将原竖排繁体字版改为

横排简体字版，杂志内容全部保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初之心愿。此套典藏横排简体字版共合订为12卷本。真心希望这套横排简体字版的《新青年》能够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许，当我们重温五四先贤们激扬奋发的言说，感受他们当年那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我们的灵魂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

是为序。

杨宏峰

2010年9月10日

凡 例

《新青年》以简体典藏全本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编辑的总原则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只在字体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版式上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在内容、语言表述上保持原貌。

二、关于版式的处理原则

1. 竖排版统一改为横排版，双栏统一改为单栏。
2. 栏目标题（无论“目录”还是“正文”）统一用黑体字排在左上方。
3. 独立引文缩进两字，用楷体，其他引文与正文字体一致。
4. 剧本等特殊文体改为横排时遵循目前的通用格式。
5. 原稿中通信落款全部统一改为另起一行，行末空两字。

三、关于用字的处理原则

1. 《新青年》（上海书店影印版，以下简称“原件”）中的繁体字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执行标准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2. 字形用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相关字体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的字形，严格杜绝港台字形的混用。

3. 原件中附有《勘误表》的，此次排印按《勘误表》所列内容进行修改。

4. 原件中的错别字，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修改。

5. 原件中明显的脱文，用〈 〉补充在相应的字后。

6. 原件中的衍文或明显有疑问的字，在该字后标注“（？）”。

7. 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表示，如参考其他文献获得可靠字形的，在□之后用夹注注出。

四、关于句子、词语等的处理原则

1. 未改变原件的句式和语序（即使欧化或文言色彩很浓的句子也不作变更）。
2. 原件中的结构助词统一改为现代汉语通用的“的”“地”“得”，其他虚词不作改动。
3. 原件中的实词（主要是常见双音节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准，凡《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标准词形的，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或《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收录但词义与原件所用有出入的，不作改动。
4. 方言词保留原貌，但用夹注的形式加以标注，如“麻雀（即麻将）”。

五、关于标点符号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无标点符号者，须加标点符号。新加标点符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2. 认真阅读原件中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相对照，相同的予以保留，不同的以《标点符号用法》为标准作调整。

六、关于注释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脚注、篇末注、文内夹注一律未作改变。
2. 原件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横排单行。
3. 原文中人名、地名所用下画线、着重号等全部删除。

七、关于外文词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外文只改为横排，英文书名用斜体字标示。
2. 原件中的外文音译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八、关于图表、广告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广告一律未收录。
2. 原件中的照片一律未收录。
3. 原件中的普通图表改为横向排列，遵循目前印刷通例；跨页式图表略作处理，使之不跨页，亦不影响内容表达。

目 录

凡 例	1
-----------	---

第一期

民国一二年（1923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新青年之新宣言	/ 1
国际歌	/ 5
赤潮曲	秋 菜 / 8
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	瞿秋白 / 9
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	瞿秋白 / 28
俄罗斯革命之五年	列 宁（Lenin） / 42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屈维它 / 49
东方问题之题要	一 鸿译 / 56
共产主义之于劳工运动	洛若夫斯基（Lozovsky） / 64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	陈独秀译 / 77
世界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华尔嘉（Varga）之说 亦农编译 / 81
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	/ 87
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	瞿秋白 / 95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统观	永 钊 / 106
评坛	
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	秋 白 / 109

第二期

民国一二年（1923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阶下囚 郑韦之/ 111

诗

革命 VON HEINE 文虎译/ 118

颈上血 工人某/ 118

进行曲 赤军 文虎译/ 119

过去 巨缘/ 119

天语 双莫/ 120

知心 瞿景白/ 121

飞来峰和冷泉亭 瞿秋白/ 121

出狱 刘拜农/ 122

狗熊（独幕趣剧） 俄国·柴霍甫著 曹靖华译/ 124

荒漠里 陶畏巨/ 136

科学与人生观序 陈独秀/ 140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瞿秋白/ 145

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 蒋光赤/ 154

社会之现在与将来 周佛海/ 160

列宁论 张秋人译 腊狄客（Karl Radck）著/ 167

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书录） 周佛海/ 174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 屈维它/ 179

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山川均著 王国源译/ 197

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 史黎雯/ 215

共产国际一九二三年大执行委员会纪要 施陶父辑/ 230

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 张国焘译/ 234

第三期

民国一三年（1924年）八月一日出版

答张君劢及梁任公	陈独秀/ 241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瞿秋白/ 249
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	蒋侠僧/ 254
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	蒋侠僧/ 259
辩证法与逻辑	蒲列哈诺夫 (Plekhanoff) 著 郑超麟译/ 271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	阿多那斯基著 石夫节译/ 278
生产方法之历史的观察	周佛海/ 281
马克思与俄罗斯共产党	梨亚荫诺夫 (Riozanov) 著 罗忍译/ 297
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基本条件和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著 尹宽译/ 301
现在的力量	罗若夫斯基著 赵世炎译/ 305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	/ 308
《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自序	李季/ 317

第四期

民国一三年（1924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彭述之/ 330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陈独秀/ 341
广东政府与国民革命	卫金/ 347
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	郑超麟/ 353
国民革命之土耳其	瞿秋白/ 363
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	蒋光赤译/ 375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	蒋光赤译/ 381
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	光赤译/ 384
中国战争	列宁/ 390
革命后的中国	列宁遗著/ 394
亚洲的醒悟	列宁/ 396
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	列宁/ 398

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	郑超麟译/ 400
黎明期的台湾	沫云/ 406
伦敦会议之面面观（九月十六日巴黎通信）	任卓宣/ 415
后 记	/ 424

第一期

民国一二年(1923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新青年之新宣言

我将创造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簇新；请几万万人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歌德之浮士德 (Goethe, "Faust.")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女尊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

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它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节自卖，真正地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于“革命”的观念，得有更切实的了解，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所以新青年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将于宗法社会的思想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必须力除种种障碍：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笼统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碍；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琐屑的对付，谬解科学，“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碍。因此种种，新青年孤军独战，势不均力不敌。军阀的统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此之残酷，学术思想都在其垄断购买威迫利诱之下，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得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内受军阀的摧残，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迫，所以困顿竭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无限的同情，必定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遇威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务期不负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重新整顿一番，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名其妙，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否认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

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尽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之新活力，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猥猥琐琐泥滞于目前零碎的乱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为解决问题；更不宜好高骛远，盲目地爱新奇，只知求所谓高深辽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地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细加细绎，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绝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悉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学艺术思想的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颓废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此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却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所以觉得各国有各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滚入国

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社会科学，因研究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上最客观的。何况新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青年上来，令它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会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以求智识上的武器，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而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最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共产国际。所以新青年新整顿之时，特以此“共产国际号”为其第一期。

国际歌

“国际”一字，欧洲文为“International”，歌时各国之音相同；华译亦当译音，故歌词中凡遇“国际”均译作“英德纳雄纳尔”。

此歌自一八七〇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欧美各派社会党，以及共产国际无不唱此歌，大家都要争着为社会革命歌颂。

此歌原本是法文，法革命诗人柏第埃（Porthier）所作，至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时，遂成通行的革命歌，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

诗曲本不必直译，也不宜直译，所以中文译本亦是意译，要紧在有声节韵调能高唱。可惜译者不是音乐家，或有许多错误，然而也正不必拘泥于书本上的四声阴阳。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今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再则法文原稿，本有六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三节，中国译文亦暂限于此。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

拼死一战决矣。

旧社会破坏得彻底，

新社会创造得光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从今要普有天下。

这是我们的

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纳尔 (International)

人类方重兴!

这是我们的

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纳尔 (International)

人类方重兴!

不论是英雄,

不论是天皇老帝,

谁也解放不得我们,

只靠我们自己。

要扫尽万重的压迫,

争取自己的权利。

趁这洪炉火热,

正好发愤锤砺。

这是我们的

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纳尔 (International)

人类方重兴!

这是我们的

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纳尔 (International)

人类方重兴!

只有伟大的劳动军,

只有我世界的劳工,

有这权利享用大地,

哪里容得寄生虫!

霹雳声巨雷忽震,

残暴贼灭迹销声。

看! 光华万丈,

照耀我红日一轮。

这是我们的
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
人类方重兴！
这是我们的
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
人类方重兴！

赤潮曲

秋 菓

赤潮澎湃，
晓霞飞动，
惊醒了
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何论黑，白，黄，
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
只待共产大同…

看！
光华万丈涌。

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

瞿秋白

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在人类文化史上，自然有相当的功绩。封建制度的末流，实在令社会生产窘迫不堪，必须别求出路，而资本主义的“发财自由”主义，就代之以而。固然“发财自由”不但解放个性，而且增长社会财富。这是资本主义初期的景象。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仅仅及于西欧与新大陆，等到有了百余年来发展，资本主义本其无政府的及掠夺的根性，盲目的无限制的扩张，波及全世界，乃不由得不得成帝国主义。那时，发财也不见得很自由了，掠夺的对象也渐渐地缩小范围了，而无政府的根性却不得不发作。因掠夺的地盘缩小，所谓“自由的竞争”就渐成了强力的战斗，一经济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渐渐消灭，而各经济范围间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增长，于是酿成千古以来绝未曾有的大屠杀——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欧战，这是自然的结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现存的生产制度所限制。世界的文化，人类的生存，因生产力的抑遏不舒，爆裂的冲突时时发现，已经处于非常之危险的地位。现存的制度不破，人类的文化决不可救。社会改造的机运，已经具备；而且非于世界的范围内着手不可，务必竭力消灭各经济范围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所以绝非一国一区内的改造所能济事。

谁能改造社会？社会之中，因现有的私有生产制度、自由发财制度，不断地造成贫富的阶级。此等阶级，因其对于生产制度的关系各不相同，而经济利益往往冲突。所以对于现在的社会，凡是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必定竭力拥护，无论他有多好的“良心”、多高尚的“理想”，一到利害关头，他必誓死保存现社会，一切理想都成泡影。更狡猾的，还能想出种种敷衍办法，缓和政策，好像破屋子上，横七竖八堆砌补缀，东一块砖头，西一块石条，非到一旦倾圮同归于尽不止。现在的生产制度是资产阶级的“命”，如何能想望他来改造社会。无产阶级是生产力之一，只有无产阶级，机器生产的工人，方能有改造社会的责任；其他一切劳动阶级，亦只有与此最有组织力，

最反对现存制度的无产阶级携手，方能于复兴世界文化的伟大事业之中，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无产阶级的生长，就是生产力的生长；无阶级的发展，正可以彻底冲倒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以独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力、经济力、政治力之增长，乃是新社会的基础，无产阶级于革命运动中的锻炼训育，及其智识觉悟的增高，方是对抗旧社会，毁灭旧制度的实力之积累。一时的成败进退攻守的局势不同，而最后的胜利，必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运动中的经验，能增长其阶级的战斗力、阶级的觉悟力。不但如此，战斗力之强弱，且不完全在于训练之良否及经验之多寡，乃大半在于阶级的根性。资产阶级在私有制度中是主人，在发财自由主义之下是主动力，互相竞争绝不顾社会共同生产之规划，是他的根性。所以无论如何，他必发现经济上的无政府倾向。资产阶级内部绝对不能消弭矛盾冲突，因此而有他的无组织性的特征。在此社会文化濒于危亡之际，无产阶级积极备战之时，资产阶级始终还是互相猜忌顾东失西，一定不免于败灭。无产阶级却与之相反，在私有制度中是对象，在发财自由制度之下是受动者；机器生产之物质生活使他不得不有统筹全局团结组织之根性。虽因资本主义在各地发展有迟速之不同，无产阶级之形成也就有久暂之别，然而经济动象之趋向，始终日就汇集同化。所谓“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 y s. unissez-vous!*）不仅是主观的表示意志的呼声，而是客观的必然的结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斗争。更进一层，无产阶级的胜利方能改造社会，又是什么缘故呢？此一问题的答案，正和上述的阶级根性相同。无产阶级的集合性，是经济政治现实的趋势所产生。假使无产阶级仅仅抱一“均产主义”，那么，岂不是复活千百年前的旧古董，循环不止的中国式的治乱相代的现象，犹太古教“五十年均分一次财产的制度”，哪能行社会改造！只有根据于无产阶级集产的可能性，经过社会主义有规划的经济制度，尽量发展生产力，令人人都能享受脱离私产束缚之自由及涵养智识文化之权利，方能渐进于无政府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营利观念，不断地引起战争，紊乱经济，如何能谈到社会改造，如何能救世界文化。假使无产阶级不能于第一步军事上战胜资产阶级，第二步政治上战胜资产阶级，第三步经济上战胜资产阶级，那就永久没有行向社会改造的可能。

于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改造，决非中国式浑朴可笑的头脑中之“穷人造反”，而是社会科学的结论。

或者说：“固然不错，资产阶级因切身利益而反对改造社会，负世界文化使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对之行剧烈的阶级斗争。然而难道资产阶级眼看着文化破坏，永不能反省而自克制，行社会改良，令无产阶级仅须加以督促，岂不是和并行向新社会的建设么？”“何必一定要有革命！何必不许和平的进化！”很好！请看欧战后的社会改良成

绩：凡尔赛相会之后，华盛顿会议，土耳其战争，罗尔问题，各国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加长，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进逼，新战争的危机又在眉睫，好个社会改良！何况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根性，决不容资产阶级擅自让步。资本主义的发现，带着掠夺性而来。固然，现存生产制度，比之于封建制度，能造出更多量的“赢余价值”，一时尚令社会有一长足的进步。固然，若在社会共同生产制度之下，“赢余价值”归之于社会公有，愈多则社会文化愈进。然而私有制度的末流，同资产阶级的独占“赢余价值”已成为社会进化之障碍，现时实失其自由竞争之优点，反为生产制度之社会化的死敌。况且资产阶级既独占“赢余价值”，在客观的经济结构上，他若放弃此权利，他自身就不能存在，这是他的命根，即使以社会改良政策渐渐限制私有，限制赢余价值之占有至一定范围时，资产阶级必定“反噬”，有历史的事实可以说明。所以无产阶级必以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令失所凭借，而后得自由处置此私有制度，使合于行向社会主义之目的……资产阶级凭借政权一日，私有制度之害永不能除，资产阶级却不惜以强力拥护其“命根”——私有制度，而无产阶级也就不得不以强力争取政权，仅就最近的世界史上的事实观察，就可以明了。德国革命后之国有企业制度，所谓“以和平的方法取得之胜利”，如今已成泡影。德国大资本家史汀纳斯（Stines）不但渐渐占有国家的财富，而且还竭力主张非行十小时工作制不可。实业“国有化”（nationalisation），如今落得个“史汀纳斯化”（Stinesiation）。请问各国的改良派，这是何着“胜利”？德国当初无产阶级若能按“国有”呼声继续猛进，取得政权，令所谓“国有”成无产阶级的国有，未始不是改造社会之第一步。而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必定要显他的神通“怕流血”，现今始终是要为罗尔而流血呵！

所以无产阶级的社会改造，决不在于他要不要，而在于他干不干。并不是无产阶级格外地喜欢革命，格外地喜欢“杀人流血”，格外地欢喜“强力”，而是为资产阶级固执的强力的手无所逼迫，不得不如此。况且世界现实社会中之动象，其客观的科学上的公律又不许资产阶级不取强力的压迫方法，亦就不许无产阶级不用强力的反抗方法，世界文化的出路，唯在于此。无产阶级应当干去！

无产阶级既不得不革命，又应当革命；既不得不创造新社会亦就应当创造新社会。新社会的形式、组织、结构，都在此剧烈斗争的过程中。其双方力量衡比之结果，当时当地自能发现种种不同的，先后错落的各阶段，然而最终的目标及根本的原则：必定先立劳动者独裁政体，方进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以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所谓“斗争的过程”，实是现实社会制度所必有现象；而改造此社会，必在有时间空间及物质的现实世界中，依其各种力量、各种阶级相互敌对持角之势，流动变迁之状，而取得指导前进改革处置之权：决无死的范式，可以在智识阶级头脑之中预先拟定一理想的社

会，拿来按照条文实施。一切以消费生产相对待，求劳资报酬相协调的空理论，都是废话，或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后，至经济进化的某一阶段，自能实现类似的形式，而现实革命时，殊可不必有此等乌托邦的幻想。圣西门、傅立叶，以及其他一切所谓“社会主义”，每每犯这个通病。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初输入时，所谓“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辨，都是泥滞于此最终理想的新社会形式上，枉费不少唇舌。其实马克思派革命的共产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绝不在于最终的目的，而在于过渡的政策。虽然，所谓“过渡”，亦不是盲目的适应主义。正因斗争的过程里，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处于社会改造的先锋地位，所以能本其阶级的经济利益，深察社会动象之变态能力求胜利，亦就是力求复兴文化，乃是客观的不得不然的局势。哪有时间空间及物质的社会，既呈一统形式，则必有某包涵万象的动律，必有其总原则，方能发现此因时而异的各阶段。无产阶级生在这社会里，若要自救，若要改造，必须汇观深察此社会之总体，而得一总原则，以适用于现社会中之斗争。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敷衍涂砌。譬如：

……考茨基以一理论家的资格，著作等身，如今却处处讲许多玄想的蠢话。他处处想证明新发明的真理，其实是伯恩思敦的旧货。譬如说，他忽醉心基尔德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以为：工会即使不取政权，亦能步步渐进，实行社会主义；工会竟能实行社会主义，所谓背着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实行。可是，应当相一（？）注意工会所处的地位，尤当注意工会在此资本主义社会日就破毁之时的财政状况，便可知道此种假定，完全是幻想。工会现在好容易保存一些罢工基金斗争基金，如何能想望他们背着资本主义社会来造社会主义。

其次，还有改良派心爱的“市政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 Communal），所谓市有制度，凡稍知西欧状况之人，却知道不但是国家中央财政破产，而且地方财政亦是如此。现在并不见私人财产过渡于市有，以行近社会主义；而是市政公有机关及企业，正当竭力抵御资本家妄想攫取的政策呢。

或者说，较无流弊的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可以用相当的价值赎取资本家的财产。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对于英国地主制度的问题，曾经说，有赎取其地产之可能。可是他绝没有以为可行之于取得政权之前。此一问题，现在的欧洲又待怎样？即使说，政权已经取得，只要向资本家赎取其私产。然而人人知道，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却必须竭力减轻国民经济所负之重债。所以在我们的现代，这一“较无流弊”的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方法，亦已成幻想……

——德共产党代表在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之演说。塔尔黑梅 (Talheimre)。

于是可见世界的无产阶级既不得不实行改造社会，并且应当实行改造社会，却尤其要有对于此社会之现实的考察，勿堕于幻想，要有对于此社会之总体的运用，勿敷衍苟安，就是应当有改造社会之计划，改造社会之步骤，改造社会之总原则——党纲 (Programine)。

可以确实断定，无产阶级改造社会之党纲，绝不是头脑里幻想的新社会之死范式，亦不是盲目适应的敷衍主义。现实的世界社会，要求改造甚急，容不得书生从容不迫地妄想吃天鹅肉，更不许市侩宥于局部的瞎对付。无产阶级应当有积极奋斗的进行计划，方能拯救普天下的劳动者，人类之文化。

社会既不得不改造，尤非无产阶级负此重任不可；欲改造则非以革命的方法不能行，实际上不得不诉之于强力；既欲革命则更当有现实的综合的规划，绝不能依于虚幻或苟安的理想。总之，无产阶级，秉其集合组织之根性，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深察世界社会中之动象，得有切于现实的总原则，以为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之方针，进而求发展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自身，亦即以整顿世界经济的总规划，由此，方能以革命的方法改造社会，复兴人类的文化。

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地方共产党联合的总党，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改造社会事业之先锋。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会时，已经发布一“宣言书” (Manifeste) 及一“大政方针” (Plateforme)，第二、第三次大会以来的共产运动，更能以实际行动证实他的忠于社会改造事业。总原则、总方针早已明显于世。至第四次大会 (一九二二年末) 共产国际已大发达，五洲各国无处无共产主义者的运动，因此各地实际的政治经济状况渐得而研究综合，加以四年来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变迁，及无产阶级奋斗中之经验，于是可以更详尽地规划世界革命事业，故亟亟讨论及于党纲 (Programme)。虽然，各国各地因经济发展有程度之差异，其客观状态有明显与否之不同，所以党纲上之改造规划，还应有极慎的研究；再则，最终目的及过渡政策固然在共产党内可无大歧见，然实际施行的，极具体的计划，是否应当规定在党纲上，还得取之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因此，决定此次仅议及党纲之大体，至于详细的条目，一方面交委员会，一方面请各国共产党及时建议，留待下次大会，作最终的决定。

如今，论社会改造须有党纲之必要已明，便当述及共产国际之内容，可以分作三

部分说来：一、共产国际诞生以来的世界经济现象；二、共产国际现今在世界政治中之位置，凡此二者，都是客观的所当改造的社会之实况及其中互相敌对的各种动力之关系，三、共产国际党纲之学理上的根据，及其大体纲要；此乃改造社会之总原则及总规划。

一、世界经济现时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下，此经济的基础已经动摇。经济危机愈紧迫，是所及范围愈广，则“资本之进攻”愈猛，逐渐蔓延，到处进逼，已成为现时世界上最突显的事实：此种攻势，其动机实起于资产阶级力求避免危机，而欲以经济的重负归之于工人阶级。

当欧战之后，资本主义曾经一度让步。大战所引起之群众间的不平，到处爆发，显然有革命的性质，当时统治阶级力求“纳此不平之象于法律范围之内”，所以屡屡让步：“自愿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国际劳动局，令实行协约国“爱恤工人”之心愿。从一九一八年末至一九二〇年末，资产阶级的确退让，勉强肯行一点社会改良，实则全为救急起见，因此也居然骗过了无产阶级，仍旧保持统治权在手。

不但如此，这一期的退让，更与战后工业暂时的联盟大有关系，所谓不但有退让的必要，而且有退让的可能，当大战时，横截世界经济为两部分，及大战后商品交易才能开始，中欧本为最需货物之地，如今骤然加入市场，世界的市场扩大。再则，那时工业的兴盛，却还因为各国怕企业倒闭，勉强履行互相前定的军器制造奖约。其实战争已完，此种经济政策是极不自然的，不过因为那时关闭工厂，失业工人中更加一层刺激，则革命之祸必不能免，战胜的协约国行了一极聪明的政策，他们竟请国际的工会首领去解决所谓一切根本问题。他们的自由主义真“自由”到极处，竟请最恭顺的社会主义爱国派参加商定凡尔赛条约的第八篇，又立了国际劳动局，可是其中资本家代表占了四分之三的多数，这就算证明民主派真正得胜了，工人阶级从此可以满足一切要求，一切愿望，哼！

这一出滑稽戏，居然找着不少大工会来参加。亚摩斯德丹之职工国际（见本期《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尤其尽力。因此开了一次华盛顿劳资协议，议决〈是〉一很广泛的社会改良案，几乎是全体通过的（赞成八十三票，反对二票）。可是当时就宣告，此一议决案实行与否，听各政府自便，资产阶级很明白：只管答应，实行时再说。自然，社会中之阶级斗争完全是实力问题。资产阶级在自力巩固的国家里，尽可绝不过问此种白纸黑字的议决案。而于没有能力的资产阶级，怕工人革命，自己不等议决案，已经赶紧行八小时工作制，借此做一个顺水人情，显一显他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此种帝国主义首领和“劳工官僚”的协作延长二年之久。亚摩斯德丹之黄色职工

国际的领袖，还屡次在演说里论文中，证明国际劳动局的重要，劳工阶级的“胜利”。当然，其时共产派及革命的工会，很不相信，“国际劳动局靠着英美法政府的资助而存在，难道能有利于工人阶级”？可是也真有工人深信此种“胜利”。

“劳动从此不应当是货物”，凡尔赛条约第八篇居然写上此等文字，岂不可喜。固然，当初也有人怀疑，认此凡尔赛条约简宜等于土匪的绑票手段。然而这类的人，大半都染着些“布尔塞维克的野蛮气息”，很可以不听他们胡说。当时大家兴高采烈地说，社会改良的劳工立法已经有凡尔赛条约“做保证”了，听着政府代表也演说工人阶级的能力，说“至少他要实现最少限度的正义”。真有那种傻子，相信这些鬼话！

然而这出滑稽戏不久就闭了幕。工业暂时兴盛的一期过去，退让的可能消失，资产阶级也就不客气了。一九二〇年中间，各国经济渐起变象。市场上货物太多，资产阶级政府的恶政策的影响发作，俄罗斯，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受封锁而隔离于国际贸易之外，凡此一切，都是促成经济的危机，暴露帝国主义战争之恶果。于是企业家及其政府，渐渐对于劳动阶级取进攻之势，力谋“自食其言”。经济界的危机因而益显，劳资协调的酣梦也就快醒了。

此种危机究竟是何等性质？一方面有几个国家，所有货物非常之多，别一方面，却有几国受货物缺乏的惶恐。换言之，就是一方是生产过剩，一方是生产不足。各国的债务已达可惊的数目，租税的增加一日千里，甚至于有“工资税”，同时军国主义仍发展不已，军备费的挥霍不可限量。一国里工资很高生活程度较优，而别国里工资比战前低落数倍。财政更加紊乱，世界上显然分出两种国家。一种国家的货币价格甚高，如英法美比荷瑞典挪威，而另有一种国家，则货币价格低落不堪，如德奥等。中欧的状况，非常危急，工资低落，货币低落，生产成本可以较贱，于是协约国中立国的资本家都到德国工厂订货，而自己国内的企业停闭。因此货币价格高的国家里，失业工人日增无已。

德国工厂承办外国资本家的订货如此之多，它的原因，我们只要稍一留意欧洲各工业国中工资的状况，便可以明白。英国工资据一九二一年上半年之调查统计，较之德国高出十一倍。此等生产过剩的国家里，工资既高，资本家自然竭力想法克扣。此地既有订制货物于德奥而自闭工厂之可能，亦就可以趁此减少尚在营业之工厂内的工资，自减少百分之三十，四十以至于五十，一次达到目的，第二次又继续进取。这是所谓“资本进攻”之最明显的特征。此等资本家必欲平衡工资，以备在世界市场上能与德国竞争。当时参与掠夺德国的各工会，如今可算受着了报应。不但德国工厂之订货，成为失业之主因，并且战胜国的资本家还借此以克扣工资，以行其“社会改恶”，却并非改良呵！

资本之进攻不仅是减少工资而已。实在是世界经济总体的停滞。美国失业日增，英国失业至于二百万。八小时的工作制在英美瑞士荷兰法兰西意大利实际上已经取消。又是为了轻减生产的成本。凡尔赛、华盛顿的高会，现在想来，真成一梦。此外，还有公债国债，凡是加重平民劳动者的负担的，资本家政府都拼命地保存。不但如此，实际上延长工作时间还不算，甚至于想在劳动法上根本推翻八小时制。总之，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延长，限制工厂委员的职权，实际上破坏保护女工童工的法例，一层一层剥削工人阶级的权利。凡此一切，资本家不但假手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甚至于自立专门机关，以武力解决。俄国革命不但是工人阶级的教训，而且警告了资产阶级——世界的资产阶级，鉴于二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的失败，居然也学着了不少乖，还没有等到革命，他们已经组织反革命的军事组织，各国有各国名称徽号，如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都有，专雇一班失业军官、无赖光棍，殴打罢工工人，焚毁社会党报馆，施行暗杀等，资本主义的政府故意纵容，绝不过问，各殖民地以及中国，外资骤增，帝国主义压迫及于穷乡僻壤的农民劳动者，而各卖国政府更助纣为虐。

资产阶级实实在在觉着这旧社会的基础动摇，四方八面想尽方法弥补，而无产阶级因有改良派的蒙蔽，屡次受欺罔。旧社会的根性，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流毒，实已彰明较著，无可讳饰。社会之进化已遇一绝大的障碍；无产阶级的处于如此之困顿的状况之中，他的利益问题，实已成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经济状况的解释，如尚嫌不足，可再进一步论国际的政治现象。

二、世界的政治现象，在凡尔赛和会之后，也有绝大的变更。帝国主义战争既为资本主义必然的结果，则今日之国际政象也就是四五年来经济的总危机的酷报。

北美合众国于经济上现在已占世界最高的地位。英国当初所怕的德国虽已倾圮，而又来了一个美国，足以成他的死敌，世界外交关系上遂有一重要问题：究竟还是英美冲突日益增长呢；还是条顿民族的同盟？当然，此后国际政象与此问题大有关系。现在还不能有具体指实的答复。英国资本界中，大众都非常明白与美国竞争之危险，而想力行英美之协作。然而协作之可能，必须英国资本无条件地降服于美国资本；美国现在气盖一世，只顾着自己的利益，绝不愿轻易让步。英国外交家口头不断地说英美协作，英美亲善，实际却不能做，英国国际的威信似乎还很可靠，决不随便低头妥协。现在正有两种趋势，一种求接近，一种想竞争，双方外交界之间这两种趋势互相消长，始终暴露英美间的互竞。不但华盛顿会议上之海军军备案使我们格外明了协作之难能，而且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两大工业国，同具海面势力，必起斗争，而难妥协。

美日利益大有冲突，又是已成的事实，不用赘述。这一冲突问题与英美协作大有关系；英美协作可能与否，亦就可以决定美日冲突爆发与否，总之，美日间投资投贷等经济利益的冲突，及映到国际政策上来，远东的局面必定大受影响。

英法互争欧陆的霸权，以及近东问题，更是最近几年国际政象的结果。英法利益相矛盾，确是欧洲国际政策的大关键，然亦与英美间的关系大有渊源。法国现在军事上的强盛却没有经济上的基础。法国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竭力组成“德法煤铁托拉斯”。罗尔问题尚未爆裂之前，德国资本家史汀纳斯曾屡屡想做成此事，希望法国鉴于资本主义联合之利而改变对德政策。然现时法国已经急不及待，竟以强力实行其煤铁政策。此种计划能达目的与否，全看英美竞争激烈与否。假使竞争激烈，法国将成美国之工具，美国或竟援助法国而抗英。假使美国得英国某一方面的让步，亦许成一候顿民族暂时的联盟，此海面国的结合，将实行封锁欧陆，令德法同受实际上的困厄，以遂其侵略政策，然而设有这种局面，将来英美间冲突的爆发，必定更加剧烈几倍。

德奥现在已成国际政策之对象，所以国际间列强关系无论如何变迁，都不能有与德国以出路；除非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转成国际政局中之积极动力。欧洲列强间关系之变迁，至多只能变更欺压德国者的姓名，而德国始终永在受动地位。国际政局中的动力，必须是有反抗力的国家；如今德国资产阶级在国内日夜与无产阶级相斗，实无余力反抗协约国。所以德国国际地位至多只有形式上的改换，而不能有内容上的差异。

俄国现在却已成国际政局中之一大动力。记得去年十月间巴黎《时报》（“Temps”）都有这种承认。法国政府向来是最反对赤俄的，现在他的政府机关报都不得不承认，可见此中的意义。全俄疆域已入无产阶级之手。俄国赖有赤军之保卫，遂能对资本主义的世界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策；竭力周顾境内“非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得大多数东方民族东方国家之同情。虽因历史的隔离，往往双方不明当地的风俗旧习及内政的细情，难免有许多次外交家的错误。然而东方各民族始终渐信：可以利用俄罗斯以达解放的目的，况且实际上也只有赤俄，因其客观的阶级的利益与东方诸国同，故能为殖民地解放，民族解放之支柱，力与世界帝国主义奋斗。可见苏维埃俄国虽然经济力尚弱，而确能保持已得之胜利，渐成列强之死敌。

世界政治现象中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什么时候爆发，以至于引起第二次的战争，一时也不必胡猜年月。世界的资产阶级已经受上次欧战的打击，伤痕至今未复，实在也非常之怕新战争，新战争起又必为世界革命最终胜利的导火线。因此他们自己竭力互相求妥协，然而资本国家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各方都不肯自己牺牲，以顾全“资本界的共同利益”。刚有妥协之可能，同时立即暴露敌意。现在一班欧美盲目的外交家、

少数国际的专制魔王、“伟人”，决不能实行恢复经济的事业。因此，凡尔赛条约的破产，更将因“重新分赃”而引起新冲突。

自凡尔赛条约之后，国际间所起种种冲突中，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可惜竟没有能处主动的地位，而反成国际政策的对象。因为改良派的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及一切黄色的职工联合会同盟，往往不但不能恐吓资产阶级，反而安慰他们，此等改良派所行政策大半是叫资产阶级放心——改良派因怕革命而帮着反对赤俄，实际已成资本主义的卫队，况且他们的政策，只求免除战争，就是完全恢复资本主义的残酷制度，亦所不惜。此种苟安心理，听来岂不是爱和平，实际上又是堕入竞争、战争、瓜分、掠夺的“轮回”。

于是共产国际真成唯一的国际的革命派。他能渐召集无产阶级群众，领导之反抗资本世界，现势之下更可与此欧战后社会恶象奋斗，由经济的要求进于政治外交的干涉。此种斗争，既反抗帝国主义的新战争，尤当竭力反对“帝国主义的伪和平”，而以本无产阶级的原则改造全世界为职志。

总观世界现势，实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双方之间极剧烈的暗争明斗，其间自右至左自有不少过渡的派别，“中央”的派别，其实在政象流动之中，倚重倚轻之势不向“右”即向“左”。苏维埃俄国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营垒，不过已组成国家的形式而已。改良派每每笑骂苏俄的国家政策，共产国际的偏袒俄国等等。共产国际的答复乃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国家之利益乃是组成国家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之利益，他是世界无产阶级中已得胜利之第一部分，所以他的利益就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见腊代客 Radek 所著《凡尔赛和约之取消》，一九二二年，莫斯科）。世界资本主义日就衰落崩坏，而苏维埃俄罗斯日益强盛巩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渐渐兴起，自力日益充足。双方的斗争必趋于决裂。于此斗争之中，苏俄及共产国际乃成解放国际无产阶级及一切近东远东受剥削的民族之中心势力。固然不能说定，此一斗争延长到什么时候，然而猛勇精进的世界劳动者平民一有反抗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财阀的伟力，必定能得最后之胜利。尤其应当赶紧预备，组织锻炼，第一先当对于世界政象中一切变态加以详尽的研究。各国的共产主义派，真正的革命派，以至于真正的民主派，必须明悉世界政象中各个具体的事实及其综观的意义，分析明解，立即与以适当的对待政策。如此方能唤醒全世界的劳动平民，令自觉地位之危急及人类文化之险象，而激起其一致的革命的意志。

世界社会的改造既如此急不容缓，共产国际的责任尤其非常之重大，现实的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之现势既已如此，绝非苟安的爱和平者所能宣言反对。况且现社会崩坏的命运，实是资本主义根性中所带来。共产国际代表无产阶级来改造此社会，乃是

客观的必不可免的事实。他改造社会的总原则、总规划也就是根据于此现实社会的动向而立，可述其学理上的根据及其大体纲要。

三、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之党纲问题，提案本有四个，尚未有最终决定，已如上述，当时议场上以蒲哈陵（Bonkharin）之提案及塔尔黑梅（Talheimer）之提议为最详尽细则。兹所述大半本他们的解说。

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其社会改造规划之学理上的根据，必当先究其来源及其与第二国际的区别。读者若不熟社会主义史，欲知何谓“第三”“第二”，可参看本期“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一篇。第二国际在欧战前的党纲，理论上的原则已经伏了战时破产的祸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马克思昂格士之马克思主义；第二期第二国际之马克思主义；现在第三期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更近于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回复第一期的精神。第一期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之产物，自然有真正的革命的精神。正因当时全欧动摇，而无产阶级第一次以革命阶级的资格，作跃登历史舞台的尝试，马克思昂格士的学说涵养生长于其中。学理的发明，正在于试用以解释学者所处环境，所以在这磨砺锻炼研究过程中，能发见社会科学之真理，绝非静止的抽象概念所能左右。此后第二期的发生，尤足证明社会思想受环境动象的影响。一八四八年前后的革命时期既过，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进化之中，世界史上已开另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增长，那时正全赖于资产阶级之殖民政策，即大陆工业之繁盛，大半由于剥削殖民地弱小民族而来。此种现象，遂引起欧洲各民族中内部社会的变化。在经济上工人阶级日益强盛，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造成畸形的劳资利益相共的结果。大陆上劳资利益相共的局劳（？），不期然而然，引起无产阶级思想之变迁，社会党之中自然亦是如此。此后乃有“社会民主派”发生，所谓社会民主派的马克思主义，于是有“正统派”与“修正派”之争辩，“正统派”为考茨基，“修正派”为伯恩思敦。当时似乎是正统派战胜，其实现在的回顾，却是正统派对修正派负荆请罪，“赔不是”的景象。一切理论上根本问题的争执，考茨基的自辩，还在战前好几年，已经是处处赔不是的口吻。当初大家社会主义者还不十分觉着，现在历史的教训，实在教人深省，此中一切缘因结果已了若指掌，约可一一分述。

贫化论 考茨基对此问题的结论，已经比马克思的温和得多。他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人的状况，并非一定日就贫困，所谓“贫化”，而是相对的生活程度低落。所谓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变律乃是：工人生活状况虽实有改善，而较之资产阶级，乃为低落。考茨基这种科学式的定义的结论，实在和伯恩思敦所见，所差仅有毫厘而已，此种概括的论定，实在是错的。他的理论仅仅根据于英美工人阶级局部的经验。

马克思当初以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立论确定之，以综观的观点立论——谓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变律实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日就低落。考茨基乃宥于琐屑的应付社会问题，他所谓工人阶级仅仅指欧洲的工人。固然，那欧洲工人生活日有改善，而不知道，这一些儿小福气是榨着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汗血买来的。马克思所论的是整个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的“笼统”反能得科学的总定义的价值，考茨基的“精神”却与事实不符。假使我们现代革命的无产阶级科学，见更进一步，比马克思更具体些，那么，应当不但研究欧美并且及于各殖民地，各小民族，总定之，当研究全世界的经济。资本主义本来是国际性的社会制度。那时所得理论上的结论，必定与考茨基大不相同。

资产阶级社会崩坏论 资产阶级社会之崩坏及无产阶级之代兴，本是资本主义之特征。考茨基对此“崩坏论”，似甚拥护，而实际上因与修正派辩驳，受诡辞巧说的请责，无意之中已经大让其步。他讨论革命及总同盟罢工问题，往往发现此种弱点。譬如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竟谓假使我们快能举行革命，又何必要总同盟罢工；假使不能，也就不必总同盟罢工，这真是机会主义。

国家论 欧战初起，第二国际派助战，当时列宁、只诺维叶夫等曾谓，考茨基自背其学说，然而却不尽然。社会民主党的助战，实则早已有理论上的暗示。当初第二国际派的国家论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论，究竟是如何说法的呢？他们以为“国家”不过是一个对象，处于受动的地位，可以先在这一阶级手里，随后再移转到别一阶级手里。假使如此，则国家似乎是一中立的机关，可以随便传递，任意使用。自然！有此种概念，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当然可以预料得到。战争一起，这一“国家”或者可以到无产阶级之手；无产阶级自然要想保护他，不让他破坏。此种观点的谬误，在于不知道各社会阶级的势力，实必寄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政权，若是不先行破坏旧的国家机关，必不能立。不但无产阶级，凡是彻底的革命派，必定要明白此种社会原理：一切旧统治阶级的权势，必定凭借于政治机关，否则他虽有经济势力，也不成其为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独裁论 考茨基与伯恩思敦辩驳时，犹对于这一问题不敢多说，隐隐约约的意思，以为只好留待“后人”解决。总看起来，实在不能不说此派“马克思主义”实受西欧“劳工贵族”的心理反映，已经腐朽委顿，绝无振作之精神。“劳工贵族”欧美熟练工人，为资本家所賂买，得分殖民地工人阶级所造盈余价值之余润，生活稍改善，便求苟安，当时的修正派与正统派，其实不过是程度之差而已。现在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派、第二半国际派，更公然表示脱离全体无产阶级的态度。新近考茨基论党纲问题（德国），竟说：

无产阶级之成分，本非绝对各自相同的。他现在截然分成两部，特别的经济状况及法律关系，竟使一部分无产阶级，能组成强有力的机关，自己保障利益。这一部分，地位日见增高，所谓‘劳工贵族’，有时他们极能反抗资本主义而得胜利，甚至于此种斗争已经不是因贫乏而起的斗争，而是争取政权的斗争。

他以“争取政权”与“因贫乏而起的斗争”相对待，实在已经全失马克思主义之“辩证法的唯物论”（Materialisme Dialectique）。这两种斗争，只有在动象中流转而互相变成，绝不可以分立对待。考茨基又道：

除此一部分实有训练有预备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外，另有一部分，人类非常之多的无产阶级，然而因环境所逼，绝无组织能力，而不能反抗资本主义，他们仍旧非常贫乏，竟常常日益窘困。

始终考茨基也不能否认真正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过他否认群众的力量，却是第二国际派改良主义的总原因。此下又论及“策略”（Tactique）上的问题，更明白表示他所以与共产国际派分道扬镳的缘故——他以“劳工贵族”为支柱，而共产国际则赖无产阶级最革命的群众。于是考茨基的结论乃是：

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因为无经验无知识，又正力求自由及物质生活的改善，往往容易为一班独断论者（指共产主义派而言）所诱。此等独断论者，别有用心，或轻浮喜动，拿甜言蜜语诱惑这一部分苦的无产阶级，来与有组织有训练的无产阶级斗争，那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很明白的，他们只在能力范围之内，慎重小心地解决各种问题。……

诚然不错，资产阶级为保存现社会起见，不但力谋离间无产阶级，而且已经实行这一计划，即有“劳工贵族”——熟练工人、工头，及“劳工平民”——普通工人，苦力的分别，资产阶级便能利用前者，而压迫后者。所以资产阶级尽可“优礼”工人的贵族，显显“民主”精神，而实际上大多数劳动群众大受其苦，革命的改造社会事业大受挫折。于此可见社会民主派的功能。

经济的恐慌论 考茨基现在对于“恐慌”（Crises，或可译作“危机”）的理论，以为经济的恐慌渐有“缩小范围”之势。事实却相反。其实欧洲大战，也可以说是经济的“危机”之特别形式。全世界现在处于极大的危机，而考茨基不愿睁开眼看一看

清楚。甚至于有人以为欧战之后，资本主义更加稳固。就是极平常的自由主义派、和平主义派、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人人都觉得现社会的弱点，不能否认。而第二国际反有此等奇论。难道是请资本家再多打几次仗，资本主义更要稳固百倍呢！

无产阶级革命论 考茨基现在还是否认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据他的意思，什么样的革命才是无产阶级的呢？他说：（一）资产阶级革命用强力的手段；（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用强力，正因他是无产阶级的，所以不得不与资产阶级故意立异。更有人说，一切强力都是反动的。可是昂格士论革命说：革命是天下最有威权的事，是历史的大事，简言之，就是一部分的平民以刀剑或枪炮强制别一部分的人服从其意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如此。考茨基却以为枪炮刀剑等强力的工具，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不应当用它们。那么，盾牌、障壁（barricade）也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可以不必用。假使再说资产阶级在他革命以前，曾以思想为武器以反抗封建制度，那么，现在无产阶级也可不必思想！

其次则有联立政府问题，是考茨基最得意的发明。这一问题，实是他否认独裁制的工具。请看马克思的话：“我之前，已有人略知阶级斗争的学理，独有我的学说，乃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客观的必要，必至于无产阶级独裁制”。再则马克思的《社会民主派党纲之批评》中说得更详确：

“资本社会与共产社会之间，有一时期，是为资本主义经革命而变成共产主义的过渡。那时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其时的国家，必为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独裁制，而非别种形式。”

马克思如此说，而考茨基却不然。他的立论：

一、在最近一年的经验看来，我们可以略变马克思此语的形式，而为：

“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与纯粹无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有一时期，是资产阶级国家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过渡，那时，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其时的政府，依公例当有联立政府（劳资妥协而联立内阁）之形式。”

此处已绝无共产主义及革命之痕迹，简直比修正派的理论还要可矣。请问：联立内阁如何能过渡于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如何能过渡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西欧，尤其在德国，已实有经济能力。资产阶级所赖以镇压无产阶级的，正不过是政权，现在考茨基不要革命，只要联立妥协，联立内阁之下，资产阶级的阁员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议员要帝国主义，而无产阶级的阁员议员要社会主义。如此，没有一件经济事业的议案，可以稳稳当当地通过的，无论其他！外加四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上的恐吓，军事上的侵略，国内资本家可以借外力而以强逼方法挤出“无产阶级”的或社会民主派的政治势力。现今德国的局面，岂不是如此！并不是由联立政府过渡于纯粹

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由联立政府退到纯粹资产阶级的国家。所以实在非以革命的独裁制取得政权，卸除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武装后，决不能达改造社会之目的。凡此一切，都以证实“社会改良”理论上之各方面的谬误。

然则我们现代的社会，究以哪一观点来考察，为最能得其适当的综合概念呢？或以工人阶级所处地位，以资本之集中的过程为主要点，或更于“党纲”上加以新社会构成之各要素，都可以。然最重要者，草（？）若以资本主义社会间一切种种矛盾冲突之增长激励为观点。我们如今眼见着此资本主义解体的阶级，尽可更加以资本主义发展史之回顾。换言之，实即以“社会史中资本主义的一大时期，社会内部继续不断的矛盾冲突”为考察时之总线索。资本主义的“争竞”，必发生种种矛盾冲突，至欧战乃得一极大的极明显的表示。欧洲大战，其实不过是资本主义之“无政府状态”的天性极激励的暴露而已。若能于此发见：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矛盾之爆发，已无久存之可能，则自可得而说明其他现象：无产阶级分离而出的各部分，现社会之新结构，工人阶级之地位等等。依此线索而研究及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性质，最可注意的，有一点：“财政资本”所应用的强力政策。何以有此特殊形式？此一强力之最后的根据何在？这可以有多少种解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独占”性质。然而要注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一切经济学，马克思派亦在其内，所讨论研究的“竞争”及其各种现象，都不出于一种，就是“工业资本”时代的“竞争”。这是单个的企业家之间的斗争，其对付竞争者之方法，往往适用跌低货物的价格。马克思所论，差不多完全是这一种“竞争”。至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一时期中，此种“竞争”形式，早已不是第一等的了；确有别种形式，因此时跌低价格的手段，已经用不得。譬如说，煤业“新狄嘉”（Sjnaicat）与铁业“新狄嘉”争取盈余价值，当然必不能用跌低价格的方法。只能用强力的方法，如同盟抵制、政意倾轧等等，现今最有势力的，更莫如“托拉斯”，分裂各国内资产阶级而令竞争，以渐合并。其实此种“托拉斯”是一种“合组的企业”。此种企业的“竞争”方法，当然侧重于强力。国际分业，有所谓工业国，有所谓农业国，各国内各业间之复合的组织，凡此一切都令帝国主义国家，舍强力外，不能取别种政策。因此新发生的“竞争”之种种形式，必引各资本国人于战争。

国家之功能于是“党纲”之中，必特别注意于国家功能之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很可以公开地说，国家问题实未详细研究。此中的原因，却在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时代环境，当时经济学上之自由放任主义正盛，所谓“自由竞争”真无限制。至于现在，经济上既处处非用强力不可，则国家功能之重要，实不可掩，不论从哪一观点看来都是如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有此种感觉。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当破坏此一组织，

而别方面又应当建设新的来代替它。然后借此新国家为动力以求变革经济关系。故于“党纲”之中将特意详尽说明国家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在无产政权之下的功能，以至所消灭国家之条件。

教育独立说 从前社会党对此问题，在“党纲”上往往不大讨论。现在呢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改造社会，则社会事业中种种职员之养成问题，行政人员之训练问题，科学宝藏之保存进化问题也就非常之重大，决不像当初还没有直接实践的可能时，可以稍缓。

社会主义之渐成 其次便当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实有社会主义渐就成熟”之问题。马克思学说之精粹，正在所谓新社会已包孕于旧社会。然因此一问题，第二国际派误解最多，尤其要有更具体的解释。我们应当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甚多，有时，无产阶级革命且往往引起生产力的低落。而资产阶级学者及改良派却想证明，损失所以如此之大，乃是社会主义还未成熟而强行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达还没到此时机。所谓新社会的成熟其实有两种形式：一是资本主义成熟于封建制度的内部，一是社会主义成熟于资本主义之下，两种形式绝不相同，绝不可以混淆，尤其不可以死范式强相比附。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从工人、管理员、技师，以至于资本家完全能在封建制度的内部。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之下，却绝对不能有如此优越之环境。工人阶级要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管理生产，造成社会主义，岂是可能的事！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而有社会主义成熟，其特征与资本主义当初发展成熟之过程相较，大不相同。尚在封建制度统治之时，资本主义已自有其行政管理的人才及经验练习。无产阶级则不但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文化上亦是如此。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工程师技师等等，他逼不得已只能在实行其独裁制之后，有了可能，方得学习，只有那时，他方能推开高等学校的门。文化上的比较，自然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蠢，比资产阶级笨。可见无产阶级在资本统治的范围内，不能成就其组织新社会的能量。此两种“成熟”性质之不同，必须牢记。所以，社会主义之成熟，在革命前，差不多只有客观的方面，至于主观的方面必待积极的奋斗于革命之后。并不是不爱“避难就易”，实在是少不了的牺牲。

社会主义之增长 社会主义既有客观方面的成熟，必继以增长进化。修正派以为“社会主义之增长”，亦可以在资本主义之下，反正用不着革命。固然，会社会主义之增长，决不单靠革命后政府之命令通告，然而必待无产阶级独裁制确立，此种“增长”的过程方能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毁旧国家，取得政权，然后方能以其新国家为动力，秉其集合性为原则，改造经济关系。此处当有一极长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及交易制度逐渐推广，渐渐扫除资本主义的遗迹，以至于完全变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 俄国革命以前，所谓“有规划的集合经济”，只有大概的研究，只有很抽象很简略的概念，没有具体化。十月革命之后，实际的经验，自然发生“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问题（所谓“国内的”，当然仅指生产关系上之经济区域而言）。如以资本主义而言，则法美的资本主义，各有各的特征。可以一比较法国之放债盘利的资本主义及美国之纯粹的“财政资本主义”，或是英德之“托拉斯”“新狄嘉”的历史，都是各有相异之处。自然，现代“世界经济”的融合，一切都有渐渐同化复合之势。然而社会主义只能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所以必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可以说是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之继续变革。固然此种“社会主义生产”之不同形式，必当渐就更广泛的同化复合。至于最初一期，虽至各国无产阶级都已取得政权之后，却必暂呈互异的社会主义。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派的经济学家，大可公开地说，俄国的社会主义，比较起来，实在是大部分“亚洲式”的。俄国农民经济超过工业经济等等特殊状态，大足以令其社会主义发露落后性。

“新经济政策”，因此实际的经济的研究，便可知“新经济政策”之重要。“新经济政策”之意义、制度，见《北京晨报》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之莫斯科通信。亦为“党纲”中所应注意之问题。“新经济政策”，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观点观察之：一、则可以为革命的策略；二、则可以为经济建设的合理政策。其实无论哪一国的无产阶级，既得政权，必遇见经济事业的最困难的难题，就是两种经济制度的冲突：一种是无产阶级所能管理整顿的，能以规划辖制的；一种是无产阶级无法以预定规划整理的。假使无产阶级不察此种经济制度势力强弱之比例，而自取管理者太多，则必令生产力不但不能发展，反就停滞，无产阶级亦非能一挥而成仙境。他必不当以其规划强制小生产，小农经济，个人的农村经济。况且他所取既太多，要行管理，又须言建设极大的行政机关，一要求小生产经济来经营，所须行政人员未免太多，国家支出太费。其结果，反而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阻滞生产力之发展。若有此现象，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收缩减少行政人员，改组经济机关，否则小资产阶级激而走于反革命。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俄国特别现象，一方面是普通的原则。组织经济事业，本当先考察农工各业间势力强弱之对比，能作集合生产者由国家管理，不能者留与小资产阶级，各得其发展之正道，并令有较概括的规划，使社会主义经济渐渐超越熔铸此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至于社会的阶级关系爆裂之际，旧社会以武力镇压之时，革命怒潮汹涌，政治上的斗争战略，往往紧急于经济建设万倍。政治上不得胜利，资产阶级也不容你来行什么“新经济政策”。当时必须要有军事上的运用，架起障壁来巷战，斫断电杆绝敌人的耳目，难道这也会增高生产力吗？决死的战争中，丝毫不容姑息，而和平

的建设事业，也不应当为幻想的社会主义原则所阻滞。

综观的策略问题 “策略”本是政争中一阶级对于其他阶级的态度，犹如军事上的策略，战阵之间友敌各军情势的窥测既明，便可取定和战迎拒攻守的方针，或者可以联盟共守，或者可以共同出战侵袭公敌，或者可以使一方守中立，而自己独战。阶级斗争之中，各阶级拥护旧社会攻击旧社会的态度，以及其实力，必不十分相同，所以革命的政党必有“策略”。策略本可随时随地而变，然而有总原则，也应当规定在“党纲”之上。譬如，共产派在封建制度或宗法社会尚未倾覆的殖民地上，对待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民族运动，所应采取的态度：因大多数平民同受帝国主义的摧残，有几阶级应当合作，共御公敌，以至于无产阶级有能反守为攻的时候，彻底要求“民权”，达最大多数劳动平民的胜利。至于共产国际之总体，对待工业国内的改良派工团派的态度，对待殖民地上的解放运动之诚意，亦都可以察各社会间阶级的关系而类推以定改造社会的斗争中之策略。再则，如今更有策略上的新问题。其一，无产阶级政党绝对不能冒昧得敌党的资助，而无产阶级国家却不妨向资产国家借款，因为政党所行纯系在野的革命事业，无所建设于社会主义，而国家之借款，既以建设社会主义，又即巩固革命，推展革命。其二，处帝国主义国家之中，无产阶级政党万不赞助防卫资产阶级政府之战争，而在无产阶级国家或殖民地，在相当机会中或竟赞助攻伐帝国主义国家之战争，因是防卫无产阶级革命或是摧折帝国主义的气焰。凡此，都是策略总原则之举例，策略之破坏及建设的两方面，本须有积极的综观的意义。

总之，改造世界旧社会的规划，必应有所综合善于适应，恰当于客观的环境，能达此主观的目的，共产国际的“党纲”，应当如此。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帝国主义的世界：

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环境内，“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所以资本主义自其最早期起，就已力求推广其势力于“非资本主义的”地方或人民间；因此而有，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中等阶级起无产阶级化，殖民地政策，新市场之开辟，资本之轮出。资本主义的存在发达，必须力求不断地开展新地方，侵入新职业。然而此种力求征取全世界之“外延”，遂令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方式相冲突。乃不得不用强力，而起战争，革命。总之直至于崩坏，这是资本主义自生至灭永有的天性……

世界资本主义愈厉行其军国主义，愈急遽地消灭国内“非资本主义的”人民，

愈降低其工人阶级之生活程度，则于世界的舞台上，抑“资本之积累”，变成不绝的政治崩坏、社会崩坏，及一切错乱惊痛的观象也愈快。此等现象，加以经济的崩坏，所谓“危机”，必能令资本之继续积累渐不可能，而国际工人阶级之反抗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即使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到自然富有的限度，亦必如此。见罗若卢森堡之《资本之积累》。

实在已经绝无疑义，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衰落之期，却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客观的可能。然而“可能”，始终不过可能而已，还不是实现的事实。无产阶级的统治，应当争取！假使无产阶级不积极奋斗，积极革命，那么，帝国主义更能掠夺尚未进化的各地，甚至于相对的变现在的工业国（法奥中欧）成“资本主义前的”状态，资本制度，帝国主义之残酷的经济关系，必至于“轮回不已”。现时已入社会革命的时期，应当格外努力。

世界的社会改造！我们要知道：无论何时还没有行过如此之伟大的斗争，立过如此之伟大的目的；普天下的命运，在这一斗争的凯旋。我们要奋斗！

共产国际的党纲将依此纲要分为五部分：

- 一、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之分析；社会革命时期之解剖。
- 二、共产主义社会之说明；各种过渡时代之区分。
- 三、资产阶级颠覆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意义。
- 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进行策略之综观。
- 五、各国共产党对于当地的规划。

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

(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

瞿秋白

二十世纪之世界革命必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共产国际正负此重任，所以共产国际于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会即已发布宣言书，明定其大政方针，一九二〇年第二次大会之宣言及章程更明定：

“共产国际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设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达完全消灭阶级，实行社会主义’为目的。”

至一九二二年，又进而讨论改造社会之总规划，共产国际之党纲，以为实行此宗旨之详细具体的计划。然而党纲大部是对于现社会之理论的考察，以及革命中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之步骤。至于日常斗争中，在革命前如何行向革命，在革〈命〉后如何建设，种种手段态度，凡能达到最近的目的以至于最终的理想者，还极琐屑繁杂的职任，就是策略。党纲是对于现实社会为改进进一步的制度上的要求，以至于最高的理想社会；策略则为引进现实社会中之各阶级以行此制度改革之手段。党纲是对于社会之物的方面，策略是对于社会之人的方面。一是较静的，一是较动的。因为各地各时社会中之阶级关系，每每随政治经济现象而起变化，此间立于世界革命主位的无产阶级，对之须有明确的考察，而时时审定改造社会之斗争方略。策略因此时时可有变更，正所以求达其绝不变更的最高限度的党纲。固然，在策略上，每一派的政党自有其总原则，与党纲有同等重要之意义，党纲上也有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之分别。最低限度的党纲，亦可因时过境迁而变易。然而策略与党纲之区分，大致当如上所述。再则策略既为达到目的之手段，比党纲尤其要切于现实生活，尤其是实际运动中之要著；假使有党纲而无策略，等于有“坐言”的理想制度，而无“立行”的具体办法，况且设有对于旧制度的批评及新制度的规划，而无破坏旧制度对待各阶级之态度及建设新制度中利用各阶级之手段，一切都成纸上空文。因此，凡无策略之“政论团体”，不称其为政党，亦不能成正当的社会动力。因此，共产派之最低限度党纲，往往可以貌似自由

派或改良派，共产派之最高限度的党纲，又可与无政府派完全相同，独有策略问题，必定有异。此中区别的根本要点，不在于主体的不同，就在于有无主体。如改良派，以少数的富裕的工人阶级为主体，自由派以资产阶级为主体，这两派有时同染着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如无政府派，在政论上往往无主体，其实亦不免时落于小资产阶级之幻想的陷阱。既如此，可见策略问题关系之重要。看一政党之策略，就可见其究为哪一阶级的政党，更察其策略变易之适当与否，便可见其实际上之强弱，其能否真正代表阶级利益，能否真正实行逐步改造社会之世界革命事业。

“世界革命，为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事业”，既有综观社会的结论，而得于章程上特定为宗旨，党纲上又加以有规划的研究，我们更当进而讨论共产国际之策略，见其分时分地的考察社会中阶级关系之变迁，而定适应之原则。共产国际每次大会，必于世界革命进行之趋势，力加审察，以定策略。此种革命运动在二十世纪时代，实在就是劳动与资本间之战争，因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固然无产阶级必得最后之胜利，然而双方斗争时，战阵上的形势，内部之实力，组织之成绩，及一切环境以至于主观的阶级觉悟之程度，都能为暂时的短期间的胜败之近因，于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而行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对此阵势，因时因地而有相当的战略，以求引之至于最终的胜利。所以叙述共产国际策略之总原则及其四年来的经过以至于最近的方针，仍不得不与世界政治经济之变象夹叙。读者于此，自能见共产国际于现代劳资斗争中促进世界革命之方策，运用社会间各种动力之筹划，以日进于消灭社会阶级实行共产主义之目标。

—

世界革命并不是“平地一声雷”的乌托邦，亦不是一直的发展，绝无屈伸进退的过程，此种变象，本是现实世界中所无，而仅是智识阶级头脑中的幻想。世界革命乃是，“各国内种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以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及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所延展的一长时期”。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客观上实不免继之以此长期的社会革命时代。所以帝国主义发展到最高点之时，欧战爆发之后，我们已确见社会革命时代之开始，从此劳资间战争已趋一新方向，要求全社会的改造，较之欧战前社会改良派时期的劳资战争，绝不相同。然而劳动对于资本之进攻或资本对于劳动之进攻，双方仍继历史的发展，不能免于“社会的惰性律”。双方攻守阵势又因现实经济状况而变。所以共产国际的策略，既以求达无产阶级独裁制为总原则，必须处处与此现实生活中之斗争相应。总之当力求反守为攻达其最终的目标。

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实是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而不仅止于俄国国内。当时世界的资产阶级早已明白此一革命的意义，而着手预防，这本是国

际无产阶级进攻之先锋，德国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又进一步，当时德奥的革命，势不得不涌出无产阶级的色彩。然而社会民主派，处于无产阶级之领袖地位，反畏缩顾忌，令革命的潮势大弱。但是，单就当时客观的政象说来，我们实在可以断定，这一期无产阶级的进攻，确已开世界史之新局面。世界资产阶级的代表，劳雷·乔治，当预备凡尔赛和会时，曾有一秘密文件，其中言论实已洞悉当时之危象。此一文件，现在已发现于意大利，略一翻阅，便能知道，资产阶级尚且明白当时的革命运动：不仅是工人之不平鸣，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大变更。劳雷·乔治说：

现在情形已经大变。革命方在开始，俄国还在恐怖政策之中，欧洲又满布了革命的情绪。工人心中实有极深切的感觉，不是仅仅不满意而已，而是愤怒的恶意，毒恨战前的生活条件。全欧人民看着各种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政策，都觉得不可信任。有几国内，譬如德俄，此种不安的人心，竟至于公然的爆发；至于英法意，也有不少罢工，不愿工作的表示。凡此一切，都是一种表象，证明人民确有急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希望心，此种希望并不下于仅仅增加工资的要求呵。……

其实对于此种不安的现象，也有可以欣幸的。本来我们现在无论如何，决不能再返于一九一四年时的生活条件。假使必定强行此种政策，反有极大危险，势必反激欧洲人民于左派势力之下，此种党派的根本理想，乃是以完全破毁现社会之制度为方法，复兴人类。在俄国此种党派已得胜利，然而他们胜利的代价，实在非常之大。几万人的死灭，铁道，城市，俄罗斯国家的机体，几至于全毁，虽然如此，始终他们能得俄国民众的后盾；更可注意的，却是他们竟能达成很大的军队，看来，确有很能干的指导者，纪律非常严正。此种军队，大部分确是能为他的理想而牺牲的。假使我们再因循过一年，俄国新鲜的活力生长，他就记不得他的和平主义了；因为全世界上只他有这唯一军队，能为自己的理想而战。

劳雷·乔治更进而论资本主义的危状。社会民主派，真可以醒一醒，请看当时客观的状况，革命的机运：

现时最大的危机，实在于德国或将信任布尔塞维克，以其富源、智识以及组织能力，帮助那班幻想的革命家，他们本来想以武力征取全世界呢。这种危险实不是空话。现在的德国政府能力很弱，他不能得民间之信仰，他的威信有限得很，虽能暂执政权，实靠不住。然而这一政府若倒，必定是斯巴达克派（德共产派）

起来，而德国却还没有成熟。虽然，德国斯巴达克派却有一利器，只有斯巴达克派能救德国于战后困危之境。

假使德国而入斯巴达克派之手，必定与布尔塞维克携手。那时东欧必全卷入于布尔塞维克革命之怒潮中，一年之后，可以有三万万人的赤军，加以德国之军事技术，导师，将军时时都能侵入西欧。

这一时期是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进攻。资产阶级乃急起自卫，于西方暂时让步，而即刻向东方进攻。当时西欧德奥的“无产阶级领袖”竟放过这一时机，群众受社会民主派的欺蒙，没有恰当的策略。

试看一九一九年罢工的统计，尤足见其时无产阶级经济上的进攻之趋势。方当战争期间，劳动之价值，对于协约国之资本主义，其实非常重大，而劳动者之胜利并不十分显著，正因社会趋势尚未见无产阶级之进攻，资产阶级不到亲见危急决不肯让步。等到无产阶级进攻之势已猛，他方急急退让，谋保政权，以为再进之计。现实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现象，确是如此，战后之各种社会改良政策，并非劳资可以协调之表征，而是革命策略必不可少之铁证。欧战期间英国之工人运动，总共只争到每星期增加七先令之工资。至一九一九年，工资乃增加一金镑。有七百万工人之工作时间，骤然减少三四小时。英国政府更设委员会，筹备煤矿收归国有事业。美国罢工陆续继起，也不得不议及铁路收归国有问题。德国的资产阶级，费了几万万国库资财，求消费品价格的低落，缓和工人间的不平；设了“社会公有委员会”，筹备国有办法——于是社会民主派都嚷着“社会主义将近了”，此种呼声，无非是想工人之中渐信和平手段之有效，虽然，这始终是此期无产阶级经济上的进攻。

西欧及美洲，资产阶级处处对工人让步，唯恐发生共产主义的革命。

同时，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急取攻势，俄国无产阶级独力奋斗，而西欧工人方畅心满意于社会改良政策。其中只有匈牙利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可惜竟失败了。苏维埃俄国困顿至于极点。这是欧战后第一期之劳资斗争的国际阵势。一九二〇年，世界经济状况中有一番变化，开世界革命的第二期，苏维埃俄国进攻波兰实即无产阶级对世界资本之第二期进攻，又正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夺取工厂之时。可是这两方都受挫败：赤俄的失败在军事上，意大利工人之失败在政治上。从此局面大变。

此期间共产国际之策略，不得不取急进，“能做多少，便应当做多少”，世界工人间的革命潮，极当顺应之而导之于无产阶级独裁判。可惜当时大多数无产阶级，受改良主义的毒，组织力战斗力太弱，而觉悟程度之低尤其是一大障碍。

从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起，因俄意无产阶级之暂时失利，劳资斗争的阵势已经渐变。

劳动渐就退让，资本渐趋进攻。现在且举英国为例：一九一八英国罢工一千二百五十次，参与罢工人数一百万余；一九一九年，更加增多，罢工次数一千四百一十一，参与的工人有二百五十余万人，积计罢工日数总共有三千四百万天；到一九二〇年，罢工次数增至一千七百十五次，参加的人数虽减少，尚有二百万人。罢工的结果，工资增加，时间减少，均有成效。等到一九二一年，罢工人数就有十一万八千人，工资有一部分反而减少，八百万工人，每星期总共少得一千一百万磅。一九二二年八月时，此等工人的工资又减少了三百五十万磅。

英国资产阶级还不甘心。英国工业联合会当时曾发表宣言，说：

“此种趋势，或者还要恶劣。工人应当知道，工资的低落，从此将江河日下，工人生活程度必较前一期工业发展时为低，或竟比战前还要低落。此种情形，若是工业不能再兴盛起来，必不能改善。为减少工资而不引起剧激的争执起见，应当格外广泛的一致的实行此种政策。”

欧美各国都是如此情形，同一的趋向。企业家争得工作时间之延长，工资之减少，还不满意。各地都有夺回职工联合会已争得之各种权利的行动。美国宣言“工场公开”，不准工会独荐举有工人权，极力想涣散工人的势力。英国则处处摧残“工厂委员会”。企业家说“究竟谁是主人”，保守党在国会之中提议禁止工会用其自有的资财，作政治运动。瑞士荷兰瑞典挪威法国都是如此。至于德国有别种意义。因为凡尔赛条约之经济上的意义，就在于使战败国担负复兴资本主义的成本，然而德国财政窘迫无从着手，于是这一重担，不得不分任于各国无产阶级。战前，布尔塞维克就说，将来的“战败者”仅工人阶级而已，双方资产阶级必不肯认此账。果不其然，现在资本家说：“当然！只有敲工人阶级的竹杠，能恢复资本主义。”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是这一种想头。战祸的影响发作得愈快，经济状况愈恶，则资本家不能恢复其资本主义也愈明显。现代已非拿破仑的时代，资本主义确已根本动摇。那时欧文说“英国所以能逃出此经济危机，正因有汽机之发明，生产力之增长”，现代却已不同：假使意大利能用其战费十分之一，来经营全国的电气化，现时已经可以不专赖英美的煤炭。然而他竟不能做到！所以在战后工业的暂兴时，资产阶级能对无产阶级让步，实行社会改良政策，成就无产阶级的进攻；等到根本的病发作，经济界战后的危机日益显露，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力谋“自食前言”，收回其社会改良政。这是欧战后第二期中资本进攻的经济方面。

资产阶级既因互相猜忌，无从安心经营提高生产力之事业，只有想法推广货物之销路。可是这第二方法也不能行。于是资本对于劳动之进攻不得不一长期的计划，不但暂时利用工人之弱点，而且有步步进逼之势，想括出工人的汗血，来养兵制炮，

争夺市场。资本家此种计划若归失败，则各工业国中工人阶级当可取得胜利。这是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关系，资本家必出死力以御。他们不但收回社会改良政策，不仅只是经济上的进攻，而且还有政治上的计划。

一九二二年之意大利柔鲁会议上（Genua），各国对俄要求废止国有制度，其实亦是资本进攻的一种形式。德国资本家史汀纳斯争政权，想组织内阁，亦是一种资本进攻的形式。英国资本家竟能阻止工人要求国有煤矿之运动，一九二一年英国工人已不敢提及此一问题，仅仅争工资增加。美国的国有运动更消灭于无形。德国社会党在一九一九年，口头上争国有，如今国有铁路反另售与私人。只有俄国还保存工业国有制度。所以各国资本家逼迫赤俄交还工厂，不仅是榨取俄国的财产，而且还有原则上的意义。协约国之资本主义要求恢复，除逼迫俄国外，更进而逼迫德国，想赖德国之富源财力。他们第一，须保存德国资本主义；第二，须逼迫德国出“本钱”，来恢复国际的资本主义。德国的资本主义呢，他有他的计划。史汀纳斯的预想：（一）要出卖一切国产，煤矿铁道等，借英美的钱来，由私人经营；（二）减轻工业的负担，工资克扣，工时加长。法国一方面，军国主义派的资产阶级等不及德国资本家榨取工人汗血来还他的债，早已主张：占据罗尔（Rhur），建设莱茵岸缓冲国，以罗尔煤炭供给法国工业；分裂南德与北德，以便法国势力经莱茵而直贯德奥。本来大陆的资本家早已明白，假使德国资本家史汀纳斯的计划不实行，（裁减“多余的工人”，延长工作时间等），资本主义必不能恢复，然而史汀纳斯一人不能做到，非以法国的哀的美敦书助之不可。德国的社会民主派及工人阶级虽欲抗拒而不能。现时已成为事实，除非因英美资本之嫉妒法国，此一计划或可停顿。虽然，还不止此呵。意大利的“法塞派”（Fascistes）的夺得政权，尤其是资本进攻之政治方面最显著的现象。“法塞派”当初的党纲，明明说：

“……现时工人阶级，所负租税最少。……工业家担负直接税，其实就是间接影响到下层阶级，因为挤轧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势必引起失业及工资减少的现象。想要宽待穷人而今‘富人’多担租税，实在是谬误的。”

政治上的进攻还不足，更加以暴力的行动，实行资本家的政策。意大利的“法塞派”不过是此中的一部分，各国都有同样的组织，暂时还没有能像法塞派那样得意罢了（意大利“法塞派”出于“Fasei di Combattimento”，译意可为“斗殴会”，完全是一班退伍军官，高等下等的流氓光棍，做中坚人物，以盲目的民族主义，侵略主义为宗旨，于罢工时殴杀工人等，声言所谓“保障国权”）。此等反动派，含有帝制主义的分子，他们更顺“逆流”而退，想根本破坏民主主义，公然保障极少数的资本家，实行寡头的专制政体。不但他们显然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面具，而且他们非常明悉

压迫真民治(?)派的方法：从要求“真民治”最切的无产阶级入手。他们知道，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的，现时有三个国家：德国、捷克斯拉夫、意大利。意大利的“法塞派”成功，不过是他们计划之第一步。其关系于资本之进攻，反革命的猖獗，非常重要。所以关于这一层，当加以详尽的说明。

法塞派之反革命。

英国劳雷·乔治后之保守党内阁要废除劳动部，德国史汀纳斯要勾结法国恢复“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意大利法塞派实行执政，反动的潮流弥漫全球。其中法塞派的反动，在社会科学的观点上看来，尤其重大。法塞派是什么样的人呢？当欧战終了，战场上回来了不少下级士兵：智识阶级、教员、志愿兵等类，战时他们很有所尽力。（意大利的智识阶级比别国格外有力量。战前意社会党中竟有七十位大学助教，可见其智识阶级之多），他们为战争所欺，虽然战胜，而意大利所得甚少。回国之后，国内经济破坏，国家不能顾养这一班“智勇之士”。他们又眼看着工人革命运动之发展。他们反对此等革命，不但因为这是工人的运动，而且因为他们自己是主战派，向来是反对社会党的。而社会党呢，正在尽力推开这一类的人，甚至于反对战胜时受伤的残疾者，这是社会党最大的错误，不懂战略。当时各地社会党反对军官，反对残疾者，仅仅因为他们到过战场，真正是稚气！而这一类人，为社会心理所反激，都投身于法塞派。当时的社会党，只知道“人的问题”，而不知道社会活力的运用。譬如说，其时法塞派首领莫索黎尼（Mussolini），还带着假面具，冒充社会主义者，他亦主张工会监督国会，亦主张分给农民田地，亦主张渐行工业国有制。然而社会党以为莫氏主战，一味地盲目反对，不知道“拿他自己的话，堵他自己的嘴”。这叫做：怕人利用自己吃亏，后来，浅见的群众，渐以为社会党反对的是此等主张，并不能明白他们是反对战争。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法塞派一部分在段农迪阿（D'Onnuntio）的菲姆岛上，国内还仅有很小的散漫的团体。其时意大利国内，革命的风潮正盛，不仅仅是罢工，即是摧散资产阶级。社会党都绝无预备，专意于小小的争执，以至于失败。于是莫索黎尼乘机组织法塞派，组织军事机关，私藏军械……等到他夺取政权之前一月（一九二二年十月光景）德国一新闻记者问他：“你是否冒险用秘密的方法夺取政权呢？”莫索黎尼答道：“不管是秘密是公开，我一定要夺得政权。”社会党此次在政治上更大大的失败，因为他们不能以“行动”反抗莫索黎尼此等阴谋。再则他们真不明悉社会总体的变象，不善运用，以致一大部群众，为法塞派所诱惑。莫索黎尼如今既然拥着民众，又有军事机关，已成骑虎之势，他若不取政权，他自己一派的人就要反对他。社会党绝无能力，不足以引导群众奋斗，更可以举一事实为证。一九二〇年工人占据工厂之时，资产阶级其实很弱，不敢派兵去剿，直等到改良派的社会党，先出头说退了工人，工人

抛弃已占的工厂，资产阶级方鼓起勇气来。于是资产阶级突然开始进攻。此种进攻，却并不出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国家军队或审判法庭。何以故呢？因为资产阶级负欧战的责任，负破毁经济的责任；一切纯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在解体，兵士、职员（官吏）、小资产阶级对之已绝无信用。于是莫索黎尼等狭义的民族主义派，小资产阶级的新政党，有积极的行动，仿佛能“内平工人之暴乱，分争国权之扩张”，遂一跃而登政治舞台。法塞派开始便声言：“社会主义绝不能有所创造，而我们处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却能强资本塞（？）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工人呢，也应当做工，帮着恢复国家”。实际上他们逐步破坏工人组织，施行暗杀，打毁报馆。在大城市及工业区，工人群众还能勉强互相团结，而在小城市及乡村之间，工人竟为法塞派所蹂躏。法塞派先以武力摧残工人，而后从而指挥之，故在工业区内，工人虽不能心服诚悦法塞派，而小城市及乡村之间确有一部分工人为法塞派的政策所惑。资产阶级亦有一部分怕法塞派，以为始终是匪类，未必能管理国家运用政权。于是社会党中之改良派宣传与资产阶级组联立内阁，妥协共济，以御法塞派。其时资产阶级力弱，不能行此果断政策，改良派又笨，死不明白群众不信任旧政党的心理，上述的计划反促进莫索黎尼之争取政权。意大利社会党（共产派，谢腊蒂（Seratti）等，于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后，曾因大会要求其开除改良派之故，而与共产国际决裂。至第四次大会时，谢腊蒂派悔悟，方仍与决裂后所余之真共产派合并，而宣言与改良派脱离，现已合称意大利共产党），若再不能分析法塞派得胜之原因，共产派失败之恶果，重定其策略，则莫索黎尼之专政，恐尚有时日。所以非积极奋斗不可，不但要设秘密机关，而且要与法塞派于政治上的打击。共产党若要在意大利与法塞派奋斗，必须恢复工人对于社会主义之信仰。

法塞派不过是市侩而已，取得政权之后，依类资产阶级的实力，他便不能实行自己的党纲，而逼不得已去行资产阶级的党纲，实行资本之进攻。莫索黎尼之后有一大班小智识阶级。党纲之中虽有节省国库，裁减人员等条目，而实际上一执政权之后就有几万候补官僚的小资产阶级，拥挤得不堪。意大利的社会结构，本与中国有相对的类似之点，所以政客亦是非常之多，高等流氓非常之多。莫索黎尼自己本靠一班（武装的光棍），取得政权之后，他说（可以解散了）。他手下的人就不得不给他（算账）。莫索黎尼若要解散武装的“会匪”，专赖正式军队，那可不成！法塞派内本有两派：工业派与农业派；北意大利工业的资产阶级及南意大利农业的田主阶级，双方都有极反动的分子渗入法塞派，如今乃在内部大起冲突。莫索黎尼自己是专制魔王，而所用的力量，或正是小资产阶级盲目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民治主义派，他的失败一定就是这两种冲突之爆裂，其弱点正在于其优点。

共产党对待意大利政治之策略必在于组织最大多数的劳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以敌

法塞派，而所谓“组织”，又在于适当的口号、适当的要求，不但合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合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从现实的政治斗争，引导之于革命，引导之于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进于社会主义之建设。单有能牺牲的精神，单有理论的研究，绝无用处，必须能负解放群众之责任，实际上得群众之信仰。以前意大利社会党之筹议，正在于墨守成规，不明现实政象，不是倾向太右，趋于妥协，就是倾向太“左”，于群众目前要求不能体会，多树社会间的恶敌，“替人家张声势”。

这是欧战后第二期资本进攻的政治方面。

此期间共产国际之策略，应随革命潮之低落，及革命之紧迫，而立取守势，行“劳工之统一战线”，自经济上的“工资”“时间”起，一直到政治上的“自由”“政权”止，极力督促一切社会党，不管他是改良派，是中央派，一概趋之使入斗争。假使群众及改良派不敢谈无产阶级独裁，那就不必谈，本来在防御战时也不用谈。只看改良策能否忠于他自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假使不能，群众的劳动工人，便可恍然于共产党的忠实的革命精神，亦就实际上明白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不可少。革命的机会再至，无产阶级的预备必已更充足，战斗力更强，摧折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就更容易。

二

世界政治经济的变象以及劳资斗争的阵势既如此而共产国际的策略及战斗力又如彼，世界革命的胜利究竟能达否？此后的发展又是怎样？历史上的经验，每每革命之后随起反动。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反革命势力起而反抗，全欧为所镇定，现时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的革命时代，难道也是昙花一现。上述欧战后之第一期与第二期，能否比之于与一八四八年与一八四九年？从此反革命便能得胜吗？

答复这一问题非常容易，一八四九年反革命的所以能得胜，乃因资本主义势盛，工业方在兴起，资产阶级得有余利，与复古派的地主阶级妥协，遂能供给幼稚的工人阶级以食粮，消弭革命，缓和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倾向。现时呢，却大不相同。全世界及革命之强，不是由于经济总象的兴盛，而却是由于经济总象的崩坏。时代的性质，截然不同，正相反背。于是此次的反革命，并非因内力充实而取势，乃是“困兽之斗”，资产阶级目睹危亡，想以强暴方法镇压革命，苟延一时之残喘。无论他来势如何凶恶，始终是垂死时的（回光返照）。既如此，自不难确定我劳动阶级对待资本阶级此次进攻之策略。共产国际之策略的总原则及其最近的方针，更得确实的说明，实际的根据。

凡一政党之策略，其对象必为社会内之各种动力，资产阶级政党之玩弄“舆论”，亦即此意。在此劳动与资本战斗之时，共产国际以世界的革命党之资格，其对象之重

要点，当然在劳动界。资本界为社会改造之敌，所谓客观的对象，已可不言而喻，劳动一（军）却以共产主义的政党为其参谋部，而共产主义的政党以劳动界为其大本营，所谓主观的对象。将兵之道，首在于“士气”，所以劳动界内部的训练鼓励尤其重要，亦就是主观的对象比客观的对象尤其紧要之原因。须知劳动界为革命中动力之主体，而资产阶级为客体。上述各节已说明劳动界与资本界战斗之阵势，以及共产党对于他“客观的对象”之观察。以下当再略叙劳动界内部战斗力之分合运用及共产党对于他“主观的对象”之作用。

最激励的劳动进攻之时期，工人群众的气概非常激昂。一九一九年时，不但共产党及独立党（德国），就是极普通无党的工人，以至于夏德曼党的工人，都自信行向社会主义。当时右派的社会党自以为与共产党的区别，仅仅在于方法。英国在一九一九年时社会主义亦成了群众之间讨论的题目，甚至于外交问题，如赞助苏俄问题等都可以引起罢工（一九二〇年），此等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劳动进攻的性质，带着有无产阶级欲得政权的特点，现在都已不同，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仍在继续，而工人群众对于参政问题，反无信念。劳动已处于防御地位。劳资妥协，联立内阁的可能，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已非社会民主党或劳动党与资产阶级携手之时，我们只见各国政府里挤出社会党来，或竟挤出自由党来。工人群众呢，却很消极。德国社会独立党并入于极右的社会民主党夏德曼去，而工人的反抗声，非常之少。这正足以证明工人阶级自觉能力之弱，受改良派的作践玩弄，弄得神魂颠倒。于是大多数工人群众，再也不想“取得政权”，攻势已失。此时积极的工人共产党要领导之而前进，就决不能用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口号。假使独断论的“共产主义者”说，只有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方能装得好假牙齿，岂非笑话，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历史的必要”，而不是随时随地，不论情形不论局势都能得工人群众的同情的，应当顺势而导之，至相当的客观环境成就，自然能发生政治上的意义。因此，必须要以工资时间住宅等日常经济斗争的口号，先团结起工人群众来，同时亦就是实行劳工的统一战线：督促各派社会党共同进行，使工人群众看一看究竟是哪一个社会党，能真正为工人切身利益奋斗，是改良派呢，还是共产派？共产派不但争此经济利益必能坚持到底，而且得到之后，还要依他们的党纲，积极前进，所以自然是共产派占优胜，改良派虽貌为工人政党，其实他们既否认工人独取政权，在经济斗争中亦惯与企业家妥协，那时工人群众自然觉得真正替他争利益的，只有共产党。共产党得赖此而得大多数工人群众的信仰，渐渐以行动及事实证明其主义。此种经济斗争的运动，在资本进攻时期，实能使大多数的工人，倾向于共产派，所谓群众的政党，正在能体会得劳动群众之利益，以至于联合一切革命派的力量，反守为攻，扑灭那社会改造之恶敌。只有此种运动之推广，深入，加紧，方能突向无

产阶级独裁制猛进。况且此种运动，无关于社会党的派别，难道改良派还能要求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么？所以正可以励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起来，各派联合向资本界作战。

所谓“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怎样的实行呢？向群众问去——自下而上。可以由共产党通告工人，对企业家或国家提出改善待遇的条件。然而也不能和改良派的政党或工会开谈判。何以故呢？在共产党内部，分析解说客观的社会现象，我们不得不说夏德曼或其他改良派首领卖阶级失节。然而改良派的社会党内，有大多数工人，他们看见共产党通告，也得问一问，“你来和我们协作，你可问过夏德曼没有？”难道共产党能回答他，“夏德曼是失节的了”，那真是痴话。这些工人若已认夏德曼为失节，也就不必再宣传，他们早已入共产党了。所以要行统一战线，正应当和第二国际开谈判，第三国际之所以异于第二国际，不在于其一承认无产阶级独裁制，其一则否，而在于第三国际能奋斗第二国际不能。第二国际连最低限度的要求也不肯坚持。等到那时，共产党更多一种真凭实据向工人宣传，况且口头上的谈判，第二国际对于此等运动绝没有法子拒绝，如此，则统一战线可成。群众工人，各党各派都来协作，结果自能暴露其首领之罪恶。所以不但当“自下而上”，亦应当“自上而下”，一年以来，已见成效，工人群众渐渐明了，那时不但可以仅用“自下而上”的一法，而且可以再进一步了。实际的事例，已可举一二。共产派说，我们社会党，都应当共同争八小时工作制，争工资的增加。第二国际及改良派的工会说，“你们共产国际若不散赤色职工国际——见本期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我们便不与你们协作”。赤色职工国际正是反对一般的“职工官僚”，旧工会首领，他们在各国缓和退让，八小时制都不坚持，在德国公然赞助工作时间之加长，在英国破坏矿工的罢工，私自妥协。而第二国际的主张，以为此等行为不应当反对，同时又说肯来共同协作争八小时制，岂不是自打嘴巴？工人群众必不能信任。

统一战线的策略确乎不错。绝不可以怕与改良派开谈判，此等假清高，徒然坏事，实行此一策略，一九二二年五月，刚刚开始时，第二国际等就来破坏，不肯践言，仅仅因为共产派还没宣传得普遍，所以工人群众不大觉得他们的矛盾，如今德国却已有成绩。法国共产党不肯实行，其结果大多数工人听着社会党口头上叫得热闹，共产党却不加入运动，于是都渐渐投入改良派的怀抱。因为资本进攻之时高的要求不能实行，亦就不得工人赞助，低的要求反可以引起大多数的注意，所以法共产党大受其“假清高”的恶果。第四次大会后乃着手整顿内部，积极改正。此正可以反证“统一战线策略”之必要。

此种策略之运用以至于反守为攻行向无产阶级独裁制，确是非常之困难的事业，

然而不得不努力。第一，必以极精密的社会科学方法，观察社会动力之所在；第二，须分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各种势力之关系，分量之轻重，势力之强弱；第三，须用其主力军，联合一切温和激烈程度不相等的左右翼，相其所宜，使为社会改造事业之某一方面尽力；第四，随其变动而加以督促，顺其流势以达最终目标，因经济现象变，而社会各动力间之关系变，则策略亦必变，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并不是名为共产党便能取得此地位，必须实际上能为“群众的政党”，能尽社会改造的责任。劳资斗争的战阵中，革命与反革命敌对之时，必须令“革命军”的训练，确实能有政治上经济上的战斗力、群众的组织力，而后一致的向敌，活动的运用，方能令无产阶级取得独裁制以消灭社会间之阶级，经集合经济以达共产社会。产(?)无产阶级所以能取得独裁制，正在其阶级要求的限度势必高于其他阶级，亦正在于其要求的范围势必广于其他阶级。既然他们要求较高且广，自然能包含其他阶级的要求，而其他阶级的要求却不能包含他的，这是在革命派内部的关系。再则，既然他的要求较高且广，必较其他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为彻底，为不妥协，所以独有他能督促社会内一切动力积极攻击旧制度，这是对于反革命派的关系。所以共产党的策略，必须以最大多数最低级的无产阶级为主体，进而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等。当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独裁之必要于民象之前，而后能积极猛进。复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策略之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之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

三

共产国际四年来策略运用之经过及其总原则既已叙明现在可一述最近的方针。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之进行，以要求工资增加，保证八小时制为出发点，因为社会改良派所颂扬的政策，已经被资产阶级逐渐收回殆尽，再进则为要求承认“工厂委员会”，因为旧式工会以职业为单位而组织，战斗力往往涣散，每一工厂工人自组委员会取得直接交涉之权，过问工厂管理之权，本为职工运动之新形式。共产党应当积极以此最小限度的经济要求着手，利用劳工组织之新经验，与无产阶级以切身权利的冲动，导之入于革命斗争。再则现时欧洲经济破坏，纸币充物，资本家借口财政困难，减发工资。其实一班投机的银行家、工业家居奇垄断，所以要提出“劳工监督生产”，于此已带有反守为攻的性质。再进则如财政最恐慌的纸币最低落的德奥，更可提出“征收现货”之要求，为一般消费者利益之保护。至于军备问题，尤其是劳资冲突时，自然

要发生的。所以要求移转军事武装机关于有职业有组织的工人，此种要求，当各国有关类似于“法塞派”的行动时，在劳动界中自能迅速发展。凡此都是实际上经济斗争中防御战的口号，能反守为攻的。若论其政治上的相当的策略，则更进一步而有组织“工人政府”的要求。

关于“工人政府”，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有极详密的讨论。在此全球反动政象之中，劳动受资本之侵袭，要求政治上的反抗，非常困难，因为不但劳动党不能执政，就是自由党尚且不能。若劳资冲突波及政潮，必生倒阁组阁问题。经济斗争中，共产党与各派社会党行统一战线……政治斗争中亦何以如此。改良派自命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如今无产阶级受压迫，就可以请他们登台，看他们究竟能不能代表劳动者利益！或者以为共产党在经济斗争上可以行统一战线，在政治却不能，这却是不然，因为社会运动是活的，以经济斗争始，必以政治斗争终。若是划清界限，经济斗争的范围愈小，愈不能有成效，“今天企业家答应增加工资，明天就可以逮捕工人，强迫原价做工，于是涉及法律，立刻可以卷入政潮”，这不过一个小比喻。工团主义不谈政治往往吃大亏，就是任凭资产阶级狡猾政策循环不已，劳动界进到经济上的胜利即便退回，直至于前功尽弃，“重新再来”。所以现时劳动对资本之防御，至于经济斗争剧烈时，应当紧接提出政治要求，要求组织纯粹社会党内阁——所谓工人政府。然而何以不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要求呢？何以不怕社会改良派卖阶级呢？须知“工人政府”本是“历史的可能”，并不是“历史的必要”。在防御资本进攻时，工人的要求或暂限于资产阶级政党退出内阁，此与根本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程度大不相同，这就是“工人政府”与“无产阶级独裁制”相异之点。假使剧烈的政潮，令无产阶级觉悟力陡增，反守为攻，由直接行动以至革命，能自建苏维埃政府，则可径行独裁制，其间或经“工人政府”，或否，当视现实的环境如何而定，所以说“工人政府”是历史的可能，而非历史的必要。社会党而卖阶级，则“工人政府”受劳资双方的攻击必倒，此时政权若再落于资产阶级之手，则工人群众愈信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可不缓，无产阶级群众的统一组织真可实现，共产派战斗力愈可增加，而直达目的。社会党而不卖阶级，则更好，可实行社会主义的种种政策。此时若资产阶级起而反抗，则工人群众自当督促“工人政府”，行独裁制，仍是共产党的目的。

况且“工人政府”无革命运动中假定的“范畴”，在各阶级关系相异的社会里，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此种要求的口号，实是各地所当相机而提出时。譬如：一、英国，在理论上，当改选时或内阁改组时，各方面的政争，很有形成劳动党组织内阁之可能，而称其为“工人政府”，则必将成一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此种政府之成立，当加以赞助。成立之后，在今日之英国，未始不与全国以革命化的空气。英国的共产

党投票时亦已赞助劳动党。这是正确的策略，为什么？因为客观上确是前进一步，因为自由主义的政府，在英国现状之下，恰好是预备资本主义破产的好手。正如俄国克伦斯基政府时，资本主义自然摇动，客观上当时的少数派实为毁坏资本主义的出发点。主观上固然对无产阶级而言，少数派是卖阶级的，然而他们若得政权之后不得不行几分“貌似而实非”的进步政策。恰好！此等改良派是“貌似而实非”，已可大有害于资产阶级国家。就此引进一步而至于“实是”，便是资本主义的末日。所以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赞助劳动党，更可提出劳动党组织内阁之要求。这是一种“工人政府”。二、德国的社会党政府，假使能成立，因历史的关系，当与英国劳动党政府稍异。然而趋势无有不同。现在的时局中，虽已合并的社会民主党各派，所谓“统一社会民主党”，若能组织纯粹的社会党政府，共产党可与以相当的赞助。这是第二种的“工人政府”。三、至于东欧等国，如南斯拉夫、布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等，又可以有农工政府之可能。农民政党，或所谓“代表农民利益”的各种政权，在此等国家内占一部分相当的势力。他们与社会党的联合，是一种反抗旧势力的力量，共产党处最左派的地位，可从而赞助之。这是第三种“工人政府”。四、或者更有各左派联立内阁之可能，社会民主党、职工联合会以至共产党。此种政府虽不能达到无产阶级独裁制，然可为其出发点。假使无产阶级反守为攻的势力能到这一步，那就可以群众的督促，逼改良派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第四种的工人政府。五、若是纯粹共产党的政府，经当有的阶段，而出现于今日之欧美，那亦可以称之曰工人政府，然此已为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别号而已。这是第五种的工人政府——真正的工人政府。此等可能，当然不足以尽历史的事变。然形式虽有不同，共产党提出此种要求及赞助，必有一种原则：“社会主义的政党，能勿与资产阶级政党携手，方得为工人政府立基础。”赞助不妨赞助，而唯一条件，乃在右派悔悟四年来的苦经验，与资产阶级决裂。此一口号之革命性，亦正在于此。资产阶级决不轻易让出地位来。经济斗争的结果，势必卷入政潮，政潮的激励又非至“国内战争”——阶级间的战争不止，革命于是不得不暴发。自守至攻的进程，自攻而守的退步，顺逆流都是一样的流动不居，绝非预拟的和平办法所能从容布置，更无中流砥柱的可能。

共产国际在此劳资战争的时代、革命的酝酿时代，所取策略，当“能攻能守，得步进步”，察客观环境之真相，量主观实力之多寡，作相当的运用，势力勇猛精进，并非坐待革命的“宿命主义”，更不是躁进妄动的“大革命梦”。

俄罗斯革命之五年

列 宁(Lenin)

此篇为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上之演说

诸位同志！我是预定的这一问题的主要报告者。可是你们都知道，我久病初愈，实在不能做很长的报告，只能做这一重要问题的绪言。我的题目范围很有限制。本来大会上所定题目：“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及世界革命之前途”，其实非常之广大，绝不是一个人在一篇演说之中所能尽的。所以我只取这一题目的一部分，就是“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故意取此一小部分，要与你们知道，现时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对于我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正在研究。

我要论及我们怎样开始行新经济政策，及因行新经济政策所得的结果。假使我以此为限，想必能道出这一问题的总观察及其总概念。

说到我们怎样想着新经济政策。我应当提及我在一九一八年所做的一篇论文。在一九一八年初期，我正论及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态度。我当时写的是：

“对于现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国家资本主义却可为前进一步。假使在半年之中，我们能设立成国家资本主义，那就是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确实保障再过一年之后，我们能绝对巩固，而社会主义亦能得最后的胜利。”

固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现在这样聪明，然而也不至于笨到不会考察此等问题的地步。

一九一八年时我的意见是，对于当时俄国经济状况，若能有国家资本主义，却是一大进步。听来似乎有些奇怪，甚至于有些蠢气，因为我们当时的国家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赶紧实行种种经济办法，那些办法也实在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的，当时也许太赶紧了。然而我仍旧以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经济之一大进步。要说明这一层意思，我曾历数俄国经济组织中之根本元素。依我的意见，此等元素有五：（一）宗法社会的，即最幼稚的农业经济之形式；（二）小商品生产制度（此中包括大多数出卖谷物的农民）；（三）私人的资本主义；（四）国家的资本主义；（五）社会主义。

当时的俄国，此等元素都完全具有。我就想分析说明此等元素之间的关系，并且问一问，是否应当以其中“非社会主义的元素”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重些呢？说起来似乎真有些奇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看得非社会主义的元素比社会主义重要，这种误会很容易解除，只要知道俄国的经济组织不是单纯的，不是发展程度很高的，俄国之内尚有宗法社会式的农业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并存。国家资本主义在此种环境内，当有何等作用？

其次，此等元素之中，哪一个势力最大？当然，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小资产阶级的元素为最有势力。于是可以论及对待国家资本主义之态度。当时我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为非社会主义的元素，而为俄国起见，恰比现在的环境为好。可见我们虽已行社会革命，并未过于夸称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亦未过于夸称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我们当时就略有感觉，以为先进于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及于社会主义为较妥。

我所以特别注重这一点，实因只有根据于此，方能解释现时的经济政策，而为共产国际，求得此实际经验中的结论。我亦并不要说，当时已有退守的计划，那篇论文决还不是退守的计划，其中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有绝大意义的自由贸易问题，并未提及。然而始终已有不十分确定的总括的“退守”观念。

我以为这一问题，不但在俄国很可注意，俄国本是很落后的国家，就是在共产国际全体及西欧先进各国内亦当注意。譬如现在我们正要起草党纲，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应当先多加讨论，各人的草案多印出来，以便详细研究，而今年暂且不必表决。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好好想过。我们还没有想透那“退守”问题以及“退守”之保障。同时必须评论世界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困难问题。若是仅仅想着运动的方法，直接进攻以至于得胜，还是不足。革命期间往往有时机可乘，敌人忙慌失措，而我们能得胜利。然此种机遇并无意义，因为敌人若有精力可守，仍能预定计划，重新集中能力，他能及时挑战，而令世界退步数十年。所以我以为要预备“退守”之可能，不但理论上，就是实际上也非常之要紧，各国共产党都在积极预备进攻资本主义，就应当预计如何保障将来的退守，若是我们能好好地受这一问题的教训，以及我们革命中其余一切教训，自然不但无害而且有益。

于此可见，我们在一九一八年已经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退守”的可能办法，现在可以议论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当时还只有十分不一定的观念而已，等到一九二一年，经过了国内战争的各种重要阶级，而有成功，我们却遇着苏维埃俄国内部政治上最大的危机，这一内部的政治危机暴露大多数农民甚至于工人的不满意。这是苏维埃俄国史上的第一次——农民群众起而反对我们，无一定意识的，却仅是本能的情绪的骚动。我希望他亦是苏俄历史中之末一次。

何以发现此等不好的现象？原因在于我们经济上的进攻太过，而后有保障充分的基础。群众当时已有感觉，我们却还没有明晰的断定，然而经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就已承认：直接进于纯粹社会主义的生产及分配形式，实出于我们能力之外，假使我们当时不会“退守”，不知以较易着手的职任自限，非败减不可。

危机之发现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当年春天我们就议决执行新经济政策，当时意见并无甚出入，现在一九二二年，已有一年半，很可以比较比较，结果如何？此一退守政策是否有利于我们，或者还不能说有一定的结果呢？我以为这一主要问题对于各共产党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答案若是消极的，（若是新经济政策是差误的。）那就一切都防败减。我想很可以安心说一年半以来这一难题目已经答复对了。

我现在且说一说证据，应当略略历叙经济事业的各部分。

首先就是财政制度，妙不可言的俄国卢布，我想卢布真可以算妙不可言的了，因为单就数量而言，已经超过一千兆（quadrillion）。这真是天文学上的数字。我想大家未必多知道，此种数字有何意义。以经济学上的观点看来，此种数字大有重要的意义。几百万几千万上的“〇”我们可以去掉，这是无关重要的。这不过是一种办法，现在已经实行了，将来还要实行得多些呢。最重要的却是卢布价格之稳定（Stabilization）。这一问题，俄国最好的学者正在竭力研究，于经济上大有关系。譬如我们能设法使卢布有较长期的稳定，以至于永久的稳定，那就是我们经济事业的第一步胜利。那时不管他数量上的几百万、几百亿、几百兆，都不成什么问题。〔案：俄苏维埃卢布本名为计算分，为军事时期——欧战后国卢（？）战争间所发，纯以为一种救急的财政政策，绝不兑现。现金流出国外，国内市场消减，所以纸币价格低落，金内布值一千七百余万，一九二二年底，价格愈低落，发行额不得不增加；于是以一百万为一万，至一九二三年又降为一卢布，以前一百万数字上之六个“〇”，已完全去掉。必须经济发展，国内工业品与农产品对比得以相衡，方得渐渐发行金币，乘纸币价格稳定期间，重颁新币，自能使金融流通入于正轨。〕

我能指出很重要的事实出来。一九二一年间纸币价格稳定时期，没有能过三个月；一九二二年稳定时期已超过五个月。我想这一事实已经很够，固然，若说要科学上的证据，证明我们确实能解决这一问题，单这一事实必不足够。然而完全的证据，无论如何现在暂时决不能有。此处所说，至少可以证实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如今，我们确已日有进步，已经学会了好些。假使我们不做出什么特别的错误，必定更能日见成功。

最紧要的还有商业，此种商品流转为我们所必须。两年之中所营商业，虽尚在战争状态之下（海参崴的占领，不过前几礼拜的事），直到今日方能着手经营有系统的经济事业，始终能令卢布价格之稳定自三个月延长到五个月，我想确亦可以满意了。我

们真正是独力经营，资本主义国家亦没有肯借债给我们。他们办经济事业真是“好”极了，他们也丝毫没有帮助我们。他们的凡尔赛和约弄得欧洲的金融一塌糊涂，他们自己莫名其妙。这种大国强国的经济尚且如此，那么，我们这样落后，这样没有教育，能得这一些成绩也就可以满意，居然能增高纸币价格的稳定程度了。这不仅只是理论上的辩论，而已经是实际上的成绩。实践的具体事实，足证我们已能令经济生活适应稳定纸币价格的趋向，对于商业，对于自由商品交易，对于农民及大多数的小生产者，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现在再一述我们的社会上的目的。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农民。

一九二一年时，确有大部分农民非常之不满意。随后又是饥馑灾荒，又是农民最大的痛苦。当然“外国”的意见，以为旱灾是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一九一八年时地主资本家，一面开始侵袭俄国，一面就说国内的饥荒是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此种饥馑正是那国内战争的结果，他们却一字不提。饥馑真是非常之大的危险、非常之大的不幸，足以消灭我们一切革命事业、一切组织上的事业。

至于经过一九二一年的旱灾之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之后，又怎么样呢？答案已经非常之明了，人人都看得见。一年以来农民不但战胜了饥馑，而且还能交纳食粮税，现时已得几千万铺德（俄量名抵中国三十斤），并用不着强迫手段。一九二一年前之农民的反抗运动，已经完全消灭。农民已能满意现时的生活状况。此种证据强于一切统计的簿籍，农民是俄国政治上很大的动力，现在对于我们绝无反对。这话绝非夸大，农民可以不满意于政府行政的某一方面，然而他又可以自由提出抗议。这本是有的事，而且也是不可免的，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还办得很不周到，然而绝对的不满意于政府之心理，农民之中却已消灭尽净，一年的成绩有如此，也不算少了。

现在再说小工业。我们工业可以分为两部分：大工业与小工业，因为两者状况不相同，小工业确在兴盛起来，我暂不能引详细的统计。然总括而论，却有事实足以证明，小工业既在兴盛，所以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的生活状况现在已有改善，其他各区工人生活改善较少，因为其地大工业居多，可以不必混同而谈。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之改善，却已绝无疑义。这两城中，一九二一年春工人之中曾有不满意于政府之心理，现时却已完全消灭。我们天天都在留意工人之生活状况及群众的情绪，决不会说错的。

其次就是大工业。大工业的情形却还很困难，一九二一年时，大工业状况有一变更。我们可以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情形能渐渐好起来，我们已经收集了一部分资财以备进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若要振兴大工业非得借几千万外债不可。由资本主义国

家的经济史上看来，已可见落后的国家必须要几千万长期的借款，方能振兴大工业。我们却没有借着款。现时所讨论的租借区，还不过是白纸上的黑字，最近尤其讨论得多，而租借区始终还没有成立。所以振兴大工业确是落后国家中之困难问题，因为我们决不能把富强国家的借款算在账上。虽然如此，我们已经渐见状况之改善。我们的国家商业已经积聚了些资本，固然很少，不过二千万金卢布有余。然国家商业（国立的通商事业等）能与我们以改善大工业之资本，我们还止可积极进行呢。

诚然不错，一部分须由人民担负，然而我们应当积极节省，缩小国家预算，裁减国家机关。我们对此，能节省多少就要节省多少。我们样样都要节省。学校经费亦可以有相当的节省，因为我们若不振兴大工业，必定要渐失无产阶级国家之独立，我们应当知道俄国的救星，不但在农业振兴，年成丰收，不但在小工业兴盛，专为农民制消费品，而且必要大工业，这是好几年的事业。大工业必须有国家的补助费，假使没有，俄国不用说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不能成其为文明的国家，必至于败灭。我们积极进行，积聚虽只有二千余万，就应当用以振兴大工业。

我想，极简明地报告俄国经济状况，各部分都已略略地述及。可见现时已经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有积极的结果，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已经能经营商业，农业工业之中也能站得住，而努力进行。有实际的事业，足以证明。我们自然还有不少事应当学习。五年以来，我们执政，而且五年尽在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却已有成功。因为农民赞助我们。农民赞助我们，实在是一件难事。他们知道白党之后有地主，地主是他们所最恨的。所以当初他们非常之热心赞助我们。要农民反对战争，反对白党反对地主而行阶级斗争，多不很难。然而仅此不足，重要的问题乃在于政权之属于农民抑属于地主。农民现在却已经明白农工的政体。农民知道，我们取得政权以为劳工，且有凭此政权以行社会主义之目的，所以最要紧的是预备社会主义经济之基础。我们不能直接预备社会主义，所以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自成其为一种，不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相同。

土地属于国家，这是非常之重要的事实。我们的政敌以为无关紧要，是错误的。土地属于国家在经济上大有关系。一切将来的事业，都根据于这一范围。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与通常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土地既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最紧要的工业亦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小工业一部分出租，而其他仍留国家手中。至于大商业，我们渐图设立合资公司，其中一部分资本属于私人资本家、外国资本家，一部分属于我们。第一，我们因此可以学习商业；第二，我们必保证随时取消此等公司之可能。总之，我们决不冒大险。我们在私人资本家处学习经营商业，考察工业的发展，自己审察所做的错误。

其次我再说几件比较小的问题。我们确实做了不少蠢事，将来也不免还要做，这是的确无疑的。我看得最清楚。为什么我们做蠢事？这很明了：第一，我们是落后的国家。第二，我们国内，教育是很低的。第三，我们不得外来的帮助。无论哪一文明国家都不但不帮助，还在反对我们。第四，是我们国家机关的过失。我们重新改革的，本来是旧时的国家机关，这就是我们的不幸。

国家机关常常反对我们。一九一七年时国家机关的职员实行怠工，我们赶快请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了，也就是我们的不幸。我们有非常之多的职员，然而没有充分的教育智识，足以运用他们。常常上面的政府机关还能勉强供职，而下面的低级机关自由行动，实际上足以破坏我们的办法。在上面呢，以我所知道，不过有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自己的人；在下面呢，几十万俄皇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官吏，他们有的是故意，有的是无意之中，都在破坏我们的事业。在如此之短的时期中，实在也没有办法。必得有几年工夫，逐步改良，造成新力量，新人材。我们办这件事办得很快，也许太快了。现在有许多苏维埃学校，劳工预科，有几十万青年学习，学习得也许太快了。然而这件事已经开始，将来必定有成绩。假使我们能不十分慌忙，过几年之后，自有许多青年人材，足以大大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

我说，我们做了不少蠢事。我也要说一说我们的仇敌。假使他们说：“你瞧，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塞维克做了不少蠢事”，我可要回答他们：“不错，你们可要知道，我们的蠢事，始终比你们的要两样些。”

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然而很有系统，必定总有成绩。假使我们的仇敌——资本家及第二国际要指摘我们所做的蠢事，我可以引一俄国著名的文学家的话来比较比较。我稍微变一变他的文调，就可以说：“假使布尔塞维克做蠢事，他是说的：‘二加二等于五’。假使他的仇敌——资本家及第二国际做蠢事，却是说的：‘二加二等于洋蜡烛’呢”。譬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哥尔察克所订条约，岂非是大笑话。[按，上引比喻，本文是杜介涅夫（Turgeneff）之语。]

天下还有比他们再文明的再强盛的国家没有？这种富强的国家又怎么样？他们答应帮助哥尔察克，也不曾算计算计，考察考察。真是奇事，不可思议的。

其次，再存一个实例，凡尔赛条约，此等“光荣的”国家所成就的是什么事！他们怎能自己出此无意识的混乱状态？我想，拿我们的蠢事比一比资本界及第二国际所做的这些蠢事，真算不得什么事，所以世界革命的前途也确可乐观。若再加以一种新条件，革命前途的形势，尤其要好。我再略略说一说，此种条件，就是共产党之组织。

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曾有一议决案，论共产党之组织方法及其运动进行之方法，这一议决案非常之好，然而纯粹根据于俄国经验。这是它的好处，也

就是它的坏处。为什么坏呢？我新近重新看了一遍，觉得别国同志不能读，因为它俄国气味太重了，平常这种议案，别国同志向来不读。其次，这一议决案也太长，有五十多节。所谓俄国气味太重，并不是因为底稿是俄文的，各国文译本都还好，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精神太充满了全篇，别国同志不容易懂。即使懂了，也不容易履行。我此次屡屡和各国代表谈论。更觉得这一议决案是大错误。我可以在这议决案五十多节之下，都签名赞成；然而我觉得我们对于别国同志，没有知道怎样利用俄国经验去请教他们，向此议决案，遂成白纸上的黑字。我们应当更切实际，否则寸步难行。

我想，经过了俄国五年革命的经验，俄国同志及别国的同志，都应当努力学习。我们呢，刚才得着学习之可能，我也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然而苟有可能必当利用。俄国现在无论何人，俄共产党全体都积极向学。别国的同志也应当努力学习，当然不是说学着读书，写字，读着书还要会懂他，其实我们连这个也是要的。有人还争辩，这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还许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呢？我却不知道。总之我们很要学习读书，写字，读着书还要懂他。别国同志却更要有大些的事业做：他们第一要明白，我们写了共产党组织法议决案，别国同志没念没懂就署名，这是不行的。必须要能履行才好。自然也绝非一旦一夕之功。那一议决案，俄国气味太重：纯粹反映俄国革命史中之经验，所以别国的同志不能明白，他们决不能当它神像一般挂起来祈祷，就可以满意的。他们应当要迎受一部分俄国的经验。怎样就能得此种结果，我却不知道。也许，像意大利的法塞派对于我们却有些功劳。意大利有法塞派，正可以解释意大利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够，他们国内还免不了绝端专制派的反动危险。这也许是有益的。我们俄国同志也应当稍稍尽力解释此种议决案的原理所在。不然，别国同志不能懂得。我想，现时不但俄国同志，就是别国同志，对于这一层意思，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所谓学习包括一切而言的。你们的学习，则更有特别的意思，总要力求达到革命运动，及其组织、结构之种种方法。若是这事能有成功，我深信世界革命之前途，不但是好，而且非常之好呢。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屈维它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拆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其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假使设此两种文化各自独立，不相关涉，便可以如此说，以得一确定的概念，然后更进一步：先明了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他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这是研究的方法，至于详尽的说明，不是一篇杂志论文所能了事，况且此处各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后再逐期详细讨论。

中国人，甚至于学者，所心爱的东方文化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中国之‘家庭手工业’，在城市之中，尚且还有不少保存着呢，并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业城市之中。譬如宁波，有三十万人的居民，前一辈的妇女还是亲手制作衣履，以供夫妇子女之用。当时青年妇女，自己本亦能做女工，若竟向商铺购买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为怪事”。（见 Dr. Nyok-Ching-Tsur, N: *Die gewerblichen Betriebs for men der Stadt Ningpo!* Tubingen. 1909, P. 51）这是十五六年前的话。如今呢，比较僻静的外省外县，还不是如此？更不用谈到乡村了。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

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记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们，若听见姑娘们要到店买鞋，必定骂她们“无耻”，若看见洋手巾、铅笔，都说是“洋骚气”。此种厌恶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拜东方文化的旧梦，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实中国木匠的鲁班祖师、秀才的至圣先师，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会”式的文化。假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看见中国理发师手臂上刻的花纹，中国字画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题款，必定很高兴，以为社会史上经济史上添了不少陈列馆中的材料。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东方其他各国的宗法社会现象，虽然各有特殊形式，与中国不相类，然而性质是一样的，也许色彩的浓淡相异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遗迹，却很显露，比中国明显得多，田地制度、劳役制度处处都可以表现此等国家中经济上的封建遗迹。至于中国呢，难道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毁，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这是屡进而又屡退的过程（此层意思将来再当详论，此处仅限于总观念），所以政治上虽屡见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并非真正的集权政府。不过以宗法社会为基础，承封建制度几经屡起屡仆，“诸侯”的力量薄弱，经济上的凭借极不稳固，资本主义制度又为技术所限无从发生。那时所谓“资产阶级”仅得极小的一部分商业上的分配权，所以君主得勉强建成立于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隶属无数的小经济单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贵族非贵族的阶级，而官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诸侯非诸侯的统治者。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未曾死灭，况且“改丁归漕”之法律上的实行不过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而“捉差”“办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秦灭诸侯之后呢？新式社会，若无建设它的相当动力，是不能代旧式社会而兴的。中国独立的文化之中，经四五十世纪的历史，而竟不能求得丝毫类似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就无足怪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透了一口气，可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并且着手预备得也还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统一君主的败落，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中国社会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军阀制度所异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者不过两端：一、后者为自其原有的经济基础生长而成，前者乃攫得此种经济基础于外；二、后者根据于采地制度农业

经济，而前者根据于雇佣军队投机商的财阀。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然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依西欧历史的类似阶段而论，中国其实还没有封建制度，比封建制度还早一期，正在由部落的酋长时期，进于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呢（此处当然是比拟而说，不可拘泥）。例如四川、云贵、湖南、山西、甘肃、东三省等，几乎全是一军征服之后渐渐依据地势强行逼迫商民，凭借当地的经济势力，实行农奴制度式的劳役征调以剥削劳工民众，于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四川省内现时各军队之“保商”“护商”制度，商人怕“匪”当初请他们“保镖”，现在落得反客为主，每次护商队“临幸”，商人反须贡献一大笔费用，往往超过所有货价百分之五十，颇与俄罗斯开国史上商人请镖师，镖师变成“外国来的老爷”相像。福州“拉夫”办法几乎完全恢复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汉铁路、汉阳工厂自从今年罢工失败后，实行军队强迫工作。其他残杀奸淫，拘禁铐掠，和封建时代的诸侯对待农奴的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劳工平民一概是为军阀经营生产交通的牛马。凡此都不过是最显著的实例，其他相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此等现象，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

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东方诸国，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输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西欧初发展时正是封建制度的劲敌，然侵略国外弱小民族之际，却往往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其实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凡是所谓强国，因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要求，可以进而为种种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阴谋，务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适宜他的剥削政策，所以维持殖民地内能代行其统治权的各派各阶级的势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属此等弱小民族为止。中国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谓“国际均势”，而成国际的殖民地。各强国得以联络各经济区域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军阀），以至于新生的大资产阶级，间接实行其统治权。其结果，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轧赂买威吓，令中国顾东失西，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各国各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若有异，则其对待中国军阀或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就不同。中国的军阀既须有经济上的凭借，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渐成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之中心点，所以外国资本之占有此经济区域者，必从而役使之、利用之。同时，若是军阀凭借经济势力的形式太鲁莽，足以

障碍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那时外国资本之较强者，能力贯于几省以上，就想除此障碍，而与国内的大资产阶级携手。然帝国主义的性质唯在于：一、投货；二、搜刮原料；三、投资；四、开发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资本主义于危亡所必需的程序，此中仅因其经济侵略力发展的阶级不同，而异其掠夺的方式，异其所维持之阶级。而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因为中国若是经济上真能独立发展，则帝国主义必受挤而颠覆。所以不论他是辅助军阀，或是辅助资产阶级，他必有一相当的限度，辅助至此而止，力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是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经济。所谓助国内资产阶级排除障碍，不但此等障碍专是外国经济在此发展的障碍，而且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譬如最近汉口的外国商人，趁京汉工潮的失败，役使湖北地方政府专门封闭工会之与外国企业有关系者，是证军阀的制度始终大有利于外国资本。再则如上海镇守使确实是外国资本家的刽子手，外国资本家的报纸可以一面鼓吹中国资产阶级之所谓“裁兵理财制宪”运动，一面协同军阀竭力压迫一切平民之集会结社自由，甚至于市民（资产阶级）欢迎孙中山的大会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论工会！可见外国资本甚至于与军阀同样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所以不论如何，帝国主义客观上自成为使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时又以强力纳入资本主义。一九二二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祸弄的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或者说，谈文化何必论到此等琐屑的“细事”。然而要知道，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有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览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不必多论；“和平好让”更是因宗法社会中经济发展薄弱，虽争亦必能多得，祖孙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经济单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无别法。中国的“天下四海观”，尤其是古旧的封建制度，崩坏，而经济发展刚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制”，不能前进，加上宗法社会的经济组织，所以大家

只觉得要“安居乐业”，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权的国家，如何能有国家观念？只当着其他各国，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国一样呢。若更说玄妙些，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愁，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要知道罗马时代也有“天下观”，中世纪教会中也有绝欲主义，又是什么，奇珍环(?)宝！诚然不错，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惰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譬如中国经济发展，较之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北京总商会仍旧只有送万民伞的本领，福州市民甚至于打着白旗向领事馆投降，这真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之奴隶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滥调。若是此等幼稚的资产阶级能运用现时所有的一些实力，也决不至于如此。虽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真有极大的工厂，几万万的银行资本，他还肯如此俯就么？那时，恐怕此等敬长上不争夺的“美德”早已烟消云灭了。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地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

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地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地增加人类驾驭自然界的能力。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帝国主义处处阻滞此种可能。于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国人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几项“琐事”，就可以知此种“宣传”的限度了。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然而美国人克门私运银出境，犯了法被发觉，反与关卡兵士冲突受误伤致死，美国政府却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会自诩为文化机关，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国兵赛球时，赢了他的球就应该吃他巴掌(北京)。此等税关法例、球场规则，原来是中国人学来的，也可以说是极粗浅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公约，而中国人却无福气实行。至于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提到巡捕房里去。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在哪里？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并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

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说亦正是宗法社会破产的先声。至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此种文化过程，在先进“文明国”每每分为两段。因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时尚有相当的余地，所以强国得以从容不迫先经所谓“民主主义”，而后重返于绝端反对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先经科学的文明而后重返于反对科学的市侩主义，非至于旧社会中的新力量勃生，彻底翻腾，演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时，此种“循环论证”不能终止。至殖民地上，此种过程，却有不得双方并进之势：就是民族的解放运动、普通的民主运动，因厄于帝国主义之故，自然当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融合而为一；于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与科学之社会化两阶段同时并呈，道德与科学本非相消的。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此种恶性，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

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绝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熔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世界资产阶级也反过来否认新科学。这也难怪，原来他们俩，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世界的资产阶级，既以科学的发明，作为少数人享福之用。他眼看着用了这许多精力，杀人放火的机械制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终还是镇不住“乱”，保不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的结论是“科学无能”。刚刚迎合了宗法社会的心理，于是所谓“东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实哪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的破产罢了。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应当用敌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劳动平民也应如此。世界的资产阶级及殖民地上的贵族阶级已经没有能力，为他们所依附的经济制度（私产制及自给经济）所限，不能再进。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难道受压迫者便真听了他们“克己”，讲唯心主义么？因此可见，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只是征服大行的方法。在少数人垄断此种方法之结果的社会里，方法愈妙，富人愈富，于是社会中阶级斗争愈剧烈，国际间战祸愈可惨。因此以为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罪恶，假设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应用科学，则虽有斗争亦自能保证将来发达进步之可能。只因此等进

步已非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而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所以资产阶级要否认。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灭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每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地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这一方针固然非常之明确，然而实际运动之时，尤须时时不忘科学的方法，缜密的考察，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应的方法，以及东方民族内部运动之阶段，都必须极慎重的研究。现在且就此初步的尝试，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所通过的东方问题之显要看一看，便可先得一总纲领。

东方问题之题要

一鸿 译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通过：

一、东方革命运动之勃兴

共产国际之第二次世界大会（一九二〇年），就已经根据于建设“苏维埃行政制度”于东俄诸民族之间的经验，又依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发达，议定于此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独裁制为长期间的斗争之时，对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原则。

从此以来，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诸国，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屡起反抗运动，一天比一天急激，这就是欧战后帝国主义之与时俱深的经济政治危机之结果。

凡此种反抗运动，由下列诸例可以看出：（一）图谋瓜分土耳其的“塞维尔斯条约”（Seivres Treaty）已经完全破产，土耳其之民族的独立及政治的独立已有完全恢复之可能；（二）印度、中国、高丽、埃及、摩洛哥、美索波达美亚诸国之民族运动猛烈地兴起；（三）日本帝国主义内部之不可免的危机，引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亦已能进于独立的阶级斗争；（四）东方诸国劳动运动之勃兴，正如雨后春笋，而共产党的组织亦几乎各地都有。

由以上征引诸端，可知诸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基础”有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反抗军阀的斗争，更形剧烈，且今已大非昔比。此种斗争已非纯由封建阶级所引起，当初是此等国内的资产阶级还时有愿与帝国主义妥协之意呢。

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国主义战争，以及随着此次战争而生的危机，（尤其是在欧洲。）列强在殖民地所施用的强力乃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亦因此等环境，而世界资本主义之经济的基础及势力范围缩小，致使殖民地上帝国主义的争长更形剧烈，于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系统之均势局面也扰乱了（小亚细亚英法之争煤油矿，太平洋上日美霸权之争雄等皆是）。

因此，各殖民地受帝国主义的压力稍轻，而列强彼此仇视的态度加甚，于是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本地的资本主义易于发达，这都是帝国主义列强钳制之下的漏网。

列强各国资本家向来在殖民地上，享有工商业及租税的“超越利润”（excess profits）之独占权，故常力谋隔离此等殖民地于国际贸易之外。殖民地上之民族运动今乃起而要求民族的经济独立，实足表证此等国家之资产阶级已有发展的需要，殖民地本地的生产力之发达与世界帝国主义之利益相矛盾，绝对不能调和。盖帝国主义的实质，本在于利用世界经济之各部分间有生产力发展程度之不同，方得达其独占“超越利润”之目的。

二、斗争的形势

诸殖民地上之落后程度，可于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驳杂性中见之。此种驳杂性正可反映其自封建制度或自封建宗法制度进于资本主义之种种过渡形式。所以此等运动之理想亦自有那种驳杂性的痕迹。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大半都先为“商业资本”，其发生发展既在封建制度之基础上，又在杂合、参半、过渡的形式中，故此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欲离官僚地主而独立，必定经过极混淆极困难的途径，这最足以障碍那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之成功，因外国之帝国主义在落后的民族中无处不利用本地社会阶级之上层阶级（封建的或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以为其统治权之代理人中国之督军、波斯之封建官僚、埃及之资本主义式的农场主、印度之贵族（Zimeadars）及地税包办人（Talugilars）。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若变成群众的革命运动，那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统治者阶级，不但不能引导，并亦决不愿引导此等斗争。仅在封建宗法制度尚未崩败之处，其本地贵族尚未完全脱离群众，如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之中，此等贵族的代表人物，能积极为反抗帝国主义之斗争（如美索波达美亚、摩洛哥、蒙古）。

回教诸国间民族运动第一次的标语为“大回教主义”，各强国的外交家却正能利用此群众的偏见愚昧，以抗实际的平民运动（如英法之赞成回教国联合）。可是，等到民族解放运动勃兴扩大之后，宗教式的标语，“大回教主义”即为具体的政治要求所代。最近土耳其人要求嘉李法脱（Kaliphate，回教教主）脱离政权，即是一证。

一切民族革命运动大都在于要求民族统一及政治独立。而无论哪一国里，这种问题的解决必须民族运动能吸引劳动阶级并绝对脱离封建阶级之关系，方着实际，这种运动纲领之中更须包含民众的社会要求。

共产国际知道代表一民族之争取政治独立的意志者，于历史上的种种不同的情形中，可以是极不相同的阶级，所以对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都与以援助，同时，绝不可以疏忽。只有一贯到底的革命方针，根据于群众积极的斗争，绝对脱离一切与帝国主义妥协以谋自保其统治阶级的地位者，方能指导受压迫的群众取得胜利。殖民地本地的资产阶级若与封建的反动派相结合，足令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此“封建

的无政府状态”，利用其各派各系首领间之冲突，利用其各宗族间之争竞，利用各地方、各城乡之间的对抗，利用各教派、各宗派之间的斗争等，致使民众运动之组织破坏（中国、波斯、苦尔狄斯坦、美索波达美亚）。

三、农民问题

大多数东方国家里（印度、波斯、埃及、叙利亚、美索波达美亚），农民问题确是反抗列强专制之解放运动中之第一最重要的问题。帝国主义既剥削落后民族之大多数的农民而令破产，自然使农民丧失其必要的生活费，同时却因工业不发达，仅散处于少数商镇之间，故尚未能容纳乡村的余剩人口，而此等人民又不能侨游外国，于是此等农民乃穷乏不堪，留在乡间反变成农奴。先进各国，在欧战之前每以“工业危机”为其社会生产之“调节标准”，而在殖民地，此等“调节标准”乃为饥馑。帝国主义既渴欲以最小耗费取得最大利润，所以竭其全力维持落后国家中“封建式的重利盘剥制度”以剥削劳动。有几国内，譬如印度，帝国主义将其本地封建国家之土地独占权，收归己已（？），于是地税一变而成封建式的债务，而印度贵族及“地税包办人”乃变成帝国主义之经纪。其他各国内，则帝国主义假手于其本地之大地主的机关收取田租，如波斯、摩洛哥、埃及等。因此，凡是要求脱离土地上封建式的债务以及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缚，此等斗争亦有反抗帝国主义及封建大地主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一九二一年印度之摩佛拉（Mopbla）反抗英国人及地主之暴动，一九二二年之锡黑（Sikhs）暴动，即足为例。

只有农民革命，以“没收大地主”为宗旨者，方能引起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而与反对帝国主义之斗争以极大的助力。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派，怕提起农民问题中的标语（波斯、印度、埃及），足见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或“封建资产阶级的”地主有密切的关系，即在政治思想上亦不能离之而独立。殖民地之种种革命分子，都可以利用此种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首领之游移不定的态度，加以严格的有系统的批评，揭穿他们的“骑墙主义”。此等骑墙主义最有害于劳动阶级的组织及团结，如印度人之不合作主义的策略之破产就是明证。

东方落后国家之革命运动，假使不能以大多数农民群众之行动为根据，决不能有成功。因此，东方各国革命党却应当明白规定其关于农民问题的党纲；应当要求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以及大地主制度和包办地税制度之遗迹。欲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民族解放之斗争，必须提出彻底变更土地制度之要求，并当督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充分容纳此一革命的党纲。

四、东方之劳动运动

东方之幼稚的劳动运动（是）最近几年其本地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至今就是最

主要的东方工人阶级也还只在过渡时期，正从小行会的工场过渡于资本主义的工厂之时。因为当初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智识者来引起工人阶级之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以最初期的职工组织及职工运动，往往为此辈智识者所指导。最初一期中，此种运动往往不出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谓“全国共同利益”的范围。（印度、中国之罢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官僚及管理員。）甚则竟如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说，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派，仰慕苏维埃俄国政治上道德上的威信，并迎合工人阶级的心理，欲自掩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意向，往往号称“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借此得以诱惑无产阶级的团体，令忘其自己“阶级组织”的直接职任，这有时或是无意之中自然流露的现象。〔土耳其之“埃喜尔部”（Eshil Ordu）自称共产主义派，而实为“大土耳其主义”；中国的国民党有几个代表自辩为“国家社会主义派”。〕

然而东方落后国家中近年来劳动阶级、政治运动及职工组织确亦很有进步。譬如东方诸国，已无一处没有独立的无产阶级团体，就是显例。固然这些团体大多数都应该经过改造，以免一切“闭关自守”“狭义团体”等等弊病，共产国际最初即已注意于东方劳动运动的潜势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足以证明其实为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联合。至于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至今没有于东方落后国家中得一同志团体，因为他们是欧美帝国主义的“仆御”。

五、东方共产党之主要职任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看着劳动运动，只当它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国际的无产阶级却注意于东方幼稚劳动运动的“革命的将来”。东方落后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之下，不出巨大的代价，即不忍受列强资本家野蛮的剥削压迫，就决不能获得近代的文化与技术。东方劳动者当与先进诸国之无产阶级联合，不独因为要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且亦因为只有先进诸国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他们方能于开发生产事业之际得到大公无私的助力。东方劳动者与西方无产阶级联合更可以开出一行向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途径。苏维埃制度是落后诸国从原始的简单生活进于最高文化共产主义之过渡方法，唯采此制则过渡期间之痛苦最少，可以代替全世界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分配制度者本只有共产主义。旧俄帝国之下解放出来的殖民地，已有应用发展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足以为证。只有苏维埃制度方能保证农民革命之完成。譬如东方有几国农业的特别状况（人工灌溉），向来是以封建宗法制度的协作组织维持的，现在已经为掠夺的资本主义所毁坏，此种地方就确有必要设立一种苏维埃国家制度，方能从事于有系统有组织的整顿办法，以应公众之需。因气候及历史的关系，东方“小生产协作制”确当在过渡时代占一重要位置呢。

殖民地革命运动之客观的职任，实超过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限度以外，亦就因

为他的最后胜利绝不能与世界帝国主义之统治相容。当初则殖民地之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式的智识阶级确为革命运动之先驱，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群众自即加入此等运动。可是等到群众之社会利益刚占优势，那富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式的地主就立刻脱离运动。殖民地幼稚的无产阶级始终为一长期的斗争所困，自成其为一整个历史时期，此种斗争要反抗帝国主义的剥削，要反抗自己的统治阶级，因为这些阶级力谋垄断一切实业利益以至于文化，而想使劳动平民永陷于原始状态呢。

无产阶级若能为取得农民中之同情而斗争，则必自成就其政治上的领袖地位。只有此类预备工夫，训练团结无产阶级并及于与之联合的各社会阶级之后，他方能进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此种主义，在东方落后国家之环境中，较其在西方，必尤为虚伪。

殖民地之共产主义者，若以“防卫”独立的阶级利益为名，固执“当单独反抗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意见，都是最不好的一种机会主义，足令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大失信明(?)。借口于怕“国民统一”，怕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行“国内和平”而竟至于实际上与工人阶级日常利益相隔离，这是最危险的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人政党及共产主义者，有一双方的职任：一方面，力谋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诸问题作更彻底的解决法，即直接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别一方面，组织工人农民为其事阶级特别利益而奋斗，并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矛盾，而自取其利。此种工人阶级的政党，既有其特别要求，自可兴奋无限的革命能力，绝非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的要求所能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劳动阶级应当知道：只有扩大加深那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运动，方能令自己阶级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换一方面言之，唯有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之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及其运动中之锻炼方能增长此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力量。

东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共产党，多少尚在未发展的阶段中，尤当参与一切运动，务使时时得接近群众。同时，又应当竭力排除劳工组织之中的宗法制度、小行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势力，以此保障劳工组织，令勿受改良主义的传染，而使成群众的奋斗的组织。再则，当竭尽心力，组织最多大数的农民劳动者及男女手工工匠，务以他们日常生活利益为根据。

六、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西方因在聚集已组织的精力时期，取“劳工统一战”的标语。而在东方则现时必须要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此种策略在于积聚革命的生力军以抗帝国主义。生力军之所以亟须征集，其重要原因在于国内的统治者阶级倾向于与外国资本家妥协，漠视民众的根本利益。正如有“劳动统一战线”的策略，则在西方易于暴露社会民主

派之不忠于无产阶级利益；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则在东方亦易于发现某一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派之态度不明、宗旨不完。这一标语，也足为发展革命意志之助，且使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更为确切，导入于实际斗争，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并亦反对一切封建制度的遗臭。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劳动运动，第一当先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线内获得独立的重要的地位，当有独立的基础，且能维持永久的独立，方可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暂时的结合，亦且必须结合。无产阶级应当特别提出要求：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废除一切封建式的权利与特权，要求妇女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等等。这是因为照现时的情形，苏维埃制度还不宜提出来。同时，要使农民、半无产阶级与劳工运动〈产〉生极密切的关系。当向劳动群众明白讲解劳动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及苏维埃共和国有联合之必要，因这亦是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中重要职任之一。殖民地革命而欲终得胜利不再败退，唯有与诸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之一法。

半殖民地诸国（如中国、波斯）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与一帝国主义国家或数帝国主义国家相结合，其危险已至，或希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自己获得政治的独立（土耳其亦有危险，而且比殖民地更甚，此种结合，每每划分本国统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权限，借以保形式上的政治独立，而实际上将永使此国隶属于世界帝国主义之下）。

劳工阶级明白承认，在此反对帝国主义之革命的斗争中，有欲得“息力”之处，每须为部分的暂时的妥协，确亦可以，且本不可免。然劳动阶级极端反对帝国主义者与国内治者阶级之间的妥协，瓜分权力，使统治者阶级保持其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要求联络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鲜明旗帜。再则，为铲除社会政治两方面反动分子势力及保持劳工阶级自己的利益起见，当有极坚决的行动。要求组织上的自由权，以便劳动者的阶级斗争；要求更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以扼制反动派去其政权（如民主共和国，农田改良、税制改良、宽广的自治基础、劳工立法、童工保护、产母及婴孩保护等要求）。现在就是在独立的土耳其，劳工阶级并没有享受到组织的自由权，这可以当做一个好榜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是如此。

七、太平洋沿岸无产阶级之职任

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线，一半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互相仇视滋长不已所促成。这种互相仇视的局面，今已可断定世界第二次大战，必在太平洋区域内爆发，不然就是国际革命兴起，方免此战祸。

华盛顿会议之召集，即在企图缓和这种危机。然而按之事实，这次会议只有使帝

国主义彼此间的冲突更为深广，更形剧烈。最近中国张作霖与吴佩孚间之冲突，是日本与英美资本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上并未真能调和利益之明证。第二次世界大战，蒙其受害者不仅是日本、美国、英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荷兰）也必同受波及，损害之大必远过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欧战。

东方各国共产党所应尽的职任，乃是在群众之间广为宣传，警告他们来日大难，唤醒他们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十分努力，告知他们只有苏维埃俄国是一切受压迫被剥削的民众之屏障，尤其是太平洋沿岸诸地共产党应该努力。

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美国、日本、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际此战祸危险之大，不仅应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并应尽全力去净劳动运动中助长战争的动机，预防资本家利用“爱国”观念、“人种”观念。

此种动机为移民问题、有色人种劳动廉价问题。

契约劳动制为今日南太平洋植糖业招募中国人、印度人充当工人之唯一方法。这种事实，强迫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要求政府颁布禁止移民律，以排斥有色人种，如美国、澳洲皆有此种举动。这种禁止移民律使有色人种与白色人种冲突日益加厉，更足破坏劳动运动的联合力。

美国、坎拿大、澳洲共产党应该努力进行，作废止上述法案之运动，并须向本国劳动群众剖明，此种法律引起国际间的仇恨，最终仍是害及本身。

另一方面，资本家亦反对上述的移民律，他们却因为一则可以使廉价的劳动自由输入，二则可减少本国劳动者的工资。要破这种毒计，只能竭力使白种劳动者之职工联合会吸收移入的黄种工人。同时，努力作要求有色人种与白种工人之工资一律的运动。这种策略，一方面既可打破资本家的毒计，别方面又可表示国际无产阶级绝无种族的偏见。

为施行这种策略起见，太平洋沿岸诸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应集代表开一“大太平洋会议”，以便商定正确的进行计划，并组织一相当的机关，俾可联合太平洋诸种族之无产阶级。

八、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职任

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所以必须格外地加紧在殖民地上的工作，帝国主义诸国的共产党尤其应当努力。

法国帝国主义在压抑本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用他殖民地的奴隶充任革命的战卒。

英国和美国呢，既然剥削殖民地而得“超越利润”遂能略分余润与本国的“劳工贵族”（aristocracy of labour，案：即言，得有分外增加高级工人之工资的可能），如此从

事賂买，因使劳动运动分裂，至今还是继续行这种政策。

凡领有殖民地的国家，其共产党当格外努力援助殖民地之劳动运动及革命运动，予以物质上思想上的援助，并须定有系统的规划进行。殖民地上之欧洲工人有些俸给甚厚，其间遂流行一种“殖民地化”的伪社会主义的思想，凡共产党都应当竭力反对这种倾向。殖民地上的共产党工人当与其本地工人一致要求具体的经济改善办法（白色人与有色人受同等的工资、同等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法等等）。

埃及、阿吉斯（Algiers）等处欧洲工人特立组织共产派的团体，反足以助资本家张目。共产派组织而依国籍为标准，正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冲突。凡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都应当向劳动平民宣传，说明颠覆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内的统治权之必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应当在他中央委员会之下，特设一殖民地委员会，专任其事。共产国际对于东方共产党的辅助，第一步就当为创办印刷所，以各地本国文字印行种种报章杂志。殖民地上尤其注意，各种欧洲人的工会及当地驻扎的军队。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应有丝毫疏忽，令政府、资产阶级及机会主义的社会党，得以对于殖民地行掠夺政策。

共产主义之于劳工运动

洛若夫斯基(Lozovsky)

洛若夫斯基是莫斯科之赤色职工国际的委员长，此篇为其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讨论职工运动时之报告，详论共产主义者对于劳工问题之职任。至于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之关系及其组织上的区别，读者可以参看本期所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

（节译）

共产国际本以反对改良主义派的一切现象为职志，而现代的职工联合会恰好是改良主义派的巢穴，所以共产国际进行的第一步，就不能不与工会中之改良派相冲突。因此，共产国际最初即已明定其对待现时改良派工会及其首领之态度。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已定出共产派在劳工运动中的方针，力除“工会分裂论”之谬见，当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因为不了解共产主义的政策之根本职任，只知道性急，所以有此等主张。第三次世界大会又曾加以讨论。

现代的职工联合会，已成世界资产阶级最后的避祸地，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反得以此为根据。第三次大会对于这一问题曾有很详尽的议案，论及世界职工运动中之最重要的各种问题。尤其特别注重的就是必须以“争取职工联合会”的政策为根据，努力与改良派奋斗。最后一九二二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扩大的”全体大会上，其时已发现世界职工运动中新生一派，主张取消共产派独组织的赤色职工国际，虽然他们的理想甚高，其实是弱点之暴露，是不善于组织锻炼自己的能力以与改良派争之结果，所以又曾在此大会之上明定方针，竭力矫正此派之错误。

此次第四次大会应当更进一步。职工联合会中共产派的运动之大致的方针，已经确定。我们现在要立更具体的办法，世界阶级斗争实践上的经验，足以发生种种问题，都应当更为规划。欲论这些问题，必先一述现时的环境，我们共产派力求工会之“革命化”，不得不一视此种运动进行时之场合。

只要稍一留意世界的职工运动，就可以知道它现时正在危机之际。此种危机，一方面是为“资本之大进攻”所引起，别方面亦因现时职工运动之领袖者理论上、实践上的穷窘。资本家之进攻态度，至一九二〇年之末而明显。他们的行动却带有预为规划组织的性质。他们的目的，在于减轻生产之成本，而以跌低工力的价值为手段。欧战所引起的种种困难问题，资产阶级想以剥削工人阶级为手段来解决它们。并且经济的危机愈险恶，资产阶级进攻的策略愈很毒，因为资产阶级在战时营利积蓄已成习惯，所以现在他不论在何种状况之中，都想得如此之厚利呢。资本进攻的形式，在金融状况好的国家内与在金融状况坏的国家内，很有不同。然而总括而论，八小时工作制已受侵犯，工资亦已大大跌落，到处如出一辙。甚至于根本反对工会之存在的倾向已露（如美国之所谓“工场公开”，“Oppen Shop”）。除纯粹经济上的进攻外，近两年来资产阶级更到处组织特别团体，专以消灭工会，杀害工会首领为事。在意大利此种现象最著，意大利之共产主义运动之受祸先于其他西欧各国，而劳工组织之被消灭亦然。意大利之法塞派以及各国与之相类的运动，正可称之为“预行的”反革命，意大利工人尚未得社会革命之利，已受反革命之害。此种各方并进的资本进攻，却只遇着工会首领方面很薄弱的抗拒。亚摩斯德丹派（黄色职工国际）以前处处宣传他们争得的劳工运动之胜利，颂扬万国联盟及国际劳动局之盛德。等到资本进攻之趋势发现，他们竟持“静待”的态度，至今不曾有一次自动建议进行斗争之事，除非是受工人群众的督促，才勉强前进一步。最近的英国之企业家同盟罢雇，英国之煤矿罢工，法国之五金工人运动，及德国意大利之罢工中，都足以证明此种现象。这些改良派工会领袖到处取消消极的态度，而且还只想快快和平了结，破坏工人阶级的斗争，散乱他们的组织，灰他们的心。工会领袖既然如此公然表示他们不愿领导工人斗争的态度，工人自然失望，而退出工会。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以来，工会会员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日就减少。工人出会，工会缩小，反对资本进攻的能力更弱。一九二〇年法国的劳动总同盟（C. G. T.）有二百万人以上，现在分成两个团体，总共尚且不过六十万人。意大利工会会员从二百万跌到七十万。英国工会人数减少了一百三十万，美国一百五十万。捷克斯拉夫、瑞典、挪威、荷兰、丹麦等亦是如此。只有德国、奥国还能照旧，却不是因为德奥工会领袖特别地有革命精神，而是因为德奥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格外可惨，再则这两国的工人向来有组织。工会人数的减少还不算，而且工会中空气也一天一天的坏，大家都像不敢自信似的，自己的力量都不肯信。亚摩斯德丹派当时兴高采烈地声言，国际劳动局可行“大改良政策”，现在都成了哑巴。真正是“花落火尽”，他们现在已经不信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组织，能有什么创〈造〉伟大的建设！虽然他们仍旧参与那国际劳动局，及万国联盟，这不过因为他们已经牵缠住这两个“顶顶好的”机

关，舍离不得而已。比如囚犯上了手铐脚镣，还有什么法想，只好戴着它“同归于尽”。他们不能舍弃“阶级协作”，因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根据这一原则。不但如此，这种“阶级协作”来得更亲密，因为工会与资产阶级间的决裂，不但是资产阶级的末日，而且亦是这班亚摩斯德丹派的末日。（威尔逊的政策真妙！）

亚摩斯德丹派对于资本的进攻不肯尽力抗拒，看来非常之胆小，非常之消极，然而他们对待革命派的工人，却非常之勇敢，非常之积极。从共产国际之第三次大会至第四次大会的期间，到处都有反对工人中之革命派的运动。

亚摩斯德丹派很怕自己在工会中变成少数，所以他们宁可及早分裂工会，免得工会的指导权落于共产派之手。亚摩斯德丹派的口号是如此，此种口号本是他们的本色，非此也不能救资本主义于危亡。法国的亚摩斯德丹派居然能分裂工会运动，现在已有两个劳动同盟。捷克斯拉夫工会中共产派势力发展，渐有侵犯改良派首领的趋势。这班亚摩斯德丹派又学着法国的办法，实行分裂。西班牙之“劳工总会”看见共产派及工团派渐占多数，竟忍心把最大的矿工工会分裂。德国的建筑工会、铁路工会、运输工会都用尽手段驱逐共产派，开除共产派的选举人，或者不承认他们选出来的候补人，以此隔离革命的领袖与革命的群众。德国工会的改良派，处处设法实行这种政策，驱逐最有战斗力的分子。“德国职工联合总会”的机关报上，竟有一论文题作“自左而至的仇敌”，说道：“要工会强盛，非肃清内部不可”。亚摩斯德丹派如今用“赶出会去”做他们的口号，而节节实行。共产派愈盛，群众革命心理愈强，他们想分裂工会的意思也愈明显，因为他们不要有革命的工会。他们宁可要天主教派的工会、黄色的工会，而不要革命的。这种事实非常之多，指不胜数。譬如德国改良派的矿工会很愿意的和天主教派的工会及波兰人之国家主义派的工会结合协约，而始终不肯接近“智力体力工作者之联合会”，说它的分子是无组织的。这一“联合会”本是革命的组织，共产派所指导的，而改良派的首领竟极力排斥它。虽然，亚摩斯德丹派的手段，本不限于一国之内。最近亚摩斯德丹国际在罗马开大会时，他们与各业工人之国际书记部代表行联席会议，又重新声言革命的工会不得加入此等国际书记部。他们真勇敢，真有决断的很，丝毫不肯放松的，亚摩斯德丹派对待革命派的工会，向来是有决断的！最近一年中各业国际职工联合开除俄国的工人，或简直不容纳他们，如五金工人、矿工、木工、建筑工、纺织工、农场工人、邮电工人、运输工人等。形式上说是因为他们既在全俄职工总会中又属于赤色职工国际，其实是因为他们行过革命，现在是劳农俄国及其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基础，有共产主义的精神。这些各业的国际书记部，属于亚摩斯德丹国际宁可欢迎反革命的工会，而革命的工会决不肯容纳，唯恐破坏了他们的“和平生活”。

此种排斥革命工会的现象，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根本上说来，这实在就是资本进攻的反映。亚摩斯德丹派既立于资本家的一方面，他们自然尽其所有能力以摧残国际的工人运动。现代工人运动的首领看得非常之明了，他们知道若是保存工人运动的统一，虽然进化得未必很快，然而始终必有向左的趋势，若是共产主义派取得工会之大多数，那时不但资产阶级失败，改良派也要没有存身之地了。所以他们故意引起分裂，故意实行开除政策。他们要使工人阶级的能力单弱，要破坏组织，要工人堕落，至于不能争取政权为止，至于不能享有管理生产及交易之权为止。他们真算是尽力设法救现代的“文明”呵！

亚摩斯德丹派反对共产派却不是孤军独战呢，还有无政府派帮着他们。最近两年无政府派反对共产派格外厉害。从一九二〇年起，这种现象，一天一天的急激，直到现时，无政府派的态度已与改良派丝毫不异。固然不错，无政府派自己说的宗旨与改良派相异，其实此等政治行动，内容绝无不同：无政府派竭力限制共产派在工会中的运动，加以诬蔑，并且甚至于否认共产派有在工会中运动的权利。如美国的“世界工业工人会”（I. W. W.）、意大利的工团派联合会，法国亦有几个工团派的团体，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派，都有此等行为。他们的口实，总是反对政治运动，而且以职工国际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相对待。大家都知道，无政府派看着一切政治、一切政党、一切国家都是洪水猛兽似的。他们的思想，只有“仙灵的”境界，凡是一种名词都当他“永久”的“绝对”的看待，也不会分别分别。他们只是一味的笼统的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否认共产党与工会之间的一切关系。此种“天上”的理论，叫做什么“独立主义”，一年以来无政府派尽拿着它当旗帜，来反对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照他们的意思，要共产党归共产党，工会归工会，各归各。无政府派所赞成的各种议案，说来说去都是这一层意思，他们以为“纯粹的”职工联合会格外地有革命精神。

然而无政府派不仅只与共产派有思想上的争执。这一年来更有许多事实，足以证明亚摩斯德丹派的圈套也笼络了无政府派。有几个无政府派的团体，因为自己会员中有赞成赤色职工国际的，有赞成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结密切关系的，就把他们开除了。意大利工团派联合会中就有这种实例，荷兰工团派及其他数国亦有此等情形。此种行为都是想使政治运动与职工运动相隔离，想令革命的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相隔离，而自己独自组织另外的国际。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曾有一次无政府派的世界会议，当时议决着手运动组织一独立的革命工团派的新国际，所以这一年来各国无政府派有此等行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居然有些成绩，无政府派竟集拢几个团体的代表。此一新国际的性质，只要一看他们领袖，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指导权乃在一班德国的“洛嘉黎派”（Lckkalist）、一种托尔斯泰派、“政治上的素食派”。要问何以无政府派这样

反对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呢？十月革命之后最初一期，无政府派的团体本来都愿加入共产国际的。如西班牙之全国劳动同盟及意大利工团派联合会等，都曾加入。他们何以又退出呢？无政府派之忽起反对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俄国革命，实因于今日世界工人运动之总环境。无政府派的突变，正是反映世界资本及亚摩斯德丹派的突进。无政府派虽然总有革命的口头禅，然而始终永久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所以，当此资产阶级集全力以镇压共产派之时，当资产阶级国家内一切力量都已联合而成统一的战线以对待共产派时，无政府派自然而然同他们取相似的态度。固然不错，无政府派的攻击态度，他们自己说是因为赤俄境内的无政府派所处的地位而起的，说是因为他们主义上对待一切国家一切独裁制而起的。然而说是说，做是做，我们且看无政府派实际上做出来的是什么事。他们当此共产主义运动最困苦的时候，全副国家机关都要他们担负，世界资本家都在侵犯他们，旧式的工会以全力反对他们，在这种时机，而无政府派更突然提出反对共产派的党纲，仿佛是为工会要求独立。可见无政府派与改良派同列一战线，而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共产派的战线，至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幻想家之参与，而益（？）完成，所以逼得共产派不但要和资产阶级奋斗，而且还要和改良派及无政府派奋斗。无政府派永久是和改良派联合的。这亦没有什么稀奇，他们同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个铜钱的背和面”。

无政府派及革命的工团派格外地喜欢指出工会对待政党的中立。他们自以为这是革命的工团派之职工运动的特色，不讲中立就讲独立，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谓中立主义，就是说职工运动对于一切政党同着看待，与政治运动绝对脱离。无政府派及无政府工团派一听到“政治”就吓得手慌足乱，并且他们把“政治”和“议会主义”相混，把“政治行为”、“政治斗争”和“议会选举”、“选举运动”相混。中立主义，一方面是最右的改良派之口号，同时又是无政府派及无政府工团派的口号。美国劳工运动的一个首领美德赤尔著一书，名《有组织的劳动》，其中特别明定一种思想，说现代的制度由三种要素而成：一、资本，二、劳动，三、社会。此间所言“社会”究何所指，很不容易解释。大约是他以为一切自由派的社会改良家，凡是同他常在一起参与各种“会”“社”，讨论劳工立法，改善工人状况的人，就算是“社会”。这一“工会首领”向来抱的态度，怎么样的“中立”，怎么的“独立”呢？只要看一看，他死后的遗产，不多不少，恰好有一百五十万元美金，那就可以知道了。这多是他当职工运动首领当来的钱，这一中立主义实是职工运动中最恶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令无产阶级思想上受统治阶级的束缚（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党、自己的政纲，方有确定的方针，可以和统治者阶级反抗）。

至于所谓独立主义，原则上与中立主义同其根据。固然不错，“独立论”似乎与中

立主义政策相违反。无政府派及无政府工团派之所谓“独立”理论上乃是说，唯职工运动为独尊，职工运动处于其他一切劳工运动的形式之上，不但拒绝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之指导，并且否认政党有存在之权。近一年中各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与赤色职工国际之辩论中，最足以见此“独立论”的意向。法、美、荷兰、瑞士、意大利之工团派，各有其在劳工运动中之地位，而所发言论却与各派地位信之重要为反比例，他们总是以工会与共产党相对待，并且说，工会自己独力可以革命，而得革命胜利之果。共产派其实很可以回答他：“请罢，请你把事实证明此一理论。”我们共产派在现时尤其可以要求工会首领实行革命，只不要仅有宣言。最好的理论，必是有事实可以证实的，共产派理论，不但有俄国革命，而且还有别几国的革命，足以实证。无政府派及工团派的理论，却还没有证据。不但如此，还有“反坐的”证据。俄国革命，无政府派实际的行动，就足以证明他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马黑诺夫（Mahnov）的武装暴乱，实可见其代表富农阶级的私有财产的观念。因此，我们不但对于反对共产派之“独立论”抱怀疑的态度，而且以为若是此种理论占有势力，对于当地的劳工运动还有很大的危险。总之，分裂政治与经济为平行的各自独立的两部分，实在就是破坏整个的劳工运动。劳工运动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现象，因时因地而不同，因环境而不同，因政治状况而不同，因社会内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而不同，此间斗争的方法，或用此而不用彼，或用彼而不用此。但是我们若是绝对分离政治与经济，尤其是以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相对敌，那么，简直是生生劈开原来交融为一的斗争过程，简直是弱无产阶级的力，刚刚把他最能胜敌的机会打消，而敌人却正很有组织很能联合呢，这一层是非常明了的。资产阶级却不信此等理论，他不令政治与经济分离，非常之能运动用他的各种机关。他的国家政权、文学、科学、艺术、宗教、企业家的经济机关，凡此一切都打成一片，成整个的机关，来压迫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俄罗斯共产党的党纲说：“政治是经济现象之集合”。我看这是最明了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之定义。共产主义者之视政治运动，乃是工人阶级之解放运动，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社会相敌对。凡是一种行动，足以激励此一敌对态度，开阔此一阶级矛盾，联合统一无产阶级以求达其自己的目的，确定几百万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政治运动。只有极幼稚的思想，才把政治斗争仅仅当做议会行动看待，议会行动不过是无产阶级之种种色色的政治行为中之一。以政治与经济相对待，所谓“独立主义”，所谓“中立主义”，其实就是无政府派。工团派要想离间共产党与工会，依赖“非政党的组织”来反对共产党罢了。“独立论”的根本，实即反对共产主义，不但反对共产党而已，因为共产主义不能离“时”“空”而实行，不能无一定的组织，要实行共产主义，不能无共产主义之实行者。固然，工人阶级的全体就是共产主义之实行者，然而工人群众

既有其“共产主义的本能”，自能结晶其“共产主义的意识”于一定的组织中，就是共产党。所以持“独立论”者，以工会与共产党相敌对，离间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反对此共产党，实即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反对社会革命，

无政府工团派于反对“政治”时，因而持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对待。然而什么是工团主义？“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之ism语尾，此处先作“制度”解，可以解作职工运动之全体，即一国之中工会的“总和”。如此，则工会组织既已包括所有已组织之工人，若以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对待，实为“无意识”之思想。欲以工会与共产党相对敌，岂非工会对于共产党的工人、党员亦取对敌态度！工团主义必另有意义。诚然，“工团主义”又是劳工运动中，职工联合会中之一思想流派。此种思想之特点，在于专派注重工会，近二十年来工团主义的结晶分化，有种种支派，而主要的理论，在于“以职工运动凌驾乎其他劳工运动形式之上”。工团主义根本上，就有无政府派的、反对政党的、反对政治的倾向。工团主义说，工人阶级在工会之中养成其先锋队，能经工会而实行其目的。法国共产党之马赛大会时，工团派与共产派辩论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很足以见此层意思。当时共产党大会很慎重地表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的意思，工团派就大大地反对。

其实工团主义既是工会中之一派，亦想自己定出党纲来，定出策略来，以及他自己的斗争方法、斗争形式，求工人群众集合于阶级的行动。共产主义亦有此目的。既是这样，凡有工团主义的国家内，劳工运动中实是两种政党的竞争，一是共产党，一是工团党而已。工团派其实也是一种政党。可是工团派是无政府派的继承者，看着政党两字，是天下最不好的东西，若是听见这一句话，一定要大跳起来了。此种对于政党的绝对厌恶，却亦是由于西欧诸国不但资产阶级政党，就是所谓“社会党”的政治首领，对于议会行动实在堕落不堪，昧着良心胡干，反激而至此。改良派议会行动的事实，引起此种混淆政治运动与议会选举的观念，工团派的不幸，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理论的来源，所以以为“工团主义是群众工人运动中所自生，而共产主义是外来的‘政治家’，有害于工人阶级，可怕的恶现象”。工团主义，如以其中最倾向于现实派的，最有健全的精神者看来，则其思想流派实甚近共产主义。因为他不但同样以颠覆资本主义等为目的，并亦提出根本方法——无产阶级独裁制。工团派与共产派之关系，应当怎样定呢？工团派本非统一的思想流派，其中又可分为数支派。因此，若是空泛的以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对待，更无理由。一、有所谓“无政府工团派”差不多与无政府派毫无分别；二、有“工团革命派”，却可与无政府派严别界限；三、则有“工团共产派”，离共产主义最近。可见工团派不是什么整个儿的东西，而是立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几种思想流派。因此，凡有工团主义的国家内，共产派对待职工

运动中革命的工团派之态度已可非常明了，所应尽的职任也极确定。首先，共产派应当建议劳工运动中各左派的联合。“工团共产派”与我们本最近，这一支派，算是现代工团主义中之真实受着欧战及俄国革命的教训最多的。他们已经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独裁制，并且知道过渡时代此一制度必不可少亦必不可免。他们观察无产阶级独裁制，已经不尽由无政府主义的“书本”上抽象的“革命”概念着眼，而确能观察实际生活，多受其教训。此派最显著的，就是法国的“劳工生活派”（报名），自称为无党的共产主义派。实际上就是共产派。其中有许多共产党的党员，不过实际运动方面，他们还没有入共产党的范围。这亦没有什么可怪，因为法国共产党还没有政治上的威信，共产党还正在建设中，思想上也不统一，所以还不能引导全法国的群众运动，其实以法国的客观环境而论，早就可以有很好的共产党组成了。

当然，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对于劳工运动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对于工人阶级所当尽的职任，有两种不同的实行法。我们既与工团派有思想上的异点，自应竭力加以矫正。无论他怎样实行反对政党的政策，无论他怎样拥护这一政策，共产派决不能赞成的。所以必须对于现时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派的种种式的思想派别，加以有系统有规划的矫正。同时亦切不可于实际上妨碍两派共同工作的进行，以敌资本主义之进攻，并以敌改良主义。怎样便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只有在革命的行动中。若工团派愈强，对待共产派愈见其侵袭的态度，则共产党于政治上也愈弱。若是共产党能为政潮之先锋，能及时提出各种动作的建议，能确切看出敌人的弱点而予以打击，则工团派不得不与共产派携手。至于共产党内部若生纠葛，自己不能信其共产主义精神，处处怕首先倡议，处处想等别人先说话，那就决不能与工团主义派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因为此种共产党，要自己辩护他的没有建议的能力，没有引导劳工运动的能力，反将自命清高，说出“独立主义”的论调来。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政党与工会的关系，绝不发生问题。共产派的责任，在于令一切工人组织都具有一致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意志。共产党必能有系统、有规划地实行此一责任，方有意义。共产党取得工会中之势力是社会革命之前提，所以必定要理论上、实际上都能做到这一层，方是真正的共产党。所以现在第四次大会上，也用不着再加理论上的讨论，这一问题，已有解决。假使我们重新又要论及这一问题，那却并不是要改订新原则，而是审视此种良好的原则，究竟现在应用得怎么样，公开的说，此种原则，实在有些共产党党员不会应用，应用得坏极了。

第一，当知道政党与工会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决不能各国相同。我们可以有统一的理论，而实践应用上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政党与工会之关系，每因当地劳工运动的性质而变，因当地环境之特性而变，因政治社会全体的状况而变，因各地

的旧习惯，各国社会党向来的作用而变……譬如英美，职工运动的历史甚长，而共产党很幼稚，那地方的共产党与职工会之相互关系，必为另一形式，决不能和工人政治运动的历史长而职工会幼稚的国家，如俄国等相同。我们可以正确的规定目的，要为共产主义取得工会，付以共产主义的精神，令采用共产派的策略，这是一致的，然而决不能在各国都用同一的方法求达此目的，更不能立刻实现。譬如英国，有极大的职工运动，旧时反对政治、反对社会主义的习惯很深产(?)而共产党刚只有一两千人。此地说不着共产党与工会之正确关系，工会正仇视政党。此类国家中，不用说共产党与工会的总关系，且只说共产党与工会中一部分的关系，与革命的工会及工会内的对抗派(Opposition)的关系，只有此种关系能渐根据阶级斗争而发展。所以英国共产党决不能以其小小的组织自满，必须在职工运动中建成极大的对抗派，而共产派即当渐成各种对抗派所围拱的“结晶的中心点”，应当力求对抗派之集合，而共产党自己亦将凭此对抗派而发达。更必须令分子极不相同的各种对抗派与共产党之组织间，立成相当的关系，勿使对抗派中发生反对共产派之倾向，说共产派想他们对之作机械式的服从。同样一个“取得工人群众间之势力”的目的，在此种环境之中进行起来，却要非常之谨慎小心，不可急遽。在美国的情形，亦相仿佛。美国共产党亦不大，而所谓“文化联盟”之中已有很大的对抗派。美国共产党应当根据此一“联盟”之党纲进行运动，原来“联盟”之党纲，就是赤色职工国际的党纲。当然，此种党纲比起共产国际的来没有这样明显，而“文化联盟”的党纲，也没有美国共产党的明显。然而他要联合各种对抗派，自然不能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在美国第一要集合一切反对冈伯士派改良主义的对抗派。所以共产党对于此一“文化联盟”当极有耐心的共同工作，况且他已在极短时间做了不少组织上、训育上的派动。应当竭力帮助此“文化联盟”发展势力，集合一切对共产派表同情的人来赞助他，帮他在美国劳工运动中与冈伯士主义奋斗。固然，共产党还要留意于自己在工人群众之中的势力及影响。然而这决不在于几个议决案，或中央委员会的好议案，而在于实际的运动。所以尽可以少说话，或者竟不说最好，仅仅是口头说“共产党监督文化联盟”是没有用的，至多只能有机械式的监督，甚至于并非监督，而是妨碍“文化联盟”的运动，因为有些工作，共产党自己本无能力去实行。只要能先建设成好好的共产党，引进各业工人入党，愈多愈好，巩固内部的纪律，而后在职工会中之势力自能发达。共产党在职工会中之势力必与其在群众间的工作，其“政治的回音”成正比例，并且政治上的势力必定要有组织功夫上的确定。大概而论，现时职工会中共产派的组织功夫往往较政治运动为少。德国就是一个先例。德国已有很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且大约算来共产党已在亚摩斯德丹派工会会员中得有一分之一的势力。然而组织上，这些对共产派表同情的群众，却绝不巩

固团结。此种政治势力迅速发展而组织上的“确定”功夫进行很慢，却是一种矛盾现象，对于德国的劳工运动很有危险。可见在紧急的政治斗争中，往往可以觉着能力不足，不能组织革命势力而十分整备的去运用指导，因“组织的中心点”不敷应用。此处共产党与工会关系的问题当然就与英美不同。德国之属于共产派的“智力体力工作者之联合”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却成问题。此一“联合会”之发生，盖由于斯巴达克派（德最早之共产派）之建议。后来德国共产党变更其对待工会之策略，而此一“联合会”已有十五万会员工人，反成了许多德国共产党员之在职工会中工作者的“目中钉”，以为他妨碍共产主义运动之进行。何以故呢？实是因为此等共产党员对于实际问题，喜欢用抽象的方法来解决。他们以为既已重新决定“我们的策略不赞成分裂工会，而要争取工会”，因此“智力体力工作者之联合会”就可以不必存在。这可是纯粹虚悬的形而上学。那一“联合会”既已存在，最近几年内，于德国的客观环境看来，将来也还要存在的，既然存在，他自然要扩充。天下没有不征求会员的团体。本来只应当大家都去行共产主义的政策，详加讨论，而现在都因为一“联合会”反惹起纠葛。幸而好，这一问题已在最近一次的“智力体力工作者联合会”之大会上大致地解决了。

意大利的职工运动与政治运动却密切相关，仅有一“工团派联合会”是例外。然而这一组织，于意国劳工运动上绝无势力。最大的力量就是“劳动总同盟”及共党派，所以在意大利之工会与政党的关系，不成问题。……法国却非常奇怪，共产党自己赞成“工会独立论”，而工会方面尤其甚。共产党员可以一到工会便不听党中的指挥，不守党中的策略，岂非极奇怪的怪现象。共产国际并不要职工联合会服从他，若是共产党而说他要令工会服从，他就是绝对不明白共产主义的策略。然而共产党的每一党员总应当处处都做共产主义者。现时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实在有病。且等他们去谈“自治”，资产阶级的进攻能教他们觉悟过来。那一班工团派的“共产党员”受实际生活的教训，始终要明白过来：工人阶级的胜利，不在“职工运动独立自主”之处，而在各种劳工运动的形式都能交融为一，有一致的共产主义精神，有一致的共产主义意志的地方。

总之，现时资产阶级极愿工人阶级分裂，而亚摩斯德丹派更怕统一的职工运动趋于革命，竭力主张开除革命派及共产派。然世界的趋势，正因资本主义濒于破产，不得不取进逼工人阶级的政策，层层剥削，若有统一的职工会，虽然暂时权在改良派，而受此外敌的侵袭，其中工人群众的反抗行动，不期然而期必趋于左派，趋于阶级斗争，不能再停滞于“阶级和平”之中。既然如此，则工人阶级的胜利，将因统一而愈有成就的机会。亚摩斯德丹派处此左右为人难的地位，只有主张分裂，以保存其首领的地位，其实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实行维持旧社会。共产派决不主张分裂，且当力持

统一的要求。因为分裂能使工人运动之力转弱，倒退几十年的程度。不但如此，劳工运动若有此分裂现象的退步，工人的反抗力必大减少，而企业家得以重新巩固其统治权。我们应当节节实行此统一政策，步步都要从极力统一联合为宗旨，若有已经分裂之处，应当极有系统地进行合并的办法。当能在此“左右开弓”的困难事业，一方面要与阴谋分制工会的改良派奋斗，一方面又要与以主张分裂为彻底的“左派”奋斗。左右派的分裂政策都足使工人运动转弱。右派固然是奉行资产阶级的意志，而左派以为退出改良派的工会便是救济工人运动的好方法，亦是谬见。共产党决不当主张革命派的工人退出改良派的工会，假使如此，我们决不能在会内占有势力，更不能使改良派工会与革命派工会合并统一，此处当非常留意于“劳工统一战线”之实行，几派工会之间若是没有协约决不抵御资本之进攻，取得最小限度的胜利。共产派应当解释与工人听：各派工会协约之必要，共同防御之必要，非此不能保障工资的增加，生活程度之增高。此处必能督促各派工会共同进行。

改良派之所以力行分裂政策，我们已说明其原因，他们要分裂工人阶级，令社会革命成不可能的事实。他们更因工人对于改良派政策的信仰心一天一天的堕落，急急于要避免工会内的批评，避免革命派在工会内的宣传。现时资本进攻愈甚，改良派的命运愈危。固然，当时资产阶级曾屡屡对改良派让步，然而不过因为怕革命罢了。欧战后，改良派做资本家与工人的“中间人”，能使一大部分工人信他们的手段。普通的工人，不容易觉察此中隐秘的“社会的原因”，现在却可以明白了，人人都看得见改良主义的破产了——万国联盟国际劳动局，凡尔赛和约的一大篇“圣恩高厚的谕旨”原来都是开玩笑的。改良派所以不得不急于分裂世界的职工运动。

此等亚摩斯德丹的改良派极力要摆脱革命派的会员。于是工会中开除共产党员几成普遍的事实。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决不能容忍此等隔离共产党员与工人群众的政策。而且此等政策各国有各国不同的形式，所以各国共产党的对付方法也要能相机而行。如德国之改良派工会中遇有工人选举共产党员来当工会职员之时，他们的老首领（真正的改良派）就实行开革此等选举人。捷克斯拉夫的总工会甚至于开革整个儿的工会，如化学工业的工会、木匠工会等。然而方法虽各异，却总有相似之点，我们可以决定一大致的共同的对付法。对付开除会员的方法，其实可以章程为根据。无论哪一工会，章程上开除会员的规定，必在于会员有过失，决还没有定上凡是共产党员都要开除的条文。可以利用此种合法的权利力争，但是仅此必不足，必须每遇一次开除，就到处宣传鼓吹，在各种工人会场、工会代表会议上，努力攻击工会办事人的不法，引起群众的同情，揭破他们内幕的阴谋。只有使这班“工会官僚”知道此等开革，可以惹起经年的攻击，他们方才不敢胡作妄为。再则，或有工会的地方机关中，选举的

结果，大多数教职员是共产党员或是左派，总工会竟不承认，再选又是如此，每每继之以开除选举人。选举既是根据章程办理的，则开革及不承认的办法，显然是总会的“官僚”方面违法的行动。共产派对付他的方法，就不限于仅仅抗议而已，此时地方机关尽可不必服从，地方机关本没有履行中央机关违法议案之义务。地方机关并可停止转交会费于总会，会员仍缴纳于地方机关，但不到总会承认此地方机关后，会费决不转交总会。至于已经开除的会员，尽可以召集会议，大家共同表示抗议，要求恢复会员资格。凡此一切当然各有特别状况，要相机应用，此等行动绝不是共产派倾向于分裂工会，而是力求已分裂者合并统一，未分裂者巩固团结，真真实实成工人阶级自卫利益的机关、阶级斗争的机关。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确定的原则：“争取职工联合会中之势力”，而非破坏原有之工会。这几年来实际的经验，尤足以证明此原则之正确，唯其欲“争取职工联合会中之势力”所以必须要“职工运动之统一”，因为不统一则无以对资产阶级行剧烈的斗争，无以使工人群众渐趋于革命。共产派决不怕多数工人的落后、守旧。改良派无论如何阴谋破坏、分裂工会，排斥革命的对抗派，都是枉然。共产主义生长于工人群众之间，于劳动界里渐次成熟，自然发展，有现实的社会制度及经济结构逼促他起来。共产国际乃是“无意识的历史进程”之“有意识的表现”。所以共产派决无主张革命派工人退出旧工会之理，当初“左派”此种主张，在实际上已大上其当，大上其资产阶级的当。现时已很少这样的傻子，然而美国、德国，还间或有些。其实这种策略，是强以人力拨开那革命的动力使远离群众，大有害于工人阶级，大有害于共产主义。

其次，所谓“争取工会中之势力”，有些共产党以为是只要运动到工会的小领袖，各会的书记、会长等，就算了事。一旦发生事变，发生冲突，才知道工人群众并未到手，大家还不十分了解主义。从此可以知道，仅仅运动到领袖，并不是“争取”到工会。可见必须变“共产主义的情绪”为“共产主义的意识”，极广泛的共产主义教育的一层工夫，非用不可。尤其要在工会内部建立“共产派的小组”。共产派自己先要有组织，再进而组织团结一切对抗派。“共产派的小组”在工会之内，是共产党与职工会之连锁。此间共产党对于职工会的关系正确与否，全在乎他对于这些“小组”，以及“小组”对于工会中反对改良派首领之各种对抗派，有无具体行动的计划。这是组织方面，必须有极巩固、极团结的精神，非常之一致的纪律，然后能努力推广此精神于全体会员。再则，当初入手运动之际，宣传方面往往亦太限于抽象的问题，应当以较具体的、较实际的问题，在日常斗争之中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非如此不能争取到工会。此外，共产派在工会之中自当有相当的机关报纸，以为宣传，不但要讨论总体的政治

问题及国际问题，并且要及于地方的琐屑的实际问题，如工资定率、劳工保险以及工会内的组织问题等，这是宣传方面，必须切近实际生活问题方能引入最终目的的概念。

凡此一切职工运动中之责任，既有实际具体的行动计划，其最近目的乃在联（络）各国，职工运动使围拱我们革命派的赤色职工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三次至第四次大会之间，有几国共产党中，颇有一派人主张取消赤色职工国际，他们说：“既然要行‘统一战线’，要统一职工运动，要不破坏工会，那就可以取消赤色职工国际。”这种意见是谬误的，幸而已经打消了。本来，若是说各职工会中之“共产系”，各小会、各工厂中之“共产组”，当然用不着在共产国际之外另立一新国际。可是赤色职工国际都要联合各国职工运动中之一切左派！其中共产派亦有，工团派亦有，概括而言的革命派的工人亦有。凡是不愿意“阶级和平”而要阶级斗争的都可加入。可见取消他，就是取消革命势力扩张之机会。我们并不是要在原有工会中分裂出这些革命派之后，才使她们来加入赤色职工国际。我们只要各工会，或是整个的，或是一分部。总之，凡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各自在自己工会中力求此赤色职工国际之党纲策略就当地实行。并不是组织上的分裂，并不是破坏工会，而是思想上的争取此等工会，联合之以革命的党纲、革命的策略。

我敢信共产国际在职工运动中之一切困难，必能渐渐经过。劳工运动中之一切形式，不论是政党是工会，都要联合统一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亦将开展于一切劳工组织之中。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

陈独秀 译

洛若夫斯基所论，仅为总括的原则，即有实际运动的方法，亦偏于欧美，而未及东方。世界职工运动，凡属共产派的，尚有赤色职工国际总其成。上篇本只是洛若夫斯基以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之资格，对于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之报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间，共产国际开大会时，赤色职工国际同时亦开第二次大会于莫斯科，关于各国特别问题，多有讨论。其内容本非洛若夫斯基那篇报告所能包括净尽——仅得知其总体的状况及大致的概念而已。兹因中国处于半殖民地之地位，特取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议决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译之，以见共产派对于职工运动中之“东方问题”的方针及其念。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

一、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是现代帝国主义制度所不可少的部分，若无殖民地及半殖民，则帝国主义必不能存在。

A. 殖民地常为其“宗主国”（metropolis）国家收入之直接渊源，宗主国常以租税制度、国家专卖制度吸取此等收入。

B.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利用殖民地土人之军队，以巩固其在殖民地之统治权，甚至于以之巩固殖民地以外的统治权（如英国之在印度、波斯；法国之在非洲、德国）。

C. 殖民地是宗主国恶劣贱售的工业品之大市场。

D. 殖民地是宗主国“余资”之发泄地（如铁路、商港、电站、电车、殖民银行等）。

E. 殖民地是宗主国之工业原料及燃料之渊源，此层于今日尤关重要，原料之争夺，已成各国帝国主义政治变迁之重要原因之一。

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受政治的及经济的种种掠夺。政治方面，则军事权、立法权及行政权皆集中于少数大地主大资本家及“政府”人员之手。此等大地主大资本家，

来自侵略国者居多。经济方面，则利用立法、行政、关卡、税则以及其他方法妨碍殖民地之工业发展。不仅以此种方法妨碍殖民地之工业发展而已，即其已有之工业亦往往濒于灭亡。帝国主义实是故意设法令向日（？）原有制造品及输出品之殖民地，变成纯粹的农业国，至于仅能输出原料品，推销其宗主国之制造品（如印度）。且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欲任意剥削，必且对于殖民地之劳动群众，行其愚民政策，故不仅物质方面而已，即智识方面，亦见其掠夺行为，断绝殖民地社会上的文化上的发展。

三、殖民地既能助资产阶级增加宗主国之富力，因亦大有影响于宗主国内之劳动运动。殖民地之劳动报酬，恒远不及其宗主国，况殖民地工业既不发达，手工业的技术，万不能敌宗主国所输入之贱售的工业品，因而日益破产，加以宗主国所行种种政策，令农民日见贫困，丧失其土地，故殖民地上常有过剩的劳动力。此等劳动者一般之生活程度既甚恶，工会组织又非常薄弱，因此不论何等条件无不忍受，但求得自卖其劳动力，所得报酬几至不能维持生活。于是资本家乃能取得“超越的利润”远过其在宗主国内所能得者。当宗主国工业隆盛之际，需求劳动力，尤其需要高等的熟练工人，资本家于是以其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所得之厚利，略分余润于宗主国内之高级工人。于是造成所谓“劳工贵族”其地位既优越于工资微少的劳工群众，自然与之分离。劳工阶级中既分出此特权阶级，宗主国内劳工运动之组织，当即因之而分裂破坏。此等“劳工贵族”，遂成帝国主义之机械。欧美高级工人之所以沉溺于改良主义者，其主因正在于此。改良派能笼络此种国家内之高级工人，决非偶然无因而至。正缘殖民地上剥削而来之厚利，于其国经济生活中确占重要地位也（如英国、美国、荷兰、日本及战前之德国）。至于白种工人之在殖民地上者，道德亦甚堕落。因其工资与本地工人不同，生活程度亦异，两者每每互相仇视，互相竞争。本地工人罢工时，白种工人从而破坏，反助资本家，在高丽之日本工人亦然。

四、至欧战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经济政治地位大有变更。战期中列强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输入减少，列强对于殖民地反有军事上财政上之依赖。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异常剧烈，凡此一切皆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资本家取得自由发展之机会，渐离各宗主国之帝国主义者之荫庇。于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印度、埃及、中国）发现急遽的工业化，因此殖民地上欧美式的企业中发生许多工业的无产阶级，群众咸集中于工业都市。此新生的无产阶级，即时涌出广大运动，弥漫东方全部。

五、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幼稚的劳工运动颇有特点：

A. 已组织的工人人数虽多，然在无产阶级全体比例上，究属少数。

B. 最近发生者亦有较巩固之工会组织，然多有仅因罢工而生之工会，随罢工风潮之息静而灭者。

C. 工会组织又常带有“行会性质”“团体主义”“省界主义”“地方主义”（如中国），除罢工之时外，少能表现阶级的意识。

D. 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遍于东方各国，因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幼稚的劳工运动每每为资产阶级及其领袖之势力所支配。资产阶级因此运动之有利于己，故欲利用此群众，甚至于工会之首领往往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事业家”，且有资本家者。

此等特点，乃因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业，在封建的宗法的制度之下，又当高利的商业资本流通之冲，急遽发展所致，虽各地有种种形式上的不同，而实为一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之工会所同具的性质。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同受帝国主义之束缚，因而有民族运动。本地之资产阶级遂能利用人种观念、民族观念、门第观念以及种种传说迷信，凡为农民式的无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所不能详辨者，皆足为鼓动之助。资产阶级往往假名独立解放运动，以图诱惑劳苦群众之阶级的社会运动，令成为简单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资产阶级即于其所谓“民族运动”，亦未必忠实耳。

六、故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职工运动问题，应有下列的策略：

A. 根据阶级斗争的原理组织依产业而联合的工会，当完全脱离资产阶级之势力，务以保护无产阶级之阶级的利益为目的。欲达此目的，在大多国家内尚需力争工会立法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权。

B. 当实行有系统的不折不挠、继续不断的奋斗，以求殖民地本地工人与来自宗主国之白种工人，劳动条件相平等（工资、工时及一般待遇）。

C. 同时，当竭力消灭殖民地本地工人与白种工人间之民族的仇视心，此种仇视心实有利于资本家，为阻滞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劳工运动发展之主要原因。

新生的殖民地资本家，本甚乐于煽动增长此种仇视心，其利用之也，有两种目的：一、令劳动阶级内部分裂；二、号召大多数群众以从事于资产阶级式的民族独立运动。

D. 然仍必努力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此种运动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自然必有民族解放运动之性质。帝国主义既以吸所厚利于殖民地为目标，则殖民及半殖民地之工人阶级必先破坏帝国主义之统治，方能得较优之劳动条件。故参加一般的民族运动时，劳工运动当能于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上，取得最先进的完全独立的地位。同时即可暴露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中国之国民党、印度之甘地派、荷属南洋群岛之回教社、土耳其之“平民军”等）之虚伪的骑墙态度，指明其轻视农民问题。吾人正应努力于农民群众革命的斗争中，取得指导者之地位，若无农民革命，则殖民地及半殖 < 民 > 地之民族解放，必不可能也。

E.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职工运动尤有特别职任，即（农场工人）之极大的群众组

织。农民乃东方诸国（如高丽、波斯、土耳其）人民中之最大部分，至于手艺学徒，亦须令脱离家长式的行业制度，加入无产阶级之斗争。

七、凡此一切问题，不仅在殖民地上非常重要，即在全世界劳工运动中亦复如是！赤色职工国际必当扶助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幼稚的职工运动。

A. 凡革命的职工联合会，有殖民地的各国之职工联合会中少数的革命派，已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者，皆当特设机关，与其殖民地之职工运动相联络。日本、美国与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高丽、中国、远东相接近，于此工作中尤有重任。太平洋一切问题之解决，将由此诸国劳工运动发展之程度而定。

B. 根据各国及各殖民地实际境况，定具体行动的计划。赤色的职工国际决议于下次世界大会时，同时召集一全球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革命的职工会会议，即日着手筹备。

C. 于此殖民地职工会议之前，为建立东方与西方之间及东方诸国之间革命的职工运动中更密切的关系起见，必须先在各重要港口设立“港口办事处”。港口之选定及设立“港口办事处”之切实办法，由此次运输工人特别会议讨论之，赤色职工国际亦当特派代表参加。

世界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华尔嘉 (Varga) 之说 亦农 编译

世界革命之中，无产阶级处于指导者的地位，正因他的社会关系令他不得不以领导革命为使命。至于农民阶级，亦是经济生活中之重要动力。然而于革命的斗争中，农民问题，却自成其为一种，有特别困难之处。最困难之点，实在于各级农民之阶级地位，极不固定。工业之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起来，分明得多，确定得多。谁是工人，谁是手工业者，谁是工厂主，一看就知道。工业中，自工人而变成工厂主，自工厂主而变成工人，非常之困难，的〈确〉是少有的事。固然，在资本主义退化时代之中，我们亦可以看见，工业的工人同时经营小商业，投机事业等，或在家中仍能自制手工业品，然总观起来，阶级的分别，始终明显。

至于农业之中，却大不然。其间有许多阶段，种种的过渡阶级：从真正的绝无私产绝无田地的农业无产阶级，至田地极少的半农民，以至于小农、中农，富农。我们可以时常看见此等阶段间之往来过渡。因此而农民所属的阶级，极不固定。譬如因田地之改良，小农可以变成雇用长工的主人翁，同时又可以因外围的环境而退转，竟使他不得不自卖劳动力。可见农业之中不但没有阶级的分化，即使有，亦是纯粹临时的性质。

不但如此，工业与农业之间，还有数量上的差异，即此等中间阶级的力量。在城市之中，共产主义的宣传，大概可以不大十分注意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小商人等。因为无产阶级在城市之中，数量甚多。至于农业中，则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为数每每极少，而小农中农却占居民中之大多数。因此，在乡村之中，对于此等阶级，应当比在城市之中，格外地多注意。

农业中阶级地位之不稳定，确有经济上的原因。本来农业中之“生产手段”，以田地为主要，却很容易分割，而且不甚影响于生产量。工业的工人，决不能想着分割铁路、电站或机器制造厂等。假使如此，真是无意识，而且就是直接毁灭此一产业。农业之中却不然，尽可以分割田地，而同时不减少牧获的数量。若是小农民有教育，

他们自由分地可以不受丝毫恶影响。因地可以随便转卖收买，可以任意荒芜，或因遗产辗转相授，或因分割过甚。农业的根本，既可随便分割，则立于此根本之上的生产者，农民的阶级地位当然常在动荡不定。

再进，则有更困难的一种环境。各国各区的农业状况异常之不同。工业无产阶级的问题，虽也各国有相异的情况，始终还大致相似，农业之中却有非常之大之多的差异。略举而说：第一种形式，殖民地之受剥削的农民，如埃及如印度。农民受以前盗匪的剥削，强迫工作，此等盗匪又与封建式的地主有密切关系，以及一切大王爵，英帝国主义的“联襟”，此种地方，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受压迫的农民反对地主之社会的斗争。并且民族的解放运动亦就是农民反对一切“社会的剥削”之解放运动。

第二种形式，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彻底而封建制度的遗迹还很显著的地方。就是德国尚且有此封建制度遗迹的气息，愈往东愈甚，波兰、巴尔干半岛、路美尼亚、小亚细亚，愈东则封建制度式的农业愈多。

第三种形式，譬如美国，纯粹资本主义的农业，农业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全体生产制度中之一部分。英国的“移民地”，如加拿大、澳洲，甚至于英国本地的一部分，亦是如此情形。此处剥削者与受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与工业之中相类似。

再则，我以为若加以中国的农业结构，可以说是第四种。中国的农业经济，总括而论，可以说是纯粹小资产阶级的。虽有少数的大农、大地主，或中等地主，他们对待佃户及雇工，事实上或者等于农奴制度，然社会的生产关系法律关系上，始终已经不见明了的封建制度。与其说，中国农业上有封建制度遗迹，不如说是有宗法社会的遗迹。可是，还当注意：一、中国政治上既在退向封建制度，农业上就有“现代式的农奴制度”发生之危险，也许有“暴发户”，承劳动农民疲敝之时，握得中国向来“以农业品棉丝茶等占经济生活最大部分”之枢机，因此土地渐渐集中，初或绝无影响，久则必赖各种强力任意使用平民之劳动力，以为少数“住在城里”的地主挣厚利。二、中国边境空地，因自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将由帝国主义者直接变之为大农制度的农场，生产力或由此而增高，而平民汗血都入世界资本家的手里。华尔嘉所集材料较不完备，远东方面的中国，以我个人的意见为之补充，约略可说是如此，然而中国无确切的统计可凭，也不敢自信。

况且，所谓某种形式，不过是论其大概，若是细分析起来，尤其要发现运动中之困难而又困难的问题。譬如欧洲之凡尔赛条约后所新建的南斯拉夫国。其中新附区域，有纯粹的封建式农业，此处的农场劳作者与以前的土耳其地主之间的关系，还纯是封建式的；旧时的塞尔维亚，却是纯粹资产阶级式的农业国；至于从南匈牙利及霍尔瓦德所割过来的一部分，更有极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极大的农场、新式的机器构造。

一国之中，显然有三种相异的形式。实际运动之中，农民问题的要求，在塞尔维亚的与在南匈牙利的不同，在南匈牙利的又与土耳其旧壤不同，如今合而为一，就非有相当的口号，分别而复合之不可。

其次，还有一种各国容易有互相差异之点，就是土地缺少问题。譬如在波兰及匈牙利，甚至于德意志、意大利之一部分，土地问题是农民最感切身利益的。至于美国及英国之殖民地等，却不成问题，因为那些地方土地很够。法国呢，这一问题也不十分重要，因为法国人口之增加非常之慢。战时死的人约有一百五十万，所以现在法国农民不觉得土地缺少。布加利亚则虽觉土地缺少，而没有大地主可以分割。所以土地问题亦不觉十分紧迫。可见此中差异之点正多着呢。

贫农的阶级地位，既不明显，又善变动，这是他的特点。于是他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因此而亦善变。有时他们自觉与无产阶级相接近，有时，经济稍宽裕，又渐接近富农。因欧战之故，尤其可以明见农民阶级之善变性。简略言之，欧战时期农业工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物质上的分配，却是农村经济受利益。因此欧战前有许多农民自觉近于无产阶级，欧战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增高，而渐接近富农。可以说，欧战前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欲得大多数农民间之同情较易，而欧战后则较难，然而欧战却能对于农民加以更明显些的阶级分化。欧战时食品价格之增高，比其他货物较速。所以凡有余粮的农民，都发了财。至于穷苦的农民，亦更穷苦，不得不自卖劳力为生，此中阶级分化突进一步，不过没有工业那样急遽罢了。

最近两年，又起了一种变化，农民生活状况，却再见恶化。譬如美国及阿根廷，工业品太贵，农民已经没有高价出售食品，贱买工业品之可能。此种最新起的变化使农民债务日重。

综观以上所论，可见乡村中资产阶级的各种分子，他们的阶级性都非常之不稳定。即此便可恍然于凡有农业的无产阶级之处，只有此农业无产阶级能为革命运动之最主要的动力。此等绝无田地真正的农村无产者，自是共产主义政党之联盟者，无论在何等环境之中，他们不能坚决奋斗绝不畏缩。共产派之于农业的无产阶级——农场工人，当然有非常之明了的运动方法，应当根据于他们日常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劳工立法等等。不但应当竭力赞助他们此种奋斗，而且要联合统一他们的运动，令与工业无产阶级相联络，努力指导他们。如此，方能证明共产党确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于此等农场工人之前。

其次，便是，“半无产阶级”中之运动方法。此处却自“左”自“右”都有发生危险之可能。向右的危险，就在于“半农民”及资产阶级的小农众多的国家内。此处共产党之农民问题上的要求，往往容易与一种“纯粹农民主义”的极端党相混。譬如

此等国家内农民问题上的要求若偏于小农的利益，要求政府严定农产品之最小限度价格之类，则一方面可以有损于城市工人消费者之利益，别方面又有害于最穷苦的乡村贫民，向左的危险则又是一种：很有共产主义者，泥滞于学究式的理论，以为只有工业的及农业的无产阶级能为革命的积极分子，贫农小农却不能。这亦是错误的观念。差不多除英国州，其他欧洲各国，若无此等小农阶级之助，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假使乡村间的资产阶级、富农、中农、小农绝对的反抗，则无产阶级独裁制必不能稳固。所以，怕近农民及对于大多数农民革命化之可能性，取过分的怀疑态度，亦是谬误，正与轻视农业无产阶级相同。总之，最靠得住的最有战斗力的，自然是农业无产阶级。然而在革命运动增涨的时机，凡一切乡村中之劳动平民都应当结合。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议决之农民运动纲要中，指出农民阶级受资本界束缚之种种形式：田地典押，重利盘剥，投机事业，贱值收买农产品而高价出售之于城市。细言之，则农民阶级受“工业资本”之束缚，在于因专利制而工业家得故意提高工业品之价格；受“交通资本”之束缚，如在美国，铁路企业家力能操纵农业品之运输，承运者每每得货价百分之五十。至于农民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法律的地位，尤其困顿，国家之租税政策、征兵制度、战争时之征调，无一不与贫农阶级利益相矛盾。

共产派之现实运动，正应当赞助此等农民阶级所应当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可以略略举例而说。关于农产品之价格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单说，农民应当特定农业品的高价。然而，却可以说，资本家不应贪得厚利，当贱价出售肥料、机器等类生产手段于农民，农民方能贱售其农产品。至于工业消费品，亦为农民之所需，更应当限制最大限度的价值，不得任意操纵。此等问题中最重要者，自是土地问题。土地缺少，是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的最积极的动力。所以这一问题，非常明了：共产党是否赞助缺少田地的农民争求扩张田亩？赞助还是反对？这一问题非常之紧迫，共产党不能不答复，当然是赞助的。共产党的策略应当如此：无论资产阶级的哪一种农地改良策，都应当有共产党提出的新要求与之对抗，务在努力推广农民问题的要求，引导农民行向革命。

用地缺少的农民，如租田的佃户，迫不得已要付出一部分收获，所以他们一定极愿租价跌低，共产党当然不反对此种要求。然而共产党可以说，仅仅跌低田租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只有没收租主的田地，用革命的手段方能解决此等问题。缺少田地的农民愿意买地，想国家特定贱位摊买，共产党就赞助此种要求，进而为之要求无价的颁发。贫农虽有地而不能耕种，又应当由国家供给农具。只有如此的运动，才能结合此等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引之行内革命，与城市无产阶级共同携手，积极奋斗。

资产阶级的政府，若是看见此等运动渐带革命性质，却也会预防，先分田地与农民阶级之首领，因此缓和革命。譬如俄国边境的各国、芬兰、腊德维亚、埃史笃尼亚、路美尼亚等。（波兰政府已经允许分地，却还没有实行）。英国经济学家报（Economist）的通信记者说：

“路美尼亚的农地改良政策之实行，实起于政府之恐怖心，而不是经济行政上的计划。这是统治阶级防御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代价。”

这是当然的现象，或者可以问：“既然此等运动，在相当的时间，能变成反革命，何必加以赞助呢”？诚然不错！然而共产党在此种形势之下，不得不进行。虽明知富农等稍有满意便立刻让步，令农民革命运动转弱，然仍须努力。理想上的革命过程本来应当是：缺少田地的农民与城市的无产阶级双方并进，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同时农民阶级没收田地。其时乡村平民取得田地于无产阶级独裁制之手，犹如俄国，比处分给田地者已非资产阶级，而是刚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的对面，还有资产阶级在，他或者能捷足先登，径行分此政策以弱革命运动。所以理想上的革命过程，未必实现，可是，决不能因此而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与农民阶级相结合，我们即使在资产阶级已行农地改良政策之后，亦正可以立刻利用其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政策之缺点。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政策，决不能有益于真正无地的农业无产者，因为他必须行收纳官价而后颁发的办法，或是存记田价作为债款。再则，资产阶级所颁发田地，更不能到与绝无生产手段绝无家畜或农具等的农民之手，即使资产阶级因“畏大乱”而想实行较彻底的政策，始终有“私有制度”为之作梗。譬如南斯拉夫在旧时的匈牙利南部，分给田地于绝无所有的退伍兵士，然而兵士仍以所得田地出租，而于农地制度上，可谓绝无效果。此等资产阶级之农地改良政策，缺点非常之多呢，其结果：可以造成一人数较多的富农阶级，与资本主义生息相关；同时富农与贫农之间利益的矛盾，却亦因此而更激烈。贫农或不能得地，或虽得地而身负重债，永为资本家银行之牛马，到头来始终是赤贫。因此，共产派的农民问题纲要，就要求土地收归国有，没收一切农业的生产手段，无值颁发田地，且附加农具，使尽归绝无田地的农业无产者，以及缺少田地的农民。此外更当令中农不起反对，令其对于革命守中之态度，所以共产派又特意注重，提出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必当取消典押田地制度、租田制度，现在租田的佃户，应当完全享用所耕田亩，不付任何地价。于此可见，资产阶级的农地改良政策与无产阶级的农地革命政策，绝不相同。凡此都是世界革命中解决农民问题之要求。

至于农民运动中之组织问题，则凡有农业的无农阶级之处，必当组织农场的职工联合会。既有此等联合会，则当于其中组织共产派的“小组”力求指导其一切运动。此等联合会之组织方法，如本为依职业而组织的，更当渐求改为依产业而组织的，凡

经常在农场做工的工人：铁匠、铜匠、木匠、建筑匠、大农场中之司机生等，都结合于统一的工会。再则，若有黄色的农场职工联合会、法塞派的职工联合会，以及其他一切工会，不论是革命的非革命的，农村中之共产党员都应当加入，竭力设法于其中组织成共产派的“小组”，方能就其内部暴露此等工会不能满足农场工人之要求，更于事实上证明此等工会并不与农场主人奋斗。其次，共产派亦当加入于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小农的组织、农村协作社等，同样设立自己的“小组”于其中，以求指导此等团体，令参加共产党的各种运动。凡在贫农的一切运动之中，共产党都要力求取得领袖地位，尽其指导之天责。

凡此，都是世界革命中农民运动之组织方法。

无产阶级与贫农阶级，当能互助，方可得社会革命之胜利。这并不是乌托邦。如南德五金工人罢工时，很得贫农阶级之助，当时农村之中募捐罢工后援的费用，居然得到不少食粮。缺少田地的穷苦农民中，若有运动，城市的无产阶级亦必能与以援助。这两种运动差不多至今互相独立无关的，非力求其联合不可，若已有“工厂委员会”之组织于城市工人之中，则两者之联合，更可着手于组织大农场中之职工苏维埃及贫农苏维埃，如此则小农亦能得城市中“工厂委员会”的援助，双方同进以促起革命运动。运动方法非常之多，此处不过略举数例，还当各就时地不同之环境中，相机应变。总之，共产党不但在党纲上，并且须在实际运动上，表现其能真正代表一切贫苦的大多数劳动平民之利益。首在于结合统一城市无产阶级、农场工人、缺少田地民农之革命运动，而引之走向世界的社会革命。

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

社会改造的伟业不能没有精神上的文化能力来担负。况且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文化运动，是最先进最普遍的文化运动。文化运动必定要能增进劳动群众之政治智识及政治觉悟，使农工平民了解其所处之社会地位，自觉其政治能力，方才能行向社会改造，尽复与人类文化之天责。唯其如此，文化运动方能实际增加社会运动之内力，社会运动亦必有此，方能成其为文化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派的社会运动及文化运动所以永不能相离，亦永不能不注意于“政治教育”，宣传方法的研究。学理深入的讨论，其重要不在实际运动之下。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曾讨论及此一问题。兹取当时之教育回顾委员德国代表项莱（Hernley）及俄国代表克鲁朴斯嘉（Krupskaga，列宁夫人）之演说，译述如下，以见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的意义。

奚滨女士志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项莱之演说

同志们，此次之教育问题委员会一致主张以为大会中所当讨论的教育问题，不是共产主义的教育政策全部之计划，而仅限于共产党内所执行的教育问题——共产党中职员与党员之政治教育问题，及共产党中职员与党员施行政治教育于党外群众之问题。

共产党之政策比之于资产阶级和改良派之政策，非但宗旨不同，并且事实上亦有异点，因为共产党之政策是根据于科学的，而且由于细心分析历史情境及明白知道资本制度内的社会势力而定的，这种政策之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从这样看来，一切共产党之政策，必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为根据，方能做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领袖，以及一切受压制的民众之引导者。因为这层缘故，共产党应当给他党员和职员以一种精细的学理上的训练，这是很要紧的。

共产党中需要政治教育，还有一层缘故在里边，就因为一切共产党均在幼稚时代，非但机关成立未久，而且党员之多数在政治上的经验又很少。现在许多共产党员，仍受小资产阶级及改良派的观点与理想之遗害。我们现在斗争的战阵，异常复杂，幼稚

的共产党，虽然发展很快，始终觉着应接不暇，艰难万状。譬如现时“统一战线”的策略（见本期第二编），尤其要共产党中一般的党员都能敏捷适应，彻底思考，且须有一致不变的宗旨，此种需要，不仅限于一党中少数的指导者。因此各国共产党中之共产教育必须从党员中进行起来，切不可只施于少数职员。盖共产党不像改良派，其重要事务不是少数领袖所执行，而是全体党员所参与的，共产党党员绝非仅享有选举权利，开会时到会，领有党证而已，更非盲从的群众，讨论时盲目投票而已。共产党员一定要担任党中职务的。因为必须服务，每个共产党员就至少须有一点最小限度的政治智识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再则须具些组织，演说与辩论之才能，学习公共会议之习惯法等，如此，方能组织各种机关内之共产党“小组”（Cell），议会中工会中之共产“系”（fraction）。

共产教育与改良派教育大不相同。改良派使工人相信，以为在资本制度之内，虽然无产阶级横受剥削贫困不堪，始终在智识及艺术方面还可以与资产阶级平衡，似乎在资本制度之下，所谓全人类平等自由的幻想，至少在精神方面可以实现！以此而令工人不注意于阶级斗争。再则改良派教育偏向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或有工人借一己之勤恳，常听通俗科学演讲，及受某几种科目之特别训练，而后乃超越侪辈，这样就是利用同伴中之费用而使地位较优。共产教育简直与此相反，他的宗旨是在训练成一辈革命战士，训育各个工人之阶级的共同责任心，使党中之战斗力、鼓动力与组织力发展增高。从这样看来，改良派教育之结果是使工人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理想，而共产派教育的宗旨却是使工人超脱资产阶级思想的“轮回”。共产派教育使工人明白一切理想均依赖于经济与社会之基础常屈于经济与社会现状之下，欲得精神上之自由是不可能的。总之，改良派之教育仅与工人以现成的结论，况且还是用的很坏的普及方法，或受以很平常而未必可靠的资产阶级的科学与艺术智识，人家的残羹剩肴，反当他是膏粱肥肉。反之，共产派教育使无产阶级知道资产阶级的科学及全部教育制度均有阶级性质，而决与资产阶级的科学、艺术、道德、宗教宣战。指明资产阶级的趋势，不但在社会科学与政治中有，而且在不关社会与政治之科学中及纯粹抽象的问题中亦有。如此批评资产阶级的科学、艺术、道德、宗教，即所以建立共产派教育的基础，以备创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及平民生活之新模范。只有批评资产阶级的科学艺术，只有为着无产阶级革命而批评，为着阶级斗争之伟业而批评，方能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否则所谓“新文化”都是幻想而已。

现在无产阶级贫困，非但缺少物质的产业，并且也缺少精神的产业，因为精神方面不能有遗传的“宝藏”，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重要异点。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他们自己的有智慧者，当革命运动之际，便能于艺术与科学方面大放光明

出来。他们所以能够做到这地步，因为在革命之前，资产阶级之衣食是充足的。况在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之前，他们已享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生产手段”。无产阶级都大不然。无产阶级仅在取得政权之后，方能完全享有精神物质两方面的“生产手段”。虽然，最早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成绩，以历史的观点而论，却在幼稚时代，即能于斗争的过程中，锻炼出唯物史观的利器，督促马克思与昂格士二人建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共产派教育之进行，既为专供奋斗之用，必须划有界限。设有一个经济竭蹶之党，又要做重大的政治奋斗，他所施的教育，决不能普及各种科学智识方面，而只能专限于有益于该党之科学。其他各派各种科学，固然很好，然而暂时并非直接有关于其运动的。相当的教育只能限于授几种直接有益于奋斗之科目，例如劳动革命运动之历史，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学之要纲，及共产国际之原则及策略，必须教导党员。若在民众尚受宗教影响很深的地方，更当进一步，教导他们了解自然科学及宗教之来源。若在无产阶级群众多不识字的地方，应当注意初等教育，至少令党员必须受初等教育，这样方能使他们做宣传者、鼓吹者，及报告者，设使不授初等教育，他们就不能进行政治与革命的职务了。

试从这一层看来，可见共产党教育问题，首在于为党中增进鼓吹力与组织力的方法。

共产党一方面施行这样的普通教育于大众党员中，若欲完全其职务，对于职员之特别教育，亦当同时进行，因共产党在职工联合会、各种协作社、各种租户联合会，以及妇女与青年中都有事务执行，再则在国会及地方自治会等中亦有要做的事情，所以共产党之职员必须具有各种特别知识以备执行各种事务。担任这类职务，没有特别训练是不行的。因为一个人单有普通知识，不够办专门事业。共产党里若是没有勤恳的有系统有组织的教育事业，往往有危险发现，党员因无智识而不得不依赖其领袖，更因缺少必需的“民主主义的不肯轻信的精神”而不能监督和批评其领袖，和改良派一样。如此势必至于为虎头蛇尾的领袖所牺牲。但党员之普通教育及职员之特别教育，两种犹不足以尽共产派的教育。共产派教育一定应当发展到党外群众之间及与共产党表同情之人，尤当普及于改良派之工人，以至于漠视政治的普通民众之间。共产党不应当只有普通的宣传鼓动，必须有马克思学说之根底，而同时必令群众明白了解，应用极浅显的说理方法。有一大哲学家曾经说过，天下最精之艺术，莫若用极简单之语言以述极深奥之事。大多数共产党之鼓吹者都要表同情于这句格言。这本来是极难的事：要用十分简单的普通语言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及其政治情势的研究，又要留心党外的漠视政治的群众之偏见及成见。

应当从极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利益上说到深切的伟大的目的，也确是一件最最困难

的事情。所以共产党必须时常开创宣传与鼓吹之新法，以感动民众而引起他们的兴味，吾们应当知道，资产阶级素来用图画、幻灯，及教堂中各种游艺以蛊惑民众，所以最好也要利用电影、幻灯、艺术宴会及戏剧表演等于共产党中为政治宣传等之工具，共产党对于这一类运动还向来没有注意。但现在我们应当循序而实行之，吾们又必须与党外赞成共产主义的平民教育机关贯通，这乐（？）的平民教育机关差不多各国都有的，例如德国有“无产阶级自由思想者”之组织（Proleta-rian Frcethinkers），在别个国里边这种运动有叫做“无产文化”（Prole-tcult）的，英国则称之为“平民联盟”（Plebs Leagues）。这类组织内的共产主义者大半已有活动，然而他们的活动不受共产党指导的。要知道，一两个人在这种平民教育机关里单独的活动，与受共产党之指导而为协作的活动，这两方面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有几个国中设立许多补习学校，有市立的有国立的，如“平民大学”之类。有时这种学校亦能助共产党革命事业之进行，这里面念书的学生，多数是工人。倘共产党不伸展势力到这些工人渴求学问的地方去，那就放弃他的重要职任了，所以共产党应当竭力在这种学校里操得指挥权，而后可以鉴定他们的功课。共产党应当保有势力于这种教育机关内，或有时可假手于地方自治公会等。那么可以引起里边的工界学生反对资产阶级的教授与讲师。这种学校里的教授法当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这样可使优秀分子参与讨论而引起其对于资产阶级的学术持对抗派（Opposition）的态度。

当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其教育问题自然又可以有另一形式，而范围亦要扩大了，到那个时候，共产教育问题，已非专为教育一辈党员、职员、组织者和宣传者等等。那时，已不能以党内交换政治智识自足。无产阶级独裁制既已得胜之国，共产党之职任已决不止此。必须在各工厂、各种文化机关、各学校、各大学之中都有共产主义的精神，全国文化生活都受共产主义之指导。

共产派教育与资产阶级及改良的教育，于教授法方面，亦有不同。现在资产阶级所办的“平民大学”中之普通教授法，仍旧不过使学生领受现成的学问罢了，学生仅用强记的方法迎受讲义，绝对是消极的。这样的教授法完全不合于共产教育，因为我们的主义，第一要与学生以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学生能自动地分析实际的历史情景及经济政治状况。这个方法，预备学生能够对改良派及资产阶级政治家辩论，又能够在工厂中工会中自己解决一切问题，拟议一切提案，提倡一切行动。

共产教育中，应当弃除无味的讲演式，而代以师生间集合的思想，就是利用自由讨论方法以交换意见，不是授不消化的学问于学生，令消极的迎受，一变而为积极的自动。

执行共产教育应当常以经验校正之，这种经验，是共产党在平日之奋斗与宣传中所得来的，所以共产教育应当与平日党中之宣传和奋斗有密切之关系，虽共产党之教

育动作与政治动作无并行之情形，但是前者常附属于后者的，因此组织方面须注意一点，共产党执行教育事务之负责职员，不应当是一辈不著名的文人与艺术家等等，以致讲不关革命之文化。但是必须是党中最优等的政务上的指导者与奋斗者，这样是使全部教育事务附属于党中之政治奋斗里边。至于教育政策必须与政治经验相关连之理，在某几种情形中就可显明出，当共产党在紧急的时候，必须召每个党员出来合全力以奋斗，在奋斗之中，重要的运动在于街道与工厂之间，此等时期理论上的事务，当然暂退至第二等重要地位。当平静时，再从事于理论方面，以分析过去之经验而从胜负之中推出新教训出来，变这些新教训为一种新知识和新势力之根源，以备将来奋斗之用。

总括起来，今日共产党对于教育事业所当行的事情至少如下列几项：中央设立教育机关以教导全体党员，及特别训练职员，与一切鼓动宣传以马克思主义的及科学的解释，而附以真正通俗的宣传法和幻灯、音乐、戏剧等机械方法。

即使最弱的共产党，必能做这些事项，以训练一辈办理党务的人出来。这辈人能用马克思主义以训练其余党员，其实教导一切党员、候补党员，及与共产主义表同情之人。亦不必一定有十分深奥的科学教授法，凡一富有经验的同志能够对于缺少政治智识的新党员授以一切必须有的学问。在某几种情形内，甚至必须教这辈新党员，怎么样去读共产党报纸，及报里面对于工人之宣传文字怎样的去实际应用。

共产党不可让少数党员任意单独行动发刊教科书等，这件发刊的事情，必须也是中央主持而用共产党全党之联合力以执行的。

共产党中掌理教育事务之文书股，须与党中之出版发行股联络，这样可以促进发刊对于教育事业特别重要之书籍，图书馆亦不可少的，因为工人日益贫乏，不能各自备重要之书，或竟无钱买最重要的马克思学说出版品，所以共产党的地方机关，应当设法补救这辈没有书看的工人，必当行的方法就是拿共产党的著作品放在工会的图书馆及公共的图书馆中，这样既可节省经费而仍能宣传重要的政治智识于党员及工人之中。共产党之中央出版部也应当找革命的美术家与著作家帮助宣传共产主义，要知道这类美术家与著作家各自单独行动，虽有宣传而无综合的计划，其结果没有像群力会于一处而合作的好。

共产党之教育事业也应当包括少年工人及儿童之教育事业在其中，如共产主义的少年团体独自施行教育，共产党非但应当供给他们经费，又应当供给教师及书籍等，每个共产党青年当有许入一切共产党教育机关的权利，共产党又应当注意平民儿童之革命教育，这种教育已由各地共产党童子会的组织着手进行。

此次教育问题委员会呈建议于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特设一部，组织，

指导及监督各党之共产教育事业，以使共产教育机关成为国际的组织。并在莫斯科设立一社会主义学院，因该地为执行委员会所在之区，各国共产党聚集之处，最易研究国际的总运动，许多详细的情形容后再说。但我们决定各国必须遣多少具有初步学识的同志，到这里来受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因为西方各共产党，除俄罗斯共产党以外，所以受困的原因，是由多数党员缺少切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识之缘故，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校，就能满足这种需要了。

固然，以上所说的计划，依集中制度为原则而组织，作极有系统的文化运动，在各国应用起来，必各有不同，不能一致。因为有的党已能公开，有的却还在秘密状态之中；再则，大的党经济比较宽裕，小的党思想还没有稳定。所以此一有系统的文化运动，学理的研究，假使能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员总指导之责，必定能大增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战斗力。

（二）克鲁朴斯嘉女士之演说

同志们，我要在项莱同志所说之外再加几句，我们俄罗斯共产党，于鼓吹与宣传方面素有很多经验，吾党中之特色，就是每个党员必须活动，这是由于党中之情形使然。盖共产党从来算为一种不法组织，入党的人就要冒大危险，第一件危险事就是要被捕，党中无利益给党员而能使党员尽大责任，所以只有积极的分子方来入党。然于理论上，此一问题早已十分明白。二十年前列宁同志所著的《怎么办》（What must be Done）一书中慎重说，每个党员必须担任党中职务。一九〇三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讨论党员资格问题，遂肇布尔塞维克（Bolsheviks）与孟塞维克（Mensheviks）两派分裂之源。列宁之提议，以为每个党员非但必须赞成党中的党纲，而且必须在党中某一机关服务。反之，马尔托夫（Martov）之提议，以为每个党员仅当承认党中之党纲，待受其指导而服务。两派意见之分歧，初看似乎很小。当时有许多党员确以为这个争论中包含意义甚微，而并无利害的背景，但从共产党以后之历史证明出来，这一争论却有极重要之意义。吾党之得有影响于群众，而能占优胜地位，显然是党员都活动的缘故，盖每个党员必须尽力党务，那么，党中之全部组织及鼓吹与宣传方面都受利益了。仅因与会所至而研究理论研究各种问题，是一件事，若因实际运动的需要而研究理论，求各种问题的深切的解决方法，却又是一件事。每一党员必任“鼓吹”的责任，或作宣传事业或从事于组织方面。我要先在“鼓吹”（Agitation）方面说一点。共产党于鼓吹方法组织切当，所以能影响群众。鼓吹一法就是提起人的感情。曾因用这个方法，而有许多人来入共产党，鼓吹问题之开创在经济运动发现之时。第一期所鼓吹的，就是须奋斗以改善工人物质方面的生活状况，那时候在一千八百九十余年间，由是我们同志中有许多人对于这方面之奋斗过于注意，其结果遂发现一派，所谓“工人思想派”

(Rabotchesngsientse! 俄文)。这派人过于看重群众无秩序的自生自灭的劳工运动。他们因鼓吹既能大得胜利，于是相信奋斗之进行，无需于理论之宣传，只赖工人之运动罢了。这一派人，甚至于说，工人自能达到社会主义，无需乎马克思与昂格士等。由是共产党对于这种趋势竭力奋斗，故此后又有一问题发生，就是“怎么样使我们的吹鼓力深入”。这个讨论发生于二十年前。我们同志中有一部分人主张以为我们不必增加鼓吹的力量，只要限于群众日常易晓的问题，当时群众只知道经济问题，于是这一部分党员主张，以为我们应当限于鼓吹这一方面的问题而不可出此范围，不要提高当时工人的程度。

这一派人就是所谓“经济派”“劳工事业派”——当时此派之俄文报纸名劳工事业 (Rabotchee Delo)。他们主张，不必加深鼓吹之程度，只须跟着工人阶级在后面追。当时之“火星派”(列宁等一派，“火星”亦报名，俄文为 Iskrse) 即极力反对，实因其有害于工人运动之进步。确是不错，假使全党都以“经济派”的观点为观点，决不能领导群众。

马克思主义助我们共产党正确审定“鼓吹”之价值。这件事我们那时怎么样做的呢？就是吾们时常分划吾们鼓吹之集中点。在十九世纪之末，经济的要求是吾们鼓吹之集中点，在一九〇五年，集中点就是工人政治上之要求，而后来到大战时候，战争就为集中点了，但是集中点不过是许多问题中汇集的一点。鼓吹员联合组织成“职员会”而讨论各问题之分配。在大战时候我们共产党之能成大事，因为从前吾们十分注意于一种鼓吹问题的缘故，至若讨论鼓吹之形式，我将先论口头的鼓吹，这种鼓吹之得胜，不十分凭借演说者之口才及其演说术之程度，而大分赖于鼓吹问题对于群众之兴味何如。

这层关系在各种情形中证明出来都是正确的，例如在战争的时候，一个不善于谈话的兵丁而能使群众受感动，这是因为他言语之间发表群众的感觉的缘故，这一种鼓吹应当特别注重。他若地方关系的鼓吹问题，现在我且不讨论，但是我要指出在战争时所常用的一种鼓吹，这就是用艺术方法的鼓吹，要知道工人之思想，偏于具体的形象较多，而抽象的推理很少。所以用画片、音乐与戏剧等艺术以鼓吹，能发生大印象于群众工人之脑中，若欲引起群众工人直接行动之时，则用艺术鼓吹，尤其有重要价值，关于这一方面俄国的经验实足以证明，此种形式之鼓吹确有极重大的意义。

我们共产党里边相传下来的方法，非但鼓吹一种“宣传”(Propoganda) 在吾党中也是重要职务。当我们的鼓吹起初感动群众之先，我们已行宣传于秘密的结社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往将来党中念马克思与昂格士的著作，讨论日常生活中之问题。所讲的是文化史及经济学等。这种习惯入人很深，不但成年工人，而且少年工人都受

影响。我曾亲见一偏僻的村庄中，幼年工人要求他们的女教员，教以从前他们在“工社”中所研究的科目经济学与文化史，诚然不错，这种“工社”中的研究，为时往往很短，每因逮捕，而工人乃不得不于流戍监狱之中，“终其所业”。

我们俄国的习惯，几至于监狱或流戍之地，自成其为一种学校。在这些“学校”中许多工人后来，成了得力的职员，因为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那“劳工事业派”都不明白宣传之重要。列宁同志同他们争论，指出昂格士的农民战争（The Peasants, War）之绪言中所说：工人阶级之经济运动，及政治斗争而外，还有学理的训育，也有同样的重要。共产党对于鼓吹及宣传问题，从来不与其根本事业分开，盖鼓吹与宣传是共产党中之重要职务。

现在俄国共产党已成公开的组织，工人已经取得政权，而工会中之教育事业仍旧保存此好习惯。凡是从事于政治教育的职员，无论在什么地方，不论是成年人的补习学校，不论是图书馆，不论是职工联合会，人人都就其能力范围之内，尽其宣传之责任，现在正进行不懈呢。因为这种种缘故，我们造成这样的一种大势力，使马克思主义教育普遍全国，而少年人现在很勤恳研究这种学问，吾们欢迎这种倾向于理论研究的趋势。这一点在上次我国共产少年大会时尤其明显（一九二三年秋）。

综括地说来，我们的现在却正在大变迁之交。当革命之初年，我们的注意大致完全在战场上及一般民众之间。现在我们进而经营经济建设事业，就更当做深入一层的工夫。现在大家对于马克思之理论及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分有兴味。我任职于“政治教育委员会”，每天我们得有许多接触，足以证实，如今群家实在渴求智识之增高。这个情形完全是当然之理。盖一九〇五年之革命，鼓动群众，怒潮遍于全国。此后，反动随之，在这几年反动时期间，智识阶级灰心失志。他们以为革命的一切胜利已经完全丧失，无可挽回。然而群众却永没有忘记革命。一九一二年林纳（Lena）之役，（金矿工人罢工被残杀），立刻便激起群众，足证这几年间工人阶级有多大的进步。无形之中，这几年已经成就工人运动内部的事业不少。当时群众对于革命感想，那几年来确已细细地经过一番“回味”，一番讨论。一九一二年的劳工群众，就已经比一九〇五年大不相同了。现在亦是这种过程。群众专意于修养，专意于建设物质的基础，来巩固革命之胜利，然而建设物质上的经济事业，却需要人才，需要更高的文化程度，要劳动之一切旧习惯的革新，要社会心理的变更。

现时我们正又经历一个时期，在此过程中，当有深沉的伏流的无形之中的伟大事业成就呢。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劳工青年，现在正发愤向学。一方面他们研究“生产”之定义，亦就是一方面自己发展能力，这正教我们能抱无穷的希望，将来世界革命一日暴发之时，我们一定满有准备的了。

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

瞿秋白

此篇为瞿秋白所著俄罗斯革命论中之一篇，原题为“世界革命之先驱”。那部“俄罗斯革命论”，本是秋白集所作关于“十月革命”的各方面之论文而成。他的体裁，是社会科学的论文，琼屑的史实不载。所以本篇也是如此，所述至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止（一九二一年）。

（一）第三国际

社会革命，决不能不是国际的，当乌托邦社会主义之时期过后，科学社会主义方兴，劳工运动即成政治上的力量，那时就已经有社会党国际主义的组织。一八四〇年国际无产阶级初次得此联立组织之觉悟，马克思就创立共产主义联合会。一八四七年马克思昂格士受此联合会之委托，遂起草共产党宣言书，于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呼声，乃出现于神圣同盟统治之下的欧洲。然而因为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革命之失败，反动潮流汹涌，共产主义联合会竟没能正式成立。直至一八六〇年，英德法工人运动的元气才恢复过来，更觉与资本主义奋斗，非联合不可。于是一八六四年国际劳工协会（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遂成立于伦敦，是为第一国际^①。劳工社会党之党纲策略，能根据于科学的社会主义自此始。每年大会之上举出所谓总会（Gerendale Conseil）以任执行。马克思为其领袖。后来因各国经济现象之不同，国际之内自起分裂现象：巴枯宁派之无政府主义者，法意等罗马民族的代表最多，都反对国际内部之集权者的组织。等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革命失败，于是第一国际亦随之瓦解。然此“国际组织”之宗旨已经借此深种于劳工运动之中，“取得政权”之党纲，更成社会党之标帜。

^① 第一国际——Internationl 为后起之名称；大概如今凡简称“国际”即有社会党的国际组织之义。

第一国际正式宣告解散于一八七三年。嗣后十四年中，国际组织虽中断，而各国劳工运动益党政党组织之必要，先后继起，组织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s）。一八八九年，国际劳工“五一运动”之创始，遂于巴黎复联合各国社会民主党而成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组织，基本上已略失第一国际之遗意：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行动，国际绝不过问。三年开会一次，所讨论者只有大政政纲，议决案可以不必完全遵守，因此仅成一互通消息的机关，而不能负世界革命先驱之责。虽然在第二国际最初几年，社会主义的精神尚未全失，而且国际间联络之关键，因有此“机体”，始终日济完美，总算是第二国际的功绩。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欧战之始，第二国际助战的态度突然明白表示，即此自己宣告死刑。各国社会民主党，受资产阶级的传染，却中了莎凡主义的杨梅毒。法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公然在战场上枪击德国无产阶级，还有何“国际”可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世界的工人阶级才渐渐从“地底下”听见殷殷的雷声，大梦沉沉，至此方警醒。从此乃能日渐暴露第二国际的妥协政策及其出卖阶级之罪状。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俄国的布尔塞维克，自当急起直追，立革命怒潮中之灯塔，第三国际^①遂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

共产国际与俄罗斯革命之意义相切相关。请一论其成立之经过，及其在世界革命中之价值。共产国际之发展可分为四时期：第一期约自第二国际之臻美华德会议^②，至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第二期自一九一七年末经一九一八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书，以至于一九一九年初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前；第三期，自第一大会至第二次大会；第四期，第二次大会至第三次大会。

自臻美华德至俄罗斯革命之一期，可以称之谓共产国际胚胎期。当时最重要的职任，仅在于树立思想上之新流派。全欧正溺于帝国主义战争之沉梦中（臻美华德会议召集于一九一五年九月间），虽有孤雁的哭声，只埋没于枪林硫雾里，很不容易“闻于九泉”。所以组织上问题，仅仅略为提及而已。

一九一四年十月末，俄国布尔塞维克党，已在中央机关提出“第三国际”的口号，然而独力周旋，殊无回响。当时列宁论“社会国际之地位及职任”，就说“第二国际已经死灭，纯为机会主义所吞蚀。推翻机会主义！预祝第三国际万岁！第三国际应当力除机会主义之耻辱。……第二国际总算尽了他一份天责——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步最速，奴隶制度残忍最极的“武装和平”时代，聊且为无产阶级群众组

① 第三国际又称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简称为 Comintern。

② 臻美华德（Zimmerwald），瑞士城名。

织之筹备而已。第三国际之职任，则当在组织无产阶级之伟力，以侵袭资本主义政府，以实行国内战争，反对各国资产阶级，而求取得政权，进于社会主义的胜利。

同年十一月只诺维叶夫（Zinovieff）之论文反对流行病中，亦谓“现今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除“变帝国战争为国内战争”外无话可说。我们应当树立国内战争的旗帜。

“真能名称其实的国际，唯以此标帜方能复活，否则落胎即死。我们的职任，即在于筹备战斗力，自就训练，亦即以训练工人群众，于此国内战争之标帜下，不胜则败，不生则死。”（见中央机关报）

单从当时第三国际建议者之政策看来，在臻美华德会议一年之前，已见俄国多数派反抗欧战之热烈。当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时，欧洲各国社会党醉心于机会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绝不存在，自当有一新国际起而代之。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论点，赞成的当然非常之少。一九一五年召集臻美华德会议，“左派”即提出一草案：“国会中之社会党议员，应对战费案投反对票。资产阶级政府中之社会党阁员，应即辞职，当在议会中竭力攻击帝国主义的战争。当在机关报上暴露此次战争之反乎社会主义，有公开的社会党机关报最好，如其没有，亦可以于秘密的机关报上宣传。城市中当举行示威运动，反对政府。战场中当宣传无产阶级的团结。当辅助经济的罢工，如有良好机会，立即变之为政治的罢工。非阶级间的和平，乃国内的战争。”臻美华德会议竟否决此一议案。当时到会的，已经都是第二国际中之“国际主义派”，然而正式的议决案中仍言：“无论如何，臻美华德会议绝非为引起分裂，重建新国际而设。”诚然不错，当时的时势还很混淆，要彻底扫清官僚的社会民主党，自非易事。列席各派社会党仍旧非常之“客气”，谁也不敢说人一句坏话。至于第二国际之“非国际主义派”——社会爱国派，更不必说，既不肯到臻美华德，还在伦敦自开会议，他们所决议的议案，正中当时英法资本家的心怀。此种局面实际上不分裂而自分裂，无产阶级革命之重任，固非客气所能了事。

“臻美华德左派”从此渐渐巩固团结，至一九一六年在经塔尔城（Kintal）开会议时左派势力已甚大。俄国二月革命之后，革命党之亡命于外的，都遄程归国。俄国之多数与法德瑞士瑞典等国劳工运动中之左派，曾开临别会议，实际上却成第三国际之筹备会。一九一七年春，第三国际之呼声，独在俄国渐得同情。第三国际在胚胎中已与俄罗斯革命有密切关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第三国际诞生，此革命之地位愈稳固，世界各国第三国际派之影响亦愈广。

十月革命既成，已入第二期，当着手组织，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遂致通函于

德“斯巴达克派”^①及奥国共产派，时在一九一八年之末，此通函之动因，乃由于英国劳动党有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召集国际会议之说。俄国一面拒绝到会，一面通函德奥。当在一九一七年时，第二国际之斯托克霍摩会议（Stokholm），俄国多数派已经严拒。此等会议，充满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空气，有什么意思，所以布尔塞维克大声疾呼，努力反对。然而一九一八年时，此第三国际派尚寥若晨星——俄国、芬兰、埃史笃尼亚、理德瓦、白俄、乌克兰、波兰、荷兰，诸国之共产党，此外还有瑞典、瑞士、意大利一部分的社会党，英国之马克林（Wac Laine）、法国之禄利沃（Loriot）、美国之德白斯（Debs）诸人，及德奥共产派，一如是而已。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俄国共产党就正式建议，请各国共产主义者召集第一次的共产国际大会。此一延请书后，签名的发起人，不过如上述各派，添上一美国劳工社会党及一匈加利共产党，此外更加入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人数虽少，然从此之后，“赞成第三国际”之呼声，一日响一日。德奥皇室颠覆，柏林斯巴达克派第一次向资产阶级宣战，欧洲各国革命潮流汹涌，怒涛高掬，看来必将冲倒旧社会民主党的朽屋，然可惜“思想”之入群众未深，组织的能量未足，竟不料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反革命的动力。德国一资产阶级的学者菲斯德尔（Richard Fester）所著《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之国际》，曾谓：“德国社会民主派固然未能阻止德意志革命，然却能挫钝此革命之锋芒，并组成反对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力量”，他著书正在柏林斯巴达克派失败之后。足见奋社会民主党之“劳动”。一九一九年三月，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于圣彼得，到会代表人数并不多，而且第一次大会适成其为宣古（？）的盛举。俄国通函中所表明之十二“提纲”（Theses），完全通过，而“宗旨与策略”乃定。

第一次大会至第二次大会之间，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突然发展，非常之迅速。全世界劳工运动怒潮澎湃，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之第一巨波，共产国际大得工人群众同情，赤浪横空亦卷入各国旧社会党。因此“中央派”的首领也有许多渗入共产国际。一九二〇年之春夏，社会党之中央派里，不少受群众之骚动为环境所迫的首领，想到“中央派与左派联络”的意思。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遂发现中央派的代表，如美国社会党之类。共产国际之中不免发生“中央主义”的传染病，却是一种危险。中央派蜂拥蚁聚，几视共产国际为时髦。当时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受各国封锁，外间以讹传讹，不知真相。中央派的代表，暗中“祝祷”上第三国际变成第二国际式的组织。譬如意大利中央派的首领莫狄黎雅尼（modigliani），他宣言

^① 斯巴达（罗马文 Spartacus）为罗马奴隶革命之首领，时在基督纪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派之最左派，从此自名，今已成德意志统一共产党。

愿加入共产国际时，却说：“为什么不进第三国际呢！这又没有什么重大的责任。每三个月寄一明信片到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去，又不是什么难事”。共产国际既见此种危险，为自保起见，不得不有相当的办法。于是共决“加入第三国际之二十一条件”。向右的危险既除，向左又生枝节。第二次大会时，德国已有二共产党，（一）德意志统一共产党；（二）德意志共产党。所谓“工党”乃有无政府的倾向。共产国际当即努力矫正此等伪“左”派的逆流。然仍竭诚吸引到真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如美国之“世界工业工人会”（I. W. W.）等。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即第二次大会与第三次大会之间，欧洲劳工运动渐趋静息。资产阶级政权乃渐得稳定，似有出险之象，社会民主党亦借此而得重整羽毛。一九二〇年二月时，第二国际在倍恩（Bern）开欧战后第一次会议，总算是死灵复活。同年七月第二国际派见职工运动之潮势与之迕逆，急欲贯彻其妥协政策，蒙蔽工人阶级，乃联合世界职工联合会而成所谓“国际职工联盟”于亚摩斯德丹（Amsterdam），是为亚摩斯德丹的职工国际。到一九二〇年时革命怒潮竟未能涌入帝国主义的港口，况且一切改良派中央派又从而为之壅塞涯岸呢！至第三次大会，而共产国际内部组织完备，已无内生蠹蚀之虞，更以向“群众间去”为口号即此组织职工运动。同时各国的幼稚的共产党亦能积极整备组织。第三、四期共产国际之发展方向乃在于此。至今已成一世界政治生活中之伟大动力，人类历史的新世纪中，共产国际必当处一相当的位置呵。

据第三次大会后的统计，世界各国几无一国无共产党的势力。集于共产国际旗帜之下者，共有五十一共产党，加以少年共产国际，全球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者约二百八十余万人。

（二）赤色职工国际

欧战破坏世界经济，巴黎的分赃和会又从而火上加油，播种不少恶种子。人类文化的希望只在世界劳动阶级。可惜劳工运动中受了爱国主义的毒，内部受伤，无暇旁顾，于是陷全球于新战争的危险。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略示征兆，此中的缘由，还不尽在职工运动旧政策之谬误，战前社会主义政党与职工联合会的关系不得其当，大军与参谋部自相隔膜，如何能作战呢？所以职工联合之国际组织，于欧战之后，应对付华盛顿派之“劳资协议”，乃有一日不可缓之势；而社会党之于工会，更有重新审定相当关系之必要。

欧战没有促起世界革命，侥幸在于工人组织之弱，社会党战斗力之不足而已。然而欧战始终促起无产阶级的觉悟，为世界革命作进一步的训练。我们只看，战前世界

职工联合会会员总数不过九百万人，至一九二〇年中已达二千万人。虽然，数量固然增多，而革命性的联合，较之共产党未免迟缓。第二国际虽宣告破产，仍旧想把持职工运动，而创所谓亚摩斯德丹国际。此等联合组织不但无益于劳工革命运动，反一变而为反动潮流，“宣传阶级间的协作”。自然非有革命的国际工人组织与之对待不可。

职工运动之国际联合，早已有动机。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职工联合会就有此提议，时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一九一八年全俄职工第一次大会，曾有一议决案通告世界，而爱国派的社会党终不愿与“洪水猛兽”的布尔塞维克派接洽，所以没有能开得成会。等到华盛顿的“劳资协议会”时（一九一九年十月），俄国全国工会中央总会又诚恳忠告世界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独裁制或无产阶级独裁制；万国联盟或第三国际，‘黄金的中心’是没有的，亦不能有。”此一通告书已经大有回响，然而没有剧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尝着阶级妥协的况味（？），始终还不肯直截痛快，拨转马头向革命的道路上走。一九二〇年中英国几次空前的大罢工，工人运动吃着妥协派的苦头，于是英国工会之爱尔兰会议及伦敦初发现的工厂委员会，方才主张加入第三国际。法国劳工同盟的左派，在里昂大会时得三分之一的票数，西班牙工团派之革命的劳工同盟得五分之四愿加入第三国际，而意大利一部分的工会，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先后有此同等之表示。

于是，一九二〇年七月，革命的职工联合会各国代表聚首于莫斯科，讨论的结果，俄国、意大利、法国、布加利亚、西班牙、南斯拉夫、乔治亚为发起人，定一议决案：“（一）革命的先进分子不应当退出现有的职工会，而应当积极参与，扫除其中的机会主义派。（二）于职工联合会范围之中作有系统的共产主义宣传。每一工人组织之中，建立共产主义的支部。（三）组织国际的奋斗委员会，以改造职工运动。此委员会作为国际职工联合之临时总会，派一代表加入第三国际之执行委员会，以便共同协作……”

亚摩斯德丹国际闻之，大发雷霆，竭力排斥革命分子。然而世界经济现象，工人的革命阶级，双方都相应而起，社会革命的国际怒潮，已非“职工官僚”所能压迫。自一九二〇年七月起，加入此国际职工临时总会的工人，一天多似一天：

- 一、全俄职工总会。
- 二、德意志劳工同盟。
- 三、布加利亚职工中央总会。
- 四、南斯拉夫职工中央总会。
- 五、希腊职工中央总会。
- 六、西班牙劳工同盟。
- 七、阿根廷劳工同盟。

八、路美尼亚职工联合总会。

九、那威职工中央总会。

十、芬兰职工联合会。

十一、“世界工业工人会”（I. W. W. 美国，英国，澳洲）。

十二、赫勒晴克尔亨（Helzenkirhen）之“总工会”。

十三、德国之“总工会”。

十四、墨西哥之“总工会”。

十五、各国工团。

十六、各国职工联合会之一部分（法国、英国、德国、捷克斯拉夫、美国等黄色职工联合会内部的各种组织，倾向于第三国际者，亦派代表联络）。

当时的总计，组织于此革命的职工运动之中者，已经有一千六百三十九万三千工人。虽然，此种联合在当初并无何等责任。联络的关系，可以说仅仅是思想上的。于是遂有组织上的筹备，以巩固此等革命战线。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集革命派的职工联合会之世界大会于莫斯科，是为赤色职工国际之第一次成立大会。到会总计有四十一国。

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大会非常之复杂，其中各种分子凡稍倾向于革命者，无不加入，工团主义派尤其多。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赤色职工国际对共产国际之关系及职工运动之策略。虽因倾向相异，辩论非常繁复剧烈，而最终的决定，始终以大多数通过一致的方针，可以约略叙述如下。

人类历史之中，工人运动的浮动，群众运动的操纵，至欧战之后而大盛，为向来所未见。工人之于职工联合会，所以发生此种特异发展的现象，其原因固非常明了。工人已受欧战的打击，生活逸出常轨，失业者异常增多，社会冲突日趋激烈，自然觉着能力薄弱，而有组织的必要。可是，一般“老内行的社会党”，旧式的职工首领，惑于威尔逊的劳资协调政策，令工人阶级不但不能利用其群众组织，循序而进，以达执政的地位，而且反连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利益都不能保。所以革命的职工联合会应当第一步先有正确的策略：（一）“直接行动”，就是每次发生社会冲突时工人阶级积极的反抗资产阶级。（二）改造职工联合会，去其“行会”性质的半生产式，而立生产式的联合会方法，即以企业为单位，凡一工厂中的工人，都组织于一工会之中，从此再联合一种生产之各工厂。废除旧时以职业单位的组织法，或以地方主义为单位的“行会”等。如此不至于发生工人内部互相冲突，绝不接洽的弊病。（三）工人之各种革命组织完全一致行动，职工联合会与共产党之间协定密切的关系。（四）发争取旧式职工联合会，而并不当破坏它。凡此都是赤色职工国际之策略上的重要原则。

至于赤色职工国际对待共产国际之态度及关系，策略之中既有规定，则“当有关

系与否”自己不成问题，所当决定者，乃在此关系之形式。当时大会的决定，承认：当竭尽全力以巩固此革命工会之国际奋斗组织，统一于其中央指导机关之下——赤色职工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又当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先锋——第三国际，结极密切的关系。双方互派代表于执行机关之中，常开联席协议。当令此关系限于实践行动的范围，于国际间或一国内的实行或筹备一切革命运动时，双方协同工作。大会之上，并明言，凡革命的职工组织，当有真正密切的统一行动，实行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之议决案时，各国之赤色职工联合会与共产党应当互相协助，各方接洽。

其次，赤色职工联合会之组织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于经济的组织之中，欲进而攻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有内部组织巩固团结的伟力。所以凡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会，都应当承认入会条件：

一、承认革命的阶级斗争之原则。

二、日常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统治斗争之时，实践此等原则。

三、承认以社会革命颠覆资本主义，而于过渡时期中，有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必要。

四、承认国际的“无产阶级纪律”而服从之。

五、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之议决案，而实行之。

六、与亚摩斯德丹之黄色的职工国际决裂。

七、于反对资产阶级而行自冲的运动时，各职工组织及共产党一致行动。

赤色职工国际，如上所述，发源于一九一九年的莫斯科“国际职工临时总会”，虽此“总会”正式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七月，而实际与亚摩斯德丹的职工国际同时共生。世界的各国职工联合会中都发生了新鲜问题“亚摩斯德丹还是莫斯科”。此中自不少游移不定的分子。一九二一年开大会时，又有共产党及工团派的争执，法国工团及美国的“世界工业工人会”中有一部分表示脱离的态度。然而亦有不少后来重新加入，或有原属于亚摩斯德丹的转入赤色职工国际，所以至今所谓属于“莫斯科”者，实有一千七百万人以上，居全世界无产阶级三分之一而有余。

世界职工运动史中，已新辟一章，暂时虽只见“叙言”，已经可逆料“本文”之中，当有人类文化史上最光荣的一页——社会革命。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战的势力，全欧劳工阶级处于革命潮颠，利于进取，而各国社会党的改良派游移踌躇坐失时机。政潮汹涌之中，有伦敦派的双手供奉政权于资产阶级，有维也纳派的徘徊彷徨于“民治”与“独裁”间的犹豫态度——潮流震荡，不向“左”就向“右”，本无中立的可能，于是西欧政象，一天一天优势侧重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机运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已经低落不少，此中世界经济现象也

大有关系。时至今日，无产阶级已无进取之可能。世界经济已出战时状态，而入平时的经济恐慌状态，所以世界资本，到处取进攻之势，同盟休业，工作时间之延长，工资之减少，改良派所盛称的华盛顿八小时工作时间“光荣”议决案，大概又忘记了！维也纳之第二半国际^①碍于革命的招牌，又以为第三国际向来不肯“妥协”，故意提议第三国际协商抵御资本的进取会议。第三国际立即应允。于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在柏林开第三国际协议会，结果决定“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各党及职工联合会，遇有与资本家起冲突，共同出发，至少当力争最小限制的经济利益。谁知第二国际派处之暗中破坏，无产阶级已经从进攻的阵势退到防御的地位，而改良派要极力捣乱，以至于五月一日的世界示威运动都不一致，可叹之至。

虽然，共产国际于柏林协议上既得精神上的胜利，世界的无产阶级确已明见：第三国际并非“死倔强”的不妥协派，确能代表工人实际利益，所以与其他国际相异者，乃是始终不变行向劳工执政的宗旨。因此第三国际最近的策略（一九二二年）已不注意于第二国际之破坏柏林协议与否，仍努力积极进行，各国共产党与国内其他各社会党之“工人群众”携手共筑“劳工统一战线”，反抗资本阶级，而绝不理会改良派的“首领”。所谓“今已不用自上至下，而当上自至下”。工人群众必能见三派五国际之中，何者是真正的社会党，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真正为人类文化的社会运动。

世界人类的文化至欧洲大战而大破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症暴露，以后的发展若不改一趋向，非走到绝地不止。“世界的人”负文明之新使命者当知道：欲救人类文化求光荣的将来，非颠覆资本主义不可，非克服帝制派主义不可，非建立“劳动者之苏维埃联邦自治世界”不可，非行世界的民主主义集权制不可，非以有规划的经济代无政府的竞争不可，总而言之，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欧战以来，巴黎之和平会议、华盛顿之“劳资协议”、一九二一年之远东会议，最近之柔鲁会议、海牙会议，世界的资本主义者已经千遍万次宣告社会问题之不能解决，改良主义的破产已经不待赘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家，何苦绞尽脑浆尽想做乌托邦的黄粱梦呢！

Une guerre plus legitime-

Cest laguerre a qui nous opprime.

In seule que nous ne fosson pas.

——（那更合法的战争却是反抗我们压迫者战争。独有此一战争，我们却不执行。）”

^① 第二半国际（ $2\frac{1}{2}$ International）因第二国际Ⅱ（Internationat）之承认欧战及其与大资产阶之妥协而分出。然不加入第三国际，因不赞成革命的斗争方法及无产阶级独裁制。

法国社会党的军歌往年曾发此哀怨之声。现时却不然了，世界的无产阶级现正在继续进行猛烈的阶级斗争，攻守胜败的形势，虽然有一时的转变，而最终目的永永不移。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世界政潮的流域已经转入东欧，我们于上述各篇，可见俄罗斯革命在世界社会运动之中，占何等的势力，有何等的影响。俄国新式的“斯拉夫派”说：“政潮的激荡令俄国已成又（？）苏维埃的国家，莫斯科已成国际的京师，俄罗斯农民已成世界文化运命之负担者”……“历史的运命如此，俄国民族的事业，已经不能进行于那第三罗马^①，而在新兴的第二国际。”何况十月革命诚然应验“革命之第三力”的预言呢。^② 哼，谁知文明的俄国学者，也信此汉学派的符讖，“第三”的奇数。这却不然！不是第三国际为你俄国民族的事业，而是俄国为第三国际，第三国际为世界革命事业。

少年共产国际附

共产国际，成年工人之世界的政治组织之外，还有少年共产国际。各国社会主义的少年组织于欧洲大战争时，已经有一部分坚持绝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原则。虽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亦各有少年组织，而共产主义的少年国际实为第三国际巩固勇猛的战斗员。他组织上的原则，可以参看予所著之俄罗斯革命论第十六篇与俄国共产少年会相仿佛。此处只略述其历史上发展。

少年工人生活的状况，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处同等的地位，所以少年组织之职任及斗争方法自然相同。一九〇七年第一次少年社会主义组织集会于德国史迦却尔德（Stuttgarb），当时尚在第二国际之下，就已经成就少年社会主义联合会之国际的组织。此次大会，嘉尔黎白涅黑德（Karl - Libkhechet）也曾参与，当即议决国际社会主义教育及反对军国运动之政纲。

一九一四年前之“武装和平”时代，实际上此一少年社会国际并无特设机关，若有若无之中，亦没有能辅助各国少年工人的运动。改良主义既已渐渐侵蚀各国社会党，当然也有影响于少年运动，如德、奥、法，因此各国国内的少年劳工会也渐失其政治上的积极性，而变成“市侩”式的文化运动。然有几国内，少年劳工会得免于改良主

① 十五世纪时莫斯科王娶东罗马帝（国）公主为妃，克服诸侯，驱逐蒙古人，适值东罗马帝国亡于土耳其，维赞斯城（Byzance）即君士坦丁堡陷落，于是俄国乃移希腊教教主于莫斯科，承用维赞斯帝国之“双头鹫”国徽。因此遂称君士坦丁堡为第二罗马，莫斯科为第三罗马。

② 俄国“民粹派”（Narodnitchestvo）向以农民革命为重，而轻视无产阶级，俄国所谓“社会革命党”承之。“社会革命党”首领赤尔诺夫曾谓资产阶级为革命第一力，无产阶级为革命第二力，农民阶级为革命第三力。

义的传染，则能竭力赞助社会党中的“左派”，如意大利、瑞典、挪威等。

欧战初起，国际工人组织，以及少年运动大受打击。然则战争开始后之明年，一九一五年四月，虽第二国际少年部正式秘书竭力反对，始终得召集大会于倍恩，议决“少年”独立为政治运动，反对阶级间的和平，而号召各国“少年社会主义少年联合会”反抗战争。倍恩会议之后，各国少年劳工运动大有活动，曾出版一种革命杂志，题目“少年国际”（列宁、杜洛茨基等均曾参与）。每年秋九月，依倍恩会议之规定，各国一致举行“少年纪念日”，行少年工人之国际的示威运动反对战争，反对社会党的爱国派。

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各国社会主义少年联合会大多数赞成俄国的布尔塞维克派，及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国际秘书部及几国少年会提议，遂由少年国际大会于柏林。到会各代表全体通过加入第三国际，组成少年共产国际——是为少年共产国际之第一次大会。重订共产主义的政纲。柏林大会到会者十四国，总计全世界共产主义少年联合会的会员约共二十二万人。

少年共产国际之第二次大会时（一九二一年七月）已有会员八十万人，总计四十国，欧亚非美无处无共产少年会。第一次大会与第二次大会之间，最重要的少年运动中的事业，乃为改组以前的社会主义少年会，会成纯粹的共产主义少年会，以及巩固国际向少年运动的关系，建立更强固的宣传机关。

第二次大会，更决定“共产主义少年联合会”在无产阶级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之功能，并及于各国共产运动发展中之少年会的策略。现时少年共产国际之责任，已非以前“创立共产党”之事业，乃在于吸收少年工人群众于会中，加以共产主义的教育。各国共产主义少年联合会的职任，亦是如此。最近，少年共产国际的实践上的成绩，正可以证实此种职任之重要。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的“国际少年的纪念日”，尤足以表示此种精神。

此外共产国际还有一“国际妇女秘书部”，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在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前，曾开第二次国际妇女大会。第二国际亦曾有妇女秘书部，然无一致进行的规划。第三国际妇女秘书部，在每国都派有女通信员，与共产党一致行动，而保护女工问题，尤其注重。不但如此，第二国际向来看不起亚洲人的。一九二二年时，讨论殖民地战争问题，改良派竟在第二国际席上赞成侵略，所以第二国际妇女秘书部中绝无近东远东的代表，第三国际当然不同，妇女部的范围包括五大洲，而且努力行向妇女的群众，令与男子同起而为共产主义奋斗。

郭冷苔女士（Kollontay）说：“苏维埃俄国已无所谓‘妇女问题’，只有社会的革命达到劳动界之男女平权。”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统观

永 钊

这篇文章根据于共产国际委员长只诺维叶夫同志 G. Zinoviev 的一篇报告。他把这次大会的意义同特色说得很简明，给我们对于这次大会一个总括的概念。

第四次大会比前几次大会进步的地方，就在它把从前联盟式的共产国际，改成真正的国际统一的共产党。这次会议把从前的决议，都切实地下个定义，决定实行时的方式，以及各国共产党在个别的状况之下当采取的策略；同时又着手起草共产国际的党纲。

共产国际到此次大会，人数及实力都已增加，到会的有六十五国全权代表，比第三次大会已多十三国。大部分的事务都委托到委员会去讨论，大会的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用在讨论内部问题上，参照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来解决后进的共产党之困难。

下面是几个重要的问题在大会中讨论经过的情形。

（一）统一战线问题

这个问题到了第四次大会才得到最后的解决。第三次大会只决定以“往群众间去”为标语，当时执行委员会及其两次扩大的期会，最先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第四次大会方打破最后的阻碍，从此“统一战线”的政策，遂成现在一时期之标语了。当初法、意、西班牙诸同志蔽于素来劳动运动的习惯，不了解统一战线的意义与重要。到这次大会的时候，在他们自己的宣言中已经看出统一战线有实行的成效。这是此次大会可欣慰的事情。

（二）工会运动统一问题

第四次大会非常重视工会运动的统一，从前有许多共产党员痛恨亚摩斯德丹派之黄色职工国际的领袖作恶。于是感情作用，宣言宁愿分裂工会运动，不同他们协作。到了第四次大会，大家都看清统一工会运动的必要，主张联合各派工会。但黄色职工国际的少数领袖，是很欢迎分裂的。分裂便是破坏工会运动，他们知道自家必归失势。所以想在共产国际胜利之先，把一切破坏。所以共产党人无论如何是要挽救工会运动

的团结的。罗斯美同志（Rosmer）说：“共产国际曾在一九二〇年救工会于危亡，因为阻止党员脱离工会”。这句话说得很对。由我们看来，共产国际现在又第二次挽救世界工会运动于危亡了，因为主张“在任何状况之下，保持工会运动的团结”。

这次大会决定同工团主义者的进步分子发生接近的关系，因为他们代表法国一部分真正革命的群众。从前法国共产党势力太弱，素来旧习惯没有除去，不能采用这正当的态度。现根据统一战线原则，各国都要保持工会运动的团结。这也是此次大会很有价值的成功。

（三）整顿各国共产党问题

共产党中素亦有许多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次都把他们洗刷下去。共产国际成立了四年，现在还在大会中讨论江湖派的“会匪”（Freemasonry）问题，在他方或不免于冷笑。第二次大会时意大利同志谢腊蒂（Serrati）（谢腊蒂同志在今年二月间为意大利政府所拘捕）提议禁止党员加入“会匪式的团体”，我们当时以为这是当然的事实。我们未免太乐观了。各国社会党加入共产党的，往往带进许多民主党分子，这些分子加入愈多，共产党的组织愈无力。法国共产党曾吸收了许多社会民主党分子，因此受害不少。旧党之中所来的分子，不但带有社会民主党的恶习，而且竟有“会匪”问题发生。第四次大会切切实实地讨论这个问题，把非共产主义的分子，洗刷无余。敢信此后这类问题可无须讨论了。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国际中最重要的几国共产党，都已重新经过审视，当时均特设委员会解决各国问题。此次大会于法国共产党，则助之克服其“议会行动”及“中央派”之旧时遗传的恶习。意大利旧社会党中之一部分，曾反对共产国际，经过许多痛苦的经验，现在悔悟而重归共产国际，因此大会又助意国共产党，联合此一部分之社会党。挪威共产党中尚有半改良主义、半工团主义，组织上的联邦主义以及种种社会民主派旧观念，此次大会亦助之力除此等弊病。又助美国共产党规定其秘密的共产运动与公开的群众运动之间的正确关系，赞成其运用一切活力以组成“劳动党”（如英国式的劳动党）。捷克斯拉夫共产党中，刚有半工团主义的危险现象，大会即助之扑灭。西班牙工人群众之间，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恶影响，大会助其共产党规定进行方法以克服之。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则大会助之确定进行方针，为更强烈的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等等。

（四）资本进攻的问题

第四次大会确知各国工人现在颇受“白党祸”（White Terror）及资本进攻的危难。大反动的法塞派（Fascism）将成大规模的国际化的怪物（参看本期“现代的劳资战争与革命”），大会对此认得很清楚。但并不能当作很固定的观点。将来历史上也许别开生面，譬如英法诸国或能有“和平民主”的幻象偶然再现呢。

（五）农民问题

第四次大会拟就了详细的农民运动策略。否认旧时社会民主党的粗浅的马克思主义解说，他们把农民问题看得无足轻重。大会同时也就指出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把一切农民都认为“农场工人”，当他是一整个的阶级，同工厂劳动者一样。

（六）近东远东问题

第二次大会，曾经拟定近东及远东共产党之行动方针及其革命组织之纲要，现在只需把前次纲领修改成为具体的确定的就行了，此种修改在实行时颇为重要。再则，黑种的革命家，居然也和其他殖民地代表一样，对于共产国际非常之表同情，此次大会亦来出席，是破天荒第一次。不但在共产国际为第一次，而且从有社会主义的政党之国际组织以来，黑人的出席，要算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这是最足以使我们欣快的。

（七）共产国际已成统一的世界的政党

第四次大会把旧时章程加以修改。凡有丝毫联盟性质的地方都已删除。此后大会全体自选委员长及执行委员会，废除以前由各国选派代表合组委员会的办法——这才真成世界的统一的共产党呢。

第四次大会是共产党最好的学校。全世界进步的工人都当了解大会的经过，这次大会很审慎，很清楚很确定地拟定进行的计划——这是前几次大会所未有的。如此进行，数年后共产党基础巩固了，我们很可以信他必能与一切反动派、国际的法塞派作战。此次大会，更足表示全世界共产主义派的劳工界团结紧密，对于世界上一切黑暗势力，必能力战不退，勇猛直前，不达最终目的不止。

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

参看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至十三日《北京晨报》

秋 白

罗素论先进国之社会主义说，“若大英欲恢复其从前独立之地位，并使其力量有以足以拒绝美国大资本家之要求，则必谋合德俄两国之富力，缓欧洲列强互相反抗之态度，于匈牙利、南俄及美索波达美亚等处，另辟粮食接济之来源；更须力谋造成‘欧洲之合众国’。凡此均为工党应取之正当政策，要知美国之资本主义，较任何地点均为强盛，故脱离美国羁绊，实为进化之第一要件。……吾人当考察工业文明之将来时，必视世界之阶级战争为文明之末路，而非新世界之门户也。……苟非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之信仰动摇，而欲世界免于完全崩坏，直无希望可言。……”

固然，以工党政治上的标语而论，此策未始非在野工党所应取，然而罗素要反对“阶级斗争”。其实“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若客观上既必不可免，则必有国内的阶级斗争，与之对抗，破坏方能较少。罗素不欲势工〈人〉阶级独立执政，请问欧洲之“社会主义合众国”如何而有？其结果所得，至多是“以大英为中心之欧洲的国际帝国主义”。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之信仰，尤其非以美国之“国内的阶级斗争”破之不可。即此也至少可截短美国以资本国之资格来攻击“无产的欧洲合众国”之战争，又必美国及各国无产阶级乘机取得政权，方能完全消灭世界之资本主义。并不是无产阶级格外爱斗争，而是资产阶级不容你不斗争。

今罗素并国内的阶级斗争而否认之，请问何以出此“末路”？伯讷萧（Bernrd Show）说得好：“我怕我们‘白色的私有者’（资产阶级）没有斗争，决不轻让。就算劳动党在国会之中有六百票也没用”。工会势力如此之弱（参看本期第一、二篇），劳动党的能力，难道能于未革命前，实行罗素的政策么？即使劳动党能执政，若不经阶级斗争而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也决不容忍你们从容不迫地行“社会主义政策”，历史的明证多着呢！你怕牺牲“世界文明”，资本阶级却不怕牺牲你呢。请放眼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难道不是如此？

罗素说：“美国之生产制度，大可付以国家资本主义之称，其异于社会主义，只有两点：一则为贵族的，二则此制度之运用，系为操纵者的私人利益而非社会之利益。其与布尔塞维克派在俄国所欲创造之制，仅于此二点略有所不同而已”。诚然！美国之社会主义的物质的基础，确已成熟，只因有世界殖民地的泄气洞，所以此一蒸汽锅，尚未爆裂，“却不在他信仰不信仰！”若世界的经济有理想上之发展，则必先于殖民地上革命的劳动平民振兴其本国实业时，排斥美国资本家之投资势力，总则能作“世界的大翻”令无产阶级执政，而资产阶级受治。然后有世界经济互助之可能。或则美国的经济生活中，因无产阶级真能得阶级的觉悟，令群众心理变成物质上的能力，积极位成此国内阶级斗争之胜利，不但美国，且波及各国，以至于殖民地。总之，只有“革命”，方能缩短此“社会主义婴儿”之难产时间而减少其痛苦。

罗素所论，固然也多精到处。然而他竟以为布尔塞维克所“欲创造之制”仅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已是一大谬误。况且他既承认俄国现行之国家资本为平民的为社会之利益的。他却又否认革命。不知道，俄国之“平民国家资本主义”正由革命而得来。

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绝非贵族的，而是苏维埃的。如知苏维埃之意义，便可以了解此政治上的“突变”之价值。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上的完成，仍在“潜变”的过程内。故共产主义：（一）自阶级斗争至社会革命——以时、地之经济现象及阶级觉悟为标准，而定其急激之程度——足为革命的原则。试问，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动者，真觉悟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当战争之际，资本家何从取得制造杀人工具之“牛马”，又何从取得杀人之“活工具”？那时何来国际间的一切战争？社会革命何至于绝对地破坏工业？（二）以无产阶级独裁制及有规划的经济——为政治上的原则。（三）以民主的集权制及联邦的自治制互相为用——为行政上的原则。（四）以社会活力为社会运动，及振兴一切社会事业之原则。凡此都以各地各时之经济现象及阶级觉悟力为标准，而解决其实行时之一切问题。例如美国，难道还要待共产党来，方行国家资本主义！如中国，难道能立刻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来决无死板的乌托邦玄想的梦魇，而有最终的一致不变的目的：经“社会主义的城乡生产品之正当交易制”，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至于俄国现行之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是经济上的过渡制度，无产阶级的独裁制，也仅仅是政治上的过渡制度而已。

第二期

民国一二年（1923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阶下囚

郑韦之

——一个审判的纪实——

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那时真是历史的滑稽：

“……公民呵！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自己。应当仗着剑拥护自由。而皇帝的‘钦赐自由’宣言书，哼！那不过一张纸罢了。你们看，我可以把他团在拳头里。今天是人家‘钦赐’的，明天人家就能收回去。你们看，我当着大众撕碎这张纸！难道不容易！……”

那年十月，罢工运动日益发展，苏维埃自然而然变成政治运动的中心。最早，它刚组织起来，工业的无产阶级，有的依职业组织，有的依企业组织，或者还有依市区组织的，四方八面都派代表到这所谓苏维埃来。铁路工会完全和它密切地结合……革命的怒潮里，苏维埃从“联邦式”的评议机关不期而变成一切革命行动的直接指导机关。甚至于那“各联合会之联合会”，智识阶级的各种同业公会的总机关，也参加十月十四的总同盟罢工，居然也承认苏维埃的最高权。无数的罢工委员会——工程师、律师、小官吏，都自动地遵从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真成“革命天”里的北辰了。

好容易！钦赐自由的宣言书，论允明定宪法的诏书下了！

那便怎么样？……十一月里，已经……

政潮似乎滚滚地东去，滚得那么快：当初反抗政府的有产阶级已经渐渐被他冲进“秩序党”了。然而十一月中旬突然地爆发邮电罢工，各邮电机关，因为杜尔诺沃将军不知怎的违背了半月以前的“上论”，发出一个命令禁止小官吏结社，就宣布停工了。当时的国务总理维德接到邮电公会的哀的美敦书：“取消杜尔诺沃的命令，使因入会而被革的官吏复职，不然呢……”十一月十五日，七十三处邮电职员代表，开大会于莫

斯科，一致同意的议决——通电全国：“维德没有答复，罢工吧！”十一月二十三，圣彼得堡区铁路工人委员会却忽然接到苦史奇地方的来电，说：那地方炮台工程师莎夸洛夫等数人因“宣传革命”被逮交军事审判处，已经判决死刑准二十三晚十二时执行。正在罢工中的电报机关，立刻接通了各地的铁路工会，他们就议决一哀的美敦书，送到国务院——假使晚八时前不取消莎夸洛夫等的死刑判决，全国的火车便要立刻停止。果不其然，八点零五分交通部便来央求电报生拍一万急电通告全国，说莎夸洛夫等的死刑已经奉上谕停止执行了。那亦冒险乎……哼！自由自由！偷来的自由是靠不住的，天下哪有不卖力白沾光的事。

俄皇政府瞧着情势不对，“非除根不可”。“苏维埃是违法的秘密结社，应当……”司法总长却支吾着：苏维埃不是……不是……他“学着”中国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学生联合会，议决的事在报上公布，每次会议记录都发表，并且每每和行政机关直接发生正式交涉……然而，始终想着了一个方法，逮捕苏维埃主席赫鲁斯达列夫（Khroustaleff），那是十一月二十六的事。

逮捕一个主席又怎样？赫鲁斯达列夫个人的才能固然很高，他的真姓是诺塞尔，有名的律师，早已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然而革命潮流急转直下的时候，实在看不出他这“英雄”的本领。这并不是他无才，而是革命的功绩。从一九〇五年一月到十月的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实际上进了政治的学校。“英雄与庸众”的公式已经不能通用于实际的革命运动。首领的个性好一似融化在群家之中；而群家却自成其为—政治的个性。

政府逮捕赫鲁斯达列夫不知是为什么？那种动机，恐怕当时主谋的皇村里的土匪头儿自己也不知道。然而却给了群家一个暗示：决死的斗争，不是一天一天的而是一秒一秒地近了。

苏维埃议决案里说：“十一月二十六日俄皇政府虏捕劳工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赫鲁斯达列夫·诺塞尔。因此，当举临时主席团（Pre'sidium）并预备武装反抗”。于是新主席就是杜洛茨基（Trotsky）。他那时的假姓是雅诺夫斯基（Yanovsky），还有符维乾斯基、慈勒德纳夫（工人），一共三个人。

苏维埃的机关里，向来是络绎不绝的人，雪片似的信，请求那样，请求这样：工人、女仆、店伙、农民、兵士、水手……他们这些人很“笨”，也和北京东郊的农民“请求”学生似的，去请求苏维埃。他们对于苏维埃，简直以为是万能的，这固然是他们的幻想，然而他们现在确实觉得“母亲回来了，有个诉苦的地方”！

一个瞎子，土俄战后的伤兵也来诉苦，请苏维埃“逼那个人”（皇帝）出钱抚恤。

乡下某地主的经纪人，一个老哥萨克，说主人苛刻了他二十八年，无缘无故地革斥了他，请苏维埃去问他。他的信封上只写着“圣彼得堡工人管事处”，而革命的邮政居然给他送到了……

劳工代表苏维埃积极地日益扩张自己的职权，到杜洛茨基时代，已经紧迫着决战。“两个政府”并存的时期快终了了。正值当时，日俄战争之后，革命运动期中，俄皇政府的预算决算弄得一塌糊涂，各机关欠发薪水。全俄各地各界的骚动一天一天地厉害。革命中各种势力团聚集中……苏维埃于是发出财政宣言，说：“……只有罢税，要求现金。提取国家银行里的存款。俄皇政府是决不能信任的……”

那时《新时代》报上说：“劳工苏维埃并不悲观，现在仍旧积极地进行，它的命令和议决案，简短明了，简直是斯巴达式的文体。现时的维德内阁却没有这样的本领，很像颓伤失恋的女郎，向人叨叨絮絮地说个无穷无尽的废话。”

然而十二月三日，维德内阁却亦简短明了：派兵围自由经济协会（当时苏维埃的会场），简直逮捕苏维埃。

那天四点钟，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会。议事日程早已有了：政府没收报纸问题；新颁罢工条例问题；杜尔诺沃将军的阴谋密电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中央委员会代表提议：简直接受政府的“宣战书”，立刻联合全国革命团体，预定日期举行总同盟罢工，号召一切革命势力开始行动，并当联络兵士间的骚乱和农民运动……

铁路工会代表声言：六日将召集的路工大会，必定赞成罢工。邮电工会代表也非常赞成——邮电罢工正在声嘶力竭的时候，若有总罢工，便可以再振旗鼓。……正在讨论，忽然接到当天逮捕苏维埃的消息，半点钟后便证实了。那时楼下大会场里各处代表已到齐，另有各党代表、新闻记者、来宾。执行委员会在第二层楼上开会，还想赶快藏起几个重要些的会员预防变故，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屋外已经包围上一营兵、宪兵队、哥萨克骑兵队、更夫，地保……脚步声、枪柄声、门窗开合声……楼下劳工代表热烈地抗议演说，嘈杂得很。执行委员会主席便开了楼上窗子向低下高声地说道：“伙伴们，我们不要抗拒！我们现时就预先声明：这里只会有兵放的枪声，不然就是奸细故意放的枪……”过了几分钟，兵上楼了，走到执行委员会门口。

主席说（向着军官）：“请关了门，不要打扰我们会议。”

兵站住了不进去，可是门仍旧开着。

主席又说道：“会议仍旧继续，有谁要发言？”

店伙联合会代表发言：“政府今天这种行为更多添了几条总罢工的理由。政府替我们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一次更当以军队为出发点。平民的兵士应当保护国家，

而不是……（军官赶快把门关上。演说的人却更高声地说）。就是关着门，门缝里也透得过这劳工对于兵士的极亲爱的呼声，这是全国受压迫者的呼号……”

门忽然开了，走进一个宪兵军官，他的脸白得像蜡似的（他怕人放枪），他后面跟着十几个兵，一个兵守一个代表。

主席道：“现在宣布闭会。”

只听得楼下一片折断手枪的清脆声音——代表们不愿意留在身上使警察取去。

开始查抄。大家都不肯说姓名，可是一个一个抄查过，身上记上号数，都随着半醉的兵去了。

圣得彼堡劳工代表苏维埃竟入了皇村里的土匪头儿之手。

苏维埃里的劳工代表约莫有三百多人坐在监狱里——那十二月里莫斯科的武装反抗总罢工运动完全被强力摧残了。政府却也不得不召集“帝国议会”，总算那是一年来革命运动的可怜的余迹。第一次的帝国议会召集时，大家都以为要大赦了。可是议会一面开，一面仍旧完了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日开审苏维埃谋叛案。彼得堡各工厂的工人继续不断地开大会，提出抗议。检察厅要想完全归罪于苏维埃的执行委员，说他们是一团秘密党员，自称代表群众罢了。十二月之役以后，自由派的报纸也天天说苏维埃的“梦呓的革命方法”早已不得群众同情，群众已经倾向于新生活——“立宪国家”。然而一九〇六年六月中各工厂工人的议决案竟如此地明白表示这些官僚、学者的谣言丝毫没有价值，甚至于他们的报章杂志上都羞得不敢提起。彼得堡的工人都说自己愿意受害。假使革命运动是犯法的，那么，大家都会积极参与，苏维埃不过是执行机关罢了。

好大的案件！难道还有什么司法问题？完全是政治上的势力消长问题，谁也不曾犯罪，谁也不是应当审判人的。六月中政潮还没有稳定，究竟是守旧内阁还是自由派内阁，正在争执之中。难怪审判厅长突然又宣布了改期开审。

直到九月十九方才开审。证人传到四百多——工人、企业家、宪兵、工程师、女仆、新闻记者、邮电官吏、学生、教授、兵士……而厅审官，原告的检察员、被告的苏维埃、辩护人、证人，大家足足忙了一个多月。那十月间的全俄总罢工，十一月间的罢工示威运动，反对军事裁判处虐杀海军水手，反对俄皇强压波兰民家，以至于八小时制运动，苏维埃领导武装反抗等等……一幅一幅的电影又重新在审判庭前演过。苏维埃的议事速记录、议决案、布告、命令乱山似的叠在桌上，都成了物证，其中也有救济失业办法，和解工人之间的误解，调停劳资的冲突，领导时起时落的经济罢工，

小示威运动，这些“琐屑的”事务，在审判官方面以为暂时与案件无关的。

审判庭完全宣布戒严，满庭宪兵、警察，院子里站着几百名大兵。站岗的一直从监狱门口站起，到审判庭为止。他们竭力隔离着犯人和听家，大约放进去的旁听者不过一百至一百二十人，可是三四十个穿着大礼服的律师，却时时穿过这一军警筑成的“活墙”。而被告的橈上就时时发现书报，旁听席上时时掷下花朵。一束一束送来的花，没有完！审判长却亦不禁止。到后来，甚至于有些宪兵、警察，受这种空气的“传染”，居然替被告传递起花来了。

还有当证人的工人！他们几十个聚在一间证人室里，等到审判长传他们的时候，那门一开，革命歌的声浪竟一直达到审判庭上。这些证人真奇妙！他们把工厂左近的革命空气带到审判厅里来了，竟轻意地破坏了神圣庄严的审判庭里的肃静。那些新闻记者，上等社会里的证人看着工人都很很似的。

第一天开庭，便有一个“示威”（De'monstration）。当天应当有五十二个被告受审，然而只传到五十一个。有一个姓戴尔摩克尔池羌茨的，没有来。

——被告戴尔摩克尔池羌茨哪里去了？律师问道。

——他已经不在这一被告名单上了。

——为什么？

——他……他……已经枪毙了。

不错，他在六月二十至九月十九之间，曾经保出狱，不知怎的又突然被军事法庭捕去，说是海军谋叛人之一，枪毙了。

当时被告、证人、辩护人、听众——都默然地起立，对于死者致敬。那些军官宪兵莫名其妙地也站了起来。

随后证人排着二三十个一次去宣誓。有许多证人刚刚做完工来，手亦没有来得及洗，衣服亦没有来得及换。这些工人走到审判庭，四面看一看，对着被告点一点头，说道：“你们好，伙伴们！”好像他们还是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来问事似的。审判长赶快叫他们去宣誓。一个老神父已往站在那里摇起他的法宝来。可是证人却站着不动。审判长又请一遍。

——不去，我们不宣誓——底下有几个人回答——我们不信这个事。

——你们都是正教徒？

——我们在警察的注册册上是正教徒，可是我们对于这些事不承认，并不相信。

——既然这样，你们可以回去了，今天不用烦劳你们。

除出警察等职员做证人的以外，只有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的工人去宣了誓。希腊正教徒反而一个人亦没有去。他们只声明：必定不说谎。

一批一批的证人都是这样问过去。审判长对神父说道：愿意的，就替他们行宣誓式；不愿意的，请他们退后！

工人互相私语，渐渐地退后。证人之中有一个当时有名的律师，而且还是自由主义派，沃君。

——证人沃君，你宣不宣誓？

——我……我……实在说来……宣誓的。

——既然这样，请到神父那里去。

沃君踟蹰着走去。他回头望了一望：谁也没有跟着他来。前面却已经站着一个宪兵，亦是证人。

——举起手来宣誓！

那个宪兵高举着三个指头。律师沃君慢慢地举起手，却又回头望，手也停住了。

——证人沃君——听得像是已经发怒的声音说道：你究竟是宣誓，还是不宣誓？

——怎么啦……怎么啦，我宣誓，宣誓。

于是这一自由派的律师勉强“克己复礼”，高高地举着手，和那宪兵同念着神父教他们的“咒”。假使有艺术家描写出这样的景象，恐怕大家还以为绝不是写实的！这一法庭上的小小的一幕戏，实在是一个“社会的象征”，这是当时大家都觉得的。工人的证人和被告相视着微笑；上等社会里的人觉得很不好意思；审判长有幸灾乐祸的神气……满堂忽然陷于奇寂的幻梦里。

开始质问证人。问到圣彼得堡市议会的议员溪仁高仁伯爵。有一次苏维埃派代表团到圣彼得堡市自治会里去提出种种要求，他刚刚出席，所以他亦来当证人。

辩护人就问道：

——你当时对于举办“武装的自治民警”的提议，是怎样的态度？

——我以为这是与案件无关的。那伯爵回答，在我所主席的案件范围里。审判长驳他道：——辩护人刚才的问题是合法的。

既然如此，我应当说，当时我对于苏维埃提议的民警办法，大概是表同情的。可是以后我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大有变更……

啊！一年以来，“他们”的见解，对于许多问题，不知道变更了多少了！自由主义派、立宪派、民主派的报纸，总算声明对于被告的“人格”非常之表同情。然而他们当初的政治主张比起现在开审时的见解来，真正是“不啻天渊之隔”，只有工人，“无智识的下等人”，却绝对承认苏维埃的政治行为，没有三心两意的杨花水性。

各工厂往往有用全体签名的声明书，最多的有二千多人签名，递交法庭，说明：苏维埃的确代表群众的无产阶级而行动，并非一群冒名代表的秘密暗杀党……不能使

他们个人负责。那些声明书往往在工厂里已经经过几千人的“油手”，又皱又龌龊，然而被告却很爱这些“烂纸”，每次正式要求书记官宣读。读到临了：“我们，某某工厂的工人若干，愿意分任苏维埃之政治行动的责任。假使他的行为是犯罪的，那么，下列签名的人都愿受同等的判决”。审判长听着，一句话也不敢接下去。

然而检察官始终要……他们的意思当然全注重在“预备武装反抗”一点。审判本是为此而开的，并不讲什么法理！

——苏维埃是否号召“武装反抗”？

——实在说来，并没有号召，证人回答。

——苏维埃议决案中仅仅说明客观上武装反抗之不可免。又有一个证人说。

——那么，苏维埃曾经要求召集“建国大会”。究竟谁应当来创立这“建国大会”呢？

——平民自己。

——怎样呢？

——自然应当用自己的力量。好良心是不中用的。

——这样说来，苏维埃确曾供给工人武器，预备反抗的了？

——没有，那武装是预备自卫的。

审判长只有耸耸肩。然而辩护人、证人、被告的答辩，始终教审判官都懂得这层“矛盾”的道理。工人的武装直接的是为自卫。然而……原来一九二三年大杉荣的死，很有些“模仿”那时俄国许许多多的工人首领。不但如此，俄国当时的光棍、暗探、警察还专心组织“私杀”案，放火烧工人区，掷炸弹，或简直掠杀工会报馆。既然如此，工人不武装又怎样——武装的间接的目的，确亦因此决不能不是“反抗”！

审判的结果——十五个人，杜洛茨基亦在内，判决终身剥夺公权，永久充发西伯利亚；两个人监禁几年；其余的都只能宣告无罪。

这次审判对于全俄社会有极大的影响。第二次“帝国议会”选举运动时，社会民主党居然得到相当的胜利，原因一半亦在于此。实际上，俄皇政府审问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巴力门”，恰好是为革命而宣传。阶下囚的苏维埃尚且留这成绩，有以自傲。难怪现在莫斯科德维尔街苏维埃场上举手鹄立的自由神，在那赤旗招展之下，面对着莫斯科省苏维埃的红墙，要这样睥睨一切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

诗

革命 VON HEINE

文虎 译

我是宝剑，我是火光。
我在黑暗中照耀你们，
战争时我抢着站到尽头的前线去。
围绕我的是我朋友们的尸体，但是我们已经胜利了。
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围绕我的是我朋友们的尸体。
葬仪的赞美歌中高唱着凯旋的歌调。
但是现在既不是欢乐——也不是悲哀的时候。
战鼓重响了，
重新酣战去。
我是宝剑，我是火光。

颈上血

工人某

军阀手中铁，
工人颈上血。
颈可折，
肢可裂，

奋斗的精神不可灭！
劳苦的群众们！
快起来团结！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江岸。

进行曲 赤军

文虎 译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前进，
光辉从黑暗过去，炫耀着将来呵！
看亿万兵丁，滔滔不绝地从幽暗中出来，
直到我们的希望达到，天地澄清的时候。
兄弟们，只前进吧，兄弟们，死正在嘲笑我们：
永远做奴隶以终生，还是出于神圣的最后一战？

过去

巨 缘

淡绿色的落叶儿，
秋意中轻轻飘展呢。
落叶儿，我送你归去，
祝你安安心心抛离“生意”。

春华秋实，你的使命尽了，
地上枯死了绿茵的草，
枝上飞去了啁啾的鸟，
只落得把秋来报告。

天 语

双 莫

大地山河，如今还剩得几许，
便欲倚飞云，一直叩天门去。
静悄悄里，像听得宇宙低语。
寒浸浸，光芒涵照斗牛路。
飘忽归来天国，故乡已无住处，
那莽尘寰乱攘攘，怎能回顾？
何处，何处？
.....
天却有情，恨我高绝，
殷勤来问我那人间苦。

知 心

瞿景白

蝶儿吻着花儿道：

“我是你的知心。”

花儿道：

“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样的？”

蝶儿道：

“你的心是香甜。”

花儿道：

“哼！只知道香甜——你爱的，
不顾我心里的悲酸。”

一九二三，九，二〇，杭州。

飞来峰和冷泉亭

瞿秋白

飞来峰下坐听瀑泉，
我恨不能再乘风飞去。
且来此冷泉石上，
做个中流的砥柱。

只听你湍流奔泻，
急节繁响怒号千古。
始终听不出个：
“你为什么飞来，
为什么又飞不去？”

难道虚名儿叫冷，
出山心却热！
怪不得这样咆哮奔放，如泄积怒，
毕竟也枉称飞来，原来是力求飞去。

一九二三年七月。

出 狱

刘拜农

同胞们都在地狱中，
你们怎能不入狱？
同胞们都在地狱，
你们怎可长入狱？

为了解放受压迫的同胞，
你们同入狱。
入狱复出狱，
片刻不忘同胞的幸福。

回首望故乡，

虎狼当道行人伤。
伤害我们犹可，
莫使三千万同胞都喂了虎狼。

你们是受压迫的平民的使者，
你们是弱者的朋友。
我谨在你们出狱时，
代表受压迫的平民，
代表弱者，
祝你们一杯酒。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狗 熊(独幕趣剧)

俄国·柴霍甫 著 曹靖华 译

——呈梭洛夫曹夫——

人物

叶丽娜伊凡诺夫娜波波瓦——寡妇，颊上带着颊窝。女地主。

格利戈利斯节巴诺维其史米尔诺夫——不老的地主。

绿克——波波瓦的听差，老头。

在波波瓦宅中的一座客室里面。

I

波波瓦与绿克

波 (身服重丧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张相片)。

绿 这样很不好呵，太太……这不过是你自己糟蹋身子罢了。……丫头们和女厨子们都去采野果子去了，她们都是快快活活的。就是那猫也都知道它自己的快乐，在院里捉扑着小鸟，跑着玩。可是你自己整天坐在家里，好像在尼姑庙里一样，没有一点乐趣。唉！差不多有一年了，你连门都没出过……

波 我永久不出门了……为什么？我已经是未亡人了。他长眠在坟墓里边，我把我自己葬埋在这四堵墙里边……我们俩已经都死了。

绿 唉！这哪儿的话！我真不要再听了。尼古拉米哈洛维其下世去了，命该如此，这是没有法子的……悲伤一下，也就够了。你也应该知道自己保重呵，不应尽管哭泣一辈子，穿一辈子丧服。我的老婆死的时候，我也经过这种时候……怎么办呢？我悲痛哭泣了一个月，这也就够她的了。要是哭泣她一辈子，她也实在担当不起呵！（叹息）把你的邻居都忘完了……你自己既不去瞧看人家，也不叫接见他们，我们过的光景好像蜘蛛一样——同现世都隔绝了，礼服都放起来叫老鼠咬破了……如果没有好人还好说，但是县里那么样的多着呢……在雷勃洛夫那儿的军

营里边，那军官是何等的体面，叫你看的连眼睛都不想闭！在他们的野营里边，每礼拜五都有一个跳舞会，差不多军乐队天天都奏着音乐……唉！太太，你正当青春的年华，应该及时行乐……那娇艳的姿色，不是永远保得住的呵！若是再过十年，你要像孔雀一般，在那军官老爷面前，去讨他们倾心的羡慕，那就晚了！

波（坚决）我请你永远不要向我说这些话！你知道自从尼古拉米哈洛维其死了之后，我完全失了生命的价值。你以为我是还活着呢，但这不过是你想着吧了！我誓到此生的最后一刻，都不与人往来，都不脱去我的丧服……你听见没有？叫他的幽灵看看，我是怎样地爱他……我不瞒你，他先前是常常用种种残刻（？）不当的手段待我，并且欺骗我。但是我呢，至死我都要给他守节。我可以给他证明我是怎样地爱他，他在阴间可以看见我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地爱他……

绿这样说，还不如到花园里逛逛，或是套着多比或维里康（马名）到邻居家里作客去……

波唉！……（哭泣）

绿太太！……太太！……怎么办呢？上帝保佑你！

波他是何等地爱多比呵！他常常骑着它到戈尔查根及付拉梭夫那儿去，他驭马驭的是何等得好呵！当他用全副精神去勒马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威仪呵！你还记得吗？多比！多比！叫他们今天多喂多比点铃铛麦吃。

绿是！

（锐利的铃声）

波（战栗）看是谁？告诉他，就说我什么人都不见！

绿是！（出）。

II

波波瓦（一人）

波（看着相片）你看一看，尼古拉，我是怎样地会爱你和宽恕你……等到我的悲哀之心停止跳动的时候，我的爱情就同时消灭了（含着泪笑起来）。你不嫌抱愧吗？我是多么样贞洁，把自己关在家里，至死都不变节操！但是你呢……你一点也不抱愧么，宝贝？你常常骗我，对我耍脾气，常常成几个礼拜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III

波波瓦与绿克

绿（进来，带着急遽的样子）太太，外边有人问你，要见你……

波 可是你告诉他没有，自从我丈夫去世以后，什么人我都不见！

绿 我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不听，他说他有很要紧的事情。

波 我不见！

绿 我已经告诉他了，但是那个小鬼骂着一直撞到屋里来了……已经在饭厅站着呢……

波 （愤怒）好！去问问他……这样无礼的东西！

（绿克出）

波 这样讨厌的东西！他来我这儿干什么来了？为什么他来扰乱我的安宁？（叹息）这真是逼得我要到尼庵里去……（沉思）好！到尼庵里去……

IV

波波瓦、绿克与史米尔诺夫

史 （进来，向绿克）蠢驴！你尽管爱说废话……（见了波波瓦装起很有身份的样子）太太，容我来把我自己介绍给你：我是退职的炮队中尉，是地主格利戈利斯节巴诺维其史米尔诺夫！因为有点很要紧的事情，不得已方来烦扰你……

波 （不给他握手）什么事？

史 你的先夫是我的朋友，他尚欠我两张期票，共一千二百卢布。因为明天我要到地务银行去付息金，所以我到你这里来问问，太太，请今天把我的账清一下吧。

波 一千二百元……为什么我丈夫欠你的钱？

史 他买我的铃铛麦。

波 （叹息，向绿克）绿克，你不要忘了，叫多给多比倒点铃铛麦。（绿克出，波波瓦向史米尔诺夫）如果尼古拉米哈洛维其欠你的钱，当然我要还你，可是实在对不起，今天没有现钱。到后天我的总管从城里回来的时候，我好告诉他叫他给你，欠你多少就还你多少，只是现在实在不能执行尊意……并且今天恰好正是我丈夫死后的第七月，我现在情绪很不好，很不愿意做这些关于账债的事情。

史 可是如果我明天不去付息金，我立刻就陷于破产的境地了！我的产业都被作抵押了！

波 到后天你来取你的钱。

史 我并不是后天用钱，是今天要用钱。

波 对不起，今天不能够还你钱。

史 只是我不能够等到后天。

波 如果我现在没有钱该怎么办！

史 怎么样你今天不能还吗？

波 不能……

史 呵！……就是这样了吗？

波 是的，就是这样。

史 就是这样吗？真的吗？

波 真的。

史 哈哈！谢谢你，这样就是了。（耸眉）这样还要叫我不生气！刚才在路上遇见一位税务员，他还问道：“为什么你常常生气，格利戈利斯节巴诺维其？”这样叫我怎样能不生气？我急着用钱急得要命，昨天早上天不明就出来到各账户那儿去要钱，哪怕有一个人给我钱也好些！我好像丧家之犬一样，谁还知道我夜里过宿在什么地方！在一个犹太人的酒店里边，躺在酒樽的旁边……后来离家走了七十多里地来到这里，希望要几个钱，不料她又拿起她的“情绪”来搪塞我！我怎能够不生气？

波 我已经明白向你说过了：我的总管从城里回来就给你。

史 我不是来找总管的，是找你的！你的总管是什么鬼东西，谁与他有什么关系！

波 对不起，先生！我受不住这样的话，听不惯这样的口气！我不愿再多听你的话！（疾走出门）

V

史米尔诺夫（一人）

史 请你说！……情绪……七个月以前你的丈夫死了！可是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我问你：我要付息金不要去？呵！你的丈夫死了……情绪不好……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诡计……你的总管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你叫我怎么办呢？我能够坐气球飞了去避债不成吗？怎么办呢？再不然撞死到墙上不成吗？到格鲁慈则夫那儿——他不在家；亚洛先维其呢，躲开了；顾丽琴呢，大骂了一架，我几乎想隔窗子把他掷出去；马祝多夫呢，正害霍乱病；到她这里，她又拿起“情绪”来搪塞我！这些无赖子竟没有一个还我的钱！这都因为我老实好说话，把他们娇养惯了！呵！等等看！你看我怎样！我不愿意你们拿我开心！不给我钱我就住到这儿！呵，今天真倒霉！真气死我！气地浑身都战栗了！唉！天呀！把我气昏了！（大叫）听差！

VI

史米尔诺夫与绿克

绿（进来），要什么？

史 拿点汽水或水来！

（绿克出）

史 这叫什么理！人家急着用钱急的几乎要上吊了，但她不给钱还说不愿意做这些关于账债的事情！……这真是妇人女子，不知世故！所以我向来就不愿同这些女人们讲话，我宁愿坐在火药桶上都比同女人们讲话好得多呢。呵！真气死我！气得毛发都竖起来了！我只要远远地看见她们，就要吓得毛骨悚然喊叫救命了！

VII

史米尔诺夫与绿克

绿（进来，奉上茶）太太病了，不见客。

史 走开！

（绿克出）

史 病了，不见客！不要不见客……不给钱我总是不走。你病一礼拜我就在这里住一礼拜……病一年我就住一年……你总算是欠我的钱，你的丧服和颊窝都打动不了我的心……我们见过这些颊窝！（走近窗子叫道）西门，把马卸了！我们不走！我就住在这儿！告诉马房里叫把马喂喂！你这畜生！你还将马缰绳套着！（嘲弄）不要紧……我给你——不要紧！（离开窗子）真不好过……真受不住的热，没有一个人还我钱，夜里又睡不着，不料到了这里，她又拿起她的什么情绪……真弄得头痛……喝点酒，怎么办呢？好，喝点酒！（叫道）听差！

绿（进来）要什么？

史 拿杯酒来！

绿克出

史 嘿！（坐下，环顾周身）很好，很不错！好像灰驴一样。靴子弄得这么样脏，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弄得一身草……她还把我当强盗看，还想怎样好！（打哈欠）在客所里这样未免太粗鲁一点，但这也没有什么……我在此不是作客哩，我是讨账的人，对于讨账的人这样没有什么……

绿（进来，奉上酒）先生，你太……

史（激怒）什么？

绿 我……我没有……我……

史 你同谁说话？住嘴！

绿（到旁边）这不晓得是什么小鬼来这样捣乱……（绿克出）

史 唉！真气死我！我恨不得把全世界都弄得粉碎……真把我气昏了……（叫道）听差！

VIII

波波瓦与史米尔诺夫

波（进来，俯视着）先生，我离开人间孤居很久了，我耐不惯这样的吵闹，我十分的恳求你，请你不要扰乱我的安宁！

史 给我钱我立刻就走。

波 我向你讲的是俄国话：我现在没有钱，请你等到后天。

史 我也是真正给你讲的俄国话：我不是后天用钱，是今天要用钱。如果你今天不还我钱，到明天我就要上吊了。

波 如果我没有钱怎么办？真奇怪！

史 那么你现在不给我钱吗？不能够吗？

波 不能够……

史 好，那么我就坐在这里……只要不给我钱……（坐下）后天还吗？好吧！我就这样一直坐到后天。（跳起来）我问问你：我明天要不要去付息金？……或者你以为我是闹玩笑吗？

波 先生，请你不要吵！这儿不是马厩！

史 我问你的“不是马厩”，是——我明天应分去付息金不应分？

波 你在女子面前太放肆了！

史 不，我一点也不放肆！

波 不，你太放肆了！你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很粗野的人！有品格的人对女子说话不是这样子！

史 哈哈！真是怪事！你叫我怎样同你说话？说法国话吗，怎么办呢？（激怒，咕噜说道）妈达姆，惹乌普利……你不给我钱，我真幸福……哈哈！对不起，我扰乱你！呵！今天好美丽的天气呵！这孝服真衬得你分外得俏丽呵！（向她鞠躬）

（注：“妈达姆，惹乌普利……Madame, je vous pris……”太太，我请你……）

波 又呆又蠢。

史（嘲弄）又呆又蠢！我在女子面前太放肆！太太，我这一生见的女人比你见的喜鹊还多呢！我因为女人决斗了三次，我抛弃了十二个女人，九个女人抛弃了我！的确，我从前也曾当过傻子，发过柔情，巧言花语，竭力地逢迎女人，恭维女人。忽而对月儿叹息，忽而苦恼，发抖，用尽心血去爱她们，爱得几乎要发疯了，

好像喜鹊似的高唱着解放，把我的一半家产都送到这温柔乡中，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们骗不了我了！这已经够了！那乌黑的睛珠、柔情的秋波、玫瑰的嘴唇、笑容可掬的颊窝。在那银白色的月波之下，低微的蜜语，低回的叹息——太太，我现在看起来一个钱也不值了！我并不是说你的，我是说一般女人的，她们从小以至于长大都是不怀好意，阴险、残忍、谗诬、嫌怨、胡说乱道，撒谎几乎要撒到入骨！可是讲到这个东西呢，（拍着自己的额）呵！对不起，我说话太不留情面了，就是一个喜鹊都比这些女子还要强十倍！如果你看一看任何美貌的女人，袅袅娜娜，简直好是天仙一般，直叫人万分高兴！可是你要看一看她的心——那直是鳄鱼一样呵！（抓着椅子背将椅子破碎）最可恶的就是这种鳄鱼，不知为什么道理，常常总想着她的神品，她的专卖权——就是爱情！可是她除出只会爱一〈只〉小狗之外还会爱谁？如果我说的话不对，我愿叫魔鬼把我缢死了！……她的爱情只会呜呜咽咽的哭泣！她只会乘着男子所牺牲，所受苦痛的时候，她好作出种种的媚态去尽力地骗他。幸亏你也是一个女人，那么按着你自己就可以知道女子的心性了！请你说句良心话：你一生见过女子真能够守节不变的没有？有没有这回事！能够守节不变的只有老妈妈和痴傻子！你可以看见有角的猫或白色的乌鸦，可是你遇不到一个守节不变的女子呵！

波 请问你，你以为在爱情里边能够守节不变的是谁？是男子吗？

史 是的，是男子！

波 男子！（冷笑）男子在爱情里边能够守节不变！真是奇闻！（激烈）你有什么权柄敢说这种话？男子能守节不变！如果这样我就告诉你：我所知道的男子里边最好的就是我的亡夫了……我那样热烈地爱他，拿全部的生命，凡青年有思想的女子所能爱的去爱他。把我自己的青春的年华、幸福、生命、财产，统统都交给了他，同他一个鼻孔出气，好像异教徒似的向他祈祷……可是怎么办呢？这是世上最好的男子，还是毫无良心的步步欺骗我！他死了之后，我在他桌子上找到一整匣情书，可是在他活的时候——唉！这真是不堪回忆呵！他整个儿礼拜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当我的面他去和别的女子通情，欺骗我，挥霍我的金钱，拿着我的爱情去开玩笑……虽然如此，我还是爱他，很贞洁地爱他……甚至他死了之后，我还是一样给他守节，不变，我永远把我自己葬到这四堵墙里边，至死都不脱去我的丧服……

史 （轻蔑地笑着）丧服……我不知道你把我当什么人看？好像似我不知道一样！你为什穿着这黑色的衣服并且把自己葬到这四堵墙里边！哦，这真是神秘奥妙极了！叫那些赳赳的武士或青年的诗人从你宅前经过的时候，望着你那窗子必悠然想道：

“这儿住的是神秘的达妈拉 Tamapa，她因对她丈夫的爱情，遂把自己葬到这四堵墙里边！”我们知道这些玩意儿呵！

（注：达妈拉是列尔孟托夫所著《魔鬼》里边的女主人公，是乔治亚——在高加索国的公主，是黑睛美人。据列尔孟托夫诗中所说；达妈拉曾被一魔鬼爱上，后来她避魔鬼的爱，逃入尼庵，死在那里。）

波（脸红）什么？你怎敢对我说这些话？

史 你把你自己活埋了，但是还忘不了往自己脸上扑粉呵！

波 你怎敢同我说这样的话。

史 请你不要吵，我不是你的总管！我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是妇人女子，我说话是很爽直痛快的！请不要吵！

波 不是我吵，是你吵的！请走！

史 给我钱我就走！

波 我不给你钱！

史 不行，得给我钱！

波 我就气气你，一个大钱也不给！走开！

史 我没有这种福气，我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未婚夫，请不要给我玩这些把戏！
（坐下）我不爱这些！

波（气得发喘）你就坐着吗？

史 坐着。

波 请走开！

史 给我钱……（到旁边）唉，真气死我！真气死我！

波 我不愿同这些不要脸的人讲话！滚开！（少停）你不走吗？不吗？

史 不走。

波 不走吗？

史 不走！

波 好！（按铃）

IX

同上人与绿克

波 绿克，把这位先生拉出去！

绿（走近史米尔诺夫）先生，请你走吧，太太吩咐了！不要在这里……

史（跳起来）住嘴！你同谁说话？再说我杀死你！

绿（捶胸）老爷！……我的好老爷！……（倒到椅子上）唉呀！昏了！我昏了！要命呀！

波 姐沙在哪里？姐沙！（叫道）姐沙！白拉格亚！姐沙！（按铃）

绿 唉呀！她们都去采野果子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我昏了！拿点水来！

波 请滚开！

史 请你放庄重一点吧！

波（握着拳，顿着足）你这鄙夫！鲁莽的狗熊！蠢货！怪物！

史 怎么？你说什么？

波 我说你是狗熊！是怪物！

史（挺身上前）我请问你，你有什么权力来欺负我？

波 是的，我欺负了……怎么样？你当我怕你吗？

史 你看你是女人，便有权力无故欺负人吗？是的吗？决斗呀！

绿 老爷！……好老爷！……拿点水呀！

史 决斗哟！

波 你看你有强健的拳头，牛大的嗓子，你便以为我怕你了吗？是的吗？你真是蠢货！

史 决斗哟！我无论谁都不让他来欺负我，我不管你是什么女子，什么纤弱的女子！

波（用力叫道）你这狗熊！狗熊！狗熊！

史 现在我们可以除开一切的偏见，这仅是一个男子本着义气去雪他的耻辱！平权，这就是男女平权！决斗哟！

波 你要决斗吗？好！

史 即刻去！

波 即刻去！我丈夫死后还留下了两支手枪……我现在去取来……（急遽地走去，忽又转回来）我将一枪打到你的铁面上，叫你滚蛋！（出）

史 我打她好像打一小鸡似的！我不是小孩子，不是心软的小孩子，我管她是什么纤弱的女子！

绿 我的亲老爷！……（跪下）请你开开恩，可怜可怜我这老头子吧！请走吧！真把我吓死了，还要决斗呢！

史（不听他）决斗，这就是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两性平等！按理我也要打她！呵！这是什么女子？（嘲弄）“叫你滚蛋……我一枪打到你的铁面上……”这是什么女子？红着面孔，瞪着眼睛……竟要和我决斗！我真是这一辈子只见过头一次……

绿 老爷！请走吧！我永远祝福你！

史 这真是妇人女子！这个我明白！真是妇人女子！呵，她不是扭扭捏捏，不是懦弱

无能，是火一样，炸药一样，火箭一样！打死她也觉可惜呵！

绿（哭泣）老爷……我的亲老爷！你走吧！

史 我真喜欢她！真喜欢她！那笑容可掬的颊窝，我真爱她！我不问她欠我的债了……我的气也消了……她的魔力真大呵！

X

同上人与波波瓦

波（带着手枪进来）这就是手枪……但是在咱们决斗以前，请你先教我怎样放枪法……我向来还没有握过手枪呢。

绿 救命吧，老天爷呀，可怜可怜吧……我去找园丁，车夫去……这真是天外飞来的灾难呵！（出）

史（检看着手枪）你瞧，手枪有几种……有一种专为决斗用的手枪，叫做毛及梅尔式。你这两支手枪是斯米特和维也生式的，是三响，子弹的发火点在中央……这手枪很不错，这两支手枪至少得九十个卢布……拿的时候这么样……（向旁）喂！眼睛！真是媚人的眼睛！

波 这样么？

史 不错，是这样……然后再搬起机头……这样的瞄准……头少向后一点！手伸直！很好……这么着……然后再用这个指头把这个小东西一搬就得了……不过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慌，瞄准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叫手摇动。

波 好……在屋里放枪不方便，咱们到花园里去吧！

史 走，不过我预先要声明的我要往空中放枪。

波 这个还不够吗？为什么？

史 因为……因为……这是我的事情，为什么！

波 你怯了吗？是的吗？呵——呵——呵——不，先生，你不要变卦！请跟我走！我的枪弹打不到你的头上总不甘心……这个头脑我真讨厌！你怯了吗？

史 是的，我怯了。

波 胡说！你为什么不想决斗？

史 因为……因为……我……我爱你！

波（冷笑）他爱我！他竟敢说我爱你！（指着门）请吧！

史（默然放下手枪，拿着帽子走去，走到门口站着，半分钟的光景，两人默然互相注视。后来他踌躇的走向波波瓦。）呵……你还生气吗？我简直像发了疯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这怎么说好……是这么一回事，你看，是这么一回事，到底……（叫

道)呵,我爱你,难道我还错了吗?(抓着椅子靠,将椅子破碎)怎么你的家具这么样脆!我爱你!你明白吗?……我差不多爱上了!

波 走开,我讨厌你!

史 呵!好美的人儿呵!我生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我上当了!中魔了!好像老鼠一样跳到笼里了!

波 走开,不然我就要放枪了!

史 放吧!你知道我死在你这双媚人的眼睛之下,死在这天鹅绒似的柔美的小手握着的手枪之下,我是何等的荣幸呵!……我情疯了!请你即刻决定吧,因为如果我从此出去之后,我们永远就不能见面了!决定吧!……我是一个贵族,是很体面的人,每年有一万元的收入……能射中掷在空中的铜钱……有很好的马……你愿意同我结婚吗?

波 (大怒,用手枪示着)决斗哟!决斗!

史 我情疯了!……什么也不明白了……(叫道)听差,拿点水!

波 (叫道)决斗哟!

史 我情疯了,爱上了,我简直好像小孩子一样,好像痴人一样!(握着她的手,她痛地大叫起来)我爱你!(跪下)爱得向来都没有这样地爱过!我抛弃了十二个女子,九个女子抛弃了我,但是没有一个我爱的能够和你这样……我被软化了,征服了……跪到你面前好像痴人一样和你求婚……真羞真耻呵!我已经发誓我五年没有爱过人,现在忽然柔情动了,跳到你的圈套里了!

我向你求婚,你愿意是不愿意?不愿意吗?那就算了!(起来急遽地向门走去)

波 等一等……

史 (站住)唔?

波 没有什么,走吧,走吧!但是,等一等……不,走吧,走吧!我讨厌你!可是,不……不要走!哈哈,你知道我是怎样生气,怎样生气!(把手枪掷到桌子上)握着这讨厌的东西把指头都弄麻木了……(气的把手帕撕破)你还站着吗?走开!

史 再见吧。

波 是的,是的,走吧!……(喊道)你到哪去?等一等……但是,去你的吧!哈哈,真气死我!走开!走开!

史 (走近她)我真爱你!爱的要发痴了!好像小孩子一样跪下来了……我浑身都抖颤了……(鲁莽)我爱你!我真爱上你了!我明天要去付息金,秋忙也到了,但是你……(搂着她的腰)我永远都不原谅自己……

波 走开！撒开手！我……我恨你恨极了！决……决斗哟！（作长久的接吻）

XI

同上人，绿克带着斧子，园丁拿着耙子，车夫拿着钁子，工人拿着扞子

绿 （看见一对接吻的人）老爷！（少停）

波 （睁开眼睛）绿克，告诉马房里，今天不要给多比倒铃铛麦了。

——幕下——

荒漠里

陶畏巨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俞平伯先生说，到过洋鬼子那里去的人回到礼教之邦来，便觉得葬身荒漠里似的。那里有精神生活！“物质臭”熏天的西方反即是艺术世界，你道奇不奇？那里……那里亿万重压迫之下的工会尚且有自己的俱乐部，有文学晚会。工人出厂洗洗油手，带上领带便上剧院去。何况……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一片黄沉沉黯淡的颜色，不要鲜丽，不要响亮，不要呼吸，不要生活。

霞影里的蜃楼，是我孤独凄凉的旅客之唯一的安慰。然而它解不得渴。在沙漠里水草是奇珍，我哪里去取水呢？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鲁迅先生虽然独自“呐喊”着，只有空阔里的回音；周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园地”，也长出几株异卉，哪里舍得给骆驼吃？虽然，虽然，我走着不敢说疲乏，我忍着不敢说饥渴，且沉心静气地听，听荒漠里的天籁。且凝神一志地看，看荒漠里的云影。前进，前进！云影里的太阳，可以定我的方向；天籁里的声音，可以测我的行程。（小叙）

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反而是圣皇神武的朝衣黼黻和看元妙真人的五方定向之青黄赤白黑的旗帜，招展在市侩的门庭。文学革命政府继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后，建设也真不容易。“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民族国家运动”在西欧和俄国都曾有民族文学的先声，它是民族统一的精神所寄。

“中国的拉丁文”废了，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请看：

“他们将如何？……他们欺侮我如狼欺侮一只小羊一样”。或者“本来，为这件，我和他们大伤情感”她……说。

“为这件”三个字，中国的人，尤其是说白话的人，向来不这样说。那“狼和羊”的一句，我念着都不能顺口，我若要背诵它，一定比《大学·中庸》难万倍，不用说

顺口说出来了。我似乎是个中国人，并且念念书的，尚且如此。我当初想这样的句子大概不是中国活人说的，然而那两句却偏偏括在引号“”里。呵！我明白了：这是翻译过来的。哪里有丝毫现实性和民族性。

小说里的“引语”至少要贴切说话的人，何况简直不成“话”。难怪四五年来的努力枉然抛弃。说鼓书、唱滩黄、廉价的旧小说、冒牌的新小说——他们的思想虽旧，他们的话倒是中国话，听来流利——仍旧占断着群众的“读者社会”。文学的革命政府呵，可怜你号令不出都门……这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期：不是伪古典主义，而是外古典主义。你什么时候走？我必定备盛筵替你送行（外古典主义）。

“我们应当说爱是人的；
我们可以说爱是兽的；
我们不能说爱是神的。”俞平伯

现在虽则有许许多多无聊的爱诗：“东君”变成了“安琪儿”，“弓鞋影”变成了“接吻痕”，花花絮絮蜂蜂蝶蝶依旧是飞着，不过稍稍练习了些 La Valse（转旋舞），飞舞时带些洋气罢了——可是我们应当承认近年来散文和小诗，确已经开始锻炼中国现代的文言。譬如朱自清先生的《毁灭》……

我们且专谈诗的内容——那诗的技术，本来不是我们不做诗的文学评论者所谈得的，像徐志摩先生，他能用中国话译曼殊斐儿，他自然就能长吟“幻想”。我们且不要献丑，只略谈，诗的内容——爱。爱真正不是神的，爱是人的。爱若是神的，便是说谎。禽兽之邦里的女鬼子往往说：“人难道是感情的主人”！就这一句话断送了一切法律道德宗教。她为的是不肯说谎。诗（Poe'sie）里强烈的个性，虽不能次次战胜，然而就是失败也有光荣。有这种个性，悱恻忠恕之苦心才能自见；若是心存着名教，自己对于爱敢说谎，还要说爱是“神圣的”，其实是计较心，哪里还有爱！“唱老实些罢！”

可是，老实要自己老实，不要替人家老实。

创造周报的滕固先生有一篇小说《乡愁》，真正说老实话：L夫人因为恋爱者的死而另嫁了。可是她的恋爱者竟没有死，是故意拍的假电，为了要完成她和L先生的好事，她发觉了……怎么办呢？滕固先生的艺术很好，也没有“外古典主义”，就这“L”一个字母（我想外国文的N城，尚且应当译成某城，何况中国人的姓），然而一个字是小事。虽然……外表虽然没有“外古典主义”，内容却有些嫌疑。

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这样空阔冷寂的荒漠里，这许多奋发热烈的群众，正等着普通的文字工具和情感的导师，

然而文学家却只……（爱的诗意）

劳作之声还远着呢。

现在正是“黄金”时代，有黄金便有甜吻。那手足胼胝的蠢人，哪里在诗人眼里！黄金时代开始，人格赖黄金而解放，恋爱赖黄金而自由，礼教赖黄金而摧残——黄金自己要制礼作乐。汗血虽然“漂杵”，诗人却立在杵上，正在乘长风破万里浪。可是世界的……可是挣扎在汗血里的也许有呼哧之声。譬如瞿秋白先生的《浣漫的狱中日记》（文学周报）：

“我们之后还有不少人呢，不说现在的工人不过多，国内此后要做工人的人更不知道几千万万万……杀得净么？”……“我们的同事，我似乎看见他们眼睛里……面色白得……白得可以显出我们这几万人的心，几万人的力量。……”

可是他说：“这张纸还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的，距今已有三千零六年，是一篇狱中日记的一页。单是这一个‘狱’字就很费考据……”是不是？还是离得现实很远，很古了。他的文笔也有些“外古典主义”，浅薄，浅薄！

劳工的诗人，你们问瞿秋白讨债去：为什么他做的题目如此，却写得那样难懂？“胫可断，肢可裂”——又何尝不是诗呢？只是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受尽了各方面的压迫，真正是“穷党”，那里该得起文化的……（黄金时代）

徐玉诺先生“问鞋匠”道：“鞋匠鞋匠，你忙甚？现代地上满满都是刺，我将造下铁底鞋。鞋匠鞋匠，你愁甚？现代地上满是泥，我将造出水上鞋。鞋匠鞋匠，你哭甚？世界满满尽是疽，怎能造出云上鞋？鞋匠鞋匠你喜甚？我已造下梦中鞋。张哥来！李哥来！一齐穿上梦中鞋”！梦中鞋是穿了，可惜走不出东方。我实在熬不住，不免续貂：

“梦中鞋是穿上了，

只是恐怕醒来呵。

张哥醒！李哥醒！

大家何不齐动手？

扫尽地上的刺泥疽，

那时没鞋亦可走”。

东方始终是要日出的，人始终是要醒的。

东方始终是要日出的，何必要登泰山？然而泰山上巨人的手指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徐志摩“泰山日记”）

东方有的是日，可是日在东方只照着泰山的顶，“那不过是山巅，日光所初照的；山下呢，还正是漫漫的长夜，无量数的穷无可告的……”（俄国美联兹夸夫斯基之“不是和平而是剑”）那些又怎么样呢？东方，东方！你如何独占了太阳？那普照的光明，只有在日中的时候。

东方的日始终是要出的，大家醒罢。东方的日始终是要正中的，大家走向普遍的光明罢（东方的鞋）。

一九二三年，十月，于扬州。

科学与人生观序

陈独秀

亚东图书馆汇印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无事，却很欢喜地作这篇序。第一，因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文化落后的俄国此前关于这问题也有过剧烈的讨论，现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进了步稍懂得一点社会科学门径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无常识的讨论了，和我们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不至于讨论什么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电线是不是蜘蛛精这等问题一样），而却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寿康先天的形式说，及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说）。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敌人方面却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出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这方面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我以为不但不曾得着胜利，而且几乎是卸甲丢盔的大败战，大家的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学概论讲义”，不容易看出他们和张君劢的争点究竟是什么，张君劢那边离开争点之枝叶更加倍之多，这乃一场辩论的最大遗憾！第二，因为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这两个缘故，我很欢喜地作这篇序。

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和人生观有什么关系，这问题本不用着讨论。可是后来科学的观察分类说明等方法应用到活动的生物，更应用到最活动的人类社会，于是便有人把科学略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类。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的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这些社会科学，不用说和那些自然科学都还在幼稚时代，然即是幼稚，已经有许多不可否认的成绩，若因为还幼稚便不要它，我

们不必这样蠢。自然科学已经说明了自然界许多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科学已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自然界及社会都有它的实际现象。科学家说明得对，它原来是那样；科学家说明得不对，它仍旧是那样；玄学家无论如何胡想乱说，它仍旧是那样。它的实际现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来在那里绕日而行，孟轲以后，渐渐变成了无君的世界。科学的说明能和这死板板的实际一一符合，才是最后的成功。我们所以相信科学（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也就是因为“科学家之最大目的，早摈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现象化之为客观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穷其因果之相生”（张君劢语），必如此而后可以根据实际寻求实际，而后可以说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死板板的实际，和玄学家的胡想乱说不同。

人生观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很显明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讨论？哈哈！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之本身，也可以证明人生观和科学的关系之深了。孔德分人类社会为三时代，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像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像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这种社会的实际现象，想无人能够否认。倘不能否认，便不能不承认孔德三时代说是社会科学上一种定律。这个定律便可以说明许多时代许多社会许多个人的人生观之所以不同。譬如张君劢是个饱学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尝学问的家族要去求符咒仙方，张君劢立意要延医诊脉服药。他的朋友丁在君方从外国留学回来，说汉医靠不住，坚劝他去请西医，张君劢不但不相信，并说出许多西医不及汉医的证据。两人争持正烈的时候，张君劢的家族说，西医汉医都靠不住，还是符咒仙方好。他们如此不同的见解，也便是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都是他们所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绝不是天外飞来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绝不是形而上的玄学可以说明的。

张君劢举出九项人生观，说都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而不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学所支配。今就其九项人生观看起来：第一，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纯粹是由农业经济宗法社会进化到工业经济军国社会之自然的现象。第二，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于农业宗法社会亲与夫都把子女及妻当作生产工具，当作一种财产，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手工已不适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拿家族当生产工具，于是女权运动自然会兴旺起来。第三，财产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产社会，人弱于兽，势必结群合作，原无财

产私有之必要与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单一性的张先生，生在那个社会，他的主观、他的直觉、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财产私有起来，怎奈他所得的果物兽肉无地存储，并没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变卖金钱存在银行，结果恐怕只有放弃他私有财产的人生观）；到了农业社会，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仓库，谷物又比较的易于保存，独立生产的小农，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没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到了工业社会，家庭的手工的独立生产制已不能存立，成千成万的人组织在一个通力合作的机关之内，大家无工做便无饭吃，无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没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已为少数资本家私有了，非将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大家只好卖力给资本家，公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第四，守旧维新之争持，乃因为现社会有了经济的变化，而与此变化不适应的前社会之制度仍旧存在，束缚着这变化的发展，于是在经济上利害不同的阶级，自然会随着变化之激徐，或激或徐地冲突起来。第五，物质精神之异见，少数人因为有他的特殊环境，一般论起来，漫说工厂里体力工人了，就是商务印书馆月薪二三十元的编辑先生，日愁衣食不济，那有如许闲情像张君劢、梁启超高谈什么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第六，社会主义之发生，和公有财产制是一事。第七，人性中本有为我利他两种本能，个人本能发挥的机会，乃由于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之不同而异。第八，悲观乐观见解之不同，亦由于个人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而异，试观各国自杀的统计，不但自杀的原因都是环境使然，而且和年龄性别职业季节等都有关系。第九，宗教思想之变迁，更是要受时代及社会势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教，依据所传神话，大都是崇拜太阳、火、高山、巨石、毒蛇、猛兽等的自然教；后来到了农业经济宗法社会，族神祖先农神等多神教遂至流行；后来商业发达，随着国家的统一运动，一神遂至教得势；后来工业发达，科学勃兴，无神非宗教之说随之而起；即在同一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产业进化之迟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随之而异，非洲美洲南洋蛮族，仍在自然宗教时代，中国、印度乃信多神，商工业发达之欧美，多奉基督；使中国圣人之徒生于伦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颂耶和華；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国穷乡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与狐狸。以上九项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哪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

梁启超究竟比张君劢高明些，他说：“君劢列举‘我对非我’之九项，他以为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十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梁启超取了骑墙态度，一面不赞成张君劢，一面也不赞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见是：

“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他所谓大部分是指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他所谓一小部分是指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他说：“既涉到物界，自然为环境上——时间空间——种种法则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项，固然不离物界，难道情感方面事项不涉到物界吗？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应，情感如何而起，这都是极普通的心理学。关于情感超科学这种怪论，唐钺已经驳得很明白。但是唐钺驳梁启超说：“我们论事实的时候，不能麝入价值问题”。而他自己论到田横事件，解释过于浅薄，并且说出“没有多大价值”的话，如此何能使梁启超心服！其实孝子割股疗亲，程婴杵臼代人而死，田横乃木自杀等主动，在科学家看起来，无所谓优不优，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无所谓有价值无价值，无所谓不可解，无所谓神秘，不过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应有之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乃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传说及一切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试问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这样举动，有没有这样情感，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意志？

范寿康也是一个骑墙论者，他主张科学是指广义的科学，他主张科学决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他说：“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绝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绝不是主观所应妄定”。他所谓先天的形式，即指良心命令人类做各人所自认为善的行为。

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一个人生在印度婆罗门家，自然不愿意杀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长家，自然以多杀为无上荣誉；一个女子生在中国阀阅之家，自然以贞节为她的义务，她若生在意大利，会以多获面首夸示其群；西洋人见中国人赤膊对女子则骇然，中国人见西洋人用字纸揩粪则惊讶；匈奴可汗父死遂妻其母，满族初入中国不知汉人礼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为耻；中国人以厚葬其亲为孝，而蛮族有委亲尸于山野以被鸟兽所噬为荣幸者；欧美妇女每当稠人广众吻其所亲，而以为人妾为奇耻大辱；中国妇人每以得为贵人之妾为荣幸，而当众接吻虽娼妓亦羞为之。由此看来，世界上那里真有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我现在举出两个证据：

第一，他自号存疑的唯心论，这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此所以张君劢说：“既已存疑，则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学，不应有丑诋之词”。其实我们对于未发现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说我们武断也好，说我们专制也好，若无证据给我们看，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

第二，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科学与物质文明，固然是十分糊涂，但丁在君把这个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离开事实太远了。欧洲大战分明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订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得来的。如果离开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排科学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造成这样空前的大战，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君劢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真有力量了。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十二，十一，十三。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瞿秋白

今年春夏间，《努力周报》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与张君劢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可是因为辩论所涉太广，我不愿意直接加入，弄得我的文章变成论战体（“pole’ mique”）的，读者反不易懂。我只说：“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所以我试一论“必然”与“自由”的意义——“That is the question!”

一、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之规律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历史。最显著的差异，便是：自然界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流动而互相影响。此中共同因果律的表现，亦仅只因为这些力量的互动。自然界里绝对无所谓愿望、目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里却大不同——这里的行动者是有意识的人，各自秉其愿欲或见解而行，各自有一定的目的。固然，研究各时代或各战役的时候，这一异点，应当特别注意，因为它对于人类历史有很重大的价值；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的进程之共同因果律。表面上看来，历史之中，虽然有人所愿望的目的，而实在还是偶然的事居多。所愿望的事能够真正实现的——非常之少。人的目的往往互相冲突反对，或者是根本上不能实行，或者是手段不足以实行。历史之中无数不同的倾向及行动互相冲突，其结果却与无意识的自然界毫无差异。凡行动都有所愿望的目的；然而此等行动之结果却往往并非所愿。即使表面上看来，结果与原定目的相符，而实际上此等结果又能引出非所愿望的事，决不能刚刚是人所愿望的。因此，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学的职任便在于发现这些公律。

历史的进程大致是：各人自求其目的而有所行动，于是无数人的行动互相牵掣推移而进展，便成历史。各人的目的和意志受愿望与见解的规定。然而直接规定愿望和

见解的各种影响，又各不相同。此等影响或来自外物，或出于思想：虚荣心，“爱真理及正义”，个人的毒恨，甚至于一切肉欲。然而一方面，我们已经说明个人的愿望决不能完全实现，所以这些愿望根本上便只有第二等重要的价值。别方面，却发生了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意志而能使移易方向；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反映于人的思想里而引起各种愿望？”

旧派的唯物论向来不设这种问题。他们的历史观实在是唯用主义（实验主义）的。可以分历史上的人物为“好人”与“坏人”，各依其所愿望为标准而断，研究的结果大半是好人吃亏而坏人沾光。于是就说历史发展中并无所谓“天道”——这算是唯物论！其实这种学说自己就反对唯物论。他以为思想的动机是历史事实的最后原因，而不去研究那思想动机后所隐匿的动机。这种学说的不一贯，不在于他承认思想动机之存在，而在于他不追究思想动机之后的最后原因。

历史现象的研究应当更深一层。英雄伟人以至于群众的动机，不论是显而易见的或是隐匿难见的，都不是历史现象的最后原因。最后原因却是造成这些种种动机的现实力量。黑智儿的历史哲学不承认个人的动机是最后原因，然而他承认是哲学思想的流派。他寻求最后的原因不在历史之中，而在历史之外。譬如黑智儿解释希腊史，他不细细考究希腊史实之间的联系原因，而说希腊史是真美个性之创造过程，说是艺术作品的实现。客观的唯心论之谬误，就在于此。

历史中之政治家的动机，不论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必定与最后原因相联系。个人的动机无论如何重要，总敌不过群众的动机，或是民族的，或是阶级的。所以研究历史的原因，必须追究群众动机的根源。然而群众动机，还不仅在于短期的爆发或涌动（如中国之五四运动时之群众心理），而在于能引起历史上之巨大变更的长期运动，所谓时代思潮，或是明显的有组织有意识的，或是隐藏的无组织无意识的。先细察此等动机——或是直接明了的，或是托之神秘幻想的——只要是能侵入群众及其首领（所谓伟人）的头脑的，都要研究，再进便求此等动机的最后原因。如此，方能发见历史进化里的公律以及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之特别公律。

二、自由与必然

既如此，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联系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决不能因为“不知因果”便说“没有因果”。

或者有人说：“若是承认一切现象，甚至于精神现象都是必然的，那就人的行为都成了盲目的不自由的了”！其实所谓“自由”（绝无因果）仅仅是尚未了解的“必然”。

“必然”的所以显着是盲目的，亦仅仅因为暂时不可了解。凡是可以了解的“必然”，就决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却在于能探悉这些公律。因为只有探悉公律之后，方才能利用这些公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而达某种目的。因此所谓“意志自由”，当解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若是否认因果律，就算自由，那真是盲目的真理了！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事实，则愈不自由。因为不知因果律，便无从决定行为，只有孤注一掷的赌博的侥幸心，而绝无所谓自由意志。“自由”实在是能克制自然及自己，然必以知悉自然的必要为根据。所以“自由”本是历史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最早的人，在昧昧时代，各方面都不自由，与禽兽无异。然而每一次的文化进步，都是行近自由的一步。人类历史的初步便是火之发明，发现机械的动及摩擦可以生热及火——到最近代的文明，却是变热力成机械的动。人类离自然而独立自由，完全在于探悉自然界的公律。人类历史的发展里，人若欲求得自由，欲求脱离社会现象之“自生自灭性”的压迫，而进于自由处置社会现象的威权，亦必须探悉社会现象里的“必然”的因果律。空言意志自由，甚至于否认因果律以立意意志自由——那简直是自相矛盾。

三、历史的必然与有意识的行动

资本主义时代的强有力的生产工具若能变成公共的财产，生产制度若得按照着社会关系而组织，那时，人类方能完全克服自然，才能完全制止自己的盲动。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方才能有意识地制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意志（社会的原因）方才渐渐的能实现。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为人类所支配而动的社会原因，方才能渐近其所愿望的目的。“这是从必然世界至自由世界之一跃”。

第一，应当明了“必然”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便说“必然”有种种程度的不同。譬如：必然要吃药，病才会好；必然要呼吸，人才会活；必然要到上海去，才能讨着债。这是所谓“附条件的必然”——假使要病好，我们便应当吃药；假使要活，我们便应当呼吸。人类经营生活，对外物有所动作，常常遇见这一种的“必然”：假使他要收获，他便必然要先种植；假使他要打野兽，他便必然要射箭；假使他要开动汽机，他便必然要积蓄热力。此种“附条件的必然”里，显然有“服从”的成分在内。人若能不费劳力，而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时他就更自由些。因此，即使人能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服务，那时，人仍旧是服从自然。然而这种对于自然之“服从”却是人类解放的条件。人若服从自然则对于自然的威权反而增长，人的自由亦就增长。所谓服从自然（必然），是说服从自然律。所谓征服自然，是说征服自然本身。组织有规划的社会生产时亦是如此。服从技术上及经济上的某几种“必然”，人便能破毁那受自己生产

品所支配的“作茧自缚”的怪现象，人便能得多量的真正自由。他的“服从”正是他的“解放”之源泉。

其次，所谓“必然”还有“障碍力”的意思。就是特别的一种力量，强迫我们不能照着自己的心愿去做，而只能做违心之举。这种“必然”的确是人的自由的对敌。然而应当知道：外力固然足以使事实与我们的的心愿相违异，可是他亦能使事实与我们的的心愿相适合。我们的的心愿，自己能成为一种外力。只看我们的观点如何。譬如“强迫地主无代价移让土地权于贫农”——这是一件事实，他对于地主，确是很可恨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贫农，却是他的自由意志之表现。至于“以相当报酬赎取土地于地主”——对于地主是自由意志之表现，对于贫农便是可恨的历史的必然。

于是可见“附条件的必然”和“障碍力的必然”都不是绝对与自由意志不能并立的，却是相反相成的。

再则，最重要最根底的问题，便是“因果的必然”。那“附条件的必然”是主观的行动，“障碍力的必然”是主观的受动。至于“因果的必然”才是客观的解释。或者以为社会发展既有因果的必然，便可以绝不行动，便无从有意识地去助长某种历史的发展。这种学说以为只有两种情形：“或者我认这种现象是必然的，不可免的，那便用不着去助长他；或若我的行动是引起这种现象所必需的，那便这种现象不能叫做必然的。谁又竭力去助长那必然的不可免的太阳之东升呢？”

虽然！太阳之东升与人类社会关系绝无联系，亦不是它的因，亦不是它的果。所以可与社会现象相对待。至于社会现象和历史，对于人类却不同了。历史是人做的。当然，人的意向不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可是，人所做成的历史偏偏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正因为其中亦有个“必然”在。既有这一“必然”，便有这“必然”的果——人的某种意向。此种意向再回过去做社会发展因素。“意向”并不与“必然”不相并立；不过意向亦受“必然”的规定罢了。

每一阶级倾向于求解放，行社会的变革，他的行动亦是这一变革的因。然而他的行动及种种意向又是某种经济发展的果，所以他自己亦受“必然”的规定。

社会学之所以能成科学，全在于他能解释明白人之社会的目的何故发生。社会的目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之必然的果，追寻他最后的原因，却在于经济发展。

既然知道历史的必然，人的行动就更可以“自由些”——更容易达到目的些。我可以看着自己的行动以为是某种必然的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种种条件之一。我的行动因此更有意识些。所以决不能因为既有历史的必然便不要有意识的行动。只有否认历史的必然时，方才真正否认社会学，否认社会科学，而一切社会运动都成盲目的无意识的侥幸行动。

四、理想与社会的有定论

理想是什么？普通人的答案是：“理想是目的，是我们道德上所不得不立的目的，可是因为太高了，我们不能达到。”所以有所谓“信仰理想”。其实“信仰”与理想绝对不相关涉。只有与现实毫不相关的理想，容得人家信仰。现在许多中国人都说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好极了，可惜不能实行。这种人是最信仰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反而是对社会主义怀疑的人，还想着些现实世界。那种颂扬社会主义的人，比警察可怕万倍。理想与现实之间必须有密切的联系。假使没有联系，那种理想便是幻象。譬如章士钊的农村立国之类，就是这种东西。社会主义的理想却密切联系着现实生活。真正的理想就是明天的现实。现在的现实是过去的果，亦就是将来的因。现实是流变不居的。既有流变，便有公律，依此现实流变不居的里面公律而后能预见将来的现实。这种将来的现实对于现在便是理想。假使没有这种必然的公律，哪里能发生对于将来的理想呢？张君劢先生以为自然界有“相同现象”可以做科学的对象。人类社会间则有英雄豪杰等，不能发现“同相”人，故不能以科学测度，这是很错的。科学的公律正是流变不居的许多“异相”里所求得的统一性。譬如雷雨前的天色实在没有一次是绝对相同的，然而亦不因此而不能求得雷雨的公律。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环境形势大相差异，然而并不因此而不能求得革命的公律。

因有公律可寻，所以才有社会理想。真正的社会理想只有根据于科学公律所求得的“将来之现实”。

既然如此，或者说：“一切英雄豪杰的理想家，所谓‘天才’，所谓‘创造’，似乎都是无用的，都是不足奇的了。”那却不然！从客观方面说来，现实的社会生活以至于艺术思想，从旧的变成新的形式，恰好用得着理想家或天才，他们是这种变革里所必需的“历史工具”。然而此等历史工具仍旧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科学的证据不在于孙文之类似罗倍士比埃尔，而在于孙文之不似罗倍士比埃尔。假使中国与法国革命前的经济制度及国际地位等绝不相同，而能生一孙文恰好与罗倍士比埃尔相似，那才足以证明社会现象之无因果呢。再则，从主观方面说来，英雄或天才能参加伟大的历史运动，能当得起历史工具，是很荣耀的事；然而他至少要能知道几分社会现象的必然公律。那自然现象的公律，若是没有物质，必不能有；社会现象的公律，若是没有人，亦决不能有。可是决不能据此便说个性可以不顾社会公律。

总之，社会现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这些因果律，则其意志行为更切于实际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后能开始实行自己合理的理想。

因此，“必然论”是社会的有定论（determinisme），而不是“宿命论”（fatalisme）。社会的有定论说明“因果的必然”，只有不知道“因果的必然”的人，方趋于任运的宿命主义，或者行险的侥幸主义。

五、社会与个性

社会的有定论说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在于经济，并不曾否认社会里的心理现象及个性天才，他仅仅解释心理及天才的原因而已。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里，人生派一让步到仅仅“情感是超科学的”（梁启超），再让步到仅仅“先天的义务意识是超科学的”（范寿康）。请问：戊戌以前的旧中国“儒者”遇着李贽、谭嗣同、梁启超之流，不由得不起一种极厌恶的情感，他们先天的义务意识是要请这班“大逆不道”的人上菜市口去砍头。现时的中国智识阶级却对这班“大逆不道”的人表历史上的同情，他们先天的义务意识是要请这班“先知先觉”的人进中国思想史古物陈列馆里去——这样的情感和和义务意识是否是超科学的，是否是先天的？当然不是！这都可以以科学解释其因果。最后的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变迁——从宗法社会到资产制度的动象能规定那社会的情感及义务意识的流变。

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含“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

社会现象变迁的程序大致可以说明如下：

- 一、生产力之状态；
- 二、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
- 三、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
- 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
- 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家之理想。

每种社会理想无不根据于当代的社会心理（时代的人生观）。然而社会心理随着经济动象而变，于是在这流变之中可以先发现一二伟大的个性，代表新的社会心理之开始（个性的人生观）。每一期人与自然界的斗争，由于自然的适应而生技术上的变革。于此斗争的过程里，得综合技术的成绩而成系统的智识（科学）。然而技术的变革，必定影响于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又渐渐确定新的政治制度，变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阵势。于是政治制度较稳定的时期，大家引用当时所已得及已承认的智识，便有大致相同的对于人生及宇宙的概念——养成当代的社会心理。如此转辗流变，至有新技术、新科学、新斗争之时，便能生新人生观。这是人生观所以有时代的不同之原因。再则，当

新的社会心理创始之期——政治制度受剧变之时，平素隐匿未见的阶级矛盾显然地爆发，伟大的个性能先见此新人生观，立于新阶级的观点而与旧阶级开始思想上之斗争。这是人生观所以有个性的（阶级的）不同之原因。

新阶级的群众对于某一问题，因其对于生产工具之关系相同，大致有同一的态度。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趋向，亦就不相上下。然而阶级的观点永久与经济环境相关，所以各阶级及阶级内，各“层”的观点必不相同，解决这一问题的趋向也就各自相异。此种群众的动机在阶级内有共同的解决问题的趋向，本来亦是经济原因的必然结果。况且在各阶级之间又有各种趋向的斗争，互相牵掣而各不能达，于是又落于第二次的客观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的“必然”如此愈演愈复，使各阶级的解决问题的趋向，所谓“意志”，亦愈适应而愈精密，能渐近真正的解决。可是，某一阶级利于有此必然的结果，别一阶级则否。因此，前一阶级的解决问题法日近于真理，而后一阶级的解决问题法便日远于真理。

个性孕育在社会里，它受当代社会心理的暗示，它亦受当时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影响。学者能发见当时社会里所已有的问题，虽然大家还视为当然的事，它却能发疑问。然而它不能制造出社会所没有的问题。佛经上的譬喻——若是梦见人头生角，那是因为醒时“此处见头，彼处见角”。人决不能梦见他绝对没有概念或印象的东西。解决问题的方法，亦只是当代所能有的种种手段。即使顶天立地的最伟大的个性亦决不能在孔子时代想着现代的共产主义。当代的社会心理有阶级的分化，个性能“自由”选择某一阶级的观点，“自由”趋向于某一阶级的解决问题法——当然依此个性之环境及性格而定。他却不能跳出当代社会而以他“绝对自己”的观点为立足地。尤其是一切道德善恶及所谓“义务意识”，完全建筑在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绝对的“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只能存在于无社会的矿物世界里，其实是无己可利。人类往往以利己主义出发而得利他主义的结果，一切利他互助主义都产生于利己斗争的过程里。所以社会里个性的动机在初民时代便是社会的；在现今有阶级的社会里便是阶级的，伟大的个性能超越阶级而“自由”选择观点，是因为这一斗争的过程显示了必然的因果律，使他不得不转移其观点于新阶级，结果仍旧是阶级的观点。所以个性的动机仅仅是群众动机的先锋，阶级动机的向导。

大致可以说：因生产力的状态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经济动向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足以为新时代的政治变革的种种因素中之一因素。历史的规律性便在于此。

然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适应新变化的个性能自己觉得历史流变之“必然的因果”，

那时，他方能超阶级而“自由”选择观点。至于阶级的社会心理亦因对于“必然的因果”之认识日益清晰，而能自化为人类的社会理想。初民个人依利己主义而向自然进攻。人与自然的斗争过程里发见自然现象的公律，能使他不得不结合共产部落而同进于较自由之域——实在是利他。无产阶级的“阶级个性”依利己主义而向现存制度进攻。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实在亦是利他。个性之于阶级，亦与阶级之于人类的关系相同。

总之，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智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借新科学智识，推广其“个性的人生观”使成时代的人生观。可是新科学智识得之于经济基础里的技术进步及阶级斗争里的社会经验。所以个性的先觉仅仅应此斗争的需要而生，是社会的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而已。他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他亦是历史发展的一结果。

各个性的努力足以促进历史的进化，正因为他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见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然律”及“社会律”同登“自由之域”。

譬如人不知道电气的公律时只有信电神，知道公律之后便能应用电气；人不知道资本集中律时，只能受它的害，知道之后便能应用此集中律以达无阶级无政府之共产社会。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

一、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应当先求之于社会的最后原因。不能以个人动机或群众动机作为社会现象的唯一因素，当再求此因素之因素。

二、社会现象确有因果律可寻，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律之“自由”。

三、人的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果，既成社会力量之后亦能为社会现象之因，然必自知此因果联系，人的意志方能成社会现象之有意识的因。

四、社会的有定论以科学方法断定社会现象里有因果律，然后能据此公律推测“将来之现实”——就是“现时之理想”。

五、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实的实质”——经济，由此而有时代的群众人生观，以至于个性的社会理想。因经济顺其客观公律而流变，于是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出适当的个性——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

历史的工具运用“必然”的公律——由个性而阶级而人类，由无意识而有意识

——成为群众的实际运动。群众运动的斗争正需要此历史的工具，社会的实质亦已能产生此历史的工具，于是方开始从“必然世界”进于“自由世界”的伟业。

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

蒋光赤

一、人类之由来

数千年来，圣经上神意创造宇宙之说，深入人类的脑海。十九世纪之初，许多学者尚以为动植物之种种类，皆为神意创造之结果，自古至今，永远存在，亦不增加，亦不减少。从自然科学昌明以来，人类生活形式之发展了然，才一破向来经典之谬说。现代科学指示我们，动植物的种类皆非常态不变者，现代动植物的种类，皆为其前代动植物的种类之改良蜕变的后裔。因为环境的影响，从前的许多种类，现在都消灭了，亦有蜕变而成别一种类的。适者生存，自然淘汰，动植物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死亡成败的过程。

科学指示我们，人类并不能超出动物界的范围，他不过是生物种类发展上之最后的一位。人类属于动物界，在等级上——属于哺乳动物的一级。在此阶段内，人类占第一位置，而还与猿猴立于一血系内。人类与类人猿或者是共同的祖先。

二、动物状态中之人类

人类从何时起，方自低等动物的形式进于高等动物的形式——人类——我们现在实难猜度。不过有一件事却不必疑虑，就是人类，和别的动物一样，他的生理发展之过程很快，逐渐改变身体的外形。人类在此发展的过程中，前部的两肢变为手的形式——异于别种动物。唯有此手的机关后，人类超出动物界的历史才能开始。人类利用此手的机关为生存竞争之最利的工具。因生存竞争，遂造成人类之协作的和社会的本能：我们知道原始人类取得自己生活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合群打猎，而不能单独行动。因为身体机关的进化，生产工具有改良的可能。在劳动的过程中，在复杂协作的新环境之中，人类的社会本能日渐增长，而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原始的宗族共产主义

人类社会之始，人们皆过小共产村或小宗族的生活，如现在非洲、澳洲一些野蛮民族生活一样。照着古代的遗传和对于现在野蛮民族的考察，就知道当时的小宗族之

经济的生活是共产主义的：共同劳动——渔猎；共同消费——平均分配所得之物；共同防御敌人和猛兽。在这些小共产宗族里，一切物件都属于公众，而没有私产存在。

后来，原始共产主义消灭，仅留一点原始人类生活之追忆。在十八世纪的文学中，到处歌颂此黄金时代，人类自然的生活。其实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非常之狭小，此一宗族与其他宗族互相仇敌。其基础建筑在原始的生产工具之上面，不如现代的共产主义以世界的经济为基础，范围包括全世界的人类。在原始共产社会之中，没有分工，差不多人人都做一样的工作。除能得到最低的生活品而外，没有点儿剩余。原始的共产主义是退后的，穷困的，个性和经济组织不发展的共产主义。故至劳动工具改良，经济生活形式增高的时候，原始的共产主义自然就消灭了。

四、父权（或家长政治）的宗族共产村

工具改良，人类逐渐发展，简单的经济形式——渔猎——应当让出自己的位置与较高的经济形式。采取食物的方法变了，原始的人们不仅屠杀禽兽，并且驯养之，不仅利用它们的肉，并且利用它们的乳毛。于是畜牧成为较高的经济形式了。畜牧需要较复杂的协作和分工。经济的组织既复杂了，于是在此畜牧的共产宗族里，就需要生产的组织人，管理和分配一切生产的工作。此种组织人就是家长 Patriac（patep 是父的意思，acp 是权的意思）。然而因为畜牧劳动的生产率之增高，于是就利于获得邻近俘虏，强迫之做看守畜牧的工作——奴隶因之发生（数量还小）。畜牧共产村内，逐渐起了分化，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从战争强夺而来）亦因之发现。

五、固定农业之发生

人口的繁殖和人类社会消费的增长，需要比猎牧较高的经济形式。到了某一发展的程度，社会开始生产这样的工具，用之可以从土地中取得生产品，并且利用驯养的兽类耕犁土地，于是农业因之发生，而固定的经济形式成立。然而畜牧与农业的混合之时间，还是非常长久得很。

自从农业发生后，此种共产村内，起了阶级的分化：有土地多者，土地少者，无土地者。奴隶劳动更给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内的可能。虽当此时公共的财产如森林牧场还有保存者，在经济生活上却不占重要位置。阶级斗争的景象已经非常得剧烈。

六、固定农业之发展的方法

人口繁殖，需要生活工具的源泉——土地——之增加供给。使土地增加供给有二方法：一、改良农业生产的工具，仍在原有土地的领域内加一番较好的耕种；二、扩张耕种土地的领域。人类很长久地走着第二条路。固然在几千年之内，不能说农业工具没有〈一〉点儿改良过，然而此种过程非常得迟缓，有时我们看得出农业工具退步（如罗马帝国时代）。就是近一世纪来，城市工业用伟大机器生产的方法，而在农业中，

十分之九还是伏在旧生产方法之下。

七、固定农业的经济基础上之社会关系

我们在最初期的社会史内，已经看出共产村之阶级的分化。此种阶级分化的现象至固定农业时代，更较显明。贫与富和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甚清。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虽然森林牧场等等尚属一宗族而非个人，然而土地私有权同时已经存在了。土地私有，不自由的劳动发生，奴隶制度因之成立。因为有了奴隶的劳动，富者愈可扩充自己土地的范围，故日益富，贫者因竞争不敌，故日益贫，并且有许多失了土地。

土地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因之土地的贵族阶级发生。有时因为战争的缘故，农民多数要向战争服务，逼不得已把自己的土地贱卖给于大地主。大地主因为利用奴隶的劳动，日益扩充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成为一完全统治的阶级。于是社会上之对立的战线就成为两个互相仇敌的阶级：大土地占有主与奴隶了。

八、奴隶私有制度下之社会阶级

在奴隶私有制度的社会里，劳动阶级并不仅仅由奴隶构成的。除了奴隶，还是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不过此时生活的形式已经属于奴隶和奴隶领有者之中间的关系了。奴隶劳动在每种经济范围以内，都占重要的意义，而非奴隶的劳动，都失去旧有的意义。然而到了此时的奴隶，又与从前的奴隶不同：从前的奴隶——如在希腊哥墨时代——在共产村内或农人家庭内，所过的生活几与农人一样，而现在的奴隶生活却与劳动的家畜无异。

奴隶占有者不仅仅是地主，并且有时商工业的阶级亦成为奴隶的占有者，因为奴隶劳动非常便宜的缘故。

总之，在私有奴隶制度之经济形式下面，土地的或一小部分财政的贵族是统治的阶级，而奴隶是被压迫的阶级，无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

九、罗马文化之衰落

欲明了欧洲中世纪文化之发展，则应知罗马兴亡之因果。罗马建国基于农民。纪元前五世纪至纪元前一世纪，四百年中间，农民竞争自己经济的生存和政治的影响甚烈，然终陷于失败，因所争者属于小部分自由人民的利益。当时农民帮助统治阶级之侵略政策，从事战争，失去自己私有的土地。有许多农民惯于战争，不再回转做劳动的生活，完全成为兵士。失去体力，不能服务军事，这些前为农民而后为兵士的分子陷于穷困，只得跑入城市——构成无产阶级的队伍。农民经济亦衰落至极，有许多农民自己情愿附属于大地主树荫之下，渐流入农奴的地位。

罗马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游民的无产阶级，与现代的无产阶级不同。现代的无产阶级为经济的中心，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却为社会的寄生虫。当时罗马的工业范围甚小，且筑

在奴隶劳动上面。故当时的无产阶级不参加工业经济的生活，而为流民。因为失土地的农民增多，解放的奴隶增多，都加入游民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城市简直成了消费者的大场合，与现代的城回(?)大不相同。

当时统治的阶级——土地的贵族之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增加奴隶的数目，扩大土地的范围。在此时期中，技术不但没有改良，反而日形退步。现代的资本家欲扩充自己的利润，趋向技术之改良，而古时奴隶的占有者以战争为增加收入唯一的方法。罗马的统治阶级既征服东方各文明国家之后，不但取其财富，并虏其人民奴隶之，此种奴隶的知识高于主人，于是主人付之以管理国家的事务和私有的经济，而自己惯于骄侈奢侈。于是统治的阶级渐失去管理的技能。

技术既不改良，而奴隶的生活又非常之苦，无工作的兴趣——因之奴隶劳动的生产率低降不已。奴隶劳动渐渐失去意义，对于奴隶占有者无大利益，于是释放奴隶的时期到了。奴隶劳动的生产率低降，结果使奴隶制度的经济一定衰落。

奴隶经济消灭，因之罗马的文化亦就消灭了。

十、封建制度

古代奴隶私有制度消灭之后，封建制度 *feudalism* 因之发 (*feud* 即土地的意思)。贵族、武士或地主从国主或大诸侯领取土地，作为自己功绩的赏赐。此种土地分与农民耕种，农民每年对于地主一定要纳交若干租课，服从若干日期。

封建制度发展成为经济的形式，约在九世纪。封建制度之发生，实为奴隶私有制度崩坏后之不可免的结果。在德意志等国，所缺乏者非土地，而为耕土地的人，凡是地主都想把持农民固定在自己手里。因为战争等种种的关系，农民欲避免苦役不得已付给地主部分的出产品，托荫于其保障之下，因之农民渐渐失去个人的自由，变为农奴了。

农奴与奴隶的还(?)别，不仅在被压迫的程度之深浅而已。在某一期中(如在家庭奴隶时代中)奴隶的生活实较农奴为善。最重要的在经济上之差别：农奴有自己的经济，有土地和家属；而奴隶无之。除此而外，农奴结合于自己共产村之内，有时拒绝主人的贪求。中世纪很有农奴和地主之斗争的事实，有时农奴脱去地主的压迫，而为自由的农民。

初期封建制度的经济全为自然经济，每一“经济”消费许多，即生产许多，纯为一种闭关的形式。交易的行为，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没有。当时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并没有十分苛刻的性质，到了商业货币经济发现之后，地主趋于奢侈，有严苛剥削农民之可能，于是农民经济生活状况困难已极。农民尽力出卖自己的产品供给地主的金钱需要，然而农民的生产有限，而地主的需要无穷。从农业经济所榨出的金钱大部分落于商人之手，商人经过地主剥削农民，实为农民之敌。商业资本主义尽力帮助城

市之解放，而对于乡村，则尽力使其居于奴隶的地位。

货币经济发现，农民流于破产。从十四〈世〉纪起，农民暴动的潮流漫布全欧。封建制度建筑在农奴经济基础的上，农奴经济既破产之后，封建制度当然消灭，于是在中世纪社会腹中发生一新势力，此新势力即中世纪的城市，为新社会的创造者。

十一、中世纪城市

城市之发生，在德意志诸国，均从八世纪起，而在欧洲其他国家中，有时前一点或后一点。城市大半都从诸侯的乡村出来的，有种种的原因——或者附近诸侯的宫院、住所，或者地理上的位置便利。商人、手工业者皆群集于此便利的地方。人口日渐增加，经济的关系日渐巩固，于是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居民差不多完全由手工业者和商人所构成。在初期他们还附属于诸侯，贡纳诸侯以货币的租税，后来他们渐向诸侯用若干的金钱赎出自己的义务，比较地成了自由的人民。当时城市成为逃亡所，谁个跑出宫院逃到城市，即开始同诸侯奋斗，脱去农奴的地位。在此种奋斗之中，手工业者占主要的位置。结果，城市所以终久能战胜者，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城市财富（商业资本）之增长，别方面是手工业者行会组织之坚固。手工业者行会之初组织时，不过带着管理生产的性质，后来成为竞争的组织。它的发生约在七世纪或八世纪。

当行会发生初期，每人皆可成一手工业者。虽然每一手工业者手下有助手学徒，然而此种助手学徒，差不多是主人家庭中之一员，并没有什么仇敌的关系。自从商业渐渐发展，城市财富增加以来，行会成为专制的阶级的组织了。行会闭起门来把助手学徒推之于门外，加之以苛刻的条件。一方面行会拒绝其他初到城市者之加入。此种被拒绝之人因为之无工具物料等等，只得跑到其他手工业者手下，做成雇佣。向之手工业者到了现在，自己不工作了，变为督监的主人，而向之助手，一变而为被剥削的雇佣的工人，绝对没有能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希望。于是助手与主人间之斗争以起，在十四纪时，助手时有罢工的举动。助手亦组织一联合会与行会对立，不过此种联合会之重要的目的，在于互助通融而已，对于奋斗无甚大用。并且此种助手联合会都是闭关的，他们毫不觉到和其余被压迫的助手们应当有阶级的固结。

十二、商业资本主义

在中世纪城市中，商业阶级占重要的势力。此阶级旧日大半由农奴而来，当城市反对诸侯之时，他也是一个极力的参与者。封建的割据大有碍于商业阶级之行为，故商业阶级趋向帮助王权，反对诸侯，力求统一国家。

当时商业阶级不以一东方市场为满足，开始寻觅新市场，最醉心渴慕者为唯一的印度。此种寻觅的结果，发明许多新土地。此种新土地与其人民乃成为剥削的对象：戕其人民，抢其宝物，种种野蛮的方法，可以说当时的商人都用尽了（此时期所谓最

初积累的时期)。然而商人徒贩卖他人的商品,生产机关不在自己的手中,总觉不能厌
望。等到积聚丰富的时候,商人不愿限于商业的行为,于是趋向占有产业,自己组织
产业,扩充自己的利润。中世纪的法律、规例和风俗皆阻碍新阶级之占有产业,因此
商业阶级趋向于工业资本之路,绝对仇视中世纪的制度,如地主政权、行会组织等。

十三、工业资本主义

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必先具两个条件:一、充足的金钱资本之积蓄——为了多雇
工人,供给生产消费之用;二、自由的工力——无限制的工人数目,可以自由购取。
唯在此两种条件之下,工业资本才能一方面尽力扩张生产的范围,别一方面尽力剥削
工人,取得丰富的利润。

金钱资本之积蓄已经完成在商业资本的时期。工业资本之能取得自由的工力,则
是封建社会破坏后自然的结果。农民经济破坏,农民穷困已极,结果使多数的农民不
得已抛弃乡村,跑入城市,寻觅维持生活之职业。农民经济既然破坏,地主亦就愿意
把农民放入城市,自己(地主)另寻其他土地生产的方法。在英国十四纪之初,地主
自己占据土地,做牧羊的事业,驱逐农民,使不得不成群结队离开土地。此种被驱逐
的农民一时寻不得职业,都流为盗贼流民。无工作、无土地的无产阶级日增一日,虽
当时统治阶级尽力禁止此种无产阶级之行动,任意惩罚他们,然而终无大结果。这些
无职业的群众对于工业资本非常得有利益,他可以尽力选择,任意购取。然而此类
的群众皆无技术的训练,自然难与熟练的手工业者竞争。工业资本家因想得出路,遂
组织“手工业工场”(Manufacture),在此手工业工场内,每件商品皆由很细的分工制
造而成,并非一个人从头到底的工作。此项分工不一定需要很熟练的工人,并且劳动
生产率亦因之大为增加。此种手工业工场可以算后来的工厂雏形。

手工业工场虽然增加许多生产率,然而因为只是人力的工作,总有一定的限制。资
本主义趋向无止境地扩张生产范围,当然不能以手工业工场为限。因此,工业资本家
竭力趋向机械力量之利用——于是机器生产的时代开端了。

在英国(各国亦然),工业革命发生,社会经济变为机器大生产的形式,旧时的小手
工业几破产无遗。此类小手工业者既破产之后,或者变为工厂的无产阶级,或者变为无
职业的流民。资本家在此际要用多少工力,就有多少工力。工作的时间延长到极度,工
资亦低不堪言。机器工作因为仅仅看守指拨轮机,所以不尽需要成年工人与男工,妇女
儿童亦可工作,加之妇女儿童的工资较成年的男工为低,对于资本家非常得有利,于是
女工童工反把成年的男工挤去了。自有机器生产以来,资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劳动
阶级完全陷于奴隶的地位。若长此资本主义存在下去,人类文化将有灭亡之虞。欲拯救
人类文化出于灭亡之祸,则除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而外,无他出路!

社会之现在与将来

周佛海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比较的研究)

一

凡是要知道一件事物的特质，比较的研究是最要紧的。要知道一个东西是白的，必要一些青、黄、红，黑等东西和它比较；要知道一个人是身長七尺，必定要一个身長六尺、五尺，或八尺的人和它比较；要知道象是大的，必定要一个小鼠和别种小动物和他比较。物件是这样，社会现象也是这样。要知道自由劳动（Free labour）的特质，必定要奴隶制度（Slavery）、农奴制度（Serfdom）等制度和它比较；要知道大家庭组织的特质，必定要小家庭组织和它比较。诸如此类，数不胜数。那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又何能逃出这个公例，而为例外呢？我们要知道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特质，最好拿它来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相比较。由此我们不单是可以知道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特质，并可以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所以我现在把它们两者相互比较一下，以明它们各自的特质。但是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事实判断，不在价值判断，明白地说：就是在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实在，并不在说明它们的是非。读者如要明白它们孰是孰非，请根据下面的叙述，自己去判断罢。

二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本有许多的区别。但是归根结局，只在下述的一点。因为有这一点根本区别，所以就生出各方面的差异。

所谓根本区别，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下，社会对于其成员（Mitglieder, member）的物质生活，有意识地承担责任。而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下，社会对于其成员的物质生活，不负责任，让他们各自自己去负。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下，社会保证各个人的经济生活，务必使各个人不受饿寒冻馁；而在资本主义经

济组织之下，社会不保证各个人的经济生活，各个人或饥或寒，或死或活，听其自便，社会毫不过问的。既有这个根本的不同，所以就发生了许多的区别。

第一要说的，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一对于各个人负物质生活之责，一不负这个责任，所以他们生产的物质，也就不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下，最重要的是生产生活必需品，而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下，最重要的，是生产奢侈品。因为前者既对社会中各个人的物质生活，负充分的责任，那么，非到社会中各个人，全体都有了粗布粗食，就不能生产膏粱文绣。后者对于社会中各个人的物质生活，既不负责，那么，就是社会内大部分的人没有衣穿饭吃，只要富者需要，他们还是去生产膏粱文绣。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的生产，首在生活必需品，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则在限制生活必需品。此事已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的拙著上详细说明，所以此地不再重说，请读者去参看。以下再把他们两者之间的几个区别说明一下，以明他们各自的特质。（以下所说明的，主要根据 Pohle's *Kabitalismusund Sozialismus* 一书，及我们的先生河上肇博士的意见的。）

三

除去上述的区别之外，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一区别，就是支配社会成员的经济生活的法则不同。在社会主义组织之下，支配各个人的经济生活的是意识的法则，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支配各个人的经济生活的却是无意识的法则。然而这个区别，就是从社会对于其成员的物质生活，负责与不负责而发生的。

社会设若是社会主义的组织，社会就有保证其成员之物质生活的责任。既有这个责任，则一切物资的生产和分配，就不能不由社会来支配了。社会欲支配这些经济生活，就设一定的机关，以为其意的表现者。这种机关，在共产的氏族之下，就是氏之长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下，就是人民委员一类的机关。劳动应该怎样分配，生产物应该怎样分配，换句话说，就是某类人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的结果，应该怎样分配于各成员之间，都是在社会机关的中央管理（Central control）之下，秩序整然的安排好了的。所以各成员自己意识他是一个生产共同体（Produktionsgemeinschaft），而入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这个社会之下，社会有一个意识的共同目的。各成员都认识这个共同目的，互相结为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这些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直接的和有意识的社会关系。详点说，就是各成员的经济生活，都是由社会机关直接的且有意识的而决定的，并不是根据各个人之私的意思的种种行为之无意识的结果。简单说，就是在社会主义组织下，各成员的经济关系，是受社会机关所决定之意识的法则所支配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情形就大不相同。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对其成员的经济生活，不负责任，所以就没有管理和支配其生活之必要。社会的成员，生产何种东西，生产多少，各让他们私的意志去解决，社会毫不过问。生产的東西之分配于各成员之间，社会也不去管，只不过是各成员以自发的意志而行的相互交换买卖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生产物的分配，是由各成员间相互之交换而行的。各个人各自独立生产一定货物，而互相交换，以为所谓无意的分业（Unconscious division of labour），于是才联络成一个社会，并不是社会有一定的机关，预先定下计划，以管理社会全体的生产和分配。所以社会中各成员的经济生活，并非统一于有意识的预定的某种计划之下，而完全为无政府的。然而虽是无政府的，还有相当的秩序，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各成员因私的交换，而生出不绝的联络，所以支配他们各自行动的秩序，就自然的成立于其间。但是这些秩序，并不像社会主义组织之下，是由社会机关有意识的决定的，乃是社会各成员，仅有意为各自的经济利益，互相凑合而得无意识的综合现象，所以这种秩序可以叫做自然的秩序（Ordre naturel）。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组织下各成员之经济关系，是为一种不为任何人所规定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

支配社会各成员的经济生活之法則不同，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第一区别。

四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二差异，就是经济道德的原则不同。前者以利他主义为经济道德的原则，后者以利己主义为经济道德的原则。但是这也是从社会对于各成员的经济生活，负责与否而生的。

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经济生活，是不负责的，其责任由各人自己去负。所以经济道德方面，就自然是利己主义。因为社会如果保证个人的经济生活，那么，自己的生活就得安全，有暇谋别人的利益。然而社会不保各个人的经济生活，所以各个人于考虑别人的利益之先，不得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要为别人谋生存之先，不得不先保全自己的生存。自己没有衣穿，没有饭吃，而为别人谋衣食，社会又不保证自己的衣食，那就非陷于饥寒交迫不可。所以各人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不顾别人的死活，在道德上就不得不承认了。如一方面社会不保证各个人的经济生活，一方面又不许他们各自追求私利，那就是社会组织与社会道德不相容了。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有适应它的道德原则。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利己主义，是承认为道德的原则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组织之下却不然。社会对于各个人，既负其经济生活的责任，各

个人就无须追求己利，而不顾他人了。既不需专为己谋，若还取经济的利己主义，在道德上当然就该排斥。所以在这种组织之下，是以利他主义为经济道德的原则的。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第二差异，就是经济道德的原则不同。

五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三差异，就是经济政策上的原则不同。前者以自由放任主义为经济原则，后者以管理主义为经济原则。但是这也是从社会对于各成员的经济生活，负责与否而生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下，社会对于各成员的经济生活，就不负责，而使他们自己去负，那么，社会就不能干涉他们的经济生活。因为各个人既对于自己生存，须自己负责，那么，行动就不可不自由。所以近代社会里面，国家对于国民的经济生活，是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的干涉和束缚，实为例外。生产何种货种？以什么方法而生产？生产多少？以及消费什么货物？以什么方法而消费？消费多少？这些问题，一般在法律上，都是各个人的自由，国家不加干涉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组织之下却不然。社会对于各成员的经济生存，既负积极责任而保证，所以社会的意识机关，对于社会全体的货物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就不得不直接管理。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保证社会全员的生活。

总而言之，经济政策上的原则不同，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三差异。

六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四差异，就是关于生产手段的支配原则不同。前者以公有制为支配生产手段的原则，后者以私有制为支配生产手段的原则。但这也是从社会对于各成员的经济生活，负责与否而生的。

在社会主义组织之下，社会对于其成员，既保证其经济生活，那么，就不可不有保证其生活的物质了。要保证人不饥，必具有相当的食粮；要保人不寒，必具有相当的衣服。如不具有必需的物质，虽然要保证，也无从保证。但是食粮衣类等物质，是由生产得来的。所以社会要达其保证各个人的物质生活的目的，就非社会自己营相当的生产不可。然而要营生产必需生产手段。所以社会要达其生产的目的，就非相当的使生产手段归公有不可。因此社会主义对于支配生产手段，是以公有制为原则的。

然而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情形就完全不同。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是不负责的，要他们自己去负。各个人既要负自己生活的责任，就不可不有维持生活的资

料。要有这个资料，就不得不营生产。假使一切生产手段，都归公有，个人不得自由处分，那么，个人不能生产维持其生活之物质，怎样能够生活呢？所以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下，原则上，生产手段是归私有的。其所生产的物质，也归各个人私有。社会的意识机关，只以保护这些私有财产的安固为任务的。因为社会既使各个人各自负其物质生活的责任，就当然要使他们各自所有财产，而保其财产安固了。

总而言之，支配生产手段的原则不同，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四差异。但是有许多人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在废止生产手段的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此实似是而非之议论。废止生产手段的私有，而使之成为公有，不过是达目的的手段，并不是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保证社会中各个人的物质生活的。

七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五差异，就是关于生产的目的、原则不同。前者是自足的生产，后者是营利的生产。但是这也是从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负责与否而生的。

什么叫做营利的生产？就是生产的目的，是在获得利润。什么叫自足的生产？就是生产的目的，是在满足欲望。详细地说，就是：欲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生产，其生产上的损失归各个人自己负担，其利益归各个人享有的，叫做营利的生产。自足的生产，如就社会全体说，（因为一社会之中，现在的家庭内，是营的自足的生产）就是：欲满足自己的消费而营的生产，其生产上的损失，则由社会全体成员负之。

资本主义组织之下，社会对于各成员的物质生活不负责，要他们自己负，所以生产就归私人经营，生产手段也归私有。生产既归私人经营，那么，生产上的损失当然归各个人自负，生产上的利益，当然归各个人享受了。又，各人虽因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生产（因为社会不负维持的责任），然而却不能生产一切自己所必需的种种物资。只于这些物质之中，选一二种生产，以应顾客的需要，而自己又为别人的顾客。大家都为出卖而生产（Prodazieren zurverkaufen），就是营利的生产之特质。

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下，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是要负责的。所以生产的目的，不在出卖而获得利润，是在消费而满足各成员的欲望。所以他的生产，是自足的。

生产的目的不同，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五差异。

八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六差异，就是社会对于其成员的

生存权，态度不同。前者是认各个人的生存权，后者否认各个人的生存权。但是这也是从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负责与否而生的。

什么叫做生存权？就是社会的成员，对于社会主张自己的生存的权利。各个人于物质上陷于不能维持其生存时，得向社会主张生存权而要求其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不负责任，须由自己去负，所以各个人于物质生活陷于绝境时，没有向社会主张生存的权利。贫穷的人请求社会周济，社会应与不应，可以自便。社会没有周济贫民的义务，贫民没有受社会周济的权利。如果周济救助，乃是发于慈善心，而非发于义务心。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之下则不然。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既负责任，所以各个人当然有向社会主张生存的权利。社会须维持其各成员的生存，乃是社会的义务，各成员受社会的维持，乃是他们的权利。譬如在现在的家庭之内一样。现在家庭内部，大体是行社会主义的。所以老幼残疾都有要求扶养的权利，而一家也有扶养老幼残疾的义务。这就是家庭的成员，得向家庭主张生存权。把这个家庭的团体扩大起来，就可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了。

总而言之，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生存权的态度不同，就定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第六异差。

九

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差异，大致已如上述了。但是这些差异，都是从社会对于其成员的物质生活，负责与否而生的。所以归根结局，他们两者的根本差异，就是前者对于社会各成员的物质生活负责任，后者则否。但是上面所谓社会对于各个人的物质生活负责任，所谓保证各个人的物质生活，并不是说社会一定使各个人过安全而丰裕的生活的。有时社会或竟不能保证，无由负责，使社会成员都不能维持生活。例如水旱大灾，农产物完全无丝毫收获之时，社会就尽其全力，也不能保证各成员的物质生活。所以所谓负责，所谓保证，乃是对于社会全体成员负责，乃是一样的保证成员的物质生活，不使成员之中，一方面有饱欲死的，一方有饥欲死的。物质资料充分时，大家一样的过丰富生活，物质资料缺乏时，大家一样的过穷困生活。所以与其说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保证各成员的物质生活的组织，不如说是生死与共，存亡与俱的社会组织。如以俗话来说，就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社会组织。这种特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之下，是看不见的。在这种社会之下，我们只看见“享福”的是一辈人，“当祸”的是一辈人。“享福”的人因为有别人“当祸”，才得“享福”；而“当祸”的人因为有别人“享福”，所以才陷于“当祸”。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特质了。

十

价值判断，要以事实判断为基础。资本主义在今日，是否还是应该维持的，社会主义在今日，是否是不能不实现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白资本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何物。上面所述的，其目的就在说明他们的本质。请读者由他们的本质，而推论他们的是非。

本来社会主义，在前几年已经风起云涌地鼓吹过，而且激烈地辩论过。时至今日，已是实行运动的时代，不容我们从容坐谈“我们为什么主张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是什么”一类的空论了。但是觉得赞成社会主义的，还有不少盲从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还有不少狂吠的。所以特把它和资本主义比较一下，以明两者的特质。尚望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两方的人，都过细思虑一下。

一九二三，十，十二，上海旅次。

列宁论

张秋人 译 腊狄客 (Karl Radck) 著

列宁之生长而成今日之“列宁”，正和小孩子长成大人一样。有一次，他看见我，适我正在浏览他方才出版的一九〇三年所做的文集，他笑着说：“读一读我们从前是怎样的笨伯(?)，倒也很有趣的!”但我并不要在这里把列宁十岁或三十岁时的脑筋和他主席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种会议或人民委员会会议时的脑筋相比较。这里，并不是把列宁当一个首领的问题，不过把他当一个平常的人罢了。亚克谢勒罗德(Axelrod)——少数党的祖宗之一，切心刺骨地恨列宁。他和我的辩驳之中，有一次说到列宁第一次如何到外国去，他如何同他散步和洗浴。他曾想借此使我信服多数主义之有害，尤其是列宁。他说：“在那时，我曾觉得这里有一个人，他将来会做俄罗斯革命的首领。他不仅是一个学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者多着呢。而且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和怎样地去做。他熟悉俄罗斯的国情”。亚克谢勒罗德是一个恶劣的政治家，因为他不懂国情。他只能在自己的研究室中推求理论，他一生的缺憾就是：在俄罗斯没有劳动运动的时候，他想出议论，以为应该有这样的劳动运动发生；若劳动发生适与他的议论不同，他就要老羞成怒了，现在，他还是向着这个不服从的小孩大发其怒呢。但是，人们往往批评别人，而所批评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缺点，所以亚克谢勒罗德说及列宁自以为聪明过人的地方，正是列宁所以能做首领的特点。

不知劳动阶级的历史，而做劳动阶级的首领，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劳动运动的首领，必须知道劳动运动的历史。若没有这种知识，便不配做首领。譬如近世的大将，他若不知将略的历史，他决不能以最少的兵力得胜的。将略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如何能打胜仗的方法书，因为情形一经叙述过，彼本身并不能重演一番的。不过大将专心研究，烂熟胸中，能使他在战场上运用自如，并且他能看出那只凭经验不研学理的将军所不能看出的危险和可能罢了。劳动运动的历史并不告诉我们应做什么，不过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现状和劳工阶级所已经过的阵势相比较罢了。因此，在各种危急的时候，我们能认清我们的道路，看出将要临到的危险。

但是，我们若不彻底明白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在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现象中的作用，我们便不能知道劳动运动的历史。列宁很知道资本主义的历史，只有几个马克思主义学者能赶到他。他不仅明白书上的字，且能想出从来没有人想出的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且拿他在我们与职工联合运动冲突的时候的小册子来做个比方，在那书中，他称蒲哈陵（Bukharin）为工团主义者，折衷派，而且说他在许多别的事情上是罪魁。这本争辩的小册子也略略地说明互辩律（Dialectics）和折衷说（Eclectics）之不同。所发的议论虽不引用任何唯物史观的材料，但所说的唯物史观，却多于比这小册子更大的书的全本。列宁独特地领会和想出唯物史观的理论，以至无人能及他的，因为他研究唯物史观所见到的事物，与当时激动马克思创立理论的事物是一样的。

列宁之投身于运动，具有革命的意志（Will to Revolution），且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之进化以及社会主义之进化，皆立足于革命的意义。朴列哈诺夫（Plekhanov）也是一个革命家，但他不具有革命的意志。他虽是一个俄罗斯革命的重要教师，但他只能教革命的方式，而不能教革命的方法。列宁之所以由理论家而变为政治家，全在于这一点。

〔注〕原文谓朴列哈诺夫只能教“革命的代数”而不能教“革命的数学”——意思是说朴氏只能说明抽象的方程式，而不能求得具体的答数。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普通劳工阶级的战略相化合。他能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有关俄罗斯劳工阶级的运命的战略。我们可以说：列宁在军官学校里不仅研究克老史活兹（Clausewitz）、毛奇（Moltke）等，而且同时也研究将来俄罗斯无产阶级战争的区域。这种研究，在俄罗斯找不出另外的人。列宁的奇才，全在于此：就是能够以全身的精力，服务于他所任的事业上。

我必须趁着机会辩明，当多数主义发轫的时候，何以像卢森堡女士（Rosa Luxemburg）这样聪明的人，也不能明白列宁的主张的正确。我现在且大略说一说：卢森堡不十分明白俄罗斯无产阶级的战争状况，那是和西欧无产阶级的战争状况有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不同的。因此，伊于一九〇四年倾向于少数主义了。我们依历史说起来，少数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智识者的政策，能使无产阶级的根基多与小资产阶级发生密切关系。依方法论说起来，少数主义是一种转输西欧的劳动运动到俄罗斯的舶来货。若我们读一读亚克谢勒罗德或马尔托夫（Martov）关于劳动阶级发展的独立论，他们以为劳工阶级“不得不练习站立在自己的脚上”。这种论调，凡生长在西欧劳动运动中的任何人听着，无不惊异赞赏。我很记得，当第一次革命的时候，我得读着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辩论文，若我不十分熟悉俄罗斯的实情，决不会否认这种根本的真理。他们这种伟大的计划并不缺少什么，可惜没有实行战略的预先应备品。到了今天，历史已给我们

证明，少数主义者关于“劳动运动的独立”所发的言论，简直是俄罗斯的劳动运动有附属于俄罗斯资产阶级之必要的废话。

今天我们试翻开共产党章程（Party statutes）上的著名的第一节上的争论来读一读，便觉得有趣味。因为这一节，曾使社会民主党分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在那时，列宁要求只把秘密组织的分子视为党员，这桩事，大显他自立一派的样子。但究竟的争点是什么呢？是列宁想决定劳工党的政策，以免除某种知识者的混乱观念。在第一次革命之先，凡对于政府不满意的医生或律师偶然地读一读马克思，便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究其实，不过一个自由主义者罢了。甚至于他们曾进一个秘密组织，甚至于他们曾毁弃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而历史仍然告诉我们：有许多知识者还存留自由主义于他们的心灵中。但是党章之限制：“只愿属于秘密组织的人加入，要人人愿受秘密组织之危险”，已经可以减削资产阶级在劳工当中之优势的危險，并使革命的红光从劳动阶级发出，而射进党的组织里，虽然里面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也不要紧了。然而要能坚持这层意见，要能为这缘故而不惜分裂工党，则必须如列宁一样地根据俄罗斯的实情，而做有力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和俄罗斯革命家。若是许多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九〇三和一九〇四年还不明白这一点，那么，当亚克谢勒罗德开始把那反抗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与有名的田地运动（Agrarian campaign）混合起来的时候，就应该明白了。这件事就是：工人列席自由派的宴会，有二种用意：一、可以知道知道资产阶级；二、可以充满着怨恨而反对资本阶级。人人都知道他们除了这宴会上，从来没有见过劳动阶级。再，资本家可在这里得点教训，会觉悟到促进全国的共同利益的必要。

列宁之知道俄罗斯实情的方法又有一个特点，他与他们那些伸出手来讨那领导俄罗斯无产阶级的权势的人不同。他不仅知道俄罗斯的实情，而且非常明白。凡在党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尤其在我们握得政权的时候，一千五百万人民的运命系于党的议决案上，我往往惊骇列宁之储有英国人所说的常识。譬如现在我们谈论一个人，而我们相信这一世纪必不再有像他一样的人，他的常识何值我们称赏？不过至于政治家而有常识，那就伟大了。当列宁要决定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他不想到抽象的历史情况，也不想到地租、剩余价值、专制主义或自由主义。他想到德维里（Tver）省之沙伯格维支（Sobakevitch）、建逊（Gessen）、塞达尔（Sydor）、浦帝老甫（Pútilov）的工人、街上的巡察，他也想到那“乡下人”（Mujik）塞达尔和工人奥纳甫立埃（Onufria）的成效。他以为凡此种种，都是革命的柱石。

我永久不能忘记在白莱斯德（Brest Litovsk）和会之前与列宁的谈话。凡我们所提出来反对白莱斯德和议的理由，都受他驳回，好像弹豆到墙壁上，受其反动而弹回一

样。他用最简单的理由：战争不是一些好革命家的党便可指挥的，因为他们已经尽力控制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咽喉，所以不能与德国的资产阶级停止交易。“乡下人必定要进行战争”。我当时说了这一句话。列宁就问我：“难道你不看见乡下人投票反对战争吗？”我说：“他何时并且如何投票反对的呢？”“他用他的脚投票的，因为他从战线上逃去了。”列宁就是这样地解决这件事。我们不能同德国帝国主义妥协，列宁知道这一点与别人一样。不过列宁赞成白莱斯德和议，为的是要休息一下——但是他主张和议时，并不在群众面前把接踵而来的苦难隐藏片刻。这件事的确无异于立即颠覆俄罗斯的革命。可是却能给我们一个希望之影，可以喘一时之气。若这休息只有几个月，那就当时确是一紧要关头。因为“乡下人”必定要先接受那革命所赐予的土地；必定要他觉着土地有重新失去的危险，他才知有保护彼的必要。

我们再举当我在波兰战争中败退，磋商和议于里嘉（Riga）的时候来做例。在那时，我要到外国去，未起程之先，去访列宁，因为要同他说一说我们对于职工联合会之关系所起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正如白莱斯德和议时一样，那略赞省（Riazan）的农民（乡下人）在他的测度中是战争中之重要人物，列宁便根据农民心理决定和议。所以当内争一变而为重建经济的问题的时候，他也同样地把自己站在一个朴素的工人的地位上，因为没有这位朴素的工人，就没有重建经济的可能。但是他如何问自己呢？党的会议上讨论职工联合会在经济事业中所应做的职务，工团主义者与折衷派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列宁所看见的，是被宰割的工人，忍受着无人过问和不能形容的痛苦，现在却要来重定经济事业。重建经济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不得不汇集我们的一切力量，并且我们有权可以请求劳动阶级参与这种工作，凡此种种，于他毫无异议。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开始做此工作，我们应该怎样把几千好同志从他们已经习惯于军事指挥的陆军中撤回，送他们到工厂里去呢？采用这样的策略，必不济事的。所以列宁说：“他们必须休息，因为他们疲乏了”。这是列宁的重要理由。他看见在他面前真的俄罗斯工人，如他在一九二一年之冬季时一样，他知道那样可能，那样不可能。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的批评》的绪言中说：历史只能处置彼自己所能成就的工作。换言之，凡深察历史在某定期所能成就的事业，而且不为决意只为可能而战的人，就是历史的工具。列宁之所以成为伟大，在乎当实际情形变化之时，不会被任何预定的公式所蒙蔽，当公式稍有不合实际情形的时候，他有立刻弃彼于深山大海之勇敢。在我们未握政权以先，我们既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所以有“平民间的和平！反对政府间的和平”的口号。但后来我们突然地跑上劳农政府地位，而四面围着的平民都还没有推翻他们的资本家政府。有许多同志都问：“我们如何能同德皇霍亨伦（Hohen-

zollern) 的政府议和?”列宁带玩笑似的回答说:“你们简直不如鸡。一只鸡不敢走出粉笔所画的圆圈一步。但是鸡可以说‘这圆圈是别人画的’以自解。至于我们的公式,是我们自己的手画的。你们现在只见公式,而不见实际情形。我们之所以要有‘平民解决和平’的公式,用意在乎唤醒民众反对军阀和资本家政府。现在你们却要我们走到颠覆的路上去,反让资本家政府假我们革命的公式的名义而得胜。”

列宁之所以伟大,在乎找准实际的目标,在这实际中,他找着一匹强有力的骏马,彼会驮他到他的目标里去,而且他很相信彼。他永不空想。不仅如此。他的天才还有一种特性:他决定一个某目标之后,他还要从实际上找寻达到目标的工具。他不以决定了目标而知足,他还要具体地想出一切用以达到目标的不可少的东西。他不仅想出作战的方法,而同时想出作战的全部组织。我们的“组织家”——他们只是组织家——往往讥笑列宁当一个组织家。凡看见列宁在家里在人民议会里或委员会里如何工作的人,也许想:再也找不出比他更不如的组织家了。因为他不仅没有书记官替他预备材料,并且到如今他还不会学会速记生默写的方法,而自己定睛望着速记生所写的笔,好像乡下人第一次看见汽车一样。但是我们全党中只有一人能够明白数十年内关于改革我们官僚主义制度的重要观念,若我们不要农民怨恨劳农政府,此种改革是必不可免的。我们都明白官僚主义制度,而且带着悦人耳目的口气在半官式的机关报上说:“苏维埃制的小缺点”,我们都大声反对同志斯脱克拉夫(Steklov,《新闻报》的总主笔)所称为专闹笑话的事务国(The scandalous state of affairs)。不过我们党的首领中,谁问过自己:新经济政策已创立了无产者与农民之同盟的新基础,我们如何阻止官僚主义恶习不破坏这种同盟呢?仅有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大政治家,虽然因每天的工作而患病,总是想到国家的组织的重要问题,预先做出数十年斗争的计划。我在这里所说不过是一个约略的草稿,详细情形,可以得之于年来所经过的事实。但是我们越对于这约略的草稿留意,越明白地看出列宁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政治组织家合而为一的人物。

这一切何以都会联合在他身上,只有上帝知道(请斯德凡诺夫Stefanov同志与反对宗教委员会原谅我说这一句话)。历史自有彼自己的机器去蒸馏白兰地酒,没有特别的侦探能侦查出来。譬如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统一德国的力量,历史就在某处或一小田庄上放他的机器做起工来,得着上帝或魔鬼的帮助,造出一个俾士麦克(Bismarck)来,他就成功了统一的工作。若我们读他第一次的报告,一步步地跟着他的政策,我们不得不问问自己:一个地主如何能了解全欧的实情。

凡我们想党的历史、革命的历史和列宁的时候,亦有像上述的同样的思想发生。十五年以来,我们看见这个人战胜难题上之任何障碍,以反对最近二十五年来所发明

的任何主义（Ism），自尾巴主义（Khvostism）以至经验的批评主义（Empiriocretism）。列宁以为凡这样的主义往往与真正仇敌联为一气，存在于别些阶级或劳动阶级之中，不过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存在于实情中。这些主义都是用以知道实情的工具，他把这实情的全部吸收进去，加以研究，思索，直至最后的结果发现为止，并且显明他自己是一个最懂俄罗斯的实情的人。从明白实情的革命家渡到政治家，历史再不能给我们第二个例了。这样的大理论家、政治家、组织家的特性的结合，使列宁做成一个俄罗斯革命的首领。他自己想使我们相信人需要绝对的真理，不过在易卜生（Ibsen）的个性主义的表示中，这种真理并算不得真罢了。真理对于许多人是死的，甚至对于许多阶级是死的。若资产阶级领悟真理本身，且透彻真理，则他们早已败了。因为当那历史的真理告诉他们：他们不仅该定死罪，并且他们的尸体应该投于阴沟的时候，谁还敢去战？资产阶级不知他们自己的命运。但是革命的阶级必须真理，因为真理就是明白实情。若不知道真理，就不能明白实情。我们做成一部分实情，就是劳动阶级、共产党。若我们能鉴别我们的力量和弱点，那么我们就能鉴别保险最后胜利的方法了。列宁以真理告诉无产阶级，并且只是真理，虽然失意，也不顾的。（所谓“苦的真理”也是要说——译者）。当工人们听他演说的时候，他们知道在他的演说中没有一句空话。他帮助我们以实情去告知我们自己。有一次，我同一个将死于肺癆病的多数派工人住在达华斯（Davos）。在那时，正在辩论自定国籍的权利，而我们波兰的共产党人反对列宁的意见。我所说的同志读完我的反对列宁的论文之后，说：“你所写的，我完全信服，不过无论何时我反对列宁，到事过之后，往往总是我错的”。这是领袖党的职员们所想的，列宁之所以在党中有声望，也是这个缘故，但工人们并不如此想。他们很相信列宁，因为他曾有数千次的不错，若他偶然有一次错，或他所指导的事错误了，他立即公开地承认说“我们已经错误了，所以我们败的，这种错误应该怎样怎样地补救”。许多人曾经问他何以这样地公开地承认错误。我不知道列宁何以如此的，不过这种行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觉悟的工人决不至于因一小过失而不信他的救主的。当列宁承认他的错误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隐瞒，他引工人到他自己的思想的实验室里去，他使工人参与决定最后的议案，工人们看出他是个首领，代表他们的实验室——阶级斗争的结晶。一个本身需要绝对的真理的大阶级，必用全心去爱一个首领，这首领是爱真理和说实话的。有这样的一个首领，工人才能负担任何的真理，甚至最难的。人们相信他们自己，只在他们一点事情不隐瞒的时候。凡关于他们自己的事，他们都知道，甚至最不幸的可能，然而他们觉得可以说：不拘何事……列宁帮助劳动阶级知道一切有害于他本身生存的分子，使他在最后能说：“朕（？），无产阶级，是将来的现实生活之主宰和创造者。”这是列宁的伟大之又一点。

我们的党不仅负有地球上六分之一的运命的责任，而同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胜利之主要柱石，所以在这个党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共产党人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充满着以下的愿望：愿这个“摩西”（Moses）——他曾经把奴隶们从被囚的地方领出来——一定会和我们同到“应许地”（Promised land）！

（此篇乃腊狄客为俄共产党二十五年周年纪念所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书录）

周佛海

（马克思《资本论》之研究对象及其全三卷之结构）

马克思的大著《资本论》（Das Kapital），在中国现在的学术界中，不知道他的人大约也很少了。然而不知道他的名目的人很少，而知道他的内容的人，我大胆敢说也很少。这也不是无故而然。因为《资本论》一书，内容既深奥，分量尤冗长。也有见这样庞大的著作，知道难得读完，就不敢起心读他的。有即着手阅读，因内容晦涩难通，因而中途辍业的。也有即勉强读完，而不知全三卷前后的联络，虽有断片的理解，而不知《资本论》始终一贯，究竟是说些什么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来说一说《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研究是什么？它全三卷，究竟是怎样的结构的？就不是徒劳无益的事了。我们每读一书，第一要明确的，就是这本书的目的，究竟在研究什么？这个问题不弄清，就如无舵的船，漂流于烈风暴雨的大洋中，茫无边际，尤以读卷帙巨大的书为然。研究的对象既然把捉确实，如不明白它研究的次序，理论的排列，就会要读前面不知后面，读后面忘却前面，终得不着论理的归结。读一般的书籍如此，读卷帙浩繁的《资本论》尤其如此。所以我们于开始读《资本论》之先，先要明白它的研究对象，及其全三卷的结构。先从他的研究对象说起。

一般人都说《资本论》是“社会主义的圣经”（The bible of socialism），所以想求社会主义的知识于《资本论》之中。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怎样组织？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怎样？有许多人因想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去读《资本论》。但是怀着这个期望而读《资本论》的人，我敢保险他定要失望。因为他把《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弄错了。他们以为《资本论》既叫做“社会主义的圣经”，一定对于社会主义的特质，有所阐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之组织，有所研究。其实不然。《资本论》研究的对象，不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论》始终一贯的理论，在说明资本制度的作用，不在说明社会主义的组织。你看他的标题为“资本”（Das Kapital）就可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怎样组织？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没有详细的

论究的，不是他的缺点，正是他的长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也就是为此。因为社会组织应该怎样，是因时而异，因地而殊的。决不能由一人的理想，建筑于空想之上。至《资本论》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圣经”，不是因为他研究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怎样组织，乃是因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而阐明它必然崩坏，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之而兴的历史之必然。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将来的社会主义组织，而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如前述了。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方面很多，他是从哪方面着手研究的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研究资本的剩余价值（Mehrwert surplus value）。换句话说，就是研究资本所产生而归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是什么？“资本所产生而归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又是什么？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把他的概念说明一下。

普通以为剩余价值是阶级社会（社会之中，分为若干阶级之社会）的特色。社会若分为数阶级，其中必有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或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一个人的生产力，设若还不能维持他自己的生生活时，社会之中，就没有阶级的区别。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掠夺。等到社会的生产力渐渐发达，一个人所生产的东西足以维持其生活而有余时，社会之中，就现出阶级的对立了。一群强者以其武力来掠夺弱者所生产的东西之一部，而自己养尊处优，毫不劳力。这就是支配阶级或掠夺阶级。被他们所掠夺的一群人，就是被掠夺阶级或被支配阶级。所以剩余价值，被支配阶级所生产的东西之中，被别的阶级——支配阶级——所掠夺去的那一部分。例如现在劳动者，每日所生产的东西，价值五元，而他所得的工资，每日只有一元，其余四元，为资本家所拿去，那么，这个四元，就是剩余价值了。但是我以为剩余价值，不单是阶级社会的特色，就是将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之下，也是有的。因为在这些组织之下，也有不参加生产的人，如老幼残疾，以及从事于政治、教育的人，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就是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了。不过在阶级社会之下，这种关系是掠夺的，而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不是掠夺的罢了。所以在阶级社会之下，剩余价值，乃是生产者所生产，而非生产者所掠夺之物；而在无阶级之社会，剩余价值，乃是生产者所生产而非生产者所消费之物。

剩余价值的概念，大致如上所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剩余价值。

但是《资本论》所研究的剩余价值，不是剩余价值的普遍现象，乃是资本的剩余价值。详些说，乃是资本所生产而归资本家所占有剩余价值。

为什么呢？因为剩余价值，不单是资本制度生产的特征，一切阶级社会之下，固不待说，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无阶级区别的里面，也有它存在，这事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就在无阶级区别的社会里面，生产者所生产的一切物资，不能全部

归他自己所有，必以其一部以养活生产上的无能力者，如老幼残疾等，以及从事于生产事业以外的事业，如政治、教育人的。这一部分的物资，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之下的剩余价值。在奴隶制度之下，似乎奴隶所生产的一切物资，全部尽皆主人。其实不然，主人所得的，不过是掠夺奴隶生产的一部，不是全部。因为奴隶的生活资料，主人是不得不供给的。奴隶所生产的物资之中，除去其生活资料以外，其余就是被主人所掠夺的剩余价值。在农奴制度之下，剩余价值就越明显。例如一星期之中，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只工作三日，其余三日，要在地主的土地上，无报酬的为地主工作。这种掠夺的剩余价值，实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星期中的三日劳动，显然为地主所掠夺去了。在资本制度之下，剩余价值的掠夺，就没有这样明显了。劳动者为其雇主资本家作一日工，就得一日的工资，所以别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无所谓剩余价值了。其实何尝如此。例如劳动者一日所得的工资，只须六小时即可生产，而他一日要工作十二小时，所以劳动者一日只为自己工作六时，其余六小时，就是被雇主掠夺去的剩余劳动。这个剩余劳动，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总而言之，只要劳动的生产力，能维持劳动者的生活而有余，无论哪种社会里面，都是有剩余价值的。但是《资本论》所研究的剩余价值，不是总括这一切剩余价值而研究其全部，只是于这些剩余价值之中，单研究资本所产生而为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所以我们可总结一句说，《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制度下的剩余价值（注意：上面常说，“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我们切不可误会说资本它本身能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的，实质上还是劳动。我们所以这样说的，是使剩余价值的此种形态和其别种形态相区别罢了）。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已如上述。但仅只研究资本制度下的剩余价值，为何要占全三卷呢？这就要使我们说一说全三卷的结构了。

《资本论》第一卷，是论“资本的生产行程”的；第二卷是论“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第三卷是论“资本家的生产之总行程”的。我们试看各卷与研究资本制度下的剩余价值有什么关系。

第一卷的“资本的生产行程”，就是研究资本怎样生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以为资本之所以生剩余价值，是因为它通过生产行程。社会内的资本，就全体而言，如不通过生产行程，是不能生何等剩余价值的。所以资本之目的既在获得剩余价值，就不能不通过生产行程。资本家既欲获得剩余价值，就不能不经营生产。说明这个关系的，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的任务。换句话说，就是第一卷乃是说明资本的剩余价值之成立的。

第二卷的“资本的流通过程”，是研究在生产行程中已经成立的剩余价值怎样实现的。剩余价值虽已成立，设若没有实际的实现，资本家的目的就还没有达到。所以于

它成立之后，必求它实现。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呢？马克思以为资本要使剩余价值成立，须通过生产行程，若要使它实现，就须经过流通过程。资本如不经过生产行程，剩余价值就不能成立。同样，资本如不能经过流通过程，剩余价值就不能实现。我们现在且把这个关系说一说。

我们现在且把剩余价值之成立和实现的行程，用公式来说明。我们以 G 为货币 (Geld)，以 W 为商品 (Ware)，以 P 为生产 (Produktivn)，以 P · M · 为生产手段 (Produktionsmittel)，以 A 为工力 (Arbeitskraft)，那么，剩余价值之成立和实现的公式如下：

$$G \longrightarrow W \left\{ \begin{array}{l} P. M. \\ A \end{array} \right. \dots\dots P \dots\dots W \longrightarrow G \left\{ \begin{array}{l} G \\ g \end{array} \right.$$

资本家用他的货币 (G) 购买商品 (W)。这个商品，就是生产手段 (P · M ·) 和工力 (A)。资本家使他所买的商品 (生产手段和工力)，通过生产行程 (P) 而生产一新商品 (W')，卖出这个 W' (新商品) 所得的货币为 G'，G' 就是于原有货币 (G) 之上，再加以剩余价值 (g) 的。资本家最初所有的货币资本为 G，后来所有的为 G'。其中的差额就是 g (剩余价值)。但是这个剩余价值 g 是怎样生出来的呢？从 G——W 一行程中生的呢？还是从 W'——G' 一行程中生的。这都不是。据交换的原理，是等价与等价交换的。拿 G (货币) 去买 W (商品)，只能买着与 G 的价值相等的 W，决不能生出剩余价值。以 W' 去卖，也只能卖得和 W' 的价值相等的 G'，决不能生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决不能在这个流通过程或交换行程中成立的。他是于通过生产行程时，在生产行程中成立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就要在流通过程中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资本家拿他的货币 G，去购买商品 W，这些商品通过生产行程，就成立剩余价值，而使商品 W 变为新商品 W'。这个新商品 W'，就是 W' = W + w。w 就是所成立的剩余价值了。但是这不过是说剩余价值 w 已成立，而包含于 W' 商品之中，他还没有货币化而实现为利润。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只得到 W'，而没得到 G'，所以也只得到 w，而没有得到 g。但是资本家的目的，是在得 g。所以他就不使其资本经过 W'——G' 一流通过程，而实现其剩余价值 g 了。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他自己已很说得好。他道：“只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过是资本家的生产行程第一幕——直接生产行程——已完毕。……现在他的第二幕要开始了。商品的全量，全生足物……非卖不可。设若卖不掉，或只卖其一部，或虽全部卖掉而其价格不足以偿生产费时，劳动者固然已被缴取，但是这个缴取，没有十分为资本家实现。就是缴取的剩余价值，或全然不实现，或只实现其一部，或竟损失资本之全部或一部。直接缴取的条件，和其实现化的条件，绝非一样

……”总而言之，生产行程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须通过流通过程，才能实现。说明这个关系的，就是《资本论》第二卷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第二卷是在说明资本的剩余价值之实现的。

第三卷的“资本家的生产之总行程”，是研究的什么呢？原来第一卷与第二卷之中所研究的，是把资本就全体而观察的。但资本于其运转的行程中，生出种种具体的形态。因为资本和劳动一样，也有分工（Arbeitsverteilung Division of labour）。资本有种种机能，某种资本分担某种机能。这样分化的结果，所以生出种种具体的形态。《资本论》第三卷，就是分别研究这些具体的形态的。把资本就全体而观察，那么，它要生产及实现剩余价值，就非先通过生产行程，后通过流通过程不可。不通过这些生产行程和流通过程，而欲获得剩余价值，就全体而论，实在是不可能的。但是社会全体的资本，如一分担各种机能，它所经过的行程，就不限定一样了。有不通过生产行程，只通过流通过程，而能获得剩余价值的。有连流通过程都不通过或非常短缩而获得剩余价值的。就和人类社会一样。人类就全体而言，若不从事生产物资的肉体劳动，就不能获得生活必需品。但是社会因分工的结果，就是不从事肉体劳动的人，也能得生活必需品。资本也是一样，流通过程内的机能，如为一种资本所分担，它就成为一种具体形态，叫做商人资本（Kaufmannskapital）。它的循环，就不和产业资本（Industrielles Kapital）一样，要通过生产行程了。因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是 $G—W……P……W'—G'$ ，而它的循环，就是 $G—W—G'$ 。但是他虽不通过生产行程，而仍然获得剩余价值。此外尚有生息资本或放债资本（Zinstragen des Kapital. Interest-bearing capital），就是借给别人而取利息的资本。它的循环，又和商人资本的循环 $G—W—G'$ 不同，而缩短为 $G—G'$ 。但是他还是获得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三卷，就是就这些资本形态而分别研究的。也就是研究直接生产行程中所生的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于这些具有具体形态分担特种机能的资本之间的。所以《资本论》第三卷，是说明资本的剩余价值之分配。

《资本论》全三卷的结构，已如上述。就是：

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行程”——资本的剩余价值之生产。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的剩余价值之实现。

第三卷“资本家的生产之总行程”——资本的剩余价值之分配。

由上面的简单解说，我们大略已明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及其结构了。我们据此以读《资本论》，总不至于茫无边际，捉摸不定罢。

一九二三，十，四，于上海客次。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

屈维它

中国宗法社会的皇帝制度破败之后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治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已经处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观念受枪炮飞机潜艇新银行团的恐吓，方才烟消雪散，想建立“民族国家”，然而欧美各大民族国家却已显然表露他们是“阶级国家”。中国民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开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治主义和民族主义崩坏时期。于是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状况。实际生活要求民治主义，而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一个要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哪一个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袖？

中国的“第三阶级”，诚然不错，要求革命了。然而他的目标只限于民治主义，他的力量只能做“无血革命”。天下的革命有无血的么？中国的无产阶级，确是幼稚，然而他的目的必然在于社会主义，他的力量却能彻底地扫尽旧统治阶级。然而现在的统治阶级去了，社会主义便能实现么？天下的革命没有无血的，现在的统治阶级去了，社会主义也还不能实现。那么，无产阶级是否应当参加推翻现存统治阶级的运动，使无血的革命变成有血的呢？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否有赖于这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呢？世界的社会革命对于中国的民治革命有何等影响，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究竟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我们请细细地论一论这中国现时很迫切的问题。

—

先从无产阶级之革命策略的总原则说起。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职任应当依社会进化中之客观的可能和必要而确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所谓“国民经济”之自然的发展而成，不管你心上喜欢不喜欢。况且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能生出社会主义来，只有他能造成社会主义公

有生产资料之技术上的基础，只有他能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受大工业大都市锻炼集合的普通劳动者，或简直是游民，只能“穷人造反”，而不能革命。没有集中的资本和生产，只能均分（抢掠）而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穷人造反的实例很多，而丝毫社会主义亦没有看见，便是明证。要知道：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治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种子才能开始萌动，那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显然暴露。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出发反对君主封建制度的时候，阶级矛盾不期然而然隐匿掩藏不甚显露。在民治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无产阶级方才有活动之自由及广泛的政治运动之可能，这是无产阶级的成熟及经验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凡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成就的地方，“资产阶级还能做革命的进取”的地方，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联合而反对“君主诸侯及军阀”，同时亦就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最高的目的固然是社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随时有切近的目标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经济改善。然而这种斗争之时，“务必时时刻刻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矛盾，确实深入于群众的意识”，又以备工人能利用资产阶级政治之下所发现的新式的社会政治关系，立刻就反对资产阶级。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曾经希望革命转向社会主义方面，然而他仍旧认政治斗争结社自由普通选举是必要的。他论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代（一八四八年）的责任说：

“实际上，既然工人独立的出发还没有基础，还没有直接普选的制度，大大小小三十六个国家还在分裂德国，这时候除出紧随巴黎运动之后（巴黎运动的胜败对于德国运动有生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除出与小资产阶级共同争政治权利（有这些权利再能行自己的斗争），此外无产阶级的政党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

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之间断然实行上述的见解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中。他和昂格士在德国革命初期，不到“资产阶级勉强发生只有口硬手软的市侩和绝对还没开通的工人”之柏林去，而到莱茵省城柯仑——那时是最开通的地方，已受法国革命的冲刷，旧国家的形式破坏，工业亦最发达，而资产阶级受新式社会生活的波动亦最甚。他们不像白恩（Born）等人（亦是共产主义联合会的会员）在这革命时期去专做所谓“纯粹的工人运动”，却以全力来办一资产阶级民治主义极“左”派性质的机关报《新莱茵新闻》（罗兰霍尔斯特论《资产阶级革命中之马克思及无产阶级》）。马克思既然以无产阶级的观点考察得社会进化的公律，断定革命的进程是如此，所以先提出民治派各阶级的总利益以反对封建君主制度，而暂时不及于无产阶级的特

别利益。马克思之所谓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利用时机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即此突现革命运动中之最彻底最热烈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分子。资产阶级本来亦必定要提出普通平民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政党便当逼迫他实行到底，勿使中途让步。

所以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是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可是这种赞助必定不能永久的。马克思以为“在某种程度之内各阶级的联合常常是革命所必要的先决条件”。然而等到革命开始进行，却亦就是阶级矛盾暴露的起点，革命进程愈速，阶级矛盾的爆发亦愈激励。“共同的仇敌刚刚打倒，胜利的军营里，立刻就要分裂成几派，而重起相互的斗争。”（《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

所以等到革命的进行既已变动了局面，如一八四九年春天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治派已经不往前进而向后退，那时《新莱茵新闻》也便变更其策略，马克思等也就退出莱茵区民治委员会。于是开始预备革命行动的组织。结果反革命占胜利，《新莱茵新闻》被封，而德国革命也就失败了。

再则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二月革命固然还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比起一七八九年及一八三〇年来已经大不相同。那两次无产阶级的出发必定在革命已到高度发展的时候，而这一次却在革命的最初期，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期然而然占了畸重的形势。六月之役无产阶级失败，那时“国内的阶级战争”已经非常明显。然而一八五〇年春反革命地位渐稳而国内民治派各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及一切中等阶级——又重新兴起要想与治者阶级反抗，而围拱“革命中心”的无产阶级。这一民治派的联盟反对那所谓“秩序党”，居然在三月选举时取得胜利。革命有重复前进的形势。可是，这时的封建阶级已经很弱，耐不起战斗，他们宁可让步，于是高等阶级得到让步的利益而却退，革命大受打击。高等阶级不但退却，而且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反对“红党”。

这种革命失败的原因乃在于经济的变动——一八四九年欧洲经济渐渐地兴盛起来，革命的潮流不期而缓和许多；其次，民众的政治智识虽经屡次的革命教育而还不能算成熟，所以那时国王背誓破坏普选而竟没有大反响。现时就大不同了！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的俄德革命尤其给了不少教训。现时德国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程度，就是从那时参加普通的民治革命，经过长期的锻炼而得来的。可见虽失败而对于无产阶级还是有益的。

无产阶级方面固然受此训练，而资产阶级方面却亦有很大的影响。从一八四八年以来大致欧陆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天增加一天。即使君主政体还没推翻的地方，资产阶级亦已恐惧不宁，他们要革命，却又怕革命时政权被无产阶级夺去了。因此连资产阶

级的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无产阶级却利于这一革命早些爆发。社会结构进化的原则确要有资产阶级制度（民治主义）的发展，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完全正当发展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往往无产阶级在此等国家内反成资产阶级革命之组织者指导者。大资产阶级愈弄愈胆小，而同时就是大资产阶级变成君主封建制度之政治的附庸，这种情形愈过愈明显，那时一切反对旧统治的毒恨都转移到大资产阶级身上，而可以不用大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已经显然地暴露阶级矛盾。所以不论先进或落后的国家里，在封建军阀政治之下无产阶级必定参加或进行民治革命，可是愈落后的国家，它的无产阶级在民治革命中愈有势力，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也愈多。

马克思说：

数量多而且集中强大的有智识的无产阶级之存在条件常常和那多而且富又集中有力的资产阶级之存在条件同时并进的。资产阶级的各部分，尤其是他那进步的一部分——假使还没有取得政权而改组国家制度以应其需要，那时的工人阶级运动无论如何还不能成为独立的，而且不能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只有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制度成立之后，工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才大大的发现，那时已经不能再推动资产阶级前进；那时资产阶级亦不能再拿好话来骗工人，满口答应而不实行；那时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才完全明晰地暴露于全世界。

无产阶级曾经参与这一反抗运动（一八四八年），他本来对于这一类的革命运动没有不参加的，他的希望：（一）不是这种运动能扫除行向社会革命及无产政权的道路中之几种障碍。（二）便是这种运动至少使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少的阶级行向更果决更革命的道路。工人拿着武器参加反抗运动的时候，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一次的斗争还不是为他自己的阶级利益，可是他在这时候唯一正当的策略，却是：假使高出于无产者的任何阶级（如一八四八年的资产阶级）不能给工人阶级以“为他自己利益而斗争”的自由战场，那就无论如何不让这种阶级的统治得以稳固，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引起政治危机，使全国非决然行向革命不可，否则索性恢复旧统治的“不变状态”（Status quo），使新革命不能免。两种假设之中，工人阶级都是真正的全国利益的代表，因为欧洲一切旧社会（各国）都应当及早革命，谁也不用想安安稳稳有条有理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假设真如此，欧战便是梦中事了！〔译者注〕），而工人阶级却正是诚意的在可能范围内促进革命的阶级。（《德国之革命及反革命》）

二

无产阶级对待民治主义运动的态度和参与民治革命的方法，大概在原则上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取现实社会进化中的实例作更详尽的说明。欧洲落后国家，第一就算俄国，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离法德资产阶级的民治革命已经百年五十年。俄国那时已经有二百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人的无产阶级（五十人以下的小工厂不算在内——见杜洛茨基之《一九〇五年》），而且有社会民主党，似乎可以直接行无产阶级革命了。何况实际上革命是社会民主党指导的，大多数罢工工人所参与的。然而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无条件的断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列宁之《两个策略》）。这是什么意思？原来那时的俄国，已经有民主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造之必要。这种改造运动不但还不足以表明是资本主义的崩败，资产阶级统治的崩败，而恰恰相反，正要有这类民治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才能扫清障础，让俄国的资本主义好好地发展，进于纯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永滞于亚洲式的半自给经济。有这种改革才能使俄国有完全资产阶级式的统治。俄国社会革命党（Parti des Socialistesrevolutionnaires）、俄国的农民党，自称为最积极的社会党，其实不懂社会主义，当时就不明白这层道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什么。他们决不知道：就算农民暴动得了完全的胜利，田地完全均分过，或者干什么“农村立国”的鬼把戏，始终对于资本主义并无丝毫损伤，反而促动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农民之间自己便要受“阶级的分化”。民主主义的改革必然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如此，或者有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很可不必帮助民主革命了。那却不然！

民主革命之社会及经济的内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并不因此而对于无产阶级没有很大的利益。民主革命在形式上可以有好几种。也许在这种形式的民主革命中，大资本家及财阀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也许在那种形式的民主革命中，却是农工平民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

民主革命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虽然眼看得是革命，是暴动，反对上等人，反对资本家或帝国主义。然而这一革命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扩充推广他的发展。民主革命不但代表劳工平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既有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之下，资产阶级之统治工人阶级是不可免的。所以可以说：民主革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少。然而说民主革命绝对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却是蠢话。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最早一期曾经有过这种论调，所谓“民粹派”（俄文 Narodnitchestvo），他们以为无产阶级用不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这种思想，往往可以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政治斗争，否认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否认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种思想根本与科学的经济相冲突：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免的，无论怎样不能禁止资产阶级的生长，要想跨过资产阶级立刻实现乌托邦是必不可能的事。马克思主义说：凡是一个社会，根据于商品经济

而与文明的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交易关系，到一定的程度它自己亦必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当初是如此，中国现在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行社会主义；路只有一条——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行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这几层意思已经有一大部人类历史——如俄国如印度如埃及如土耳其——足以证明是科学的公律。所以假使有种学说，要除出“更加发展资本主义”之手段，而另求别法来救济工人，这种思想，自不免是反动的。列宁说得好：“像俄国这种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受资本主义本身的苦，实在比受‘资本主义发展不透’的苦少。”（《两个策略》）工人阶级确利于资本主义有很广泛很自由很快的发展。工人阶级确利于很彻底的破坏一切旧制度、旧习惯（如行会制度、艺徒制度、同乡观念、门阀观念等），因为旧制度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民主革命就是这种彻底的改革，应当扫除一切旧迹和那便于军阀官僚营私舞弊的制度。

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很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愈普遍，那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与资产阶级争的奋斗也愈有保证愈易开展。只有那班根本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听着这一结论诧异呢。因此，有的时候由某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许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大些。资产阶级有时候很可以靠旧制度旧习惯来抵制无产阶级（如西欧俄国当时的帝制政府，中国的军阀警察等）。资产阶级所以往往利于革命的不彻底，所谓：“不为已甚，过犹不及”。向来欧美革命史里社会党和共产党往往论述到这类的事，习惯上总说：资产阶级自卖，他竟背弃“自由的原则”，或是：资产阶级不能行彻底的民主主义。事实上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宁可使必须的资产民主主义的改革，也慢慢地进行，小心谨慎的用改良的手段，而不用革命的手段。资产阶级很愿意这些改革不促进平民农工等阶级之革命的独立性及其建议力；因为假使如此，正像法国人的俗语，平民“掉过枪来”也来得容易，于资产阶级自身先就不利。所谓“掉过枪来”便是：民主革命的成功，使那些自由民主的机关及舆论集会的权利等等，都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

至于工人阶级呢，却正利于民主主义的改革不以改良的手段实现，而以革命的手段。因为改良手段是使社会的腐败部分慢慢地烂掉。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正是受这“腐败社会”的苦最厉害的人，非得一刀把他割掉不可。革命的手段就是用果决的行动和群众的势力有组织有系统的努力扫除一切封建君主时代的遗迹。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若愈无组织系统愈不集中愈不彻底，则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愈大；他若愈有组织系统愈集中愈彻底，则对于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愈能多保证他们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教无产阶级：“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就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是教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并且全副精神的去参与，是教无产阶级：“不要专守着经济斗争而要参加总的政治斗争，努力去争民主主义，争那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列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之‘资本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可是我们能够竭力去扩大这个范围；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在这范围之内争无产阶级的利益，争他们生活里迫切的需要，争他们预备将来再战而能彻底胜利的条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固然结果为反动所摧残，然而俄国无产阶级在此中得了不少政治上的教训，创立苏维埃制度。

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必须参加民主革命的运动，当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关系，甚至于在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可以加入革命政府，在代议制范围扩大的时候，可以从事于选举运动。于是有些“洁身自好的社会改造家”，好一似黄花闺女泊舟孀妇，要大叫起来：“这不是要玷辱我们无产阶级的‘家声’吗，抛头露面的像个什么样子”！其实大谬不然。现今时代开通，男女社交已经司空见惯，难道社会改造家还做高节的隐士吗？无产阶级的参加民主革命，诚然有改良派化的危险，然而却并非不参加便能免祸的。

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主革命运动能否不受资产阶级的恶化，并不在于某人某领袖要想投降资产阶级，亦并不在于党中某一派保存了形式上对于民主运动的“独立”。这种独立派，其实往往只是形式上的。不管他组织上怎么独立，而实际上因为政治标语落于实际生活之外：若不问政治便与群众脱离，若问政治往往又只是跟着群众已有的情绪移转，不能尽领导之责。因为若是当时社会只有民主革命的需要，那初入政治战场的群众，往往反而容易跟着“自由派”的模糊标语走。保持所谓“独立”的社会党尽着放空炮，实际上反使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落于资产阶级之手。最后一着，这种独立派反而为资产阶级所恶化。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在于各阶级之客观的现实的社会力之消长。当时社会中的各阶级，各以实力参加总的革命运动，暂时亦许力量大的得到最近的胜利，力量小的却仍旧继续着往自己的目标走。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便在于指示劳动群众以一定的合于实际生活的标语——实质上就已经决不会和资产阶级同化了。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标语可以同是一“民主主义”的形式，而他的经济内容却决不会同的。这种“标语的阶级实质”，只要会运用，自然能引导民主革命到底，造成社会革命的一切可能的条件。很用不着拼命地直叫：“我们要革命，不要改良，要社会主义，不要民主主义。”

譬如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只听好听的‘革命’字眼。我们应当考察切实，究竟反抗俄皇政府的有哪几个社会实力。……只有‘平民’，便是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至于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性，“民主主义的改革决跳不出资产阶级式的社会经济关系之范围，然而这一革命对于俄国及世界之将来的发展实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两个策略》）

无产阶级运动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往往可以有两派似是而非而倾向：一、乱叫社会革命；二、只管经济斗争。我们再举俄国的实例：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的运动离现在还不十分远呢，并不是什么古代神话（列宁写这段文章正在一九〇五年）。那时示威运动刚刚开始。‘庸俗的革命主义派’（Révolutionarisme vulgaire）就大叫起‘猛烈攻击’来，发布血色传单（《劳工事业报》，当时少数派的机关），骂那提议创办全俄宣传日报的人（列宁等），说他们是文学迷、学究派。而那所谓‘尾巴主义派’（Khvostisme）——专门只跟着群众或别的政党后面叫，不是迁就庸众，就是迁就自由派——却又竭力主张：‘经济斗争是政治宣传的最好的手段’。那时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怎样对待他们呢？他两方面都反对。他反对庸俗的革命主义派，因为这一派的确是轻躁妄动，所谓‘猛烈攻击’和群众的公开的出发明明还是将来的事。他亦反对‘尾巴主义’，因为这一派确是假清高怕多事，喜欢在小范围内当领袖而实际上没有政治能力。他那时所决然提出的，就是全体平民暴动反抗的标语，可还不是直接号召行动的意思，而仅是宣传的意思，说明客观上必然的结论是要平民反抗。那时宣传和鼓动的确是第一等重要的责任，那时全俄的政治评论周报还算是很难能的事……”。“庸俗的革命主义派不懂得‘文字’（宣传），也是‘实事’。总观历史的全部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公开的群众政治运动不可能的时代，本来群众的政治运动不是人力可以任意制造的。‘尾巴主义派’却又不懂得当革命时机临头，便不能再死守着旧‘文字’，而应当有直接行向‘实事’的标语”。（《两个策略》）这两派都是真革命运动的障碍。

再则，还有小资产阶级误解民主主义为放任主义的一派，亦很足以危及革命。凡是革命的成功，必不可少的革命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是社会主义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时便是民主主义的独裁制。孙中山的“军政时期”确与此意有些暗合。然而革命的独裁必定要求社会某一方面的巨大牺牲，所以非有民众的实力后盾不可，不然就变成个人专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正须得此政治机会，以促进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途程。

“平民之革命民主的独裁制”——是民主革命中最近的目标。或者，如香港《南华晨报》（英文）对于中国各公团（商会工会学生会）召集国民会议的提议之批评，说

这是水与油混合的药方。固然！真可以说：所谓“独裁制”必须有“统一的意志”，而无产阶级和其他的平民不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一驳议其实并无价值，因为他抽象的形而上的来引用“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统一的意志”。可以有各方面完全相合的统一意志，亦可以有一方面统一而别方面不统一的。对于社会主义不能有同一的意向，而对于民主体制及共和主义却可以有统一的意志的。假使不记得这一层，那便是不明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上历史上的差别；那便是忘记了民主革命是有全民的意义的。革命既是“全民的”，就有统一的意志在。民主主义的要求以外，当然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更不能有什么统一意志。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尽可以执此统一意志要求严厉地克服反革命——就是平民的革命独裁制。

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压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分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预防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

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为着全体平民的。封建军阀之下首先要的是平民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滥用“平民”一词，空泛地说平民而掩藏着平民里面的阶级对抗性。马克思主义断然地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然而他分“平民”为“阶级”，并非为着使这先进阶级闭关自守只干工会运动，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单独发展。而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以最大的毅力为全体平民的事业而奋斗，领导全体平民。当然不是在某委员会里占着几把交椅，就算得了领导权，而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无产阶级在政治中的影响。

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俄国民粹派的“平民均分土地主义”（Tchern'ey Peredel）、中国国民党的所谓“民生主义”亦是资产阶级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经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进步。我们应当知道：在封建军阀之下没有别的方法行近社会主义，只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平民的革命独裁制。所以无产阶级在这种时代，当有正确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这件事非常之重要。经济斗争的工会运动固然要紧，而尤其要注意民主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做‘平民使者’而不应当仅仅做‘工会书记’”。必定要如此，方才能尽无产阶级的天责。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亦就是颠覆资产阶级社会的健将。他的力量，正在他阶级意识明显，并且有组织有系统的奋起而为政治斗争之时。

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就是在经济斗争之外，在工人对

工厂主的关系之外。此种知识所由来的地方，乃是各阶级对于国家政府的关系、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所以对于“怎样为工人求得政治知识”的问题，决不能像普通的实际运动家（更不用说偏向于“经济斗争主义”的实际运动家），永久只有一个答复：“往工人间去”。要与工人以政治知识，社会民主派（共产派）应当往各阶级间去，应当派遣自己军队到各方面去。……试举一个最近几年的社会民主派（共产派）的机关，看一看他的工作。他“和工人有联络”，就此自以为满足了，只知道发发传单，专说工厂中的虐待，政府帮资本家，警察的凶横；和工人开会谈话，大致也不过谈这些事，几乎绝对不出此等范围。至于讨论研究革命运动史，俄国内政外交问题，俄国西欧各阶级在现代社会中之状况及现代社会的经济进化等，则可以算绝无仅有。更不用说有系统地实行扩充对于各阶级的联络关系，那更梦想也想不到。实际上大多数此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里的党员，只想着应当做一个工会书记，而并非一个社会党员——政治的领袖。其实英国的工会书记，亦在时时帮着工人行经济斗争，揭发工厂里的恶弊，解释一切法律规则的不公道，说明此等法律妨碍罢工自由及工人纠察队的职权，说穿罢工调和人的偏心等等。总之，凡是工会书记亦在帮助工人做“反对东家及政府的”经济斗争。可是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民主派不应当仅是“工会书记”而要是“平民使者”。应当：对于一切压迫和专制，不论他是关于哪一阶级的，都加以攻击。汇合一切现象而与人以警察政府富豪地主之残暴的总概念。利用每一件“小事”，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见解和民主主义要求之正确于人人之前。对于一切人和每个人解释明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世界的历史的意义……

“往各阶级间去”，我们是以理论家的资格，是以宣传鼓动家的资格，是以组织者的资格。自然，最重要的是平民的各阶级间的宣传和鼓动。……谁实际上忘了“共产主义派赞助一切革命运动”，谁忘了我们应当在全体平民之前，既不隐藏我们社会主义的见解，又要明白指出民主主义的总责任，那人便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谁实际上忘了自己应当在人人之先提出激动并解决一切民主主义的总问题，那人亦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列宁之《怎么办》，一九〇二年）

三

自自治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应当如此的去实际应用。中国现时的状况究竟在社会进化史上占何等阶段，社会运动的趋势和民主革命的方向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中国十二年前的暴乱，近因起于国内两个新兴阶级，争取统治者的地位。一、军阀阶级（财阀政客附）；二、商业资产阶级。中国商人阶级不能如英法当年，由商业资本直进于工业资本以组织生产，为数不多，经济力为列强资本主义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时他刚一抬起头，就受北洋军阀的当头棒击。治者阶级实际上已是军阀，然而军阀一则始终见此隐隐中的资产阶级力量，二则内部之间无力统一，三则现代中国处于文明的外国人监视之下，四则‘官僚资本家式’的军师（政客）要有新的运用方法，所以必需国会，以便涂饰耳目巧于持纵”。因而有此畸形的“民国”，其实还在封建宗法社会时代。

虽然，“中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却已经渐出于商业资本的阶段（欧战的影响很大）。所以近年来最大的现象：海员罢工、铁路罢工、矿山罢工、纺纱业罢工以及其他，罢工工人已渐团结积极组织。亦自然趋于运用自力争取立法权政治权要求最普遍的代议制”。资产阶级更大有进展，起而要求裁兵理财制宪，试组织“民治委员会”。可见“中国……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劳动运动混流并进的现象，这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使然。中国工业发达的途径与欧美大异，政治运动也必不同（民主与社会两革命间的进程紧凑得多）。中国资产阶级要自力发展，非去军阀不可，非去帝国主义不可。然欲去此二者，则必须借重中国的劳动平民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亦就非对社会主义让步不可”。（参看瞿秋白之《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前锋》第一期）

虽然，我们考察中国经济政治现状所能下的断语，仅仅是：“中国已渐进于资本主义而需要民主主义的改革”。至于资本主义的程度，是否已经发达到成就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的阶段，那却还待考虑。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实业虽受外国压迫，而五十年来确不能说没有进步。帝国主义当然要变中国成资本主义的而完全破灭中国原来的“半自然经济”。即使帝国主义能行妥协手段而缓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排外性，然而因此而实业又进一步。或者外资直接经营实业于中国境内，以至于和中国人合办，实际上夺去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然而实业因此亦有一更大的进步。在中国境内（在此一经济区域内）而有实业发展，则必要求更宽泛的市场，因此中国内地之资本主义化的速度愈增。外资愈侵入，中国资产阶级在此经济机体内愈膨胀愈深入——外国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缓和了这一部分，又“培植”了那一部分，再缓和了那一部分，又激起了第三部分。帝国主义的经济上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若无限度他便不是帝国主义了。因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无论如何，确在一天紧迫一天。

譬如中国绸缎之输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为四百万余海关两，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便已涨到二千八百万。中国矿物之需要，在五十年前为二千五百余万两，至最近便已达二万二千八百万，差不多增加十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一发展前面有非常之巨大的障碍物。军阀制度沿袭皇帝对商人的政策而变本加厉：重征暴敛，“就地筹饷”。更加以争城夺地，内乱不息。不但如此，更有类似于英法当年的“贵族与市侩”之争：“今之政客军人失势则办工厂，曰吾将以实业救国也，既办厂矣，朝开会暮投机，明日又为官，工厂遂为传舍”（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这确是扰乱市场的大害，然而也是不可免的经济斗争，不可免的军阀官僚之资产阶级化。中国的市侩又怎么办呢？他们但“愿吾国之工业家专心本业，尤愿吾国军政界之伟人，勤修己职，勿污工业界之干净土……振兴工业之道亦至简：（一）政府与工业当合作，凡妨碍工业之法令制度当皆革除；（二）工业组织当大，则资本与人材皆可经济，而得多所制造之益；（三）当多设制造机械之厂。机器为工业最要之资本，故孙中山有机器借款之议，然中国本有煤铁，与其仰人供给不如退而自造，仅购基本之机械，即可源源供给各业之需要”。（同上）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梦想。理财制宪裁兵及民治委员会的尝试又是个什么味儿？哼！美国公使休门尚且教训你们说商人当自组政府。颠覆军阀的民治革命始终是不可免的。

复次，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还有一种更大的障碍。我们看：（一）“一九一六年以后吾国之棉织业遂呈空前之活跃……至一九二一年底，全国共有纱锭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计华商一百三十四万枚，日商八十六万七千枚，英商二十五万九千枚，其余未开车者一百三十万枚……”（穆湘玥之中国《棉织业发达史》）外国人在中国棉织业中占二分之一的势力。（二）最近几年（一九一八）中国铁的产额约共三五五〇〇〇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的铁矿，总共的产额就是三三六·五六一吨，简直是全数。至于汉冶萍等的“官办”“借款”式以及其他形式的铁矿，所产有限。（三）最近几年煤的产额约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吨，而日本之奉天抚顺及山东淄川中英“合办”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却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吨，几乎占二分之一。中国自己还打算制造机器，岂不是笑话！中国的资产阶级对这有什么办法？他只知道“今者，关税已有修改之机会，各国对于中国通商之待遇亦将渐趋平等。此正吾人发展国外贸易之日，工业革新不容更缓，自动发展时期之后若继之以通国合作，吾知中国工业史上之黄金时代，不难立致也”。（杨铨）唉！临城案时留华美侨已经主张撤销华会优待条件。临城案后铁路共管问题已经紧迫万分，等到“中国各要地都驻外兵”（美侨主张），等到

“美国派委员会来替中国组织政府”整理财政（密勒评论），那时关税虽增加，于中国还有什么利益？那时难道还有中国？人家筷子头上落下来的骨头，不是好吃的，吃了就要套上嘴套系上链条的。独立自由平等，都要自己花气力去争。那颠覆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实实在在是必须的。

中国的现状约略如此。解决这中国问题的主张，最近几年随欧战而兴的“新文化运动”里约略可以分为三派：一、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革命主义；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派）。

虽然主张的人亦许事过遗忘，而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不管个人。现时明明还是可以看见社会之中隐隐有此三种心理。

第一派的心理，可以看两年前张东荪梁任公等人驳社会主义的论调。当时虽是东荪发难，而实是任公综合这派的见解（一九二一年梁任公《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他的意思：一、“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盖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二、“欲行社会主义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三、“中国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诅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四、“唯当设法使彼辈（资本家）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剥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动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五、所以“第一灌输工人以相当之智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害之事入手试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等），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任公末后居然说：“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然而他主张对于资本家之“取偿较优亦可姑容”。他主张的社会政策，原是因为“生反动非彼辈（资本家）之福”；他主张不要太逼中国资本家“助外国资本家张目”。可见他完全站在资产阶级观点上来论社会主义。他的社会政策以至于工会运动无非是喂猪的食料，人要吃猪，当然愿意喂肥再吃。他的意思是说：“我只要你们工人容许这‘在奖励生产范围内’一条件。我们资本家当然来行些社会政策，使国内有生产事业，将来可以交给你们（？），现在且慢。至于要国家来办亦可以，只求你们不助外国资本家张目，暂时让我们多剥削些罢”。而他偏要“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他实以分配平均为社会主义。不知道谁和他同主义！他的平均分配及社会政策只可以算得“喂猪的社会主义”。梁任公以唤醒资产阶级觉悟自任，与我们劳动者或游民何与！无业的平民只

知道自己组织起来，以革命的力量要求应得的权利。劳动没有生产机关，我们就要求他有，没收军阀来办工厂。无所谓奖励生产。我们穷无所之，奖励什么生产。关心奖励生产，自有人在，如梁任公——资产阶级的代表。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只知道积极为群众的政治经济运动，既然要我们做工，当然你们便该给我们优越的劳动条件，优越了再优越一直到政权交给我们。什么叫妨害中国生产？要赚钱的资本家为什么不看见军阀和帝国主义妨害中国生产？我们只知道以革命的手段逼得资本家推覆军阀等等，劳动运动所取于资本家的，资本家当取偿于列强及军阀，不应当反过来请我们姑容。我们无产者怎样有姑容你们大人的资格？罪过罪过了！

总之，中国的民主民族的革命运动（国民革命），万不是和平的“试办一二件”的方法所能了事。必须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见解及手段来行。中国资产阶级的觉悟亦要在这实际运动里才能发生。何况他非受无产阶级的促进，不能举步。中国军阀及列强存在一日，便一日不容你“试办”，资本主义都不能十分容你试办，何况社会主义。革命貌似破坏，而实是彻底廓清旧社会，开新社会建设之门。英法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此，到一八四八年的德奥匈，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亦是如此：革命之后即开一生产力发展之长期。现代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任公派的猥琐懦怯正足以证实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他的社会政策正是瞿秋白所谓对社会主义之让步，对无产阶级的让步，目的仅在于保证资本主义的安全发展。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之“社会的下意识”早已觉得：只有唐山矿工，太平洋中国海员，京汉路工，上海纺织工敢于直接行动，以及最近长沙之五六万劳动平民的国民外交委员会能外慑日本且内夺赵恒惕之胆。只有真正的劳动平民能行国民革命。

虽然，中国的国民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的性质，这一层应当非常之注意的。

现在要说那第二派的心理了。第二派的解决法，大致说中国要社会主义。从完全否认政治运动起到相对非难民主运动止，其中阶段非常之多。然而最主要的就是：现在社会主义时髦，是“理论上之极致”，或者是，宗教式的信仰抽象而不着边际的“无产阶级”。假使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精密的社会科学来运用他的策略——竭力参加民主革命并组织一切劳动者及平民，他们就说：“那就要这些人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才行”，或者简直说：“那么，这一党是失节了”。其他种种无政府派的论调，大致相仿佛。那前一种的代表便是努力（六十六期时）的高一涵，后一种的代表可以随手推举今日（二卷四号时）的初民（虽然今日之初民已非那一“今日”之初民了，他最近在《努力》六十六期已是另一主张。可是他个人不成问题。中国社会思想中现时确还存在这种心理）。这第二派的两种心理可以并合批评。如高一涵的意见是：国民运动是好的，

可是必须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他说“要国民党自身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殊不知，中国现时需要国民运动的真正国民党，正因为没有发生可以公开的社会党，并不是说对政府不能公开，而是说对平民群众，甚至于工人，也不能公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很浅，当然没有大生产中之纯粹无产阶级（参看《前锋》杂志第一期瞿秋白及我的文章）。俄国发生小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五六个人的劳动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 nya Trouda）——朴练汉诺夫（Plekhanoff）、乍苏黎池女士（Ve'ra Zasonlitch）等，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俄国集中的工业资本已经有五万四千一百万卢布。他们那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尚且还只是民主运动，宣传学理和指导工会组织，绝不敢称政党。社会主义的政党，必定要能明显地拿着主义的旗帜走入劳动群众，而不为群众所诧异；必定要能对于日常政治生活次次提出社会主义的解决法，而不为群众所不了解。而那时俄国并不单因为政府压迫，而因为资本主义改组社会生活的火候还没到。虽有许多工人，而都是刚从农村来的，或尚未完全失私产，或方失私产而求恢复之心甚殷。他们不诧异而能了解社会主义的运动之心理的物质基础还没有筑就。所以那时俄国社会运动发展之限度还只到民主主义之最左翼的地位（沃尔洛夫斯基 Orlovsky 之俄国马克思主义史略）。中国现时工业资本仅仅一〇八·九〇二·八一一元（一九一八年），约比俄国当年少四万万，仅有其五分之一。不但如此，俄国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五年间，资本主义发展已大进步，纯粹工人有二百余万，工业资本已达十八万万一千六百万卢布，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已经成立而稳固，那时列宁尚且说：“往各阶级间去！……做总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现时真正的社会党（共产党）并非仅仅代表国内六十一万的工业无产阶级而存在的（这普通工人数是一九一五年的统计，现在至多不过一百二三十万）。假使仅仅有此，他早已不存在了。他的能存在，乃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争取政权，他不得不赞助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辅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在世界的斗争范围之中，与国际无产阶级同具最终的共产主义目的，所不同的是斗争方法：先进国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以至于劳工独裁制，中国是国民运动统一战线以至于革命独裁制，然后再进。中国一千万人的手工业劳动者四千二百万户的农民劳动者中的一百二三十万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斗争范围中，与普通所谓“平民”同有民主革命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目标：资产阶级是要法律上的平等，无产阶级是要事实上的平等，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所以中国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并非采取了白字黑纸的理论，就算社会主义的政党。没有物质基础及实际运动是不能凭空造的。至于国民党尤其不能变成社会党。真社会党在中国尚且只能以世界共产党支部的资格勉力栽培无产阶级

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主运动中勉力做主干。何况国民党历史上就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那时的所谓民生民主主义都只是“富强”——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看孙文《建国方略》便可了然。他说民主共和是他教小孩子似的教中国国民的功课（第一册第六十页），原来并非中国平民真要民权而他代表这种心理来抗争的，乃是因为要“富强”非共和不可。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才渐渐接近民众，接近那真正要自由的学生会、真正要平等的海员工会等等。国民党到现今方才开始走上民主主义的路，渐渐想代表平民群众而抗争，行真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党，首领制个人主义的义侠策略——哥老同盟会的祖传，如此而已。现今国民党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倾向，也只是因为社会中实际上有了学生工人商民等的运动，“社会的物质”已经稍有端倪。然而至今他的根本观念还是在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已。同时一方面，宣誓“维世界之和平”，这不是对帝国主义畏怯，便是对社会主义让步。可见仍不离一种“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过如此。

既然这样，国民革命的真国民党是现时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然在此总运动中，只有以世界无产阶级的观点为根据的政党，才能用社会主义的见解及运动方法来促进这一国民运动，或者简直改造国民党。同时这亦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正确的策略。

于是可以说第三派了，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那么，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然而现时真正共产派的运动在中国亦不过是“耶各宾”——最底的最左的民主主义运动。大概而论，要劳工阶级真正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假民主主义的不可信，绝不是几本书可以办到，而必须实际普遍的政治经验，小孩子不烫手总是要弄火而且应当弄一弄火，至少也要远远地试一试火的热性，那时群众意识再能实实在在进而求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劳工群众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第一，就是要拿“耶各宾”的方法加速革命的过程；第二，就是实际上去感受感受资产阶级革命之不彻底（不完全反对列强及军阀到底）；第三，就是在这运动之中无产阶级能得必须的政治智识及经验，增高一般的程度。

所以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在原则上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政治经济上——都是绝无疑义的。既然应当促进国民革命，便当有国民革命

的中心。列宁说：“我们应当组织反对政府的一切势力成一全民的运动。……这样去实行各方向的政治鼓动应当有一政党，能结合一切攻击政府的‘军队’成一统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体平民的名义去行。再则，实行那无产阶级之革命的训练工夫，一方面严格地保存政治独立，并领导劳工阶级的经济斗争，别方面利用一切剥削者与受剥削者之自然冲突（剥削者本来日益替我们‘拉拢’新的各种无产阶级分子）；凡是这些工作都要集中于不可分的统一行动”（《怎么办》）。中国国民运动的主干，亦应当如此，并应当由此主干扩大国民运动的中心，那时势力才能凝聚。

然而要造成运动的中心，必定要用社会已经有的实力。我们理想一个乌托邦是幻想，理想一个“理想的国民党”亦是幻想。中国现存的国民党，因其宗法社会的出身，旧历史的关系，军事崇拜的习惯，中国旧式下等阶级的会党遗传等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现象。他当时亦确只能如此，而且正唯因为如此而能行一部分历史使命。与他同时的其余一切维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会式的，而绝无革命性。只有国民党能秉此革命性而适应进化。可见中国现有的革命材料旧的只有国民党，新的尚未集中。所以只能，并且十分应当适合现时社会的动象，就现有的材料努力改造，集中实际生活所涌出的一切新的革命派分子于此党。况且时过境迁，国民党以前的不纯分子，当然要在淘汰之列。不过应当就在集合新分子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既要组织政党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儿戏”了，什么发咒打手印等。我们现在必定要有明切的政治主张来号召，不纯分子的行动不能与之适合，就立刻请去。于是劳工派在国民运动之中的基础，亦就因此而凝聚起来。换句话说，便是根据于现时实际经济动象而改造国民党，使从模糊的革命主义进于真正的民主革命及民族革命主义。那时的国民党方才能做国民运动的中心。

如是的去造成国民运动的中心，正因我们参与其事，我们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便亦建立，而得日趋巩固。在这运动的急速的过程里和社会经济的动象中，“阶级利益”必定渐渐突显。到那个时候，即使仅仅是国民党左翼的分子，亦就很可以勇往直前，走上他们所应当走的路。何况无产阶级呢！

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是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那时简直实现对等的联合战线。可是这种群众党的基础，正要筑在国民运动中。

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地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

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

所以现时必定要：

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于经济的及政治的斗争。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斗争到政治的斗争。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地宣传国民运动里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目的。（陈独秀之论国民运动及国民党。）

一九二三，九，二十三。

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山川均 著 王国源 译

(一)

俄国革命第二年，即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的布告，把旧制度的征收农民的五谷一条废了，改为照农民收入的生产物的多少，在其中取征全数的几分之几，即是纳税制度。但是战争的结果，这种制度并未实行。到去年（一九二一）渐渐恢复平和状态，于三月二十二日召集全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再把从前的布告拿来讨论了一次。依此布告把从前征收谷物制度是废止了的，于是照农产物纳税的制度遂实现了。这种制度，要算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其当然的结果：（一）从来国家独占谷物制度废除。（二）农民给国家纳税后剩余的农产物，可以在市场中自由买卖。即是不管好歹如何，而小规模的地方的自由商业从此复活起来了。（三）因此工业方面有资本家和国家合办的企业，或工场的一部分，可以借给国体和个人。（四）虽是外国人的财团，与资本家，对于天然的财源，或一定的事业，许其租借。又有六月十二日的布告对付此种变化，即（五）财政上的政策一改变，邮政、电信、铁道等，规定成一定的金额，更依十一月十三日的布告，应付金融上的要求，于是开设国立银行。

采用这种新经济政策，很受资本主义的世界，反对共产主义者和降伏无产阶级的欢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改良派，对于现社会主义实现的方法，证明共产主义者见解的错误，而反夸自己们的识见高明。可是还不止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者的左边站起的人，看了这新经济政策，亦以为：“苏维埃政府对于农民一让步，早就失掉了无产阶级政府的性质”。进一步说，一般人听得新经济政策的消息，忽然大声叫起来：“俄国的光荣，已经过去了！世界的人们，得了这种消息，心也冷了，一阵阵悲惨起来了！我的悲叹的心！放雄些！再来继续的奋斗哟！”（Shilpa-Boco-sed 女士）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在无产阶级的独裁或限制之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许可其生产物的资本主义的交换。即是许可资本主义生存在无产阶级独裁或

制限之下的一种新方法。单是这点意味，已足助资本主义的世界要驱逐无产主义者的高声喝彩。往往说：现在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列宁常常说明新经济政策，爱用那“在经济的战线上打败仗”“共产主义的一步退却”等话来撑场面。

这样看来新经济政策的采用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马克思的学说上观察起来，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极有趣味的一种问题。本想先从经济政策和马克思学说的关系上着手研究，可是对于新经济政策采用的路径与实际的情形也不能不常常放在眼目中。

(二)

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为劳动政府的成立期，国家的政权从此就该无产阶级执掌了，同夜，对于土地的处置问题，也宣布告示，把大地主的土地、寺院和尚们的领地，和皇帝家的土地，统统一齐没收，皆为国有，即是人民全体都有份了。第二年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布告，居然承认这种原则为金科玉律。可是照原则的规矩，土地既归国有，应该如何利用处置呢？在刻下的俄国的农业技术的程度上，还是不外分给各家族，使他们各自去耕种罢了。因此农民对于土地的分配就有要求了。从那些土地之中把既进步的农业技术所经营的各部分，或特别共同的适合于应用社会主义的各部分除外，没收的地面的八分以上的土地，完全分配给农民。土地的原则，土地原归国有，为人民全体的东西，受分配的农民，不过仅有使用权而已，可是土地既分给农民的家族去耕作，事实上与土地私有又有什么分别呢。

于自己的所有生产机关，应用自己的劳动力，造成的生产物，当然是自己的所有物，私有财产的神髓和出发点，就在这里面。工业方面的手工业，农业方面的小作农夫，就是他的代表制度。但是利用机器的生产机关，为集合的，社会的，造成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政策。对于此点却无论如何已经从本来的私有财产主义，跑出轨道了。

因此特别从大地主手里夺过来的土地，再分配给一般农民，使全体的农民当小地主这件事，还只算得私有财产主义之一种。于是那跟着社会主义的经济状况走的极讨厌的小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又大繁殖起来——不论从哪方面说，这种办法，绝对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

说到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回事，要算社会主义对于小资本家的生产上，大大的一回让步。

就农民的心理状态上说起来在纯粹的私有财产主义上立脚的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依环境生变化的农民，只是要求土地分配而已。他们时常都在叫“土地国有”！“土地国有”！那不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意味，绝对不是把那土地当作社会主义的利用的意

味，太不彻底了。没收土地的分配对于农民里小资本主义的思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让步的结果。

现在从马克思的说法上看来，俄国革命的第一步岂不是就弄错了吗？不然那就该和马克思一致。依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实现的根本条件，要生产方法成社会化，社会主义好像把甜柿子接在涩柿子树枝上一样，小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不是从社会主义的理想接枝后可以实现的。

若革命后六个月，或一年之间，就有变化农业技术的想象，或者土地不至于分配，这也不知道的事。但是农业方法的社会化，最少要十年光阴，而且第一步若电气化政策不实现还不成功。何况农具，家畜，也不够，比从前的农业技术，更加一层原始的状态，那怎么做得到呢。假如俄国革命，要想在这种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做社会主义实现的梦，分配土地的问题也不去从速解决，那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之间的联络一失，立刻破坏，没有话说。

没收的土地，大部分是分配给农民的家族的。

(三)

但是照以上所说的样子，自作小农制度，要算标本的小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应此制度而生起的交换制度，不待说，是自由买卖了。农民自己劳动，自己生产，所生产的东西，自己所有，自己处分的要求，是自然应该的。

谷物的买卖自由，为小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必然要件，也是当然的结果。

在当时的形势，任随经济上的自然却还做不到。各资本主义的列国直接间接来相干涉。依赖他们的资金军器将校而动作的反革命军，把俄国的版图占去了四分之三。

俄国当此，外敌内乱不期而生。因为要对付这些反动运动者，维持革命事业，就有养二百万赤军之必要。因为要养赤军，不从农民征收谷物就不得下台，又想复活都会的工业，不得不从农民处支给劳动者的食物与原料。

若都会的工业发达了，能充分支给谷物的代价——农民所必需的工业生产物，那就不成问题。但是俄国的大工业，发达很迟，加上五年战争的结果，都会的工业，受了农业以上的打击，生产力衰弱得不成话了。劳农政府仍然继续这种状态，拼命地想法子恢复生产力的元气，可是战争的结果，一般大工场，都不得不趋向制造军需品一方面。农民的谷物代价——工业生产产品，哪有力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呢！论起来，农民的生产力一增高，从农民处得了很多的农作物，都会的工业生产力也就有增高的必要。要增高工业生产力，不得不从农民得丰富的农产物。如此，成了一种循环理论去了。

总之，要维持革命，不得不征收农民多数的谷物。然如上所说，因为工业的生产

力不足，都会与农村之间，正当的交换也不行。此时若是农民拒绝交纳剩余的谷物又要卖投机的高价钱，秘密地输送到都会，那就除强制征收剩余的谷物之外，或更取战时的非常手段。

最初一九一八年，工场劳动者，组织了无数的宣传队送到农村去，又将农村的无产阶级分子，组织成贫农委员会——去支配富裕的农民，才稍稍把谷物的流通，弄圆滑了些。可是一时要养活五百万以上的赤军，和维持军需工业，这种不规则的方法，早就不完全了。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所需的谷物，要应生产力的要求，于是向各地方去分配加租，同时对于教会的工业生产物的剩余，命食料委员，统统送到农村里去。当时农村大宣传一起，于一九一八年收集了三千万卢布的谷物，一九一九年一亿一千万的卢布，一九二〇年有二亿六千万的卢布。

如此对于农民谷物的代价，务必把工业生产产品分给他们，但是为数极少，大部分都是纸币。一九一八年与一九二〇年中间，农民给政府供上的农产物，其代价与工业生产产品两抵下来，一年有五亿以上的相差。其实赤军的兵卒，六分或八分是从农民中出来的——这且暂时不谈。

然而农民要维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其牺牲之大，可想而知。

革命的结果，因为农民牺牲过大，反使都会的劳动者们，得了便宜，到处的农民，对于劳农政府，怨声大作。

但于事实上，就尽不然。革命中占便宜的，并不尽是都会的劳动者，乡间的农民，其实比他们好得多。一九二一年七月至八月，第三国际联盟大会开会时，布哈林的演说中有几句得力的话：“农民虽是苦，未必有劳动者那样利（?）。别的什么权利，或政治的权利，且不必说，拿经济上看起来，农民比一切的阶级都要占利益些。无产阶级，虽说是胜利阶级，而在经济方面，农民所得的利益，超过无产阶级好几倍”。农民不喜欢征收谷物，是实在情形。乘着这个机会，帝政派的残党，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都来煽动农民给劳农政府捣乱。可是这些反革命军，把得胜所占领的地方，不论何处的土地，尽从农民手里夺回，交给大地主。农民在战争中，支持劳农政府，已吃亏不少。怪不得各地方都举起反旗来。但是要维持革命，难免不做出些对不起百姓的事情来。其惹祸的根子，就是征发制度。

征收谷物时，同时又须防止他们秘密输出，或做投机的买卖，于是谷物为国家所独占，禁止自由买卖。但是这种制度的根本主义，如后篇所说，大有经济上的矛盾，决定不是稳当的政策。又因此制度出现，即刻使社会主义的农业，进步生出大障碍。在当初一九一八年劳农政府，已有主张纳税制度的决心的表现，不过因战时状态，简直没有实现罢了。

(四)

但是到一九二一年，形势忽然一变。一九二〇年一月台居金一死，亚尔汉格尔入了苏维埃的掌中。十月十二日与波兰国订的休战条约成立，十一月十四日击破蓝格尔的军队。资本主义的各国，从此觉悟了武力干涉是没望的。于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俄通商条约，居然调印。

如上所述的，一般农民，至死都反对无产阶级独裁制度，劳农政府，若是单靠武力来支配农民，那就错了念头。布哈林说过的：“那样的事情，虽说是有权力的政府，到底还是不成功的。”劳农政府，能继续三年多的征收制度，也并不是暴力的结果，其实革命运动，被反革命运动逼迫之间，这种制度，也具有相当经济上的基础。但是内外的战时状态一去，平和状态一复元，此政策的经济上根据已失。因此农民也反对这种制度，主张自己的利益去了。

从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建设上看起来，此制度早就不能维持下去了。如布哈林所指摘出来的“农民大家都喜欢，如一九一七年布尔塞维克所做的，把大地主的土地，通通分给他们，农民的谷物，又去供给共产主义者。”可是到一九二〇年的共产党，就大不满意这件事。当年的布尔塞维克是一件东西都没要过，把所有的物件，完全都给农民去了。现在就不然，什么都不分给农民，就是谷物的剩余东西，还想拿去。他们看来，不特这点事情，而且和农民的生产方法不能相容的共产主义，也大大的宣传起来。农民要依赖劳农政府的原因，为的是那点土地想长久拿到自己手里，土地出的五谷，并不是为共产主义。就是在平时无事的时候，依然要征收谷物的剩余，在农民则生产力一增加，入不敷出，互相利用的老汤头，就行不通了。因此，耕地的面积，和收入的标准，不得不大灭其色。今日的俄国，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进步的主要条件，就是生产力增加了。增加生产力的第一要件，就是食料增加。从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变迁上看起来，自来的农民政策，早就维持不下。

自从征取制度一撤废，想得买卖自由农民的要求原就不像反革命派所夸张的那样凶了。可是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惹起了农民的反抗。原来征收制度，容易使农民负担不公平，在土地肥沃的地方，农民倒还可以饱食暖衣，在不肥沃的地方，则不过仅能维持贫苦的生活而已。于是一般农民，对于谷物征收的条例，更加反对得厉害了。

这种不满意的感情，在莫斯科省的农村苏维埃会议（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席上，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的了。此回的会议，约有三千名的农村代表，都是异口同声地主张：“我们当如何进行的事，我们是很想知道的。我们极愿意把我们的义务确实指定出来。从共产主义者看起来，都以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了。虽然我们是俄国的脊

骨一样。社会革命的力量，只有从我们身上才可以找得出来”。若是照这种样子做起来，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若把经济的根据一失，对于农民，单靠权力去支配他们，很觉可怕。总之，不管经济上的必要，或政治上的理由讲起来，对农民的政策，不能不改。

从这种危机里面产出的怪事，就是克龙史泰的海军反叛一回事。这回的事，明知道是反革命派的阴谋弄出来的，可是一方面对于农村强硬的社会主义的设施，惹起小资产阶级的反乱，不无原因。海兵大概都是农民的子弟，其中乌库拉也纳的农民，更占多数。乌库拉也纳的农民，原比中俄的农民要发财些，与其说是俄国的农民，不如说是德国的农业者还要相近些。他们休假回乡中，受了农民思想的影响，其结果，就反起来。（据布哈林的说法）

在此形势之下，一九二一年，共产党开大会，做出一大有英断的事，把谷物征收制度废除了，大家决议下去，采用依生产物定纳税制度。于二十三日，将此决议宣布出来。依此布告的办法，农民该从土地所出的几分之几，给政府纳税，剩余的，拿向市场去自由买卖，或与其他物品交换也可以。谷物既可以自由买卖，其当然的结果：谷物为国家独占，国内商业为国家独占的老法子，就除掉了。于是都会与农村的交换，务必用产业组合的团体去干，同时就是私人的商业，也被公认了。比从前的法子，好得多。（请看以下的注 I、注 II）

注 I 从来的征收制度，和新税的负担相差，请看下面的表，显见其农民的负担减轻了。

产物	征收（一九二〇—二一）	租税（一九二一—二二）
谷物	四二三百万蒲德	二四〇百万蒲德，
卵	六八二百万个	四〇〇百万个，
麻	五一〇〇〇〇〇蒲德（下同）	三四〇〇〇〇
大麻	三五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羊毛	一二七五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
牛奶	三四四一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
油种	二四百万	一二百万
洋芋	一二〇百万	六〇百万

注（II）对于三月十三日的布告，最初一般农民，很怀疑惑，可是不久，全俄的农村，大受刺激，耕地的扩张，播种的繁殖，就到现在，都没详细地统计。食料委员瑞德斯义说，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所征发的谷物，有四千七百万蒲德；次年的——一亿八百万；第三年的——二亿

二千万；第四年——二亿八千四百万。但是到十一月十一日所收入的，已达八千八百万蒲德之多，其中五千七百万蒲德是由新租收取的，与一九一七八年间收入的十七分之八九相当。

(五)

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全凭农业政策撑持，可是手工业、家内工业、其他的小制造业，就不同和自作农一样的同有经济上的性质。而且在俄国，这些小产业，常与农民经济上有密切的关系，若农业上生了问题，同时所有的小产业，也难免问题发生。

俄国人口，有八分是农民，经济上的消长，常依农产物的丰歉为转移。就在战前工业最盛的时代，国民的全生产额的一半，都是农民的生产。拿这一件事看来，就可知俄国经济发达的程度。占这可怜的工业的大部分的东西，就是小工业。十一月革命后，主要的大工业，尽归国有，依社会主义的目的在经营。那些社会化的工业，与其他小工业的生产物比较，虽还没精确的统计，可是朴联活白腊仁斯基说，恐怕现在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三都要算是不被社会化的小工业的生产物。这些小产业，在一九一八年与一九二〇年之间，因征收与换纸币而给政府租税的生产额，若以战前的物价来计算，总在六或六亿二千万金货以上。

依以上的数目，俄国的生产，可见大部分是农民的生产。工业的生产，是靠手工业与家内的工业的生产，或小工业的生产。社会化的生产方法的大工业的生产，反不过占一小部分的位置而已。这些小工业在经济上的性质和小自作农民一样，依赖私有财产主义的标本生产方法为生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完全相反。

若是十一日那回的革命，一举就把小工业打倒，从新扶起满足农民的大工业来，那么早就没有什么问题发生了。但是一方面不能把大工业所需要的机械原料、生产技术等从外国输送进来，一方面又有三年的帝国主义战争，若废了的工场和交通机关，恢复不起，在当时的俄国，前途实在黑暗。若果真俄国的经济生活，有依赖小工业的必要，为国民的生存起见，依然除靠着小工业以外就没有法子的时候（革命的第二天，因农业组织，不能改为社会主义的组织，除依赖旧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以外没有办法时，就照自作小农制度的法子，容忍私有财产主义，法子都差不多），把小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中所包含的私有财产主义，除容忍而外，还是没有办法的。私有财产主义的自作小农，不能随便和社会主义接枝。那些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生产方法，无数的小生产，虽完全收在国家手里，然而要立刻把它改变成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却是不可能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主义者，处于如此的窘境，在当初亦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

(六)

但是反对派还说：“布尔塞维克的一切希望与纲领，到底有何价值。布尔塞维克自己，早已抛弃其所主张，而一般劳动者，为什么不能不信用他们呢？若是我们看来，布尔塞维克的纲领，既不得不抛弃，就没有把权力委给列宁与杜洛茨基的必要。孟塞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于这些事情的理，我们以为就充分到极点了”。

奈林对于以上的话，他回答说：“这种话，完全差了。在事实上，现今所行的事，就是在把歪的东西，想弄端正。十一月革命，当时我们握掌政权最初的一年，已经将我们所采用的纲领，立刻停止施行了。因迫于种种的事故，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我们常常脱离我们本来所规划的那一根直线。而今战争告终，本党可将国内的形势，看如何才能调查得清楚……在战争的混乱中，重将本来的直线弯曲了地方，矫正端直，意在重新整顿一回使其端正如前……”

依这样说法，试问本来的正直的线，是什么东西呢？奈林又继续地回答说：

“布尔塞维克的纲领，从前、现在是一样的。就是想做到社会主义完全实现的程度，把资产阶级的权力打倒，将劳动阶级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独裁树立起，被世界大战破坏了的俄国经济，和受压迫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恢复起来，这是目的。于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国有化（移在有支配力的有组织力的劳动阶级的管理下）。就是从来的资本家的产业与交通机关，从资本家手中经营所准备的基础，使它成为国有化。此生产阶级的政治的职分居然占有经济的基础，如此全经济（包含农业）社会化也可能了，技术上的根底也造成了，而且可以大扩张特扩张。

“以上所讲的，就是我们行动的纲领，又可以说是政策的根本。人口的多数，不是无产者，全人口中五分之四是中下的农民造成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流水（在俄国现状之下），遇着这条水路，哪有不流起前进的道理呢？农民经济不是共同的财产制，是在私有制度之内活动的一私有者而已。在农民所有的私有经济，并没有利益，自己一家所必需要以外，要图大规模的生产，也是不行的。

“若是这种经营还不错，有时候可以活动自由，和小小的私有经济的生产物来交换。那么，对于农民经济必要的商业与小工业（锻冶、制粉小规模机械制造工业等）来极力取联络，得活动的自由，为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因此小工业上的自由，也是必要的东西。

“占了大部分的人口，具这样经济上的特质，已经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革命时，为布尔塞维克（今译作波尔札维克）充分地表明了。对于经济生活方面，实现生产阶级独裁的形式与方法，农民的经济，是万不可能缺少小资本主义经济的帮助的。因此，

少数的劳动者和多数的农民，当然有提携的必要。可是我们想把根本的目标到达的纲领，使它强固的原因，在意识制限必要的自觉之下，是十分有把握的。

“在工业方面，这大规模资本家的工业，与中流资本家的工业，才可以和国有化这句话相当。我们何尝主张过‘一切的工业的生产，完全要弄成国有化呢?’”

关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发布的产业国化的宣告，是当时在柏林的奈林与格拉心起的草。就将这种意思，作为提案的基础。那时的宣告，仅仅规定以时价五十万金货以上的资本所经营的工业，归为国有；手工业、家内工业以及直接与农民有关系的小工业，全然没去惹动。奈林这位英雄，要算定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主要人物，这件事，并不是偶然做起玩的。立法上行政上都用极明白的意识去研究和表示过的，这种慎重的态度，就是当年经济政策的特别处。

去年十月二十一日，列宁在第二回政治教育劳动大会上演说了一场，我把它写出来载在下面：

我看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的采用新经济政策，没有人不吃惊说他们变化得太激烈。可是新经济政策，从外观以上看来，包含得我们的本来思想不少。对于经济政策，苏维埃政府，到底要生如何的关系的一种问题，自从在泊来斯李德斯克与德国的讲和成立后，在那平和建设有几分希望可以着手的一九一八年的前半年，曾经非常细心而且严密的研究和计划过。当时我们对于农民的经济生活，不断的前后思维，务使国家的资本主义有起色而后止。但是内乱勃发，与共和国绝望的一种危急，逼起我们，去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分配，不过是短时间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管理与社会主义的经验的时期，尚未通过，共产主义最低程度的发达尚不可能的一种实情，给我们一回大教训……

卜李阿巴善斯也说：“若一九一八年没有激烈的内乱，不消说，在俄国的小产业上所有的特别意义，以我们三年后的今天所采用的政策，用在三年以前也是一样的。”

依以上所说，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对于私有财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各种小产业，并没有打算随着共产主义起同化作用，已经明白了。他们本来的纲领只在于适合资本主义的经营的程度，限于已成就的主要工业，移到政治所组织的劳动阶级手里去，改归国有。手工业、家内工业、其他的小工业等，务必使它依旧不变样式，因此这些小工业的生产物，能自由买卖，就大做起生意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供给组织”的布告，由地方苏维埃封闭的商店，重新开张，政府单和国有化的大工业生产物来做生意，小工业的生产物，专由产业组合，或个人的自由买卖，一种明白的

规定。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以这种办法，为资本主义发达迟的俄国里进行共产主义的唯一无二的法子；这是小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与共产主义之间最短的距离。

可是实际上论起来，与直线相离，是万不得已的事。

“这些原因，在农民中和劳动者中，是寻不出来的。事实是这样。旧时的都会资本家，拒绝了经营商业。接着小工业经营的事件也拒绝了。法律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店铺被封锁了。有资本的人，在布尔塞维克治下，财气不振，所以关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后数月之间，小商业与生产，不大旺盛，也还继续下去了。他们以为布尔塞维克自己做事不正，即刻就会下台。事实却不然。因此他们大家都把组织上的进行停止了。他们尝说：‘我们大家想布尔塞维克倒，而一时他们却总不倒。’当时阿尔哈的船舶所有者，全然停止修理，做木贩生意的人，也停止采伐，简直成了一种不可收拾的现象。其结果，到今天害得我们烧湿木料过生活。……”

“一九二一年的现在，形势完全变了。小资本家们，都相信苏维埃政府从此能够长久坚固了。……但从前并不是这样的。‘无诚意的’政府，把中间商人的职务，与使用十人十五人的劳动者的商店，完全接收下来。最初本来暂且置之不问，然而他们自己慌乱，无形怠工，政府不得已，也去领来代办。

“一九二〇年秋天，蓝格尔的反革命军，被最后一回镇压下去了，布尔塞维克主义永久继续的观念，在我们头脑里作起怪来……”（奈林的演说）

最初着手经营五十万金以上的大工业，因为这种形势，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渐次比较小的工场归国有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简直变成法律上的形势去了。就是经济委员会，使用十人以上的劳动者，一切的事业尽归国有的布告，宣布出来了。

可是这些小企业归国有以后，到底怎么样了，未必是极不经济的经营，不然，那些小工场还是被旧主人封锁了的旧样子，放在那里的。所谓小工业收归国有的话，不是小工业在国家手里经营。从俄国的经济上看来，小工业的生产物的大部分，当时自然消灭，这是很明白的。

依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三日的布告，上前年十二月的布告，是被取消了的，这些小企业与小工场，借给个人或产业组合去了。

其结果，俄国的小工业已经恢复到哪步程度一回事，还没精密的统计，虽二三实见者可以记述出来，可是马上就生了变化，总没一定。

注 前年十一月三日，在莫斯科共产会议场中，依加麦奴的报告，莫斯科租出了百七十件的职业，其中二十三件职业，都是金属工场，其他尽是食料的职业，期限一年至六年，租金为生产物的百分之三及百分之十。十一月二日的《经济生活》（最高经济委员会机关报）所发表的，统计十月十四日到三十一日共十五日之间，在莫斯科租

出了四十四个工作，今天把它列在下面。

	金属 工场	家具	化学 工场	木料 细工	印刷所	制革	面包	合计
(11月14日)	18	4	10		6	4	4	47
(10月31日)	27	14	16	2	9	10	13	94

又十一月六日原报载，新经济状态，发达极其迅速，关于食料品的产业一件看起来，到十月十五日，全国的二千二百九十二制粉工场，就有千八百的酪农场租出，又据加奈戈省的报告：本省的统计千四百一十的工场中，九十三的工场，是国家经营的，新政策的结果，到十二月一日，借出三百四十的制粉所。租出的条件有许多的规定，试举一例来看：前年十一月所租出的彼得城的电力发动机制造厂，以五年为期，第一年要二千个以上的生产，第二年要三千以上的生产，到第三年以下要五千个的生产为条件，租用金在生产物中，抽取百分之十四，不然就不出租。

以上的事情，不过是片段的记载，其实俄国的工业，恢复得极快，如石炭的产额，渐渐已增加起来。

东纳地方，七百的炭坑中，二百五十的炭坑，是国家经营的，从前年七月至十一月，共五个月的产额：七月有八百万蒲德，八月一千万，九月千八百万，十月三千五百万，十一月四千五百万。坑夫一人平均出的产额，从三月的二千蒲德至十一月就增加到三千四百蒲德。单是卜利安斯利一个炭坑，因为有新式设备，一个月，可以从二十万蒲德增加到七百万之多。

(七)

自从新经济政策出现后，跟着这种变化也就许多东西有革新之必要。

第一对于商业复兴上，货币就有改正之必要。从来国家的经费，为农民捐纳的谷物与国家的谷物交换政策所得的物品充当，其不足的时候，才拿货币来补充。

于是这些谷物与物品，专供给赤军的兵士、工业劳动者与其他住居都会的市民。可是国库一有不足时，马上就大发纸币来补充，纸币一跌价，更加倍地发起来，维持眼前的市面的恐慌，愈弄愈不得了，要想限制纸币的发行，似乎除印刷机械完全打坏至于不能印刷而外，没有法子。

到了这种光景，货币的下落，就是惹起货币废除的先声。结果纸币的价格，比开战时的卢布，只值一万另五分之一。但是既许商业自由之后，因之都会与农村的物品交换，依货币为转移，大有改良货币之必要的趋向了。同时有一部分劳动者，他们生活上的必需品，有许久国家不能支给他们，只能给他们发了些纸币，他们不得不就

将纸币拿向市场去买换物品，以供生活，及到货币跌价时，虽是可怜的消费者，也不免遭殃。前年十一月俄国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的“1922”，就新纸币产行出来，此新纸币一卢布，当旧纸币一万卢布。

无限制乱发纸币既停止，正确的国家岁计预算，就可以做得到。现在国家许多的国办事业，因为补助社会的必要上见有多少缺损的地方：最高经济委员会收入的八百亿卢布，支出却有二千亿以上。因有那些紧要事件郵便电车电信铁道等都规定成一定的价钱。（注）况且国家企业，亦应当以商业原则与私人商业竞争。

注 依财政委员格纳斯成氏的演说：铁道的收入，前年六月就有六亿一千万卢布，车费制度改正的结果，七月收四十三亿二千万卢布，虽有多数的食料与乘客是免票的送运，九月还是收了百八十万卢布。郵便及电信的收入，前年五月是千五百万卢布，六月初间，在十天之内，收入已达四亿七千五百万卢布。

银行在十一月革命时，先就收在国家手里去了，可是剩余生产物品，完全尽在国家手中，银行的用处，反转显不出来。然因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对于个人或产业组合的事业通融资本之必要，就发生起来，而对于外国通商更觉紧要，因此前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布告，开设国立银行。

既承认私人的企业，则属于各事情底下的劳动者们，不得不再和掠夺的资本家来会面。不待说，私人的企业，要受无产阶级国家的严密的限制，而且工资及标准劳动的决定权，依然还在劳动组合的势力之下。实际上，劳动者的境遇，并没有什么变化。对于此点，本想再为介绍一回，可是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总不外乎劳资关系的起事而已。这件事，对于同盟罢工劳动组合意见上起的变化考察起来，可以知道的。前年十月《劳动》（全俄劳动组合的机关报）报载：“俄国的现状以生产力增加为第一急务，工会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起见，对于私人的企业，于同盟罢工，亦可加以防止。但是要想绝对没有同盟罢工的事情发生，是办不到的。法律上行政上种种的解决问题，利用同盟罢工去，有时很觉便宜。……”

（八）

以上所说的话，我以为把劳农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大概表明白了。“因采用新政策，害得俄国共产主义者，把共产主义都放弃了。俄国从共产主义，把资本主义恢复起了。”俄国人“把共产制度，证明不能实行以后”，非难与欢喜两种舆论同时起了。

但是第一不可不注意的地方，就是从马克思的论说看起来，在俄国，并未实现过共产主义。前篇已述过，过去四年的俄国无论如何说起，单照目前的形式，有不能不

给养国民的苦衷。所以除将所有的东西，照共产主义的分配外，没有方子。俄国既迫于这种非常的状态，一时很觉狼狈，可以取个名字给它，叫做“机械的共产主义”。

列宁特别把这个称为“战时共产主义”。与这种同性质的设施，程度自然有些不同处，迫于战时的必要，不论何国，尽可实行。可是在俄国的位置，对于国内国外，都迫于猛烈的阶级争战的形势，不得已，就是生硬的机械的共产主义，也要勉强进行。列宁对于说明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中，其有名的文句如“在共产主义里面，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名称，是表示相向社会主义进行并理解苏维埃政制的决意为目的；绝不可以以为现在的经济状况，就算社会主义的，我想这种意思或者没有一人反对”。

第二不可随便看过的地方，就是在俄国实现出来的东西，不是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独裁制度而已。借伯多罗夫斯的定义来说明他，最有阶级的自觉，最有组织得好的工业无产者独裁，其余一般的工业劳动者，苏维埃只有积极地维持他们，对于农民，满足其根本的要求，取消消极的维持而已。

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度，可以指导经济上一切势力，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意志——一直流向社会主义方面去的东西，可是绝对算不得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治形态，定会自然消灭，社会主义，从中实现出来。

这样看来，无产阶级的独裁，简直是向社会主义去的一种过渡的政治形态，列宁说：“在此制度之下，对于经济上有半资本主义的要素和半社会主义的要素，可以意味出来”。于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不外乎使资本主义的要素附属在社会主义的要素，促进过渡的作用而已。

第三件当留心的地方，就是满足其根本的要求后，当然农民有要求谷物自由买卖的举动，一点不可怪。大工业，至少需要生产技术成社会化，本来就已出了私有财产范围之外，反面便是自作小农等以私有财产主义为生命，自来就带小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这两件，在前篇已经说过的。可是在俄国战时所行的共产主义，在私有财产主义所立脚的生产方法上，直接与机械的共产主义相接着。进步的资本主义，他的生产组织时，生产机关，就为社会主义的利用也不要紧，他的生产物，还是私有者照常领有。但是在俄国的农民的立场，恰与此相反，生产虽属私有主义的，其生产物反属于社会主义的照常领有。就是不论什么时候，其组织的根底含有同样的矛盾，绝对不是安定的经济组织。因此把非常的政策逼迫出来，此非常的形势一过去时，这种制度，马上就会维持不下，这也是当然的结果，何尝稀奇。

若说是俄国的共产主义，一旦失败了，专靠私有财产谋生活的中产阶级的生产，立刻跟着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变化起来。俄国并未尝试过欧罗巴各先进国的资本主义化那种悲惨痛苦的滋味。共产村落的遗物实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却有人直接打算在

那上面即刻把共产制度实现。

往年的波伯友利斯就是主张最激烈的，他的后继者，就是社会革命党。取马克思的学术的社会民主党，起初反对过这种主张。

俄国的采用新经济政策——若说是社会主义实现不可能的活证据，那正可以证明小产业直接不能成社会化的道理，不可不明白。主张小产业主义的复古派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多少也被俄国的经验，零零碎碎地打破了许多。

看起来，岂不是俄国的共产主义者，被资本主义者打败了吗？纵不然，说为资本主义让步，也何尝不可呢。

在别种意味以为对的，在此种意味以为不然的也有。为什么呢？若以为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真是在让步，那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大资本主义——并没让步，反转一般农民及其补足品，如手工业、家内工业、其他的制造业，为小资本主义让了步。可是苏维埃政府的权力，对于农民自由买卖虽说是让步，而依然把持一切主要的大工业，这是人人知道的事。就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制御大工业——大资本主义——的力量，反转把小产业——小资本主义没有法子。

这些原因，在俄国是特殊的小资本家们的环境所造成的。列强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虽因战争而极其危险，然在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英国，它的社会革命，不见有什么动静，在俄国反闹得天昏地暗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实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锁链”里——俄国的一“铁环”太脆弱了的缘故。俄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位置，还欠坚固。俄国不像先进资本主义国那样为强大的资产阶级所组织成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起事些，其反面就可就推知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环境，是如何特别，如何强大。

因此，无产阶级国家的主要任务，我以为与其和资产阶级的余势来竞争，宁肯和小资产的环境来战一场。详细看来，所谓无产阶级独裁的过渡时期，是怎样的长久，怎样的困难。列宁说，先进资本主义国，就比俄国迟点碰着社会革命，收拾起来，定比俄国早些。要想充分理解俄国社会改革的进行，和其进行的一阶段的新经济政策的大义，那就不能不把俄国特殊的极度的小资产的环境，吞下肚子去细细品味。

(九)

俄国的无产阶级国家，出马就和反革命党一场血战。

可喜是打胜了。其后常常与消极的敌对势力来不断的接战。他们的战线，因此渐渐从军事转到经济上来。经济上的战争，可以说是和小资产的经济在交锋。到此时，俄国的无产阶级独裁，把反革命已打得大败。但是赤军所组织的赤色劳动军在变换组

织形势之间，一转眼无产阶级独裁就将小资产的经济已打成粉碎。于是俄国的社会改革进行的大舞台，把此事当作枢纽拿来推转。小资产阶级粉碎了的话，就是俄国的无产阶级独裁的特别处，因有这种特别的意义，就有特别的作用和任务。

然则小资产阶级的环境，究竟是怎样破坏的呢？他的经济粉碎的原因如文字上所以说出来那种情形确实不差。

但是养活俄国的全人口，完全靠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维持大工业，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本主义发达最迟的俄国，国民的生产大部分依赖那些小资产主义者的生产物。俄国想用大工业来代替这些小企业，若不先用力打碎小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极不容易的。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在四年中，这些小资产主义的生产，大半都有粉碎的样子。但其结果，与其富而共产，不如贫而共有，要好些。实际上那时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还一点都没有破坏。

最后的一条路，就是将小资产主义的生产，用来作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建设。第一，就是设备不完的非机器生产的小企业，本来没有由国家供给原料燃料及劳动者的食料之必要。将那些小产业恢复起来，把农民的生产力抬高。第二，就是将增大的生产力，利用为大工业的组织。第三，就是提倡大工业，小工业就渐成无用之物了。卜李阿布奈正斯说“此种政策，许久小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和社会主义的资本相等了。其现时的存在是当然的，而且是预想得到的。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被社会主义的大产物的竞争（不待说要借助政府渐进的强制之力）渐次就消灭下去，是我们所预料的”。

但是照现在的小产业的原状，先使它发达，或利用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建设，或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路上去，一切的手续，总不外俄国的工业化。要向这方面着手去办，大概离不得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许外国的资本享同一的利权，从而利用之，使俄国成工业化。

例：乌拉尔地方的亚拉伯阿斯科所属的亚斯伯斯坑的租借，劳农政府对美国的投资团提出的条件，带租借的性质，条文如下：

1. 财团要承认“劳动者保护法”；
2. 一切的争议归俄国裁判；
3. 公司的进步，则须采用技术上的设备；
4. 使用人的一半以上，须用俄国人；
5. 战前的生产额，为五万蒲德，可是于五年之内，须增加到十六万蒲德；
6. 公司须支出生产物的百分之十，而价格亦须与外国市价相当；
7. 公司须出保证金五万美币，交国立银行保存。契约以二十年为期，经过五年后，

劳农政府在六个月前通知，得解除契约，支出相当的价格，亦可将其事业，完全赎回自办。若二十年的契约期满之后，只需交还保证金，事业的全部，无价归还劳农政府。

第二种方法。国内的工业，完全弄成托拉斯化。

例：托拉斯化，到底进步到如何程度方止，虽不能明白知道，亦可以举得出二三的例来证明。去年十月，乌克兰的制糖工场全部百九十三个，变成托拉斯了。其中的劳动者，有十九万五千人。乌克兰的经济委员会，所指定的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生产额，为一千四百万蒲德。随后接着在乌克兰的化学工场（有劳动者四千人）、玻璃工场、制纸工场（九个）、三合土工场、窑业工场等，一齐都成了托拉斯化。十一月中，最高经济委员会，把两部地方的采木托拉斯组织认可了，托拉斯以输出为目的，有西部地方的采木独占权，并有与外国资本家的直接商业关系的自由。其代价的条件，于所得的利益中百分之二十五给俄罗斯政府纳租。十一月中，伯亚德克北部地方的西喏火宜克格登斯克阿母地斯克几个的熔矿炉几处的矿山，登西亚金的大森林，完全合并成托拉斯了。此种实例，多得很，都要经最高经济委员会的认可，在它监督之下经营事业——仍旧是苏维埃劳农代表所选举的人经营的。

（十）

这种的工业化，同时就带有资本主义化的表现，无论何人不敢否认的。利用外国资本与托拉斯政策，随便从哪方面看来，都带资本主义的色彩。产业组合的促进，为资本主义化的一种形态，列宁首先就把这个称为产业组合的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在无产阶级的经济战线上的战争，不是共产制度的建设，而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化！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路，成了资本主义化了！真正奇怪”。列宁冷静地说道：

“资本主义，比较社会主义，是有害的东西。但是与封建主义来比较，与小生产来比较，又与隶属于官僚政治下面的小生产来比较，就很进步了。我们想是从小生产推移到社会主义宽限以外，在其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小生产与小买卖所依赖为基本的生产物，有时候是难免的。

单就其程度而论，把小资本主义，系于小生产与社会主义间接之间，和生产力增加的手段及其路径与方法，都非利用不可……”（农村的意义）伯德喏夫斯宜说明新经济政策时，对于往年列宁评论波比有利斯时他的小著“一步前进，二步退却”两句话，他用来反起说“一步退却，两步前进”。但是出于共产主义，入于资本主义，一段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前进法呢。列宁回答说“不错，入于资本主义真是对的”。可是此地所谓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与普通有点不同。苏维埃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到底

能否确立呢？

“理论上，实际上，对于此问题的全部，所不可避免的（在或范围内或期间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变成社会主义，可能不可能呢？行为上应用那种条件，方为适当，我是非常的不放心。”

依以上列宁所说，现在俄国社会经济的要素，不单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第一，是宗法社会的——即原始的农民生产。第二，是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凡出卖剩余谷物的大多数的农民，也包在此内。第三，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第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五，是社会主义。成问题的地方，在其中是何要素占优势呢？

现在的斗争，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小资产阶级与私人资本主义的联军的战争。于是帮助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苏维埃国家（无产阶级国家）与国家资本主义，互相提携结合同盟以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战略。因此“对于小生产，使它发展成资产；对于发达迟的生产，使它成进步的生产；对于手工生产，强大其机械的生产。如此，苏维埃政府手里的大企业的生产量，既然日益增加，国家的经济关系的管理也强大起来，对待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可以强大其均衡的力量”。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就说过“这回的战争，是所以推进历史（指人事的进行）向前的，在今天的历史，像火车那样快的走，历史是几百万民众造成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的水平线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伊子比亚斯卡”所发表的论文）

同年五月：“现实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曾经说过一步前进的话。若是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把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出来，要算是我们的胜利”（一九一八年五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改良派爱称国家资本主义为国家社会主义，其实不如说老实话）。

（十一）

然则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就是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的吗？在别种意味上，或者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的。但是俄国的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之内，“行于苏维埃国家范围内”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说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府，是一点不怕的。为什么呢？苏维埃国家，是保护劳动者与贫民的权力的国家。”

巴比诺斯宜氏也对此问题，发了以下一节议论。国家资本主义，有三种的区别。第一，是在国家之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执行机关而已。在此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一部资本家的特殊利害，是拥护有产阶级全体利益的制度。第二，是战时的社会主义，战争时的德国，就是好标本。但是在有时

经济制度的社会的意思，因政治权力所在的地，多少有点不同。第三，现在俄国的资本主义，外观上是很像的，而其实质就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国家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则生产上分配上法律与道德的适用上，无产阶级的利害，常为规定的要素。……此第三的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当作“过渡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看。

因此，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外乎属于无产阶级独裁下的工业化而已。此处所谓的工业化，不是想坚固资本主义的意味，向社会主义去的一种过渡期的意味。在俄国，从既成熟的资本主义，不是直接地向社会主义方面推移上去的，是从小资产阶级推移到资本主义去的。于是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若能与社会主义互相接合，此二者之间，不论在小资产阶级的独裁下做，无产阶级的独裁下做，工业化的作用，总是必要的。此等作用，若在小资产阶级独裁下做时，因其本来的性质必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化；在无产阶级的独裁下做时，却是向社会主义走的过渡期而已。

然则这种作用，由纯粹资本主义化去做与向社会主义走的过渡政策果真生出何种差别来呢？换句话说，此作用，若行在资产阶级国家之内和无产阶级国家之内，究竟有何差别呢？无产阶级，与其自己冒险自己负责任，不如把这种事情，一下交给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去，岂不是一场大利益吗？

这不同的地方，毕竟在于那上述的工业化的过程，由资本主义的机械作用，任无意识的通过呢，还是由无产阶级的意志，自觉的有意识的将此过程行指导指导呢？

我想总不出此两条路，一定有所归着。在俄国的地位，无产阶级独裁的经济上的意义，总不外乎由无产阶级的意志来指导看管经济的势力，将此引入必经的大路上去，然后将社会主义的生产的基础，所谓工业化的作用，在最小限度的时间之内，把它弄清楚了事。

(十二)

对于这种的表现，说是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的前进也可以，一步倒退了也可以；因为难免前进两步的缘故，反转方便些，也是不晓得的事。但是纵使二步前进了，与一步退却也没甚分别。因此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简直就将此事实承认了。所谓“经济的战争败了”“共产主义一步退却”的话，不是批评家和反对者的私造语，反是列宁亲口说出来的。（可是说对于战时的“共产主义”，退却一步罢了！）

新经济政策，对于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不得不让步的地方，他们已明白地承认了。但是这种的让步，比改良派对于资本主义的让步有根本的不同处：一方是保护资本主义的安定，才让步；一方是保护无产阶级独裁的安定，才让步，不过这点而已。

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

史黎雯

绪论 无产阶级发生之历史

“工人运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后才发生的，尤其是大机器工业发展后才盛行的，但是现代大工业中之无产阶级却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他是从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者变成的。这些人还没有变成真正的工人阶级之前，已经和他们压迫者奋斗。

阶级斗争自从社会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发见后，就已经有了。这种事情我们在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详细去讲它，我们要讲的只是直接产生近代无产阶级的那些社会阶级之运动。

在中世纪的行会里只有匠师和工匠。其他所谓小工苦力并不在此会内，但是那时城市人民之重要分子却是工匠。起先工匠是可以渐成匠师的，但是后来因商场条件之变化，手工业者向竞争之发展，多数工匠做成匠师的事是不可能了。于是一个匠师所能收容的工匠和学徒之数目不得不加限制，学习的时间不得不延长。而对于工匠的限制更加苛刻：要有合法之出身，工作之成绩，并且还要是城市的居民。因有此种限制——在十五世纪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则，所以那些被赶出乡村的农民不能进行会，于是就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行会里匠师与工匠间之区别就不免越弄越大。匠师渐渐从老资格的工人变成主人，而工匠却变成无产阶级，再也没有跳出火坑的希望了。

自从手工业者分成两个阶级后，雇佣劳动的情形也就坏起来了。在匠师与工匠之间发生种种斗争，而以增加工资为最甚。政府自然是帮助主人而压迫工人的，于是工匠为奋斗收效起见，不得不开始工人组织。这种组织的第一个痕迹，我们在十四世纪就可以看得见。如带宗教性质的“互助社”及带奋斗性质的“反抗社”都是工人组织的始祖。

罢工的事情在那时已就发生了。这是无产阶级奋斗最流行的形式，但是那时对于这事的处罚极严，甚至于有割耳的刑法。虽然政府防御极严，设种种法子去取消工匠

的工会，但是工人不仅达到叫政府承认他们工会的目的，并且他们这种工会在那时的社会生活中还占绝大的势力。

但是这些手工业者奋斗的精神虽好，但未成为那时候一般被剥削民众的指导者。不唯没有成为一般被剥削民众的指导者，并且像现代英国的有组织有技术的“熟练”工人一样，成了一种所谓劳工贵族。这种劳工贵族的目的极狭小，要求极和平，并且不是想为一般劳动群众谋幸福，而仅是为自己少数人的私利而已。他们不唯不愿意与当时在社会阶梯上占极低地位的劳动分子团结，而且极端轻视他们。他们简直把自己的同胞都忘记了！一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尤其是机器工业发展后，才把这般手工业的工匠之特殊地位完全打翻，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推到工人运动的共同漩涡里。同时无地的农民因为农村里不易得工作，渐渐都跑到城市工厂里来，于是就组成现代无产阶级了。

无产阶级发生的历史，在上面大概已经说过了。现在且归到本题来讲法国工人运动。讲到法国工人运动，我以为可分三段来说：（一）革命及暴动时期；（二）社会主义的政党及（？）；（三）工团主义。现在我把它逐段来讲。

一、革命及暴动时期

1. 法国大革命及一八三〇年革命 差不多在一百三十四年前（一七八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仿佛把法国的新历史分成两部分：革命前的“旧秩序”和革命后的“新秩序”。革命以前专制国王有无上的威权，人民都分成等级——高级的及低<级>的。所谓高级的人民就是贵族和僧侣，他们占有全国土地三分之一，一切国家的重要职务都在他们掌握之中。对于第三阶级——城市居民（工业家、商人、手工业者及工人）的态度异常傲慢，尤其是对于农民特别残暴，简直不把他们当人看待。

但是国家一切租税都由城市居民和农民去分担。农民除了对于国王应纳种种重税之外，还要把收入之十分之一送给僧侣，就是对于地主所应纳的租也是极重的。除此种种重税之外，还有多年当兵的义务。当时对于农民的待遇真所谓猪狗不如！

那时候法国的工业已经很发达了。虽然已有许多纺织的大手工艺工厂，然而其工业总是带一种小手工业的性质。所有的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都联合在行会里。凡是属于一个行会的工人共分三级：匠师、工匠及学徒。对于充当学徒及工匠的期限，以及得称匠师的条件都有明确的规定。政府对于物品之如何生产及销售都颁布得有明令，甚至于布匹尺寸之大小也有严格之规定。从这一个行会转到别一个行会是绝对不可能之事。匠师对于工匠及学徒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因为工匠不是绝对不能升成匠师去自己开一个手工艺厂，所以匠师与工匠间利益之冲突，不像现在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

间的那样大。

在城市居民（或资产阶级）中有许多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能忍受国王及官吏的专横，僧侣和贵族的压迫。并且这种种情形对于工商业极有妨碍的。因为要工商业之发展除非先得着自由和把政权归到资产阶级之手不可。所以资产阶级要联合工人和农民去反抗国王官吏贵族和神父的种种特权，他们反抗的目的就是争自由、平等、博爱。

果然，革命发生后，国王和他的官吏都被杀了；贵族、地主的土地也被卖给农民了；从前工商业中的行会制也取消了，于是规定政治上之自由和人民在法律上之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资产阶级带着工人及农民把革命做成功后，就把国家一切政权都夺在自己手里。虽然允许人民以法律上之平等，但是仍然规定不纳一定租税的人还是没有选举权。所以革命后一般人民虽不受僧侣和贵族的压迫，却还不免要受资产阶级的气。他们以为私有财产是社会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根基。

但是资产阶级自身还是不能保持他在革命时所得的种种利益。一则因为资产阶级间各党派之自相残害，一则因为欧洲各国王都联合起来反抗他。战争中有一位将军拿破仑把政权夺到手里自称为法国皇帝。到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失败后，于是又恢复从前的王权。

虽然国王不能再恢复从前种种旧秩序，但是贵族和僧侣与一部分最富的资产阶级仍然掌握国家一切大权。至于选举还是一小部分市民的私产，其余人民——农民、工人、中小资产阶级仍旧是与前无异。这种情形极不利于中 < 小 > 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城市的工人（农民因为得了地主的土地一时总算满足）。所以自由派复又带起市民来反抗国王，于是酿成一八三〇年之革命，与政府军队交战者只有学生与工人，其结果查理等五（？）被废，让位于路易·菲利浦。一切政权仍归于资产阶级之手，工人虽流了许多的血，还是毫无所得。

2. 工业之发展及无产阶级之发生 法国大革命把工业从前所受的种种压迫完全解放，如行会制度及政府各方面之干涉等，而一八三〇年之革命却更进一步，把政权整个地交给资本家。因此工业就一天一天发展起来。自然因蒸汽机、化学、铁道、轮船之发明以及生产中技术之完成也受不少的影响。我们只要把采取钢铁及煤炭以及机器数量的统计一看，就可以知道其工业发展的速度了。一七八九年共采钢铁六一〇〇〇吨，到一八一一年就增到九九〇〇〇吨。一七八九年共采煤炭二五二〇〇〇吨，到一八一二年却增到九二九〇〇〇吨了。蒸汽机是一八一五年头一次才用的，到一八三九年就已有六百二十五架了。

要与英国相较，自然是比不上的，但是因这一发展不免就发生无产阶级。所谓无

产阶级就是集中于大都市中，没有生产工具，要出卖劳力才能生存的工人阶级。英国都市工人的情形，自从大工业发展后比较从前工业完全带一种小手<工>业性质的时代要坏得多。所以法国工人就开始向资本家激烈的斗争，要改良自己的生活状况，取消资产阶级的组织，实行社会主义。但是照下文看来，法国工人运动与英国不同，它另外带一种性质。

3. 第一次工人组织及第一次暴动 在革命以前法国的工匠中，也和欧洲各国一样，有一种大家联合起来的风俗，专门帮助一般从别处来找工作的伙伴。革命之后，大工业渐渐发展，这种联合遂称为互助社，它的最要目的就是帮助伙伴中之老弱多病者。这互助社在十九世纪头二十年法国是很多的。到一八二三年仅在巴黎一处就有一百六十所了，其中有一百三十二所（社员共一一一四十三人）是同一职业的工人所组织的，这样是所谓职工联合会。

后来这种组织逐渐更改，把从个人的互助的目的扩张到维持失业者及罢工者。于是发生所谓罢工互助社及反抗社等积极地去与资本家奋斗。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工人出了许多死力，结果受了一场大骗。工人的状况不唯没有改良，而因为工业发生恐慌到越来越糟了。于是在工业中心点就发生工人大暴动——毁坏机器，焚烧工厂。

工人暴动中以一八三一年里昂纺织工人罢工为最有名。在这工业中心点丝业异常发达，工人数目竟达到四万之多，资本家所得利润当然不在少数。但自一八三〇年革命后，工业发生极大的恐慌，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减少工资。于是工人以十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只能得一个佛郎的报酬。纺织工人有他们自己的互助社，他们得了市政公所及市长的允许，由工人及工厂主各派代表组织一个特别会议去规定最小限度的工价表。但是多数工厂主不愿服从这特别会议之决议，于是斥逐工人，并向政府控诉保护工人利益的市长。政府自然是帮助工厂主方面，就把市长的罪判定了。但是这种一来，却就惹起工人的公愤。三万纺织工人手拿旗帜，上面写的是：“不能工作而生存，则宁奋斗而死亡。”

政府于是派有钱的资产阶级组成国民军，与政府的军队一同去弹压这暴动。但是一部分的政府军队反帮助工人，所以这次罢工工人能得胜利，并且占据市政公所，做了十天的城市主人。后来政府复又派精兵二万到里昂，于是工人的暴动就被平服了。暴动平服后，由资产阶级代表组织的议院给国王上了一张谢恩书谢他保护根本摇动的私有财产和几乎消灭的工业。

里昂这次暴动是工人保护自己利益——劳动者反抗资本家的利益的第一次暴动。虽然后来失败了，但是工人从此深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终究是占胜利的。

4. 巴伯夫（Babeuf）、圣西门、傅立叶 法国工人这种暴动的发生，一方面固然是

为经济上之压迫所迫，而一方却也受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及学者不少的影响。还是在大革命的时候，巴伯夫在他的演说词及文章里就极力说当时人民在政治上之不平等，必须争到财产上之平等后人类不能得到幸福。他在一七九五年组织一个秘密结社“平等”，以推翻当时政府及建设他理想中所谓社会的组织。可惜事机不密，巴伯夫和他的同志都被处了死刑。

圣西门（一七八〇——一八二五）对于资本主义的组织攻击甚烈。他说从前的奴隶制度、后来的农奴制度，以及现在的雇佣劳动制度，都是人类最不等的事。其所以如此者，是因为一个阶级把生产工具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强迫别一阶级去工作。法国大革命虽然允许人民以一切幸福，然而实际上工人是一无所获。这次革命不过把政治上之形式变更了而已，而对于急切不可迟的经济组织之改造就完全疏忽了。圣西门以为改造经济的关系最好是使工业家和学者占社会上领袖之地位。但是如何的改造法，如何的组织生产才能得着社会之幸福，他却没有明确地指示出来。

头一个研究这问题的要算是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他曾极力地反对革命后的经济状况。他说这种经济状况只不过把剥削者——资本家的情形改好了，而把工人的情形却反弄坏了。其原因全在工人被分散而彼此发生竞争。所以他提议组织一个工人机关，人人都可在这里按照其性情与本能去找工作。每一个这种机关，可以容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傅立叶称之为共产团体，其所占土地和房屋则谓之共产社（Phalanst'erie）。在这种团体里人人都可以自由工作，绝不受何等强迫，因为他只按与自己性情相近的工作去做。在必要时各共产社可以联合起来而为其所在地之管理机关。如此则国家就成为多余的一件东西，国家既没有了，则一切强权也随之而消灭。

但是我们要知道傅立叶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没有把资本家的资本夺过来而反请他们到共产社去做帮手，把所生产的物品平分与“资本、劳力和才能”。所以他并没有和资本家奋斗，只把他们的剥削力减少而已。他并没有消灭雇劳劳动，只想使人人有永远的工作，有充分的工资而已。所以在共产社里任何阶级都可以进去的。他虽向富翁及国王请款以建设模范共产社，但是谁也不理他，并且他还死在贫苦之中，始终不能实行他的计划。

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都是理想家）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意义，只在他们与英国的欧文同为第一个发现资本主义组织的根本缺点。他们对于工人情形的热烈的宣传引起不少学生及一部分手工业者及工人之兴趣。于是发生许多的秘密结社，其目的各不相同（如“人民之友”“民权”“四时”及“家庭”等）。有以为只要改造经济关系或者使工人间稍微平等就够了；有以为只要把当时政治组织推翻，建设一个共和国，则经济关系可以变更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可以改好。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〇年，这十

年间这些秘密的组织，曾谋起事者数次，然终不能成功。

5. 对于工人及其组织之监察 日渐增长的工人运动、罢工之时常发生以及秘密结社之暴动使政府不得不颁布种种法律以禁止结社，言论之自由，惩罚政治犯。据一八三四年对于组织工会之法律，凡是组织工会，欲得政府之许可，其会员不得过二十人（前此会员须超过二十人始能得政府之允许）。而同时对于加入未得允许之工会之处罚极严。但是自此法律实行后，里昂立刻就发生极大的罢工，后来接着又是几天的武装暴动，可惜终归失败。当里昂罢工消息传到巴黎后，有四千工人马上暴动起来，后来也被政府平服了。

自从颁布这法律之后，政府对于工人及资产阶级出身的“工人之友”监察得一天比一天严紧起来。据当时统计，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四七年，对于违犯这种法律之审判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件，被判罪者有七千人。然而无论监察得怎样严，工人的组织还是一天比一天增加。

秘密结社、工会、暴动、罢工——这都是制造新革命的原因。但是在未详细讲此事之前，有两位大著作家及社会学家是我们应当知道的，因为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及革命之性质有莫大之影响。

6. 路易·白朗、普鲁东 路易·白朗（一八一——一八八二）对于资本主义的组织异常不满意。所以他以为有联合生产者建设他所谓社会主义的组织之必要。但是他以为非夺到政权后是不能实行这种组织的。所以他说：“假使你们不愿意政权压迫你们，你们就把它夺过来罢；假使你们不愿意它阻碍你们，你们就把它拿来作你们的工具罢。”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路易·白朗所说夺取政权并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意思。他以为政权应当交给“超越阶级利益的国民中之最好的分子”。

这新政府应当把一切铁路、矿山、银行都归国有；组织社会工艺厂，使人人得有工作，一方面成为国家生产之管理者，一方面使劳动者得受劳动权之保证。至于地主与工人可以联合在生产协社里，而由国家借给他们资本。就是资本家也可加入这种协社，若是能拿出资本来，还可以得一定的利息。

总之，路易白朗以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可以联合的。他以为资本主义的制度不仅绝灭工人，而且还在消灭资本家——此种制度之下，人人不绝的竞争，只有最富的人能得胜利。所以他说将来法国必定闹到只剩几十个大私有财产者，而其余一切人民都要变成他们的佣奴。因此，他主张资产阶级也参加社会改革的事业，而借国家的权力以改造生产。

讲到普鲁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的意见，却就不是如此。他以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利益是绝对相反的，所以绝讲不到他们联合的话。并且还告诉无产阶级

千万不要对于政府发生什么希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他说社会上一切贫困都是因为私有财产发生的，他简直称之为贼赃。但是他并不反对小私有财产。

要使私有财产不发生害处，非先消灭金钱和利息不可，所以普鲁东认为当改变交易之形式而以国民交易银行去代替它。小生产者可以把他的生产品拿到这银行里换得他需要的同价的生产品。同时银行又可以把钱无利息地借给工人，使他们能建筑工厂作坊等，于是地租利息等事自然而然就消灭了。他对于政府不唯不存什么希望的心，并且还以为它是多余的。他并且还反对一切革命的奋斗方法。他说他所提议的这种制度可以用交易银行及生产物社这种和平手段去实行。

据以上所说的看起来，普鲁东是保护小生产者利益的人，所以人家称他是小资产阶级之思想家，也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否认一切政权。

7. 工人中思想上的运动 傅立叶、路易·白朗、普鲁东等的学说对于许多学生及工人发生极大的影响，他们曾经把这种意见和建设社会主义组织的方法下过一番研究。但是除了这影响之外，工人的思想也曾独立发展。一八三〇年革命后，巴黎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和报纸，投稿者都是工人，如《人民》周刊，《工人周刊》《手工业者》等。

有一个印刷工人博意哀（Boier）在他著的小册子中说：“许多著作家在其论文中关于工人阶级中日见扩张的贫困问题，已经讨论不少了。他们对于现社会给了我们许多正确严格的批评，但是我们无产阶级也应当把锤子锯子放在一边，拿起笔来，写我们的需要，说我们的权利以争正义。”

有许多工人在自己小册子中常常发表他们对于社会贫困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之意见。他们以为跳出这种困难状况唯一的方法就是组织职工联合会大家联合起来。有些则出版一种报纸《手工艺厂》，主张组织生产协社，据他们的意思，这生产协社是可以解放工人阶级受资本家的压迫。

8. 一八四八年革命（二月革命） 工人运动以及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之怨恨渐渐把路易·菲利浦的王位摇动了。但是这次暴发的革命对于人人差不多都是意外之事。二月革命系小资产阶级因扩张选举权所开始的。我们知道自从一八三〇年革命后，路易·菲利浦虽把选举权稍微扩张了，但是仍留下二百佛郎的选举费，所以政权仍落在大资产阶级和中资产阶级的手里。其余阶级在政治上是无实权的。

一八四八年二月开了许多会议要求改革选举，政府不允。二月二十二日许多学生和工人就游街示威，政府派兵弹压。工人忽然大呼“共和万岁”，有许多兵士与工人大表同情，于是大家一直追到皇宫，国王只好逃出巴黎。暴动者和其先锋占据市政公所，而比较和平的市民及议员都齐集于议院，立时把临时政府阁员人单拟出。占据市政公所的人要求将民主主义者传洛康（Elocon）社会主义者路易白朗及工人亚尔培（Al-

bert) 加入临时政府阁员名单。于是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各种阶级的代表都有。

临时政府除规定普通选举权、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外，还把死刑也废了，并且还预备选举国民大会。它虽然没有忘记此次革命系工人出力最多，但是它惧怕“社会主义”这个字也就和一切法国资产阶级一样，所以用种空言去骗工人。二月二十七日它出了一张宣言，允许“保证工人劳动之存在及替一般人民谋工作”。但是工人不肯受欺骗，遂于次日（二十八日）齐集一万二千人于葛烈夫（Grive）大场，要求“劳动组织”及“建立进步部”。政府于是组织劳动委员会，派路易·白朗为委员长，而以工人亚尔培辅之。

当时政府在巴黎和附近一带建设了许多国民手工艺厂，以便失业者工作。政府中之右派想以此向工人证明路易白朗的“劳动权”之不切实际，而可以当着工人面前推翻这种社会主义。除此以外还可以因此组成大队的“工兵”，完全受政府的支配。失业者在国民手工艺厂里的到六月间竟达到十五万人之多。他们做工的日得两个佛郎，不做工的那一天可得一个佛郎。政府并没有什么工作给他们。老实说句话，它也并不想把什么有益的工给他们，只不过叫他们掘地掘运河而已。

开办国民手工艺厂要费许多的钱，于是政府不得不把租税增一倍半。农民听说加租税是为实行什么社会主义，于是极不信用政府，而对劳动者的怨恨尤深。这件事情对于国民大会选举之影响极大，被选者多半是在乡村庄住的保皇党和僧侣，社会党只占少数。于是选举五个人的执行委员会以代临时政府，其中竟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最左派的只有民主主义者莱德吕罗棱（Ledru-Rollin）一人。

国民大会对于巴黎工人之怨恨极深，于是决定取消国民手工艺厂。因此用种种方法把失业者遣送出巴黎，关闭手工艺分厂，逮捕不满意者。六月二十日社会工作部竟发出命令，凡十七岁至二十五岁之失业者均应当兵，有不服从者驱逐出工艺厂。

工人忍无可忍，于是就发生在历史上极有名的“六月暴动”。除了政府军队和国民军外，还有许多自由加入的资产阶级去弹压这次暴动。因此我们很可以说这一次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之争斗。此次暴动共延长四日，但是因工人方面没有一定的计划及指导者，所以当政府发出劝告工人停止争斗并且赦免的通告后，工人就停战了。

但是暴动平复后，政府终是枪毙一两千工人，有十几万参加暴动的工人被流到殖民地去。路易白朗也被迫得逃往外国。从前工人在革命时所争得的立法上及政治上之自由差不多丧失了，法国的社会党也几乎完全消灭。国民大会于是开始修改宪法，选举总统。

候补者三人，一是资产阶级代表嘉维亚克（Caveiac）（这是工人之大敌，此次暴动之平复都靠他的诡计），二是民主主义者莱德吕罗棱，三是差不多谁也不知道的路

易·拿破仑——拿破仑〈之〉侄，但是他却被选为总统。其原因是：在保皇党及僧侣势力下之农民因他善于处置“富人之共和国”，兼又闻其叔父之名而选他；一部分无产阶级因他是反对嘉维亚克者而选他；保皇党因想借他的力以恢复王国而选他。

拿破仑被举为总统后，他就存下一个当皇帝的心。因为他颇得僧侣、一部分资产阶级及农民的同情，所以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颁布新宪法，他被选为十年的总统。但是过了一年之后，他就自称为皇帝，即所谓拿破仑第三。

9. 第二帝国时代之工人运动 拿破仑第三即位后，对于工会异常注意，对于社会主义更不必说了。所以有许多工会被封禁，到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法律颁布后，集会结社的自由就完全消灭了。

路易·白朗因拿破仑第三自称为“民主主义的”皇帝，所以他使人竭力劝工人与政府联络，因此可以改良自己的生活状况。但是工人不愿再照从前老样子去办，所以组织反抗社直接与资本家奋斗。

一八六二年伦敦开了一个全世界展览会，拿破仑因要借工人之力以反对共和党，所以叫工人派代表以官费到伦敦参观。工人代表共二百人，到英国后，极受英国工人之欢迎，并且知道当时英国工人之运动——有工会的组织。工人代表回国后，做了许多报告，以为英国工资之高是工人用职工联合会与资本家奋斗之结果，所以法国工人应当争集会结社之自由。但也有人以为解放工人阶级还得借政府之帮助以建设生产公社。

工人始终应当争独立的奋斗。所以一八六三年选举议员时，抱这种宗旨的工人竟选举共和党，赞助独立的工人候补议员。当复选时有六十个工人就把这种意见发出一个宣言（“六十宣言”），但在别种报纸上发表一篇“八十宣言”反对这种意见。这两篇宣言经过许久的讨论。后来普鲁东做了一篇文章劝工人把自己联成一个阶级，独立去奋斗，千万不要与别的阶级联合。

工人因为受了这种影响，于是开始组织职工联合会及争结社之自由。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法律竟允许工人组织工团而严禁自由涨落工资之事。这是工人第一次争结社自由之胜利。到一八四八年六月又有集会自由之法律。于是职工运动得有尽量发展之机会，组织工会同盟以联合巴黎工人之新思想也就因此而发生。

10. 国际及法国工人运动 必须联合各国工人以与资本家奋斗之意思头一个是马克思和昂格士，在一八四七年《共产党宣言》中发表的。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在伦敦发起国际工人协会或简称之为国际，以谋劳动者经济上之解放为目的。后来在西欧各国发生许多分部。以伦敦本社为总部，其最高机关为总会，规定每年开大会一次，以讨论工人之重要问题。但因西欧各国政治上和经济上之情形不同，

发生种种的趋向。

法国工人多半主张普鲁东的意见，反对政治的奋斗，以为工人的问题只要占在经济的地位上就可以解决的。法国工人和一部分英国工人却主张马克思的意见，以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要改良工人经济上的情形，非先夺取政权不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人受了巴枯宁极大的影响，以为只要用暴动的方法就可以实行社会革命。我们现在只要把俄国十月革命拿来一证明，就可以知哪种主张对而哪种主张是不对了。法国在最近数十年来组织许多工会，发生许多罢工运动，都是受了这国际的影响。

11. 一八七〇年革命及巴黎公社 (La Commune de Paris) 资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趋向使拿破仑不得不在一八七〇年向德国开战，他以为如此可以巩固他的皇位。但是屡次失败后竟弄到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巴黎后，人民大起暴动，于是推翻皇位，再造共和。临时造出“平民国防政府”。

此时德人已包围巴黎。工人决定保护祖国，而政府以为已是不可能之事，但是民意如此，只好尽它的力了。关于保护巴黎及继续战争之事，巴黎无产阶级与临时政府发生很大的冲突。政府虽允支持到底，但是一八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它竟把巴黎送给德人。巴黎无产阶级与民众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大起反对。

于是召集国民大会，但其中以农民选举的反动派及保皇党占多数。因为农民极不愿继续战争，所以对于共和党及社会党反对特烈，说他们是战争发生之主动者。后来政府看巴黎无产阶级将起暴动，于是派兵想把巴黎居民的军器一齐收尽。这事对于人民发生极大的怨恨，兵士中不满意者也很多。于是兵士和工人就把市政公所占据，历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就从此发生。但是因为工人没有经验，并且意见不一致，不能切实保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反对别的阶级之利益，所以巴黎公社产生七十天后就夭折了。不过我们要知道巴黎公社对于现代无产阶级之意义是极大的。

二、政党

1. 巴黎公社解散后之工人运动 自从巴黎公社解散后，法国发生极大的反动，工人运动于是受了莫大之影响。政府特别颁布法律反对国际之分部，集会结社当然也在禁止之中。老实说句话，此时工会差不多已不存在了，并且也没有工人能够恢复它，因为工人中的好分子或是死亡或是被赶出巴黎了。一直到一八七二年职工联合会才算恢复原状，到一八七三年又组织了许多的新工会。

工人运动之复兴，是受了一八七三年维也纳及一八七六年费拉地亚 (Filadelfia) 两次万国展览会之影响。因为到会的代表是由职工联合会选举，所以联合会就日见增

多。回来的代表仍然多数主张组织生产物会，只有少数人赞成职工联合会（工团），但是这对于职工运动并不发生什么影响。

一八七六年在巴黎开了一次职工联合会及协作社大会，有代表三百六十人，代表九十二个工人组织。大会的议决案异常和平，比较被逐到伦敦的巴黎公社的工人之所企望的差远了。这是因为大会以为社会主义之思想是“资产阶级之梦想”。一八七八年在伦敦也开了一次大会，但它的议决案也和巴黎大会一样温和，不过这次多数社会党主张组织独立的“工人”的政党。

2. 社会主义工党之组织 法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祖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差不多在一八二〇年时代就发生的，但是工党却在一八八〇年时代才组织成功。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法国工业虽然很发达，但绝不像英国那样带大资本主义的趋势，它总免不了小手工业的性质。

小手工业者本来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是附和于大资产阶级，或是趋向于无政府主义。所以法国工人运动总脱不了普东鲁思想之影响，否认政治奋斗解放工人阶级之意义，而竭力提倡经济上之奋斗，如组织生产协社及交易银行等。

从一八七七年起由社会主义的工人出版了多种社会主义的报纸：如《平等》《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记录》等。因为受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在一八七九年马赛大会议决工人阶级之真正目的是土地及生产工具国有，只有由无产阶级首创的社会革命才能解放工人阶级，所以工人应当组织独立的工党。马赛会议是头一个议决此事的。

马赛会议后，就开始规定党纲，即所谓“最小限度的党纲”（Programme minimum），起草员是马克思和昂格士。这党纲是在一八八〇年党会上议决的。其大概系要求规定政治上无限制之自由，政体民主主义化，租税制度，及工人生活条件之改良（八小时工作及工人保证等）。

3. 政党之分裂 工党还没有完全组织好，内部就已经分成两派了。这是因为一八八一年国会选举之失败所招出的。普鲁斯（Bruss）一派以为这全是党纲太趋于极端的缘故，所以他们主张按各地情形之不同，得变更党纲之形式。他们这种要求虽在一八八二年大会上核准过。但是格士德（Jule Guesd）一派极不以此为然，所以脱离大会而在别处召集独立的大会。于是唯一的工人政党从此分为两派了。

后来从普鲁斯一派复又分出亚尔曼（Alleman）一派。此外从前法国本来就有一派社会主义首领是白朗吉（Blanqui）。其余的社会主义者又合起来组织一个“独立派联盟”。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异点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在且把它分开来说一说。

格士德一派，或称社会民主派，是马克思一派的继起者。其观察点完全根据于经济的唯物主义。以为社会在历史上之发展全系乎其经济之构造，并认为社会主义是资

本主义发展之结果。这个发展要无产阶级战胜资本家，没收剥削者之后才能完成。对待剥削者的剥削之必要条件，就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及无产阶级独裁制。但是掌握政权却要根据普通选举法用政治奋斗的手段才能得到。总之他们以为解放工人阶级，政治奋斗占最要的地位，而职工运动及协作社运动等不过是过渡时代改良工人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已。至于组织方面却要采集权主义。

普鲁斯派虽然也承认共产主义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他们总脱不了普鲁东的一种思想。所以他们主张分权主义及联邦主义。

阿尔曼派以为普鲁斯派也和格士德派一样太注意于选举的事，而把在工人中经济上宣传鼓动全忘了。所以他仍自从与普鲁斯派分裂后，另组织一个社会革命党，其主要点在组织工团，其奋斗方法就是同盟罢工。党员只收工人，不收智识阶级。

白朗吉派以为只要有小小的一个有组织的暴动者的团体，在相当的时候就可以发生革命，这样数次之后就可以带着群众做到社会革命。

其余的社会党以为应当与资产阶级妥协，而实行与工人阶级有利益的改革。

法国社会党虽分成以上几派，但法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却共同承认以下数点：一、生产机关公有；二、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三、全世界工人之结合。

三、工团主义

1. 九十年代前之政党及工团 法国社会主义工党及工人阶级之职工运动间，即工人运动之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之间向不一致，是法国工人运动中特点之一。盖当时德国之社会民主党已能使工人之职工运动受其指导，而英国工党却是由工会发生出来的。独有法国工人阶级政治运动与职工运动间不能一致。工团运动在工人运动中独树一帜。

我们在前面已说过法国手工业者及工人组织职工联合会的趋向在前世纪三十年代就发生的了。但是这种趋势之增高总要倚仗工业发展之量而定，在前世纪之后半期就很发达了。但因受了反动时代之限制及监察，不免有许多阻碍。

自从一八八四年对于工团的法律颁布后，工团即遍于法国。一八八六年工团大会的议决案说工团不应仅改良工人片面的情形，同时应达到社会主义组织之目的，于是发生工团同盟。其中格士德一派的人很多，他们竟能把同盟的章程修改得使工团同盟之原则及行动与政党不相矛盾。

但在一八八八年工团大会上赞成工团与工党分离的一派独自通过总同盟罢工的议决案。他们以为同盟罢工可以解放工人受资本家的压迫。但是一八九〇年格士德一派在其党的大会上关于讨论同盟罢工的议决案（马克思之女所拟）说：同盟罢工是工人阶级奋斗的一种工具，但是要用这种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很需要一种社会主义的组

织，所以现在说不到同盟罢工。过了几天，在工团大会上采纳了这种意见及其他工党大会的规定。因此九十年代初工人阶级政治和经济的运动渐渐合而为一。但是劳动介绍所的指导者又出来妨害它。

2. 劳动介绍所 第一个劳动介绍所是巴黎市政公所在一八八七年建设的。其中社会主义党的代表也很不少。这种介绍所后来渐渐扩张到小的城市里。其目的就是要调和劳动的需要及介绍。这介绍所发展后，在一八九二年就组织劳动介绍所联合会。于是法国工人中就发生两个中央联工机关：一是与社会主义党联合的工团同盟，一是独立的介绍所联合会。

格士德派见发生这单独运动的影响，于是决定根本上去解决同盟罢工的问题，但在一八九四年介绍所联合会及工团同盟的大会上并不发生什么影响。格士德派因此脱离大会，从此社会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间之关系就一天远似一天了。

虽然如此，而格士德派对于工团同盟的影响多少还有一点，所以工团主义者决定改组工团。到一八九五年就组织一个劳动总同盟，联合全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工团。于是复又发生两个中央职工组织。但是过了不久的时候，两个组织全承认这种分离是很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所以到一九〇二年复又合而为一，仍称为劳动总同盟。

自从工团联合后，工党又想使工团的行动与原则与党相符，一九〇六年大会上发生工党与劳动同盟间关系之问题，有代表三百人出席，代表一〇三八个工团。但此次工团主义者的势力很大，社会主义者完全失败。

当这时候工团主义的影响极大，甚至于官吏教员都有自己的工团，连巴黎的警察都发起自己的我(?)工组织。现在法国共有五千工团，人数超过一百万。

3. 工团主义之根本原则 劳动总同盟立于一切政党之外，专在经济上奋斗。但它却又组织劳动人民之党派，其目的在于为达到不可稍缓之种种改良（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及雇佣劳动制之消灭而保护工人之阶级利益。为实现这种目的，工团主义有自己的一种手段及奋斗方法，即所谓直接行动是也。

据工团主义者说直接行动是工人与资产阶级间之直接奋斗，不需借乎于何等中间人。所以他们不仅反对一切政治奋斗，就连一切政治改革也是不赞成的。直接行动之最要形式如下：同盟罢工、同盟抵制（Boycott）、怠工等，其中最要的就是同盟罢工，以及各种强制行为，如以强制手段行八小时制等。

罢工是工人阶级奋斗的工具，早就发生了，但是近来其性质渐变，其目的亦趋于复杂了。现在所谓罢工，不仅是改良工人物质生活之奋斗工具，并且还带一种教育的意义。从前工人把罢工当着一件恶事，所以非至不得已时才一用之，现在却以它为攻击资本主义之利器，所以不怕发生罢工，且竭力帮助一切的罢工。工团中最流行“同

情罢工”。同盟罢工可成为社会革命的口号。

工团、劳动介绍所、同盟、总同盟都可以直接做将来社会的管理机关。因为将来社会可不用中央的政权，只要把工团联合起来就完了。

工团主义共分两派，一是革命的，其原则我们才已说过了；一是改良的，其目的比较和平，如缩短工作时间保证失业者等。它并不反对与国家妥协，但是否认一切政治行动。照以上所说可以看工团主义各种趋向中之特点，有马克思主义，有普鲁东主义，亦有无政府主义。从马克思的学说中采〈用〉了阶级斗争之理论，从普鲁东主义中采用对于政治行动之不信用及联盟组织，从无政府主义中则采取“直接行动”之策略。

4. 罢工运动 法国工人虽比不上英德美诸国，但因劳动总同盟之宣传及维持，其罢工运动异常发达。据正确统计，法国在一九〇〇年共有九〇二次罢工，参加人数为二二二七一四人，其中二〇五次完全胜利，三六〇次半胜利，三三七次完全失败。一九〇四年共一〇二六次，罢工者共二七一〇九七人，二九七次完全胜利，三九四次半胜利，三三五次失败。一九〇六年共一三〇七次，罢工者共四三八四六六人，八一七次胜利，四九〇次失败。

有许多次罢工被政府派兵压平了，如一九〇八年之罢工，罢工者被害数人，劳动总同盟之先锋亦有数人被捕。此后工人之被捕者极多。从此工人深信资产阶级的军队不仅是替资产阶级夺取商场用的，并且还用来剥削工人的。因此极反对军国主义并爱国主义，这是受了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无祖国”之影响。所以有一次大会议决案上说，“因为无产阶级无祖国，所以应用革命的同盟罢工来反对战争。”但是欧洲大战发生后，许多工团主义者抛弃其理论，加入保护祖国者方面以反对德国，即社会主义者如格士德等也加入了国防部。

结论 法国工人运动之特点

以上大概把法国工人运动说完了。现在再把它的特点讲一讲，以作我这篇文章之结论。

我们把以上所说的三大段归纳起来，可以找出法国工人运动与别国工人运动不同之几点。其中最特异之点就是革命主义。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七一年是革命暴动的时期，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在此期内所占的地位极重要。就拿工人运动比较和平的第二个时期来说（从一八七一到现在），这种革命主义虽然已不是从前那种形式了，但是并未完全消失。它在与英德正相反的法国职工运动中，仍然不失其从前的影响。

第二个特点就是分系主义（Fractionisme），其趋向与理论极复杂，彼此互相仇视。

其中尤以“个人”所发生的影响为大，如理论家、思想家及首领等。在工人运动第一个时期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及路易·白朗等对于工人运动之影响实在不少。在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先锋所占的地位也极重要。并且以这些人的名字称其所主张的那一派，如普鲁东主义、白朗吉主义、格士德主义、布鲁斯主义等。

何以法国工人运动有这些特点呢？这绝不是因为法国民族之特性使然，而是因为法国生活政治上和经济上之特点造成的。所以只要把法国政治上与经济上之特点一看，就可以明白法国工人运动所以有它的特点之原因了。

法国大工业虽然一天一天的发展，然总比不上英德美各国，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就以生产集中来说，也是赶不上别国的。据法国统计家说，法国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小企业要占全国企业百分之九十。这是因为法国工业总还是带半手工业的性质、小生产的性质（巴黎以生产奢侈品出名）。所以统治城市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往往成为工人运动之先锋。此外应当知道的就是法国大部分人民是小农（十九世纪中系百分之七〇现在是百分之五五），他们是拥护私有财产的。

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是介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极端之间的，即介于大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之间，所以小资产阶级就发生两种趋向。一是附和大资产阶级，想谋个人之利益；一是以为大资产阶级很不到于他们的地位，所以恨之入骨髓，因此急于想推翻他的仇敌（？），而创造一般乌托邦派的理想社会。极端的革命主义，小团体暴动之事就由此而生。再证以欧洲小农国家之经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不仅要发生革命主义，甚至于发生无政府主义。

再从政治方面来说。后反动的农民及僧侣在政治上占了极重大的地位。工人阶级种种政治上社会上之失败，全是受了这反动派之影响。所以不得不急用革命的手段去反抗他们。现代法国之政体是介于民主派及反动派之间的，其所保护还是大资产阶级之利益。那么在这种条件之下发生所谓革命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就不算稀奇的事了。

我这篇文章，因为时间仓促，没有充分的预备，所以做得异常潦草。其中有些题目（如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等），当另有论述，所以此处说得不免简单一点，这是要读者原谅的。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共产国际一九二三年大执行委员会纪要

施陶父 辑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三年之国际形势。

大执行委员会 (L'Exe'cutif' elargi) 是共产国际各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最高机关，各国都有一代表。这次开会的重要事件首先便是一九二三年上半年的国际形势之审查，其次是日常运动中的紧迫问题，如：“工农政府”之标语、法西斯主义 (Fascism——即本刊上期所译法塞主义)、工会问题、协社问题以及其他各国党内问题等。

如今先述执行委员长只诺维叶夫所报告的国际形势。

自从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 (去年十一月) 以来，国际大势里很显然地发生了些新问题。我们可以估定英美法三国资本主义在此期内有更趋于稳定之势。但是中欧情形日坏，日本亦已开始经济的危机。英俄的冲突很足以显示国际间劳资势力之消长。英国对俄的态度蛮横，不是因为俄国国力不振，乃是因为新俄的巩固。因新经济政策而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加，于是英国乃不得不加以恫吓。

各国社会党原本在战后分成两个国际：一、第二国际；二、第二半国际 (参看本刊上期)。今年来两个国际合并了——那第二半国际本来自己以为胜似第二国际，没有赞助欧战，如今仍旧并入赞助欧战的第二国际了。当初考茨基曾经反对英国劳动党加入国际。这个党现在仍旧很妥协。可是汉堡会议时两个国际实行合并，于是汉堡的“新国际”里就有英国劳动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亦仍旧把所谓独立党收进去了。可以说新国际和新德国社会民主统一党是一样的：都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只是促进他们的瓦解而已。真能担负国际劳动阶级解放之责任者，还只有第三国际——共产党的国际。

第三国际虽然实在还没有占世界无产阶级的多数，然而至少也已经联合。法国及德国共产党已经共同计划实际行动的计划；两国资产阶级反目时，无产阶级却能声气相通协力合作，这是共产党能力之表现，是真正国际党的第一步骤。

共产国际在劳工运动中早已采〈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纯粹的手段罢，并没有诚意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罢。共产党这种策略原是为着要和社会民主党及无党派的劳工群众接近，起初先从首领方面着手。因为群众不大了解我们，我们要找那些首领说话。这是不是纯粹的手段？只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怎样。如若他们实在愿意行动，那就不是手段。如若他们不行动，我们便能直接找群众，当面证明他们不是真为社会主义奋斗。固然，统一战线亦有内部的危险，就是使共产党运动松懈下去。但是统一战线却不因此而失其必要的价值，尤其是在此资本进攻的期间——共产党只知道一直前进，凡是暂时同路的一概不拒绝，走到大家目标相异之点，不愿意奋斗的自然往后退，那时群众就明白了。

赤色职工国际亦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前还有些同志怀疑它不能得好结果，如今可以证实了：各国工会的改良派势力渐渐动摇起来。

第四次世界大会之后，法国党内部问题完全解决，已经恢复健康。德国却因时势激急发展的结果发生冲突，共产国际中央也替他们解决。意大利的共产党至今还以为谢腊蒂派社会党不可靠，是共产主义的仇敌，其实这是大错的，意大利的社会党现在已经可以以同情党的资格加入共产国际，意大利共产党至少当援助社会党左派，就是倾向于共产主义者。意大利受法西斯主义之虐，故劳工统一战线尤其有必要。美国共产党现在已能公闻。英国共产党却还疏忽民族问题：爱尔兰问题及殖民地问题。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拉夫的共产党，也应特别注意民族问题。资产阶级政策与无产阶级政策不同之处，不在于前者有民族问题而后者没有，乃在于前者不能解决而后者能解决。其次，挪威党内发生对于民主集权制的怀疑，这是应当消灭的，尤其是党中一派 Mot Dag 独自成一种隐秘的小组织，其危险可以使别种小派也组织特殊的派别而引起党内之分裂。奥地利则已纯处于协约国威胁之下，社会民主党本为第二半国际健将，日益堕落，压制劳工，法西斯及帝制派阴谋尤甚，共产党正应速依“工农政府”的标语进行，现时的内部分派及个人之间自相攻击等现象，应当立刻停止。丹麦还没有统一的共产党，从九月一日起无论如何必须团结一致。瑞士共产党还限于少数所谓“纯正党员”，较之社会民主党数量上大相悬殊，应当力求争取群众。（此段辑自此次会议决案）

共产党有世界革命的责任，他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不仅是工人的政党，并且是一切劳动者的政党。尤其是现今时势所趋，受帝国主义剥削的小农都能倾向于革命。第四次世界大会的“工人政府”标语当解作“工农政府”。社会民主党渐失工人中的地位而获得农民中的势力。共产党当然亦努力进行，勿使改良派侵蚀群众。农民不是直接反对工人的，虽则他们是资产阶级私有者的心理，虽则他们曾经想组织“绿色农民国际”，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觉悟到这种介乎劳资之间的“中间政治”之不可能。农民

经济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方能渐趋于有规划的发展而达共产主义；农民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中方能得真正的解放。换一方面说，无产阶级亦就必须获得农民之同情，与之密切结合，方能得最终胜利。

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决议案。

一、对于执行委员会之报告，议决表示完全同意于执行委员会之行动，尤其是它处置各国共产党之办法。

二、对于宗教问题，认为党内同志不得以宗教为私事（Affaire prive'e）可以自由信仰（因挪威有些同志主张如此）。共产党有责任训练其党员，不仅要共同认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经济行动，而且还要养成无产阶级的正确的人生观，教育马克思哲学的总概念，而无神论便是这哲学的基础之一，否则大家没有共同的宇宙观，如何能成统一行动的政党呢？

三、“工农政府”之标语。A. 农业无产阶级，仅依工银如（？）生，如大农场等之雇工等；B. 农业半无产阶级，虽有些许土地而实在只能勉强糊口，往往非兼做雇工不可；C. 小农地主，自己有地或能承租田地，不必做工银劳动——凡此等农民在无产阶级胜利时，也能得许多利益。共产国际第二、第四两次世界大会的决议案，都非常注重农工之结合。现在本此定一政治公式，便是“工农政府”。可是不应当与无产阶级独裁制相混，应当记住两种危险：一、小资产阶级式的社会主义；二、农民议会等空泛的政治标语。

四、工会问题。实行联合战线已有成效，亚摩斯德丹摩职工国际所属工会，已经逼不得已与赤色职工国际所属工会相联合，以反对战争及法西斯主义。从此组织上更当注意“工厂委员会”，然当与职工会并行。决不宜以工厂委员会完全代替工会。共产派当竭力参加改良派的工会。

五、协社问题。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府摧残协社，更足以证明协社运动里的“非政治主义”之谬误——只有无产阶级国家内，协社得充分发展。协社亦必须有政治的意味，政治地位稳，方能行经济事业。工会与协社当竭力结合密切关系，但是现时黄色职工国际（亚摩斯德丹摩）与协社国际的同盟却是反乎革命主义的。共产党指示此同盟之真相于群众之前，而努力运动。协社若能与工会相结，农民与工人之联盟便易着实际而能奋斗。

六、法西斯主义。此种主义已成国际的反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独裁制的逆流。共产国际亦当组织无产阶级的国际反抗，武装劳工百人队等。

七、对于汉堡两国际合并的决议。第二半国际向来徘徊于社会化政策与资本主义改良政策之间，如今社会化政策的花言巧语已无所用，索性仍旧混合于绝对改良派之

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更可以用统一战线的行动揭示此等阴谋卖阶级之丑态于劳工群众之前。只有共产国际能解放劳动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能引导他们到光明的将来。

八、英俄冲突问题。苏维埃政府未受英国的挑拨而能避免英国所愿的决裂。将来列强若再效尤，必遇国际工人的反对，而为俄国劳动平民之不可犯的精神所屈。东方劳动群众尤其要起而抗争，同达解放之目的。

九、对于复洛夫斯基被害的决议。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横行。世界革命成功，资产阶级必受报复。尤足证明赤色恐怖之不可免，乃资产阶级自作之孽。

十、党纲问题。决定各党推一人起草，共同讨论，交国际执行委员会，俟下次大会最终法定。

十一、挪威；十二、意大利；十三、丹麦；十四、奥地利；十五、瑞士；十六、日本等问题已略见前。

十七、黑种民族会议；十八、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问题，决于明年同时开会。

十九、新选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二十、对于布加利亚政变之宣言，略谓以前之“农民党”政府因不与都市工人联盟而失败，为高等游民阶级所颠覆，所以必须共同建设“工农政府”。

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

张国焘 译

世界各国无政府党的理想和行动，异常分歧，此宣言中已略为指明，毋容再赘。我国无政府党虽只做文字宣传工夫，不如各国无政府共产党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实际参加革命运动，然大部分确系纯洁高尚的青年。但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党人中间不免有些隔阂，无政府党对于共产党，更是时常加以无谓的攻击。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兹特将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译出，我亲爱之无政府党同志，如能加以注意和慎重的考虑，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

译者志

我们——俄罗斯的无政府共产党和无政府工团派曾实际参加俄罗斯革命，无论在十月革命将成未成之准备革命时期，或在革命中为劳农政治之剧烈战斗时期，我们总是和波尔扎维克党人在一块儿合作。我们和波尔扎维克党人共同担负一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奋斗，并共同对付那些资产阶级帝制派与伪社会党人的反革命运动。许多无政府党人，在这次俄国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战争中，丧失了生命，而这篇宣言的作者们仅代表曾参加为劳农政府而战的无政府党同志中的一小部分。

虽然我们和波尔扎维克党人一致奋进，我们的目的，直到现在，却还没有相当的达到，这是表现很明白的。我们从来相信无政府党的世界拼命，一时是办不到的，而且要在国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成以后，才能谈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无政府事业。我们等待和希望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局面，因为我们承认要达到不用强力维持之社会组织，劳农专政简直是历史进程中必经之道路。

但是在此六年之内，俄国劳动阶级须勉强而勇猛地与全世界资本主义相搏战，而且是单独担负这战争呢。俄国须单独抵御全欧帝国主义的进攻，并须在此世界革命一时尚无希望的情况下，设法使国基日见巩固。俄国无产阶级要能维持他的革命地位，

便只有劳农专政之一法了。因此苏俄不能将已得的政权，从自己手中失去，更不能将此政权奉还资产阶级。同时也不能从事进行不用强力维持之社会组织，除外各国工人们把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都推翻了，那时才能谈到罢。

大战以后，欧洲资产阶级更是凶恶，西欧各国无产阶级也正在那里拼命反抗他们，这是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也很有急地注意过：他们的最后胜利，还是差得很远呢。在最近几年之内，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局面更加稳固了，阶级斗争之进程中，资产阶级居然占了上风，由抵御时期进到向劳动阶级进攻时期，并且他们为制服国际革命运动起见，创设一种新式而险毒的武器——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是被打到十八层地狱下去了。黑暗的反动势力，不但扫荡了巴华利亚（今译巴伐利亚，下同）和匈牙利的劳农共和国，而且在这两国内，建立着地主和资本家专政的局面。德国、波兰、奥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次血了，现在呢，压迫工人的形势并没减轻，黑暗的反动势力又进于攻打农人的共和政治了。保加利亚的暴动，便是法西斯蹂躏农民之表征。保加利亚农人，要算是第一次独立执掌政权的农人。

这种反动潮流还正推进不已，在许多国家里，一种特殊恐怖状态，已在发展之中。工人机关正在被损毁着，各个罢工运动都遭受残暴的压迫，还有万数被开革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在饥寒的惨状中，坐以待毙。资产阶级立意要从根基上摧残工人的组织，图谋完全拆散劳动运动，使这独立的工人势力，毫无存在的余地，并削去工人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使他们降于奴隶的境遇。

在这种种情势之下，还谈无政府革命，那就太非其时了。第一步，无产阶级必定要奋起抵御，共同努力击退资本家的攻势，达到可以抵御的地位，然后才能进攻，与劳动农民携手，以夺到政权，正如俄国表现过的进程一样。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资本压制之下，解脱我们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打碎军阀主义，将生产和分配事业，重新组织起来。只有达到最后胜利以后，并将资产阶级恢复地位之反动革命种种阴谋压倒了以后，那时我们才能谈到废除国家和强力等问题。那些认〈为〉这个进程为不当的，却不能指出其他更妙的进程，实际反处在直接行动和胜利的结合以外，把自己的活动限于很小的范围，很勉强地忍痛和不合实际的幻想之中，这都是不免为革命的名词所蒙蔽着的缘故了。国际无政府主义既这么软弱和复杂，那就须要一个新势力才能摇撼资产阶级的组织罢。

现在资产阶级竟是全副武装，用他所有的力量攻打我们，那些攻打我们的陆军、舰队、潜水艇、含毒气体、警察、教堂、黄色报纸和黄色工会（译者按：所谓黄色报纸和黄色工会是指改良派和妥协派的）早就预备好了。处在这样的时期中，我们也应该赶造新式武器，所有那些无用的旧式武器，不能让它再存留于我们的革命武库中了。

在这个时候，无政府党宣传自由联合主义，势必使劳动阶级势力分散了去。指摘红军，硬说是一个抱野心的帝国主义势力，或是为俄国伪社会党的反革命辩护，而不顾及他们图谋恢复资本家秩序的丑行，都是无政府党绝对不应该采用的政策。要是用个人主义的遗留观念，反对在这历史上过渡时期必须应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甚至以为在这剧烈争斗时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态度，在后面的建议案中，更表示得明明白白，而且我们是对于世界状况，对于无政府主义在世界革命中历史的任务，和对于由十月革命所得到的种种经验中，加以客观地研究后，才采取这种态度的。

无政府党必须完全脱离一切空想派的偏癖性。我们一定不要自陷于应何（？）陈腐的形式观念，我们必须承认十月革命是收容了第一国际一些最好的传统理论，而且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老早就与社会民主党分离了。共产党虽然立足于革命的马克思派理论上，却融化了许多其他的理论，虽无国家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超出他溶化的范围。共产党对于国家问题，怀抱着很明白的态度。他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内，树起社会革命的旗帜，毫不犹豫；他对于德谟克拉西和议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念，扫除得非常干净；而且他领导偌大国家之革命，至五年之久——这就足以证明历史上少数无政府党的最初观念是很正确的。

无政府工团主义对于国际劳动运动，曾有很大的功绩，和他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完全承认的。但是我们以为无政府工团派此时应该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了。无政府工团派如能承认这个必要，便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一个大转机，从此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中间的一些隔阂，都可以渐次消除了。我们请求无政府党的同志们不要把各资本国家里的革命势力分散了，并与共产党人联合，大家团结于直接群众行动的纯粹革命机关——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之下，更树立一个抵御资本进攻的巩固基础。同时对于俄罗斯革命，加以赞助。俄国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派和封建派图谋再夺回政权的新阴谋和新攻击是还没有终止的，因此俄国究竟还不能说是完全脱离危险的境界呢。我们同志必须明了俄罗斯的各派伪社会党确实实是为反革命党的利益而活动，假若他们的活动居然成功了，那么，这种由东方杀入欧洲劳动阶级的可怕的反动势力，若以意大利法西斯党与之相较，那又渺乎其小了。

我们确信劳动打倒资本的最后胜利，要是没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如许〈多〉被压迫民族中的劳动群众的赞助，也是难得成功的。

十月革命促成东方的觉醒，因而发生民族解放之殖民地革命，已证明是确实的事实。我们请求所有诚实的革命主义者，永远而且决绝地与多数社会党和与他们合作的

黄色工会所奉行之秘密帝国主义政策脱离关系。倘若那些革命主义者能努力地赞助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俄罗斯革命，如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才能迅速地脱离殖民地奴隶的地位，如在全世界自由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日子，就近在目前了。我们请求无政府党同志对于我们的建议，加以慎重的考虑，因为这包括我们的观念很简明的总和，而这些观念的总和是我们在这最大革命焰火之下六年奋斗所作成的。我们在世界反动痛苦下为无产阶级奋斗，完全觉悟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写成这篇宣言和建议，发表出来。

适于此时，党纲和政策的修正和他们的价值的审定，是这么样对于个个革命主义者都有急切的需要，只有很懦弱的或怀成见的狭隘性，才会阻挠无政府党同志们进行这些更改。

我们请求我们的同志们注意目前无论何处资本进攻的开始，估量这种危险至若何程度，研究俄罗斯革命所得来之经验，总括起来，再将攻打资本主义的方法加以修正，那么革命势力的分离，才可以终止了。我们十分相信：除非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为密切之联合，是再没有其他的道路了。

建议案。

1. 无政府党的理论和行动之审定

我们觉得无政府思想，是将许多不能兼容并包的思想，陆续地凑合拢来的。戈德温（Godwin）与托尔斯泰（Tolstoy）的全人道德论、司狄莱（Stirner）的贵族式的个人主义，和巴枯宁（Bakunin）与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阶级战争观，如何能够范围在一个科学〈规〉律之内呢。正因为理论的无政府主义是这么样的情景，所以无政府党半世纪以来的奋斗，竟没有达到在世界上若何重要的地位。

无政府党思想之不一致，实弄成共同意向之缺乏，并妨碍一切共同行动，而且打碎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不能在世界上发动任何有重要意义之革命行动的原因。直到我们的时代，当此初步社会革命怒潮激荡的时候，当此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政府主义不能担负革命中的最要任务之真相，更显露无余了。

因为这些理由（就是无担负革命中最要任务的能力和思想与行动之不一致），世界各处的无政府党运动，都一天一天地崩溃下去。社会革命主动的地位，是早已丧失了。这个主动地位，是落到主张群众直接行动和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的那些党的手里去了。

2. 无政府党在革命中的任务之审定

在社会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中有组织的少数（就是革命的社会党）总是挺身而出

力地指导着，并且是在革命中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奋斗。这样一个任务即是自始至终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无政府党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如是把自己逐出革命的历史进程之外，并且于劳动与资本争斗的时候便毫无所行动了。

工人革命的计划和演进，需要无产阶级——就是有组织的少数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全部事业，特别是管理生产分配事业和国防事业。无政府既鄙视权力，甚至反对暂时的专政，便将自己处于反对革命工作的地位。

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无政府党总是努力去加厚革命的要素，“破坏的精神便是建设的精神”，这个抽象的公式便是无政府党所努力的了。因此半世纪以来，各部分的无政府党总是致身于初步煽动和宣传的工作，至于革命后如何办法，就没有清晰的观念了。

但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破坏是绝对不能得到胜利的。要得到胜利，便需要一种有组织的权力，这种权力要能运用革命要素，并将革命要素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倘若革命自身不能建立稳固基础，那就鲜有不为反革命的牺牲者了。

革命爆发之际，群众往往尽量毁坏旧有的国家社会机关，在那个时候，有组织的少数革命分子便要引导这种势力向相反的方向进行，并且要将这种单纯的破坏势力，变成建设和组织新社会的势力。

若以无政府党的破坏行动而论，正与一班群众相同，总是立足于所以发生革命之动因上面。那些群众也与无政府党一样，是一种单纯的革命势力，他们总想把促成革命之目的物去掉，并且他们的努力仅仅限于毁灭旧社会。但是革命除掉要把目的物去掉以外，还有其他的计划。有组织的少数自然要回头看到革命的目的物，但是对于最终目的，也须前向为同等之注意。对于这个时期，必须对症下药。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一个有力的组织，这种组织要能依照坚定的意向，支配革命要素，从纷乱中间，找出进行的道路，并领导革命的要求。他固然要能够抵抗从右边来的攻击，也要不屈服于从左边来的感情作用的强奸政策。

3. 我们的时代之审定

我们的时代是在两大势力互相冲突的时代：一方是私人资本，一方是集合劳动。大资本是在有限数的一部人手里，无论在哪一种生产事业中间，都想扩大规模以利用劳动力，或是减少生产，或是大规模的扩大生产。私人资本现在却遇着一个生死仇敌，这个仇敌便是社会集合劳动，既能管理生产，又能发展生产，到空前的大规模地位。

这个经济基础也就引起政治上的特殊状态，这便是私人资本和集合劳动的极剧烈的争斗所形成的。近代国家已再不能保持资本和劳动间的平衡了。国家机关的全部权力不是被逼着保护这方，便被逼着保护那方。在最近的将来，全世界的帝制派和德漠克拉西制度之地位，一定要消灭，而成为片面的阶级专政：不是劳动专政，便是资本

专政——这是不可免的进程。在法西斯和共产国际二者之间，我们必定要选择其一的。而且目下再没有第三个进程。反共产党的各党派，无论他们怎么说法，是会或先或后地很合逻辑地归到法西斯队伍里去。俄罗斯的各派反革命党，很明了这种情势，虽然他们并没有将他们的希望公开地表示出来，却在等着资本豢养的军队打进俄国来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是有组织的阶级军队正在开始最终决斗时代。所有中立的势力，不是加入这边，便须加〈入〉那边；否则，便被赶出战场之外，而成为社会上无用的废物了。

4. 共产国际

我们深以为第三国际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向着自由社会主义的最高方式和社会主义生活的最高方式努力进行。我们亲眼看见第三国际所信仰的观念，与社会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好的传统理论，是相吻合的。

同时我们看见无政府党早让社会革命的主动地位逃出自己的手掌了。我们内部组织原则的欠缺，和包括群众的革命行动的组织之初步基础的无有，另一方面，集合互相冲突的思想的乌托邦梦想，仍在我们的党派中盛行着。所有这些，实使无政府运动陷于死境。因为这个缘故，目前社会革命的主动地位，实早已过渡到共产国际手里去了。

我们已看见俄国共产党所成就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在他们的能自由而不受掣肘的时候。有时也许为这个或那个理由，被欧洲反动势力压迫太甚的时候，不得不让俄国革命缓过一口气来。虽然俄国共产党有因不得已而让步之处，而我们却没有半点理由，疑及他们的急进派革命社会主义。至于共产党完全没有沾染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和改良派社会主义的臭味，这也是丝毫不容疑惑的。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算是完整的一件新现象。我们从实际经验上觉得，俄国革命之进步和成功，实有赖于世界革命之成功。我们也相信世界反动势力正在阻碍俄国革命的进步。克烈慕林（Kremlin，译者按：克烈慕林昔为俄国皇宫，今为苏俄政府）的状况虽已改更，在各反共产党领袖下之欧洲无产阶级却依然站在一边而毫无活动的。

俄国革命中，除掉有些错误，偶然的抵触，和想不到的事态发生以外，俄国革命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之确定重要意义，却不容我们有丝毫的怀疑。无产阶级必定要认识俄国革命是一件新的事实，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世界新权力。

因为在革命的新变动中间，俄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权。在这个不可比例的社会革命中间，组织者的重任落在俄国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劳动阶级之先锋，不能够也不至于放弃这个重任。我们赞许他们合于科学的经验之全部，我们以为他们的全部事业，

是必要的有机阶段，而且是无产阶级奋斗的历史的总和。

签名者：黑资孟（I. M. Heizmann）、贺甫莱 [D. Hoppner（Aserkovich, Shak）]、梅格洛夫司基（N. N. Michailovsky）、温戈古拉多华女士（A. E. Wingogradova）、西麻洛非子（L. Simonovitch）、列萍（A. P. Lepin）、华西尔察 [I. I. Vasilchag（Shidlovsky）]、特洛西士客耶（E. Tinocistskaja）、伯尔确夫士基 [N. Belkovsky（Mavuga）]、罗田保 [Rotenberg（Jelich）]

一九二三，六，十四于莫斯科。

第三期

民国一三年（1924年）八月一日出版

答张君劢及梁任公

陈独秀

张君劢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对于适之及余之意见加以驳诘，关于适之方面，自有本人负责答复，不劳我为代庖；关〈于〉我的方面，先讨论重要的三点，次则略论其他。

第一点，张君劢说：“马氏自名其主义曰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别于翁文辈之乌托邦的理想，且推定生计上之进化，遵正反合之唯物史观之原则，故资本主义之崩坏为不可逃之数。然自今日观之，以欧洲而言，资本主义之成熟，英远在俄上，顾劳农革命，何以不起于英而起于俄乎？以俄与德较，则德资本主义之成熟又在俄上，何以德之革命成绩，反居俄后乎？”怀这样疑问的人，世界上很多，不止中国张君劢一人，都是因为不明白社会科学之方法论的缘故。因果律虽是一切科学共同的原则，而各种科学之方法论却各不相同，不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即自然科学中，数学和化学、动植物学都各不相同。

社会上有相类的因之现象，必将有相类的果之现象。唯其果之现象之特定的时空及现象中之个体现象，则另有其因果关系，而非社会科学范围以内之事，这本是社会科学重要方法之一。譬如，一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发达起来，其社会中劳动运动必将因之发生，此一社会科学之公例，在各国简直没有例外。而其劳动运动将发生于何日何地以及运动中之领袖将为何人，此事只有请问六壬卜算大家，社会科学无此神通。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料资本主义必由发达而崩坏，崩坏后继之者必为社会主义，此乃就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一般趋向而言。至于资本主义之崩坏与夫社会主义之现实，果在何国开始及完成，又另有其特殊的因果关系。固然，在特殊的地域内，倘有特殊的社会现象之因，亦可推见其特殊的社会现象之果（其特定的时空及个人关系，仍非

社会科学之事)，然究竟和马克思所指人类历史的进化由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之一般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件事。俄国劳农革命何以先于英德，将来英德劳农革命后，其社会主义实现之日程，必速于今日之俄，这是因为他们资本主义发展之进程各有特殊的原因（例如俄国资本不及英德，而集中速度则过之），和马克思所指全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过程，是两件事。法兰西资本主义之成熟，自始至今都远不及英国，而巴黎共产团之暴动，还远在俄国劳农革命之前，马克思亲见之，原不待张君劭先生今天来驳难了。人类社会因果关系非常复杂，所以社会现象也非常复杂，因此，社会科学、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决不像张君劭先生所称引的那样简单，并且一定还不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样简单。

第二点，张君劭说：“且即以俄论，私有财产之废不及二年，而已许私人买卖私人土地所有权，且大招致外国银行与外国资本家，不知此等翻云覆雨之局，又遵科学的社会主义全书中何种公例乎？”有这疑种问的人，世界上也不只张君劭先生一人，这是因为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实质与意义的缘故。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不是玄学家，自始便未尝妄想一革命便能够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不过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指示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罢了，在现在的新经济政策之下仍是这样，并未翻云覆雨。小企业初因资产阶级的怠工自己放弃，不得不由国家经管，今因他们愿意继续营业而租给他们，也无所谓翻云覆雨。战争时军需万急，不得不禁止买卖强制征发，战后停止征发，生产力又未到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时期，自然没有禁止私人买卖的必要，这也无所谓翻云覆雨。俄国劳农革命家果曾妄想一革命便马上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便马上能够完全废绝私有财产，果如张君劭所言现在允许私人买卖是翻云覆雨，因为此前已废止私有财产已不许私人买卖。如此，试问苏俄宪法第六十五条第二三项，剥夺坐食以资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贩之选举权被选举权，岂不是赘文？在新经济政策之下，这两种人仍然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实无所谓翻云覆雨。说他翻云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实质的缘故。革命的内外战争中，势不得不采用军事共产政策（其实只是“禁止买卖强制征发”，无所谓共产），非此无以应军事之急需，且非此无以覆敌对阶级之基础。战争停止，破坏事业告了一段落，无产阶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实行废绝私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何况半亚洲式的俄罗斯。所以此时苏俄采用的经济政策，在社会革命之经济改造的过程上，正足以证明客观上的必然性，也正足以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理想不同。说他是翻云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意义的缘故。

第三点，张君劭说：“我之清华讲演中所举九项，谓非科学所能解决，而断其起于人

类之自由意志……独秀复牖举社会学家言以相难，谓此九端之因果尽为科学家所能解释，而归结于物质为社会变动之大因。夫大家族也，小家族也……在一事既已过去，科学家汇集各种事实，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其事之可能，何待赘言？顾我所以举此者，非曰社会学家之说明是否可能也，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何自而来也。甲以为然，乙以为否，甲曰以为是者，乙曰又以为非，其变迁之速如此，而推求所以致此者，则曰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之，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也。夫不究九端之动因，而但言科学的解释，则社会学家之关于九端之说明之文，连篇累牍，我虽浅学，岂并此而不知？夫科学之大本曰因果公例，有同因则生同果之谓也，吾人据此公例，得以推定物理上天文上种种现象，虽历久而不爽毫厘。若夫人事，但能关于已过者，于事后为之解释，此种过去之解释，能视为与物理公例有同等价值乎？殆不然矣！故独秀虽能举尽社会家言以难吾九端之列举，然吾之根本主张，仍是一丝一毫不能动摇也！何也？小家族后之家庭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公有财产后之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张先生这一篇说话，说坏点，直是遁词；说好点，他的观念、他的论点、他的文义、他使用术语都太欠明了。张先生果始终承认他所说的“夫大家族也，小家族也……在一事既已过去，科学家汇集各种事实，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其事之可能，何待赘言”。这段话不错，我们已经用不着论辩。汇集各种事实而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非科学之方法而何？此方法倘有应用于说明及推求社会现象所由来之可能，则社会现象亦必为因果律所支配，尚何待赘言，社会科学亦得成为科学，又何待赘言？社会现象若不为因果律所支配，虽事后亦无法推求其现象所由来；若既为因果律所支配，则可据今果以推求前因，亦可据今因以推求后果。惟张先生如欲超越吾人犹未及闻见之今因，凭空推算千百年后之果，虽历久而不爽毫厘，此事大类神秘的《推背图》《烧饼歌》，不独人事的社会科学所不许，亦物质的自然科学所难能。例如天文学无论如何进步，亦不能于气压之动象未现以前，预示数十百年或数年内某地某时风雨寒热之定象，虽历久而不爽毫厘。资本制度发达，宗法制度破坏，其结果小家族制度自然发生；共产制度实现，私产制度破坏，其结果家族制度将简之又简而至于无；生产力大发展，分工制度大发展，生产方法及生产工具都日趋于集合而不可分离，其结果财产制度亦必日趋公有。此等都可据今因以推求后果，过此以往，欲求知千年万年后的社会制度如何。只待富于神秘性的玄学大家重造新推背图，社会科学家唯有甘拜下风！前所辩论之九项中，一部分明明是推求社会现象变迁之动因及人类态度随此变迁而变迁之动因，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皆是；一部分明明是推求人类之人生观所以不同的动因，如第五、第七、第八皆是。乃张先生一则曰“不究九端之动因”，再则曰“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我真不懂他所

谓“动因”，在术语上到底是何意义？而且张先生所指九项，究竟是说社会现象还是说个人态度，其观念及论点实在太不明了。在他“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何自而来也，甲以为然，乙以为否，甲曰以为是者，乙曰又以为非”。这几句话看起来，明明是指个人态度即个人的主观，不是指社会现象，他对于我解释的社会现象之动因，似乎已经承认，他所以说：“此事之可能何待赘言”，又说：社会学家关于九端之说明之文，连篇累牍，我虽浅学，岂并此而不知？（张先生倘不抛弃玄学家以个人自由意志为社会变迁之根本动因的谬见，无论他如何博学，对于我关于九端之说明，其实未曾知，且恐终身亦未必知。然而他竟自欺地说：“岂并此而不知？”他若再将我说明九端之文细心看一下，他必然自悔发言轻率。他倘不自悔发言轻率，便真是知道我关于九端说明之可能，也便真是知道社会变动及人生观变动之唯物的说明之可能了）然而同时又说：“独秀虽尽举社会家言以难吾九端之列举，然吾之根本主张，仍是一丝一毫不能动摇也，何也？小家族后之家庭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公有财产后之制度如何，谁知之乎？”似此，他又是指社会现象而非指个人态度，其论点不明如此！吾再简单地正告张先生：社会现象变迁之动因及大多数个人对此变迁之态度即社会心理，推求其最初原因都是物质的，而为因果律所支配，因此，社会科学家才有加以物质的因果的说明之可能（幼稚的社会科学家所说明的因果是否和社会现象之实际因果一一符合，这是另一问题），至于个人对于各项问题之态度之变迁，其异时而态度不同者（即甲曰以为是，乙曰又以为非），则仍是明显的社会心理或隐伏的社会实质变迁之结果。其同时而态度不同者（即甲以为然，乙以为否），则因社会之新旧变迁终属相续而相错，没有截然的突变，于是个人不同的历史和环境遂造成个人不同的态度，即不同的人生观。这些个人态度即人生观之变迁与异同，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是个人自由意志之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个人意志之活动，诚然是事实，而非绝对自由，因为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律并心理现象的因果律支配，而非支配因果律者。

以上三点之外，还有数事须请教于张先生：

（1）讨论真理，当以符合实际与否为标准，不当以其说新旧为标准。张先生说我生当日而犹守马氏之言若圣经贤传，然而张先生自己却连篇累牍地称引穆勒约翰与詹姆士（我生平论著绝不似张先生动辄称引古人），不知穆勒约翰以后唯物派的经济与社会学，詹姆士以后测验的心理学均大有进步，何以张先生犹守穆勒约翰、詹姆士之言若圣经贤传？

（2）张先生说：“生当日，而犹守马氏之言若圣经贤传如陈独秀者，岂为求真哉？亦曰政治之手段耳！墨司哥之训令耳！”吾当正告张先生：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墨司哥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地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

隐痛。若张先生鼓吹玄学反对马克思学说，是否求真，是否政治手段，是否直接地受研究系之训令间接地受北洋政府之训令，像这类逾越讨论道理之轨道以外的话，我在此处不屑多说！

(3) 张先生所谓生当今日不应犹守马氏之言的理由，乃是“谚不云乎，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张先生（不但张先生，自来唯心论者）在社会动象中，只看见思想演成事实这后一段过程，而忘记了造成思想背景的事实这前一段过程，这本是各派唯心论之共同的中心的错误。他们只看见社会上一种新制度改革之前，都有一种新思想为之前驱，因此便短视地断定思想为事实之母。他们不看见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它所以发生的背景，绝非无因而生。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才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些事实的儿孙，如何倒果为因，说思想是事实之母？笛卡儿说：“我思，因此，我存在。”我说：“我存在，因此，我能思。”我并且说：“我不存在时，因此，我不能思；而宇宙间一切物仍存在。”敢告一切唯心论者，倘不能论破我这辩证的方式，别的千言万语都是支遁之词。

(4) 张先生在此序文中，分“物质科学”“个人心理”及“社会生活”为三类。在此三者中，只承认物质科学是真正科学，并力言社会生活之超科学较个人心理为尤甚，其论点视前文明晰，不犯笼统混淆之弊，这或者是他的思想更成熟之故。但张先生要知道：这是因为个人心理现象比物质现象复杂，社会现象比心理现象更复杂，所以我们人类对于这些现象因果之认识便有比较的精粗迟速之不同，并不是宇宙间诸现象中，一部分是有规律秩序的，一部分是乱杂无章毫没有规律秩序的。宇宙万象之有规律秩序是一件事，我们人类的知识已否认识这规律秩序又是一件事，不能拿我们主观上犹未能完全认识某一部分之规律秩序，遂断定客观上某一部分本来没有规律秩序。现在不必谈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单就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来说，亚当·斯密以来，果如张先生所谓“绝无一条真正公例”吗？此时物质科学之公例视社会科学之公例多而且正确，也不过是比较之词，其实物质科学之公例仍不敷应用于一切物质现象而包括无遗及其已成的公例又时复动摇，这都是彰明的事实，张先生岂能因此更主张物质现象也不为因果律所支配，并对于物质科学也要否认吗？我想生在今日的张君必不致如此。但是在五百年前，物质科学即张君今日所承认之真正科学，那时它的公例又有几条呢？那时人们否认物质科学，否认物质现象为因果律所支配，比现在的人们否认社会科学，否认社会现象为因果律所支配，岂不更为凶猛？

(5) 张先生说：“所以以人生观与科学对举者，谓科学有一定之公例者也，人生观则可以人类意志左右其间，而日在创造之中者也。”张先生又说：“思想者事实之母

也。”却是他又说：“事实如此……十九世纪以来，欲进人事于科学之迷梦，今可以觉醒矣。”张先生这篇文章未免太逞笔锋，忘其所以了！原来张先生所说以人类意志左右其间而日事创造的人生观，不受科学因果律所支配的人生观，仍然要跟着事实走！原来事实仍然是思想之母！原来思想仍然没有超越事实的可能，超越事实的想头乃是迷梦！原来张先生也重视事实，竟不相信人类思想意志可以自由创造！

梁任公在非“唯”文中（见二十期《教育与人生》），对于我们也有两个误会，这两个误会原来是各国学者对于马克思派普遍的误会，在欧洲在日本都有不约而同的误会，梁任公误会我们，也和他们完全是一样的论调。

第一个误会是他说我们是“机械的人生观”。这大概是因为他不甚注意近代唯物论有二派的缘故：一派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一派是历史的唯物论。机械的人生观属于前一派，而后一派无此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为人是物质造成的，历史是人造成的，如何说他是机械的人生观？我曾有《列宁之死》一短文载在第十六期《中国青年》，也是说到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兹摘录于左：

唯心派素来把历史变动之唯一原动力归到个人意志之伟大，因此将俄罗斯革命事业，无论功罪是非，都当作列宁个人的事业。因此，列宁死了，他们便以为俄罗斯革命将随之寿终（即苏俄瓦解之意）。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历史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俄罗斯有农工大群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为之拥护；他们不明白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他们不明白苏俄之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地位，已有不随列宁之死而动摇的程度。所以这派人的想象，是和事实不符的。

然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许多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地实现。人们的意志，是人们物质生活关系造成的；人们的历史，是人们贪欲无厌的意志造成的；这便是我们所相信之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之点。列宁生前在革命中的成绩，是我们所知道的；他死后，在新俄建设及世界革命中的损失，也是我们所应该承认的。人造的历史和机械的影戏不同，我们决不可陷于机械的唯物论之误解，说列宁之生死存歿都和俄罗斯革命事业绝无影响。

梁任公第二个误会是他说：“唯物史观的人们啊！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啊！若是你们

所说是真理，那么我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遗传的八字’‘环境的流年’，早已经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这个误会也是因为他把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看做一样。张君劢先生也说：“假如其言，社会进化为生计条件所支配，而无假于人力之推助，则马克思之宣传与颠沛流离，岂不等于庸人自扰？”胡适之先生也曾以同样的理论质问我。最有趣是张君劢也以同样的理论质问适之。历史的唯物论不否认个人之努力及其和宿命论不同，本是唯物史观中一部分重要的理论，Boudin 的马克思学说之体系附录二中论此颇详，怀疑者觅此一读便自明了。兹再录我答适之的话以答梁任公与张君劢：

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我们不妄想造一条铁路通月宫，但我们却不妨努力造一条铁路到新疆；我们不妄想学秦皇汉武长生不老，但我们却不妨努力卫生以延长相当的寿命与健康的身體。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能和经济立在同地位。

此外，对于梁先生非“唯”的意见，我也要附说几句：

原来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及人生观，向来分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两派（我不承认二元论能够成立），唯物唯心是沿用翻译佛典之名词，在西文里原没有什么“唯”字。但物质论者是说世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亦为物质所生；精神论者是说世间一切都是精神，物质亦为精神所生；二者结论虽正相反对，其均为一元论则同，一元便与“唯”无别。

互相联系的森罗万象，本来是一气呵成的整个世界，其根本或云都是物质，或云都是精神，却不能说是分途并进各别为一世界如二元论者之所想象。因此，二元论之归结，恒为客观的唯心论，即使他本不欲“唯”，而事实上令他终不得不“唯”。犹之唯心论者终必采纳宗教神灵之说，因为在有人类意识以前，单纯的物质世界久已存在，若不抬出神来，精神一元论的招牌便须自己取下。

二元论终不能成立也如此，无论物质或精神，世界终属一元，一元就是“唯”，不是哲学者为分门户，主观的故欲其“唯”，乃是探讨万象穷源尽委，客观地说明此现象时不得不“唯”。梁先生所信分明是二元论，二元论本无可“唯”，自己无可“唯”便责骂他人“唯”，自己主张二元便责骂他人主张一元（“唯”就是一元，唯物论就是物质一元论），便下哀的美敦书来宣战，这是何等“学术界专制帝王的口吻”！

客观地说明宇宙现象之“唯”，和李斯、董仲舒对于人为的学说定一尊绝异端迥不相类，乃梁先生竟并为一谈，这是何等浮光掠影的望文生义！浮光掠影的望文生义而不能深入骨髓解析其内容，或者正是梁先生一生治学之受病处。梁先生果真欲在学术界指导青年，须先于自己受病处深加猛省！我知道梁先生不是饰非文过的懦夫，故敢进直言。

五月二十五日。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瞿秋白

哲学的思潮往往是时代的人生观变易之际的产物。譬如法国革命前的百科全书派、启蒙学派，或是欧战前后的复古思潮——都是社会制度根本动摇时的影响。然而每一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思想的争辩都含有阶级的背景。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这固然是中国“第三阶级”发展时的思想革命，可是实验主义的本身，在欧美思想界里所处的地位是否是革命的呢？这却是一个疑问。

实验主义首先便否认理论的真实性，而只看重实用方面——“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可是这一个原则，却亦没有抽象的价值。它的应用亦是因时因地而异其性质的。它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至于欧美呢，这却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

诚然不错，实验主义教中国人自问“为着什么而生活，怎么样生活”，在中国是旧制度崩坏，新阶级兴起时的革命标语；在欧美却是旧阶级衰落时，自求慰藉的呓语——因为实验主义给的答案是“怎样应付现状”。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应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中国的第三阶级，要应付军阀的压迫，所以是革命的；在欧美的资产阶级，要应付劳工阶级的反抗，所以是反动的。

中国这样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处于国际竞争之间，当然需要科学的知识，以为应付之用，所以实验主义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实验主义的特性就在于

否认一切理论的确切价值。它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哲学，尤其是“美国主义”。实验主义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它自己是否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

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彻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

实验主义是什么？

詹姆士说：实验主义的方法，最先便是消弭哲学上辩来辩去辩不完的争论问题。宇宙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这是永久不能解决的问题。宇宙的真实，其实可以不用讨论。实验主义只问某种意见在实用上有什么结果。假使某人认甲种意见为真理，认乙种意见为非真理，在实用的结果上，有什么区别？若是没有什么区别，那就很不用争辩。真正的争辩，只有实用上两种意见有不同的结果时，方有价值。

实验主义的名称——Pragmatism 的语根与欧洲文 Practic（实行）一字相同，本为希腊字“行动”之意。普通的哲学系统，大致都以“静观”作考察宇宙的观点，从没有问及宇宙的变易之可能与必然的，亦没有注意到现实世界的积极精神的。实验主义却是一种行动的哲学。

“实验主义远避一切抽象的不可几及的东西，一切纸上的解决，先天的理由，一切硬性的不可变易的原则，一切锁闭的系统以及一切绝对与原理。它只问具体的，切近的东西，只问事实行动及权力。”（詹姆士之《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愿意做锁闭的系统，它要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有这方法可以研究现实生活，并且改革现实生活。它的根本精神——就是使一切“思想”都成某种行动的“动机”；它时时刻刻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方面及积极性质，这都是实验主义的优点。

然而实验主义的弱点，却亦在它的轻视理论——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论的。

照实验主义说来，一切理论不是解释疑谜的答案，而只是工具罢了。凡是一种理论，一方面是我们对付外界的手段，别方面是一种逻辑的工具，如此而已。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在于这种知识能否促进我们的某种行动。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照实验主义的意思说来，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某种学说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实的；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一切真理都应当

合于我们的需要。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它实用上的结果而定。“哪一种理论对于我们最有贡献，最能领导我们，最能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各部分的问题，最能综合我们的一切经验，丝毫不爽——这种理论，实验主义方认为是真实的。假使宗教能合乎上述的条件，假使‘上帝’的概念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实验主义又何所根据而反对上帝仍存在呢？”（詹姆士）只要对于事实有利益，不管他究竟真不真，这种理论总是好的。假使宗教能“安人心”，那么，宗教亦是真理。

实验主义的意思，以为真理自身并无何等价值。每种学说必须与人的实际需要发生关系，方能成为真理。假使宗教能帮助我们经营实际生活，减少我们生活里的苦恼，那么，宗教亦是真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实际上真理是否能作如此解释呢？不然。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方能是有益的——思想的积极精神必须反映现实里的积极精神。事实上无所用其“积极”的地方，单是我们主观的努力是无用的。一定要客观世界给我们一个保证：保证客观里的一切发展是依定律的，这些定律可以做我们人的行动的指导的——那时方有积极之可能。如今实验主义只问理论能否做人的行动的动机——那就是承认一切催眠术式的学说亦是真实的。譬如说：中国现在要一个好政府——你们只要承认这一个意见，动手去干就好了，不必细问这一种意见，是否客观上有实行的可能。中国政治的发展，社会里各种力量的形势，依社会变易的定律，是否容许好政府式的救中国，也应当考虑一下。

何以实验主义以为一切理论自身本无何等价值？这是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建筑在多元论上。“……现实世界若是离了人的思想，就变成很难捉摸的东西。现实世界接触了人的经验之后，还没有定名，便只造成某种观念；或者呢，现实世界还没有被人认识明白之先，能因经验而与人以某种概念。在这种时候，只有一种模糊的绝对的不可捉摸的意象——纯粹理想上的一种界说。”（詹姆士）如此说来，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这种感觉以外的真实世界，若是不和我们的经验接触，那么，他的存在与否，都不成问题。于是我们便能任意分割经验上得来的感觉，使成种种事物、种种关系及联系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念。感觉固然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绝不受我们的管束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凭着这些利益和需要我们来决定：许许多多感觉之中对于哪几种感觉我们便注意，对于哪几种便不注意。因此，现实世界的内容，可以由我们自己选择。外物自外物，我自我。我凭我的需要，择取外物的观念——我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别人所见的，我现在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我将来所见的。于是外物都成了我们任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凭着自己的需要而设想出来的。詹姆士说：“……就是在感觉方面我们的精神亦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有自

由选择的能力。我们能取此舍彼——这便是感觉方面的界限。注重感觉所得的某几部分，而不注意其余的部分，我们就划出一个先后来了。在这里再整理出一个系统之后，我们方能了解他。总之，我们有的是一块大理石，要自己拿来雕一个形象出来。”在某一现实世界里，我们有几种目的，便照着这些目的制造出一种观念来，这些目的以外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不问。因此，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它的真理便成了主观的。所以一切“真实”只是为我们思想的方便（Expedient）而设——一切“正义”，亦都是为我们行为的方便而设。

照实验主义的观点看来，假使某种真理，因种种缘故而变成无益的，他亦就成了谬见；换句话说，假使原有的目的和需要变了，以前的真理便变成非真理了。人的需要、现实生活的要求、主观的愿望及目的——是知识和意见之真否的最高标准。这些目的和需要愈有价值，愈高尚，那么，能以达到这些目的和需要的学说也就愈有价值、愈真实。

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和愿望完全依着我们的利益而定的——所以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再则，各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所以实验主义便只能承认：有几种利益便有几种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的互辩律的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很相近，其实不然。

第一层应当注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为：“各种观念是由于各种感觉所引起的，感觉乃是人对于外界环境直接起的反应作用。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定——尤其是每一社会阶级的行为是如此。”仅仅承认在心理方面说来，每一社会阶级对于自己有益的真理，对于那种能够做自己阶级斗争的好工具的学说——格外接近些，却并没有承认一切有益的学说都是真理，亦没有承认人的愿望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标准，真理的规范，更没有承认知识的内容是主观的。

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我们对于外物的概念确与外物相符合。因此，我们要利用外物，只能尽它实际上所含有的属性，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客观的现实世界里所没有的东西，不能做我们行动的目标。现实只有一个，真理亦只有一个。我的观念及思想，当然是〈时时〉刻刻变的，然而这是因为客观的现实世界在那里〈时时〉刻刻地变，却并不是因为我们主观的目的在那里变。照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意义，我们亦在时时刻刻变易外界的现实生活，然而只能依着客观的趋向。我们不能要做什么便做什么。现实生活处处时时矫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观念反映客观的现实很正确的时候，我们的

行动便不至于和现实相冲突——不至于“碰钉子”。某种意见是真理——并不因为它对于我们有益；这种意见对于我们有益——却因为它是真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客观的现实世界确是变易不息的，我们因此要求科学的真理——确定的真理，求此变易之中“不易”，不能像实验主义那样，只能暂时有益于我们的算真理。我们得了科学的真理，客观世界的定律之后，才能彻底地改造社会，不能安于琐屑的应付。

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它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它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

蒋侠僧

我的心灵使我追惋，
那八十年前的海涅，
多情的海涅啊！
你为什么多虑而哭泣呢？
多情的诗人，
可惜你未染着十月革命的赤色！

——录侠僧《我的心灵》诗一节

“……想起来那个时候——共产主义者，不信神的人们得到了统治权，用自己粗糙的手腕，毫不怜惜地破坏一切温柔的美的偶像（我的心灵所贵重的东西）——我真是恐怖而战栗啊！他们破坏一切为诗人所爱的艺术的幻景；铲除去我的娇艳的樱桃树林，而种下粗野的马铃薯；美妙的百合花亦将要被芟去而离开社会上一块土了！……呸！当我想起来那个时候——凯旋的无产阶级将我的诗抛入坟墓与一切旧的浪漫幻想的世界同归于尽——我真抱着无限说不出的羞辱啊！”

德国伟大的诗人海涅在一八五八年临死不久的时候，写出自己对于将来的悲痛。他明知道无产阶级，粗糙的共产主义者，要得到政权，为世界的统治者；但同时忧惧他们破坏一切为诗人所爱的东西。哎哟！我的多情的海涅啊！你真是空忧惧了！倘若你能活到十月革命之后，亲睹俄国无产阶级对于旧有艺术保护无所不至，你又作如何感想呢？

共产主义者也爱百合花的娇艳，但同时想此百合花的娇艳成为群众的赏品；共产主义者也爱温柔的美的偶像，但同时愿把此温柔的美的偶像立于群众的前面。共产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之无意识的玩物，非常的厌恶，然对于美术馆、博物馆及一切可为群众利益的艺术作品，仍保护之不暇，还说什么破坏呢？共产主义者对于帝王的冠冕

可以践踏，但是对于诗人的心血——海涅的《织工》、哥德的《浮士德》，仍是歌颂，仍是尊崇！我的海涅啊！你可知道你许多的作品还为共产主义者所诵读呢？倘若你能听到这诵读的声音，你又作如何感想呢？

海涅真是白忧惧了！

倘若有人说，无产阶级只能作破坏人类文化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也只是为着讨厌的面包问题，而不能顾及人类文化的前途，那么，我们现在拿俄国无产阶级做一例证，好不好呢？

我们是粗暴的劳动军，
我们战胜海洋陆地的空间，
举着人为的太阳之光照遍都城，
我们的心灵之火也红得动地惊天。
我们立于暴动的权威之上，
让人们对于我们的呼喊：
“你们是杀美的刽子手啊！”
为着明天，我们抛去艺术之花，
我们焚毁宫殿，破坏博物馆！……

——克里洛夫《我们》诗一节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怒涛中，本有破坏一切艺术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文化之反动，为一时的，无理性的现象。克里洛夫本是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诗人，这一种不顾一切的宣言，实可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对于文化，一种反常的心理。然而当十月革命发作时，对于文化问题之解决有二大趋向：克里洛夫代表无产阶级之一种反常的趋向；我们又可以在无产阶级诗人格拉昔莫夫诗中，看出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文化问题之一种伟大纯正的趋向。格拉昔莫夫答复克里洛夫的宣言：

我们统了都拿来，我们统了都认识，
我们探讨广大的深渊到底。
这金光灿烂的五月，
使得春天的心灵沉醉，
我们能领受一切，
我们向着这新的博物馆高举玉杯……

这真是无产阶级对于文化的态度啊！“我们统了都拿来，我们统了都认识”，这种态度是何等伟大呢。虽然当无产阶级革命时，发生一种反常的潮流，但是这种反常的潮流是一时的，而非永久的。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本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人类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负担。所以克里洛夫的宣言终为格拉昔莫夫的宣言所战败了。

十月革命以后，一些攻击共产党的人们，天天闭着双眼，乱骂共产党人为杀美的刽子手，人类文化的蠹贼——总之，共产党是野蛮分子。现在俄国革命已经六年了，无产阶级政权日益巩固，而对于俄国旧有的文化，所损害在什么地方呢？剧院、博物馆，不但没有被野蛮的共产党所破坏，而且较从前增加得多了。虽然在最短时期中，不能产出伟大的著作家，但是现在俄国文学界总比欧美兴勃得多了。教育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发展到我们所希望的地步，但是比较未革命以前，一般人民的程度已高得多了。到底无产阶级对于人类文化所损害的在什么地方呢？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人类文化有无损害，我们可以在俄国看得出来。倘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人们，一定要骂共产党为人类文化的蠹贼，那我们也不愿意多争辩了。

不错，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着解决讨厌的面包问题，倘若没有面包问题，十月革命也将不会发现了。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止于解决面包问题吗？正面说无产阶级革命原是为着解决讨厌的面包问题，而在反面说，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对于人类文化之促进。面包为文化之本，面包问题不解决，人类文化永无充分发展的希望：人们不能饿着肚皮，静听美妙的音乐；人们更不能饿着肚皮，创造出贵重的作品！我们固然知道这美妙音乐、贵重的作品，可以圆满人类最高度的精神生活，但是若面包问题不解决，这美妙的音乐、贵重的作品，纵然不能完全不能存在，至少也可以说为少数人独享，而其余的多数人们，都无赏鉴、听闻的机会。

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是解决面包问题，而且是为人类文化开一条新途径。

人类的精神生活由其物质生活而定。换言之，人类文化依着物质的、经济的基础而发展。物质的基础发展到某一定程度，人类文化必与之相符合，而不能超出范围，因为人类文化本是人类物质生活的产物。某一时代经济发展的形式规定某一时代文化发展的程度：原始共产社会时代的文化是一样，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化是别一样，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更与前二者不同。经济形式进步，文化也随之发展，所以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化比原始共产社会时代的文化高，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又比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化高。

但是因为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缘故，社会中分成统治与被统治二个阶级。因为

社会中有阶级的差别，文化亦随之而含有阶级性。统治的阶级为着制服被统治阶级，于是利用文化迷惑被统治阶级之耳目，而别一方面被统治阶级生活于劳苦之中，几无享受文化之机会。不错，文化为全人类的结晶，但因阶级斗争缘故，文化本身不得不蒙着一重阶级色彩了。

试问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多数人们能听得美妙音乐么？多数人们有创造贵重作品的机会么？资产阶级占有文化，或借文化为消磨无产阶级觉悟的工具，可以说，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非有害于无产阶级，即与无产阶级没有关系。

试问现代的文化能称为全人类的文化么？现代的文化是阶级的文化！阶级为文化发展的障碍，阶级不消灭，人类文化永无充分发展之可能。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社会阶级，建设无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生产机关与工具既属公有，竞争市场的现象必归消灭。用全社会力量发展全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当然可以发达到最高程度，而随生产力发展而发展的文化，当然也可无止境地发达起来。阶级既归消灭，文化的阶级性亦随之而失去，全人类的文化方有开始发展之可能。虽然无产阶级革命一时不能创造成全人类的新文化（因为阶级一时不能消灭），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却开辟了创造全人类的新文化之一条途径。

照着这一条新的途径走，且看将来人类文化的灿烂光华啊！

倘若现在的社会中，多数人们不能静听美妙的音乐，无创造贵重作品之机会，则在将来社会中，人人都能静听美妙的音乐，都有创造贵重作品之机会，岂不是快事么？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是否有存在之可能？主张全人类文化说者，以为文化为全人类所有的，当然没有阶级性，所谓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等等，直是一种成见而已。

我上头已经说过了，文化为全人类的结晶，不应为任何阶级所独占，但是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文化虽为全人类产物，其势力不得不为统治阶级所私有。统治阶级，一方面为自己阶级地位巩固计，竭力发展自己阶级的文化，而别一方面，将所有非自己阶级所产出的文化，务使其适应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灌输之以自己阶级的思想。阶级的文化就因此而成立了。封建阶级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在事实上，实不容加以否认。

无产阶级亦与其他阶级一样，在共产主义未实现以前，当然能够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而在别一方面说，这种无产阶级的文化为真正全人类文化的开始。真正全人类的文化，在无产阶级完全得到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消灭各阶级之后，全人类成为一体，文化再没有含着阶级性的可能。此种共产主义的文化——全人类的文化——现在我们暂且不说，我们所要说的，就是在过渡时代，无产阶级能否

创造自己特殊的文化。

无产阶级文化，在欧洲、美洲已经开始发展了。无产阶级既成为政治上一大势力，在文化上不得不趋向于创造自己特殊的、而与资产阶级的相对抗。这种趋向经过自己的思想家表现出来。无产阶级亲手创造出许多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

但是在无产阶级未握政权的国家中，此种无产阶级文化，当然发展在极低度，因为物质的力量欠足，无产阶级不能为所欲为的缘故。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譬如俄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程度快得多了。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诗人、无产阶级的剧院、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在文化上，已经夺得一部分优越的地位，而努力创造自己阶级的文化，这些无产阶级诗人、剧院、艺术家……可以说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表。

倘若有人问：无产阶级文化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就回答：无产阶级文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无产阶级文化在自己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当然比资产阶级文化高些，范围宽大些。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是现代的大工业，伟大的机器已经锻炼得无产阶级异常强固——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化更有切实的根据。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伟大思想家，已成立科学的根据，比较资产阶级更强有力得多了。

倘若资产阶级从高等的阶级（贵族）及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得了许多帮助者，无产阶级从别的阶级中所得来的帮助者必定更多。一些慈心而颖慧的人们，自然对无产阶级抱绝大的同情。有时并且有些伟大的分子从敌无（？）阶级跑将过来，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臣。这些阶级的叛贼，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可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更对无产阶级文化之创造上，将有莫大功绩。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已有很坚固的根据了。

现在且回头看一看无产阶级革命后的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收集了许多由别阶级跑来的一切尊重人类文化的分子，正在一方面发展无产阶级文化，而别一方面同时开始全人类文化的途径呢！倘若同海涅有一样忧虑的人们，现在可以觉悟了！

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

蒋侠僧

一、绪言

倘若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那么，我就要问，上帝由何而产生？
可笑！人类自己创造了上帝，
而反以上帝为万能。

旧经典对于世界之解释，以为世界为神意所创造，生于无有，乃千古不变者——这一种愚笨而幼稚的思想，不能满足现代人类求知的欲望了。几千年人类所积聚的观察及所经过的事实，皆与此类谬误的观念不能相容。现代的科学已发达到较高的一点，凡往昔所不能解释者，现在皆能穷究精微，不遗余地。地质学对于地质的分析，生物学对于动植物界的研究——皆显明地指示我们，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之物。一切自然界都在不断的发展中，亦即都在不断的变动中。日球也罢，行星也罢，一切无机体也罢，一切有机体也罢，皆非忽然一时发生者，今日它们在吾人前呈如此的现象，也不知道经过几许的变动而来。

自从达尔文学说出世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两句话成了生物界一个定案。人们既知物种的由来及其演变，自然把神意创造宇宙之说抛入天外云边，不复相信。哥白尼发明地球绕日而行，久已规定对于宇宙的法则之科学的唯物的观念。我们现在可以说此二人给了人类解释自然界发展的锁钥。

自然界既如此，人类为自然界之一部分，能否逃出自然界的范围？人们说，人类为万物之灵，其发展演进当然非自然界所可拟比，我们可以用科学的唯物的眼光观察自然界，绝不可以用科学的唯物的眼光观察人类的自身。

倘若这一句话是对的，那么，人类的历史茫茫，我们将无从研究起；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也无从认识；我们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分子，我们的行为又应以何为标准呢？

不！人类既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当然逃不出自然界范围以外——人类社会的变动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物质的基础之变动的结果，若把人类社会生活之物质的基础之变动的线索，考得清清楚楚，则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并非没有认识的可能。

马克思以前，唯物史观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未成为一科学之时，学者总未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因之，我们也就寻不得一个圆满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

法国大革命的代表，十八世纪的唯物论者一方面创立唯物的世界观之坚固的根基，解释自然界的真相；但是一涉及人类的历史，他们完全陷于唯心论的幽谷。他们说思想支配世界，理性有管理人类社会的本能。凡一切不合于理性的，皆不宜存在。封建制度不合于理性，当然无长久存在的必要。他们高唱平等、自由及博爱的美歌，咒骂不合理性的遗物。但到大革命以后，社会中矛盾的现象不但未减少，并且因之而剧烈；不合理性的事实，不但没有消灭，并且因之而增加。所谓平等、自由及博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革命前理性被视为神圣的万能，革命后理性不禁蒙了无限的羞辱！社会中自然有一种潜势力规定社会前进的方向，不与理性的愿望相符合。也好！有了此一番历史的大经验之后，在永远的利益斗争之中，人们不得不另寻社会发展之内部的规律——不依赖单独个人的意志与理性的规律。

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被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始人马克思寻将出来。马克思首先使历史成为真正的科学，规定一严密的规律，而以唯物的观点解释一切过去历史的事实及现在的现象，预言将来的趋向。马克思指示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真正的方法，他虽然没有解释唯物史观的专书，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经济学批评》的序书中，已可以得到唯物史观之正确的概念。

稀奇！达尔文《物种由来》出世的一年（一八五九年）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出世的一年。一个探得生物界的隐秘，一个发明人类历史的真相。两位伟大的学者给了我们对于世界及人类社会之一明了的概念。

二、生产力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类离开动物界，能开始创造自己人类的历史，仅仅从他会利用工具，并且会制造工具的时候始。寻找食物或与仇敌奋斗，也有许多高等动物会利用工具，如猿猴抛石打敌手与用树枝砸穴或打果实等。但是它们所利用的是现成的工具，而不知改变工具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唯一的会制作工具的动物即为人。因此，人能使自然界适应自己，而自己很少的时候适应自然界。一切动物只能适应自然界的环境以图生存，否则无生存的可能，而人则逃出此法则以外。一切动物种类的进化仅表现在自身自然的器官（角、牙、爪……）之改良，而人的进化则表现在改良人为的工具，发明人为的工

具上面，而非自身的机官。工具成为人手的使徒及人与自然界的中间物。人有了此中间物之后，在生存竞争之中，超出于他动物界，他动物界适应自然的环境为消极的、肉体的，而人适应自然的环境为积极的、技术的。

但是，人与他动物异者，不仅仅在于能使用工具，采取现成自然界的物品（如植物的果子、生肉……），并且有了工具之后，人能开始生产物品——使自然界所有的一切物料成为更有益的、更便利的。人开始种有用的一切植物及制造这些植物的果实，豢养有用的动物，采取植物的纤维织成衣服，剥取动物的皮毛……这些都为他动物所不能。

利用工具经营生产的事业，人能创造给自己某种程度之生产力的积蓄。生产力发展之后，人类能在劳动的过程中积聚种种的经验，养成种种精神上的习惯、技术的才能——换言之，生产力为人类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人类异于他动物之唯一的原因。

因此，唯物史观的第一个原则：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要素，或者说，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之唯一的动力。

三、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

马克思说：“人类改变围绕自己的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私有的特性。”这个意思就是，环绕人类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文化及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巨大的影响。

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人类劳动的对象亦超不出自然界的范围，人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乃为不可免的事实。

大家久已知道，落居于某一地理环境之中，人不得不将自己的机体与社会的生活适应此地理环境——这是必然的事情。在热带之下，因为太阳逼射的缘故，人们的面貌及皮肤不得不变为黑色。因此，人类的种族就发生区别，我们照着皮肤颜色区分五大人种的差别。并且气候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程度及形式，亦有非常大的影响：处在热带的居民，因为自然界的供给已经充足，无再须人工探讨的必要，生活条件毫不发生问题。生活条件既然充足，当然没有鼓起人们勉力劳动，趋向发展的激力。因此，生产力凝滞不进；生产力既不前进，文化自然无发展的可能。在极寒带的地方，自然界枯寂而严厉，居民以最大限度的劳力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品，终日奔波于为生活而奋斗之中，没有些许的余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可能，生活无成为更富足更变动的机会，他们的文化又从何而发展起呢？所以我们在最热的地带与最寒的地带，都找不出高度的文化来。人类高度文化发展的地方都处在温带之下，因为温带地方，一方面天然物不十分的充足，还须要人们勤勉的劳动，而别一方面，人们的劳动皆可以得着实效，不至于空费精力。人们除了每日探求生活品之外，还有一部分的余时，在此余时之中，

有了发展文化的机会。

至于地面是高原或是平地，河流之多寡，海岸之曲折等等，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亦有相当的影响。倘若某民族落居于高原之地、丛山深谷之中，与别民族无交通往来的机会，其文化的发展，当然亦随之而局促。倘若某民族落居于海岸曲折之域，或河流交叉之间，交通既然便利，文化的发展当然有更多的机会。

最后，地土与埋伏在地土下财富的性质，对于生产工具与文化的形式，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某地适于牧畜，某地适于农业，某地适于工业，皆为显然的事实，我们绝不能把适于牧畜的地方变为适于农业的地方（指古代人类社会而言）。

因此，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此发展的方向、形式、速度，在最初期已为外界物质的势力、自然界的条件、地理的环境所规定，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然而此种发展到了某一方向之后，就要受内部原因最大的影响，生产力要占第一个位置。生产力越发展，则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减少，人类越能征服外界的条件。现在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无论到某一地方，皆能安然生活，而使自然界屈为己用。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人类非唯一的社会动物，但是人类是唯一的达到社会共同利用工具的动物。因为人类能共同利用生产的工具，所以除了自然界的的环境而外，同时又创造了社会的环境。这个意思就是，人类既然共同向自然界奋斗，在此奋斗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相互发生一种关系。这种相互的关系以生产力的状况而定，当生产力变动之时，此种相互的关系亦必随之而变动。马克思称此相互的关系为生产关系。某一时代的生产关系，必与其生产力的状况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当研究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过程时，必以此生产力的分析为出发点。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说：

“人们加入一定的，不可免的，不依赖人们意志的关系——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一定与物质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符合。”

在《哲学之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又说：

“某一定的社会关系，如麻、布一样，为人们的产物。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发明新生产力，人们改变生产的工具；而改变生产工具，供给生活的工具——同时人们亦改变一切自己的社会关系。”

我们在以上所引证的话之中，已得到唯物史观正确的概念。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为人类社会之唯一的、物质的、变动的要素，因为生产工具改变，社会关系亦随之而改变。我们若欲研究历史的过程，不得不先自研究生产力始。为明了此起见，我们可以说出来几条例证。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的阶级：一、渔猎时及采取植物的果实；二、游牧；三、农业，此时期生活已经固定了；四、最后，各种工业，从手工业到现代机器的生产为止。每一阶级有与生产力相符合的特殊的社會关系——特殊的社會生活的条件。如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渔猎及采取植物果实时代），每一家族采取生活的物品，皆取共同的形式——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谁个也不能说某一兽为他单独所击杀的。所得的物品既然是共同的结果，当分配物品的时候，当然分不出差别来。在此种制度之下，人们间的关系——亲爱自己的家族，仇视其他的家族与部落。此时代完全为共产主义的，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阶级的区分及贫富的差别。

当渔猎不能供给某一部落的生活之时，于是转而为游牧。人们豢养某种禽兽，食其血肉，衣其皮毛。人们随畜队而飘流，此牧场无用时，则转移于彼牧场。比较起来，游牧比渔猎的生产力高得多了。游牧不需要集体的工作，每人皆知自己所领有的畜队，私有财产遂因之而产生。人们开始制作剩余的物品。从前这一部落从彼一部落所捕获的俘虏十九皆被屠杀，到了现在，此种俘虏不必屠杀，而可以强迫之工作，对于主人贡献利益。于是奴隶制度因之而生。

这一种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之发展，在游牧转而为农业的时候更甚。当人口增多，牧场不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固居某一地方耕种可供食的植物，农业遂因之而发生。

私有财产的制度更加巩固，奴隶制度更加发展。大家族分散为小家族，每一小家族耕种自己一片土。于是起了阶级的分化，发生了贫与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阶级斗争既非常严厉，于是阶级统治的组织——国家因之而发生，且保护富人、反对贫人的法律也因之而出现了。

固定农业的经济为自然的经济，每一家族制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品。至生产力更加发展之后，交易的行为因之而起，商业日发展不已，自然的经济不得不破坏了。

工业随着商业亦日渐发展起来，直到现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在机器工业时代，人们间的关系与自然经济时代大相悬隔。自然经济时代，封建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现代资本经济之下，资产阶级统治雇佣的无产阶级。若当封建时代，阶级斗争尚未十分剧烈，则现代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间斗争已达到极高点。现代一切国家的、社会的生活，可以说与封建时代大不相同。

综观以上，某时代生产力之发展的程度规定某时代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了固定的农业，地主与农奴的关系成立；有了大工业的生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成立。此种生产的关系，完全不依赖人们的意志，因为每人所参与的生产关系已经是现成的，农奴的儿子生下来即为奴农，绝不能转变为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当然要卖自己劳力于资本家，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地主非某一农奴所创

造的，资本家非某一工人所创造的，乃历史的结果。若某一工人不愿卖劳力于资本家即刻就要挨饿。

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构成经济的结构——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的筑物：国家的组织、法律、道德的观念，科学的与哲学的思想，都建筑在这个基础的上面。每一社会的经济组织与生产力发展的阶级相符合，而某一社会的政治、思想，又依赖此经济组织而立足。因此，社会生活的变动，政治的、思想的演进，其根本的原因埋伏在经济的组织中，而不应向哲学中、宗教中或文学中去搜寻。

生产力为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非常的重要。若不明了生产力的意义，则研究人类的历史将无从入门。我今因限于时间，不能详述。为使读者更为明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动起见，特列一表如下：

生产力发展表

生产力	生产的性质	劳动的生产率	社会的组织	群居的范围
人们自己	最原始的技术，采取现成的生活品	无剩余的生产品	原始的宗族共产主义，剥削无存在的可能	不很大的群队，每一队的人约 40 ~ 50
人 + 牲畜（马、牛）	原始的农业游牧	剩余的生产品开始发现	宗族的共产主义破坏 家族的共产主义 奴隶为家族中的一员	公社 人数为 300 ~ 500
人 + 牲畜 + 开始利用风力、水力	较进步的农业及牧业 手工业的技术发展 奴隶与农奴的苦役	有剩余的生产品	农奴制度 阶级：武士 神父 农奴 奴隶 商人	诸侯的采邑有时包括数千人
手工业	在城市中开始发展很高度的手工业的技术	同上	小资产阶级交易的制度 自由的手工业者 自由的农民	城市公社与其周围包括数千人以上
人 + 牲畜 + 蒸汽的发动机 复杂的机械 机器的、煤气的生产。此世纪之末，人与牲畜的作用，肉体的力量没有需要，人仅为重要的指导者	技术非常发展 农村经济 大工业	剩余的生产品的数量甚大	资本主义制度 阶级： 大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贵族变化为资产阶级，农民破产	社会间关系包括无数千万人，起初以一民族的国家为范围，然后推至于全世界的市场
机械的发动机（电气化），人仅为一指导者而已	工业与农业联合一起，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联合一起自由的合作	社会必需的劳动减至极低限度 生产率非常的高	将来的共产主义的制度	全人类在一个经济的组织中过生活

五、筑物与基础

我旅行在这广漠的空间里，
无意地吃了许多花果。
我哪知道花果的蜜汁，
会变成了我的心灵呢？

我逗留在绵延的时间里，
无意地听了许多哭笑。
我哪知道哭笑的音流，
会变成了我的心灵呢？

——侠僧《我的心灵诗》二节

倘若我没有吃过花果，我一定不知道花果蜜汁的味美，倘若我没有听过哭笑，我一定不知道哭笑音流的感力。倘若我不旅行在这广漠的空间里，我将无从而吃花果；倘若我不逗留在这绵延的时间里，我将无从而听哭笑。呸！我之所以有心灵，原来是吃来的，听来的，旅行来的，逗留下来的！倘若没先有一个物质的我，则这个心灵的我亦将无从而存在。

哲学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点是：先物质而后精神呢？还是先精神而后物质呢？还是精神与物质是并立的呢？生活规定意识呢？还是意识规定生活呢？关系精神与物质间的关系之规定，不在于抽象的争论，而在于具体的实际的明证。数千年人类实际的经验，近代发展极高度的科学指示我们，精神不过是物质的一个特性，离开物质，精神无存在的可能。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能思想，你有无数量的情绪，但当你一死的时候，你将同别的无机体一样，不能起一点作用了——此完全属于哲学范围，现在且不多论。现在且说一说意识与生活的关系。原来意识与生活是精神与物质的变称，不过意义比较宽泛一点。在社会学上，讨论的是生活与意识的问题，而非物质与精神的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当然负有解决此问题——生活与意识的关系——的职任。

“非人们的意识规定社会生活的形式，乃社会生活规定人们意识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对于生活与意识的关系之公式。此公式并非武断的，乃从历史过程中寻出来的。我们执此公式对证历史的过程，方不致神昏目乱，无所适从。

原始共产社会之风俗、道德的观念、丑美的观念，绝对与农奴社会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不同。若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同原始共产社会的人们聚起来讨论道德的观念，必定大家莫名其妙，互不了解所说的是什么。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定阶级的意识，创造出来特别的阶级的心理。此一阶级对于世界的观念，绝不与彼阶级相同。若资产阶级的代表辩护现代社会制度之正当，则无产阶级的代表极力企图推翻现代社会不公道的、非正义的制度。因此，在现代的社会中，科学也罢，哲学也罢，艺术也罢，宗教也罢，没有不带阶级性的。

我们可以下一定案——意识是生活的反映。意识的形式一定与社会生活相符合；社会生活是变动的，所以意识的形式也是变动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中国社会数千年生产力凝滞不进，农业与小手工业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封建制度非常坚固，一切社会思想都是封建式的。但是自从门户开放以来，欧洲资本主义侵入内地，农业的小手工业的生产不能敌抗大工业机器的生产，经济基础起非常大的变动，社会生活日形不安，骚乱已极。而同时思想界也随之变动，什么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民主共和国，闹个不了。若比之海禁未开以前，真有天壤之别罢。

社会经济生活变动，意识的形式当然亦随之而变动。意识的形式包括宗教、国家、哲学、艺术、法律，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而非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社会经济生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之相互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为一切意识的形式之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切科学、法律、道德、艺术等等的筑物。

现在就要发生问题了：既然一切意识的形式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则筑物对于基础是否有反感的作用？一切哲学、法律、艺术发生后，对于社会生活能无影响么？无产阶级独裁制之政治的形式能否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形成一种力量？倘某种艺术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此种艺术既成之后，对此社会关系能无反感的作用么？

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给一答案：筑物对于基础有相当的反感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举几个例子：

中国虽经过一度民主革命，然因经济落后，国际地位低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事业，致政权落于封建阶级——军阀之手。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因欲陷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不辞极力帮助军阀，剥削中国的人民。因此，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非常之慢，不但无产阶级少发展的机会，即资产阶级亦还未伸起臂来。谁个能否认现在中国军阀与世界帝国主义者合作的政治形式，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没有巨大的影响呢？

十月革命成功，俄国无产阶级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唯劳动者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资产阶级在法律上毫无地位。在思想方面，政府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分谢旧制度的遗物。在经济方面，积极扩张国有工业，树立社会主义的根基。谁个能否认无产阶级独裁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不有促进呢？

就道德方面说。俄国劳动阶级现在差不多大半都明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当工人在工厂做工的时候，以为自己的义务，不仅多尽一点力强固苏维埃俄国，并且多做一点工要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因此，怠工、罢工的意念总算减少到最低度。红军为什么这般勇敢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战将，是劳动阶级利益的保护者。他们对于苏维埃国家的忠心，实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不小的帮助。

就宗教方面说。在东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诸国，本地资产阶级利用宗教号召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生产关系，莫哈默德的威名大有功能。中世纪欧洲的执权者垂涎亚洲的财富，组织红十字军东征，一班愚蠢的国民为着要夺回“圣尸”，于是也就不辞辛苦艰难，做宗教的忠仆。结果，从亚洲所劫夺的财富，助长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给我们的例〈证〉——宗教对于生产力的影响——非常之多，现在可以不必多举。

综观以上，筑物对于基础有反感的作用，毫无疑义。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没有一定的界限呢？

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变动，一切巨大的筑物迟早都是要崩坏的。”这一句话有两层意思：一、筑物的崩坏并不是即刻同基础的变动一起，或者基础变动了，筑物因为习惯、传袭，固泥太深，一时不能崩坏净尽；二、基础变动了，筑物虽快或慢一定是要崩坏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筑物对于基础是有反感的作用的，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一定的界限。

法国大革命前，封建制度妨碍生产力发展，但到十八世纪之末，生产力已发达到某一程度，资产阶级不得不推翻封建阶级而代之，于是革命爆发，封建制度崩坏。当资产阶级初得势之后，一切资产阶级制度实助长生产力发展，但是到了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已与资本私有制度相冲突，无产阶级又不得不取资产阶级的产物而代之。但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初成功之时，无产阶级独裁制虽能助长生产力发展，然而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即刻创造成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又要经过许多时期。倘若筑物能根本地更变基础，则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又无从研究起了。筑物当未影响基础之时，先为基础所创造；当筑物发生后，其对于基础的影响，亦只能到某一定的程度，而不能超过范围。

六、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人们说：历史是几个“个人”所造成的，若把历史过程中几个伟大的人物除去，还有什么历史之可言呢？没有拿破仑，还有谁能领率大军横扫欧洲？没有华盛顿，地球上将无合众国之名。没有列宁、托洛斯基，俄国亦将不致有十月革命之发生。总而言之，历史是几个伟大人物所造成的，无伟大人物，也就没有历史了。

这种见解不仅是一般普通人的，差不多为历史学家所公认（除了马克思主义派的历史学家）。倘若这种见解是对的，我们又将无从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了。我们上头已经说过，历史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此规律并不为个人的意志所转移。现在说历史是个人所造成的，换言之，历史是个人意志的产物。那么，个人的意志是无定的，我们能不能在此不定的意志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我们并不否认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说领率大军横扫欧洲是拿破仑一个人的事情则未免是谬误了。

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精强力壮，乘着推倒本国封建阶级之余锐，极力反对自己的敌人与竞争者（如美国），企图占领欧洲之第一把交椅，掌握世界的霸权，自然趋向征服异地，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欧洲各封建制度半崩坏的国家，当然敌不过新兴资产阶级的法国军队。拿破仑不过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人，一个统率军队的大将而已。拿破仑的行动并不为拿破仑意志所指使。倘若没有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推力，拿破仑能够横扫欧洲么？即使拿破仑有横扫欧洲的伟志，结果也不过是一种幻想，并无实现的可能。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他的伟大的地方是在于他能执行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适应时代的要求，完成法国大革命的事业。

没有华盛顿，便没有合众国么？笑话！当美国未独立以前，英国以美国为榨取财富的源泉，横征暴敛，无所不至。美国人民（包括各阶级）欲图经济的解放，不得不先求政治的独立。英国虽为美国人民的祖国，但因实际利益的冲突，美国人民不得不脱离英国的羁绊。因此，美国独立的要求久已坚固，并非一二人的意志。恰好华盛顿出而任执行的职务，为群众的领导，以建此伟大的功业。假若没有华盛顿，必定另有别一人出来，不过名字不叫华盛顿罢了。

现在再看一看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已经表现过自己伟大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最后时期已发展到很高度，使俄国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帝国，然而因一方面受地主阶级（贵族阶级）的压迫，总不能昂起头来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相并立。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虽较西欧无产阶级为幼稚，而革命性与觉悟的程度却高出西欧的无产阶级，已具有推翻资本制度的力量。欧战发生后，俄国损失

最多，因之俄国无产阶级亦最受苦，至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差不多连面包也没有吃了，不得不起而革命。十月革命完全是解决面包问题的革命，并非一二人意志的产物。列宁、托洛斯基，能适应无产阶级的要求，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才能为十月革命的指导者。他俩对于十月革命的助力是非常伟大的，谁也不能够否认。或者也可以说，假若没有他俩，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之成功没有这般的顺适。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列宁、托洛斯基，即没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而非列宁、托洛斯基二人的产物。

总观以上，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不过我们要确定地说：个人不能转移历史发展的规律。倘若某个个人能认明历史的道路，适应社会的要求，出来执行某一进步阶级的意志，才能成其伟大。否则，某个个人欲倒转历史的轮关，违背时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劳无功，莫得效果。即使某个个人一时地妨阻历史的发展，反背时代的潮流，在历史上也只落得一个反动的罪名，没有“伟大”之可言。如十月革命后的田尼庚、蓝格尔，中国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张勋、曹锟一些混账东西有什么“伟大”之可言呢？倘若我们要为人类社会做一点事业，而不愿空费工夫，则应认明历史的道路，群众的要求，而为此要求的执行者。我们绝对不要以为自己如何想，就如何去做，而应考察群众的心理，作此心理的指导员。例如现在中国社会内困于军阀之专横，外迫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倘若我们能领导群众为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一定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不做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要认清历史发展的道路！

七、结论

人类社会的历史绝不允许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另走别一个道路，而与其他民族及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也许所走的迟快不同，第一个国家在第一个阶级走着，第二个国家在第二个阶级走着，而第三个国家已经走到了第五个阶级。但是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同一的，例如美国资本主义发达最早，法国次之，俄国尤次之。但是无论英国也罢，法国也罢，俄国也罢，社会的发展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既然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在资本主义的腹内一定生存着共产主义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资本主义一样。

俄国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民粹派说：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应如西欧一样，因为俄国的国情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资本主义为害甚大，不适合于俄国，俄国无避免资本主义的可能。俄国建国基于农民，农民有“密尔”的制度，可为社会主义的根基。俄国农民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能力，但是八十年代后，普列哈诺夫由民粹派转而为马克思主

义者的时候，于是马克思派认定在俄国一定要发展资本主义，一定要走西欧所走的道路。马克思派很确定地说，俄国避不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是将来的无产阶级，而非现在的农民。这两种意见的争辩，孰是孰非，俄国历史已经明明白白指示出来了。现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我们更有趣味地问一声：究竟俄国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农民呢？呸！俄国不但经过了资本主义，而且现在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开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

现在在中国或者也有人们说：中国的国情是特殊的，中国不应走欧美所走过的道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致有劳资阶级斗争的惨状，故在中国应免去阶级斗争，而另走别一幸福的道路。中国社会无阶级的分化，没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分别，故共产主义学说不适于中国。……这种愿望或者是很好的，但是中国近数年来的历史，已经说明这种愿望或主张是荒谬的。谁个还能说，现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或是中国资本主义不正在发达呢？谁个能说，现在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呢？香港水手的大罢工、京沪铁路大罢工、湖南纱厂的惨杀案……岂不是都足证明中国一定要走欧美所走的路之证据么？我可下一定案：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中国有劳资阶级的斗争，中国将来一定有无产阶级革命。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愿望，乃是客观的物质的趋势。

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因为生产力未发展到极高度以前的时候，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形成阶级的差别。有了阶级就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之最后一步为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度，建设共产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哪一部分社会都逃不出此规律的范围。

我们且看中国社会的将来！

辩证法与逻辑

蒲列哈诺夫 (Plekhanoff) 著 郑超麟 译

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哲学，不仅是唯物的哲学，而又是辩证的唯物论。反对这个学说的人，表示两种意见，他们以为：（一）辩证法本身受不起批评；（二）唯物论与辩证法不能相容。我们对于这两种意见须得答辩一下。

读者大概都还记得，伯因斯坦 (Monsieur Bernstein) 先生怎么用辩证法底恶影响去解说他心目中所谓马克思与昂格思的错误。通行的逻辑必得有这个公式：“是——是与否——否”，而辩证法则不然，它把这个公式翻转过来，成了恰相矛盾的另一个公式：“是——否与否——是”。伯因斯坦先生讨厌后一个公式，就说它能领导人们至极危险的逻辑的错觉与谬误。所谓受过教育的读者先生们，或许有大多数同意于伯因斯坦先生，因为公式“是——否与否——是”，从表面看，固然与推理的根本律成显著的冲突。这里就是我们该当置论的一方面。

推理有三个根本律：（一）同一律；（二）矛盾律；（三）不容间位律。同一律说：甲是甲或甲——甲。矛盾律——甲不是甲——不过是第一律的否定形式罢了。按照不容间位律，凡二个互相冲突的矛盾判断，不能二个都是错误，甲是乙或是非乙。这二个判断中，一个是对的，必然可以断定它个是错误，反之亦然。这里没有折衷的判断，也不能够有折衷的判断。

伊伯尔凡格 (Tberveg) 觉得矛盾律与不容间位律，可以联合在底下一条逻辑的原则里头：对于每个完全确定的——即在这个完全确定的意义内明白的——关于以某一定特性附属于某一定物件的问题，应该答复：“是或否”，而不能答复“是与否”。

固然，很难的发表任何意见，反对这条原则的正确性。可是这条原则果真对了，那么公式“是——否与否——是”似乎绝对不能成立了。我们也只好学伯因斯坦先生先列嘲笑这个公式，而这个问题就牵连到发问：怎般举世公认的大思想家，如希拉克里特 (Héraclite)、黑格尔 (Hegel)、马克思，能够承认这个公式，比较那根深蒂固建筑于上述的推理根本律之上的公式“是——是与否——否”，为更满意些？

这个，为辩证法的必然结论，似乎是无可否认的。

但在未曾接受这个结论之先，须得从论题的别一方面看看。

物质的“动”形成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可是“动”是什么？“动”就是显著的矛盾。如果有人问你，在某一定空间，某一定时间内，有无“动”的物件？那么你以极真实的诚意，将不能按照伊伯尔凡格原则答复他，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按照公式“是——是与否——否”答复他。“动”的物体存在于某一定空间，而同时又不存在于这个空间。对于这个，除了公式“是——否与否——是”之外，别无方法可以判断。这一点就是赞助“矛盾逻辑”的一个无矛盾的证据。谁不愿意顺承这个逻辑，谁就该当同老热隆（Zénon）一块儿，声言，“动”不过是感觉的欺骗。

我们间所有不否认“动”的人：推理的“根本律”既然与物象的根本实质冲突，我们将何所适从呢？不是应该谨慎一点，来对付这个问题吗？

归结起来，似乎我们突然处在歧路之口：或者承受形式逻辑的根本律而否认“动”；或者反之，承受“动”而否认这个律。处在这个歧路之口，以最少限量，也不是一件乐意的事。试看解决这个歧路究竟是不可能的么？

物质的“动”为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动”即是矛盾。关于这个，应该用辩证法去判断，即应该用伯因斯坦先生所叫做“是——否与否——是”公式去判断。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上面所说的，是关于一切现象的这个基础，我们是站在“矛盾逻辑”范围内的。但是“动”的物质因子，互相结合，形成人们所知道的总体——物。这些总体各以凝结程度，为相互间区别的标准，它们存在的时期长短不一，过后它们就变成他种总体而消灭了：物质的“动”永久是一个，物质本质是不灭的。不过在永“动”的结果中，一定的和暂时的物质总体发生了以后及其未消灭以前，解决它的存在问题，必须抱着肯定的态度。因此，如果有人告诉我们金星，并问我们，这个行星是否实有，那我们不迟疑地即答复他：是。如果有人问我们：魔使是实有吗？那我们也可坚决地答复他：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说，当涉及单独物体时节，我们就可以应用上述伊伯尔凡格原则来判断，推理的“根本律”到此也能通行。在这个领域中，伯因斯坦先生的得意公式“是——是与否——否”也就唯我独尊了。

究竟在这里，这个贵重公式的权力，并非无限的。

固然对于已经发生出来的物体的存在问题，应该明确地答复；但是如果物体还在发生中，那有时就不能毅然决然地答复出来。一个人失落半头头发了，我们可以说，他有大部分秃头；但如果请你确定，几时这个人的头发完全失落，成了一个十全秃子，那就不容易了。

对于每个确定的，关于以某一定特性附属于某一定物体的问题，应该答复是或否，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当物体发生了变化了，它已经消失某一定特性，或正在获得某一定特性的时节，我们将如何答复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大家都知道须得有个确定的答复，可是这里要有个确定的答复，除非是靠公式“是——否与否——是”，若是按照伊伯尔凡格介绍的公式“是或否”来答复这个问题，不免徒劳而无功。

自然可以说，特性的消失，还未曾停止了物体存在，而特性的获得却已使物体存在，因此虽然所讨论的物体处在变化状态中，还可以按照公式“是或否”得一个确定的答复，这个也是不对的。青年人腮下生出细须来了，自然他算有了胡子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权利叫这种细须为胡子。腮下的细须虽然将变成胡子，但它并不是胡子。

要变成质量，其变化须得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谁忘记了这个，谁就失却了确定判断物体特性的可能。

古代伊非斯（Fphese）一位思想家说：“一切流动，一切变化。”我们所谓物体，这个总体处在迟速不等的经常变化状态中。在某一定总体仍是这个总体而不变的界限内，我们须得按照公式“是——是与否——否”去判断。但如果这个总体变了，不存在了，我们就该应用矛盾逻辑。我们不怕引起伯因斯坦派的先生们和其他形而上学的同道者对于我们的不满意，我们须得说：“是与否，存在与不存在。”

既然“静”是“动”的特殊状态，同样靠用形式逻辑原理（适合于思想的“根本律”）的推理，也是辩证法推理的特殊情况。

有人谈起柏拉图一个弟子克拉底（Cratyle），说他不同意于希拉克里特的话：“我们不能二番跳下同一条河里”。克拉底以为，不但是二番，而且一次也不可能：当我们跳下时节，河已改换了，变成另一条河了。在这种判断中，实际物象的元素已成渐变元素。这是辩证法的误用，而非真能应用辩证法。黑格尔觉得：“否定的第一个否定即是乌有。”

我们的批评家中，那些还没与哲学著作绝缘的，往往喜欢攻击特连德连堡（Trendelenburg），似乎他是攻击那些有利于辩证法的所有结论的为首者。这班先生们显然错读了——即许他们读过——特连德连堡的著作了。他们忘记了底下一点——即许他们知道这一点，但这是没有的事。特连德连堡承认，我们不能应用矛盾律于“动”，只能应用在“动”所创造的物体。这是对的。可是“动”不仅创造了物体，而且时刻改变物体。唯其如此，所以“动”的逻辑（“矛盾逻辑”）永不会失却它对于“动”所创造物体的权利。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当适用形式逻辑的“根本律”之时，应记得，这个律只在一定界限内有意义，只在于不妨害我们适用辩证法的限度内有意义。

这个就可以知道，纵然特连德连堡自身没有从他上述的——科学的认识论上极重要的——原理中，做出必然的逻辑的结论，而这个意义，在事实上已为他所承认。

这里，我们连带再说，特连德连堡在其《逻辑研究》里有许多很广义的注解，不是反对我们而为赞助我们的。这个似乎奇怪，然而解释这个却很简单，特连德连堡乃专门攻击唯心的辩证法的，即此很简单事实已够说明。举一个例，他看见辩证法承认纯粹思想的自“动”，而纯粹思想同时又是物象的自生，就以为这是辩证法的缺点。固然，这是很大的错误。然而谁不知道，这个缺点纯为唯心的辩证法的特质？谁不知道，马克思要把辩证法置在“足上”时候，即开始改正它从其老的唯心基础上，得来的这个根本错误？再举一个例，特连德连堡说：在事实上，黑格尔的“动”是逻辑的根本，而建筑这个逻辑似乎无需要任何假设。这也是对的。但这也是有利于唯物的辩证法的证据。再举饶有趣味的第三个例。照特连德连堡的话，大家以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实际似乎只是应用的逻辑，其实不然，黑格儿的逻辑绝对不是纯粹思想的产儿，它只是预先从自然而创造出来的抽象。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差不多一切都从经验得来，但如果经验讨回去了它所借给辩证法的，那么辩证法只好背着叫化袋出走了。这是对的不错的！然而黑格尔弟子中，那些起来反对先生的唯心论，而自投于唯物论壁垒的，也是这个样说法。

我们还可以再举出许多同类的例〈子〉，不过这样将使我离开我的本题了。我只要贡献于我们的批评家们几句话：

在特连德连堡与我们斗争中，攻击他是可以的，但最好是绝对不要攻击他。

再进一层。我说过，“动”是行为上的矛盾，因此形式逻辑的“根本律”不适用于“动”。为免除误会起见，我们须得再解释一下。当我们解决关于“动”由一种形式变成他种形式——例如机械之“动”化热的问题之时，我们也须得运用伊伯尔凡格原则。这个“动”的形式或是热，或是机械的“动”，或是其他的“动”。

这是很明白的。果真如此，那么形式逻辑的“根本律”，在一定限度内，也可应用于“动”。从此，再可推出，辩证法并不打消了形式逻辑，它不过废除了形而上学给形式逻辑的那些有绝对意义的律。

读者如果很注意读了上头所说的，他将不难知道，那时行的观念，以为辩证法与唯物论不能相容，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在我们的辩证法的基础上乃是自然的唯物的理解。它结合于这个理解。假如唯物论合该推翻了，它亦将随之而崩坏。反之，没有辩证法，就不能完成，甚言之，就不能成立唯物的认识论。

在黑格尔，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混成一气；在我们，辩证法则建筑在自然研究之上。

在黑格尔，活动主体——这里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是绝对观念；在我们，绝对观念不过是“动”的抽象化，物质的所有总体与状态，都从“动”中出来。

在黑格尔，推理，因为在观念中矛盾之发现与解决，而后运动向前。照着我们的

——唯物主义者的——理论看来，观念中的矛盾，以思想的言辞翻译出来，仅是在现象中的矛盾之表示，因为有其共同根本的矛盾本性之故，换言之即有“动”之故。

在黑格尔，事物的过程，被规定于观念的过程。在我们，观念的过程则用事物的过程来说明；思想的过程则用生活的过程来说明。

唯物论把辩证法置于“足上”，同时除去黑格尔所尽上的神秘之幕，而又阐露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说：“在其神秘形式中，辩证法成了德国式的时髦，因为它似乎拥护现存的事物秩序。在其合理的形式中，辩证法受了资产阶级及其理论上指导者所憎恶。因为它在资产阶级存在的肯定理解中，即含有资产阶级的否定理解及其必然崩坏的理解；因为它仔细考察在“动”的过程中，每个形成的形式，都经过过渡的转变，因此它恰好带了批评的和革命的本性。”

唯物的辩证法，受了充满了反动精神的资产阶级所憎恶，这是不足为奇的事。然而有时它也被那班真实同情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们所鄙弃了，这就很可笑了很可悲了。这犹如希尔鸠儿天柱故事（Les colonnes d'Her Cule）之不近人情。

我们的注意力，现在要用在这一方面来了。我们老早知道，伊伯尔凡格要求按照逻辑推理的人们，对于以某一定特性附属于某一定物体的确定问题，给他个确定的答复，是很有理由的，我们而且知道，他的理由到何限度为止。但是，请假设我们所欲解决的，并非简单的物体，而为复杂的，包有直接矛盾现象的，集合矛盾特性的物体。伊伯尔凡格的要求，能适合于这个物体的判断吗？

不！伊伯尔凡格自身——与特连德连堡同为坚决地攻击黑格尔派的辩证法的一人——即觉得，在这里须得按照其他原则来判断，即按照矛盾的结合原则来判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考究的现象，大多数属于这一类的物体：直接矛盾现象包含在最单纯的细胞中，在最不发达的社会生活中。所以辩证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里头，必须占得一个重要位置。这个方法一经采用到上述二科学中来，伟大的成就就为众目所共睹的了。

读者愿意知道，辩证法在生物学中，占何位置吗？

请回忆从前，变形说出现时节，关于物种是什么的辩论。

达尔文与其同道者以为动物或植物中，同一类的各种不同物种，是从同一原始形式分别蜕化而来的。再进一层，由进化说言之，同一族的各种不同物类，也发生于一个共通形式。同样也得说，一切族类都起于一源。照达尔文反对派的相反观点而言，植物与动物中一切种类，相互间是全无关系的，从共同形式，只能发生那隶属于同一种的个体。李纳（Linne'）对于物种的观念已经是这样了，他说：“现存的物种数目即

等于上帝原始创造出来的物种数目。”这个纯粹的形而上学观点，因为形而上学观察事物及其概念，是“个别的，固定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一个一个地过去的，一个一个地互无关系的。”（昂格思的话）辩证法的观点则不然，即仍以昂格思的话来说辩证法观察事物及其概念，是“在它们的互相关联中，在它们的结合中，在它们的运动中，在它们的发生与消灭中”。这种观点从达尔文起就应用到生物学中来了，而且将长远应用在这个科学里头，科学的长足进步，未曾于变形说有何种修正。

要知道辩证法在社会科学中，有何重大意义，只须记起社会主义怎么从乌托邦的变为科学的就够了。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站在人性的抽象观点上，以公式“是——是与否——否”来判断社会现象。私有财产适合于人性或不适合于人性，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制度适合或不适合于人性之类。既然人性是假定不变的了，于是社会主义者有权利可以等待，在许多社会组织的可能制度内，必将有一个，比较其余的，更能适合于所谓人性。从此就有一种倾向，向往这个最良的最能适合人性的制度。每个学派的创始者，以为他向往这个制度了！

每个学派的创始者提出各自的乌托邦。马克思把辩证法应用到社会主义上来，即以此，把社会主义造成科学，同时就给乌托邦主义一个致命伤。马克思已不求援于人性了。他并不管这种社会制度适合于人性与否。在《哲学的贫困》中，我们已可看见底下几句鲜明而且有意义的话，责备蒲鲁东：“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部历史，只是人性的经常的变化。”

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说，人在环境内生活，改变了环境，即以此改变了自己的本性。这个就是辩证法的观点，它放射簇新的光明，在社会生活问题中，即举私有财产问题作例。乌托邦主义者有许多著作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中间互相辩论，或者和经济学家辩论，都是问：私有财产应该存在吗？换一句话说，就是私有财产适合于人性吗？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则站在具体的根据内。

照他的学说，私有财产的形式及财产关系俱被规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某一社会关系的形式与生产力发展之一个阶级相符合。绝对解决不能有的，因为一切流动，一切变化，“聪明变为驽稚，幸福化成痛苦。”

黑格尔说：“矛盾乃向前进步”。科学替他这个辩证法观点，于阶级斗争当中，寻找一个明显的肯定出来；忘记了阶级斗争，就不能够明了那分成阶级的社会里，社会的与精神的生活之发展。

可是为什么“矛盾逻辑”——我们知道它是，“动”的永久过程在人类精神中之表示——又叫做辩证法？为不推论太广起见，我介绍非塞儿（Ficher）几句话：

人的生活可以同辩论一事比较。随着年龄与生活的经验，我们对于人与事的观点，亦逐渐改变。譬如几个聚谈的人，在含蓄着充实而丰富的观念的谈话中，他们的见解时刻地变更。经验就立于我们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的这个不自觉和必然的变更之中。所以黑格尔拿认识的发展过程与哲学谈话的过程相比较，即称这个过程为辩证法或辩证的运动，是很恰当的。这个术语已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诸人在其每个重要的和异样的思想中使用过了。可是无论在谁的学说中辩证法从未有像在黑格尔学说中得到这样一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

阿多那斯基 著 石夫节 译

一

思想是由生存的条件决定。这就是说，在介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中，实在的实际是一件东西，而这些关系（即实际）的意识又是一件东西。这个意识不是先天的，它是由真实的、社会的构造和人们一切生存条件决定的。此后人只在研究事实之社会的关系，勿以这些关系与人有这些关系的观念、与人们表现这些观念的形式相混。

这地方应该是两层不同的事实，已经一步一步的在历史上为我们证明了。我们常在历史中看见已成熟的社会关系，人们还没有一点意识。人们不能详细地尽了解他们所做的。社会的关系往往总是先成熟而后才成为意识的。

到了一八八〇年，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是一个确乎无疑的事实了，但人还发表很多小册子，证明俄国有一个资本主义是错误。到了一八九〇年，平民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还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资本主义在俄国么？

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发展的最后一段了（帝国主义）。数年间，民族互相残杀。人已处在一个进退维谷之中，除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实行社会的全部的改造，绝没有别的出路，但还有很多人相信资本主义会恢复。

工业的资本主义已存在有一百五十年了，与许多经济学家还不能领会它的本质和它的法则。意识受生存条件决定，但人可看见有时承认这个决定非常迟缓。

这个原理的结论是：有可视为根本的重要的地方，不是思想，是生存的条件。所以我们应该拿极大的注意力接触物质的关系——实在的实际，不让意象学迷惑了我们的观察力。像这样除开一切抽象作用，观察实际，是很不容易的。在俄国革命之初，很少人懂得于今已成的工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都还难说凡是我们同志都懂得取得政权的时期到了。同样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Brest-Litovoky 议和的必要，也不发觉于我们全体政治家。但在这些机遇中，列宁都看到了。

在别人，难以看到实际，甚至于看不见，都由于种种意象学的影响。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第一个规律就是毫不要以流行在社会关系上的观念与这些关系的实际相混；就是看社会的实际是怎样就是怎样。

二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第二个规律，需要在实际的全部中研究实际，除开一切抽象作用、一切意象学，举凡所有都应该取来注意，取来作完全的精密研究。人要切记着，实际是构成一个统一的全体，他的部分是一个牵连着不可分离的。人的资材在时间和空间中都有限制，实际自不能完全适合地反映到他的意识中，往往总是那一方面显现过甚，别一方面还留在荫隐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我们的思想笼罩复杂矛盾的实际在他的全部中。虽然这不是完全的可能，但我们应该要向这里努力。

在政治上，这个规律要我们不仅注意到一国的情形，应注意到各国的情形。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全国中和全世界的大势中观察阶级斗争的发展和事变。

三

辩证法的方法又叫我们要全在运动中研究。研究事变的发生、发展、消灭。决不要忘记这个运动，应知道除开表面的现象，没有什么是不动的，没有什么固定的。应用心追随现象的转变，即由这一程次到那一程次的经过。应追究反面势力的争斗，并记着，冲突决不是出轨的，冲突正是实际的本身。这些观念是在马克思和昂格斯著作的基础上。凡觉悟的无产者都应该透彻的。

在现在历史和政治中，主要的冲突就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冲突。时刻记着这个冲突，研究它的发展以它作我们政治的基础，并为建立具体的工作，注意到时时变迁的情境——马克思主义方法所需要的就是如此，列宁在这地方从未失败过。他亦绝不忘记：由阶级对抗所发生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实际的精确的研究之唯一的解决，就是由无产阶级推翻有产阶级和从有产阶级的社会上巩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个重大的工作，只能以长期阶级斗争的代价来成就。

当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开始时，帝国主义的坚强稳固仿佛是无量度的，列宁发出这样的标语：帝国主义的战争变为内乱。这个大胆的革命的肯定，足使那班向来亲近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轻视他、讥笑他。事变已处处将列宁的诊断证实了。

在革命当中，列宁对着现今社会根本的冲突绝不会失了见地。紧跟着事变之循环转移，他指出及时的工作——事变，工作也变——对着一个不可侵犯的目的走：无产阶级的胜利。

当一九一七年，他在苏维埃当中主持议和时；当同年七月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即刻暴动和取得政权时；当一九一八年，他指出方法供给无产阶级的面包时；当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冬季，他宣告要组织一个三百万人的军队时——这些都是机遇，举凡这个连贯的工作，都是由阶级斗争的科学的研究得来。

四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许理论与实事分离。我们不应只在认识环绕我们的环境，我们应改变环境。我们不应只观察争斗、思索争斗，我们应加入争斗，从争斗里吸取教训。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只描写种种不同的世界，殊不知只在要改换它。”没有实行，即没有真实的认识，而且认识是必须于行动的，否则它即是无用的东西。

列宁是绝未放松革命的辩证法的，他会以工人阶级战士的行动联合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的精密的研究，这地方也是马克思的大才能之一。

人能从他自己废除空想主义、唯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之最后的遗迹，只有直接参加无产阶级的组织的行动，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附托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

五

最后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就是没有抽象的真实，凡真实都是具体的。这个规律是自前几个来的，特别的是第三个。因为若真实是在运动，即没有永不变的真实。

在列宁生平，发现很多这个规律的应用，例如政治的标语，应该与情形转移，若是不可变的，他立刻即失了提醒和训练群众意识的作用，成为一些欺骗和暧昧的方法。智慧的也成了无意义的；好的也成了坏的。

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我们用最大的客观性和最可能的精确，注视表现于每个历史时期上的阶级势力的关系。我们波尔失维克党人，按照我们政治的科学的基础，时时在这里面努力，马克思和昂格斯常说：“我们的方略不是一个经典，是计划行动的一个总和。”马克思和昂格斯时常研究公式和背诵公式——这些公式在最好的机遇中可指出大概的工作；但这工作又应该在每个历史的时代中随经济和政治的状况改变的。马克思主义者追随着生活和明确的事实，而不抓着昨天的理论——所有理论至多不过指出复杂生活的大概。

生产方法之历史的观察

周佛海

这一篇是译于罕德曼底《社会主义经济学》(H. M. Hyndman: The Economies of socialism)之第一章《生产方法》(Methods of production)。

一、绪论——共产制度的再来。

多谢从来的著作，现在已没有人说我们现在富的生产方法，乃是自古代共产制破坏，私有财产制发生以来，一定不变的继续起来的了。但是我还记忆着，有些时候，就是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还说我们现在的生产方法——以利润和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方法——是经过数千年直行起下来的，并且溯及希腊、罗马、卡尔舍、埃及的历史，想证明就是在这些古代诸国之间，也通行过像二十世纪初叶英国所行的那样的形式及思想。这种错误的研究，现在完全绝灭了，实在可喜。经济学的历史派(Historical school)已完全扫尽旧派的经验说(Empirical teaching)，所以现在已没有主张下述的一真理的必要。所谓这个真理，就是说社会的经济状态，生了很大的变化，致我们不能以一生产时代(Period of production)的思想和表现，而适用于别生产时代。

但是像“历史同样的演一个事实”，“以前有过的事，以后也要有的。”“共产制是和人性相反的”，“设若没有利益，就会没有人工作”，这样极无知识的文句还在流行的时候，我们还有更精密的研究的必要。

要精通过去的社会制度，并理解其产业的和社会的诸关系，实在是绝大困难的事。就是要理解现在还存在于我们眼前的社会发达的诸阶段，还是极困难的事，设若要深入远古时代完全不同的人种的的心理而想象之，那么，要理解它，确有两重困难。幸而古代社会的和产业的形态，许多现在还残留于我们的周围——虽然就大概说，他们的高级发达已消失了。就广义说，我们实在能够从澳洲的原人、南非的蛮族、巴塔果里亚(Patagonia)的土人、和印度的山人，以至于欧美资本家的文明的最高发达，而追溯地球上人类产业的和社会的历史。这一些社会的形态，我们现在可以查踏(?)，

并且专门研究他们的人，已把他们描写出来了。所以设若你们要多少知道过去的人类及其生活方式，你们可于这些未开化的民族的种种社会生活之中，窥知其大概。

人类的社会，在它的最初时代，乃是共产制度的一事，现在已成为普通的知识。关于人类上古史的多少有名的著作家，就这一点，都是一致的。像 John Ru-bbork, Tylor, Herbert spencer, Lewis morgan, Von maurer, Bachofen 等及其余学者，对于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乃是粗率的共产制一事，都没有一点疑义。现在正是我们在私有财产制之下，经过了数阶段的发达之后，将要回到本来的出发点，而使差不多无限高级的共产制出现的大转换期，所以这个古代的共产制，对于我们是特别有兴趣的。

设若注意看自然界的发展，我们就会要发现同样的法则，明明白白地支配一切有机界和无机界的发展。我们举谷穗来做个例看：先有我们播的种子，这个种子在地中分化发芽，于是再成为穗。然而这个穗，比原来的种子，是更为高级的表现。

就是在天体界，我们也看得见这个法则的运行，就是从星云生星体，星体再返于原形而生种种的星群（银河）。在有机界和动物生活之中，我们也看见同样的过程。这些例证，就是表示同一法则，贯通一切的自然界。

所以这个法则，也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达，决不是无稽的臆说。设若是这样，那么，人类社会的最后发达，就形体说，比较很像原来的出发点，而不十分像别的任何中间阶段。就是：人类在其初代的历史，作成了以小生产机关为基础的狭隘的血族共产制，现在因为广大的知识和密接的交通的结果，获得了支配自然界的大势力，正在向着更为高级的世界的共产制进行了。

我们现在明明白白既不是在资本家的生产时代的初期，又不是在其中期。表示环的将终的一切兆候，都已表现于眼前。如果这样，那么，初期的共产制分化为私有财产制的长过程，将要终局，最终的高级共产制再结成的时期将要到了。那些想区分进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的人，或说进化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乃是误解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全学派所共通的社会学说的人。革命的意义，不过只是表示社会进化达到某一点，内外两面的完全变形，已不能免掉的一事实。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能于时机未熟之前，而起这种革命的。不过人们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并为其一部的社会的发达，可以去无意识的行动而为意识的行动，所以能够由此把革命从暴力的引向和平的。大凡成功的革命，无论它的手段方法如何，都不过是对于已在旧社会的胎内发达，而大部分被看过或轻视的形式，而给以合法的表现或承认罢了。这个状态，就和卵中的鸡，发育而孵化的一样，最后，还多少是要用些强力的。马克思说得好：“强力乃是进步的产婆，使旧社会所孕的新社会产生。”然而从别方面说，强力又是反动的堕胎者，尽力把在旧社会胎内的新社会绞杀。无论从哪方面说，强力

只不过是这个免不掉的生长之中的一细事。这个生长没有人能够急速地促进，又没有人能够十分阻止。

二、太古的共产制

设若私有财产制，是经济上和社会上支配的要素的数十世纪长时代，终究达到了终期，那么，我就再说一句，上古的共产制，在我们实在有特殊的兴味。但是这不是因为我们要回转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状态，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子孙，一定要像那个时代的男女，乃是因为我们将要接近的新社会的形态，不像立于私有财产之上的任何社会的状态，根本的实质上，是比较像古代的社会。人类当做游牧人，或蒙昧人，或印度山中的村落民，或比较进步的野蛮人，而生活于共产制之下的年月，一定比生活于一切形态的私有财产制之下的年月要长得多。所以地球上人类的历史，主要是共产制的历史。据莫尔干（Morgan）的推算，若假定人类至今的生命为十万年，其中之九万五千年乃是共产制的时代。又人类在这个共产社会之下，从最下级的野蛮状态，进到文明时代的门口。在这个社会状态之下，生产财富的机关的所有权，是归一氏或一族，富的分配，乃是应着团体内各员的必要而行的。

虽然这个社会单位，在当初也和其余同样的社会单位相斗争，但是在这个小团体的内部，是常保着完全的调和的。团结的纽，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方，乃是血缘。

成为近世美术和工艺的基础的一切大发明，都是先已在共产制之下使用了的。那些主张在社会主义之下，发明会要消灭，或进步会要终止的人，乃是完全不知道或完全看过人类初期的历史的人。设若人类应用自然力，以利益自己的一切发明之中，有特别可称卓越的巧妙的，那么，车轮弓矢，就应占第一位。而这些都是是在共产制之下发明的。船、帆、舵、桨、模板、火、织物、土木的建筑和装饰，谷类的栽培，动物的饲养，金属的熔铸，都是这样。近世产业的大组织，也是建筑于我们的远古的祖宗，为我们所筑的基础之上的。设若没有这些原始的共产人民的事业，设若当时有天才的人，不努力为这些发明和发现，现在的我们，恐怕还是裸体而居，以鱼肉我们自己人类，为食物的大部分罢。

人类生产力——无论是农业的或制造业的——发达，一定是由于长时间的事情的连结，设若就是缺其一部分，进步改良，到底就会不可能。芋、薯的栽培，人工草类的养成，耕地的交代（？），家畜饲养的进步，食肉和运搬兽的改善，肥料的使用，鱼类之保存为干物和干物——这一切发明，决不是由于一二人之力，一定要归诸数千万人的共同视察和着实勤勉的。不过运气好的人，得了最后的一点成功，致得受发明的荣誉。再就分业说：无论它是用来利用特殊地方的地味和气候的便宜，或用来省略工

场及制造所的劳力，这种对于征服自然和增加生产最有效力的一机械——分业，乃是人类社会的长久，一般，并不绝的进步的结果，决不是由于一人或数人的天才的力的。

船舶和航海的事，也是一样。谁也不知道罗盘最初是哪个发明的，小舟最初是哪个用木造成的。精密地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而在看不见陆地的海上，而定船的位置，以使能为长途的航海的一种力；用帆而增加船的速力，并在蒸汽这种独立的动力未发明以前，还能很轻减运送费的造船术的进步，都是许多小进步的功绩，这些小进步集合起来，而贡献于人类全体的大运动。

工业上的大发明，无论是简单，或复杂，也是一样。无论是兽毛，或麻，或丝，或棉，或苧麻，最初把它们拿来供人类之用的发明者，谁也不知道。确确实实，它们的发明者，乃是无数的。然而这些无数发明者的名字，都已在过去长日月之间消灭了。即就机械看，也是一样：从车轮、吸水筒、模板这样单纯的东西起，到印刷、蒸汽、电气、制造机械的大机械止，一个机械，都一定有负于别机械的地方的。这些被忘却的发明者，都永久生存在他们所成的事业的效益和他们所成的进步之中的。

我们现在或者也把神秘的或尊贵的人名和我们特别记忆着的进步相结合。然而真正的劳作者，真正的发现者即使有其人——一点也不知道，一地方、一时代的美丽而有益的发明，有时只能应用于很后的时代或很远的地方。总而言之：人生乃是一个时代连接着一个时代的。

平易的劳动，不过是遗传下的熟练。大发明，大发现，要由几万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目的。所以那些以个人为一切的论者，或主张某种人物或阶级，因为他们自己所成的功劳，有向别人取报酬的权利的论者，只不过表示他们不知道人类进步的全体和社会发达的全部，有不可分性罢了。

那么，人类的基础的诸发明，为近世资本家产业的全组织的基础的诸发明，都是在共产制之下成就的。这个原始共产制的各种形式，现在还能够研究。例如澳洲原人的共产制，这些原人，虽没有一定住处，过着极不安、极粗野的生活，然而还有着Foomerang这样可惊的武器，并有着由我们看来，很为奇妙，而对于他们的生活，极有效力一种社会制度。这些共产制，据我们所知道的，对于自然界的知识和征服，乃是最低度，所以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是最低度。然而他们的生活，绝不是不幸，住在他们之间的白人，证明他们也有生活的享乐。

美洲印度人、南非诸蛮族、纽锡兰的土人等，表示怎样伟壮的人类的标本，是在粗野的共产制之下发达的。

又如新墨西哥和亚里卓拿（Arizona）的村落印度人，不像伊洛可（Iroquois）、亚巴（Apaches）、秀克斯（Sioux）等剽悍蛮族一样，乃是极和平的人民，在他们共产村

的墙垣内，过着安乐幸福的生活。他们的生产力，和我们的比较起来，是很微弱的，然而他们还是很巧妙地耕作他们的原野，大概还有共同游步地及花园，食物煮熟之后分配于一村，并且贮藏玉蜀黍以备凶年。他们的生产力虽微弱，然而因为共产村落的经营，致足以生产衣食等生活必需品，使他们得过相当安乐的生活。

至于印度的半共产村落，该国的历史家都确认旧时的诸制度，都是保存着，村人既不受上面的压迫，也不受外面的侵略，而过着单纯幸福的生活。这个地方，富的生产力也是极微弱的，然而该村人的单纯生活状态，比欧洲都市住民的大部分，要好得多。他们不受资本的干涉，而执行必要的事务。重利放债者，古时也并不是没有，然而在欧洲资本主义，还没有给予他们以压迫人民的合法机关之前，他们在这些村落，是没有什么威势的。

在波里勒西亚（Polynesia）地方，三四十年以前，共产制还没有受欧洲的影响，照旧行着。（纽锡兰则更在几十年前，还是这样。）我们有实在证据，证明这个地方，不但没有资本，并且没有交换的观念，更没有利润的观念，然而还作了相当的大事业。菲崎（Fiji）岛民叫做 Ndrua 的两只大船，若从用来建造它的器具来考察，实在人类精巧的可惊的产物，不亚于别的大汽船。这个船并没有用一钉，船体只是用椰子的纤维缚着的。然而板和板，还是紧密地结合着，全体绝不浸水。甲板是用燧石的斧，精巧地削的，就是欧洲的木匠，也不能加刨。这个船于两艘中间，跨载一屋，大约可以载两百人，风顺时可以走八海里。造这样的船，熟练的工人等，恐怕要费两年以上的时间。在他们从事造这个船的时期内，他们的衣食，是由别个熟练的农业者和裁缝供给的，渔业者也同样供给他们以鱼龟。这个船做成时，则属于一族的所有。

他们排水工事和大屋的建筑，也是非常精巧的，没有一些人丰足，一些人过劳，一些人缺食的事的。在这个社会状态之下，因为富的生产力过大，少数人懒惰而肥胖、多数人失业而饥饿的事，是不可能的。设若一个人因饥荒而挨饿，别的一切人就都挨饿，一族中的分业，是很亲睦的、适宜的、处置的。食料大概都是贮在仓中，以备饥荒，或者禁止斩伐有果物的森林。就这一点，他们是表示很大的先见。没有理由信他们富的生产法，全无进步。他们的生产机关虽然很微弱，然而他们很能管理，不为这些所压服。

但是在这个共产制度之下，我们可以看得见交换的萌芽。例如某民族的酋长。赠物给别民族的酋长，又如在古代的纽锡兰，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而行的个人的让与。又如波里勒西亚地方，“乞讨”（Beg）已成为私有财产的物品。我们可以说这里已开始向着私有财产发达的倾向了。但是这一方向的变化，据我们能够判断的，乃是极迟缓的。为个人而行的生产，在自然的发达上，虽然是避不掉的，然而当时社会，似乎

努力想长久的维持共产制。武器、皮衣、装饰品和铺席等个人的财产，并不是惹起阶级的经济的优越的，所以也不是破坏共产制的。

三、奴隶制的出现

然而奴隶制，无论是什么形式的，都必然要使共产制终灭的。奴隶制似乎是最古的财产形式之一，最初不是属于一族中的个人，毋宁是属于一族的全体的。又，奴隶制它本身，很似乎是直接从经济上的原因发生的。例如当一强大的种族，获得俘虏的时候，设若这些俘虏从事畜牧或别的劳务，而能生产超过他们生活费以上的物品，那么，与其把他们煮起来吃，或杀起来玩，不如把他们养做奴隶，倒还有利益些。所以奴隶制乃是一明白的社会的进步。在以伪善的方法，把人类当做私有财产的今日的权力阶级看来，把奴隶的身体当做动产的这种奴隶制，虽然似乎是可惊可怕，其实它乃是社会变迁的长连锁中的一必然阶段。奴隶制乃是一切大文明和古代一切所谓的民主政治的经济的基础。然而这一切文明的历史，表示古时氏族制度和共产制度，是怎样难于废灭的。

奴隶制一发生，财富就以很大的速度，集积于个人之手。个人间的交换，遂代团体间的交换而兴。当做个个使用品的私有财产，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一列生产物。

此后一切变迁的秘密，都存在这个地方。生产者一到了不使用自己的生产物，并不和同业享受这些生产物，而把它们拿出去和别种生产物交换，他们就失却了直接支配自己的生产物的权利了。他们已不能决定，并且不能知道，他们生产的命运了。照这样离开他们的生产物，实际反成为榨取、压迫他们的机关了。

为交换而行的货物生产一开始，同时为个人的利得而耕作土地的事也就开始，此后不久，土地的个人私有就接续发生。在土地的个人私有成为正规的以前，似曾行过为个人的利益而耕作共有地，有许多证迹，是这样表示的。又，为交换而行的个人的生产一发达，同时就发现了货币，以为普遍商品而媒介交换。货币于是就成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的新势力，但是当人类发明它的时候，却没有梦想到它以后将有压迫人类的大支配力——不管你人类愿不愿。他们虽然没有十分理会货币的社会意义，然而却立刻由艰苦的经验，觉得它普遍无所不至的威力，全社会不得不拜伏于这个王位之前。在古代文明的中心的各都市，这个金力，为了很残忍暴虐的表现，一点也不顾它所支配的人民的意识和感情。

奴隶制，设若只是奴隶制，倒也不和立在奴隶上面的共产制的（或半共产制的）氏族制度的维持相矛盾。这种社会形态的实例，现在还是找得出的。这个时候，奴隶乃是族、氏或家内的劣等分子，旧血族制和旧共产制，还依然存在。但交换和货币一

开始作用，破坏就马上开始了。私有财产，富的集积，为得大富而行的富的使用——这些都是不可避的进路。接着又发生了各方面的劳动分业，大概农业、工业、商业、造船业之间，都生了严重的职业的阶级。货币和商业，着着实实地冲破古代保守的制度，而为他们自己开了进路。

然而无论何时，他们的前进是比较缓慢的。渐渐代共产制而兴的个人的生产，使用若干奴隶，而为家庭的一部，于数世纪之间，顽强地反抗组织的大规模的奴隶生产，以更为完成的分业和更集积的富，而发挥其大势力。

这个发展的历史，到处都是一样的。例如这里有个数氏族定住的地方，他们集团的中心，决不在地理的关系，更不在土地所有的关系，乃是由血族关系而结合的。这乃是莫尔干寻出的关键，并为我们应用于解决古代的结合。

这个部落，渐渐变成强大，并能对于外部战斗状态，而保持安全的时候，原来的民族编制以外的许多人民，就陆续聚集到这个部落的周围来。同时，共产制就崩坏，私有财产制也就发生。富、交易和商业，就都急速得发达起来。照这样，和原住民没有血族关系的人口一增加，“旧家族”就成贵族而立于高地位，阶级制度，就渐次发生。于是血族关系和财产关系之间，就不绝地冲突，而以财产和地方为基础的革命思想，就必然的要占胜利。

就是财产权和住居权，早晚要得着比以前血族关系要优胜的势力。所以共有地上的个人劳动，劳动生产物的个人所有，以及土地它本身的私有，就成为生产上的主要形式。奴隶制，又因为和近邻诸氏族的争斗而扩大。胜利一扩张，或联盟一构成，奴隶制就成为更有力的生产要素。战胜若越多，奴隶制就越进步，交换和货币，也有起(?)最大势力，阶级的分离，也固定而为一般所承认。不过奴隶生产，是和自由劳动相并而进行的。

此后无论何处，都由同一原因，发生比单纯的生产关系更要大的问题，这就是负债者和债主的问题。土地财产的私有者，一时为些必要所迫而借贷货币，就马上要为债主的权力所左右。这个债主，就是近世富豪资本家的直接先祖。他们大部分都是商人和中间人，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剥食他们，以集积货币。他们因为是新时代的革命分子，所以大抵和旧社会没有直接关系，而对于负债者，穷极残忍。不幸的负债者为苛酷的债主所窘迫的事实，充满古代的历史中。不能偿还债务的人，自己、妻室和儿女，就都受债主的自由处置。对于这个问题，人情是绝不参入的，惨淡的阶级斗争，就永久持续起来。而国家或社会（虽然由我们的见地看来，当时的国家社会，是极混沌的），因为防止最后的大破裂和频繁的革命，又常干涉负债者的方面。

古代的放债业，乃是乘借债者的穷乏而营利的，它的全组织，都是和前时代的血

族制及共产制相反的明白恶行。所以它不独常为当时的道德论者所批难，并为好久以后的初期基督教教会的牧师等所非难。

然而经济的进化的残虐，和自然界的残虐一样可怕。它是一点也不顾人类的感情、欲望和意思的。它完全无视人类的道德和心灵。经济界里面，没有任何宗教——无论是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混入的余地。不是征服人家，就是自己隶属，你们的情绪、你们的精神，都同样的悬于你们的肚腹。后者不得充满，前者就不能作用。只在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的物质的基础十分的确保了的时候，高尚的人类知德的发达，才是可能。所以奴隶制也是人类向上的不得已的一阶段。负债者之屈服于债主，也是前时代的自然结果，并是为次时代所行的预备。

四、奴隶制的发达

当时（以后也是一样）的大多数民众，对于自己周围的事物变迁，全无自觉。交换与货币，以市场为目的的个人生产，和以奢侈为目的的奴隶生产，扫尽一切血族的共产社会的遗物。富的压迫，每有机会，即行增大，以致奴隶耕作，成为优势，奴隶生产，为一般社会所实行，而完全排除自由劳动者，使其不得为一经济的要素。野蛮时代的上期，已发生了农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业；文明时代的初期，更把这个分业固定而推广起来。奴隶依其所有者的富的程度，或成大群，或成小群，而服苦役于田野、都市或矿山。他们又因为一般的社会关系如何，和其直接主人的性情如何，或被虐待，或受优遇。然而无论他们像在希腊一样，比较的优遇，或像在罗马和卡尔舍一样，受着虐待；又无论他们是为凯驼（Cato）所笞打，或为克挪莎士（Crassus）所厚待。就大体说，他们还是财物，和他们周围的牛马无异。

又奴隶之中位置较高的，也不限定必受较好的待遇。

例如“工头”（Villicus）所受的分配分量，比他所监督的其余的奴隶的还要少，其所以如此的理由，是很有趣味的。就是以为监督的工作，比手作的劳动要容易些。

奴隶所产出超过他的生活费的东西，不待说是归主人所有，但是奴隶，又绝不尽是下等无教育的人物。大哲学家柏拿图，起初被卖为奴隶，后来给出巨价，才被释放的。

有名的寓言者伊索，也是奴隶。其余有才能的人，生为奴隶之子，或不得不陷入奴隶的境遇的，也是不少。

这些高等奴隶，构成罗马人的富的重要部分，土地和矿山等物，就其重要度说，还是第二位。作文者、写字者、美术者、装饰者、金银锻冶，以及其余各种熟练工，都被认为比他其余一切财产合起来的，还要有价值。

为这些熟练和不熟练，有教育和无教育的大奴隶军所集积的富，实在是非常之巨大。勒比达士（Lepidns）之所以能维持那样的大军的，乃是奴隶之力；罕里博尔（Hannibal）之所以能在意大利支持其军十七年的，也主要是因为他人在西班牙所有的银矿内的奴隶之力。又，恺撒（Caesar）计划做罗马共和国的首脑时，也有和他约定，至少借给他三百万镑的债主。由此，我们就可见当时富的程度了。然而这些大富的实例，还是从奴隶制还没有完全发达的时代引来的。

这个财物奴隶的生产法，虽然比较封建制或共产制更多有近似今日工银奴隶的生产法的地方，然而实在有和它不同的地方。在财物奴隶制，生产者和其生产物，都是属于主人，两者主人都是可以卖的。奴隶的生产物的多量或大部分，也可以拿去交换而卖得货币，然而希腊、罗马、卡尔舍，或小亚细亚的大地主和奴隶所有者，绝不是我们今日所谓的资本家。他们的富，只用起来奢侈，或用起来增加声名的，他们不以其富，而从事别的生产事业，以得更大的富。所以他们社会关系的全体，和今日的不同：手段和目的，完全不一样。

然而其结果的表面，许多地方是相同的。试从奴隶自己的方面来考察。古代的奴隶，都以他们自己的地位是当然的。这就和今日欧美的工银奴隶，大部分以为自己的经济的从属，是一定不变的一样，乃是自然的，不能免的事，他们没有能想象没有奴隶而存在的社会。当时的大哲学家们，也都是这样想，古代思想史上的最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以为“设无机械之助”，就无法废弃这种根本的制度。他能够想得到机械，就是表示他的才力非凡的证据。然而当时的奴隶，实在是非常之多，其在雅典，自由市民（包括儿女及小孩）有九万，奴隶就有三十五万五千，奴隶巡查就有四万五千。斯巴达等处，大约也是一样，而在罗马，就更甚。所以支配阶级内部，虽然就有纷争，而一念及奴隶将有何举动，即表示一致的态度，这样的事已非一次。奴隶就实际起了暴动，然而因为和时代的经济倾向相反，也没有能成像皮相的观察者所想的那样大乱。小亚细亚、希腊和西班牙诸矿山的奴隶，特别地受虐待，然而叛乱还是很少。即使偶然叛乱，马上即为近世权力阶级还不能及的残忍暴虐所镇压。

然而都市之中，奴隶非常之多，所以后来叛乱之时，设若他们十分团结起来，一举而袭击主人方面，成功的机会，一定要多得多。

由这些事实来考察这个大奴隶时代的全历史，我们就可知道当生产形式变化的机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想来变化阶级关系，是怎样不可能的事。换句话说，就是若非到社会的和经济的形式的历史的发展，指示一个新进路，一般人心不知不觉的向这方面的时候，改革是不可能的。

五、奴隶制的衰灭

奴隶生产一发达，富一增大，当然的劳动，就成为耻辱了。例如罗马的安东里士（Antonines）时代，像新西纳达士（Cincinnatus）这样的大将军，从战场得胜回来，完全不能在故乡过田园生活。设若任何凯旋将军，这样降格从事，就要被一般人嘲笑为愚蠢。当时对于劳动的观念，就和现在伦敦的一样，就是以为劳动不过是把光阴费于苦贱的事上。又，奴隶生产，由竞争而打溃自由民的独立劳动，所以生出了一个像后世美国南部的奴隶制之间的自由白人那样的阶级。一切大都市内，这种人最多（尤以罗马为最），他们侥幸都有政治上的权利，他们为权力者所媚，而受其豢养。然而奴隶生产，没有永久把黑暗面转向社会。这种消耗的耕作法，在比较更早的以前，就实际把意大利的土地灭亡了，罗马现在完全仰其食物供给于外国了。设若从埃及或黑海来的谷船，因天气不顺而缓到的时候，罗马的住民，无论富者或贫者，都是很担心的。

从此以后，罗马拥有其奴隶生产和混乱的人民，而成为纯粹的富和奢侈的世界市场，并成为从地球各方面，由纳贡而吸收富的血潮的大蝙蝠，和现在的伦敦或英国一样。它的帝国、它的文明、它的富、它的荣誉、它的繁昌，都不得不归功于自己只免饥渴，而为别人苦役的生产财富的几代奴隶。比这个还要伟观的事，历史上简直没有。请看从欧洲此端达到彼端，为意大利兵队的自由劳动所筑，现在犹存的大路！请看其整齐完美，决不能逃其判决和报复的行政组织！请看他们领土内，相争的诸帝王，为因争权夺势而互相血战，尚不能破其表面稳静的太平景象！请看他们坚实而壮丽的无数的公设大工业！

就是近代最优秀的专门技师，也不得不赏叹其空前绝后的大技术。又请看他们的军备，就各方面都极完全，战胜认为当然的事体，即使战败，也认为偶然的过失，马上就可以回复的。生于这个大帝国强盛时的罗马市民，见着他的美丽而端正的都市，见着他的道路，见着他的水道，见着他的桥梁，决不至于想象到这个伟观，将有衰灭的一日。

经济的磨臼一样，虽然磨得慢，却磨得很碎。奴隶耕作和奴隶制造，就是在当时最优秀的人物看起来，也似乎是可永久持续的。就是在它将近破灭之前，也似乎是最巩固的。然而因为最初就作用起来的经济的原因，最末还是陷于衰灭。上面，则有古今无数的奢侈和乱行，下面，则有非常悲惨而陷于失望的大贫困。地方由过度的吸收而出血至死，奴隶则由过度的劳动而衰弱至死。以前独立的罗马军团，现在变成了贪婪的佣兵。

宦官宫人，都成为富者所豢养的学者。然而还没有人能先见这个明明白白将近的

大破灭。

全建筑的崩坏，遂从西部欧洲发生了，北方的大蛮族，侵入这个老朽的帝国，发现现在的状态，和数世纪前他们的祖先所见的完全不同。他们的到来，不过是促进这个不能免的崩坏，同时又是供给再建的方法。爱国，在当时多数的市民，已成为忘却了的名词。而在可怜的奴隶，没有什么变化比现在还要坏的。所以结局没有力抵抗继续袭入的波浪，这个大奴隶帝国，就陷于没落了。

接着就是最长的过渡时代和分裂时代。而在这个表面的混沌之中，新组织已发芽生长了。道路荒废了，地方市场必然地代替了罗马市场，地方武力压服了帝国武力。于是封建制度，就渐渐成为西部欧洲的一般的社会组织。

六、封建制度的时代

我们现在达到了因私有财产制度的结果而发生，由劣弱阶级而实行的生产方法的第二种，这就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就许多地方说，比奴隶制度的组织要更为复杂。居住于封建诸侯的领土的人民大群，虽当做贱民或奴隶而生活于其领主的束缚之下，然而没有和奴隶一样，完全地驱尽自由劳动者，并且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实质上 and 以前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不同。农奴是附着于土地的，不能和土地分离而卖却，但是土地若是卖却的时候，一定就要和农奴一起卖却的。农奴的义务，在欧洲各处，实质上是不同的，就许多地方看，他们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庆祝他们比其经济的先辈（奴隶）占着较优胜的地位。

但是农奴虽然当做贱民，任领主自由虐待杀戮，然而他们对于土地，有几分权利，是被承认的。这就是他和奴隶不同的主要点，所以他们一方面为领主耕作、开垦、采掘多少日数，一方面可为自己工作同样多的日数——或比较少些日数。因之当时全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由这种可怜的农奴的苦役而行的。然而当他们受不住恶衣恶食及非常的侮辱，而起来反抗其尊贵武勇的领主时，当时时代精神对待他们的杀戮刑罚，比古罗马的上流思想对待其不幸的奴隶的，还要残忍些。就这一点，基督旧教的神圣至极的武士，和其新教的最初伪善的非国教主义者，都是一样的。就和格斯克林（Guescline）、黑公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残戮法国的加克里乱党（Jacquere），或罗素家（Russels）、舍西尔家（Cecils）、霍华特家（Howards）杀戮英国农民一样，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于农民制的最终时代，惨灭德国的农民叛乱。

这样的杀戮，乃是支配阶级的家常便饭，当时的宗教家和道德家，常常注意的论绝弱者方面有罪。所以在封建制度逞其威力的时期中，欧洲大陆甚至于英国的一切农民叛乱，也和以前的奴隶叛乱一样，除掉一时的，然而正当的复仇的满足之外，完全

归于无效，以表示在社会的发达，向着新阶级经济的成熟之前，人民的反抗运动是不能成功的。

在封建制度全盛的时期中，农奴是构成不熟练劳动的主要部分和熟练劳动的一部分的。他们耕作劳役的方法，虽然不十分完全，而大小领主和其家中武士，以及自由民，大抵还过着裕福的生活。至于其中的富领主，就无论是宗教界或俗界，都是穷极荣华的——虽不及罗马和皮残丁（Byzantine）的贵族。

然而和这个农奴制相并行着，都会和乡村，还有自由劳动者的大团体，他们已不以劳动为贱役。受侵入蛮人的遗传，或为他们所教练，有着自由思想及共产制度，而立在和解放了的奴隶及土著的农奴不同的地位上。这些自由农民和自由工人，对于领主，虽负相当的义务，然而经济上他们已尽量得到了当时所能得的自由。尤以工人等因防备盗贼和武士的强夺，而集于诸侯的城下，求其保护，或者自己筑成都市而武装之。我们若从其都市的窄狭和房屋的高度来看，就可想象当时人口，是怎样稠密的。他们组织民主的同业公会，以严重制限的徒弟制度而行其业务。无论在大陆或英国，他们都是不绝的抵抗其名义上或实际上的封建领主，防止其干涉，而拥护自己的自由，然而在这个关系之下，还没有近世所谓的资本制度。当时银行事业，虽已开始，交换方法，虽已稍取近世的姿势，然而大诸侯和寺院的富，无论怎样巨大，都不是由资本的使用而生，也不是直接行商而得的利益。

罗马大道破坏，一切中央集权弛缓以后，交通渐次困难，欧洲内地个个分立的各州的生产，主要是为生产者及其家族的直接使用而行，以及为纳给封建领主的年贡、救贫税、特许费等而行了。要等到这些要求，得了满足之后，还有剩余的时候，才拿到交换市场来，并且还只限于地方的市场。

至于土地财产的领有，和地位身份的保持，当时有种种的样式，也有基于所有关系的使用制度，也有由于纯粹个人关系的主从制度，也有从政治的关系生出的特权制度。然而总而言之，都是对于其直接长上负纳税的义务，并于平时或战时，负担服务，所以他们的关系，从上面说，就是由王或大侯伯顺次而下；从下面说，就是从农奴或小农渐次而上。他们尽义务的形式，虽然也有是金钱的，然而他们的关系，却都是个人的。欧洲诸地方的这些关系，实在是千差万别，然而其制度的根本，却完全是一样的。他们的根本，就是大田园的教职制（Greatrural hierarchy），只能由增加商工阶级的财富和独立的都市的权力，以及别种僧侣的教职制的势力（即加特力教会的势力）而加以制限的。

这个时代产出的日用品、美术品、奢侈品，就是在许多方面，都是粗野而野蛮的地方，都足以使我们惊叹。

我们只要看看博物馆，读读当时贡献和赠送给领主的贵重品的目录，就可知道美术的发达，决不要资本；只要看看英国残下的很多堂塔庙宇的壮丽遗迹，就可知当时绝不少精通技术的建筑匠、装饰匠和营造匠等名手。

七、自由农民和自由职人

自由耕作者和自由工艺匠，最后，遂克服了农奴的竞争，农奴因为他们的地位，在经济上成为不利益和道德上生出弊害，次第都被解放了。所以在欧洲最进步的国家英吉利，自由民的耕作和工艺，遂代奴隶制而兴，因之十五世纪的英吉利，差不多完全成为自由民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成为以自己所有的生产机关和原料而劳动的自由生产者之国家。设若经济的和社会的意义之个人主义，在历史上能够永久维持，那么，就是这个时代的事。当时没有人不希望这个状态继续的，这个状态的结果，对于一般人都是良好的。就是上流阶级，虽然也是暴威和残虐，然而就某种意思说，还是夸张其劳动国民的富裕和独立的。

人们以个人的资格，无论在以前或以后，都没有遇着这样的幸运。他们所有自己的器具，支配自己的生产物，虽然有时也受人雇佣而卖劳动，然而很少有的事，并且工资也相当得充裕。在村落，他们乃是自己耕作地的主人，并且是共有地的共同使用人；在都市，他们乃是职业组合的一分子，他们的特权受着保护，从徒弟升到职人，是很安全的，绝没有同业的竞争，这样的生活的利益，和由此而生的自由和幸福，实可羡慕。

在当时地方的市场，粗制滥造，是目为犯罪行为，奸商是严厉地受罚的。地方的产物若不足，可以相当的由全国市场或国际市场来补充。这些大市场，多量的供给欧洲各地和东洋的货物，而与地方产物相交换。一地方，一国民之间，个人的创意的精神，到处发扬光大，致使我们现在，非常感叹，当时职人就是美术家，美术家就是职人，所以工作之中，寓有乐趣。个人的生产，个人的所有，个人的交换，都是社会全体的关系。劳动者从最初到最后，都支配自己的生产机关，支配自己的生产物。

所以当时由自己的脑力作出的东西，以自己手腕制成的物件，决不会以生产过剩的商品的形式，转向自己袭击。

无论货物，无论劳动，他们的需要供给，都是严重的调节的。这些制限和规约的目的，大概一定是在确保好商品和高工资。因为各人每日为自己在田园或都市，劳动一日或大半日；因为一年能安然获得虽粗野而善良的食物，和善良的衣服；因为教育较普通所推想的很要进步和普及；又因为被雇佣而做事，并非通例，乃是例外——因为这些事都是劳动阶级生而获得的权利，所以制度的些微变化；他们都是不欢迎的，

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然而这种国民孤立和肠肥肚满的幸福时代，没有能永久继续，英国一孤岛，是不能封锁而离开人类一般的进步运动的。

经济的发展，于是又不顾虑人类眼前的幸福了，人类又于无意识之中，步行如环之历史进化的道程，而完成其内周了。

八、现在的资本制度

自由农民之离开土地，英国最早，现已进行于欧洲全部。封建制度之覆灭，寺领之没收，浪人之严酷的取缔法，禁止劳动阶级团结之法令，民主的职业组合之变为严密的资本家公司——这些以及其余发生于近世资本制度的诸事件，现在没有一一详说的必要。

为自己使用而行的个人生产，渐次变成为利润而行的社会生产，多数自由民，其土地都被夺去，其生产机关都已失掉，只剩得卖力的权利。这就是从十八世纪初叶到十九世纪初叶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一节，古来历史上生产关系的变化，从没有这样着大、这样急激的。这种发达，可分为二时期，第一期，主要是以交换为目的之社会的生产，渐次代以自用为目的之个人生产而兴。和这个变化同时发生的，为下列数事，即纯粹的工资阶级，渐次发生，商业和贸易，渐次扩张，地方市场，归于衰微，最初国家市场代之而兴，接着国际市场随之而起。

第二期，就根本说，乃是机械时代，在这个时代，蒸汽力，进步的机械的和化学的诸设备，支配产业界的全组织。在它的第一段，生产者一生自甘为倚工资而生活的人；在第二段，不但一生自甘为工资生活者，并甘为周围其环境之生产分配一大机械的附属物。在前时代，他虽然是工资生活者，然而使用自己的机械的劳动，还相当是独立的人。但是到了后时代，他遂不得不成为产业的机械组织之单纯的奴隶了。他已经不是自己使用机械，乃是和别人协同而使用别人所设备的机械了。

横呈于这个大变迁的根底之决定的变化是什么呢？

这就是个人的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而生产物的个人的交换和所有，没有变为社会的交换和所有的一事实。

这个似乎是太抽象的叙述，现在稍为说明其意义。

十五世纪的英国劳动者，前面也曾说过，对于他们的器具、原料和出产物，都有完全的支配力。就是农民，也所有自己的土地，吃自己的谷物和果物，并且衣服的大部分，也是自己作的。又，职人都是应着地方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又似乎都各有土地。所以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人。

然而一到了多数劳动者，在一个主人的支配之下，永久为工资而劳动的时候，他们的原料、出产物、劳动场所，都归其主人所有，而其主人之所以生产物品，其目的又不在为自己使用，而在交换而得利润，所以一般产业组织的基础，就明白的变更了。一到了这样，所交换的就不只是剩余品，而是生产物的全部了，个个劳动者，也不是以个人的资格而劳动，乃是当做具有社会的意思（即交换的目的）的社会共同机关之一部而劳动了。生产物的全部，甚至于一部，都已不归劳动者所有，而完全属于雇主。他们只是倚工资而生活，关于货物的生产方法，或处理方法，是没有什么容啄的权利的。他们并不是偶时倚工资而生活，乃是终生倚工资而生活，终生当做工资生活者而苦役罢了。

于是我们就遇着了从以前自由民之个人生产中所发生之现代资本家生产组织的根本大矛盾了。就是和个人的所有及交换相对立之社会的生产，乃是一切矛盾的基础的矛盾。

这一点既经明白，该制度以后的发达，以及其诸阶级的关系，就比较地容易理解了，就是虽然某地方，或某职业之中，例自作农或熟练工匠一类的独立生产者还是残留着，然而大体的趋势，都是倾于同一方向的。其方向如下：

（一）为地方市场而行的生产，变而为为国家市场及世界市场而行的生产；（二）一切中世的束缚，都已扫除干净，就是近世的保护政策，也和中世的保护政策大不同；（三）为利润而行的生产，成为通则，为使用而行的生产，成为例外；（四）劳动者并非偶尔倚工资而生活，乃是终生倚工资而生活；（五）交换和由交换而生的金钱关系，支配全社会；（六）一切昔日的阶级对立，都次第消灭，而生出最后的阶级对立，即工资劳动者和生产分配机关的所有者的对立。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正立于资本家生产的大旋风之中。这个资本制度的发达，其迅速实非以前一切制度的发达而能比拟。资本制度，不过只经过二百年，而现在已明白的到了末日了。什么东西以这样的速力促进人类？什么东西促进进步的速度，超过一切前代制度以上？不待说就是以蒸汽力为基础之大机械产业的发生。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人类为自己的巨大的机械设备所束缚了。

这些大机械之中，有许多虽是以前发明的，而应用起来以适应社会的要求的，实自此始。然而这些大机械，并不是由社会而使用，乃是由有产阶级反抗社会而使用的。

现在是这样，以后暂时之间，也会是这样。经济的进步，至此又表示其残虐。原来大机械产业，本来是使轻（？）灭劳动，废除苦役，以及灭绝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等事能够实现的。孰料它不为人类所支配，反支配人类，压服个性，破坏家庭，发生人

生空前的不安，以无产穷民的大群集而填满都市，同时夺去地方田园的人口，使英国也和以前意大利一样，仰其食料供给于外国。

九、社会改造之意识的进行

以上极简明地考察了生产方法的变迁。我们即据这个简单的陈述，也会痛切地感觉人类并非全然无意识的、无倚靠的，从一阶级向一阶级前进，乃是从一阶级，驱向别一阶级。第一，从共产制度到奴隶制度及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全然是无意识的。对于新形式，或反抗或接受，都是盲目的遂行，并且只能是盲目的遂行。就是当时的最大人物，也不过只应着欲颠覆全社会之切迫的必要，而行一时目前的弥缝策，没有一人知道运行于其周围之事实的真相的。希腊虽然出了许多天才，然而没有一人公式化其社会所受之变化的过程，而组织的研究之。

希腊以后，奴隶制及其作出之生产力，支配文明人之数世纪间，也是同样的状态。罗马产出的大政治家、大法律家和大思想家，只没头于解决太实际的、太眼前的诸问题，而不能认识更大的问题已自然有了开决之道。以后奴隶制废颓，封建制、农奴制发生的时候，也只是同样的盲目的、无意识的、无秩序的人类发达之力在那里活动。就是当时最杰出、最有先见之人，也不能看定自己所行的路，只随波逐流的，究不知将达何岸。以后就是农奴制灭亡，个人的自由达到个人主义最高点的时候，人类也同样的盲目、无意识，宛如群童摸索于暗室之中，从质朴的个人主义流入资本家制度的地狱，而受其不可避的残忍冷酷。经济进步的车轮，也和古时嫉妒的女神勒麦西施（Nemesis）一样，同样地蹂躏最高者和最恶者于车轮之下而前进。

然而现代的人，乃是前代一切教训的继承者。人类久为生产交换的形式所牺牲，已能使古人无意识、无秩序而行动的事，意识的、自觉的进行了。多谢古人的痛苦，我们已能见他们所不能见的事了。

马克思与俄罗斯共产党

梨亚荫诺夫(Riozanov) 著 罗忍 译

当一八七〇年三月，日内瓦（Geneve）一群俄国革命党人要求马克思为他们在第一国际大会做代表时，马克思写信给昂格斯说：“稀奇的事情，让我做起少年俄罗斯的代表来了，人决不知道所有会从生活中来的，并且将使 he 处在何种奇异的地位。”在他以后的一封信中，为着开玩笑，他签字如下：“马克思，俄国部书记。”

实际上确是很难了解这样一个稀奇的事。才从封建奴隶制度脱离出来的俄罗斯在这时纵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一个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痕迹，但这个俄罗斯从此就有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造者，国际工人运动组织者——到第一国际里头做代表，与工人运动已发展的，和已产生过像魏特析（Weitling）和伯伯尔（Bebel）这样人物的德国，有同样的名义了。

官府的俄国之不共戴天的敌人，即在一八四八年就认定欧洲的革命的一个紧迫的工作就是要与欧洲的宪兵国——匈牙利和波兰的压迫者做一死战的人，现在竟在第一国际中做了革命的俄罗斯的代表。

两年后（一八七二年），俄国在一切其他国家之先，就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之译本。十三年后（一八八三年），又在日内瓦，以卜列哈诺夫为领袖的俄国革命党的小团体，展开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又经过二十年，俄国的无产阶级已成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了。他已将夺取政权的问题付讨论了，并且再过十五年，即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很好的时机，夺得统治阶级的地位，建设了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革命运动，自从一八七〇年经马克思代表在第一国际大会之后，逐渐进步，到了现在它以波尔雪维克党为代表，已变成新的“共产国际”中领导的政党，或第三国际的中枢了。老国际的最小的兄弟，已表示得非常之好了，即或有时，在它的革命方针中错了，但是它的那些兄长，没有一个能够像俄国的无产阶级和他的先锋——共产党，这样地应用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的本质。

就是在这里，应该找出俄国工人运动发展这样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来。马克思主

义不似一个“纯粹”的理论，而是理论的活动，社会生活的理解，只是做社会生活的革命的改革的一个方法，并且每一个新经验又变成一个新的源泉，人在这源泉中又去吸取实际的理论的解释。

马克思所关心的并要加以理论的分析的根本问题，就是这些革命活动的实际问题。仅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消灭人掠夺人的制度，但他怎样能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呢？

他怎样可以从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统治之下，将那些还没有抛弃对于私有财产的迷梦的阶级——特别是农民解放出来，并怎样使这些阶级跟在无产阶级得胜车子之后呢？这两个革命战略上根本问题，是第一次由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以前提出的，并且在这个革命经验基础上，又由马克思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这些同样的问题，成为今天我们讨论不休的重要论点。

柯祖基有一点是有理由的。专政这个“字”在马克思开始几部著作中遇不见的，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找不出来。可是我们通常所用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句话的含义，已经在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八年之间，马克思一切著作中找出。共产团（Ligue des communistes）所宣布的目的，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统治。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可以找出那实现并且维持在过渡时期中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建设为止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元素。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高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每个国家的阶级性——包含无产阶级的国家在内——国家是统治阶级机关，无论昨天是有产者，今天是工人，他总是利用他的政治统治来根本改变一切生产条件——所有这些定义，在《共产党宣言》已找得出。

一八四八年革命经验、法国六月革命日的经验、德国十一月革命日的经验，一句话说来，资产阶级与地主的专政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不单在小资产者和农民中间，不但在许多民主派的小政党协作中，找着帮助，就是在各种社会党的理论的精神中也得着帮助——唯其有这些经验，马克思才应用这个新“字”，明白地指出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不妥协性，和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专政来反对有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所有革命的停止，都是表明与有产阶级讲和与协作。因为这个，在《莱茵新闻》中，马克思提出“经常革命”口号来反对所有妥协者，为着保证革命的经常状态，及这种革命改变成为社会革命之故，最革命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必需的。

这个重要的思想是第一次由马克思在许多篇文章中这样说明出来，昂格斯集合这些文章成为一本书，题名为：《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并增加一篇“温和”的序文。

“这个乌托邦，这个教义的社会主义，附属一切历史的运动在片断事实上，以一知半解的学者的观念来代替社会生活（历史创造者）的历程，尤其是在他的幻想中，他用卑陋的诈术和粗鲁的感情，来避开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的表现。”

只须稍修改一下，这点特点就完全适用于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昂格斯接着又说：“无产阶级则相反，他渐渐地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在‘共产主义’周围团结起来，这个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个经常的革命，只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只是为达到消灭所有阶级的区别，消灭由这区别所生出的一切经济关系，消灭适应这些经济关系的一切社会关系，破坏由这些社会关系所产出的所有思想的一个不可免的阶段。”

这是很显著的，马克思的“功绩”，不在发明阶级争斗——他只是把这个阶级争斗并阶级的存在与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条件联合起来——而在说明阶级争斗必须达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只存在于向着阶级的消灭和建设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期中。但是这个公式在一八五二年已成立了，只证明专政这个“字”，在一八四八年以后，才可在马克思笔下找得着。但在“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中，我们应该继续看成不是简单一个“字”，或是一句话，并且还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基础，在他的一八七五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评》中，说得更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过渡时期，在这时期中，发生一个政治过渡时期，其时的国家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同样的见地上，马克思从二月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又来审察维持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当分析已经帮助路易·波拿巴尔特（即拿破仑第三）夺取政权的原因，他特别注意两个因子：第一，拿破仑第三能运用二月革命所未曾损伤的政府的机器，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几次政变（Coup d'état）不但未将这个机器毁坏，并且将它改善；第二，当时农民对于二月革命财政政策，非常之不满意，拿破仑第三得以利用他们的助力。

人能破碎这个政府的机关而不失去由一个集中的机体所供给的利便吗？在一个农业的国家中，如当国的法国，破坏这个政府机器，即破碎中央权力所以能利用农民的散乱达到他自己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目的之一切线索，农民在近代社会中，固成立一个阶级，但他们没有阶级的觉悟，所以不能自己或用自己的名义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说：“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同时就是他们的主人。应该有绝对无上的政府权力为他们，这个权力是保护他们反抗别的阶级，并为他们做倚仗和幸福。”

马克思在那时已经认定严重的集权之必要，所以他确定说：

“破坏政府的机器，对于集权制没有一点危险。现行官僚制，只是下等粗浅的集权，并且还受他的反对者封建主义的束缚。法国农民在拿破仑复古中，已经失意了，他将更失望于他的一块土地。因此建设在农民所备有的土地上的政府的柱梁就会倒，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农民阶级的应声，否则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在农业国家中，

马上就变成诗人的歌曲。”

从这段精美的文字，很显明地知道马克思解决关于政府机关的维持或破坏的重要问题，以及为无产阶级革命保证对于农民的“最高权”的方法问题——这段文字已在《二月十八日》第二版中搜集出来的。在这本书的俄文版子里，普遍有许多段落差不多全带了法国的色彩，并且所有都是太老的，只有当时人，才能了解的。所以，我们所引的一段已将用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来代替了：“政府的集权只能建筑在由反对封建制度争斗所锻炼出来的武力的官僚的组织破产之上。”

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使马克思更向前进一步。使他对于法兰西大革命在政治集权的创造中所操的作用，不得不改变观点。巴黎公社的经验使人联想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以后革命的老公社的经验，以及它的那些支部和支部的委员会，这些很像我们的城市和区的苏维埃。这是要明白的，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巴黎对于俄国全国的专政并不是建筑在沙戈浜（Facobin）的严格政治集中上，而是在许多革命公社的自治上。中央的权力依靠地方的权力，在这样光景之下，将已经被封建制度的承袭所腐败的旧的官僚的机器完全破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的条件。

因为遇了不好的时机，公社与法国其他的地方隔断了，又不能阻止毕士马克与梯尔所组织的封锁。同时外边也没有援助。所以公社光荣的歌调，没有一点回声，竟变成巴黎无产阶级的诗人的歌曲了。

但是没有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也是不会有的。公社的革命经验使革命的理论往前新进一步。

马克思自己也及时从这里抽出一些初步的结论。新的经验又提出新的问题，而生活严重地要求这些问题的解决。

革命共产主义的理论给我们正确的指导线，将马克思所草创的革命战略的基础加以严格的检查，使俄国共产党对于新的困难找着出路。

以革命经验所创造的最革命理论的武器，俄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指挥之下，会克服所有新的困难。旧式的政府机关已完全倒地——在这个机关中，全堆集着封建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分子，农民失了旧时的支配人和组织者，再不受他们驱使像牧羊一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社会进步。创造新的政府机关是必要的，这个新的政府机关可以使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能够在共同反对反革命之中，巩固起他与农民中间的联络。并且在从农民出身的无产阶级中，农民可以找得着他们最好的代表、最可靠的保护者，以反对一切旧制度的势力。

应用马克思革命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日常实际生活中，国际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俄国共产党——要使十月革命的凯旋歌能得革命的农人阶级的得胜和声。

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基本条件和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 著 尹宽 译

—

在现在我不能将这个问题做全般的研究，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人人人都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我们很多的牺牲，并且在一定的期间免不了一个生产力的破坏。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著的法则。但是我们的反对者，想为我们证明消费这样大的生产力是因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还没有成熟。这是他们重要的理论的主题，殊不知照这样说，他们混淆所不应该混淆的：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内部的成熟和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中成熟。我们应该细细地注意存在这两个现象中的原理的区别。无论如何，我们是要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规定在我们的党纲中的。在新构造成熟的两个方式中的区别，就是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中从头至尾发展出来的。在这时工人不是单独地在发展。最高的阶级层（Cou ches）也在发展，并且全社会的器械——自工人直到有产阶级的支配中人——都在封建社会的怀中成熟了。至于社会主义，他决不能像这样的成熟，纵然在最便利的条件中，纵然我们能够用数学的方式决定资本主义成熟的限度。若工人阶级未从资本主义社会怀中跳出来而能一样地从事生产的工作，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无意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而且社会主义在有产阶级社会中成熟的特别的形态，也完全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成熟的特著的形迹不同。资本在封建的统治中已经有它的管理人和支配人。至于无产阶级，他不独在经济上受压迫，并且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受压迫。无产阶级既设备有工程师又设备有无产者的专门人才；他应该取得所有这些待一旦可能唯将这些供献与他，这就是说待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能深入教训之门从事学习。从教育的观点上看，无产阶级是少发展的，并且我们应该要承认很无知的，比有产阶级很落后些。这就是指明无产阶级不能按照一个新社会的创造的势力在资本主义的门面里成熟。他能按照组织的势力，按照全社会的指挥者，按照在一个实证的意义中这个社会真实的创造者成熟，

只在一旦专政实现了。除此没有别的径途。这个资本主义的成熟与社会主义的成熟之原理的区别很值得注意的。我们的反对者以为我们可以在有产阶级社会怀中成熟亦如资本家在封建社会怀中一样。不幸事实不是如此，应该彻底明白这两个现象。

我现在应该考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纵然在属于我们的著作中还没有仔细分析：这就是“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修正派当中曾经大大地研究过，修正派的概念就是说资本主义穿入社会主义。假使误会我们的意思，人可以反对我们，说我们不会能做我们所要做的，因此，在我们有一个长时期的机体的历程，一个实在穿入社会主义的历程。不过我们与修正派的不同只在在什么时期穿入应该开始。修正派不愿意革命，所以他们认定这个穿入的历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中就已开始。至于我们，我们认定它只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才开始。无产阶级应该毁坏有产阶级的国家，占据权力，于是利用这个杠杆来改变经济的条件。我们是在这里有一个长的发展的历程。在这历程中，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渐渐扩大范围，等待所有资本主义的经济的遗迹都消灭了，人即达到资本主义社会完全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密切地关系我所已考察过的问题。现在我想说一说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方式”，自然是按照生产的形式说。在革命前，所有我们都以为只要说到规划的经济、团体的经济，就不必再给他们具体的确定。但是现在，特别是俄国革命以后，我们看见我们将要过一个长的时期，在这时期中，社会主义生产的国家的形式要实行的。就拿资本主义来说！试将法国的资本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作一比较。法国的资本主义有它的特别的表征，而美国的也有它的特别表征。法国的资本主义带一个盘利的性质，美国的带一个最清水的财政性质。或英美的散的嘉和托拉斯的历史来说。这是各种的途径，各种不同的性质。固然因有世界经济的增长帮助，时间会平均一切。但社会主义只能在已存在的地位上增长。人亦可以认定各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在一个不同的形式中——以前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延长。所有要说特别的表征都适合于各种资本主义的地方，可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特别形式中找出他们的表现。等到最后无产阶级的世界的权力立定时，社会主义生产在全世界上都成立时，自然全体社会平均的发展的原始段落，纵无产阶级在各地都取政权以后，还被有各种社会主义生产的形式。我们可显明地说俄国的社会主义与别的社会主义比较总有点亚细亚的面貌。可规划的与不可规划的钩合，工业与农业钩合等等，所有我们这些经济发展的落后的特征都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落后的形式中找着它的表现。若我们注意到所有以上所说的，若我们预先对这些加以注意，我们就可以说别的东西，例如新经济政策。

二

人可以将这个新经济政策从两个不同的观点上来说明。第一个是革命的政策和战略的观点，第二个是经济的理法的观点。这是两个不时时统一的观点。

一些同志已经说过政策和战略的观点，例如列宁、托洛斯基。至于我，我在此地为使这个问题明了，我愿意站在经济理法的观上。

我认定所有在各地握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在所有别的经济组织的问题当中第一当先解决的就是一方面所有无产阶级仍能够系统地规划、组织、经营的生产形式和另一方面为他在他的发展开始的途径中所不能系统地规划经营的生产的形式之调剂的问题。这就是为无产阶级所要解决的重要的问题。若无产阶级取得过多，对于这个调剂忽略了的时候，他一定就要处在这种情形之下：生产力不发展反麻痹了。无产阶级不是完全可以组织的。若他想用强力替换小生产者，备有永有财产的小农人以实现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不但不能，不运用这些分子使他实在为社会供给一点确实的东西，反一点都收不到，于是流通闭塞了。由此生产力将有一个更大的失败，普通的经济生活将有日见危殆的破坏。

在这些情形中，无产阶级还碰着别的结果。当无产阶级想占据太多的东西的时候他必定要形成一奇大的办事机关。他应该有很多的办事人、很多的冗员，来替代小生产者和小农人在他们的经济的机能中。在要以国家办事人——随便你们怎样称呼他们，但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办事人——来代替所有这些小的事务人另出一个非常大的官僚机关，竟使这个机关所耗的费用比由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受的损失还更大。所有无产阶级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的机关不是使生产力在里面发展的形式，是为生产的绊马索。这种制度完全成了所应该是的反面，因此这个制度势必崩坏。无论这个制度的破坏是因为一个反革命或因小有产阶级，或是他是由党自己收缩或改造（这是在俄国的情形）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若无产阶级自己不做，别的势力会要来破坏这个制度的。在各个同志都应充分了解这些。也许我可以这样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特别的俄国的现象，但在另一个战略的退步，它亦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组织的问题解决：即某一些为我们所应该规划的生产组织与另一些为我们还不能规划的生产组织调剂的问题。同志们，应该公开地宣布：在俄国我们曾经打算组织一切，即农民和几百万小生产者都在内。正是为这个所以我们曾经有很大的行政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经过一个政治的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为救济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应该采用新经济政策。这毫不是一种秘密的病应该要隐藏的。这不独是对拿起所有势力反对我们的敌人的一个让步，这亦是社会组织的问题的正确的解决。老实说：当在旧的经济计划中，莫

斯科的赤卫队解散卖面包或别的食物穷苦的妇女时，若从经济理法的观点上看，我们演出一个疯人的居房。一旦人已明白了这个，即应该努力将这些疯人的房子改为好一点的东西。有些同志以为从前那样办法是违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罪恶。其实这不是属于我们的罪恶，由我们党对于我们在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所犯的过错，加以必须的惩戒是因为我们的无经验和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思想是如此。

我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国际的问题。所有特别属于我们的，只是我们所能规划的与我们所不能规划的之比例的数量。所有特属于俄国的只有这些。不错，在俄国有很多农民和小有产阶级。但是即拿在工业上最发展的国家来说，例如德国和美国：你们相信这个问题可以不马上产生吗？拿一个比譬，人可以走来就组织美国的佃农吗？决不会！为这辈佃农也是一样，自由的经济流通应该保存的。德国也是如此。你们相信得胜的无产阶级即可立刻组织一切农民的产业，特别是巴仗伊尔的吗？生活上决没有的事！你们知道当你们向农人要求交付他的面包时，他应该向你们要求什么回来吗？他向你要求让他自由行动，让他贸易。在德国亦如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这个问题是不应该忽略的。到处你们都是必定要很正确地计算在什么尺度上你们才有一个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在什么尺度上应该为你们保持自由。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但这个问题又联系于另一个问题，这另一个问题与它完全不同的。

国际上，革命的行动中，经济理法的原理与另一个也是为无产阶级所必须的原理处在冲突的地位，这个原理即是纯政治斗争的需要的原理。对于这个原理我已经不止一次举出很多的例子。假定你们应该要建筑防堵，因此你们就打倒电线柱子，这毫不是一个什么行动可以增长生产力的。这是极容易懂得的。在革命中亦是这样。例如当资产阶级调动他所有的势力来反对你们并从小有产阶级分子当中竖起一些为他服务的助手时，无产阶级将应该怎样的呢？在无产阶级应该不顾一切解散这班有产阶级的助手。越是争斗增加紧度，小有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越是要毁坏的。就是在这时候不合理的行动出来了，这种不合理的行动在经济的观点上是没道理的，但是在政治斗争的观点上是合理的。这两个观点——经济的理法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相混合的，乃是常相冲突的。但是政治斗争应该看重，因为我们不能在有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前建立社会主义。不过我们应该极端注意不要做无益的行动，不要做什么同时从政治斗争的观点上和经济的观点上都是合理的。固然我们不能继续发展这个观念，你们自己会从各方面将问题弄清楚。

现在的力量

罗若夫斯基 著 赵世炎 译

(一) 大战以前

大战以前全世界曾有将近一千万的有组织的劳动者。出兵的动员令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的及工团行动的盲从却将这个数额大大地减少了于大战初年。除英国外，几乎是所有的各交战国的工团都失去了过半的数额。这样的衰落继续着一直到一九一五年。在一九一六年，恢复现象又才开始。在一九一九至二〇两年间，工会运动在全世界各国中经过一个非常迅速的发展形势。一九二〇年之末，国际工联运动差不多包含有五千万人。然而自从一九二一年初以后，资本主义之进攻又开始离散了这一营伟大的劳动军。

这一营劳动军在今日还没有组成一党。他们仍然依着政治、民族、宗教而分门别户。改良派的工团现在占据较密集的群众，其次便是革命的工团，其次便是独立的工团，再其次便是天主教的、自由民主党的、基督教的、圣经教的、民族的（如捷克及德意志）、法西斯帝的工团，此外还有一些同盟罢工之破坏者的工团。然而除改良与革命两派外，全没有国际的组织。唯天主教曾宣传要发起他们的国际组织。总之，这都不外乎有一个目的：国际的组织。我们现在已有的是：

- (一) 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协会
- (二) 二十九个工业国际协会
- (三) 赤色工联国际（莫斯科）
- (四) 在各工业协会中做宣传的十二个国际委员会（莫斯科）

(二) 阿姆斯特丹国际

阿姆斯特丹国际结合了二十四個工团的中心，其中有四个是在欧洲以外：（1）阿根廷；（2）秘鲁；（3）加拿大；（4）南非洲。在这些工团里面都有革命的少数派在内部正进行工作以反对他们的领袖。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协会大概包有二千一百万会员，其

中有一千五百万是在德意志与英吉利。其余二十二国合起来不过只有六百万有组织的工人。阿姆斯特丹的统计法把所有的报名于组织的会员都算上而不问其倾向是如何，于是在总数上可以夸张一点。

譬如意大利在一九二三年数目是一百二十万会员，而实际改良派工团不过包括有二十万会员，其中半数尚是反对阿姆斯特丹与其自己的领袖团。法兰西改良派的劳动总会（E. G. T.）的数目是七十五万六千人，而实际不过二十五万人。保加利亚的改良派宣言有一万四千会员，其实只有一千。希腊十七万，实还不够五万。大不列颠宣称了一个六百五十万的好看数目，然而我们知道英国工联（Trade Unions）的大会只不过五百万会员，其中至少有百分之十五还声言依附赤工联国际。最后，在德意志改良派的工团中（号称八百四十万人）有一个坚实的革命少数派，其影响至少要及于三百万工人。总而言之，倘若我们将阿姆斯特丹的真实的数额表检查起来，凡加入赤色工联国际的革命分子除外，我们或者只能得一千五百万为最大的数目。

各工业国际协会具有些同样的工团而数目有二千万人。这是些报告局与统计局。然而他们的统计法是简略的。船工有三个技业的国际组织。书业也有三个：（1）印刷业；（2）装针业；（3）石印业。又有理发业的（一万二千人）、皮货业的（一万三千人）、帽业的、烧窑的各国际组织，以他们的组合的特殊主义而作国际的结合。最有力量各国际协会要算金工（三百四十万）、矿工（二百六十万）、交通工（二百三十万）、丝工（一百六十七万）、木工（八十三万）、船工（八十万）。这些国际还没有完全包含所有的工业的工团，且在其中赤色的少数是很有力的。

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协会及依附于它的各协会组织了一个大的阻止阶级争斗的保守势力。第二国际的倒账，及最近在鲁尔占领中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协会所表现的盲从产生了一个左派，其结果仍难于估定。然而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已经衰弱了。这不如仍旧老实地说，它不过是一个“投信的邮箱”。

（三）赤色工联国际

赤色工联国际毕竟是一个国际的组织。除欧洲以外有二十二个中央组织及许多占少数派的工人组织是加（入）了赤工国际，如：奥地利、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乌鲁客、伯列希、阿根廷、印度支那、中国、印度、日本、高丽、波斯、土耳其、埃及、墨西哥等等……在全世界没有一国的无产阶级不接近于赤色工联国际，或由组织的线索，或依政治的线索。

赤色工联国际是由几个国家的工团中央（俄罗斯、法兰西、捷克、保加利亚、立陶宛、波斯等等）及一些有力的革命少数派（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合众国、比利

时、奥地利、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南斯拉夫、斯干底拉维亚)所组织而成。但在有些国家里面,白色恐怖之过度妨碍了工团运动之加入赤色工联国际(如:罗马尼亚、意大利、南斯拉夫、匈牙利、芬兰、拉帝维、波兰、希腊)。提起这个,我们便记起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同志胡时得(Foster)的诉讼案问题,我们这位美国同志就特别为作赤色工联国际之宣传而被控告。但是假使我们以确切的统计计算几个(如俄国、法国等)以政治的影响计算另几国(如德国、英国、美国等),以运动的普遍倾向计算另几国(如南斯拉夫、芬兰等),我们可以得结论,赤色工联国际的真实数额,约在一千二百万与一千三百万间统一的,密接的,战斗的。一个唯一的原因屡屡的在实。而且我们的组织实际上作障碍:这就是因为其中的力量的大部分还是包含在安姆斯坦国际的群众里面正在为坚定他们的趋向而工作。

十三个为宣传的依各工业协会而区分的国际委员会是属于赤色工联国际的。在交通工、船工及木工中,我们将近有国际势力之一半;在金工、矿工及毛织工中,我们占有国际协会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四) 一个奇怪的国际

我们再说一说,为不要遗漏,有一个才组织不久的“工人国际协会(!)”,由德意志、意大利及西班牙几个小小的“自由工团主义者”的团体所组织,他们除假冒第一国际的名称外,没有别的正经事。它的内容是无聊、懈怠、柔懦。它的目的是“防守”赤色工联国际的国际工联运动、共产主义及俄国革命。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它实没有什么重要。

(五) 结论

现在的力量,便是如此。一个可尊贵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一部分尚在有产阶级的手中,一部分在其势力影响之下,一部分又背叛而反对它。赤色工联国际的工作,在近数年来,指明把这个保守的力量转变成为一个革命的力量,不是空想的。战胜改良派工团主义者的迟钝的能力,而有千万工人继其后,这就是预备革命。这个战胜不用说是迟缓不易的,我们但紧跟着努力!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

第一部——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成立宣言

自从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全世界各国分成了两个敌对的营寨，即：资本主义的营寨与社会主义的营寨。

那里，在资本主义的营寨里面，统治着国家的怨恨与不平、殖民地的奴役、狭义的爱国主义、民族的仇恨与掠夺、帝国主义的凶暴与战争——这里，在社会主义的营寨里面，满布了互助的信用与和平、民族的自由与平等、平民间的和平的互助生活与亲密的协作。

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所用以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用一个人可以剥削别人的制度，阻止人民之自由发展，已经是证明无用了。而在反面，民族间的纠纷愈演愈烈，直摇动资本主义本身之生存。有产阶级已是证明不能在人类中间再做什么协同的工作。

只有在苏维埃共和国的营寨中是唯一可能的，在为大多数人民所保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除去民族的宿怨，创造相互的信义，建立在人类中为和平协作的基础之石。

这就因为这个条件，各苏维埃共和国才能够防卫了全世界帝国主义之进攻；这就因为这个条件，各苏维埃共和国才能够将国内战争作胜利的结束，保卫了自己的生存，进行于和平的经济改造。

然而战争时代曾为各苏维埃共和国留下了不少的伤痕。荒芜的田场、停滞的工厂、损坏的生产力、损耗的经济来源——战争的一切遗物——所有这些都觉着各个共和国单独力量之不足。倘若每一个共和国各自为生，则政治的经济改造将至于不可能。

在另一方面，国际情势之变化与新的侵略之危险，为反对资本世界而作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战线之建立，真是绝对的需要。

要之，苏维埃权力的国际性，由阶级的自然性而变为国际的，迫使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阶级不得不站在联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的指导之地位。

所有这些情形都决然地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一联邦之实现。此联邦能保障对

外的稳固与对内的安宁，及民族发展之自由。

这种存在于各苏维埃的人民心中的志愿，是一种最好的保障，他们在近来聚集的会议里面一致地通过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组织的决议；这个联邦是在平等权利下的人民的志愿的结合，每个共和国有退出联邦的自由，所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联邦之加入也是自由的，已成立的各国与将成立的各国都是一样。这个新的联邦是一九一七年十月胜利的人民的互助生活与亲密协作之开始的有价值的成功，它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战争中是一个最忠实的保卫者，它在联合万国工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路上代表一个新的决然的步骤。

第二部——条约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R. S. F. S. R.）、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U. S. S. R.）、白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W. R. S. S. R.），及大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S. Z. F. S. R.）（包括亚伊伯姜 Aserbaijan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乔治亚 Georgia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及亚美尼亚 Armenai 社会主义共和国）连合成一联邦——名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S. S. S. R.）。

第一章——联邦最高机关的统治权

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统治权由各个最高机关施行，其内容如下：

（1）在国际间的关系上为联邦的代表，公事往来的总汇，与别国订政治或他种条约的决定。

（2）联邦边界的改变及各共和国间边界更改问题的评断。

（3）新邦加入联邦时条约之决定。

（4）宣战与媾和。

（5）联邦外债与内债之决定，各邦外债及内债之批准。

（6）国际条约之批准。

（7）对外贸易之管理，内部商业制度之建立。

（8）联邦全邦经济制度之重要基础与总计划之建立，工业支派及与联邦有重要关系之各个工业企图的划分；关系于联邦或关系各邦的租借条约之批准。

（9）交通、邮、电之管理。

（10）联邦的兵力组织与管理。

（11）联邦预算案包括各邦预算案的决定；联邦总税则及收入之限定，及关于各邦预算案之减出与加入；为各邦预算案而加税则的命令权。

- (12) 流通与信托独占制之建立。
 - (13) 在全邦领土内土地的分配，矿山、森林、水道的开发管理的总则的建立。
 - (14) 对各邦间移居的联邦的总法律，移民经费的筹划。
 - (15) 联邦的审判组织与内部立法的基础原则之建立。
 - (16) 基础的劳动法之建立。
 - (17) 教育的总原则之建立。
 - (18) 度量衡制度之采择。
 - (19) 全联邦的统计的组织。
 - (20) 外国人民在联邦中的公民权的基本法律。
 - (21) 全联邦的大赦权。
 - (22) 各邦苏维埃会议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有伤害本宪法的议决案的否认。
 - (23) 各邦间有争执时的批判权。
- 二、本宪法的基础的方案的批准与改正为联邦苏维埃会议的特权。

第二章——各邦的最高权限、联邦的公民资格

三、各邦的最高权限只限于本宪法中所举，且只在联邦的统治权事务范围以内有关。在此范围以外，各邦可以有它的独立的管辖权；联邦且保护各邦的最高权限。

四、各邦保有其在自愿时退出联邦之权。

五、各邦当照本联邦宪法，改正其各邦宪法。

六、各邦的边界不得同意不能改变，为改变边界，限制边界，或第四条之废止，须得组成联邦之各邦的同意。

七、联邦的公民资格以各邦的公民资格为准。

第三章——联邦苏维埃会议

八、联邦的最高机关为联邦苏维埃会议，在联邦苏维埃会议闭会期间，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包含联邦议会及民族议会）为最高机关。

九、联邦苏维埃会议由城市苏维埃代表（每二万五千有选举者选举代表一人）及省苏维埃代表（每十二万五千公民举选代表一人）组织而成。

十、联邦苏维埃会议的代表由省苏维埃会议选出。在各邦无省单位之处，代表由各邦苏维埃会议直接选出。

十一、联邦苏维埃常会由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年召集一次。临时会议由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必要时召集，或因联邦议会，或民族议会，或各邦的两议会之要求亦

必须召集。

十二、在例外的情形之下，倘联邦苏维埃会议不能如期召集时，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得将日期延缓之。

第四章——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

十三、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联邦议会及民族议会组织而成。

十四、联邦苏维埃会议按照联邦各邦人口比例从各邦代表中选出三百七十一人组织联邦议会。

十五、民族议会由各自治邦每邦代表五人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各自治区每区代表一人组织而成，民族议会的全部组织必须经联邦苏维埃会议之认可。

（注）亚直阿利亚（Adzharia）与亚布喀热亚（Abkhazia）自治邦及南阿塞几亚（South Osetia）自治区各有一代表于民族议会。

十六、联邦议会与民族议会有审查一切由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及人民委员会，或联邦的各人民委员部，或各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呈报的告令、法典、章程等之权，且当此等告令、法典、章程问题在本联邦议会或民族议会成动议时，亦必须审查之。

十七、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法典、告令、章程及命令，为联邦的唯一的立法与行政机关，并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及联邦人民委员会之工作。

十八、一切关于联邦普通政治经济或对联邦中各邦现行律有根本改变之告令或决议必须经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审查与认可。

十九、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公布之一切告令、法令及命令在联邦境内有强制执行之权。

二十、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有阻止或取消主席团、各邦苏维埃会议，或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他联邦境内之行政机关的告令、法令、命令之权。

二十一、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由其主席团每年召集三次。临时会由联邦议会主席团或民族议会主席团之决议，或各邦之任一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要求，均应召集之。

二十二、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之法律草案必须经联邦议会及民族议会之审定才为合法，最后以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名义公布之。

二十三、联邦议会及民族议会有不同意某问题时，得由该两议会组织联合委员会解决之。

二十四、联合委员会不能解决时，由联邦议会与民族议会联席会议解决之；联席会议无大多数决议时，当由联邦苏维埃会议常会或临时会解决之。

二十五、联邦议会及民族议会各选七人为主席团以管理会议事及主席团本身之工作事件。

二十六、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二十一人组织而成，其中包含联邦议会主席团及民族议会主席团全体）为最高机关。

二十七、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联邦的数目，从其主席团选出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人。

二十八、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邦苏维埃会议负责。

第五章——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二十九、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立法、行政、管理之最高机关。

三十、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监督本宪法之实行及各部对联邦苏维埃会议或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之实行。

三十一、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阻止或取消联邦人民委员会或各人民委员会，及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各邦人民委员会之决议之权。

三十二、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阻止或取消各邦苏维埃会议之决议之权，但事后必须呈报于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其审查与认可。

三十三、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权公布告令、法令或命令，并有权审查及认可由人民委员会，或联邦各部，或各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或其他行政机关所呈报之告令草案与决议之权。

三十四、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及人民委员会之告令与决议应以各邦所用之文字（俄文、乌克兰、白俄文、乔治亚文、土耳其鞑鞑文）公布之。

三十五、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权决定联邦人民委员会与联邦的各人民委员会之间，及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其主席团之间的关系的一切问题。

三十六、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第六章——联邦人民委员会

三十七、联邦人民委员会由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产出为行政管理之机关，其组织如下：

- (1) 联邦人民委员会委员长。
- (2) 联邦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
- (3) 外交人民委员。

- (4) 陆海军人民委员。
- (5) 对外商务人民委员。
- (6) 交通人民委员。
- (7) 邮电人民委员。
- (8) 劳农视察人民委员。
- (9) 劳动人民委员。
- (10) 食粮人民委员。
- (11) 财政人民委员。
- (12) 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三十八、联邦人民委员会所公布之告命、法令在联邦境内均有效力，唯当在由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约章规定之权力的限度以内。

三十九、联邦人民委员会有审查各人民委员部，或各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所呈报之告令与法令之权。

四十、在一切工作事务上，联邦人民委员会均对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

四十一、联邦人民委员会之法令或命令得由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阻止或取消之。

四十二、各联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对联邦人民委员会之告令或决议有不服时得抗议于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但在抗议期间，仍须服从决议。

第七章——联邦最高法院

四十三、为联邦境内革命法律的保障，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联邦最高法院。本法庭之权限如下：

(1) 在本联邦总立法律范围内给各邦最高法院以命令。

(2) 在联邦最高法院检察官的职务上，审查各邦最高法院的法命、决议与裁判，并在各邦有违犯联邦总法律时或各邦对别邦利益有妨害时，提出控告于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

(3) 受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委托，根据宪法，给各邦之任何法令的合法的决议。

(4) 裁判各邦间关于法律之争论。

(5) 审查联邦高级官员被弹劾之案件。

四十四、联邦最高法院之职务分别如下：

(1) 全体会议。

(2) 国家刑事会议。

(3) 军事或军事交通会议。

四十五、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由十一人组成，其中包括各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之议长、副议长、主席四人及联邦政治局代表（参看第六十一条）一人。议长、副议长及其余五人皆由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之。

四十六、联邦最高法院检察官之责任为——发表关于联邦最高法院之一切问题的意见，以此意见提出于会议，并若对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之决议有不同意见时，提出抗议于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四十七、第四十三条中所指明之向联邦最高法院会议提出问题之权，只有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主席团、联邦最高法院检察官、各邦检察官及联邦政治局有此权利。

四十八、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包括为下列事件之司法会议：

(1) 有害于两个联邦以上之安宁及重大的违法事件。

(2) 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联邦人民委员会个人责任事件。

联邦最高法院只能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对各事件的特殊决议的指挥之下，对该事件裁判之。

第八章——联邦各人民委员部

四十九、为在联邦人民委员会权限中对国家行政之直接管理，如本宪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应成立十个人民委员部，按照由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规划章程而执行事务。

五十、联邦人民委员部分为：

(1) 联邦人民委员“总”部——即全联邦之各委员部。

(2) 联邦人民委员“联合”部。

五十一、下列各部为联邦人民委员“总”部：外交、陆海军、对外商务、交通、邮电。

五十二、下列各部为联邦人民委员“联合”部：最高经济委员会、食粮、劳动、财政、劳农视察。

五十三、人民委员“总”部在各邦各有其代表，直接对各部负责。

五十四、在各邦执行联邦人民委员“联合”部事务之部，即为各邦之各人民委员部。

五十五、各联邦人民委员部由联邦人民委员会各委员管理之。

五十六、各人民委员部以各人民委员为总长，其他人员由联邦人民委员会任命之。

五十七、各人民委员在各部权限中有独裁权，但必须在各该部以决议通告。本部或某一人员对该人民委员决议有不同意见时，得提出抗议于联邦人民委员会，但不得妨害决议之执行。

五十八、各联邦人民委员部所公布之命令，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联邦人民委员会有权取消之。

五十九、联邦人民委员部所公布之命令有显然违反联邦宪法、联邦法律，或各邦法律时，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得抗议之。此种抗议当立刻通报于联邦人民委员会及该人民委员部。

六十、联邦人民委员对联邦人民委员会及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

第九章——联邦政治局

六十一、为遏止政治与经济之反革命行动与侦探及匪乱等的争斗而统一各邦的革命力，特于联邦人民委员会附设联邦政治局，本局在联邦人民委员会中有发言权。

六十二、联邦政治局在各邦人民委员会中有代表，有分局，其工作均直辖，各代表须按照合法的法令执行事务。

六十三、联邦最高法庭检察官按照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公布之特别布告令监督联邦政治局之行动。

第十章——各联邦

六十四、各邦苏维埃会议为各邦境内最高机关，在各邦苏维埃会议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六十五、各邦最高机关与联邦最高机关相互之关系如本宪法所规定。

六十六、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主席团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之最高机关。

六十七、由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产出各邦行政机关——即人民委员会以下列各委员组织之：

- (1) 人民委员会委员长。
- (2) 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
- (3) 高等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 (4) 农业人民委员。
- (5) 财政人民委员。
- (6) 食粮人民委员。

- (7) 劳动人民委员。
- (8) 内务人民委员。
- (9) 司法人民委员。
- (10) 劳农视察人民委员。
- (11) 教育人民委员。
- (12) 卫生人民委员。
- (13) 社会安宁人民委员。

又联邦人民委员会外交、陆海军、对外商业、交通、邮电各部代表依照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规定在人民委员会中有发言权或表决权。

六十八、各邦高等经济委员会及食粮、财政、劳动、劳农视察各人民委员部，在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属从之下，执行联邦各人民委员部之调令事件。

六十九、在各邦司法与行政机关公布赦免罪犯令，开复公民职务令，为各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权。

第十一章——联邦徽章、旗帜、京都

七十、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之徽章为：在地球上以刀与斧作成交叉形，四围有稻穗，上用六种文字（见第三十四条）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突出作五星形。

七十一、联邦旗帜为红色，或朱红色，上绘联邦徽章。

七十二、联邦京都为莫斯科城。

（完）

《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自序

李 季

马克思（Karl Marx）为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他的声名即随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传播于世界各国，欧美的劳动群众知道有马克思其人，已在半世纪之前，至于智识界的人知道他的尤较一般劳动群众为早。在他的生时，固已有无数马克思主义者了。自马氏死后，欧美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和运动日盛一日，在最近数年中，风声所播，已遍及于全世界，这都是和马克思的学说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因此，在世界一切有文化的国家中，关于记述马氏事迹和讨论马氏学说的著作现在真是累百盈千，而尤以马克思出生地的德国为最多。德国著名的经济学者桑姆巴德（Werner Sombart）曾将一般学者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德、法、英、意文著作，编成一表，名为《马克思主义书籍题解资料》（Ein Beitrag zur Bibliographie des Marxismus）登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丛刊》（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二十卷四百十三至四百三十页中，表中所列著作至三百种之多〔按内中有数种是马克思自己的著作，还有数种是他人对于昂格思（Freidrich Engels）又译作恩格斯的著作〕。桑氏自己并说明此表所载，极不完备，因为除掉遗漏的不计外，凡德、法、英、意文中载有马克思事业及其学说的社会主义史、社会运动史、经济学教科书和百科全书等等，他都没有收入。而俄文中对于马氏及其学说的一大批著作，他也没有列在里面。自一九〇五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近来批评马氏及其学说的人较前更多，因此，各国这种著作不知道又增加多少倍了。

可是说来也很奇怪，各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虽多，然至今还没有一部详尽无遗的《马克思传》，描写马氏生平的态度、品性和事业等等，使他的声音容貌、言语动作，得一一活现于我们的眼前；就是世间讨论马氏学说的著作，也大概是限于一隅，没有涉及全局，要求对于马氏学说的各方面，作一种有系统的记述，与公正的批评，这种作品，现在尚寥若晨星；至于将马氏一生所经历的事实所发表的著作与所表现的学说，冶为一炉，贡献于世的，除掉几部数十百页的小册子外，简直没有见过。本书

之作，志在于斯。因此本书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马克思传》，兼述其重要著作的大要，下编则专对于他的各种学说作一种有系统的记述，并且加以批评。上编既兼述马氏的重要著作，便已涉及他的学说，唯这是以每种著作作为单位的，例如讲《资本论》（Das Kapital），则专以此书为限，不涉及其他著作；至于下编则是以学说为主体的，例如讲唯物史观，则将马氏各种著作中关于此说的议论综合起来，使自成一系统。这是上下两编同讲学说而又各不相同之点。作者深信应用这种办法，则凡马氏一切重要的片段议论，与零星学说，在下编不能容纳的，皆可在上编叙述他的著作或事业时，连带介绍出来，如此便没有疏漏之虞，又上编所讲的学说，下编大概不再提及，因此又可免重复之弊了。现在本书上编，业已告成，唯因篇幅繁多，故分作三册出版，今特略述其要点如左。

我们要讲这一编的要点，须先把各国学者替马克思所作的传记，略提一下，庶几有个比较，容易明了。西洋关于此类的著作，除短篇〔如昂格思一八七八年在《不拉克人民历书》（Brackes Volkskalender）中所发表的，马克思女儿伊利安乐（Eleanor）一八八三年在伦敦《进步》（Progress）月刊五月号所发表的，马氏女婿拉花尔格（Paul Lafargue）一八九〇年在《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所发表的，列士奈（F. Lessner）一八九三年在《新时代杂志》所发表的，以及一切百科全书、经济学史、社会主义史等书所载的〕不计外，就德、英文中所见的专书讲，有里布奈西（Wilhelm Liebknecht，又译作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纪念册》（Karl Marx zum Gedchtnis, Nürnberg, 1896）、洛利亚（Achelle Loria）的《马克思》〔Karl Marx 原为意大利文，一九二〇年由保罗夫妇（Eden and Cedar Paul〔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斯巴哥（John Spargo）的《马克思传及其著作》（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s, New york, 1910）、泽特金（Keara Zetkin）的《马克思及其平生事业》（Karl Marx und sein Lebenswerk! 1913）、墨尔林（Franz Mehring）的《马克思传》（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 1918）、柏丹讷巴格（Rebert Danneberg）的《马克思——其人及其著作》（Karl Marx. Der Man und Sein Werk, Wien, 1913）、柏尔（M. Beer）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Berlin）、威尔不兰特（R. Wilbrandt）的《马克思》（Karl Marx, Versuch einer Würdigung, Leipzig. Berlin, 1918）和脱尼斯（Ferdinand Tnnies）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Karl Marx, Leben und Lehre, Jena, 1921）等书。在这些书中，只有斯巴哥的和墨尔林的为大部头著作（斯氏的书就德文译本讲有三百五十余页，墨氏的书有五百六十页），其余的都只是些百余页的小本子，此等小书叙述马克思生平的事实和学说是非常简略的，故我们现在只就斯、墨两氏的书讲一下。斯巴哥的《马克思传及其著作》〔就此书的内容讲，只能称为《马克思

传》，因为斯氏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有许多并未提及，就是他所提及的，除《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外，均仅涉及皮毛，未能深入]一书成于一九〇九年，当时马克思的大部分书信录及其他著作多种尚未出版，作传的材料本已极不完备，而斯氏又因不甚通德文的缘故，对于德文中已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和他人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既不能尽量利用，复不能正确利用，故他的书内容空疏，讹错百出，所以墨尔本称他此书是“一部无价值的编辑”〔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年度第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页墨氏的《斯巴哥的马克思生世及著作》（John Spargo,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Werk）〕，耶萨夫诺（N. Rjasanoff）认他此书为“一种完全的失败”〔见《争斗》月刊（Der Kampf）第六卷第二百八十五页，一九一三年维也纳出版，耶氏书评：《马克思传》（Marx Biographie）〕。墨尔林的《马克思传》与斯氏的书相较，不独是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叙述的正确与议论的精密，远过斯氏，真不愧为《马克思传》中的最上乘。不过墨氏对于马克思在私人生活中刻苦奋斗的情形及其为无产阶级著书立说而牺牲一切的经过，说得很少，就是他描写马氏的学说也有详于前半生而略于后半生之弊，他所唯一注重的地方，是马克思的政治生活，所以迈耶（Gustav Mayer）以为“他只愿替马克思作一部政治传（Politische Biographie）至于思想家和学者的‘马克思’，他就使之埋在革命家的‘马克思’之下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 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Leipzig 1922）第十卷第五十四页迈耶的《马克思传的新资料》（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斯、墨两氏的书内容既异，而本书上编也和他们的书及上列各书完全不同，其主要不同点有二，特分述如下。

一、编制上的不同。按马克思生平发达的程序，截然分为四个时代，而每一时代之中各自有其特点。上列各书除脱尼斯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外，均不分时代（脱氏的书虽分时代，却有点错误，例如他的书目中传记部分第二项所划分的年份，与以后的页中所载不一致，然这只是显而易见的小错，至于第一项明言马克思第一时代自出生时起至认识昂格思为止，下面括符中却注明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那就与事实不符了，因为马、昂两氏第一次相见在一八四二年年年底，脱氏既以此为分时代的标准，则括符中当注明一八四二年，不当作一八四三年），他们对于马氏的事业大概是依照次序，一直叙下去（脱尼斯的书也是这样），就书中的标题讲，多系纪事本末体，然就内容讲，则同一种类的事件，常因年月上的距离，而散见于各处，因此又半为编年体了。本书上编按照马克思一生发达的程序，分作四个时代，并且在下面的括符中用四字注明每个时代中主要的特点，使读者一望而知马氏生平事业的梗概。时代既经分出，即有了段落，便于记述，例如马克思在某个时代中得了几个儿女，或受过多少痛苦，

都可作一次描写出来，一经翻阅，便可了然，要是不分时代，中间既没有关栏，自无所谓起止，只好将此等事杂在各种重要的事中分头叙出，使人不容易找着线索，以彼较此，得失立见了。

二、取材上的不同。拉花尔格在《回忆马克思》(Karl Marx,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一文中说：“世间有些稀有的人物对于学问和公共的活动同时能站在第一等地位上，马克思就是这种稀有人物中之一。他结合这两种要素，至为坚固，大家的心目中如不把他看做一个学者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大家便不能够懂得他。”（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第十页）英国信德门(Hyndman)也说：“当马克思对于自由党的政策——即对于这一党所持的爱尔兰政策——带着怒气发言的时候，这位老战士一双小而且深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的密布的眉毛皱在一起，他的扁平而且肥大的鼻子以及全脸都露出愤激的颜色，他的口中雄辩滔滔，若决江河一样，同时他的脾气中的怒火以及他操我国语言的巧妙着重式，都表见出来了。他因愤怒而大为激动时的行状，和他进而发表他对于当时经济进程的意见时的态度，互相对照，显然大有区别。他不现出何种显明的自制力，复从一个现身说法者和激烈的弹劾者之地位，而归于一个心平气和的哲学家之地位……”（见墨尔林的《马克思传》第五百十一页，一九二〇年第三版）马克思能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同时又能做一个学者，他能“怒发冲冠”，即刻又能“雍容自若”，这完全是由于他有一种非常的禀赋，这完全是由于他具有热烈的心肠与冷静的头脑，或像考茨基所说的一样，具有“光辉灿烂的革命热忱，严峻锐利的批评‘能力’；如火如荼的气魄，百折不回的忍耐性，盖世的聪明，对于一切卑鄙齷齪的痛恨心；对于一切忧患的热烈同情心，和科学的深远的观察力”。（见丹讷巴格的《马克思——其人及其著作》第六页，一九一三年维也纳出版）故他一人社会的战场，即成为一个奋勇无匹的战士，一进研究室，即成为一个精思玄妙的学者。凡替他作传的人对于这两点倘若忽略了一点，则这种传记便只描写出“半个马克思”，因此读这种传记的人也自然不会完全懂得马克思了。本书对于马氏这两方面的事实，力求兼收并顾，希望借此写出“整个马克思”。

本书的主旨既在描写战场上的马克思，与研究室中的马克思，那么，所涉的范围便非常广泛了。今请先言第一项。我们要想描写战场上的马克思，则必先叙出对敌的双方，和战场的形势，庶几名角登台，英雄用武，方有蛛丝马迹可寻。因此，本书对于共产党(Der Bund der Kommunisten)，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国际党(Die Internationale，又译作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自治团(The Commune at Paris)，和德国社会民主党(Die 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等等，都特辟专章，详其起止，至于马克思的活动和学说，或是连带叙出，或是接着在下一章叙出，则随材料的多寡，与作

法上的结构为转移。总之，本书对于此等事所取的材料较上列各书为多，凡欧洲十九世纪科学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的共产主义（按，这两个名词本有区别，详见本书共产党的起源一章，但在现今著作界中仍视为异名同义的名词，随便应用，本书使用此等名词，一仍通例）及其运动的历史，可以说是大概都包括在这一编中了。昂格思于马克思死后，即拟替马氏作传，毕竟因年老事多，不克如愿相偿，埃系霍恩（E. Eichhorn）述及此事，说：“昂格思尤有一种作马克思传的事悬挂在心头，这种传在他的手中必定成为一种十九世纪科学的共产主义及其运动的历史，这是没有疑义的。”（见埃氏校的《昂格思遗简》第十一页，一九二〇年出版。Friedrich Engels, Vergessene Briefe, Ein Beitrag Zum hundertjahrigen Geburtstag. Berlin）埃氏说这句话并不是凭空推测的，乃是根据昂格思答复他人要求作国际党史的信而来的（参看同书同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传中叙述科学的社会主义及其运动的历史，是最关重要的。

现在再讲研究室中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好学是出自天性，他自最小时起，即欢喜读书，后来入学校更力学不倦，常至废寝忘餐。他出学校后，仍不改变这种态度，他并在还在病中求学，所以阿克恩（Hermann Oncken）说：“马克思有一次在几星期的重病中写信道，‘此时我完全没有工作能力，此时读过的书为：卡白特（Carpenter）的生理学、宽里克（Klikker）的组织学（Gewebelehre）、施颇慈海（Spurzheim）的脑及神经系统剖解学、施王（Schwan）和施乃登（Schleiden）对于细胞病的著作。’大家由此可以测出他平常康健时的精神事业了。”〔见《普鲁士年书》（Preussische Jahrbücher）第一百五十五卷第二百十三页阿克恩的《马克思与昂格思》〕马克思就是到了衰老多病的时候，他犹舍不得一个“学”字，他犹想设法恢复工作能力，从事学问。他当五十六岁时，患病甚剧，他曾写信给索尔格说：“凡不愿做牛的人一没有做工能力，在实际上就是被宣告了死刑。”（见《倍克》、《啻慈根》、《昂格思》、《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百三十六页，一九二一年出版。Briefe und Anszüge Aus Briefen von Toh, Phil, Becker, Tos. Dietzen,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u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 Stuttgart.）马氏这句话可以表示他视因病不能工作为绝大的苦事，后来他病到将死的时候，他犹是栖栖遑遑，转地养病，想借此恢复工作能力去完成他的《资本论》，他这种好学的精神是古今所仅见的。马克思对于学问既具有一种自然的热忱，故本书上编第一篇第一章即标为“家庭教育”，对于他的出生地和家世只在内中附带说明一下，不像斯巴哥和墨尔林的书一样，另标专题，详为记载，因为此等事比较不甚重要，且至少也是我们中国人不感兴味的。此外，如“学校教育”、“思想的变迁”、“文字生涯”、“家庭状况”、“研究室中的成绩”和“疾病与死亡”各章，或是全文或是一部分描写马氏对于学问一方面的状况，因为他除掉参加革命运动外，毕生精力，都集于此，内中经过的

情形十分复杂，我们断不能用几句话概括起来，当随时随地为之介绍，庶可表见真相。上列各章中对于这一方面所叙的事实多为他书所未曾道及，这是本书较上列各书取材独多之点。

昂格思说：“一种阶级愈伏处于社会中的深层，他（指阶级）愈是‘无教育的’——就这句话通常的意义讲——则他和进步的距离愈近，而他的前程愈大。就大体讲，这是每个革命时期的特点。”（见迈耶校的《昂格思早年的著作》第二百五十五页，一九二〇年出版。Friedrich Engels Schriften der Frühzeit Berlin）在资本主义当权之世，只有无产阶级伏处于社会中的深层，只有无产阶级是无教育的，然恰因此只有他和进步的距离愈近，也只有他的前程愈大。凡具有赤胆忠心和深思远虑的人生于这种时代，无有不乐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生平最大部分的光阴都花在学业一方面，既如上所述，然他并不像世间一般无用的书呆子一样，在研究室中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为着学问的缘故而求学（Learning for learning's sake），此外丝毫没有目的。马氏的为学，是因替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一种由无产阶级观察点出发的学说，去批评有产阶级的学说，他在研究室中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替世界作工”（Für die Welt arbeiten）一语，是他时常所乐道的。昂格思又说过：“马克思一生真正的职业，是对于推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以及由这种社会所造成的国家组织，共同活动，是对于无产阶级——他首先使无产阶级觉悟自己的地位与需要，并且觉悟自己解放的条件——的解放，共同活动。”（见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纪念杂刊》第三页至四页。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阿卫灵（Edward Aveling）也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实行家。他是一个争斗的革命家。在过去、现在及将来，他总是我们现代抵抗资本专制之无产阶级武力的阶级争斗中精神上的主脑。在过去现在及将来，他总是几百万男女——这些人中有很多是未曾读过他的著作一字一句的——中精神上的引导者。”（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二卷第七百五十六页阿卫灵的《达尔文与马克思》Charles Darwin und Karl Marx）。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是各自独立，不相为谋的，自马氏出，才运用他的锐利的眼光与渊深的学识，著书立说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打成一片。泽特金说得好：“马克思不朽的历史伟业就在对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两者间造成一所坚固的连接桥梁。他举出一种确切的科学的证据，指明那照耀于历史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奋斗的工人阶级的事业——也等于一种无可逃避之自然的必要——必定是这种奋斗的工人阶级的事业。马克思既不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偶然的事件，却证明这是一种合乎定律的历史的发达结果。那么，他就使这种主义由乌托邦而变成科学。他既确切指出负历史使命和适合于这种使命的工人阶级觉悟到造成历史的发达结果，那么，他就与工人运动以一种高贵的特权证书（Adelsbrief）

‘证明这种运动’是社会革命的担当者，至于这种社会革命即是全人类因无产阶级的解放而终由‘非人的’动物圈内（Tierreich）跳入完全人类自由‘的境界中’。”（见泽氏《马克思及其平生事业》第三十页）我们由此可知道马克思做学问的目的，专在沟通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使之溶化成为一体，即专在替无产阶级服务，因此本书特本他这种意旨，将他对于工人运动的学说与批评，以及他所手草的党纲和议案等等，多为介绍，这也是本书较上列各书取材独多之点。（马氏贯通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学说自然不止限于这一点，欲窥全豹当参看本书下卷。）

自马克思死后，柏白尔（Angust Bebel）提议用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全体的名义，在马克思的墓前竖一块碑石，借作各国劳动者表示感谢和团结的意思。里布奈西则提议刊印马克思的全集，前一事不能得马家的同意，后一事则在实际上做不到。柏氏旋写信给昂格思道：“马家对于每种纪念碑既经拒绝，而里布奈西的提议又不能行——此事我也曾经说过——便不能有所举动。可是让我们热心防护着，使马克思的见解和学说，得广为传播，并且愈加实现。”（见柏氏的《我生回顾录》第三册第二百五十二页，一九二〇出版。Aus Meinem Leben Von Angust Bebel. Stuttgart.）柏白尔要尽心竭力去传播马克思的学说，这自然比在马氏坟前竖一块纪念碑好得多。因为马克思在少年时代即已明言“学说一经侵入群众中，就会成为物质的势力”。（见《马克思与昂格思文汇》第一卷第三百九十二页，一九二〇年第三版。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41 bis 1850. Stuttgart）群众有了物质的势力，终有获到胜利的一日，无产阶级的群众一旦解放，则马克思便可以含笑于九泉，区区一碑，何足以当马氏之意。作者固为马克思主义者，穷年累月，专治斯学，今既作《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书，则作者希望马氏的学说得传播于世的心理，也自然不减于柏白尔。可是作者固不挟丝毫成见，任意赞扬马氏的事业和学说，使读者一味盲从，本书是一本求真求实的精神，对于马氏的事业学术，为公平的记载与批评，凡马氏学术事业对的地方，固予以表彰，凡不对的地方，也不稍加掩饰，且一种学说一与其他学说相较，最易显其异同，证其得失，而读者也因此确知其优劣之所在，可凭自己的判断，决定何去何从。泽特金说：“‘大家要’明白懂得马克思及其历史的事业，却有一要义，就是大家也要把拉塞尔（Ferdinand Lassalle）及拉氏的理想和活动扯入研究范围之内。”（见泽氏的《马克思及其平生事业》第四十三页，一九一三年出版）我以为大家要完全明白懂得马克思及其历史的事业，除泽氏所述的一要义外，大家还要把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及巴氏的理想和活动扯入研究范围之内。因为在马克思之世，同与马氏主张改造社会而见解与方法完全不同的，在右边则有持改良主义的拉塞尔，在左边则有倡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拉、巴两人都与马氏有极多的关系，且足为这两派的代表

人物，故大家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注意，而替马氏作传的人，为求完备起见，对于拉、巴两氏也不能不为充分记述，故本书对于拉塞尔一章叙至四万字以上，对于巴枯宁一章也叙至二万字以上（此外“国际党的盛衰”一章中尚有很多地方是涉及巴枯宁的）。因为要写出他们与马氏的交涉，须先写出他们是何种人物，要介绍马氏对于他们学说的批评，须先介绍他们的学说，本编既因此胪列改良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者的学说（但当参看下编才能窥得全豹），读者便得到一个比较，即可加以判断，自为取舍，关于各种主义一项，这又是本书较上列各书取材独多之点。

桑母巴德作《马克思主义书籍题解资料》一文，将世人对于昂格思的著作，一并列在里面，骤然看了，好像奇怪。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含有马克思的学说，兼含有昂格思的学说。阿德雷（Max Adler）说：“马克思主义同时就常是‘昂格思主义’”。（见阿氏《思想家的昂格思》第四页，一九二〇年出版。Engels als Denker. Berlin）考茨基说：“大家的心意中如没有昂格思，便不能讲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马克思。”（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五年度第一卷第三百七十二页，考氏的《马克思的两卷新著作》Zwei neue Bände Marxscher Schriften）这是丝毫不错的。马克思与昂格思虽是两个人，然他们却和“比目鱼”一样，是不能分开的。没有昂格思，决没有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凡读过麦考莱（Macaulay）的《约翰孙行述》的，大概都以为昂格思对于马克思的关系，恰和波士威尔（Boswell）对于约翰孙一样，就是西洋人士，以及德国人士也大概是把昂格思看做马克思的附属品。甚至于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犹免不了陷于阿德雷下面所述的一种情形：“据世人的见解，以为昂格思在精神史上的重要，只在对于马克思的繁难的复杂思想而为一个巧妙的解释者和通俗演述者，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中，也以为是如此的。”（见阿氏《思想家的昂格思》第八页）这些见解都是极不正确的。昂格思虽不能像马克思一样出身于大学受过极完备的教育，他虽不能像马氏一样，出学校后，仍继续文字上的工作，偏要置身于他所不喜的商业界中，然他的天才是很大的，他的见解是很高的，他的自修功夫是很充足的。论年纪他比马克思小些，论在著作界享盛名他却先于马克思，因为他于一八四五年著有《英国工界情形》（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一书，这是千古杰作之一，凡《共产党宣言》的种子已含在其中，所以墨尔林称此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一种大文书”。（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三年度第二卷第五百五十三页墨尔林的《昂格思》）而考茨基也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以此书为起点”。（见考氏的《昂格思的生世活动与著作》第十三页，一九零八年第二版。Friedrich Engels Sein Leben, sein Wirken, seine Schriften Berlire）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单独著书行世〔按昂格思在著《英国工界情形》之前，已与马氏合著一书，名《神怪家庭》（Die heilige Familie），然此书并未能

引起世人的注意], 当时他受昂格思此书的影响是极大的。还有一层,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 不独是由昂格思首先安下的, 马克思自己不独初时受了昂氏很大的影响, 为之心折, 即到了晚年, 他虽因多年专门研究经济学说, 造诣极深, 然他对于昂氏的著作能力, 仍是极端重视的, 所以他于一八六六年七月写信给昂氏, 要求其参加《资本论》的著作, 他说: “我对于劳动组织 (Arbeitsorganisation) 是由生产工具决定的学说, 还有何处比得上杀人的工业 (Menschenabschlachtungindustrie) 中证明得更显著呀? 你对于这一点动笔作一点东西 (我于此欠研究), 正是值得劳神的, 我可以将这种作品用你的名字刊在我的书中, 作为附录。请你忖度一下。……你知道, 你要是以共著者‘的资格’直接出现于我的主要著作 (我向来所作的都只是些小品) 中, ‘你的名字’不仅因‘我’引书而始出现, 那便使我大大地欢喜了!” (见柏白尔和卞斯夫校的《昂格思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百三十一至三百三十二页, 一九二一年版。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1883) 由以上各点看来, 马克思在精神方面是得了昂格思不少的益处 (昂格思在精神方面自然也得了马克思很大的益处), 并且是始终重视昂氏的学识。更就物质方面讲, 马克思得昂格思的益处, 那是大极了。昂格思为着维持马克思的生计起见, 于一八五十年年的复投身于商界, 至一八六九年才得抽身出来, 他因为马克思的缘故, 甘心牺牲自己的前程, 而劳形于文牍簿记等琐务, 这种行谊是旷古所无的。马克思所以听昂格思屈居商界, 受其补助而不辞, 也无非是视昂氏为一体的人, 他们因分工的必要, 不得不如此, 故他有一次写信给昂氏说: “我们两个人开一个合伙的铺子, 我的时间就用在营业中理论的和党务的部分。” (见柏白尔和卞斯夫校的《昂格思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第二百六十七页, 一九二一年版) 此外, 昂格思与马克思共同著作, 昂氏为马氏暂时代作报章上的英文论说, 以及为马氏筹划家务, 编订遗著等事是很多的。阿克恩说: “论个性, 马克思与昂格思是相距很远的, 然他们对于自己, 对于他们的著作, 对于后世, 已经熔合成为不可分离的一体了。” (见《普鲁士年书》第一百五十五卷第二百十页, 阿克恩的《马克思与格昂思》) 里布奈西说: “昂格思是马克思的二我。” (见里氏的《马克思纪念册》第十六页, 一八九六年出版) 阿、里两氏的话, 是非常中肯的。昂格思对于马克思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 因此本书对于昂氏的学说和事业写得很不少, 这又是本书较上列各书取材独多之点。

马克思是近世科学的共产主义之开创者, 现今各国的共产党都是信奉马氏学说的。可是回顾我们中国人, 那些富有资财的与头脑顽固的不必说, 即一般以新文化家自命的与有志于社会改造的, 一听见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者的名词, 几乎要掩耳疾走, 以为这是些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强盗! 其实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尤其是对于

钱财方面的行动——是纯洁的、高尚的，并且还可以说是神圣的。我们试看一看共产主义的宗师马克思个人的行为就知道了。马氏于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重返巴黎，法国革命政府中人愿以金钱供给他和昂格思回德创办《新莱茵报》（Nene Rhenische Zeitung），他们辞而不受。后来他们招股办《新莱茵报》，马克思当主笔，至一八四九年的上半年报馆负债累累，而反革命的势力又复战胜，马氏于出亡之前，竭力为报馆偿还一切债务，他从他父亲所得的遗产金二万一千马克（约合中银一万元以上）都因此报牺牲了，他自己要携家眷往法国，因困于费，遂将他夫人的银器付质得一笔小款，作为旅费，马克思这种临财不苟取和患难中慷慨好义的行为，是浊世中不能常见的！马氏旋于是年下半年出亡伦敦，一家数口，无以为生，昂格思虽尽量予以援助，究竟能力有限，几等于杯水车薪，马氏困苦颠连的结果，儿女夭亡一半！他虽于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得为美国一个最大的报馆《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驻英通信员，借此获得一种经常的收入，然此报的主笔丹那（Dana）待他万分刻薄。他的通信稿常作为社论登出，他本是报馆中的柱石，可是丹那不独不肯送一份报给他看，并且对于他的稿件任意取舍，肆行割裂，丹氏对于他所供给的定额以内的论说，常是只登出三分之一，计件给值，而价格又常是只等于原来议定的数目之半，这种任意虐待倚为柱石的“文字苦力”的行为也是世间不能常见的！马克思遇着这种艰苦的遭际，常是穷到不名一钱，他有一次要替《纽约论坛报》作文，因没有钱买报看，不果；有一次要出外，因没有鞋子穿，不果；有一次要著书，没有稿纸，竟将自己的上衣付质去买纸；有一次要送书稿往德国，竟无力付邮资；有一次死了女儿，竟没有钱买棺木。诸如此类的事，不知凡几。像马克思这样才学兼全，并世无双的人，如果肯为自己一身一家策安全，权利害，那么，天下之大，他何往而不能安富尊荣，更何往而不能丰衣足食？他为什么竟陷在这种赤贫的苦境中呢？这个原因，他已经明白宣布出来了，他有一次写信给一个党友说：“我必须排除万难，贯彻目的，不使有产阶级的社会用我为发财的机器（Money Making Machine）……我希望吾党获得一种科学上的胜利。”（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第二卷第一百八十一页）他有一次又说：“‘我是’为世界而做工。我必须训练一批人出来，使他们于我死之后，继续从事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第十页）马克思抛弃世间一切幸福，自甘贫苦，他的目的，全在于此，然他因此所受的痛苦是极多的，他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奋斗精神，也是旷古所无的！也是后起的青年所应当矜式的！耶萨诺夫（N. Rjasanoff）说得对：“绞人架上的处死是难堪的，惩治所和牢狱中的惨刑是难堪的，在欺诈的状况之下，要忠于所得所守，是必须有英雄气概的，可是亲身遇着慢慢地挨饿之事，亲眼看见啼饥号寒的家眷，与一个一个死去的

小儿女，安然忍受着，在反对者仇视之下，于最可怖的患难中，不屈不挠，坚持到底，一步也不离正轨，此处所需的英雄气概，正不少于上述一事！”〔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二年度二卷第五百七十页，耶萨诺夫的《马克思与昂格思书信录》（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考茨基说得尤对：“马克思的伟大不仅在乎为一学者，还在乎为一模范人物。大家不能单说他只有有益于奋斗的无产阶级之智识，并且当说他还有有益于奋斗的无产阶级之心性。他不独是启发我们的思想，并且还鼓起我们的勇气。……我们不独当研究他的著作，并且还要研究他的身世，我们如热心追随他之后，那么，凡我们的能力所及之处，我们所做的事业，将为最优美的了。”（见丹讷巴格的《马克思——其人及其著作》第六页）本书对于马克思在钱财方面的行为，以及他在奋斗中痛苦的经过，写得颇为详尽，一则以此表见科学的共产主义始祖之真精神，一则以此作为后起青年刻苦自励，努力奋斗的模范，关于马氏的私人生活一项，这又是本书较上列各书取材独多之点。

本书上编与欧美学者各种《马克思传》不同点，已如上所言。兹再述一事，使读者容易在本书中找出马克思造成他的学说的渊源。柏白尔说：“每个人是他所生息的时代和环境之产物。……每个人的思想是时代精神和他的环境逼迫出来的。种种观念（ideas）是种种协作的社会要素（The Cooperating social factors）之产物。没有近世社会，便没有近世的观念，这是显然无疑的，这是不可争辩的。”（见柏氏《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妇女》英文译本一百九十五至一百九十六页，伦敦出版。（Woma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我们把马克思的事看一看，觉得柏氏的话是何等正确啊！马氏是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产儿，他所倡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合德、法、英三国特有的学术、政治和工业状况而熔铸出来的，今特借考茨基几句最简单明了的话，说明这一点：“英国予他们（指马克思和昂格思）以最多实在的经济材料，德国的哲学予他们以一种最好的方法，使之由这种材料中转变现社会发达的目标；而法国的革命则清清楚楚向他们指明当怎样取得权力——即政治的权力——去达到这种目标。所以他们是联合英、法、德的思潮中一切伟大的和有结果的质素，固结为一体，造成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见考氏《马克思在历史上的成就》第二十五页，一九一九年第二版。Die historische Leistung Von Karl Marx. Berlin.）读者预先明白了这一点，则以后便知道本书叙述马克思研究黑格尔（Hegel）的哲学，以及寄居巴黎，往游伦敦，并且研究法、英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等等，都是极关重要的地方，非等闲记录可比了。

昂格思说：“社会主义既已成为一种科学，便当当做一种科学去研究。”（见昂氏《共产主义与巴枯宁主义》：“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附录第三十三页，一九二〇年第三版。Kommunism und Bakunismus; 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Berlin.）我作此

书，意在给国人做一种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门径书，不过我的学识既十分浅陋，而本书所涉的范围又非常广泛，内中谬误之处，自所不免，尚望国内外学者不吝指教，裨将来得加以改正，那是我所感谢不置的。

李季序于德国佛郎克佛（Frankfurt A./M.）。

附上编目次

第一篇 少年时代（学业时期·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

第一章 家庭教育

第二章 学校教育

第三章 燕妮女士

第四章 《莱因报》上的怒潮

第五章 思想的变迁

第二篇 壮年时代（奔走时期·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九年）

第一章 巴黎旅况

第二章 昂格思

第三章 不律塞的亡命

第四章 共产党的起源

第五章 《共产党宣言》

第六章 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

第七章 革命中的活动

第三篇 中年时代（修养时期·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七年）

第一章 革命活动的余波

第二章 文字生涯

第三章 朋友与仇敌

第四章 拉塞尔

第五章 家庭状况

第六章 国际党的崛起

第七章 研究室中的成绩

第四篇 晚年时代（成名时期·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八三年）

第一章 《资本论》

第二章 晚景与家庭

第三章 巴黎自治团

- 第四章 巴枯宁
- 第五章 国际党的盛衰
- 第六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
- 第七章 疾病与死亡
- 附录 马克思大事年表

第四期

民国一三年（1924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彭述之

（一）

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作国民革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打倒本国封建军阀的革命，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除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或患神经病者，谁也不能否认这个革命，除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或患神经病者，谁也应该来参加这个革命。因为国民革命是我们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一切人民之唯一出路。

由此，我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应该国民革命与否的问题，而是谁来领导这个国民革命即哪一个阶级来领导国民革命使国民革命能够彻底与怎样作国民革命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比较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如果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无从说起。因为一个革命，必定要在一个比较确定的更进步的阶级意识指导之下才能进行，才能有确定的方向，才不至走到混沌模糊的瀚海里去，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虽然是混合各阶级的力量而进行的，然而必得有个主要的进步的阶级作中坚、作领导者，才能使各阶级的意识比较集中、各阶级的力量集中，不致为某一反动阶级的私利所乱，才能引导革命的势力到目的地，彻底地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

在阶级分化较明显的国家里之革命，所谓革命的领导阶级本不成问题。如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当时的阶级分界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贵族僧侣的旧封建阶级，即统治阶级；他方面是新兴的第三阶级，即资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固然在被压迫阶级方面还有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然农民、小资产阶级并没有社会经济的新发展

之要求，只有消极抵制封建阶级的剥削之需要。工人此时也说不上有发展其社会经济的必要。所以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在当时只有第三阶级有直接革命的需要)。在这样情形之下推翻封建阶级的法兰西大革命，自然是资产阶级为领导者，也只有资产阶级能作领导者。英国十七世纪之资产阶级革命与德国一八四八年之革命都是如此。在现时德、法、英、美所需要之革命，更是非常明显，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自然担负领导革命责任的只有无产阶级。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早先虽很有些争论，但经过二月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应直接起来领导这个革命（最重要的是领导农民阶级），在当时已是很明显的事实了。唯在半殖民地阶级尚未充分分化的中国里，对于现时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问题，放在我们面前，就未免有点混乱了。你说资产阶级吗？若按国民革命的性质，似乎应该是资产阶级来领导（因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可是由各方面事实证明，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唯没有这样事实的表现，并且还没有这种志愿，有时甚至于相反。如此问题就发生了。你说是工人阶级吗？似乎无产阶级的本身很幼稚，而这个革命的性质又不是无产阶级的（因无产阶级除现时的国民革命之外还有其将来自己的阶级革命），因此也成了问题。但在经济的观点上，又只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可能性。所以我们此时应从客观的环境上，从客观事实的表现上，来观察中国、来分析中国现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真实势力，究竟谁能担负指导中国的国民革命，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二)

我们说过按照领导国民革命的本性，国民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现在我们看中国的资产阶级究竟是怎样？

先看银行资产阶级。现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银行资产阶级，差不多是与工业资产阶级分不开的，大银行家同时就是大工厂主。银行的创办是为着发展工商业的便利，因此银行的发展也就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的银行资产阶级完全两样。中国的大银行家最大多数是卖国的官僚，如新旧交通系。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并不是跟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创办银行也并不是因为工业的便利，而是为着政府要借外债。所以创办银行的人，多半是刮地皮之大官僚。这些官僚式的银行家，一方面借银行经营外债或内债，得到巨大的回扣和红利；他方面又借此可以做官，再继续不断地刮地皮。如此就形成中国之奇形怪状的银行资产阶级、财阀。这些财阀的唯一责任，是在帮助军阀卖国，帮助军阀刮地皮或自己刮地皮。其余一部分银行资产阶级除替军阀政府经营借款之外，还作一点投机的买卖，可是他们因资本的不充足，又完全成了外国银行的附属物。由此看来，我们希望中国的银行资产阶级来作国民革命，

打倒与它们相依为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不是等于痴人说梦？并且它们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必然的反革命者。

再看商业资产阶级。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应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专替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销售洋货或替他们收买原料的，即买办阶级。一部分则为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如盐商、丝商、茶商……或所谓售卖国货之商人等。此种分法，本还是相对的，若彻底言之，中国所有的商业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差不多是外国资本家之买办。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因直接间接受了帝国主义之种种压迫，军阀之种种摧残，在其经济地位上确感觉到国民革命之需要。可是它势力太薄弱，另一方面它还没脱离宗法社会的关系，还是“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之软弱心理，所以它不敢出头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宣战。它至多只能跟着别的阶级跑，绝无领导别的阶级之可能，这是近年来土著商人对待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态度可以看出来的。买办的商业资产阶级，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势力，无论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在中国资产阶级队伍里头占绝对的优势。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场后的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之结果。很明显的，买办阶级的发生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买办阶级的长大，是由于帝国主义侵掠的进展。换言之，有了帝国主义的侵掠，才有买办阶级，有了帝国主义更猛烈、更广大的侵掠，才有买办阶级更发展的机会。更切贴点说，帝国主义要在中国销货、买原料，才有代它销货和买原料的买办阶级，帝国主义销货越多，买原料越多，那时，买办阶级也越发财，越有势力。现在我们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阶级的主人，你想买办阶级愿不愿意？何况帝国主义又天天用甘言巧语怂恿他呢。所以自从有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出现，买办阶级就老不耐烦，现在他更是毫不客气地替帝国主义充先锋来做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者了。我想大家还记得，当我们在五四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排斥日货时，当时代日本帝国主义销售日货的买办阶级，或明或暗，就从中破坏，反对我们的举动。我们再拿这一次广东的商团事变来看罢。年来因为国民革命的潮流日高，在各地都招了帝国主义的大忌。本年国民党的大会因时势所迫，在其新党纲上采纳了国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的两个要求，于是英、美帝国主义就发狂了，它们处处都想消灭国民党，消灭国民党的广州政府。（其实广州政府何尝是真正的国民党的，不过是几个新军阀、新官僚面子上拥戴中山先生的一个政府罢了。）另一方面广东的买办阶级也吓得魂不附体。于是广东的买办阶级就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组织商团，谋倒广州政府，压迫革命的工农群众，演成十月十五之大事变。这件彰明较著的事实教训我们是怎样？近来上海闸北商人又屡次呈请上海领事团，愿以该区（即闸北）划为帝国主义的租界，要求保护。当临城案发生时，上海及各地的买办阶级亦大为帝国主义抱不平，联电呈请美英大帝国主义共同管理“野

蛮”的中国。至买办阶级之对于军阀，有时间或打几个电报，主张废督，主张裁兵，但是他绝没有落到实际上去。到了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来要打倒军阀时，他反而与军阀合作了，反而帮助军阀来压迫革命者了。这是从京汉路罢工时，北京和汉口的买办阶级帮助吴大军阀压制工人的事实上和这次广东买办阶级勾结陈炯明军阀谋倒广州政府的事实上，可以证实的。本来买办阶级帮助封建军阀也是自然倾向：因为（一）他的主人翁，帝国主义，是帮助军阀的；（二）他在有些地方不能不利用军阀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买办阶级绝不愿意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他并且还要拥护帝国主义与军阀，他将是反国民革命的法西斯蒂。

但是有人说：商人阶级中如华侨曾经作过不少的革命工作，曾经帮助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一概抹杀。不错，华侨曾作过一些革命事业，但这是已往的历史材料。华侨在已往的历史上是革命的，可是在将来的历史上却是反革命的了，至少也不能说还能革命。这个理由甚简单，因为以前的华侨一方面受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需要一个自己的（阶级的）祖国来保护；他方面又积累一点原始资本想拿到本国来办工厂，同时又受了革命党人之排满宣传，所以他就来帮助革命了。但是华侨到了现在，一方面受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因为辛亥革命后华侨并没得什么，只觉空掷了无数金钱）；同时看见国内的无产阶级又稍稍抬起头来，他不唯不来像辛亥前那样帮助革命，反而觉得前途大有危险。我们试看从国民党改组，一部分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之后，在广东造谣言，最反动的很多是华侨，他们天天造谣说国民党赤化。所以中山先生在本年八月国民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闭会那一天演说道：“大家须明白，现在的华侨已经不是革命者了！”我以为这是中山先生深知华侨的一句话。

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比较独立，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比较得浅，利害冲突比较大，对于军阀之连年战争，骚扰地方，制造土匪，勒捐重税，妨害他商品的销路与原料的来源（如纺纱业因战争而商品停滞，原料来源缺乏，以致歇业者不少）。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业资产阶级在其客观的经济要求上，确有革命之必要。他恨不得赶出帝国主义，收回关税权，消灭军阀，建设他自己的政府。但是在事实上他的力量太薄弱。中国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其数量上太可怜。除了一部分纺织业的工业资产阶级外，我们数不出多少工业资本家。因为中国之新式大工业，一大部分是在帝国主义手里（如纺纱业，据一九二三年调查在全国已开工之总锭数为一·一〇六·八〇一，中国资本家占四九九·三四六，而外国资本家则六〇七·四六四；棉机共七·二二九，中国人占三·〇九〇，外国人则四·一三九。其余如矿山、电气业、烟纸工厂，等都是如此），另一部分则属官办（如制造厂、铁路……），所以真正私人资产阶级实占极少数。同时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发达得太晚，他现在刚刚走上工业的道路，正在打算

目前关于自己本身上的小算盘，哪里有工夫有气魄来管这广大无垠的政治革命大问题。至于要他公然出头来领导国民革命，来与最凶猛可怕的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宣战，这自然是没有的事。所以工业资产阶级近年来在各种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心理（如对于万恶的军阀仅打一个废督裁兵的空电报，对于帝国主义之协定关税，则只到帝国主义所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去请愿帝国主义开恩……），完全由于他的经济基础薄弱之反映。

但是有人说：“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的懦弱心理，自然不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这就是说中国此时资产阶级虽然懦弱，不敢起来革命，若等到了他发展成为一个大阶级时，换言之，等到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时，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起来革命，起来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了。这样的推论，未免有点机会主义罢。殊不知障碍中国产业发展的正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若帝国主义不推翻，军阀不打倒，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发展成为一个大阶级之可能吗？中国有发展成为一个大资本主义国之可能吗？这种很浅显的道理，我想谁也知道。并且这里还不要忘记了一种事实，就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时代，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很凶猛地向世界的资产阶级进攻了，不能容许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很平安地发展他的资本主义了。即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发展的可能，恐怕那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又要取而代之呢。所以现在无论哪一国的资产阶级都有其后顾之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也是一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很愤慨其宗主国帝国主义之压迫，想起而革命，可是同时又望着站在背后的无产阶级，很狰狞地可怕。此种情形在现时之印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印度的资产阶级，在其经济实力上，本可反抗英国帝国主义，脱离英国帝国主义之羁绊。但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始终不敢起来以武力对抗英国，只想在英国帝国主义下合法的印度会议里多争几个议席，慢慢地改良改良，反不若一班小资产阶级之热烈的国民运动，还表现一点印度人民之浪漫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无产阶级如果起来（中国的国民运动愈提高，中国工农阶级的势力必然随之而扩大），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唯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他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由上说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如财政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商业阶级是绝对反革命的，工业资产阶级因恐无产阶级袭其后的缘故亦很有反革命之倾向），而革命的希望很少。（仅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较大。但必有旁的阶级来指导。）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宁非梦想。

(三)

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领导国民革命，但是谁能领导呢？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是工人阶级，究竟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怎样？

先看工人阶级的数量。在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的中国里，自然工人的数量是很少的。可是在同一情形之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比较起来，他的数量却已是不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确实数目，现在还没有可靠的统计可考，有人说一百六十万或云一百八十万（专指产业工人言）。然而这样的数目不甚重要，我们所要说明的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对比，究竟谁强谁弱。在纯粹的工业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数量与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发展成为正比例，这就是说有多少工业，就有多少资本家，就有多少工人。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个比例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上边说过，因为中国的大产业，如运输业中之航海业甚至内河中之航业、纺织业、大矿业以及电气业等，大部分操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即外国的资产阶级手里，这些资产阶级自然不属于中国。可是在这些企业下之工人，确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如几万海员，如开滦之煤矿工人以及在山东、奉天各地凡外国资本家所办矿山下之工人不下几十万，纺织业工人六十余万，这均是中国真正的工人阶级，而且是最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在另一方面如许多官办之企业，如交通部所属之铁路邮电等企业以及兵工厂、造船厂等，在这些企业里只有工人，没有资本家，因为资本家是政府，即现在之军阀。在这些国家企业下之几十万工人阶级，若拿来与资产阶级比，亦完全是多余的。以上的说明，完全是事实，这很可证明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强过资产阶级数倍。

我们再来看看工人阶级之觉悟力，即革命的要求。我们已知道资产阶级之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近者与军阀有关系者如财政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甚至一部分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的。可是工人阶级却与此相反。在外国资本家企业与官办企业下之工人，革命性格外地发展，格外地仇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这个完全是物质上直接冲突的反映。因为他们直接受外国资本家之剥削与压迫，直接受封建军阀之剥削与压迫，他们天天看见狰狞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拿着鞭子向他们打，他们一举一动都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严重监督之下。大家想，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不发生反动吗？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即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教训？中国一班智识阶级——大学教授、学生、普通教职员、医生、服务于公私机关的职员等，像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企业下所尝的这种“滋味”，他们能不能领会？我曾经同几个海员、唐山的煤矿工人和津浦铁路工人谈过几次话，我一提起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他们就咬牙切齿。他们历数外国人在海船上之怎样贱视中国海员，怎样不平

等地待遇；津浦路上之英国管理员怎样地刻薄，唐山之英国人怎样厉害，怎样地压制他们；管理铁路之官僚，怎样贪暴无耻，怎样地压迫工人。当工人罢工时或有什么要求时，外国人与中国官僚怎样共同阴谋对付，凡此种种都是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可惜我此地不能一一写出来。但是由此我们可知道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残酷的待遇，比中国任何阶级要迫切，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认识它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比任何阶级要明确，要深刻。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唯一客观条件、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且举几件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事实来看，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总同盟罢工，在这次罢工运动里，以六万海员居然霎时间能团结一致，并且奋斗经过月余之久，结果征服了极凶恶的帝国主义。他们当时那种奋斗精神，那种决战态度，那种持久毅力，是不是资产阶级所能望及？同年唐山煤矿工人与洋灰工人，亦五万人总同盟罢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经过很凶猛战斗，虽卒为英国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杨以德所压溃，然而中国工人阶级之奋斗，勇敢与牺牲的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亦于此可以表现出来。京汉铁路的罢工，当时工人竟以徒手而与武装的军阀决战，不惜牺牲一切，这种勇猛、奋斗、牺牲的精神是何等伟大！这是不是中国人民直接反抗封建军阀之破天荒的举动？此种伟大的表现，不仅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真正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并且证明了它已是世界革命之先锋队了。在最近广东商团事变上，更加证明买办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极端相反的趋向。其余中国工人阶级在各方面对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表现，都是极明显而极坚决的。这完全是由于它那种天然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客观条件所规定。反过来说，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的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我们讨论中国的国民革命问题，绝不要忘记了中国不是一个与人世绝缘的孤岛，它始终不过是全世界许多需要革命的地方中之一个地方。这一层非常重要，如果忽略了，就绝对不能懂中国的国民革命，将于中国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的信仰。现在全世界已经到了一个整个的革命时期，并且联成了一条整个的革命战线。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在非洲亚洲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被压迫民族对宗主国帝国主义的革命，即所谓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是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同向世界的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进攻，是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胜利，譬如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印度的国民革命还成问题吗？现在站在这两个革命——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当总指挥的就是已经无产阶级革命和国民革命成功

了的苏俄。它把它从革命中所获的胜利，无论是物质的、是精神的都尽力贡献于世界的革命者，可是参加中国国民革命的各阶级中，谁能够真正容纳此种贡献——尤其精神的贡献——即革命的经验呢？资产阶级吗？它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上已是反革命的嫌疑犯，它很有与世界资产阶级联合之倾向。所以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容纳苏俄之贡献，能得世界无产阶级之帮助，能吸收世界革命之经验，仅在这一点上，已能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绝对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现在还有两个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疑问，应该解释一下。（一）有人谓中国工人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满头脑还是宗法社会的思想，一切行动还不能脱离宗法社会的习惯，还不能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不错，这是事实，可是绝不能因此遂谓中国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因为工人尽管有宗法社会的思想，有宗法社会的习惯，但是一到了物质的冲突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真正冲突时，那些平时的什么宗法社会思想和宗法社会习惯，都失了作用，它依旧是最勇猛的敢死军。这是我们上边所举出京汉路工人等的流血事实已证明了的。并且工人阶级经过凶猛奋斗一次，它的阶级觉悟也就发达一次，它那宗法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也就洗刷一次。经过几次凶猛奋斗之后，不唯宗法社会的思想与习惯不成问题，而且其革命性、其阶级觉悟更特别发展。譬如经济落后、宗信社会习惯最深的俄罗斯之工人阶级（如俄国工人以前笃信宗教就是一例）。所以特别有革命性就是这个道理。何况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一样充满了宗法社会的思想与习惯，在这一点比起工人阶级来更是落后呢。（二）有人又谓中国工人在物质上不及资产阶级的雄厚，仿佛是应该随着资产阶级走的。这里我不明白，所谓物质基础，还是指如我上边所说之工人阶级的数量呢，还是指资产阶级钱多呢？如果是指数量上说，上边已答复了。如果是指钱多，那就未免滑稽了，那就只好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要革命了，因无产阶级生来就是没有钱的。然而俄罗斯的“穷”无产阶级却已革命成功了。可见“钱多”与“钱少”是没有问题呀！

（四）

国民革命乃是各阶级之合作的革命，除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智识阶级、各种苦力，甚至游民无产阶级。我们现在讨论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的问题，对于这些阶级的利益之趋向，就是这些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哪一方面接近，亦很可决定其领导者的地位。所以我们应把这些社会分子来分析一下。

占中国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群众，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农民群众不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国民革起

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何况中国的国民革命，农民本是直接的主人翁，即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得农民的帮助，才有可能。但是农民因为经济地位的落后，阶级观念的守旧，无论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国民革命，始终只能作一个主要的辅助阶级，而不能作领导者。但是中国的农民，按它现时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容易与谁接近呢？辅助谁呢？这里非常得明显，就是谁能真正打倒军阀，谁能帮助它反抗地主的压迫，它就跟谁走、辅助谁。因为农民近年来因军阀连年战争，苛捐重税，逼迫到了绝路，所以农民此时之恨军阀已深入骨髓。我们只看惠州农民之反对陈炯明，湖南农民之反对赵恒惕以及陕西农民之暴动等，就可知道。另一方面因军阀重苛地主，地主则复嫁之于农民，于是农民之恨地主、反抗地主亦在所发现（尤以广东为甚）。但是农民反抗军阀、反抗地主，资产阶级能够帮助他们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并且有许多资产阶级同时还是地主呀。所以帮助农民反抗地主、反抗军阀的，只有工人阶级，这可以拿广东和湖南的事实来证明的。指导湖南衡州农民反抗地主反对赵恒惕的全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或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学生，指导广东惠州、海丰各地农民反抗陈炯明和该地地主的也是如此。并且我们看最近广东工团与农团之一切共同的主张与行动，反对广东的买办阶级陈家军阀，更可证明农民已经实际跟随工人阶级、辅助工人阶级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的农民必然是跟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挥。

手工业者更容易与工人阶级接近，因为他在经济上与工人阶级已相差不远（手工业者中之帮手已近无产阶级，所差者不过一为用手工具生产，一为用机器生产而已），所以手工业者之辅助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导，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譬如广东湖南的手工业者已很多与产业工人组织在一工会里。）并且手工业者不仅在国民革命上是工人阶级的助手，就是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上也一样的助手。

小商人在其性质上，较近于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处处都受大商人的压迫、排挤，而对于工人阶级倒反两不相关。在反对抽重捐苛税的军阀和贱视中国人（自小商人看来是如此）的帝国主义，他们又是必得要参加的。这样，所以小商人是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指挥。

现在来看智识阶级。智识阶级本没有确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确定的阶级倾向。它是依附着社会各种有经济地位的阶级而存在，所以它不能成一整个的阶级，只是备各种阶级的使用。在资本社会里，智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附属于资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它常是反革命的，如现时西欧各资本国里之智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属反动派。可是在中国却不然，除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军阀所雇佣、资产阶级所役使以外，差不多都有几分浪漫的革命性，它们大概虽是资产阶级的心理，但它们实受帝国主义的侮辱（在智识阶级看来），受军阀的冷视（军阀不用它）与摧残

(如学校学生和教职员之要求教育而被打被驱逐甚至被杀就是)，所以它们也很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很赞成国民革命，并且有时还很激烈地参加革命。但是谁能够领导它呢？换言之，就是它要在哪一个阶级的指导之下活动呢？这很难确答，但是我可以断定，如果有一部分的知识阶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深之智识阶级，即智识阶级之左派，它要成功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它必然要受工人阶级之领导，在工人阶级的意识的下去活动。(关于中国智识阶级问题极复杂，容当专著论文讨论。)

苦力，即各种夫役，黄包车夫等，它们在经济地位上，是极受压迫的人，光在这一点已很接近工人阶级了，自然是容易接受工人阶级的指挥。游民无产阶级，即青红帮，一切土匪和兵士等，这些群众确是中国一个大难题，在国民革命上亦很难对付。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他们只要饭吃，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给谁服务，不管封建军阀，也不管帝国主义。所以现时大部分之游民无产阶级都为军阀所利用，成了一种保证军阀卖国殃民之武器。其余的化为土匪，也是杀人放火，不分皂白。本来游民无产阶级是受外国帝国主义之商品侵掠而失业，受封建军阀之剥削与扰乱而更流落，可是它绝不能懂得这个道理，它很难认识到它们的真正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然而真正的国民革命绝不是建筑在游民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现时之国民党就是因建筑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以致不能成为革命的党)，所以游民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的群众上不甚重要，可是也有相当的作用，因为它也是被压迫的，有时也有用得着它的地方，不过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意识指导之下，才可以免除许多危险，才有相当的革命意义。

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姑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暗示与领导的。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五)

现在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客观的条件上，既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够作领导者，为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就不把这个革命，作成自己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因为：(一)中国工人阶级此时唯一的敌人并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二)在世界革命的意义，在中国革命历史进化的阶段上，中国工人阶级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第一步骤，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必经之路；(三)中国的各种社会阶级在国民革命的意义现时是能够受工人阶级之领导的，可是如果拿到无产阶

级革命的意义上就很有些疑问了，恐怕有许多分子马上就会变成反革命者。中国工人阶级，在策略上，为的大敌在前，消灭共同的仇敌，也绝不能使阶级过早分化，分去革命的势力。有此三个原因，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只集中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于国民革命之一个焦点上，以期消灭当前之大敌——帝国主义与军阀。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它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推动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〇七年说：“无产阶级（指俄国的）的积极责任，是在推动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革命到底而为其领袖。”接着他又说：“要无产阶级抓住德谟克拉西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以与专制皇帝和叛背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奋斗，在这种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见《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关系》，《列宁全集》第八卷四一一页）这是列宁主张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当时对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态度。当时的俄罗斯与现在的中国很有相仿佛的地方。所以中国工人阶级此时一方面应该起来作国民革命的领袖，推动资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到底。要推动这个革命到底，也就须抓住一切小资产阶级（自然最重要的是农民，而手工业者、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亦很重要），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反革命的一切买办的资产阶级奋斗，那时中国的国民革命才有达到目的之可能，中国的国民革命才不至于流产。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陈独秀

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当时所谓士大夫（即智识阶级与官僚），受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自康有为入北京上书变法救亡并设保国会，而翁派势力大张，翁康互相利用，结托清帝，遂造成戊戌变法的局面。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它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在这四个运动中，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不像什么西南“护国”“护法”都是南北军人间的互斗，不但没有民众参加，而且没有丝毫民族对外的意义。

“戊戌变法”运动，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种方法，其目的乃是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其动机乃由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而起。这次运动的优点有二：（一）当时所谓变法维新，较前此老维新派李鸿章等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鸿章等退为当时之守旧派。（二）当时之变法维新运动，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变化，即学术思想上也生了大变化。所谓思想上的变化虽然不出孔教范围，而因为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遂使孔教教义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张之洞叶德辉等之护教派。张之洞著《劝学篇》，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均以明伦卫道之正统自居，斥康梁为异端邪说。这种辩论，使远在此前

汉学派今古文之争扩大到政治上学术思想上普遍的冲突。

这次变法运动的弱点亦有二：（一）变法维新的内容，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因此，遂引起后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二）变法维新的方略，未曾在社会上坚筑改革派民众组织的基础，专思以清帝的威权行之，当时的改革派不但没有抓住社会势力，并没有看清包围清帝之亲贵——统治阶级对他们作战的力量，因此他们遂至为袁世凯所卖，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妥协性，使他们忽略了民众的组织，使他们忽略了革命的准备，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一次给我们的教训！

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反动，日甚一日。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国，尤其是北方穷苦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之生活困难与失业增加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外货输入）成为正比例。同时，清廷一方面对内厉行反动政策，一方面图结外人之欢心和缓其责难，保护外人及教堂之严令，纷如雪片地颁布到各县各镇乡。因此，遂逼成“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

思想简单的北方农民及失业的游民无产阶级，凭了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中日战争割地赔款，洋货充斥物价飞涨，教堂教徒势力薰天，政府因仿办洋学堂洋船洋枪炮等增加租税——这些多年的直觉，遂由白莲教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变而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恰当此时清廷反动的政局日趋极端，无论如何媚外，终不免外人借口要挟的责难，至外国容纳亡命的改革派，尤为清廷愤恨，及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延及直隶东三省，端庄毓贤刚毅辈遂思利用之以铲除外人干涉，以偿其尽量反动之大欲。

义和团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它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

义和团真正缺点是：（一）只是冲动的暴动之一群，而没有相当的组织，致一败而遂瓦解；（二）与反动派合作而为其利用，致失社会上进步分子的同情。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二次给我们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之失败，在国民运动上遗下两个极大的影响：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恶与昏庸，戊戌以来社会上所谓维新党，分化为立宪与革命二派，这是好的影响；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协性的知识阶级，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传，以排外为野蛮为耻

辱，损坏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精神，这是恶的影响。这个恶影响为害于国民运动至大，远及于辛亥革命一直到现在。

自义和团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宪与革命之辩论，纷起于侨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识阶级；同时，内地之商业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权利收回”运动亦轰然特起，最著者，若对俄之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若对美之粤汉铁路收回运动；若对英之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沪杭甬路拒绝借款运动，苏直鲁津铁路废约运动；若对法之滇矿收回运动，拒绝沪绍航权运动。若对比之收回京汉路管理权运动。吉林、河南、四川都组织了保路会，成了大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遍于全国，明明是针对帝国主义依辛丑条约向中国经济进攻之反抗。当时的革命党，应看清这乃是当时革命运动之唯一动力。

当时立宪与革命两派之争，前者是希望清廷的宪政来改造中国，后者是主张以革命的势力来改造中国，立宪论实在是当时一部分妥协的知识阶级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结果，也未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这并不是革命主张之错误，乃革命方法之错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力的煽动，并非是普遍地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行所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三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

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与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加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众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地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情态，并且还有一部分领袖有求助于更险毒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倾向。此倾向，发展到华盛顿会议时，更恶化了全社会。（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均因在“以武力和北方争地盘”的旧政策内，或更周旋于分赃的南北和平会议，并未看清中国革命之真关键——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国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势力，他们对于学生运动取了旁观态度，甚至有一二领袖还加以怀疑或非难。在北方的青年领袖们根本上没有革命性，不但临事脱逃，并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号：“读书求学不问政治”。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懦弱的知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四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辟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它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它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争斗或民族争斗，它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

自海员罢工至镇压商团反革命（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

日)。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罢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三月五日），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

在此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英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由海员罢工胜利起，至京汉路工“二七”惨剧止，这一年中，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攻时期。由香港广东而上海而长沙而萍乡而武汉，沿京汉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关，罢工与工会运动，轰动全国，使军阀官僚资本家侧目而视。

工会运动中，比较有力的是铁路工人，京汉京绥正太粤汉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组织，京汉尤比较得完备，而军阀官僚对之也尤为嫉视。

当中国工会运动最高潮中（民国十一年西历一九二二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镇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远东被压迫的民族进攻了。同时，新兴的直系军阀正抱了武力统一的野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之非难，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工之惨剧乃起。

“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七”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同时向工人阶级进攻，各省（广东湖南除外）工会或解散或改为秘密的小组，全国工潮一时遂低落下去。

广东虽无多产业工人，而一般劳动群众因为处在五六年来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统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会结社之自由，较之有强固组织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之大都市产业工人，反能发挥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国工潮低落之时，广东劳动群众不但能固守阵地，最近还能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得到了胜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实际上只是取缔华人，这本是对于中国全民族的耻辱。然而罢工抗议者只是被雇的工人与警察，商人毫无表示，而国民党右派党员，反有和英捕房勾结欺骗工人妥协者，幸而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并力持不妥协态度，香港

海员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者终至让步。

广东商团乡团，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最近各县商乡团且联合在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指挥之下，阴谋推翻孙中山政府。他们曾勾结国民党右派军人以罢市要挟政府发还了私运的枪弹。他们自己说后面有英人援助；他们自己说奉了曹吴的命令。他们居然以武力拦阻国庆日游行庆祝的市民，杀伤了工人学生数十人。罢了市不算，还号召各属商乡团集中广州，对政府及工人取攻势。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联合各校学生及陆军学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和商团对抗。孙中山因民众之奋起，遂毅然排弃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以武力击散商团军，没收其枪械。

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中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它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它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它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广东政府与国民革命

卫 金

卫君俄人也，此文系卫君于本年秋由广东考察归来，路过上海时所作，当时记者问彼以广东情形，卫君即以此文授记者，记者见其对于广东政局与国民党的观察，颇有独到之处，并且拿来与最近广东所发生的商团事件、右派反动等事实对照起来，更觉卫君有先见之明，今故特译之于此。

广东省人民有三千万以上，南临太平洋，有很大很重要的商埠和港口，历年以来早已成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从辛亥革命直到如今，中国的革命运动总以广东为策源地。段祺瑞在北京自任“狄克推”多时，勾结帝国主义的日本，解散国会，于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便到广东。民国七年非常国会成立于广州。孙中山努力要想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理想，或者以为这种理论在反帝国主义运动里可以号召全国人民——不论他们在经济上社会上阶级差别。可是实行上现在感着不少困难——理想不能即刻实现，自然而然使革命党不得不想着此中的物质原因和结果——中国反对世界的帝国主义而争自己的独立解放，本来确有物质的因果关系，不仅是理论问题。

广东的革命政局里，国民党自身早已有分化的现象——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决裂，便是一个分化的表现，这种决裂的结果，几乎危及孙中山的生命，而真正国民党的势力曾因此一度受打击于广东。

现在国民党势力恢复之后，一年半内，经营广东的经验，使革命党渐渐注意国民解放运动里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意义，虽然国民党中坚分子还没有坚决的意志和充分的经验，使革命运动的基础建立在广东劳动平民的利益上，然而大商买办阶级及宗法大农地主的反革命运动者必然要排挤孙中山总理及国民党中革命分子，不能与之并存的。

中国国民党的最初形成约在庚子义和团运动与辛亥民族革命之间，当时很足代表中国人民仇恨列强侵略及满清专制的革命心理——然而还不是真正的政党。这并不是根据党纲及策略相同而结合的革命的政党，而仅仅是一班热心的革命家，毒恨外族的

侵略及压制，并且热烈的愿意反抗，因此结合而成的团体。辛亥革命的时候，国民党能鼓动传播革命运动于全国，然而没有能依赖平民群众以巩固革命，更没有能以继续反对列强侵略的运动使革命事业扩大并深入。孙中山让位于帝制自为的袁世凯，这件事便足以表明当时国民党的性质。

经过好几年之后，屡次失败，国民党才渐渐得着政党的经验。十年前赞助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商人（上海、南京、广州）、南洋群岛的中国资产阶级，到了欧战之后最近两三年内，一部分已经对于中山及国民党不置可否，别部分甚至于有仇视的倾向。这是因为这些阶级和帝国主义——世界大资本家的经济联系一天一天的巩固密切起来。

再则欧战期内，中国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幼稚的工业无产阶级出现——立刻便和外国国内的资本家开始斗争。民国十年以来到处都有罢工，工潮曾经一度的高涨，直到去年二七的京汉屠杀，才告一段落。同时几千万农民从欧战以来大受经济的倾轧而破产，而土匪化游民化——农家手工业日渐消灭，欧美日本的工业品多量地输入中国，国内不断的军阀战争，这些原因都使农民不得不大破产，而发生所谓“土匪”——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

于是国民党重新陷入辛亥以前的地位——可是情势，虽然约略相同，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大变了。现在与辛亥以前相同的：（一）平民都很毒恨外国侵略及军阀的卖国；（二）中国的“高级人员”（军阀等）私通帝国主义卖国卖民。

确有为中国争独立的遗传性的国民党，可是一大部分和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有联系的国民党，能否脱离这些分子的束缚，立刻反对他们现在的卖国卖民的行为，而完全倾向劳动平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命运全系于此。

国民党及其广东政府的行为便是这一个问题的答案。

广东政府之军事问题

南方政府最紧要的职任，依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意见，是肃清东江的陈炯明——反革命党。陈炯明的根据地惠州，他自己是惠州属下人——当他没有背叛革命的时候，已经依据惠州，至少表面上他曾经为惠州人民及农民尽过“乡谊”，防御北军及土匪。以民国十一年起直到现在，他反攻孙中山和国民党，他渐渐地依赖惠州一带的大农地主。他的“政纲”便是广东自治和联省主义——这种主义恰好和广东的大农地主及大商买办相符合。陈炯明派的职志便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而维持一般市侩和土豪所需要的“安宁秩序”。因此他的军事战略——便不至于直接的和北京军阀政府、吴佩孚等相勾结或者直受他们的指挥，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不利用其反对革命，反对中山的军事势力。

英国在香港的政府用尽种种方法帮助陈炯明，可是也并不愿意他真能打胜孙中山。

现在的情形：中山逼不得不用全力以征服陈炯明，陈炯明也不得不以全力攻击孙中山——这种状况对于英国是非常有利的。一切运输机关——从广东到上海、汕头、厦门、福州，甚至惠州，完全在英国公司掌握之中。不但如此，香港及沙面的英国银行资本家还能操纵广东的金融。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中英国帝国主义很容易达到他的目的：延长战争——轻轻地帮助陈炯明而各方面阻挠孙中山。

孙中山及国民党很明了这种形势，知道陈炯明确是国民革命的阻力，所以认克服陈炯明是紧要的职任。可是这种职任却是很困难的。陈炯明虽然兵力单薄，可是他有他的根据——惠州一带的富农。孙中山的军队有许多，滇军湘军粤军各自独立不相统一，往往不听大本营的指挥和命令。假使其中有一军能战胜陈炯明，老实说，还算是孙中山的胜利——革命军的胜利，不过这种胜利总是对于陈炯明力量的一种打击。

南方政府因此注全力于克服东江，而且纯粹是一种军事上的筹划。暂时实在还没有去想方法使城市及乡村的贫民群众自动的加入这一种斗争。国民党改组之后对于这一种政策还没有切实采行。军事以及其他政策上，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明了平民的经济利益，同时对于大商及大农的“阶级觉悟”及“阶级组织”太不注意。国民党至今没有拿劳动平民的利益做根据——虽然它并不代表资本家及大地主。它只是不明了克服陈炯明的事业一大半还靠广东政府的民政政策决定，并不能专视为军事。这种民政或者使陈炯明有隙可乘以自失其根据，或者以是打破陈炯明使陈炯明的地域自有表同情于广州政府的人民。

国民党对于商人工人及农民的政策

军事行动只是革命政治的一部分，这种行动非以劳动平民的利益为根据不可——国民党不明白这一点确是一个根本错误。可是在现时状况之下，克服陈炯明的战争，至少客观上是国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最近设立军官学校，教练政治上有觉悟的青年军官，预备改良军队——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革命行动中的军事工作。可是在政治组织及行政方面却不不然了。

国民党在广东执政一年半以来，丝毫政治工作没有做，使在国民党之下能建立一个城市贫民的基础，对于农民亦是如此。恰正相反，广东工人及农民往往看着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束缚他们的国家机关。当这国内战争、国外侵略的时期，要满足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时候要满足群众必不可缓的要求，尚且实际只是件不可能的事。可是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它的政策竟使群众连它为平民政治权利而奋斗的心愿都看不见。同时，国民党对于大商大农向来没有一定的政策，而大商大农既有资财又有外国列强的暗助，于是日渐组织起来——劳动平民的政治及经济利益便因此极无保障。

国民党的这种政策——所谓左派的政策，不能说没有错误，大概这种错误的原因便在于不明了国民革命的政党的职任，不明白革命党对于民众应当持怎样的态度，怎样的代表并保护民众的利益。右派国民党更不用说了，他们完全只知道国民党未改组以前的旧习惯，那时大半是受商业资产阶级的影响，无意之中反映他们的利益。右派国民党现在已经不满意国民党的政策的模糊，竭力想它右倾，使它去代表富有阶级的利益，终至于与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右派的反对中俄协定便是一个明证。同时右派又反对共产党，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多得罪人”。其实要不得罪人最好是不革命。这种右派的势力在广东及广州很有增长的形势——这实际上是反对国民党的很大的危险力量——不在外面，而在内面。

国民党的左派，却尽以为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一种理想结合，一切不了解或误会，都可以说明解释——解放中国是国民党员的使命，哪里会有阶级利益的内部争执。所谓左派这样的糊涂见解却使国民革命更处危险地位。因此，他们对于右派的蠢动和广州奸商的刁难，竟不注意。因此，他们竟妄信左右派及共产派之间可以好言安慰免去冲突。因此，他们只知道形式上的要组织工人农民，而不懂政党组织和阶级的经济组织之间的大区别。

现在国民党的左派似乎已经看见中国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因为工业发展而日益分化。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从前的同道——商业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离革命而远去，渐渐反戈相向了。别一方面，农民渐渐觉悟要想组织起来以反抗土豪和市侩，工人运动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的新动力。他们很能说出这些新变化和新动力的意义，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应用这些新动力参加国民革命。最初他们的概念，便很简单——只要在工人中多得党员，那时一切工人运动和罢工运动便都能为国民党用了。这种机械式的联络工人——劝他们入党，当然不能得到国民党所预期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及国民党当然要另外设法接近群众。

很困难的很麻烦的改革：一步步从机械式的联络工人进于新的道路——直接影响已有的行会和工会。可是：第一，广东政府的行政应当使工人看得见政府确有帮助他们的心愿；第二，执政的国民党确乎能赞助工人组织阶级的经济组织。那时，国民党对于工会运动才能有真正的影响。这两点上国民党曾经做过不少的大错误——主义上策略上的原因都有。

上面已经说过，广东政府的注意全在东江，而饷源却要向广东的大商人去筹。于是广东政府便想尽方法要使大资本家自愿地献纳。实行上便成了这种景象：牺牲平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成全富有阶级的利益。大商阶级看见革命政府对他们这样态度，而且很明白此中的原因，他们便一天一天的胆大起来，自作主张的要逼胁广东政府。今年四五月

间，商人罢市要挟，很明显地表示：虽然国内战争非要有如此的财政政策不可，他们都不愿意出钱赞成了。当广东政府想抽酒饭馆及钱业的捐，他们便罢市，所谓商团——“纸老虎”竟耀武扬威地巡行广州市。广东政府不得已而免捐——商人便算打了一个胜仗。

从此奸商阶级日益放肆，他们向劳动平民的进攻渐渐蔓延全省——商团捣毁工会、攻击农民协会等。商人的这种势力也并非骤然表现出来的。半年以前，商人因为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十分“扰乱”他们的经济生活，自己也还没有力量，所以事事听从政府的要求。可是商人渐渐地觉得南方政府不大硬着，国民党的政策并不确定，便集中力量来对付国民党。所谓“纸老虎”——就是商团，逐渐成立，布满广州城内各处，并不服从政府的军警，全由商人子弟及失业军人组成——直到今年五月才成了真正的武装力量，专门只保护大商人和大地主。五月底商团开大会，政府代表和国民党都不能对他有什么动作。而帝国主义的报纸却称赞他是法西斯蒂式的强固组织，能保护“安宁秩序”。

现在政府和工人组织都不得不留意这一商团。可是国民党及政府对于这件事竟不明了它的危险，对于商人反抗革命政府的势头一天一天厉害起来，也不觉得。国民党以为只要东江战胜便很容易使大商阶级及商团取中立态度。疏忽之结果，乃至军械事件，商团和英国陈炯明滇军并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竟迫使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屈服了！

别方面呢，国民党虽然愿意得劳动平民的同情，极愿意在他们之间有势力，可是国民党以为军事未了，一切实际工作及经济组织都可以暂缓——“让他们晚些再组织工会罢！”工人阶级的群众因此便自然而然开始表示对于政府及某某几个官吏不满意的态度。广东工人大会在今年五月一日开会，延长至九天。工人公开地声言：政府不保护他们的利益。商人企业家和工人冲突的时候，警察总是帮着企业家；行会和工会实际上并不受政府机关的承认；商团每每毆杀工人，而政府不管；工会常常在恐怖状态之中——也许今天明天商团跑来捣毁。工人曾经正式要求承认某几个工会，而且要求武装工人，以防商团的袭击。国民党现在已经答应工人，帮助他们组织工团军，并且帮助他们的军器，然而实行上还没有看见什么成绩。

国民党现在还并不组织工人，确言之，即并不帮助工人组织阶级的工会，第一，因为他们不了解工人的阶级组织对于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第二，他们怕工人组织直接拥护自己利益的倾向。国民党员以为有国民党工人部，比工会更得力些；以为工人组成工会之后国民党对于工人的影响便小了。

国民党员大半不明了，不知道对于奸商应当有更确定些的政策；不知道赞助工人组织的必要；不知道假使国民党的政策，为着国民革命不但要求工人农民的一部分牺

牲，而且还要求资产阶级的牺牲，那时就丝毫都不用怕工人和手工业民众；不知道必须组织农民，先为防御土匪的袭击，进一步便可以反抗大地主。

我们想来，左派的国民党始终还未明白过来，而确定地倾向劳动平民。

有一点大概是绝无疑义的：国民党的左派是愿意反对北洋军阀——帝国主义的佣仆和外国帝国主义。他们也明白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苏联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历史上必然要联合的，他们或者也知道反帝国主义的最不妥协的力量便是中国的劳动平民，所以应当倾向他们，应当为中国民族独立建设这一个基础。他们也开始看出大商买办阶级及大农地主的卖国卖民的行为。

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断更换一种倾向劳动平民的新政策。

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

郑超麟

霹雳一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罗斯革命爆发，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的国家。从那时起，世界上的国家遂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二种。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营垒里，殖民地受了宗主国压迫、侵略，宗主国之间又为争夺殖民地而冲突，而一个国家中之许多民族间也因为种种利害关系无日不在互相倾轧、排斥之中。只这一个民族问题已够使资本主义寝食不安了。然而回顾社会主义的国家方面，则旧时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已与从前压迫人的大俄罗斯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中间也没有互相倾轧、排斥的现象了。正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底下做解放运动的中国民族应该从苏维埃俄罗斯各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取得经验，应该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彻底办法。

用强迫手段将无数非俄罗斯民族联合在“沙尔”的统治之下——这种过程，早开始于十六世纪了。俄国侵略的方向最初乃朝较无抵抗的东方民族发展，莫斯科以东的各民族先后都就了“沙尔”的轨范，直到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开始，西方诸国如芬兰、波兰等也都逃不了“沙尔”的铁网。十九世纪后半期“沙尔”帝国领土已扩大到全世界六分之一，“沙尔”帝国人口已增加到全世界人口十分之一。但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民族不是平等发展的，那里大俄罗斯民族是统治者，大俄罗斯民族利益是超出所有落后民族利益之上的。

据一八九七年统计，全帝国人口共有一二八·九二四·二八九人，所属民族分配如下：（但实际上，大俄罗斯民族自然没有这官厅的统计表所记那样之多。）

民族名称	人数（以千为单位）	百分比
大俄罗斯	五五·六七三	四三，三〇
乌克兰	二二·四一五	一七，四一
波兰	七·九三一	六，一七
白俄罗斯	五·八八六	四·五七
犹太	五·〇六三	三，九四

续表

民族名称	人数（以千为单位）	百分比
日耳曼	一·七九〇	一，四〇
立陶宛	一·六五八	一，二九
列多尼	一·四三六	一，一二
爱沙尼亚	一·〇〇三	〇·七八
乔其亚及其他	一·三五二	一，〇五
亚美尼亚	一·一七三	〇，九一
列支更	六〇一	〇，四七
赤城与赤格斯	四九一	〇，四二
沙尔特	九六九	〇，七五
乌支柏格	七二七	〇，五七
达支克	三五〇	〇，三〇
摩尔达晚	一·一二二	〇，八七
瑞典	三四〇	〇，二九
鞑鞞	三·七三八	九·九一
启尔基兹	四·〇八四	三，一八
巴斯季尔	一·四三九	一，一二
摩尔特瓦	一·〇二四	〇，七九
次瓦斯	八四四	〇，六六
服遮克	四二一	〇，三三
赤勒米斯	三七五	〇，二六
古尔德、波斯及其他	二四七	〇，一九
土耳其曼	二八一	〇，二一
宙尔季（西比利亚）	四四〇	〇，三五
无略特	二八九	〇，二二
雅古特	二二七	〇，一七
其余小民族尚无确数		

到了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帝国领土更扩大到二一·七四一·八七四平方启罗米突，人口更增加到一八一·一八二·六四五人。这样广大版图、众多人口的一个帝国，内部民族又那样复杂，已是很难统治的了，再看各民族经济、文化水平线之差异，尤其令人失惊。

在这帝国里，人类经济的、社会的发展之一切阶段都可以找寻出来：从应用最近发明的技术之工厂到应用原始耕种工具之农村，从共产党指挥下鲜明的劳资斗争到原始共产主义遗留带血族公社的组织都有。似这样一个帝国，又加以大俄罗斯民族中，地主、贵族、资产阶级之营私专权，自然落后民族愈不能自由发展，而影响所及又自

然使全国感觉不安了。

过半数非大俄罗斯民族，语言不同，文化习惯各异，与大俄罗斯民族同处在地主、贵族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沙尔”政府统治下，受了强迫的“俄罗斯化”和难堪的经济压迫，而所有独立反抗企图又都被哥隆克骑兵预先压抑下去，这些民族对于“沙尔制度”之深仇极恨自无待言了。

高加索民族五十年的独立奋斗，结果仍然被政府武力镇压下去，事后——往往有整个部落受军队驱逐出境送到土耳其去。波兰数次暴动也得到流血的结果。芬兰也是一样。其他各民族如犹太、鞑靼、亚美尼亚等之横被摧残，更不可以言语形容。被压迫民族在文化上也得不到自由，艺术上之含有种族情感的都被禁止，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字亦被屏斥于学校、社会和国家机关之外。此外政府于各民族，特别在东方，又实行经济的劫掠：这个“和平点做”，就是当地的人民要服从客居的大俄罗斯人，当地人民所占有的土地亦被大俄罗斯的地主和哥隆克兵靠着官厅的权威霸占了去，而且将他们驱逐到恶劣的、不毛的地方。政府这种行为是有二重目的的：一面遣送缺少土地的或简直没有土地的贵族、地主到弱小民族去，就可平他们的怨望；一面靠着这些分子在弱小民族中可以预防各民族的暴动。结果当地人民都失却经济的基础——土地，至于求乞与饿死。因此种种，各非大俄罗斯民族对于大俄罗斯人的关系，对于畜奴者的关系，永远充满了猜忌与仇恨，而各民族历史中，反对官吏等之暴动事件也就因此层出不穷了。

这种经济的劫掠到了中部工业开始发展时，更加厉害，亦以东方为尤甚。“沙尔”政府不但不肯提高弱小民族的文化、政治地位，而且还要以人工压抑这个文化、政治之发展，将弱小民族变成殖民地，供给大资产阶级的原料，而售其制品等。这个便够说明这些民族在种种方面何以还保存封建的、术士的势力在广大群众上头。举一个例来说，全俄一千八百万回教徒里头，据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调查受过中等教育的，只有三九四六人，即占全数四万五千分之一，他们又差不多完全是有钱人的子弟，至于受过高等教育的那只有一九〇人了。

在这个状态之下，所以无产阶级反抗“沙尔”制度的运动一起，被压迫民族即刻风起云涌拔刀相助，最初只是文化比较提高的西方诸民族，如波兰芬兰立陶宛等，特别是各该地的无产阶级，但其后多数落后的东方民族也参加这个运动了。

蛰伏在“沙尔”政府威权之下的民族运动，到了二月革命发生，“沙尔”政府推倒之后，遂一发而不复歇。旧俄境内各民族都各自组织“民族苏维埃”，各自提出“民族自决权”去抵制“沙尔”政府遗传给临时政府的侵略的民族政策。但可惜这种“民族苏维埃”的指导权那时却落在各民族的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上流人”、绅士手里——他们自己刚从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即自信以为可以支配本民族中的一切，

殊不知全俄劳动者革命努力之企图却超出他们想象力之外了。各民族中这般“上流人”们，不但要支配本地劳动者，而且时常表现他们的帝国主义倾向，侵掠邻近较落后的民族之野心。鞑靼的资产阶级，假托联合俄国境内回教徒口号，在卡站组织一个“回教徒苏维埃”，谋并吞邻近的巴斯季族、启尔基兹族等。同样巴库也成立了一个“回教徒苏维埃”，要统一高加索一带。乌克兰和芬兰二民族的资产阶级也群向临时政府宣布独立，要自剥削本地的劳动者。结果在俄国全境内造成异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各民族的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冲突，一方面又因为革命前进，引起各民族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冲突。这是必然现象不足为奇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组织底下本没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之可能，以包含复杂民族之俄国，旧时秩序又完全是以威权维持的，一旦威权中枢即倒，新的有力的政府还未形成，各民族间关系之一塌糊涂自无待言了。

当时所谓临时政府虽然外貌承认“民族自由”，但实际上仍然完全没有放弃旧政府传下来的对于各民族之优“越权”，且进一步还想军事上发展，打通地中海交通，占领土耳其和小亚细亚。其实这也是必然的现象。俄国资产阶级当时已经是帝国主义者，剥削、侵略弱小民族乃是帝国主义生存之要素，不管临时政府如何发表保障“民族自由”之宣言，无论它说得比威尔逊十四条更是好听，但其生存条件迫得它对于民族问题不得不取侵略的态度，但被压迫民族里资产阶级的解放要求无论说得怎样为全民谋利益，亦是笑里藏刀，别有作用的。“资产阶级老是提出自己的民族要求为第一个意义，而且无条件地提出，无产阶级则不然：民族的利益应该安放在阶级的利益之下。”懂得列宁这一句话，我们才能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之态度，才能知道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问题应取何种策略。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赞助波兰的民族运动，而反对克夫与南斯拉克的民族运动，这一点在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看来一定以为是矛盾的理论，殊不知当时波兰解放运动成功可以助长欧洲革命潮流，于无产阶级有许多益处，而捷克南斯拉夫运动成功不过替“沙尔”的反动势力张目呐喊，于无产阶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马克思即以无产阶级利益立足点来解释这个辩证法的矛盾，这个自非资产阶级政治家梦想得到。

俄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波尔札维克，早就应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处理民族问题了。

民族问题的讨论，在俄国党中，远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会议——一九〇三年——中，即因民族问题引起一场大辩论。当时犹太工会提议党的组织应该用联合会形式，以为犹太工人在俄国工人中有种种特殊情形必得另组织一种团体，再以团体资格加入俄党。其实犹太工会因受奥国社会民主党改良思想影响，

要在“沙尔”统治之下取得“民族文化自治”，自然是一种空想，但这个提议却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如果大会接受这个提议了，那无异于承认将带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割裂为许多民族的政党，以分散自己的势力。所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派——波尔札维克，列宁一派即坚持中央集权，竭力反对这个提议。结果大会拒绝了犹太工会要求，而另成立一条决议案：断定犹太无产阶级与其所在地无产阶级之密切联络是绝对的必要。唯有这个联络才能战胜一切爱国主义和反犹太人主义，改变犹太无产阶级与其所在地无产阶级现有的组织是不可能之事。这个决议一出，遂为犹太工会退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之借口，然而当时列宁一派的主张是极对的。

其次就是俄党与波兰社会党关于波兰独立问题之争执。波兰社会党根据国际承认波兰独立口号，以为任何阶级斗争，任何历史情况，波兰独立一个口号终须成为波兰无产阶级奋斗的根本口号，至于无产阶级本身解放，反是次要的事。这种丝毫忘却阶级观点之言论，不但受列宁的严重批评，而且波兰社会民主党左派，以卢森堡为领袖，也攻击这种谬论了。

但卢森堡更进一步攻击一八九六年国际伦敦会议提出的口号：“民族自决权”。据她的见解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已使波兰和俄国接近起来，如果主张分离这二个国家那就是反动行为，违背了客观合理的经济集中。其实她不知道“沙尔”政府的锁链打开之后，二国经济之接近不特不因之停顿，而且必然要更猛进呢。列宁曾做过许多论文驳斥民族问题中这种左派幼稚病。一九一三年波尔札维克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关于被‘沙尔’专制压迫的民族之要求自决权，即分离和组织独立国家之权，社会民主党应无条件地赞助之。”这个决议继续又说明凡有利于劳动运动之民族自决权与任何时间、任何条件的民族分离，有很大区别，不应混为一谈。在每个单独情形之下，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立足在本阶级利益上，斟酌当时状况来解决问题。

到了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正忙于对付乌克兰与芬兰事件，波尔札维克即于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开全俄会议对于民族问题议决：“在俄国版图内所有民族应该承认有自由分离与组织独立国家之权利。否认这个权利，或是不采用种种方法保障这个权利之实现，即等于保存占领与兼并的政策。唯有无产阶级承认这个权利才能保证各民族工人之完全一致，才能做到各民族之德漠克拉西的接近。目前芬兰与临时政府之冲突更加可以证明否认民族分离之自由势非达到直接继续‘沙尔’政府之政策不可。”这个议决案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既证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不能抛弃历史传统政策，同时又取得被压迫民族对于无产阶级之同情。

从波尔札维克党历来处理民族问题态度看来，可知它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其解决办法之主要点始终是民族自决权，直至于能自由分离和组织国家——因为当时

这种办法是唯一的利于无产阶级。这不单是十月革命之口头的主张，而且十月革命之后实际也就如此了。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各弱小民族的劳动者同情与赞助，而成功了历史上破天荒的十月革命。政权统归苏维埃以后，波尔札维克从在野的政党一跃而为在朝的唯一政党，向来对于民族问题之主张遂有实现之可能。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民族问题中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十一月二日发表一篇“俄罗斯民族权利宣言”，内有很重要的四条说：

- (一) 俄罗斯民族一律平等，一律有主权；
- (二) 各民族有自决权，其范围扩大至于能分离，组织独立国家；
- (三) 所有民族的、宗教的特权和界限一律废止；
- (四) 居住俄罗斯境内之民族小团和种族团体都有自由发展之权。

这个宣言就是后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或简称“苏联”）诞生之种子。那时有二个民族问题：乌克兰与芬兰之独立要求，曾搅扰得临时政府手忙脚乱，到了此时已很容易对付了。是年十二月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的分离权，同月又承认乌克兰民族共和国“有完全从俄罗斯分离之权或与俄罗斯共和国发生联邦关系之权”。这两个问题之解决就是苏维埃政府解决其余民族问题之模范。

此时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波尔札维克）已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了。但党里对于民族问题仍然有一部分人抱别种见解。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党开第八次大会——是最重要大会之一。会场上有人仍保存卢森堡的见解，以为“民族自决权”口号在社会革命时代适成了联合反革命势力的口号，而共产主义者是没有民族的。这种见解随后经过几次事变已从根本上推翻了，这完全是没有看到各民族历年反抗大俄罗斯民族心理之不易消灭，才发出这种见解。大会讨论结果仍然是列宁一派主张取得胜利。通过的党纲中，第九条关于民族问题如下。

俄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决定如下：

(一) 在根本上决定联络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共同从事于推翻地主及资产阶级之革命斗争。

(二) 旧时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为取得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信任起见，必须撤销任何民族团体所有的一切特权，主张民族完全平等，承认殖民地或低等民族有分离独立之权。

(三) 为同样目的，党提议将按照苏维埃制度组织的国家用联邦制联合起来，这是走向完满统一的过渡中之一最进步的形式。

(四) 关于谁是代表民族分离意志的问题,党站在历史的阶级观点上,估量该民族历史发展的程度——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或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到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等——然后决定。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旧时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特别注意、留心于被压迫或低等民族劳动群众中民族感情之遗留。唯有应用这个政策,才能创造一些条件,适合于国际无产阶级不同民族分子之真正坚固的、自愿的联合。这是许多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在苏维埃俄罗斯周围联合起来之经验所证明了的。

党纲这一条的正确性到了一九二一年党的第十次会议更加证实。但那时民族问题中又发现了二种不好的倾向:一方面是离开了共产主义走向大强国的、殖民者的、大俄罗斯的国家主义之倾向;他方面是离开了共产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民族主义之倾向,如大回教主义之类。后一种倾向实是前一种倾向之反动,根本上前者较之后者危险更大,因此前一种倾向不消灭即难于处置后一种倾向。到了一九二三年党的第十二次会议,这种倾向之表现更加显然了,大会于是乃成立一决议案重新声明四点:“(一) 坚决地否认民族关系中所有各种强迫的形式;(二) 承认民族处理自身之平等和主权;(三) 承认民族间巩固的联合只能建筑在协作的和自愿的原则上头;(四) 宣言此种联合只有资本权力推翻之后才能存在。”好在那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已经成立,每个苏维埃共和国中间关系得着恰当的规定,从此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营垒里已算完满解决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是俄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的民族政策之必然的结果,同时也即是世界政治经济的客观局面所必然造成的。这个联合成立之过程可分为二期:

第一期是各民族中阶级分化时代。革命以来,各民族脱离了“沙尔”的羁绊,解放运动遂风起云涌而来,但内部因为阶级利害关系,贵族资产阶级主张与大俄罗斯分离,劳动者则竭力要求同劳农政府携手,上面所举乌克兰、芬兰二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芬兰政府成立后,始终落在资产阶级手里,结果做了帝国主义走狗反对苏维埃俄罗斯;乌克兰则不然,独立政府成立后不久,即被劳动者暴动推翻了而另组织苏维埃的政府,联合于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其余民族中发生类此的情形很多。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往往利用从旧俄分离出来的民族反攻新俄,而劳动者执政的民族则反帮助新俄,以抵抗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这一点也可证明当代民族运动与劳资二阶级斗争是二件密不可分的事。在这个情况底下,自然每个苏维埃国家都感觉有互相联络的必要。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苏维埃全俄执行委员会决定联合大俄罗斯、乌克兰、列多尼、立陶宛、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从事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议决集中底下

诸部分事业：（一）军事组织和指挥，（二）国民经济苏维埃，（三）铁路管理和事业，（四）财政，（五）劳动人民委员会——为的是在一个总指导之下，便于一切的进行。然而此种计划，在反动潮流日甚一日之一九一九年是无实现希望的，果然六月以后上述诸苏维埃共和国，除大俄罗斯以外，都被那受协约国驱使的反革命先后推翻了！

第二期是苏联组成各分子之恢复及联合成功时代。红军战胜反革命，从一九一九年年底起，各苏维埃共和国开始恢复政权，各国中间联合的过程亦于此时开始。最初恢复的是乌克兰，其次接着而起的是亚裁倍裳、白俄罗斯，最后是二个高加索共和国：亚美尼亚和乔其亚——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至今终究走入资本主义国家营垒一边去了。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联合时机已经成熟，全俄苏维埃第十次大会上史大林演说，提出联络各苏维埃共和国为一个联合之三种理由：第一，对内的关系。（1）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结果共同感觉经济来源之缺乏必须合作，（2）历史上各民族间自然分工创成互相依赖状态，独立生存以求完满发展殆为不可能之事，（3）主要交通机关之统一在各国发展上有重大作用，（4）财政来源缺少，阻碍了我们的计划与节俭。第二，对外的关系。（1）因军事要求，必须联合战线抵抗多方面仇敌之进攻，（2）对外商业与外国资本接触，需要严密的统一。第三，苏维埃组织是国际的，应该尽量发挥劳动者团结精神。史大林报告取得一般同意，结果成立一个决议案：定出组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的计划，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召集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到了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公布宪法（译文见《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为被压迫阶级、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之“苏联”从此诞生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由四个共和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亚裁倍裳、亚美尼亚、乔其亚）组成起来。各共和国领土、人口分配如下：

国 名	领土(以千平方瓦斯特为单位)	人口(远东除外)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	…………… 一七·七四七	…九六·三三七·四八五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三九三	…二六·〇〇一·八〇二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五二	……一·六三四·二二三
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	…………… 一六九	……五·六八三·七六七
总 数	一八·三六一	一二九·六九七·二七七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互相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国家旗鼓相当之后，于是在其面前即横着二个问题，即：对外如何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援助其余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解放出来；对内如何提高落后民族之政治组织的、经济的、文化的水平线，以筑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之根基。而对内问题尤其难于解决，因为各民族种种方面相差太远既如前所说，如欲均齐发展自非待以时日不可。现在将苏联在这范围内所已做的工作，略述于下：

政治方面，即国家组织方面。按照各该民族情形组织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内容不必尽同，譬如大俄罗斯的苏维埃制度，绝不是土耳其斯坦的苏维埃制度之类，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性是很充分的，管理指挥的人大半是本地人，语言相通，又熟悉该地风俗习惯及人民心理，他们发达和巩固适合于该地情形之国家，然后将几桩重大的事业如外交、军事等，交给联邦政府支配——所以联邦制度是在这个过渡时代多民族的国家中最良好的国家组织。

经济方面。苏联内部各民族经济发展太不平均，大约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一部分及亚裁倍裳、亚美尼亚一小部分虽程度有差别，但总算是经过工业资本主义的。这些民族总算起来有三千五百万人。其他许多民族如乌支贝克、亚裁倍裳之大部分，鞑靼、巴斯季尔等简直没有经过工业资本主义，其中有时即许有资本主义痕迹也不过是商业资本主义罢了。其余还有一千五百万人之许多民族还在农业社会，现在也不过开始从游荡状态过渡到固定状态，还保存着血族公社组织遗迹，如启尔基兹、土耳其曼、赤城等。此外还有更落后的许多民族，如北部西伯利亚野人。在这个状态之下，要把这些复杂经济提高至同一水平线上，现时殆为不可能之事。苏维埃政府任务在乎于农业地域恢复灌溉的经济；于半游荡半固定地域则从事于地质改良，使该地民族的固定经营农业；铁路、电线之扩大也是提高落后民族经济之一法，至于提高这些民族之工业，苏维埃政府已实行迁移工厂到经济落后地域去，同时又可接近原料产地免转运之劳了。

文化方面。这些民族文化程度之差异亦极可惊。在土耳其斯坦、启尔基兹等地，以前差不多没有一个小学校，没有一家报馆，全俄帝国中不识字的人异常之多，但经过最近几年政府在文化上的努力，现在已大不同了。在中央设有“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全俄东方研究协会”等机关及旧时“东方学院”之改组，又成立东方与西方二个出版部，政府各机关也尽可能应用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在各地方，文化机关如学校、报馆、俱乐部、戏院、书局等，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怒发出来。即仍举土耳其斯坦、启尔基兹为例：现在已有几千小学、几个大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等，又有本地文字出版的种种日报、杂志及图书馆、俱乐部之类，而

启尔基兹城市不识字人的数目几乎从百分之百减至百分之五六·四——由此就可看出政府在文化上建设之成绩了。

经过了七年的破坏与建设之后，俄国境内诸民族已由被压迫、被侵略、被剥削地位变成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了。我们——还呻吟于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剥削底下的中国人，相形见绌之后应如何欣羨，如何效法呀！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民族问题这样解决，“只有资本权力推翻之后，才能得到。”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拿乌克兰、芬兰与临时政府之冲突来看就可证明，虽然“沙尔”权力崩倒之后，如果没有十月革命，这种冲突之结果不是大俄罗斯民族恢复旧统治权，便是各民族之分立成了“巴尔干化”。再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做例，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现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将也同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一样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争夺的目的地，如此即等于从甲强盗劫掠下逃走出来，而仍落在乙强盗的山寨里。此外如较强的鞑靼吞并较弱的巴斯季尔、启尔基兹，较大的乔其亚压迫较小的土耳其曼等种种事实，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也必定要实现的——总而言之，没有十月革命，俄国境内民族仍然逃不出帝国主义铁网，尤其是无产阶级要长远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今，地球之六分之一已染遍红色了，但资本主义国家的营垒里怎样？亚洲、非洲殖民地之痛苦较甚于旧俄诸弱小民族，而国际帝国主义手段之辣又远胜于“沙尔”的枷锁——这纯然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之一幅放大的写真。读过了以上所述苏联诸民族解放经过及其现状以后，我们知道是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它们，是俄国共产党历来所应用那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的民族政策解放它们，因此，我们断定只有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继续这个民族政策，才能解放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底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众。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列宁的提案早就指示我们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运动之意义及其解决方法了！

国民革命之土耳其

瞿秋白

(一)

土耳其的革命党，大家都知道，最初是“少年土耳其”党——虽然有人以为“少年土耳其”不成其为政党，然而它在土耳其革命史上，社会与政治两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当“少年土耳其”派是政党，本来是不对的。“少年土耳其”派自己竭力避免“党”字，仿佛中国人“朋而不党”的成见，唯恐人家说他们有党见。组织上他们是一个秘密结社，与中国同盟会同样带着“江湖性质”——最初叫做“统一进步会”(Ittihad ve Teraky)。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革命前，“少年土耳其”派并没有党纲。革命之后几个月方才定出党纲来，其中的模糊矛盾，简直比机会主义最盛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党还厉害得多。原来的立宪主义，变成了拥护《可兰法典》；原来的民族平等主义，变成了屠杀亚尔美尼亚人的民族自大主义。……并没有一定的政治纲领，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想望混而为一的化合物——土耳其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实际要求。

“少年土耳其”派的社会成分是怎样的呢？“少年土耳其”派是代表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可是仿佛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当时的土耳其还并没有现代式的资产阶级！何以如此？这却应当从土耳其与国外资本主义的关系说起。帝国主义用极细腻的方法侵入土耳其，占领它的经济生命。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外债。埃及、波斯、中国都是如此。克里米之役（一八五四——一八五六俄土之战），土耳其在欧洲借了二十次外债，于是它便成了英法德各银行的债务者。这些国债利率都非常之重，所以等到一八七六年，单是利息一项，土耳其便要付一千四百万土耳其镑，国家收入总数不过一千八百万。破产即在目前，不得已而转利归本苟延残命，其实如此便是利上加利，担负更重（一八八一年）。不久，便成立了外国管理土耳其财政的机关“鄂托孟国债管理处”(Conseil administration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好像中国的税务司似的——土耳其的烟酒盐税、渔业税、印花税都归它管辖。国债处的收入占了土耳其国库的三分之一。外国资本主义简直渐渐把土耳其国民经济的收入，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当时所谓

“鄂托孟银行”简直只存一个虚名，实际上完全是法国人的，而且独占土耳其的金融权，既是国家银行，又是商业银行。至于铁道的建筑和管理权，却又完全在德国资本家手里——所谓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便是总机关。每一条铁路都有所谓“基罗保证”，就是国家发行的特别债券——每一基罗密达铁道，债券上规定价值若干，如巴达铁路公司（Soci'ete Imp'eriale Ottomme du ch'emin de fer de Bagdad）收入国家所给“基罗保证券”每条值一万一千法郎，而实际上每一基罗铁路仅值六千至九千法郎。这些特别债券的利息又要许多租税去担保。土耳其的工业，也大半为欧洲某几个托拉斯所垄断，如烟业完全归法国公司“Regie de Tabacs”所独占；叙利亚丝业实际上为里昂几个丝茧公司所垄断；棉业发展得很快，不久便集中于希腊工厂家之手，一部分为德国公司“Deutsche Levantinische Baumwollgesellschaft”所占有；葛腊克黎（Geraklee）的煤矿是德国公司的财产，荷北（Hope）的铜矿为德国工厂家所独占……并且，土耳其和列强订的条约，使土耳其丧失规定任何专卖之权及增加关税之权——亦是协定关税制度。

外国资本家在土耳其有绝对的贸易自由，土耳其人反而受条约的束缚。土耳其财政部屡次想求列强批准增高输出税（从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十五）。可是直到欧战，始终没有成功。外国人呢，差不多绝对不纳租税，就是国内税则，不得外国政府同意，对于外国人也是不能生效力的。土耳其资本主义化了，可是土耳其在这种经济侵略之下，自己的工业资产阶级决无发生之可能，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当然亦是如此。三十三年英美德苏丹的统治，极端的专制更是一个助缘：全国布满五万侦探，“自由”“权利”“联合”等字眼都被禁止；赂买威吓，无所不用其极，不用说普通的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政治家、《Ikdam》报主笔亚黎基马尔（Ali Kemal）都被政府收买。对于异族亚尔美尼亚人等的残暴敲打或屠杀——当时的政治统治是如此。不但政治有这些阻碍，经济上也是如此：畸形的病态的苏丹有许多迷信，禁止建筑电话电灯电报以及采取地下的矿物，甚至于命令没收输入的机器——因为他怕这些东西都变成暗杀他的工具。

这种情状之下，工业资产阶级当然不能发展。可是，甚至于商业资产阶级都没有，这不是更奇怪的事吗？

普通总有一种唯心论的解释，说土耳其人天性不喜欢商业，《可兰法典》又有种种限制商业的条文，因此，对外贸易完全在欧洲人手里，国内商业又大半属于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国民——亚尔美尼亚族、希腊族等等。其实这完全不对。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市场之衰落。因为租税制度的苛刻，乡村人民简直没有购买力。田税向来是所谓什一税（Ashar），直到欧战开始时，抽取的还是物产，而不是货币，并且行的是包税制。

什一税不过是一个虚名，包税人的作弊和滥用职权，使什一税变成六一税或七一税；再加其他税捐——农人一年的收获，差不多只剩三分之一是自己的。基督教徒的异族人民，却大半居住在城市里，他们不担负物产税和国家的力役，而且受欧洲列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因此种种，基督教徒比土耳其人容易经营商业——实行那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而成商业资产阶级。这种积累资本的过程又常常是在土耳其国外进行的。希腊族和亚尔美尼亚族，因为民族上及宗教上的联系，往往侨居在希腊及俄国，他们在那里所积聚的资本，便输进土耳其的商业市场。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土耳其人对于亚尔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之后，昂纳托利亚地方发现了土耳其资产阶级，可是数量上这一资产阶级实在微弱得很。

土耳其既没有工业及商业的资产阶级，便亦不会有乡村的所谓贵族的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封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过渡阶级）。况且，摩罕默德第二时，王权统一的过程十分激烈：贵族大都被杀，田地早已没收，所以土耳其已经早已没有贵族及阉宦制度。固然，地主制度曾经复活，可是已经受一尊的苏丹的限制：田地享有每次只凭钦赐特权二十年——苏丹随时可以收回。因此，新的地主与田地关系少而与官职的关系多。他们的田地都不是自己经营的，而是出租给农民的。欧洲土耳其（马其顿等处）的田地制度却不同些：因为土耳其人征服东罗马时，对于东罗马人的封建制度曾经加以法律上的承认，经济生活没有起大变化，至今还保存着大地主和小地主。这种地主阶级与苏丹的关系密切，而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疏。一九〇八年革命时，他们反对“少年土耳其”派最厉害，便是一个证据。

土耳其的社会结构简直是一个金字塔——中间抽去了几层中介阶级，只有一顶一底：最下层是农民，最高层是苏丹官僚、半封建阶级以及西欧资本家。上下两层之间，只有弱小的基督教徒资产阶级。

（二）

然而土耳其国内的资本积累过程，在这种铁道矿山渐渐开发，消费方面渐渐的资产阶级化的社会里，决计不会不发现的。政治上经济上守旧力如此之强，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产生，于是产生一种假资产阶级，代行它的使命——就是官僚阶级。国内市场既甚衰弱，又绝对不能与西来资本相竞，土耳其社会之中只有官僚阶级能实行“资本之最初积累”。官僚阶级积累资本的方法，第一便是贿赂，上下相效，简直是家常便饭。商业工业金融业完全在外人之手，除出官署实在也没有可以积聚资本的机关。第二便是包税制，包税人的违法作弊，各级官员的朋分陋规，都是从农民身上搜括来的汗水，甚至于中央政府的大吏也参与其事。第三便是大吏所享有的钦赐田亩，他那三四层的田租，尤其是

剥削农民的工具。再则，第四，最重要的利源便是国债。每次国债成立，经手机关的官员最少得有千分之五的回扣，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法。一九〇三年一切国债转利归本的时候，所提的“手续费”竟占全数百分之五。一切租借地及军需品的订购等，当然亦有“手续费”和明的暗的回扣。靠这些来源发财的寄生阶级，人数是极其众多，当一九〇八年革命之后，“少年土耳其”派实行简政——单是国务院里一百四十六人中，便可以去掉一百人；财政机关里裁减一千五百人。可见土耳其的官职，在资本主义初期，简直和美洲的金银、非洲的奴隶对于西欧资本主义的作用一样。土耳其国内的“做官热”的原因，便很可以明了了。

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亦已经有了它的根源。一切资产阶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发展出来的。假使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带着官僚性质，那么，真正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小资产阶级，亦带着官僚性质——知识阶级的胥吏。十九世纪之末，因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土耳其内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欧化的政府机关，其中便不能没有新式的知识阶级。譬如军官和医生、电报官吏、国债管理处的簿记生及职员，以及其他欧洲式的机关或企业里的雇员。这些下级胥吏的生活状况非常之艰苦。新式胥吏常常受侦探的监视，每年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总有几个人充军到亚刺伯及非洲沙漠里去，或者直接送给军事裁判所。这种知识阶级很不容易找到职业，学校及法庭完全在回教教堂之手，新闻界又受政府严厉的监视。就是当胥吏的知识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不见得好：各官署都有世家盘踞着，位置高的都是八九十岁的老朽，各人又带着一大班亲戚私友。普通的知识阶级至多只能到第三等的位置。并且各官署欠薪欠得很久，每月十至十五利尔的薪水，因此还要抵押给高利借贷的资本家，自己往往只剩得百分之六十或五十，甚至于有只剩百分之十五的。一九〇八年革命时，军队都赞成革命——亦就是因为欠饷。

“少年土耳其”派的社会成分，便是这种失业的知识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化的胥吏阶级。实际上，“少年土耳其”派大部分是大学生，医科大学的尤其多。其次便是新军军官及军官学校的学生。一八九四年成立于巴黎的第一届的统一进步会的职员里，便有四个是军医学生。随后便有侨居外国的土耳其文学家及新闻记者，如摩腊德白（Murad Bey）等。一九〇八年革命中的重要人物：昂佛尔（Env er）及尼亚齐（Niazi）是少年军官；塔腊亚德（Talaat）是电报局的官吏……没有一个地主或资本家，甚至于一个商人也没有。“少年土耳其”派的社会成分是如此。所以一九〇八年的革命及随后的四次政变（一九〇八——一九一三）纯粹是军事暴乱（Pronunciamento），而没有普通的群众运动。固然不错，一九〇八年时昂佛尔及尼亚齐很受一部分农民的拥戴，然而只限于马其顿一带的回教徒。昂纳托利亚的农民，简直一直睡到欧战终了。至于马其顿的基督教徒，那却是尼亚齐的日记上说得好：“他们跟着革命，无非是为着将来担心，因为现在没有出路。”

基督教徒的资产阶级曾经经过一时的革命热潮，在一九〇七年的时候，当时有过一次巴黎大会，联合了土耳其十三个革命团体，其中包括“少年土耳其”派、马其顿派及达师纳克察康派等。可是革命之后，这基督教徒的资产阶级很决绝地转到反对“少年土耳其”派的方面去，成立了许多对抗“少年土耳其”的党派，如自由与和谐会（Hurriyetve Ittiliaf）等，有时简直和帝制派合作。至于地主和世阀，那就简直实行武装反抗“少年土耳其”派。

“少年土耳其”派的这种社会成分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怪的——本来差不多是纯粹的小资产阶级竭力想取得政权，以便于自己的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统治。

（三）

“少年土耳其”派的组织成分及社会根性既是如此，它的革命事业也就自然而然成一种大土耳其主义——鄂托曼主义、回教式的军国主义。民族问题上，“少年土耳其”派和帝制派并无何等区别；统一进步党的发起人纳齐摩（Nazim）博士说：“只要雅典或是苏菲亚地方没有人来宣传，我们可以给真正的自由。那时你们可以看见：我们就很容易同化一切希腊人、阿拉伯人等，而造成一个整个儿的土耳其民族，言语文字完全相同。而他们（希腊人等）自己也要很愿意地欢迎我们这种意思呢。”

“少年土耳其”派执政的时候，竭力实行这一民族政策。其实土耳其的民族问题非常之复杂，不容易解决。根本原因便在于：除昂纳托利亚地方以外，其余各区的土耳其族都是少数；阿拉伯、美莎伯达美亚、苦尔其斯坦、亚尔美尼亚地方，所有的土耳其人只是很少数的官僚兵卒，和当地的居民不相融洽的。而且土耳其人比那些异族的文化程度都低。这些地方的人看着土耳其人终究是征服者。所以他们的分权主义是很自然的现象，他们要求行政上的自治，以至于政治上的独立。帝国主义的列强，便利用这点，煽动小民族反对土耳其，其实是想瓜分土耳其。

法国对于叙利亚特别用工夫——它和叙利亚从十字军东征时起便已经有商业关系。法国每每以保护东方天主教徒为名实行侵略。天主教堂便是宣传法国言语及文化地方，每次政潮他们总在暗中指使。天主教堂上总插着法国国旗，教堂里礼拜的时候法国领事总占上宾之座。而且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法国借口基督教徒的被毆，占领黎房（Livan），宣布黎房是自治区，以基督教徒为总督，受列强的监察，当然第一便是法国。

当时的英俄，对于亚尔美尼亚亦是如此。英国利用新教徒，暗中允许亚尔美尼亚独立。可是苏丹割地供献之后（吉普尔岛），马上便食前言，所谓帮助独立，绝对没有再提。俄皇政府也和英国竞争。然而他们的独立口号——帝国主义的阴谋，纯粹是哄骗弱小民族的，因为列强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与弱小民族相反，不过一时的利用，比不

得各国劳动平民自由联合的要求，确是互助的经济基础。

“少年土耳其”派却因此矫枉过正，竭力遏止民族解放运动，根本否认他们的自由。因此，土耳其各民族更容易受列强奸狡的宣传。土耳其国内的各种革命流派，也因此早就自相冲突起来。

“少年土耳其”派的这种政策，纯粹是它资产阶级的根性。基督教徒既然大半是城市居民，而且垄断国内的商业市场，“少年土耳其”派执政之后，便首先剥夺苏丹所谕允的一切城市居民的特权。以前基督教徒不必服兵役，只要多纳一分力役税，如今便要他们实行军事义务，可是，又剥夺他们当军官的权利。小民族的反抗，三次都受“少年土耳其”派政府的惩罚——最后一次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对于亚尔美尼亚人的残杀。这种政策的目标，无非是要造成一整个儿的土耳其帝国——甚至于竭力禁止小民族学习自己的言语文字——这种大帝国便是土耳其资本主义发展所急需的。

大土耳其主义的宣传亦便根据于此。他们的理论，要从叙利亚到白史海尔，从俄国伏尔加河到地中海，建筑一邱尔民族（土耳其）的大联合。其实有些地方早已成异族经济的基础，他们却想生生的把土耳其资本主义强纳进去。

(四)

社会问题上“少年土耳其”派根本上是极反动的。革命以前，“少年土耳其”派里便分了两派：一派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派；一派是狭义民族主义的守旧派。守旧派的首领在国外是黎若（Risa），在国内是纳齐摩博士——实际上是统一进步会的中坚。他们看见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吓得不敢谈起私有制度的变更，“革命只是政治的，千万不可以变成社会的。”“少年土耳其”派得到政权之后，果然，立刻便竭力否认土耳其有社会问题。就只农地问题上在马其顿地方稍微有些改良，还是利于地主的。再则，便是欧战开始的时候，颁布了几条法律——允许法人公团享有田地和定了估定地价的规例。除此以外，什么社会问题都不准讨论。社会主义者符腊霍夫（Vlahov）在第一届国会提出扩大农民享用田地权的议案时，内务总长声明这个问题不能讨论——因为《可兰法典》禁止干涉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种反动意见常常得国会全院的赞同，不问议员中平时的派别。

劳动问题上，“少年土耳其”派的反动性亦是如此。当一九〇八年革命的时候，史汤蒲勒及史美尔纳等地方的工人都行同盟抵制及同盟罢工，反对西欧资本家和苏丹，赞助“少年土耳其”派的革命。可是，“少年土耳其”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之后，便将以前和工人及对手工者的一些儿关系完全断绝。一方面根于他们资产阶级的天性，别方面受外国资本家的逼迫教唆，对于工人简直大施虐政。第一届国会里便通过禁止工会的法律。

随后一切罢工，都受镇压，简直拘捕罢工首领，用军警屠杀工人。

农民问题上，他们既然不能除地主制的恶弊，劳工问题上他们又压迫工人，“少年土耳其”派的资产阶级性已经显然可见。他们设立了国家信用银行，许多官商合办的公司，大大发展投机事业。土耳其的军国主义，革命之后日益加厉（军费占国家预算百分之三十七），亦仍旧是因为积聚资本的来源，在于滥借外债和购办军需中的回扣及贿赂。此外，虚额领饷亦是军人资本主义化的一种原因。

“少年土耳其”派既然只代表土耳其的幼稚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狭义的民族自大主义，镇压基督教徒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及工人，他们便不得不与反动势力的回教的神权阶级合作。于是发现所谓大回教主义——真是民族自大主义的好工具，亦就是军国主义的护身符。君士坦丁重新出现“回教统一会”“大回教主义会”等，四处派传教师到印度、非洲去宣传，鼓动民族的宗教的恶感，酿成殴打屠杀异族人的种种惨剧。

（五）

欧洲大战之后，统一进步党（少年土耳其）已经消灭了。他们的首领都逃亡外国，而普通党员却融化成了国民党（Nationalist'）。国民党的社会成分是什么呢？它的资产阶级性是明显的。

一九〇八年的革命已经是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兴起。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又稳固了些，一班胥吏式的知识阶级都围绕着他们。欧洲大战中，土耳其一方面与西欧各国隔绝工商业的关系，别方面军需的购买运输又大大的增多。土耳其的工业家及大商人，彻底地铲除希腊及亚尔美尼亚人的资产阶级的势力，所以他们，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已经得到很巩固的经济基础。

欧战四年中土耳其资产阶级所接触的只是德奥资产阶级。可是德奥资本家所经营的，纯粹地吸收原料和运输军需品的勾当。所以德国人在小亚细亚大发展其煤矿和煤油矿，建筑罢葛达德铁路——纯粹为军事用的，其余便是兵工厂等。德奥的军国主义化，使土耳其对于他们不成其为一种销售工业品的市场，而只是军需品之制造及取纳的场所。于是土耳其自己的工业便得着发展的极好机会。譬如纱织、制履、家具、衣服等小工业都有相当的发达。虽然战事对于经济的恶影响也曾波及土耳其国内资本缺乏、技术程度很低，然而“少年土耳其”派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已因欧战而得施行。这期间土耳其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是无可疑议的。总之，土耳其本国工业的发达，商业机关的扩大，为政府经营食粮及购办军需——凡此一切都是资产阶级发生的原因。

农业方面亦是如此；战前土耳其的大农业不能发展，因为有美国和俄国的食粮输入，竞争太剧烈。战事一开，大农地主便独占了国内市场。同时，因为牲畜的减少及租税的

加重，小农及中农都逐渐无产阶级化，而田地便集中到盘剥重利的富豪或地主手里去。于是发生一种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富农、贩卖食粮的大商人，大半是包办军饷的。

塞佛尔和约重新使西欧资本在土耳其取得霸权，而且使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及希腊人做他们的商业代理人。自然，这种政策要引起刚刚巩固的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大反抗。战后发现的土耳其国民大会及昂戈尔会议的代表，商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胥吏式的知识阶级占百分之二十，回教师占百分之三十，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占百分之二。它的资产阶级面目是很明显的。

可是，他这种成分，也就是土耳其国民运动政治上散乱不定的原因。昂纳托利亚地方到处都组织“民权保障委员会”，确实是强有力的机关，而且是资产阶级独裁制的机关，联合社会上某几种阶级。这种国民运动，还绝对不成其为政党，不过是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团的暂时的结合。

国民运动的首领基马尔将军常常说：“分成党派是危亡的先兆”——他唯恐内部起政治上的分化。然而民权保障会里包含着商业资产阶级、农业贵族和神权阶级——已经怀孕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互相冲突的政治倾向。

土耳其国民运动的开始，它的政治上的方针其实和“少年土耳其”派差不多得温和。《世界裁判前之土耳其》一书（*La Turquie devant le Trildunal Mondial*），可以代表国民运动派的政纲，它说：“少年土耳其派同化小民族的政策是很正当的。不过少年土耳其派太不接近小民族，同化政策只要有极宽泛的自由主义与之相伴而行。”对外政策方面，国民运动派最早也是很温和的。他们想美国帮助，“主持正义”。直到君士坦丁国会解散之后，要引起民众实力的自卫，国民运动派方才开始“左”倾。

国民运动的领袖常常说赶紧要改良民生，甚至于说到社会革命。报纸上往往论“民权保障会”是和俄国苏维埃相同的。他们并且竭力联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如“绿军”及“哈勒絮摩腊”等团体。（“绿军”和“哈勒絮摩腊”其实是一个团体：前一个仿佛是社会党，后一个是它在国民大会里的一系——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及知识阶级。）

哈勒党虽然主张改良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然而决不是社会党。他们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于帝制主义者——因为他们与回教及苏丹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首领便是著名的大回教主义者汉都拉苏白希（*Hamdu la Sybhy*）。可是他们的党纲却能把大回教主义、狭义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甚至于那自成其为一种的社会主义都混淆一起。对于社会问题，他们的观点是：“本党根本的目的——为平民服务，务求普遍平等的福利，拥护他们当得的权利。体力及智力的劳动者——农民、工人、知识阶级、手工业者、教员、胥吏及下级雇员——这些人是人类真正的服务者……”对于经济上的对外政策很

有意思：“外债和租界都是侵蚀无权力无自由的平民的，简直是一条锁链，而且使资本家的剥削得以侵害并统治平民。”政治上的纲领便是各地方民选议会，议会主席就是当地的行政官。经济政策，便是“均无贫”三个字——没有地的人，由政府颁发田地。其余的条文都是社会空想家的乌托邦。可是，最有意思的，便是这党的领袖承认这些政纲都是合于回教的教旨的。

国民运动派竭力利用哈勒党是很明显的事实。他们利用左派镇压反动的右派气焰。同时，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共产党也成立了。国民运动派最初利用它，随后自己竭力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很激烈的主张，想用这个方法夺取共产党在民众里的信用。基马尔最初对于共产派十分表示好意，他写一封信给土耳其共产党首领苏白希说“为救国起见，不能不预先防止过分激烈的要求，恐怕要损害国民的统一和对外的抵抗力。因此，土耳其国民大会谨慎和缓地在这里实行社会革命”。双方策略上虽然不同，基马尔始终请共产党派代表团加入国民大会主席团，还声明自己在原则上（主义上）和政见上完全与共产党相同。不久，国民运动派竟设了一个“官办共产党”——大约是故意要破坏共产主义的信用。官办共产党表面上说遵从第三国际的政纲，却同时承认回教亦是社会主义的根据——因为“共产主义是宗教的德行的行善主义”。这一官办共产党的党员是政府派定的——大半是大商人、工厂家、著作家——如摩哈埃定（Muhaeginbey）等，向来否认土耳其有社会问题的！

国民运动派对于左派——哈勒党和共产党的好意，一直到他们自己地位稳固和战胜了希腊人之后才变更的。战胜了希腊，国民运动派渐渐有和协约国妥协的趋势，便想各种方法摧残左派。一九二一年初，忽然说哈勒党谋叛，因此便解散了它。同时对于共产党也实行通缉，苏白希一家和几位重要的共产党领袖逃向西部，就此失踪，大概是被人推堕海里淹死了。

于是所谓国民大会便日渐右倾，竟成了军政国家。据一个基马尔派的军官说：“直到如今，昂纳托利亚的民政，甚至于国民大会，都没有训练，没有纪律，大家不明白国家的公共利益。……所以基马尔要委任强有力的军人（菲夫齐）做昂戈尔国务会议的主席。”

国民运动派原来的社会主义，改善民生主义，到此便不谈了。仍旧又回到大土耳其主义和大回教主义去了。这是因为“少年土耳其”派又重新活动起来。当初昂戈尔地方不许他们居住，可是各省及乡间他们都有极大的宣传。等到一九二二年春天，内阁改组，“少年土耳其”派居然在内阁里得了四把总长交椅。

民权保障会本是自下而上地发生的，现在都消灭了，却变了军政独裁的统治。最初很模糊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相混淆的口号，如今也抛弃了，却变成了纯粹

资产阶级的党纲——战胜希腊及统一土耳其时的国民大会政府的性质，便是这样。

(六)

昂戈尔国民大会政府的政策，照上面的情形看来，决不会是很果决的、很一贯的。固然，国民大会曾经有没收回教教堂的田地、铁路国有、普及教育等的政纲。然而实际上国民大会的立法，仅仅决定了：叛国罪的意义及惩罚、国民卫生条例、禁酒条例、赦免法以及取消或否认君士坦丁政府的行动等的法令。至于真正的社会政策，可以说丝毫没有——虽然关于这一项的法令多至三百八十种。

土耳其国民政府已经经过了两个时期——就是上一节所叙由“左”倾而右倾的过程。

旧时代的土耳其政制本来太集权，而且官僚制度的流弊太多。国民政府初兴时，便首先打破这个集权制（一九二〇年）。国家组织以乡村为单位，每村选一民权保障会，这村委员会以次递选上去，直到国民大会的主席团。各级委员会在自己区域内完全有统治权，同时服从上级委员会。土耳其人每每喜欢拿民权保障会和俄国的苏维埃相比拟，殊不知，苏维埃选举有产业关系——工厂选举或工会选举，而且俄国的召回权完全属之于选民。

等到国民运动派的地位稳固了之后，这种革命式的政制，简直渐渐地消灭，官僚制度又复兴起来。一九二一年一月里在国民大会通过的根本法，限制各级委员会的职权，对外政策、国家经济、内务、军事全都归中央直辖；而且各省长官也由中央委任；再加上中央监察官制——简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集权的官僚制度。这便到了国民政府的第二期。

政制改变之后，地方上的政权完全到了资产阶级之手——富豪巨商反成了“国民运动”的中坚。最高的立法权及行政权完全归之于国民大会，“根本法”上说明只有国民大会能制定法律、改革政治，而且必须“根据《可兰法典》及民法，以时代潮流及民众生活为标准”。国民大会每两年选举一次，选出后再由国民大会选举内阁。

土耳其现时的财政，仍旧是很窘——战前每年有亏，因此借了不少外债。国家的经常收入有：什一税、地税、牲畜税、所得税等。军役税曾经废除过，现在又恢复起来，只利于资产阶级罢了。什一税的包税制也曾废除——国民大会曾经把这一种定作地方税，归下级民权保障会管理，可是不久又恢复了原状。其次，便是关税——收入却很多，对外贸易的输入税率定得很高——这是因为参加欧战的缘故——税则大约是值得百抽三十。至于特别收入，就是赔款和爱国捐。国家支出的现状，可以看一九二一年国民大会上通过的预算表。

苏丹府	551. 012 利尔
国民大会	982. 995
官吏薪水（及去年政府欠薪）	8. 056. 578
财政部	7. 527. 638
国家统计局	100. 000
海关	624. 639
国民大会主席及其职员	20. 368
内务部（及移民费）	4. 146. 842
宪兵及警察	6. 929. 868
邮电	1825. 071
医药卫生部	1. 120. 686
外交部	499. 296
可兰法庭	580. 801
民法法庭	2. 732. 301
教育部	1. 587. 618
交通	2. 103. 375
商业及农业	1. 879. 325
印刷及通讯	151. 187
国民防卫（海陆军）	15. 000. 000
总数	36. 519. 650

海陆军的军费几占全部预算之一半——防御帝国主义的进攻时，固然也不能不如此，可是宪兵及警察费也三倍于教育费，其余各部所得更少，简直不能有丝毫发展。

经济政策方面，国民大会竟能禁止外货的输入——只准原料机器及半制品输入，土耳其资产阶级因此得独占国内市场。对于农民的租税，却丝毫没有减轻——至于农地问题更没有能解决。

土耳其的农地问题是很奇怪的，“少年土耳其”派和“国民运动”派都说土耳其没有农地问题，“差不多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亚洲土耳其总共有—·八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罗米突田地，其中只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罗米突是已经开垦的——只有十分之一。可是，荒地虽如此之多，农民却尽着做人家的佃户，做国家的佃户。国有田地非常之多，私有田地确是很少，尤其没有大地主。然而：一则国家（政府）对于农民的关系简直和农奴制差不多——力役、物产税、额外征收，都是农民负担的。而田地的移让、承继，甚至于耕种使用，都很受限制。二则农地立法上并没有断绝产生大地主的可能，至少可以由富豪承租国家田地——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至于

小农所使用的田地，却都随时可以受政府的剥夺的。欧洲大战，英希的武力干涉，使农民丧失了不少牲畜和农具，完全用于军事。农民大半无力继续经营自己的经济——于是失地失业的农民一天一天的多出来，佃户多而小地主少，也是因此。

最高国民大会曾经下了一个“自由垦殖令”——没有人种的田地，农民得自由使用，不用出钱给田主；法律上不动产的规定也变更了些；贫农得无代价的斫取林木等的法令也颁了好几种。然而这不是积极的解决农地问题，却消极地避开它。同时，牲畜税增加了五倍；印花税以及其他间接税，增加了三倍——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是显而易见的。

土耳其以一“半自然经济及半神权制度”的国家而不得不行资产阶级的革命，当然，这种文化程度落后的资产阶级不会解决社会问题，以巩固国民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二年土耳其战胜希腊之后，土耳其国民运动派的资产阶级性便完全表露出来了。国民大会政府若要巩固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有赞助劳动阶级的勇气，不然呢，它和帝国主义妥协而牺牲民族及平民利益的时候快到了。

此篇根据克略仁（Kriajin）一九二三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做的——原文登在《新东方》第三期上。土耳其战胜希腊之后的政治变化，因没有材料，所以未及详论。

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

蒋光赤 译

——译自俄国斯大林所著之《列宁主义》——

从这个题目，我提出两个重要问题：一、设问，二、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

一、设问 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曾有过许多更变。民族问题在第二国际时代与民族问题在列宁主义时代，并不是一样的。这两时代间民族问题之差别，不但在范围之狭广，而且在内部的性质之异同。

从前，民族问题普通牵连到所谓“开化民族”的一切问题。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及其他欧洲的一些小民族——一切无全权的民族，第二国际对之很注意。至于几百万之亚洲人与非洲人，虽然忍受民族的压迫在极残酷的形式，也不值得一顾。白种人与黑种人、开化人与非开化人，不准列作一排。做出三个或两个宽泛的、又苦又甜的议决案，极力避去殖民地解放的问题——这就是第二国际行动家所能做的勾当。现在这种两面圆的、半截的态度，在民族问题上，可以说取消了。列宁主义揭破这种不合宜的差别，破坏白种人与黑种人及亚洲人与欧洲人中间之隔壁，取消开化人与不开化人之界限，而把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合在一起。并且因此，民族问题从局部的、国家以内的问题，转为共同的、国际的问题——转为被压迫国家与殖民地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

从前，民族自决的原则，时常被附会为民族自治的意义。许多第二国际的首领，居然把民族自决权改为文化自治权，就是被压迫的民族有权设立文化的机关，而把一切政权放在统治的民族之手。在这种状况之下，民族自决的思想，从为反对割地的工具一变而为保证割地的工具。现在应当把这种纷乱算为已经被清理了。列宁主义扩张了民族自决的观念，以民族自决权为被压迫国家与殖民地的民族之完全分立权，换言之，为民族有设立自己的国家权。如此，才免除纷乱的观念——把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自治权相混，或借民族的自治为割地的保证。如此，民族自决的原则，从为欺骗群众

的工具（当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社会爱国派以之为欺骗群众的工具），变为揭破帝国主义黑幕的工具，变为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启发群众的工具。

从前，普通视被压迫民族问题，为一纯粹的法律问题。高呼“民族平权”，宣言“民族平等”——这就是第二国际政党的能事！当在帝国主义之下，少数民族剥削其他多数民族而吸其血液，若高呼什么“民族平权”“民族平等”，这简直无异于对于被压迫民族之讥笑！现在这一种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之谬误，在民族问题中，可以说被揭露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天上拿到地下，以为仅宣言“民族平等”，而无产阶级政党不实际帮助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运动，那么，这种宣言简直是空话。因此，把被压迫民族问题转为实际帮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反抗帝国主义、争夺民族之真正平等与真正独立的问题。

从前，视民族问题，用改良主义的眼光，为单个的、独立的问题，而与资本统治、推翻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一切总问题不发生关系。似乎都默认：欧洲无产阶级之胜利无须直接与殖民地之解放运动联合，而解决殖民地与民族问题，可以慢慢地、自然地，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与对于帝国主义的奋斗。现在这一种非革命的观念之不当，又可以说被揭露了。列宁主义指示我们：帝国主义的战争与俄国的革命已经肯定了，就是民族问题之能解决，只有与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关系，而西欧革命之胜利，一定要借助殖民地之革命的解放运动，被压迫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奋斗。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问题之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一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如此的：在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运动中，所有的革命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没有？倘若未消失，则是否还有希望利用这些可能性为着无产阶级革命，而把殖民地与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预备军，转为无产阶级的预备军、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承认在民族解放运动之腹中，有革命的能力，并且可以利用这种能力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枢纽，帝国主义的战争与俄国的革命，完全肯定列宁主义的这个结论是不错的。

因此，无产阶级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应有实际的积极的帮助，是很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帮助一切的民族运动。我们现在所说的帮助，是帮助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而非巩固或保守帝国主义的运动。当某一个被压迫国家之民族运动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当然说不上帮助。所谓民族平权问题，非单独的、隔离的问题，而是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马克思在过去世纪之四十年代时，主张帮助波兰人与匈牙利人之民族运动，

而反对南斯拉夫人与捷克人之运动。何故呢？因为捷克族与南斯拉夫族在当时为反动的民族，而波兰族与匈牙利族为革命的民族。倘若帮助当时捷克人与南斯拉夫人之民族运动，则无异于间接帮助俄国君主独裁政体，使其益形扩张，而俄国之君主独裁政体为欧洲革命之一大障碍、一大仇敌。

列宁说：“德漠克拉西之部分的要求，如民族的自决，非是一个孤零的绝对，而是全世界德漠克拉西运动之一小部分。或者在某种状况之下，部分与总体相矛盾，则此时只可将此一部分牺牲去。”——录自《列宁文集》之十九卷中“讨论的总束”。

我们对于各个的民族运动之态度是如此的。各个的民族运动中有带有反动性的可能。我们估量这些民族运动的价值，应以其对于革命运动之利益为标准，而不要在形式上去观察它们。

我们对于普通民族运动之革命性，也要仔细地考察一下。自然多数民族运动各有自己的特殊的、相对的革命性，也就如有些民族运动含有自己的特殊的、反动的趋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环境中，民族运动之革命性不一定先要有无产阶级的分子，革命的或民主的党纲及德漠克拉西的基础。阿富汗皇帝极力图谋阿富汗的独立，在客观上是革命的现象，因为他的这一种运动能减弱帝国主义的势力，虽然他与他的属下的观念还是君主式的。如在帝国主义的战争时，一些“民主派”“社会主义者”“革命党人”及“共和主义者”——例如克伦斯基、雪德曼、亨德逊、乔尔诺夫——的奋斗（！）却为一种反动的行为，因为他们粉饰了、巩固了帝国主义的胜利。埃及的商人与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为埃及独立而奋斗，照着我们以上所说的原因，在客观上是一种革命的奋斗，虽然在埃及民族运动中，一切首领都是资产阶级的出身，虽然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可是同时英国的工人政府为保留埃及的不独立而奋斗，这一种奋斗却为反动的，我们莫要以为工人政府的阁员是社会主义者，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我不愿再说别的一切比较大的民族运动，如印度的、中国的民族运动。这些民族运动是向着解放的路上走的，就使它们有时破坏形式的德漠克拉西制度，可是它们对于帝国主义如一大蒸汽铁斧，能劈破帝国主义的头脑。

列宁的话自然是不错的。他说，估量被压迫国家之民族运动的价值，应以在反对帝国主义之过程中所得的实际的结果做观点，应视民族运动为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

二、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 解决民族问题，列宁主义以下几种情势为出发点：

A. 世界分成两个营寨：（1）所谓开化的民族，占有财政资本，剥削地球上之大多数人民；（2）被压迫的国家与殖民地之大多数人民。

B. 殖民地与一切依赖国，为财政资本所压迫、所剥削的，构成帝国主义势力的大

来源。

C. 殖民地与一切被压迫国家的民族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奋斗，是它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

D. 最重要的殖民地与依赖国，现在都已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不得不使世界的资本主义趋于恐慌。

E. 先进国之无产阶级运动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这两种革命运动的形式联合起来，共同向着共同的仇敌——帝国主义，奋斗。

F. 先进国之劳动阶级的胜利与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下的解放，若无共同的联合革命战线，是不可能的。

G. 联合革命战线，若无先进国无产阶级之极力的帮助——反对自己祖国的帝国主义，则也无可能的希望。

H. 无产阶级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帮助，意思就是要保障“民族有分立权”“民族有自建国家权”一切口号能够实现。

I. 这个口号不实现，则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构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上面之协作是不可能的。

J. 这一种民族的联合，仅仅能在各民族间相互友爱的关系上面发生。

因此，民族运动有两方面，有两种倾向：（1）在政治上，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完全独立的民族的国家；（2）在经济上，民族间实现经济的接近，构成统一的世界经济。

列宁说：“发展的资本主义知道民族问题之两个历史的趋向。第一——民族生活与民族运动之惊醒，反对任何一种民族的压迫，建设民族的国家。第二——民族间关系之日趋接近，消弭民族间的隔膜，建设国际的经济，政治与科学生活之统一。这两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公律。第一种趋势已经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就甚明显，第二种趋势则表示成熟的资本主义之转变，而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种趋势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若不剥削、压迫殖民地，则帝国主义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之使民族接近，只有用割地或霸占殖民地的方法，若非如是，则帝国主义没有意思了。

对于共产主义，则这种趋势为一件事之两面，为殖民地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之必然。共产主义知道：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上面之民族联合，仅仅在民族之互相信仰、互相调和时，才有可能。建设民族自由的联合之方法，只有经过殖民地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国家。

因此，我们必需极力向一切强大民族（英、法、美、意大利……）中之“社会主

义者”的狭义爱国主义奋斗，他们不愿意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愿意帮助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运动，不愿意殖民地分立成为独立的国家。

若无此种奋斗，则所谓训练先进国的劳动阶级，使之真为国际主义者，使之与殖民地的劳动群众接近，使之真正为无产革命的预备，都简直是没有意思了。倘若俄国的无产阶级从旧俄帝国所属之殖民地中得不到帮助与同情，则十月革命将不能成功，哥恰克与田尼庚等将不至于失败。但是欲得到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帮助与同情，则俄国的无产阶级必先打碎俄国帝国主义的枷锁，把他们从民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若非如此，则也就不可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真正的国际主义，建设民族协作之最好的机关——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为将来世界真正民族统一的活形。

所以我们要反对民族的闭关主义与被压迫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孤单主张，使它们要举起民族运动的钟，明了自己国家的解放运动与先进国无产阶级运动有什么关系。若非如此，则所谓被压迫民族之无产阶级政策及它与先进国无产阶级之阶级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毫无意思。至于国际主义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训练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劳动群众，使之成为真正国际主义者，唯有用这个方法。

列宁关于训练工人，使之成为国际主义者的工作，说：

这一种训练能在大民族中和小民族中，压迫民族中和被压迫民族中，都具体的是一样的么？

很显明的，不是一样的。到一个目的去，使民族间完全平权，完全亲近，应当要走种种不同的具体的道路。如一点在中间，大家向这一点走，无论从哪一方面开步，都是一样。倘若某一个强大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宣传民族之联合，而忘却了它的尼古拉第二、威廉第二或普恩费也想同小民族联合起来，用割据的方法，则这么一个社会主义者却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压迫国家中对于工人之国际主义的训练，其重心在于坚持被压迫国家之分立。无此，则无国际主义。我们有权力说，倘若压迫民族中之某一社会主义者不如此宣传，则为一帝国主义者，一恶物。这是一种无条件的要求，虽然在未实现社会主义以前，这种分立的情形是很少可能的。

反之，小民族中之社会主义者应把宣传的重心放在“民族自由结合”口号上面。他能不抛却自己国际主义者的义务，而主张自己民族之政治的独立，或主张加入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在一切情形之下，他应当反对小民族的闭关主义、孤独主义，应当主张部分的利益要服从全部的利益。

或者有一些人们，毫不对问题想一想，而以为大民族中的社会主义者主张“自由分立”，小民族中社会主义者主张“自由联合”，这是一种矛盾的现象。但是倘若我们略想一想，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联合，除开以上所说的，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

蒋光赤 译

——列宁在第二次国际大会之演说——

同志们，我现在要说的仅限于很简括的导言，然后同志马林详细向大家报告我们在草案中所更改的一切。他报告了之后，做附加草案的同志罗易演说。我们的委员会完全核准了略更改的原有草案及附加草案。因此，我们对于一切重要问题的意见都能够一致。现在我且略指出几点来，使大家注意。

第一，什么是我们草案中根本的、重要的思想？这是被压迫的与压迫的民族间之差别。我们特别提出这个差别来——与第二国际及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相反。在帝国主义时代规定具体的经济的事实，解决一切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不以抽象的理论而以具体的实际现象作出发点——这对于无产阶级与共产国际非常重要。帝国主义时代之特点，在现在的时候，在于全世界分成两部分：一大部分被压迫的民族，一小部分压迫的民族——占有巨大的财富与武力。差不多全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民族屈服于压迫之下，波斯、土耳其及中国虽然非完全殖民地，但为帝国主义的武力所征服，遂成依赖的国家。这一种被压迫的与压迫的民族间之差别的观念，不但在从前我所署名印出的草案上面，而且在同志罗易的草案上面处处标出。同志罗易的草案是以印度及受英国压迫的各大民族立论的，所以对于我们特别有意义。

第二个重要的思想：在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后的，世界状况之下，各民族间的关系，国际间的情势，是以一小部分与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国家的奋斗而规定的。倘若我们把这个忘却了，则我们将不能认清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虽然我们把话说得很远很大。只有把此点认清之后，共产党才能解决一切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政治问题。在第三层，我想特别将落后的国家中之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运动提出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争论。我们争论的是：共产国际与共产党应当帮助落后的国家中之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运动，在原则上是否是对的。在这种争论的结果，我们一致地把“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运动”改说为爱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每一爱国主义的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在落后的国家中之大部分的的人民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关系之代表。若以为落后的国家中之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农民运动不抱一定的态度，不实际地帮助它，而能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这实在是空想了。但是，若此处我们仅说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运动，则将扰乱改良的与革命的运动之分别。在近几年来，在落后的与殖民地的国家中，这一种分别非常明显，因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用尽力量，企图在被压迫的民族中，发展改良主义的运动。在压迫与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已经表现出亲近的现象，或者在多数的情形之下，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虽然帮助民族运动，而同时却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妥协，共同压迫革命运动与革命阶级。在我们的委员会之中，我们详细地指明，并且以为注意这种差别，而将“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语意改为“民族主义革命的”。这个改变的意思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帮助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仅仅当这种运动真正是革命的，且运动的代表者不阻碍我们组织农民和被压迫群众的时候。倘若没有这种条件，则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奋斗，反对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及附属于资产阶级的第二国际的首领。在殖民地国家之中，已经存在改良主义的政党，他们自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者。在我们的草案中，这种差别表白得很详细，我以为我们的观点现在应当比从前真确些。

此外，我还想将农民苏维埃提出一下。俄国共产党在过去属于俄皇下的殖民地中之工作（如在落后的土耳其斯坦），在我们面前放一问题：如何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之下，施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因为这些落后的国家之特点，就是在它们中还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统治一切，而绝对没有纯粹无产阶级运动的可能。在这些国家之中，差不多没有工业的无产阶级。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这些国家之中拿了并且应当拿着指导者的地位。我们的工作指明我们，在这些国家之中，要征服许多巨大的困难。然而工作的结果也指明了我们，虽然有许多困难，而还不能在群众中鼓起独立政治运动的趋向，虽然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工作对于我们比较对于西欧的同志更难，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指挥国家的工作。很明显的，在半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能够领会苏维埃组织的思想，而且实现之于事实。也很明显的，被压迫的群众，不仅受商业资本的剥削，而且受诸侯、国家的剥削，自然在自己的条件之下，也能适用这种工具——苏维埃组织的形式。苏维埃组织的思想非常简单，不但能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能适用于农民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关系上面。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经验还不大，但是当委员会讨论之时，参加了许多殖民地的代表，他们指示了我们：共产国际应当注意农民的苏维埃，因为农民的苏维埃不仅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工具，而且对于落后的、留存着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亦然。共产党及与共产党接近的分子，应当宣传农民苏维埃的思想在落后的国家与殖民地的群众里。共产党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竭力建设劳

动群众的苏维埃。

此地在我们面前，有很有趣味的而且重要的实际工作。现在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经验虽还不大，然而我们渐渐积聚了许多资料。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应当帮助后进国的劳动群众——这件事情是无可争论的。落后的国家之发展能跳出现在的状况，仅仅在胜利的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这些被压迫的群众以实际的帮助之时。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委员会曾作很兴奋的讨论，不但由我签名的草案而起，而且更由于同志罗易的草案。罗易此地将辩护自己的草案，可是对于他的草案已一致地改正了几点。

我们的设问：国民经济的发展之资本主义的阶段，对于战争后现在的落后的民族（正在解放的而且进步的）是否是不可免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倘若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落后的民族中实行有统系的宣传，而苏维埃国家又用所有的力量予以帮助，则以为经济发展之资本主义阶段对于落后的民族是不可免的意见，当然是错误的。在一切殖民地与落后的国家之中，我们不仅要组织先锋队的中心、党的团体，不仅宣传农民苏维埃组织的思想、趋向将它适用于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要规定一理论的原则——落后的国家因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帮助，能转入苏维埃的制度，经过一定的发展的阶段到共产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对此有些什么方法是必要的——提前指明是不可能的。自有实际的经验将此说与我们。但是这是规定的——最远的落后的民族中之劳动群众与苏维埃的思想很接近，而且苏维埃组织应当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关系。在这一种方向，共产党的工作应当赶快开始。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的革命工作之意义，不仅仅在于自己的国家中，而且在于被压迫的民族用以管辖殖民地的军队中之工作。

同志克维哥，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在委员会中曾说及此。他向我们说，普通工人以为帮助殖民地的被压迫的民众反对英国的主权，是叛逆，是卖国。不错，被狭义的爱国主义所鼓动的英美的工人贵族，对于社会主义为一巨大的危险，他们是第二国际的柱石。我们在此地见出附属于资产阶级国际的首领和工人方面的叛逆。第二国际的政党口头允许要革命行动，但是实际上帮助被压迫民众反对压迫者的行动，我们却看不见。这不但第二国际的政党是如此，就是有些已退出第二国际而愿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也是如此。我们关于这一点应高声地声明，并且不能为人所否认。我们看一看，将来有不有否认这种声明的尝试？这一切所说的都伏在我们决议案的原理上，我们的决议案虽然很长，但是我相信，它是有益的，而且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它能促进革命工作的组织与发展。

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 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

光赤 译

1. 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照着它的本性，对于一切平等的问题，惯抱着抽象的或形式的态度，对于民族平等的问题也是如此。在人类个性平等一标语之下，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声言无产阶级者与私有财产者、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暗地却以此欺骗被压迫的阶级。平等的思想本身是商品生产的关系之反映，它被资产阶级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工具，以人类个性绝对平等做借口。平等的要求之实际的意思，是在于阶级之消灭。

2. 为着符合我们根本的职任——反对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揭破它虚伪的假面具，代表无产阶级反对而且企图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共产党，应当对于民族问题，第一，不以抽象的或形式的原则为观点，而以历史的具体的，尤其是经济的情势为观点；第二，要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从普通全国民的利益的观念分将出来；第三，把被压迫的民族，不独立的，无法律平等的民族，同压迫的民族分开，而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虚诈相反——我们要知道这一种资产阶级的虚诈本是财政资本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性，资产阶级扰乱民族平等的观念，掩饰殖民地的受压迫。

3.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国主义战争，在各民族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面前，非常得明显把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虚诈揭露出来。这一次战争因布列斯立脱瓦和约与凡尔赛和约，指示了我们，胜利的资产阶级如何主张民族解放与民族自治，如何照着自己经济的方便规定民族的界限。对于资产阶级，民族的界限也成为贸易的对象了。所谓国际联盟——不过是一个保险证，胜利的资产阶级用之以为相互巩固在战争中的所得。恢复民族的统一及联合已经被让弃的地域之趋向，照着资产阶级的意思，仅是战败的民族对于新战争之企图而已。被破坏的民族之用人造的联合，一部分当然于无产阶级也有利益。但是无产阶级仅仅用革命奋斗的方法，将资产阶级推翻，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的自由与统一。国际联盟及一切战争后帝国主义协约国的政策，更揭露了这一

种真理，促进各国的，无论是先进国家的或是殖民地的劳动群众之革命的斗争，加速破坏了市侩式的民族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下，民族的平等与协作是可能的。

4. 从以上所解释的根本的原理，可以确定共产国际对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政策——要使各国家与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做革命的斗争，推翻地主与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个联合，才能保障对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若不推翻资本主义，则一切民族的平等与阶级的消灭是不可能的。

5. 世界政治的环境现在将无产阶级专政放在议事日程上面，一切世界政治的状况都集中于中央的一点：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而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应当将全世界先进的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及被压迫的殖民地的民族深信非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不可之解放的运动，统都拉在身边而指挥之。

6. 因此，在现在的时候，不可仅限于承认或宣言各民族劳动者间的接近，而必须使一切民族与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罗斯结一很坚固的同盟，且照着每一个国家之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每一个落后的国家之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而规定这一种同盟的形式。

7. 联邦制度是到各国家劳动者完全统一之过渡的形式。联邦制度在事实上已经表示出自己的适宜，如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对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及对于内部各民族的关系。

8. 共产国际的职任在这一方面，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用经验来研究、审察建筑在苏维埃制度上面之初生的苏维埃联邦运动。承认联邦制度为达到完全统一之一个过渡的形式，必须趋向最密切的同盟，同时又要注意：第一，无苏维埃共和国之坚固的同盟，则被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围绕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不能保持存在的；第二，苏维埃共和国间应有很坚固的经济同盟，否则为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与劳动阶级生活的改进是不能实现的；第三，建设全世界经济统一的趋向，在资本主义下已经表露出来，而唯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此趋向才能完成。

9. 在国家内部的关系之范围内，共产国际之民族政策，不能仅限于形式的，毫无实际上的价值的承认——一切民族皆是平权的。唯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为这样形式上的承认，仅限于形式上的承认。无论他们承认自己是否如此，或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总不能做到民族间的实际平权。

不但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在议会内或在议会外——要极力揭破资本国家破坏民族平权压迫弱小民族的黑幕，指示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宪法之无用。而且要：第一，向群众解释只有苏维埃制度能真正地给民族的平权，开始组织无产阶级，然后团结一般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奋斗；第二，一切共产党直接帮助殖民地民族及一切被压迫民

族的革命运动。若不如此，则反对殖民地民族之受压迫，或承认一切民族皆有自治权，不过是虚话而已，这也就是第二国际政党的政策。

10. 口头承认国际主义，而在宣传鼓动的时候，则暗代之以市俗的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这不但是第二国际政党中之普遍的现象，就是从第二国际退出的或自称为共产主义的政党，也有很多是这样的行为。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成见（这种成见在种种形式上表现出来，如人种的仇恨、民族的诬谤、反犹太主义）奋斗，且使之为重要的行动，则将一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支配世界的政治）改为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也为许多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支配世界的政治）之职任更迫切而重大了。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布承认民族平权为国际主义，而保留着（现在且不必说这种承认是口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自利主义。可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A. 一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奋斗要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标准；B. 无产阶级已得胜利，资产阶级已被推翻的民族，为着消灭国际的资本主义，要能有巨大的牺牲。

因此，在完全资本主义而有工人政党（的确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国家中，与投机主义的、市俗和平主义的虚伪（它们将国际主义的观念混乱了）实行奋斗，实为现在第一重要的职任。

11. 对于封建的宗法的关系还巩固之落后的国家及民族，便特别谨记以下之数点：

A. 一切共产党应在事实上帮助这些国家之革命的解放运动，帮助的形式应以该国家的共产党之力量为转移。压迫的国家之工人应当为积极的帮助，因为殖民地依赖压迫的国家之工人处甚多，关系也较密切。

B. 应极力与反动的、中世纪的神权阶级的影响（如传教会……）奋斗。

C. 特别要帮助落后的国家中之农民运动，反对一切封建制度的统治及遗迹；务使农民运动带有更革命的性质，将农民与一切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组织苏维埃，同时实现欧洲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同东方的、一切落后的、殖民地的农民革命运动之大团结。

D. 反对一方面反对欧美的帝国主义，而同时增加土耳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之大回教主义与大亚细亚主义。

E. 在落后的国家中，应极力免除非真正共产主义革命的解放运动纠染着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要帮助殖民地与落后的国家之革命运动，是欲使落后的国家之将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在自己特别职任的意识上，有所团结，有所训练。这一种特别职任是在本民族中与资本阶级德谟克拉西运动奋斗。共产国际在落后的国家中，应有时要暂时地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妥协或协作，但是绝不能与他们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虽然这种无产阶级运动或尚在萌芽的形式。

F. 在一切落后的国家之劳动群众中间，应极力说明，揭破帝国主义国家的虚诈——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被压迫国家中之特权阶级，表面上建设政治独立的国家，而在实际上，在经济、财政与军事方面，则全为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协约国的帝国主义与犹太的资产阶级勾结，主张光复犹太的故土，在巴列斯廷建设犹太国家——照表面上是很正大的，其实在巴列斯廷犹太人犹占很小的少数，若犹太国家建立了，不过是把亚拉伯人给英国剥削罢了，牺牲罢了。这实在欺瞒被压迫民族的劳动阶级之最好的一个例证。在现在国际环境之下，除了苏联而外，是没有什么救星的。

12.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弱小殖民地之时间很久的压迫，使被压迫民族中的劳动群众，不但对于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怀着仇视，就是对于压迫他们的国家中之无产阶级也没有信任。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各国社会主义首领之叛变，在“保护祖国”一个口号中，极力为自己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出力，压迫弱小民族，强掠殖民地，自然要增加被压迫的民族中之劳动群众对于压迫他们的民族中之无产阶级的不信任。消灭此种不信任与民族的成见，仅仅在先进国家里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消灭后，而且在落后国家里经济起了大变动之后，才可以达到。否则，这种不信任及成见，是不会很快地就消灭了。因此，一切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对于落后的民族间之民族的感情，特别要十分注意、谨慎，有时为着要消灭这种不信任，应当在可能的范围让让步。若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落后国家中之劳动群众没有自由统一的趋向，则对于资本主义之胜利，绝不能很迅速地完成。

附加议案：

1. 规定共产国际与被压迫而有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中的革命运动之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前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世界革命史现在正在经过这个时期，就是正确明了这个相互间的关系，成为一定的必要了。欧洲大战及其结果很明显地指示了我们：被压迫国家的群众与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世界的资本主义集中化了，例如大批的殖民地的军队与工人发送战场，参加战事，这实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有重要的关系。

2. 欧洲的资本主义吸聚自己的力量，最大部分是自殖民地的领土，而非自欧洲工业的国家。为着保存资本主义的存在，则必须要有宽大的剥削的来源，且对于殖民地的市场加以监督或管理。美国——帝国主义的首领，感觉生产过剩的痛苦已经有一世纪了。倘若没有宽大的领土做销售商品的市场与供给原料的来源，则美国的资本主义将久已消灭了。一方面把持非洲、亚洲无数万万的居民处于奴隶地位，而同时英国帝国主义也就把持住自己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之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3. 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之最重要的源泉。欧洲的无产阶

级仅仅在这种源泉完全消灭之后，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制度。

欧洲资本主义的国家企图恢复自己原有的状况，极力剥削殖民地的天然财富与人的劳动。因为剥削殖民地的居民，欧洲的帝国主义才能给予欧洲的工人中的贵族许多礼物，贿买他们。同时欧洲的帝国主义用输入自殖民地来的贱价货品的方法，减低无产阶级的生活费。资产阶级预备情愿牺牲在本国内所得的额外利润，而保存着从剥削殖民地所得的额外利润。

4. 一方面使殖民地分立，一方面在本国内起无产阶级革命，如此才能推翻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扩张自己活动的范围。共产国际应当与在被压迫的国家中之参加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有密切的联络。为着世界革命之早日成功，则必须此两种势力为共同的行动。

5. 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集合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是一军事的主体，应当团结全世界革命的势力。

为资产阶级文化所浸润的第二国际，却未度量到殖民地问题之重要。对于第二国际，则欧洲而外无世界。欧洲的革命运动与其他非欧洲的革命运动有相互提携的需要，对于第二国际是不明了的。第二国际的人物不但不与殖民地革命运动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而且自己成了帝国主义者。

6. 压迫东方民族的帝国主义自然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取消他们达到如欧美一样水平线的可能。帝国主义的政策，总是趋向于把持住殖民地的工业之发展。所谓土著的无产阶级（工业的无产阶级）之存在并不久。

土著的、地方的小手工业生产将位置让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集中的大工业，结果使大部分的人民迫不得已从事农业，而输出原料到国外去。在别一方面，我们看出土地很快地集中于少数资本家地主之手，使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数目日见增加。这些殖民地中之大部分人民，都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之下。这种政策的结果，群众反抗的精神仅经过极少数中等阶级的知识阶级表现出来。国外的压迫是妨碍社会生活之自由的发展之一大势力，所以革命之第一步，应推翻国外的压力。因此，我们帮助殖民地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不是赞成土著的资产阶级之民族主义的趋向，而是开辟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之一条解放的道路。

7. 我们可以看出日离日远的两种运动：一、资产阶级德漠克拉西的爱国主义运动，徒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的独立；二、贫苦的农工群众为着自己解放的运动，否认一切的剥削与压迫。第一种运动企图管理第二种运动，并且已很有成效。但是共产国际应极力反对这一类的管理，而促进殖民地的工人群众之阶级的觉悟。因此，殖

民地革命之第一步为推翻外来的势力，但是最重要而且必要的职任，是建设农工之共产主义的组织，使他们能够随手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因此，在落后的国家中，民众之到共产主义，并不经过资本主义之发展，而只要受先进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之指导，发展阶级的觉悟就可以了。

8. 实际的力量，殖民地解放运动之基础，并不囿于很狭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之民族主义派。在殖民地中已经存在许多有组织的革命的政党，并且与工人群众有密切的关联。共产党欲与殖民地革命运动有关联，应经过这些政党或团体，因为它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在现在的时候，它们的数量还不多，但是它们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引导群众向革命的路上走。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于殖民地中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有密切的关联，可以经过它们与一切革命运动以物质的、精神的帮助。

9. 殖民地的革命在初时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但是当革命的开始，共产主义的先锋就占在领导的地位，则革命的群众可以因渐渐所得着的革命的经验，而走上达到目的之正确的道路。倘若完全用共产主义的原则解决农民问题，则将成为很大的错误。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殖民地中之革命应适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纲，如瓜分土地等。但是这并不是说，革命的指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手里。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在最初的可能时，极力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建设农工的苏维埃。这些苏维埃之工作，应当如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之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一样，好为着绝对地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制度。

中国战争

列 宁

俄罗斯与中国战争，已告结束，为这次战争，调动了许多的军队，消耗了几百万金卢布，运送了整千累万的军队到中国内地，经过了许多的血战，得到许多的胜利——这种胜利，对于加入战斗的兵士，固然是没有什么称快的地方，更是对那班暴动的中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武器的中国人民，加以剿灭、弹击，无量的妇女儿童，都被惨杀、残戮，其苦何堪！至若农村、居民、商店之被蹂躏、抢掠的状况，更是不言而喻了。在这种惨淡情景之中，俄罗斯政府和政府所维持及靠政府以存在的各种报纸，还是无量的庆贺，并鼓吹这次战争的胜利，奖励这次军队勇敢的勋功，咸以这次欧洲文化战胜了野蛮民族为快，无不谓俄国“文明教化”在远东另开天地胜利之为愉。

几千百万先进的工人群众里面，于这庆贺喜悦愉快声浪中，曾未听有一个工人代表出头说话的声息。而何况这次出征所费的一切，都是为工人民众自己所负担的：从工人队伍中拿去许多工人，送到万里以外的疆场上，由工人群众中，增收赋税，以弥补整千累万无意识的消费。现在我们的不妨将这问题来详细剖析一下：社会主义者对此次战争应取如何态度？这种战争确是有益于谁？俄国政府所施行的政策有何种真正的意义？

政府方面还辩明自己，并没有与中国作何战争：不过是帮助合法政府，平定暴动、镇压逆叛、恢复治安而已。政府虽辩护没有战争，然事实上战争是已发生，而不能否认。到底中国人为何要排挤欧洲人呢？为何这个为英法德俄日……所平定的暴动，这样嫉妒欧洲人呢？加入战团的人说，是因为“黄种要仇视白种”，或是“中国人看不起欧洲文明的文化”之所致。中国人即许看不起欧洲人，但是他们所看不起的，只是某一种欧洲人，因为就太看起这班人们也没有多大益处。在实际上看来，并不是中国人普遍地看不起欧洲人——他们中间并没有何种冲突而是看不起欧洲的资本家和为资本家所豢养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榨取人家血汗，或者虚张自己文明的招牌去欺骗、抢

掠、刮削人民，或者为着自己得到贩卖毒人鸦片的特权而与中国挑战（一八五六年英法与中国之战），或者借宣传基督教义，暗中达到抢夺的强盗政策而到中国去的欧洲人，能使中国人看得他们起么？这种侵略中国的政策，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久已采用，现在俄国帝国政府，竟亦与他们同流合污起来了。这种侵略形式已变为殖民政策，即是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因环境关系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工业不发展而仍处于宗法社会状况中的国家，可以销售大批工业产品，而能取得丰厚利润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政府，为使国内资本家的顺利，宁使兵士在酷热地带去受饥饿，不惜民间集来百万的财富，不顾及民众的饥寒交迫而致于暴动之如何，只拼命的与各国尽量的挑拨战衅。我们犹记着印度土人反对英国的暴动以致印度大起饥荒和现在英人与蒲纳（非洲南部）民族所起战事之惨耗。

今日欧洲资本家贪欲的利爪，又伸入中国了，且现在力求满足私欲的俄罗斯，亦转入这个漩涡之中，并已割据中国的旅顺口，由俄兵保护，在满洲里公然建筑铁路。同时欧洲各国政府，相继而起，大家都热心来做抢掠中国的事，冲动了他们“分据中国”的观念，由是将中国的土地，或割据或租借起来，事实上就等于欧洲各国政府（俄国居其首位）已开始瓜分中国。可是他们瓜分中国不是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而是暗中作鬼牒小偷一样。换言之，就如同偷窃人家坟墓中的死人一样。假若这被看做死的人，稍有反抗的表示，他们就如待猛兽一般，烧毁其村落，驱逐于海洋，或将赤手空拳的居民和其妻子，弹射刀杀，毫不加以姑息。倒反还声称是应基督教的使命，来平服那些冒险来反对欧人的中国野蛮民族。占据了牛庄，屯兵满洲里，而俄政府于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致外国的通牒上面，还声称不过是临时的行动而已！“这不过是防备暴动的中国人复来侵略的对付方法而已。完全不是想图谋私欲的计划，图谋私欲，绝对非我帝国政府所采纳的政策。”

帝国政府真是可怜得很！它那样表白自己，是依教义毫无贪欲之念，而人家偏要没良心地侮辱它。它几年前那样没有贪欲心地割据旅顺，现在它又没有贪欲心而来霸占满洲里，它还想要无贪欲心地侵入中俄交界的中国地方，派许多工程师、武官和执事人，到中国内地，耀武扬威地压服中国人民，骚扰他们安全的生活，他们对于建筑铁路的工人，每天仅付给工资十戈比（等中国钱一角）——这不都是俄皇政府无贪欲心的表现么？

为何俄国政府对于中国采行这样神经过敏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到底是有利于谁？我们看得很明白的。这种政策仅有利益于少数与中国贸易的资本家绅士和为亚洲商场而生产的工厂主，以及最少数靠贩卖军器而能榨取厚利之军需上的执事人（现在几家制造军器和能藏军用品的工厂各处都加工制造）和在军民署内有高位的贵族。他们时

常希望有政变扰乱的机会，庶可乘机取利，或可借机以贪功而高其禄位荣誉。只要是对于这班少数的资本家官僚和奸人能得到利益的事，政府总丝毫不惜人民的生命财产，去替他们成美。所以现在的俄皇政府，不过是屈服于贵族资本家绅士阶级前之无身价的官僚政府而已。

俄国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从这次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得到了什么益处呢？无数的家户，均已破产，并将其担负家庭生活的男子，都强送到战场上去备战，国家消费及借债无限地增加，田税骤加几倍，同时使资本家及压迫工人的权威更加巩固，工人生活状况日形困苦，更以那些农民的惨死，及西伯利亚之饥谨之事实——都是这次中国战争对人民所造的福利！现在一切俄文出版品、报纸、杂志，均处于奴役状况中，没有政府里面官僚的准许，不能印刷各种真正的消息和写实的论文，因此我们无从得到这次战争惨祸人民的真相。但是我们能预料得到的，就是此次战争是消耗了亿万数人民所集来的财富，这是无疑义的。曾稍有露出来的消息，说有一次政府就提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卢布，而这种提出并没有公开报销的，此外平均日常消耗的战费在三四日内，约在百万金卢布左右。政府将大宗金币消耗于战事，对于饥谨农民的补恤，当然只好减少，使农民一个戈比都难得着，对于国民教育的经费，亦无款以维持，而政府反尽量剥削国立工厂工人的所得和邮局以及各国立机关的办事人的薪金，以补其不足。财政总长喻德说：在一九〇〇年正月间，在国库还存有现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卢布，现在均消耗于战争了，政府除所有的财富均消耗外，并已向外国借来大批债务，增加租税，而对于建筑铁路所需要区区不足之数还不能支出，则可见国家之财政了。快要破产的俄皇政府，它还公然取占领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是需要许多钱财，而有酝酿更大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已插足中国之各帝国主义，为分赃中国已开始冲突，谁也不能预料这种冲突的前途和结果。

俄皇政府对于中国所采行政策的内容，不仅只剥夺民众的财产，而且可以用此以迷惑民众的政治观念。

一切依赖军力维持的政府，时常离不了要用武力去阻止或抑制民众的反动，有时他们自己也明白这种反抗的民气，是不能以武力平定的，乃不得不想如何能用别的软和方法来抑消民众对于政府的不平，而激动民众向别一个对象去注意。如俄国政府激动人民仇视犹太人，即其例证：或用报纸上的鼓吹，以侮辱犹太人，或是说犹太人在同一政府之下，并没有觉得如俄国人这样了不起的压迫。……以激动俄人。如现在报纸又鼓吹，兴兵反对中国。加上中国人是“野蛮黄种”“仇视文明”的罪名。或是登载些什么“俄国的文化问题”，或是说些“俄国军队英勇战斗”，以惑民众。那班无廉耻的新闻记者，屈服于政府及金钱目的之前，乃故意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鼓励民众，轻视

中国。事实上中国国民，对于俄国人民，从来也没有何种不好的表示或排斥。他们同样也是受本国政府压迫的痛苦，中国的政府，也是同样从农民中榨取赋税，用武力平定一切求解放的行动。换言之，中国国民，也同样受中华帝国内资本势力压迫的。

俄国工人阶级，已开始脱除这种民众共戴的政治黑幕及隔膜，现在各个有觉悟的工人身上的责任，就是要以全力一齐起来，反对一切提倡“轻视他种民族”的思想，攻击愚昧工人自觉的敌人。俄皇政府对中国所采行的政策，是无人道的，是只顾欺骗、压迫贫苦民众的政策，俄皇政府现在不仅奴隶本国人民，而并且对于反对奴隶生活的被压迫民族，还要派人去加上他们一种压迫（如一八四九年俄政府干涉匈牙利革命）。俄政府不仅帮助资本家去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手足，使他们不能自己为自卫而团结，而并且派送军队为少数富人贵族的利益，去抢掠别的民众。为使战争不致再爆发而复来侵略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脱除将来的困苦，则唯有一法：集合国民代表，由真正国民代表去革除政府的权力，而另造一真正为全体国民谋利益的新政府。

弼时译自一九〇〇，一二，《火星》。

革命后的中国

列宁 遗著

先进的和文明的欧洲对于中国的改革是无兴趣的。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得到自由了，对于政治生活已经有觉悟了。可以说，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经由沉睡转到光明、活动、奋斗的路上了。

此事对于文明的欧洲是不发生关系的。甚至法国至今还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法国议员快要到国会去提出质问了。

欧洲这种冷淡的态度，用什么可以去解释呢？原来在西方各处都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统治，这资产阶级四分之三已经腐朽，对于任何一个野心家，只要争得反对工人“严厉”的方法及一个卢布有五个戈比的利息，都愿把自己所有的“文化”卖掉出去。这个资产阶级把中国只不过看成一块肥肉。这块肥肉自从被俄国“亲热的拥抱”一下之后，现在也许要被日本、英国、法国等撕碎了罢。

但是中国的改革却日见进步。现时正在开始选举国会议员——这是从前帝制时的第一个国会。众议院议员共六百人，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人。

选举权非普通的，亦非直接的。凡在二十一岁以上曾在该选举区内居住二年以上，或缴两个卢布以上的直接税，或有财产五百卢布者，均有被选举权。初选完后，再由当选者复选。

在没有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极幼稚的状况之下，这种选举已经表示出农民与资产阶级的联合。

中国政党的性质恰好也表示这同样的情形。最重要的政党有三：

第一是“激进的社会主义党”——这个党实际上就和我们的“国民社会党”（及十分之九的“社会革命党”）一样，一点什么社会主义也没有的。

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党。最主要的要求是：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向社会方面”发展工商业（这也就和我们的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所说的“劳动的开端”及“平均”一样的空话）；和平的保障。

第二个党就是自由派。他们与“激进的社会主义党”联合起来组织成国民党。大约这一党在中国的第一次国会内占大多数。其首领就是著名的孙逸仙博士，现在他正筹划扩张中国铁路（俄国民粹派须知：孙逸仙所以有此计划就是要叫中国“经过”资本主义的命运）。

第三个党是“共和党”——这是在政治上作骗人招牌的一个好标样。实际上这是一个守旧党，完全只拥护中国北部，即中国最落后一部分的官僚、地主及资产阶级。而国民党却是工业比较发达的、比较先进的中国南部的一个党。

国民党最重要的分子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其首领是在外国受过教育的知识阶级。

中国的自由是由农民的德谟克拉西及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之联合争得来的。不受无产阶级的党的指挥之农民，能否保持其德谟克拉西的地位去反抗那待有机会就偏向右边的自由派？这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出的。

仲武译自一九一二，一一，八，《真理》。

亚洲的醒悟

列 宁

中国是否早就以整世纪沉睡不醒的国家之代表而著名？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及德谟克拉西的兴起，好似大海波浪有一日千里之势。随着一九〇五年俄国运动之后，德谟克拉西的革命马上遍于全亚洲，如土耳其、波斯、中国等，甚至连在英属印度这种趋势也一天比一天增长起来。

革命的德谟克拉西运动，现在又行到荷属印度、爪哇及有四千万人口的荷兰的其他殖民地内，这倒是很有意思的。

担负德谟克拉西运动使命的，第一，是爪哇的国民群众，因为他们在回教旗帜之下已经组织国民运动了。第二，资本主义从气候化的欧洲人中创出一个本地的知识阶级，他们都力争荷属印度之独立。第三，许多在爪哇及别的岛的中国人从本国带了革命的运动来。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王拿味·斯坦对于荷属印度之悟醒，曾说荷兰政府之专制现在正受本国群众之反抗。

因此在革命未到以前，这个时期的普遍现象就开始了：联合会及政党极快地产生出来，政府禁止他们，因此反抗愈烈，甚至发生新的运动。荷兰政府因见“印度党”的章程及党纲中都有独立的话，所以在过去不久把它就解散。荷兰的“Dergimord”（顺便说一句，宗教派及自由派都是赞成他们的：欧洲自由主义腐朽了）在这里看出这是脱离荷兰的罪恶了！解散后的政党，自然改一个名称又复活起来。

爪哇也组织得有一种土人的国民联合会，有会员八万人，并常常招集群众会议，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增长是不能抑止的。

世界资本主义及一九〇五年的俄国运动把亚洲完全摇动了。几万万沉睡的人民醒悟过来了。他们从新生活的路上，从争人的第一步权利及德谟克拉西奋斗的路上走去。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应很有兴趣的很有精神的注意全球的及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之增长。欧洲的资产阶级因为惧怕工人运动的力量，于是与军阀、神父黑暗势

力拥抱在一块，替代这腐败的资产阶级而起的就是欧洲的无产阶级及亚洲各国的幼稚的却自信有力取得群众信仰的德谟克拉西。

亚洲的觉悟及欧洲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奋斗之开始，要占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篇幅。

仲武译自一九一三，五，七，《真理》。

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

列 宁

这几个字对看起来仿佛是不合理的。谁不知道欧洲是先进的，亚洲是落后的？但是在这题目的几个字里却含有苦的真理。

在文明的先进的欧洲，有极发展的技术，有极丰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宪法，现在却到了一种历史的时期，使资产阶级因惧怕那渐渐增长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不得不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的遗物。停滞不前进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停滞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以保存那动摇不定的雇佣奴隶。

在先进的欧洲，是拥护一切落后的东西的资产阶级在那里横行。欧洲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才是先进的，而实在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才是先进的。原来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在那里为争未来的幸福而奋斗，只有他在那里对于落后、野蛮、特权、奴隶以及以人消灭人的兽行保存并且扩充其仇视的对抗。

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活着的资产阶级预备拥护一切兽行、罪恶，想借此逃避快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的末运。

也许还可以举一个比较显著的例来证明欧洲资产阶级之腐败，如为了财政的分割及资本家利益的关系，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

亚洲各处现在都发生了德谟克拉西运动，并且日见扩大，日见巩固，那里资产阶级还与人民携手去反抗黑暗势力。几万万的人们都醒悟到新生活、光明、自由的路上去了，这个世界运动，使那懂得要到集合主义只有经过德谟克拉西的一般觉悟的工人们心中多么愉快呵！所有诚实的民主派对于幼稚的亚洲多表同情呵！

但是，先进的欧洲呢？掠夺中国，帮助德谟克拉西的仇人，中国自由的仇人。

这里有一篇简单的却又极有教训的小账。中国的新外债是反抗中国德谟克拉西的，因为欧洲帮助袁世凯，他原来是预备实行军事专政的一个人。欧洲为什么帮助他？就是因为可以分点利润。中国借了二万五千万卢布的债，然而却按照八十四卢布为一百卢布计算，这就是告诉我们欧洲资产阶级给中国人二万一千万卢布而从中国那里却要

拿二万五千万卢布，你看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得到一千五百万的纯利，实际上，这是什么“纯”利呢？

但是假使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债呢？中国是共和国，假使国会大多数也不承认呢？

呵，那时候先进的欧洲就要大声疾呼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及“祖国”了！那时候它就要装着大炮，与野心家、黑暗势力的好友袁世凯联合去压迫这“落后亚洲”的共和国了！整个统治的欧洲，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与中国的一切黑暗势力、复古势力联合。

不过整个幼稚的亚洲，换言之，即亚洲几万万的劳动者也有最可靠的帮手，这就是一切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抑止他的胜利，这胜利将把欧洲亚洲的人民都要解放的。

仲武译自一九一三，五，一八，《真理》。

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

郑超麟 译

——托洛茨基在“东大”第三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说辞——

现在所有政治的、文化的运动，都是与资本主义有关的，都从资本主义因缘产生出来的。但所谓资本主义，浅显地、斩截地说，是有二种不同的面貌：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英吉利算是宗主国的模范形式，它在某种时期能成功其所谓“工人政府”；东方诸国则难找得一个国家做殖民地的模型，形式上举出印度来代表殖民地罢，但如中国，虽外貌还保存自由，然其国际地位与发展步骤仍然属于殖民地之国家。英国是资本主义的模范国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伦敦观察了最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著成的。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也一样地发展，但那里不是从自己的萌芽里开放出来，而为外国资本之侵入。因此就造成了二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为什么麦克唐纳尔那样顽钝，那样保守，那样狭隘呢？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的模范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在英国是有机地、一步一步地，从手工业，按照进化道路，经过手工工场，才发展到当代工业，所以昨日的成见，前日的成见，过去一世纪、二世纪的成见——这些世纪的渣滓，我们都可在麦克唐纳尔的天灵盖中寻得出来。

这里就有一个矛盾现象出现，即马克思为何产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较落后的国家——德国，列宁何以产生在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欧洲较落后的国家——俄国？这的确是个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偶然，是可用历史发展之辩证法来说明的。英国的机器是历史创造出来最强大的发展动力，但这种机器在英国是在长而缓的历史过渡中，一步一步制成的、创造的。人的意识普通异常之保守，发展太缓，进步的印象就很难映进人的天灵盖里去。这是事实。主观主义者如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人的意识，批评的精神以及其他动力能够推动整个历史。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历史动力是生产力，如果发展是和缓的、有机的、不大感觉得到的，那么在人脊背后的生产力，就很难映进人的保守的天灵盖里，使之发生政治观念之火花。但如果宗主国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模范国家的生产力（譬如英国）侵入较落后的国家了（譬如十

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的俄国，特别是现在的亚洲），如果革命动力侵入和破坏旧制度了，如果发展不是和缓的、有机的，而为怪异的经济震动，怪异的旧社会层次破坏，那么批评的精神就随着国中理论上必要的先进者而尽量发泄出来：这就是马克思所以产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列宁所以产生在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的俄国之故，这也就是我们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历史最长的国家中，看见最保守的、最顽钝的工党这个怪现状之故。同样在欧洲范围里，经济上、文化上最落后的俄国，而有世上最优良的共产党之事实也可说明。

俄国在经济发展上，正处在资本主义模范国家（譬如英国）和殖民地国家（譬如印度或中国）之中间地位。东方诸国发展与英国之比较，较之俄国和苏联全体与英国之比较，其差别更加明显。资本主义是以外国财政资本形式侵入殖民地的，它摇动了、消灭了殖民地的旧经济基础，一下建筑起新经济的巴比伦塔，因此资本主义于东方诸国之影响映进人的意识，将不是和缓的、进化的，而为突变的，在许多情形之下，其突变且更甚于苏联。

估量东方诸国在最近几年或几十年的政治地位，应该用这个观点。请拿英美银行家的一九二一、二二、二三年账簿来看，你们在伦敦、纽约银行结算的数目中，就可推算出东方诸国未来的革命命运。英国已恢复其为世界债权国资格了；美国积累无数的金子，在中央银行储藏室中，堆着值三十万万美金的金子。请问英美将这些款项借给谁呢？给苏联吗？你们知道资本家们是不肯的。德国？人也不给。法国？只给一点救济佛郎跌价。究竟给谁呢？

英美资本家们是拿来借给殖民地国家的，他们将东方诸国工业的发展都财政化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所得于英美比较 <， > 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所得于英美要少一倍至二倍，而现在情形则恰相反，东方诸国所负债务已超过，且多量超过旧资本主义国家所负担的了。为什么？原因很多：一方面不信任破产的、贫血的欧洲，有疯狂的、将引起新战争的法国军国主义为其心腹大患；他方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能供给原料、购买机器和制造品，又是英美所需要。所以大战中以及现在，我们看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之狂热的工业化，如日本、印度、南非、南美等；如果中国的德谟克拉西政党（国民党）成功，将中国统一起来，在民族德谟克拉西制度之下，那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将雷厉风行，也是毫无疑问的。所有这些就是预备下无数无产阶级群众之动员令。他们突然从有史前的半野蛮生活蜕化出来，而钻进工业的热水瓶里；往时积累下来的世纪渣滓、腐旧成见和信仰，已在断头台上斩断，而现在他们的意识已迫得他们去找寻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的道路了，而日本、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共产党已发现、存在，且将尽量地发达了。

东方诸国劳动者同志们呵！你们记得俄国革命前辈于一八八三年组织了一个“劳动解放社”。这桩事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是很久久的。自一八八三年到一九〇〇年是十七年，自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十七年，一共三十四年，居然是一世纪之三分之一了。自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成立到无产阶级取得“沙尔”制度的俄国政权，中间整整过去一世纪之三分之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觉得很长久，但在历史观点上看，这只是一瞬间罢了！而在东方诸国，发展的步骤，比这段时间更要快些。你们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东方诸国“劳动解放社”之栽培者呵！

不错，东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是有大的危险，不应闭目放过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有一派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学生——他们随后变成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走狗，宪政民主党人，且有许多走入十月党或更右的政党。俄国那时在政治思想上还未分化。马克思主义证明资本主义发达之不可免，于是一些为资本主义去欢迎资本主义的人，都拿马克思主义做招牌，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抛弃。这种情况在罗马尼亚也有，现在罗马尼亚的支配人物大半经过马克思主义学派。塞尔维亚也有许多保守派、反动派政治家，当其少年时代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保加利亚也有同样情形，不过比较得少罢。总而言之，这可算是俄国和欧洲东南诸国的共同现象。这个危险将恐吓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么？是有一部分的。为什么？因为东方的民族运动虽是历史的进步动力，譬如印度独立斗争是很进步的斗争，但这种斗争终限于民族资产阶级范围里。又如中国解放斗争，孙中山思想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进步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终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主张共产党人拥护中国国民党，推动它向前进步。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此地就有民族德谟克拉西思想复活之危险。同样东方无产阶级在那还在进步动力的民族斗争条件底下之国家里，对于这种进步动力自然应加以援助，但东方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都有脱离“劳动解放社”之危险，都有流于民族思想之危险。然而你们究竟占得便宜的，你们比较过去的俄罗斯、罗马尼亚及其他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多得一点便宜，即你们生活和工作不仅在马克思时代之后，而且在列宁时代之后了！

你们的便宜在乎你们的青春期的从那正走入历史去的一个时代——列宁时代——生活和长大起来。你们在校报上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之辩论：一派以为马克思是一位纯粹的理论家，而别一派则反对之，以为马克思也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正和列宁一样，理论与实行相辅而行的。后一派意见自是不错，但这二位历史人物中间却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别。马克思主义不是学院派学说，而是革命行动的骨干，马克思还告诉我们说：“学说只好解释宇宙，我们应该改造宇宙。”但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有为劳动运动利用之可能么？马克思能将他的主义一滴不漏地用在行动上头么？马

克思有可能和(?)行动彻底实行他的革命理论么?自然是不能的。马克思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一位学院派学者,他完全从革命长大起来,他在一八四八年著成有名的《共产党宣言》,那时他就说破了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预见和预言这种德谟克拉西之破产,他在伦敦著成《资本论》,他又是第一国际的手创者,各国工人阶级先进团体的策略之指导人。我们简单地自问:“谁是马克思?”我们可以答:“马克思是资本论之著作者”;我们自问:“谁是列宁?”我们也可以答:“列宁是十月革命之著作者。”列宁比谁都知道他不是修正马克思,都知道马克思定出规律,而他降生(借用《圣经》上语来说)不是为修正规律,而是为执行规律而来的。他比谁都知道这个。然而亏得他能够从生活在马克思与他中间一辈人的作伪底下,从麦克唐纳尔一派人的作伪底下,从高等工人保守性、官僚性的作伪底下,将马克思拯救出来,亏得他能够将洗清了作伪和冒牌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完完全全应用在行动上头。你们一辈的最大便宜就在你们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了这个工作,就在你们看见这个工作之完成,而又在东方大学中从容研究这个理论。这是个巨大的便宜,因为马克思在其理论中虽能解释十年和百年的发展步骤,但他的学说随后已部分地变了态,到了列宁才将他的学说整理起来,应用在广大历史范围的行动上。你们已看过这个行动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是建设在这行动上头的。

根据以上所说,所以我以为民族德谟克拉西思想复活之危险虽然存在,且能陷入,但已不如前此之甚,这是马克思思想之历史的证实。东方大学出来的学生在东方诸国无产阶级运动中将占阶级发酵的、马克思主义发酵的、列宁主义发酵的地位。革命对于你们的要求是很大,这个要求之发现不是按部就班的,不是进化的,而是突如其来的。你们试读列宁近著之一:《好的必是少的,我们总要好的》。这篇文章讨论专门问题,但也论及东方诸国发展前途与欧洲发展之关系。文中根本思想在乎:西方革命发展或至留滞不前,其原因乃麦克唐纳尔一流人之抵抗革命,因为他们是欧洲最保守的势力——土耳其废教皇,麦克唐纳尔反恢复教皇旧位,这岂不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明西方孟雪维克主义与东方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冲突?

这二种势力中究竟谁是反动的?自然是麦克唐纳尔。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土耳其现正尽它的进步的历史任务。再举阿富汗为例:英国在阿富汗推翻那些要欧洲化阿富汗国家之民族资产阶级左派势力,而恢复最黑暗的、生于成见的回教及教皇信仰等等。我们看见欧洲发展怎样为高等工人阶级之怪物的保守主义所包办,欧洲经济怎样逐渐坠落与解体。欧洲寻不见出路:一方面美国不信任,不允借款,他面英美都需要将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财政化,同时就催促这些国家狂热地走上革命道路。如果欧洲长远为行会式的工人贵族,为孟雪维克的麦克唐纳尔派所把持,革命运动重心就

将完全移向东方去。从前需要英国资本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借着资本主义革命动力之帮助，才将旧俄国与旧东方提高起来，将来则需要东方革命，才能钻进英国，破坏或扩大顽钝的天灵盖，灌输革命冲动了。

我在你们校报中，看见一段消息，即在你们大学听讲的土耳其女生回到车站去，有许多老的、不识字的妇女围绕着她探询新闻等等。这是一件小事，然而这是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的。波尔扎维克主义之思想、势力及实质乃在这个主义并非向高等工人阶级说话，而是向更广大的、全体的、下层的、百万人的被压迫中之被压迫的群众说话。所以波尔扎维克主义成了东方诸国所爱的学说。你们的校报又说，列宁名字不仅传播到高加索山上，且及于印度。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劳动者虽然一生无机会得读列宁一篇论文，但能猜想到列宁学说是为奴隶、为被压迫者谋利益的。列宁主义又特别为劳动妇女所欢迎，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劳动妇女更受压迫的阶级啊！我看见校报上这个女生消息之后，引起我前在巴库短期逗留中之一段回忆。我看见和听见土耳其女共产党员，我在会场中也看见她们，看见和听见她们发出来的热忱：她们昨日做过奴隶之奴隶，今日听见解放新论，其欢呼自不待言了。那时我第一次很明了地想而且自己告诉自己说：妇女将在东方民族运动中比欧洲、俄国更有伟大的作用啊！为什么？因为东方妇女受压迫、受成见包围，要比男子加万倍。新的历史吹嘘、新的经济关系，以比解放男子更大的力量、更突变的形势，将妇女从旧习惯底下解放出来。我们现在东方看见回教的统治，旧成见旧信仰之统治，但这些现在已逐渐化成灰尘——譬如一匹腐化的纱布，外观还是完好，各种花纹也很明晰，但只要轻手一动，微风一吹，整匹纱布都四散纷飞化为灰尘了。即如此次回教皇之废除，在古董的东方似乎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然而废除教皇者竟毫发未伤，于此可见东方的旧信仰是已经腐化的了，可见一旦劳动群众革命运动兴起，这些旧信仰将顷刻灰飞不能为革命障碍了，同时又可见生活最受摧残、创造才 < 能 > 最受抑制之东方妇女——奴隶之奴隶——一旦揭开几重面幕，她们的旧信仰尽数动摇，她们必有狂热的渴望与需要一个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意识能够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于是乎东方再没有更良好的创作者、更良好的替革命思想、替共产主义思想奋斗的战士，能够超过于觉悟转来的妇女——东方的女劳动者了！

总而言之，东方大学是出产世界历史酵母的。英美财政资本摇动东方经济基础，鉴穿了这个基础，一层层地拆开，将旧的破坏了同时又引起向新的需要——你们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之新种子的播种者，你们工作的成效将无限地超过前辈马克思主义者工作的成效了！

然而我是不愿意以任何东方式夸大的态度做出这个结论的。我希望你们决不至于

误会我的意思，因为如果存了这种教士式的思想，存了这种轻蔑西方的心理，就将迅速地流入民族德谟克拉西思想里面。共产主义者，东方民族革命者不应这样，你们在东方大学中应该懂得阶级思想与势力之世界运动是向着一个伟大目的走去的，你们应该懂得联络印度人暴动，中国苦力运动，国民党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政治宣传，朝鲜人独立奋斗，土耳其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复兴，高加索文化运动等等，他们应该懂得将这些势力联合于第三国际在英国工作与斗争之上——固然那里工作进行极为迟缓，且出于我们希望之外，然而共产主义蝎子终究要钻穿麦克唐纳尔顽固的天灵盖啊！这种理论的和政治的训练，你们应该在东方大学内取得，这个大学将变成由莫斯科联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运动种种线索之总汇。

你们的第三周年纪念自然是个小的纪念。你们之中许多人才到马克思主义的门限，这个我在校报上看你们的辩论就可知道。但我敢说，你们究竟多占得一点便宜，即你们已经不是在小研究社中，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入门，列宁主义入门，而是在列宁主义灌溉的地域内，在列宁主义空气充满的地域内研究了！你们已经不仅在书本上研究列宁主义而兼有可能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空气中学习列宁主义了！这个不仅指苏联领土内的东方民族而言，从其他东方诸国来的也是一样。帝国主义统治亚洲之最后一页开始了么？它的统治将于一年、二年、三年或五年内完毕了么？这个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每年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批一批地送出共产主义者，送出列宁主义者，他们都学过列宁主义初步，而且能应用这个初步到实际上去。经过了一年我们就有一批学生，经过了二年我们就有二批学生，经过了三年我们就有三批学生。如此类推下去，到事变严重爆发的那一天，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来的学生众口同声说：“我们在此地！我们已经学会了一点啊！你们——东方的奴隶们，听着！我们会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国际思想译成中国文、印度文、土耳其文、朝鲜文，我们也会将东方劳动群众的痛苦、感情、要求、希望译成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译成革命科学的文字啊！”

“谁教你们这个？”“我们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来的啊！”同志们！在你们的第三周年纪念日子，我结束我的演说辞：“敬祝你们的大学：光荣！光荣！光荣！”

一九二四，三，二一。

黎明期的台湾

沫 云

近代台湾史的第一篇——现在的经济状况——政治现状的解剖——文化状态一瞥——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台湾与社会革命。

（一）近代台湾史的第一篇

追溯过去台湾历史之构成，生番是台湾最初的住民。当十六世纪的时候，西洋商船已经在东方海上飞走，而生番们还在经营原始共产社会的生活。狩猎是他们那时的基本生产方法，十余万人口结成几百个大部族，一切食品和器具为各该部族的共同所有物，阶级和国家那时自然还说不上。日、月、巨石、大树、猛兽，是他们所日日崇拜的神。虽然有极简单的言语，却还没有文字。

这样到了一六二〇——一六三〇年，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便先后经过地中海、印度洋，一直到了东亚。这个海上的孤岛，就被占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共同领土了——南方为荷兰人所有，北方为西班牙人所据。

到了一六六二年，明将郑成功战败于清兵，闽南一带也归清军所有，于是郑氏便引兵东渡到台湾。那时台湾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为数极少，所以台湾就为郑氏所占了。自此以后，每年都有大批的移民，来自福建的漳州、泉州，广东的惠州。经济落后的生番，便为汉人逐到深山之中，而台湾就完全变为汉人的殖民地了。在这个时候，台湾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不久郑成功之孙投诚满清，于是台湾就为福建省的一部分，变做大清帝国的领土。

到了甲午之役，日本坚利的战舰，一举而打倒满清的弱兵，清廷不得已便和日本讲和，在那丧权辱国的和议条约第二条，便轻轻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了。这个割让的消息一传到台湾，全岛上下均大为震骇，后来竟自立为“台湾共和国”，推举当时的巡抚唐景和为大总统，募兵买马，建筑坚垒要塞，大有独立形势。然而那年八月，巨大迅速的日本战舰，包围了孤岛的台湾共和国，数十万雄兵，由南北各海口上陆，灿烂的剑戟和精锐的枪炮不久就把台湾讨平了。而台湾遂又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了。这正是一

八九五年——距今三十年前的事情。

(二) 现在的经济状况

离福建省约二千里的东方海上的一孤岛就是台湾。岛的周围约二千余里，面积和日本的九州相伯仲，约有朝鲜六分之一。现在的住民大约可分为台湾人（即福建、广东去的移民）、日本人、生番、外国人四种。据一九二二年的统计，台湾人有三百六十一万四千二百余人，日本人有十七万七千九百余人，生番有八万三千一百余人，外国人有二万九千三百余人，总共有三百九十万四千六百余人。

日本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已经完全把整个的台湾抢在手中，于是一切的经济利益，也完全是日本资本家独占去了。全台湾住民的日常用品，自大至小没有一物不是日本的工业品，一切的工厂和银行皆为日本资本家所设，工业原料也完全是日本资本家的专有物。

最近几年间日本和台湾的贸易状况如下：

年 次	输出品价额（元）	输入品价额（元）	合 计（元）
一九一二	六二·八八六·八二四	六二·六三七·一三三	一二五·五二三·九五七
一九一六	一一二·二四七·九四八	六五·〇二一·六〇〇	一七七·三六九·五四八
一九一七	一四五·八〇三·七三三	八八·八八七·三六一	二三四·六九一·〇九四
一九二〇	二一六·二六〇·五八〇	一七二·四三七·〇九五	三八八·七〇一·六七五
一九二一	一五二·四三八·五〇〇	一三三·九五四·四一八	二八六·三九二·九五八
一九一二	一五七·八六四·九七五	一一九·〇五九·三〇九	二七六·九六〇·二八四

在这个表中的“输出品价额”是指台湾商品输入日本的数目。但是“台湾商品”不是台湾人所生产的商品，而是日本资本家在台湾所经营的工厂的生产品。所以这些“输出品”的利益并不是台湾人的，而是日本资本家的。在这个表中的“输入品价额”是指日本商品之输入台湾的数目。所以这个“输出品价额”和“输入品价额”的“合计”，完全是日本资本家的利益。

其次，在原料出产地直接经营工厂，事实上有莫大的便利，并且台湾的工资极廉，于是日本资本家也渐渐移植资本于台湾了。一方面日政府当然也用种种的方法，来保护其在台湾的发展（比如不许台湾人独立组织公司，强迫农民种工业的原料品——如甘蔗，对于这样原料品由工厂和政府强定一定的价钱买收，政府对于工厂每年给许多津贴等等）。据一九二三年六月的调查，台湾制糖公司的资本金和工厂数目及最近几年间糖的出产数如下：

制糖公司的资本金及工厂数（第一表）

公司名称	资本金（千元）	工厂数
台湾制糖株式会社	六三·〇〇〇	一一
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	二七·二五〇	二
东洋制糖株式会社	三六·二五〇	六
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	二五·〇〇〇	六
明治制糖株式会社	三七·五〇〇	五
帝国制糖株式会社	一八·〇〇〇	五
新高制糖株式会社	二八·〇〇〇	三
台南制糖株式会社	二〇·二五〇	三
新兴制糖株式会社	一·二〇〇	一
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	三·〇〇〇	一
台东制糖株式会社	一·七五〇	二
新竹制糖株式会社	七·五〇〇	一
沙辘制糖株式会社	二·五〇〇	一
日本拓殖株式会社	一〇·〇〇〇	一
计	二八·二〇〇	四八

糖之生产额累年统计表（第二表）

年次	出 产 额（斤）
一九一三	一一九·一四九·二四四
一九一五	三四七·四四六·三九八
一九一七	七六三·四九〇·二七三
一九一九	四八六·三五四·五七六
一九二一	四二一·二二三·六〇五
一九二二	五八八·四四七·二七三
一九二三	五九二·二八三·四七五

第一表以外旧式小工厂还有二百十七个，和第一表中的新式大机械工厂，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资本。受日本资本主义的侵入而产生的新无产阶级（以前大部分是小农民）大部分都集在这些工厂之下，为劳苦的劳动者。

台湾其他的产物也很丰富，一九二二年各重要工业品的出产价额如下：

品 名	出产价额 (元)
木 材	三·六二一·六五四
水产物	一〇·三一八·三七三
矿 产	一二·四八四·七二八
茶 叶	一五·六九一·八七一
酒 精	二·九四八·五三三
面 粉	二·〇一三·六五四
盐	一·八四五·〇三四
樟 脑	九·二八〇·二八六

农业也还是台湾的主要产业，一九二二年的调查，农民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其详细数目如下：

种类别	人 数
自 耕 农	六九五·七二九
佃 农	八七二·九二一
自耕农兼佃农	六五一·六五二
计	二·二二〇·三〇二

主要的农产物是米、番薯、茶叶、花生、甘蔗、大豆、果物、烟草、蔬菜。一九二二年的出产数目，列表如下：

品 名	数 量
米	五·四四五·八一四石
番 薯	一·五八二·九九一·三二四斤
茶 叶	一八·六九三·五七六斤
花 生	三六六·六六一石
甘 蔗	六·七五七·八三八·二八六斤
大 豆	一〇一·〇七五石
苧 麻	一·六九三·六七二斤
黄 麻	四·八四四·二五九斤
香 蕉	一三一·三九九·七〇一斤
烟 草	二·八三八·八五九斤
甘 橘	一四·九九九·五五九斤

现在大地主很少，中等的地主甚多，而这些地主，大部分一方面是小商业资本家。

专卖制度和租税制度，是宗主国对于殖民地最有利益的榨取法。这二种直接的榨取在台湾是如何的状况呢？

现在台湾的最有利益的物产——盐、樟脑、烟草、酒，已经实行政府专卖制度，还有在世界上已经完全禁止吸食鸦片，日政府因贪着有大宗的利益，并且一方面能使台湾人的体格脆弱，于是也收为专卖品之一，由政府公然贩卖。国际联盟的什么“禁烟条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之前，也只有拜倒脚下了。

现在把最近三年间的各专卖品销出价额列在下面：

年次 品名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鸦片	六·七二一·六四七元	六·〇〇一·六八〇元	五·四四九·四三五元
盐	九九七·七七八	一·八一九·八七四	一·八四五·〇三四
樟脑	一一·八四四四·九七	五·一七八·二八六	九·二八〇·二八六
烟草	一二·五五四·六八一	一一·五三一·八五〇	一〇·七四六·三一〇
计	三二·一一八·六〇三	二四·五三一·六九〇	二七·三二〇·九七五

此外，酒是自一九二二年方才施行专卖制度的，所以现在还没有统计可考，然而在没有施行专卖制度以前，日政府每年都有五百余万元的造酒税可收，那么现在政府的利益有多少，也可想而知了。

租税的榨取，也是个极可惊的数目。其种类有：地租、所得税、矿区税、输入税、吨税、制茶税、砂糖消费税、骨牌税、织物消费税、酒糟税、印花税、火油消费税、卖药印花税、酒精税、官有地耕作税、地租附加税、所得税、附加税、户税、营业税、杂种税、市街庄税等，一一算起来实在令人几天也数不尽。可惜现在没有详细的统计可考，所以不能有十二分明白的说明。但某君曾在《台湾杂志》做过一次详细的计算，据其结论说：“三百六十余万的台湾人，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年约负担四十元左右的租税。”

并且在台湾的日本人——自无产的劳动者至大资本家，除极少数的人们有极少数的税金以外，其他完全没有丝毫的租税。

(三) 政治现状的解剖

各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一切政策，当然是根基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利益而决定。在资产阶级刚刚推翻封建权力，而建立资本主义的时候，对于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本国为本位的所谓“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发达到生产消费品的工业的时候，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是其经济上的唯一信条，殖民政策也就变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许其自治的自由贸易主义。资本主义再发达到钢铁工业的时候，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便变做保护政策和独占主义，平和主义便变做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了。在这个时候的殖民政策也就变做极端的反动和压迫了。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属最近的事，而它正在要向国际间飞跃的时候，马上就碰

着欧美的先进势力了，于是日本资本主义自初就是帝国主义。在他的发达史中间没有自由贸易主义时代，所以殖民政策也只是极端的压迫主义了。现在的台湾政治状况，便是这个理论的事实。台湾的最高政治机关叫做“台湾总督府”。日本皇帝所任命的台湾总督，当然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台湾总经理，而对于台湾人却是封建时代的专制皇帝。一九〇六年，日本国会根据法律第六十三号，以台湾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统交给与台湾总督一人。所谓立宪的君主国家，在殖民地便变做握有一切人民的生死全权的总督独裁制。三百六十余万的台湾人，只可做最下级的胥吏——如警察，以外丝毫的参政权都绝对没有。有个什么“无赖汉取缔令”，对于日人的政治若有丝毫的反抗，便说你是无赖汉，只有警察官吏的一件文书，便把你的一生葬在台湾的东南边的一个小岛——叫做火烧岛，一切的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人民权利，也绝对没有。不但如此，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认为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殖民地也就极不安稳，地方官厅一道命令，便会把人民所有的土地收为公有。一九二〇年，因恐台湾人之反抗，于是公布了所谓“自治制度”，自此以后，便用那“总督独裁的自治制度”，把些渴望自治制度的一部分台湾人，欺骗得麻木不仁，总督的独裁制，便得到更巩固的保障了。

（四）文化状态一瞥

一说起台湾的文化状态，那真要令人连哭三天了！我们先看一看教育的状况如何？台湾的教育权当然也完全握在日政府之手，他们的宗旨，当然是在“养成日人的奴隶”。不但中学、小学，台湾人不能自己设立，就是极旧式的书房，也在取缔之列。自小学起就禁止三四百年来台湾人日日所用的汉文，这自然是欲断绝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全台湾人的中等教育学校，全体不及十个，并且都是极低级的，除教些日本文及浅薄的商工业知识，以供日人的驱使以外，哪里还有什么东西？不但政治、经济、法律等等的学问无从研究，就是文学、美术等的东西，也都无从学习。

可是后来跑到日本去读书的渐渐多起来了，并且这些日本的留学生，在日本比较地能吸收些自由思想，于是政府又怕起来了。因此便有一九二二年的所谓“新教育令”发生。据这个教育令所定，台湾人得入在台湾的日本人学校（以前是把日本人的和台湾人的学校分开，日本人的学校程度当然高一点），就是实行一种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同学制度。施行这个同学制度算是日政府的空前的大胜利。不但无知的台湾人都大大地欢迎，就是那些反对以前的教育制度的所谓知识阶级，也都莫不磕头鸣谢，以为这是日政府对于台湾人的平等待遇。可笑呀！原来日政府之所以许可台湾人和日本人同学，是个极端凶恶的毒计。因为日政府觉得若把台湾人和日本人分开教育，实在很难把台湾人化为日本人，于是便想出这个法子，一方面向台湾人说：“日政府已经许可台湾人

进日本人的学校，这是个日台人无差别的平等待遇”，使那些不明白的台湾人欢喜个不得了；一方面便能在最短期间以内，使台湾人尽数日本化，以便供其自由驱使。

台湾的教育状况既然这样，其他一切的文化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单就出版物一项来说，三百六十余万人，连一种小刊物都没有，到了近年来在东京的留学生，才发刊了一种《台湾杂志》和《台湾民报》，这算是台湾破天荒的大创举，然而却是极非革命的台湾资产阶级之机关报。

至于社会上一般人们的思想是如何呢？大部分都还脱不了宗法社会的支配，他们所崇拜的还是孔子。他们只把“满清皇帝”换做“日本皇帝”。日本政府对于这种宗法社会的封建思想，当然也极端地提倡和奖励。

可是台湾产业的发达，也渐渐产出新思想来了。这个物质条件的反映，便是下面所要说的解放运动之先驱。

（五）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

一九一五年南部的多吧呢，曾有一次反抗日人的大暴动。多吧呢一镇约二万余人民，全体挺身举行大暴动，然而很可怜！这一次暴动的极幼稚，好像中国义和团一样，所以就被日本兵用那精锐的机关枪打得鸡犬不留。结局在几点钟之内，被杀的和被日人活埋而死的有二万余人，一切无知的妇人和小孩子，也都在惨死之列。

到了近年，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又必然地培养出反对它自己的新阶级出来。这便是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

前面已经说明，本来在日本资本主义高压下的台湾，自身差不多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言，然而在小工业和商业方面，却也有些微的发展——自农业到商业、小工业的发展。于是乎新兴的台湾小资产阶级便成立了。而这个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和那独占台湾经济利益的日本资本主义，其利害自然完全相反。因此台湾资产阶级随其本身的发展，也就渐渐露出反抗日本统治的面目出来了。可是台湾资产阶级还正在那学步的幼稚时代，所以也就不能像印度朝鲜等处一样，做比较革命的行动，而只在于所谓“台湾议会”的参政权运动恋恋不舍而已。他们要求在日本法律的范围内，许可他们在台湾另设一个立法机关，即台湾议会。一切关于台湾的政策和法律，完全由这个机关处理（见《平平旬刊》“我的自台湾议会到革命运动”）。

这个台湾议会设立运动，仅仅是“半自治”的运动。其方法也只是派些代表到日本国会去请愿，台湾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那样的薄弱，他的解放运动也仅仅是这样而已。

可是将近死期的日本资本主义，其掠夺殖民地的程度，自然而然得更凶恶更反动。所以去年十二月，便在台湾全岛举行大检举，一切关于台湾议会运动的重要分子，全

体被捕去了。再看最近形势，台湾议会的运动无形中已经消灭，于是台湾小资产阶级的非革命的半自治运动，也就告终了。那么，此后的台湾人，应该如何呢？前进呢？后退呢？起来求自由呢？静坐待死呢？

（六）台湾与社会革命。

台湾社会的状况虽然这样，而思想的前驱已经走到社会主义了。

有人说：“现在的东亚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社会革命之前，应当有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中国如此，印度如此，台湾也应当如此。”

是的，现在的中国，当然非举行全民族的国民革命不可。然而在台湾却不应当这样。原来台湾的资产阶级是极幼稚的，并且将来也没有发展可言。现在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落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渐渐变为无产阶级，这样而至于全台湾人的无产阶级化。

一方面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台湾的无产阶级运动便是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日本朝鲜和台湾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一个整个的东西。日本、朝鲜和台湾的无产阶级运动，应当站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应当自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形势出发。

这样台湾的解放运动应当超越“国民运动”，而参加全日本的社会革命运动了。台湾解放运动的意义，不在第三阶级而是在第四阶级了。我们要看的并且应当看的，是全台湾人的解放，不是特殊阶级的解放了。

台湾人的解放运动，自然非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不可，尤其是非有日本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不可。别方面日本的社会革命——东亚的社会革命，也应当有台湾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日本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第一是掠夺本国内的无产阶级而存在，第二是榨取朝鲜和台湾等处弱小民族而发达。所以朝鲜和台湾的解放运动，就是暗示日本资本主义的死期。这便是台湾人在日本社会革命——东亚社会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使命。

使命这么重大的台湾人呀！

要求解放的台湾人呀！

只有一齐团结到日本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去努力！

只有一齐归到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去努力！

沫云同志这篇《黎明期的台湾》，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台湾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侵略，很可以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付殖民地之真精神，中国人读了之后应当作何感想！我在此地希望读者注意，甲午以前的台湾就是现在的中国一样，现在的中国又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心目中将来之台湾呢！但沫云同志的结论，说台湾

将不要经过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即全民族的国民革命，而只要直接行向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未免有点左稚病，这是读者须注意的，并且也是沫云同志应自己明白的。因为在现时的台湾状况之下，在最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台湾，只要作到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已经是不容易了，何能遽谈无产阶级的革命？我们须明白，列宁主义教训我们，凡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须得经过一个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给宗主国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普遍的打击，才能进一步行到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此时的台湾，正是应当作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台湾，而还未到作单纯的无产阶级时期的台湾。所以此时台湾的无产阶级，应该站在第三国际之下，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去领导一切被压迫的台湾民众，作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记者附志）

伦敦会议之面面观

(九月十六日巴黎通信)

任卓宣

伦敦会议是协约国的一个重要会议。酝酿数月，经过一月，到会者十多国，其关系于欧洲政局者，亦可说世界政局者，实大。在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现在要来说它，可分成：（一）伦敦会议的经过，（二）伦敦会议的内容，分述如下。

（一）伦敦会议的经过

（1）伦敦会议的开始

自赫里欧于六月中登台后，要想实行道威斯计划，于六月二十一日即过伦敦拜访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尔；及到七月二十八日，麦克唐纳尔到巴黎与赫里欧再为一度之谈话，于是遂由他们发起，召集协约国，开伦敦会议。其重要各国之重要代表：在法为赫里欧诺列克列曼达尔福煦和达古特等；在意为士大菲利和拉发等；在美为开罗和涡文源等；在比为特尼斯和许满等；在日为黑亚西等；至于英国，当然是首相麦克唐纳尔和他的部下；英国的自治政府和印度，由卑尔古代表。其余的小国如希腊、葡萄牙等，不过像大本营的细卒一样，跟着英美法跑就是了，无足轻重，不述它们，就是日意比也是跟着英美法跑的。角色既已配齐，遂于七月十六日在英国外交部衙门内开演起来。

（2）伦敦会议的概况

这次开会由第二国际的首领麦克唐纳尔当会长。组织三个委员会，分头工作。第一个审查在德国缺乏交付赔偿时应采用之对付方法；第二个研究那些为建设德国财政的和经济的统一之计划；第三个讨论接受德国原料及赔偿方法这一类的问题。至于协约国债务与法国占据鲁尔等事件俱不讨论，因为把议事程序用在专门对德上，比较才可使美英法减少摩擦，完成这个会议。他们虽组织了三个委员会，但每隔几天，又开全体大会一次。只是问题以关系大强国者较多，人杂了不便讲生意，而权亦不集中，

所以在十八日，由麦克唐纳尔、赫里欧、开罗、特尼斯和士大非利等五人组织了一个高级议事会，称为五大。

这个会议可分为两个时代。由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四日为第一时代，这时代的重要工作，是在整理美英法间之差异，一致对德。而对德是公共目的，不难一致，唯美英法间之差异甚大，颇难整理，所以在这时代中间，经过了许多的危险。但美英法三国的差异不是别的，就是它们各自的资本家银行家之利益冲突。因为这样，所以这一时代的会议，简直可说是美英法的财团会议。至美国公使、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不过是粉面登台的傀儡而已！在这个期间中，美英法各有提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法国提议。法国提议是：（一）鲁尔撤兵分成若干步次，在多年后撤完；（二）赔偿委员会宣告德国缺乏赔偿时，不必全体通过；（三）德国须继续交付原料作赔偿；（四）英国在莱因驻兵须维持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应撤之日）以后。自此议通过后，法国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以胜利相夸耀，其实真正的胜利不在法国而在美英财团，法国所得者，仅仅对德方面耳！

由八月六日至十六日为第二时代。这个会议在七月二十八日第三次全体会中，决议召集德国代表，所以自德国代表马克思士脱纳斯曼等于八月五日到伦敦后，会议的第二时代就来了。在这个时代中，大部分是协约国对付德国的问题，就中法德关系尤为复杂繁多，所以好像赫里欧与马克思当面讲生意一样。问题之重要者为撤退鲁尔驻兵和继续原料赔偿等，中间因关系重大，所以赫里欧还于八月九日借口于他与诺列意见不合，回巴黎与普恩嘉资、玛尼诺等商量，于十二日复到伦敦。德国原已决心再投降于国际帝国主义之前，马克思等亦原是卖德国工人的贩子手，他与赫里欧议价，乃纯属掩饰耳目之举。德国根本接受奴隶德国的道威斯计划，就是对于赔偿原料等问题，亦与法以圆满答复。“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若不先就愿低头，如何肯到屋檐下去？这是德代表在伦敦会议中的形势！

（3）伦敦会议的结果

自八月十六日后，宰制中欧的伦敦会议，竟从几度破裂危险中告成功了。它的结果就是：（一）德国对法比煤炭的交付，延长三十五年（原该一九三〇年止）；（二）德国颜色原料的交付，亦延长五年（原该一九二八年止）；（三）法比于签字之日起，开始撤兵，于一年以后撤尽占据鲁尔驻兵。这些条件，是一方面的，他方面还有几个重要条件，即：（一）德国组织一个归协约国所操纵的银行，支付赔款；（二）把德国国有铁路变为私有，亦归协约国操纵，并加重车费运费；（三）美国借八万万金马克与德，作为上述银行和铁路公司之用。总括言之，伦敦会议的结果，就是施行英美专家委员会的决定——道威斯计划，夷德国为国际殖民地，共同吸尽中欧无产阶级身上最

后的那一点血！这个条约，限于八月三日以前，由各国议会通过。八月二十二日，法国共产党议会喀陕在议院大攻击伦敦会议所订条约，到二十四日，法国议院以三三六票对二〇六票之多数通过。德国代表马克思等回国后，连日与天主教派、民主派、社会民主派、人民派各政党联络，赞成政府主张。国家派（国家主义派）始而反对，以后因以总长作交换条件之故，仍然赞成，卒以三分之二的票三一四对一二七通过了实行道威斯计划中之最困难的问题——变国有铁路为私有。就中能反对道威计划到底的，只有共产党，资产阶级政府知其不可收买，乃用驱逐其议员、监禁其议员、封闭其机关报种种方法来对付。因此，德国亦竟通过了伦敦会议所定的条约，甘于坠入国际帝国主义的圈套。于是英美法意比希葡日德及英属自治政府等国，卒于八月三十日签最后的字于伦敦。伦敦会议遂完全告了段落。

这个会议所订的条约，称为“伦敦条约”。原来自一九二三年一月英法巴黎会议破裂以来，法比单独行动，进兵鲁尔，协约国的招牌，早已堕地。而今因口谈和平的麦克唐纳尔和赫里欧之登台，竟破镜重圆。所以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报纸对于伦敦会议的结果，都表示欢迎，称颂协约国开了“一个和平的新纪元”。赫里欧说：“伦敦会议不是和平，是向着和平的第一步。”麦克唐纳尔简直以为“第一个和平条约”。伦敦会议果算成功了么？我敢说这是一时的敷衍！道威斯计划可以实行到底么？英法冲突可以调和了息么？美国势力巩固于中欧，英法可以置之不理么？总之，伦敦会议不过是提高了凡尔赛条约的凶猛程度，增加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将来纠纷！因为欧洲的和平与建设，绝不是将死的资本帝国主义，为祸之根的资产阶级所能维持得了担任得了的！只有工人农人的社会革命才足以斩除一切乱源而创造新的生活！

（二）伦敦会议的内容

伦敦会议的表面经过，已经述其大要了，里面的实质究竟是怎样呢？我们从表面上看来，麦克唐纳尔是劳动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赫里欧是激进社会党等所组织成的左派联合的首领。此次会议，或许要另开一个新面目。其实不然，赫里欧去伦敦时，上议院的信任票，连普恩加赉都是投了的。而麦克唐纳尔亦是得了自由党首领爱士葵和保守党首领包尔温之维持，乃始出席。这样看来，他们不过代表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会议于伦敦罢了。因此，我们要研究伦敦会议，切不可为登场傀儡所迷，我们要看玩弄傀儡的角色。并且我们还要知道此次会议除开财政总长克列曼达尔、士大菲利和财团中人涡文源等公然列席外，巴黎联合银行的代表色冉、荷兰巴黎银行的代表菲拉里都是到了伦敦的。但在了解伦敦会议的内容之先，我们要知道所谓伦敦会议，是实行道威斯计划的会议。伦敦会议的成功，是实行道威斯计划的胜利。而道威斯计划怎么样呢？这是我们要了解伦敦会议的一个先决问题。

(1) 什么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亦称专家计划，是为赔偿委员会所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研究安定德币、平衡德国预算的方法所定出的计划。所以专家计划，是实行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交付赔偿的方案。但这还是表面的形式，因为专家委员会在实际上是纽约摩尔根和伦敦柏诺特等银行所拟定的。此委员会经数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所决定的重要方案有二：

1. 在德组织一以四万万金马克为资本的发行银行，发行纸币五十年，且专占此种发行纸币的权利。银行的组织，在指挥方面，有一为德人所组成的委员会；在检查方面，有一由七德人七外人所组成的总议事会，但此会之表决须十票方能通过议案。至于委员会有一总理，由德人充当，但在总理之旁，又有一委员。此委员之权甚大，譬如纸币须要总理署名，同时亦需要委员署名，否则此纸币便不能发行。因此，这个发行银行一切权力，在名义上为德人，在实际上为外人，完全是操纵德国金融，夷德国为殖民地的工具。

2. 把德意志国有铁路变为私有，以一大公司来承办。公司之组织，有一由九个德人九个外人所组成的议事会。在这十八人中，以九人为常住员，而九个常住员中，须有四个外人，其余五人则由出二十万万金马克的股东派人担任。这二十万万金马克的条件，当然是为美英银行团所留下的了。至于总理，则为德人，但由外人任命，总理之旁，又有一个由赔偿委员会的议事会所委任的委员。所以铁路名虽由国有变为私有，实则是由德国之手移入外人之手——美英资本家之手了。

此外，专家计划还把德国赔偿分为若干年，每年赔偿若干，而款项之来源，亦指出从德国预算、铁路公司、德国实业等处筹出。但要实行此计划，必须以德国经济统一和借入大宗外债为条件。因此，非开伦敦会议不可。所以伦敦会议是解决施行专家计划之先决问题，而确定施行专家计划的。

(2) 在美国方面

我们一看便知道专家计划有三个注意点，即：为美英资本家谋利益，使德国殖民地化，压抑法兰西帝国主义。同时我们知道专家计划是实行凡尔赛条约的，美国并未签字而愿来干此事件，法帝国主义对于英美帝国主义不得不表示让步，这里面实有原因在，我们可一一加以追求。

美国的资本家，是专家计划的决定者，伦敦会议的事实会长（麦克唐纳尔实在只是一个名誉会长）。我们看美国总电气公司的总理道威斯（Dawes）与摩尔根银行密切关系的道威斯，不是专家会议的指导者么？代表美国资本家的涡文源不是专家委员会中的主干，伦敦会议的美代表么？既然美国资本家出头来斡旋专家计划及伦敦会议，

则我们便不可不了解美国的经济状况。

美国资本主义乘着欧战机会，大大发展。其生产全部价值在一九一四年为二四·二百万美金，在一九二〇年为六二·六百万美金，现在它的重要生产品的产量极大，煤占全世界的产量百分之五〇，铁占百分之六二，钢占百分之六〇，煤油占百分之七二，汽车占百分之八四。这样多的生产品，而外间的殖民地不多，所以在一九二〇年发生工业危机，至今尚有二百万失业工人。美国农业，用机器耕种，十分发达。它所产的棉花在世界的棉花产量上，几占其全部，麦子亦占四分之一。但亦因销场有限，发生农业危机。不仅这样哩！美国因为生产得多，所以输出亦多，原来它在大战前欠欧洲五百万美金，不久竟变成了二〇〇万万美金的债主，欧洲倒欠了它一七〇万万。我们看在一九二三年输出多于输入三七六百万美金，在一九二四年前四个月美国银箱子内增加了一五九百万美金，较之在一九一三年前四个月美国全部只有六六·四百万美金者，多一倍半，金子之不断地流入美国也如此！因是，全世界金子有百分之四四都走入美国资本家的腰包内去了。可是金子多了，则利率减少，货币价高，一面使资本生利太少，一面使商品价贵，没人来买。于是金子的膨胀病——财政危机，遂发生了。以上三种危机，是迫使美国有产阶级到处找寻市场的因子。世界的大市场，只有中俄德三处，未为别的帝国主义所垄断。在中国实已销售不了美国的商品，俄国虽需要机器，然是资本主义的大营寨美国的对头，屈指计算，只有德国可作为它的市场，尤其是很好的殖产地带。在美国只能放利百分之二至四，在德便可获得百分之四〇至一〇〇的利息。于是美国遂不得不过问欧事了。

输出需要机会，亦需要保障。德国现在贫困已极，无力赔偿，渴望借款以救眉急。法国既需款子，亦欲为德觅债主而自己才好得着赔款。英国亦有抑制法德之要求。于是有机会了，美国资本家遂乘时贡献其专家计划的妙计。但所谓保障，仍是不可少的。第一要使德国能够维持治安，不致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第二要使德国能交付高利息，且不致收债无着。因为这样，对于德国铁路和发行银行的组织，与使法国离开鲁尔，并使以后不再有占据鲁尔这一类事发生，以保障德国经济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但赔偿委员会为英法比意各出一人所组成，而法代表为会长，有二表决权，且比国常与法一致，所以赔偿委员会为法国所把持。此会有宣告德国缺乏赔偿之权，它一经宣告后，协约国不共同制裁德国，法即单独行动。去年一月十一日鲁尔之占据，即是这样的。现在要保证法国不自由破坏德国的经济秩序，以巩固美国投资的安宁，则一面要法国退出鲁尔，一面要防御其后日之自由行动。所以在伦敦会议中，英美银行家要求把宣告缺乏之权，归诸中立的组织，或取决于该委员会全体代表之同意。法国对此，大不赞成，结果决定美国得派一公民（非由政府派的，因它未批准凡尔赛条约之故）

参加赔偿委员会，有表决权。如表决非全体同意时，每人得诉诸为赔偿委员会全体同意所选出组织之裁判所，或海牙国际裁判所委任之裁判处决定。于是赔偿委员会对德国宣告缺乏事，成为初次判断机关了。如此，法不得自由行动，而美债有法律上之保证。又在协约国全体，或离开协约国的一国着手为对德制裁时，为道威斯计划所预见的利息，要从赔偿交付额中先行取出，而这是要为制裁当事国或多国所保证的。至于支付赔偿的款子，须由以一美国人为总经理人的手中经过。这样，美国借债与德，便得到保障，德国成为美国合法的殖民地，而美国胜利便完全在伦敦会议中夺得。所以伦敦会议，是美国奴隶德国的表示，是美国资产阶级战胜欧洲资产阶级的表示。

《纽约评论》说：“道威斯计划之实行，将置美国于几乎一个自动状态中来整理欧洲赔偿问题。赔偿的总经理人将是一个美国人，美国将能完全统治欧洲的经济形势。而这件事没有华盛顿政府去正式参加讨论过。美国曾经尽其智巧来发生一个果决的作用于欧洲大陆上的危机中，而且简直能继续这样正式拒绝它的政府之一切的参加于此种行动中。”八月六日报载许斯对于美人《留柏》（柏林）报纸的代表说：“我们美国人，我们对于实行此纲领（道威斯计划）的方法是有关系的，是有一个完全特别的样式的关系的，我们以为这个计划（道威斯计划）标出了一个和平与欧洲幸福的新时代之纪元。我们很密切地希望这个计划将来以最有意识的样式来实行。”这些就是美国有产阶级在伦敦会议中已夺得胜利后的凯旋声呀！

（3）在英国方面

在英国方面，我们可以分成对德对法两方面说。

德国是后起的国家，然其资本主义之发展，使英国惊恐。它原来为农业国，自联邦组织告成以来，大踏步地走上工业国地位。本来在一八九〇年，德国所产之铁四六五八吨，尚只能及英国产额九〇〇三〇吨之半的样子；然到一九〇〇年，便以八五二〇吨对九〇〇三吨，几于相等，至一九一三年，则德国所产之一九三〇九吨，简直超过英国所产一〇四二四吨之一倍。至于德国电气事业之能与美竞争，染料工业之专有，海上航业之威迫英国，在在都使大英吉利的帝国主义基础——资本生产，不能够占第一位。德国之所以有这样进步，全由其铁路政策银行政策。资本生产要发达，一面须有充足的资本供工业家之用，一面须容易找得市场行销其商品，德国的银行，分散全国，由地方而中央，组织极好，且特别便利于工业家之借贷。至于铁路之运输原料与商品，取费极廉，对于工业家则可以少费成本，卖价廉而行销易。因此，生产容易发达，产出商品之价，亦比他国为低廉，容易在市场上竞胜。大战虽是把德国打败了，不能与英竞争，然它的银行铁路等政策还是继续。所以到一九二〇年，英国有二百多万失业者，而德国工业还趋于安定。英国为要从根本上扫除这个工业方面的劲敌，故

利用专家计划来抑制德国工业之发展。把银行的发行纸币权握于协约国之手，则将来可以少发纸币，限制借债与工业家。对于铁路，不独要变为私有，使国际资本从中攫利，并要年抽二九〇百万金马克充赔偿之用，增加运费，是不待言的了。这样，就是英国的要求，也就是专家计划的骨子。

战前英国在大陆上的劲敌是德国，战后则变成法国去了。所以英国的政策在战前是联法以抗德，在战后便是扶德（自然不是扶之使强）以制法。它不愿有工业凌驾于它之上的国家，它不愿有军备强过于它的国家。法国的好梦，是在联合亚罗（亚尔萨斯、罗兰）之铁与鲁尔之煤，把自己变成一个工业强国。而它的飞艇，在世界说来，居于第一位。这种继德而起与英争霸之势，实使英国资产阶级恐惧不安。所以使法国退出鲁尔，使法国以后不再单独行动，掠德以自富，裂德以自强，是英国对法国的必要之图。在伦敦会议中，英国企图另组一国际联盟的财政委员会来代替赔偿委员会，不愿延长赔偿原料，否认法国亚罗产品到德不上关税的要求，而欲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撤退其莱茵驻兵，并欲法国先撤兵莱茵后借债于德，都是很明显的例证。一个英国总长在众议院说：“我们须得创造一个航空队作保卫祖国之用，这个航空队就是能够御防那最强的航空队且近于发生危险的这种强国之攻击。”这几句话，不更是明白地对法说话么？

但以上二点对德对法的要求，美国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专家计划由英美银行家道威斯和金达尔士乃来司指导。它们都愿意实行，都愿意来开伦敦会议。

（4）在法国方面

英美既是如此，法国又怎么样呢？

法国的政策是：使鲁尔煤与亚罗铁结合；使南德与北德分离；统治中欧。因为这样，所以进兵鲁尔，一面实行抢劫鲁尔之煤，发展其工业生产；一面压迫德国，使之衰弱、解体，为永绝后患之图。这次在伦敦会议中，赫里欧主张于退兵鲁尔之前，要德国与钢铁委员会（法国铁工业资本家的组合）订一商约，保障鲁尔煤与亚罗铁的配合；又他要求德国继续颜色原料的赔偿，以便发展染料工业和用以制造下次战争所需之炸药，便可知道法国对于这个政策还没有变动一点。至于武装波兰，借债于罗马尼亚，联络捷克斯拉夫，用经济势力征服奥匈，无非在使中欧所有的国家，不为其陪臣，即为其奴隶。如是，则它可称霸大陆，宰制苏俄。它的对象，全在欧洲，与英之顾全世界局面，美之以东亚西欧为其舞台者，大有不同。无如它的力量不充足，所以自一九二三年占据鲁尔以来，生活昂贵佛郎低落，不得不乞援于美。而从今年三月十日法国恰借了美债，佛郎兑换便涨之一事观之，完全证明了法国在此时，不能单独施行其伟略——帝国主义政策。所以专家计划，不仅和平派的赫里欧，努力来实行它，就是

武力派的普恩加赉，也不得不宣言接受。

在伦敦会议中，法国态度为英美银行家所软化。不论它如何要求，英美银行家尤其是美国银行家总以对德借债难之。而在伦敦会议中，态度强硬的，恐怕也只有银行家先生们了。看他们威吓法国的话就可知道。美国代表涡文源在伦敦会议之初（七月中）对法国《巴黎晨》通信员说：“假使这个会议埋葬于讨论细节所产生的原则和误会中，欧洲将要在一个奇大的灾害的打击之下。马克佛郎以及其他的欧洲货币，就是在某种限度中的英镑也一样地包括在内，一齐都要感受一个很厉害的跌落之苦，所以须要完成这个会议于此才可。”许斯于七月底在伦敦比尔格利摩宴会上说：“假使最后确定的整理，不与借银人以圆满期望，会议（伦敦会议）所决定的一切，将无半点用处。”我们更看七月底自许斯到伦敦后，银行家要求更厉害，以致赫里欧拜访许斯之不暇，更与麦克唐纳尔私谈，与摩尔根的伙伴拉孟私谈。所以巴黎《晨报》在七月三十一日说：“看，人对我说，英镑涨到八七，五〇佛郎了，假使会议破裂，这就是一个恐慌你的灾害之隐微的征象。”因为美国一声不借八万万美金于德，则德国永远不能交付赔款，鲁尔问题亦无从解决，美国资本家不论积极地向法讨他们那三五万万美金的债也好，消极地不再借钱于法维持其佛郎价格也好，要皆足以予法国一致命打击，而使赫里欧下台。这是法国不得不屈服于美英资产阶级之前的苦衷！法国一同志说：“鲁尔的占据，是法国对英宣战的表示；专家计划的实行，是法国为英所打败的表示。”其实亦是在伦敦会议中为美所打败的表示。

（5）在德国及其他方面

德国能够接受专家计划么？

德国只有接受专家计划。德国的资产阶级为着要维持其统治，不使工人发生革命，则除借美债以徐图发展和使法国退出鲁尔以减轻一点苦痛外，没有别法。若果不然，则便只有听无产阶级爆发革命之一途。英美之为伦敦会议，亦正欲这样来苏息德国一下，使它能为堵截布尔塞维克势力西侵的保障。至于鲁尔之煤和其工人之剩余价值，德国亦要想为它的资本家克虏伯、梯桑、时丁纳等赎回回来。因此，它愿以德国工人的血去作交换品，再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这个投降，德国资产阶级是受不到几许苦痛的。因为他们的钱出在工人身上，结果不过使生活昂贵、工人增加工时而已！所以伦敦会议，不啻是商量置中欧的无产阶级于二重掠夺之下罢了！

德国工人若果受加工时、减工钱以及生活昂贵之苦痛，则法比英等国内的工人也免不了要继续德国工人之后而受苦痛的。所以德英法诸国共产党对于先奴隶中欧工人次奴隶西欧工人的专家计划，反对不遗余力。德国工人在莱普尼开会被禁止，在埃斯曼开会亦被驱散，然其反对专家计划之坚决和勇敢，仍是要继续发展，不为强力所阻止

的。法国工人对此，亦极为努力，在一切公开大会中，莫不高声反对。至于英国除革命的少数工人反对外，劳动党亦有许多支部不赞成专家计划和伦敦会议。虽是此等反对对于专家计划之施行，不能阻止。但只要时候一到，就要大大爆发的。总之，伦敦条约是第二凡尔赛条约，只有开未来无穷之祸端，绝不能就说把欧洲问题解决了，或者说把赔偿问题解决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伦敦会议是图谋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增加无产阶级苦痛的了。但在劳动运动发展的欧洲，为什么美英法诸资本帝国主义者和德国无产阶级贩子手，还敢于明目张胆这样地做呢？很明显的，是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劳动党为他们作支柱！若果没有这些猪仔业的工党，在议会内投票赞成，维持它们的内阁，他们绝不能如此肆无忌惮！所以我们要反对伦敦会议，专家计划，固然须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但亦须反对无产阶级的叛徒：社会党、劳动党、社会民主党——一句话，第二国际！我们看左派的赫里欧、劳动党的麦克唐纳尔，就是现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化身，而伦敦会议的主席，就是第二国际的委员长。那么，西欧的第二国际之与国际帝国主义难道还不是像中国的封建军阀之与国际帝国主义同为“二而一”的魔鬼么？所以我们反对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亦要反对社会党与国际帝国主义。

后 记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该刊先后由上海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但印量都非常少，这些影印本（繁体竖排版）大多珍藏在大型图书馆的特藏室，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一般读者难以读到。

其实，《新青年》创办初始是想改为横排版的，这个建议最初也是由钱玄同提出来并得到陈独秀认可的。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但是横排版的想法却遭到群益书社的反对，理由是费工且费时。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其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普通读者能阅读到这部重要的中国现代文献。此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谓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年的心愿。

《新青年》简体横排版最初是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席云舒博士利用业余时间，历时6年，将《新青年》繁体竖排版整理为简体横排版电子文档，合计11卷（含季刊和不定期刊）63号，计700余万字。2008年底，宁夏人民出版社经与席云舒博士多次联系沟通，最终达成出版共识。目前，经过细致的加工整理，《〈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终于面世。

《新青年》创办时正处于白话文之滥觞、语言文字规范均尚未形成之际，前三卷只有断句没有标点，第四、五卷大多都是“一顿到底”的标点，这些文章点点滴滴地展示着当时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从不规范向规范发展的过渡。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得到了国家语委厉兵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厉兵教授百忙之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同时，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为本套书

的出版撰写了推介信，原宁夏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龙城顺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聘请了蔡永贵、马丽珠、关爱群、宗志远、王琨、潘忠、吕国安、王丽云、武耀东、苏惠、喻通、白玮、刘涵等 13 位老师对本套书进行了校订工作，出版前我们又特邀了郎伟、李仁安、杨胜利、陈春霞、周惠玲、马丽珠、白玮、陈海洋、喻通、白丽等老师，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付梓之前，对他们的真诚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 年 6 月 25 日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研究新文化的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新青年》都是必读的杂志。它不仅开始了新思想与新思维的历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与精神风采。

此次以简体横排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的传播史，都有不小的意义，是《新青年》传播的重要渠道，将把它从历史的深处拉到今人的阅读视野里，会有亲切的感觉。

孙郁 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新青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随后又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它的创办人陈独秀和主要撰稿人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三位旗手，他们和《新青年》的其他同仁一道，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教授

ISBN 978-7-227-04748-3



9 787227 047483 >

总定价 880.00元